

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

②7

张宪文 主编

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

②7 幸存者调查口述（下）

费仲兴 张连红 编

凤凰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

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

②⑦ 幸存者调查口述(下)

费仲兴 张连红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幸存者调查口述/张连红,张生等编.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6. 1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张宪文主编)

ISBN 7-214-04234-7

I. 幸... II. ①张... ②张... III. 南京大屠杀-史料 IV. K265.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9475 号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张宪文 主编

第二十五至二十七册 幸存者调查口述(上、中、下)

张连红 张 生 费仲兴 戴袁支 编

责任编辑 戴宁宁 曹 斌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凤凰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淮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46.625 插页 12

字 数 1 35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4234-7/K·531

定 价 87.00 元(精装)(上中下)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编辑出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名单

顾问 王忍之 郭永才

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任：何秉孟

委员：蔡文兰 孙 新 谢寿光 徐辉琪
王 正 杨 群 徐思彦

执行编委：王 正 杨 群

学术委员会

主任：张海鹏

委员：王桧林 王效贤 关 捷 刘楠来 张宪文
张振鹍 胡德坤 黄美真 解学诗

目 录

本册说明	1
------------	---

上

一、80年代南京市有关部门及个人调查	1
--------------------------	---

(一)“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办公室调查	1
-------------------------------	---

(二)雨花台区文物复查暨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幸存者、目击者 普查办公室调查	76
---	----

(三)江浦县党史办调查	198
-------------------	-----

(四)徐志耕调查	231
----------------	-----

二、南京大学调查	263
----------------	-----

(一)城区调查	263
---------------	-----

(二)浦口调查	271
---------------	-----

(三)六合调查	365
---------------	-----

中

三、南京师范大学调查	463
(一) 城区调查	463
(二) 栖霞调查	525
(三) 尧化门调查	546
(四) 八卦洲调查	582
(五) 迈皋桥调查	653
(六) 汤山调查	687
四、南京理工大学调查	702
(一) 栖霞调查	702
(二) 汤山调查	738
(三) 麒麟、龙潭、仙鹤门调查	756
五、河海大学调查	770
(一) 板桥调查	770
(二) 西善桥调查	793
(三) 铁心桥调查	821
(四) 江心洲调查	853
六、南京农业大学调查	861
(一) 湖山村调查	861
(二) 仙鹤门调查	881

(三) 孟塘调查	887
七、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调查	908
(一) 淳化调查	908
(二) 秣陵调查	937
(三) 湖熟、上坊、上峰等地调查	950

下

八、南京汤山地区调查	957
(一) 汤山镇调查	957
(二) 上峰镇调查	1216
(三) 麒麟镇调查	1264
(四) 上坊镇调查	1309
(五) 句容及其他地区调查	1315
九、新闻报刊的访问报道	1337
(一) 新闻媒体	1337
(二) 政协文史期刊	1417

八、南京汤山地区调查

(一) 汤山镇调查

1. 韩正礼口述

韩正礼,男,1913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寺桥17号

调查时间:2001年8月14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是黄埔12期毕业的。在国民党18军1师当炮兵团长,淮海战役时在双集堆黄维兵团手下被俘,1975年特赦,当南京市人大代表和江宁县政协委员,现在每月有380元养老费。老伴有病,生活困难。

我老家在句容黄梅桥的南巷,是个大地主,在东葛墟、高庄都有田产。江苏督军李纯是我舅祖父唐庆升的朋友,他在陶锡三的陶庐附近盖了房子,称为“俱乐部”。蒋介石来汤山后,将“汤山镇”改为“汤山镇”,把俱乐部扩大,改称“军人俱乐部”,对外不开放,一个人独享。

跑反时,南巷大刀队的队长杀死了一个日本人,西营房的日本人点名,发现少了一个,便去南巷找尸体。他们到了南巷,就把村上的房子全部烧光了,只有一间供菩萨的房子没烧掉。我老家有一面稻场,许多人躲在里面。日军发现后,就在稻场上把20多位妇女集体强奸了,后来又

把她们抓去当慰安妇。

汤山一线修了许多防御工事,曾被吹嘘为“马其诺防线”,但后来根本未起什么作用。许多碉堡和重机枪掩体、轻机枪掩体连钥匙都未找到,日本人过来时,中央军的部队都是在工事外面打的。南京保卫战,打得一塌糊涂。蒋介石拿士兵的生命不当一回事,未能利用地形,基本上是血肉拼搏,拼消耗。孟塘一仗,不堪回首啊。老百姓对那场战斗的回忆是可信的,参战将领写的回忆录,虚的多,吹的多。国民党军队虚报军情是家常便饭,尤其是王耀武,惯于弄虚作假。

2. 曾宝友口述

曾宝友,男,1927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汤岗村

调查时间:2004年1月19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78岁,原来住在汤山张肖庄的分水岗,后来才搬到汤岗村的。抗美援朝时,我参了军。那时,多少人都争着要到朝鲜去,为自己的亲人报仇,可后来部队没有人朝参战,一直驻扎在南京城里了。1955年复员:现在政府每月给我160元钱,我是老党员,另外再给60元。两个儿子没有正式工作,我吃的米和菜都是他们给的。爱人在20年前因病去世了,现在我一个人过。

鬼子打到汤山来的那年,我11岁,给地主家放牛。那年冬月里,我亲眼看到鬼子的坦克沿着宁杭公路从汤山镇朝西边慢慢地开过来,边开边向山上打炮。坦克后面是步兵,一步一步地跟着。山上有国民党兵,他们没怎么抵抗就向西撤了,附近没有打过什么有组织的阻击战。鬼子的坦克朝山上打炮,山上一打就烧起来了,但没有引起大火。那时候山上树不少,但柴不多,柴都被老百姓割光了。我家十几口人就躲在于右任别墅防空洞东边的小山包上,离防空洞很近,没有被鬼子发现。我亲耳听到一个中国人在洞口喊:“洞里有人吗?你们不出来就烧死你们!”结果,躲在洞里的老百姓都被日本鬼子打死了。后来,听别人说,有一个

人活着逃了出来。第二天刚天亮,我们觉得躲在这里太危险了,就翻山过去,到朱砂洞那里。翻山时,看到肖家一个姑娘死在山路边,手里端着一碗饭,身上衣服全剥光,下身有根木棍戳在里面。她是被日本鬼子强奸致死的。

我们一家在朱砂洞底下一个姓谢的老表家里住了两天,鬼子就跟过来了。一共三个,脸上都很脏很脏,两个人拿长枪,一个人拿短枪。当时老表家里躲了七八十人,有西山头的、寺庄的、徐家边的,都以为这里偏僻,安全些。谁知偏偏在这里碰上了鬼子。我是第一次这么近看到鬼子,心里非常害怕。鬼子叫我们把衣服脱了,挨个地看手掌,看前额,看肩膀。有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留了个洋头,剪得又不齐,七豁八豁的,手臂上有枪伤,腰里又束了一条皮带,日本人就以为他不是农民,要他跪下,用勃朗宁手枪打他。那个小伙子双手直抖,惊恐万分。鬼子开了两枪,没打死,便端起刺刀戳他。他双手抱住刺刀说:“疼死了,你们再给我补两枪吧!”鬼子又打了两枪。那一次,人群中没有几个小伙子,鬼子查了一会就叫人带路,到上曹村那边去了。

后来,我们就不敢躲在姓谢的老表家里了,一起进了朱砂洞。年轻人大多数都躲在朱砂洞里。过了不久,另外一批鬼子又来了,向老百姓要大米,要花姑娘。两样东西都没要到,他们就放火烧房子,把一个姓谢的看门老头烧死了,我晚上出洞亲眼看到的。那老人烧得卷缩成一团,死的模样非常吓人。

我父亲叫曾金良,当时40多岁。他一看躲在洞里也不安全,就带了我们躲在洞下边大山沟的石缝里。第二天,有个上海人带了鬼子从山上下来,我们见了就跑。日本人找到了我二伯曾金富,问他要大米和花姑娘。我二伯说:“大米没有,花姑娘也没有。”后来,鬼子找到我们藏身的石缝,找到了一点米,就说:“你们良心大大的坏了的。”因为见过几次鬼子,我们不像以前那害怕了。二伯牵了一头牛到山沟里去喝水,鬼子瞄准放了一枪,把他打死了。

后来,我们又回到了朱砂洞里。有三个鬼子又上山来了,一直走到朱砂洞。当时,朱砂洞旁边有庙宇,有三间瓦房,住着一位老道和两个徒弟。老道士有四五十岁年纪,对鬼子特别客气。他先跪下,让鬼子检查,

但鬼子没检查出家人。他们不知从那里弄来两个女的,一个十八九岁,听说是汤山街上人;另一个二十三四岁,头发剪得七豁八豁的,脱了衣服就睡觉,鬼子就没有打人。这边,老道便请鬼子喝酒,一直喝到下午两点多钟的样子。有个鬼子喝醉了,见人就打,把庙里一堆劈好的木柴点火烧了,大家都吓跑了。那两个没喝醉的鬼子就带了两个女的回炮校。晚上七点多钟光景,那个醉鬼找个人带路回炮校,路上有别的鬼子来接。第二天,鬼子把两个女的送了回来。过了几天,他们又来找,带回炮校,第二天再送回。这样送来送去的大约有三四回,鬼子都没有打人。

刚跑反时,朱砂洞里放了不少货,鬼子来了,好一点的,有用的,全给他们抢走了。后来,插花大队、半边山那里有了新四军,有人告密,带了鬼子到半边山扫荡。再后来,有人又说朱砂洞里也有新四军,日本人就放火把朱砂洞的房子烧了。老道士没地方住,就带着徒弟住到西山头戴家棚子的道士庵里,那个道士庵有三四间房子,后来也毁掉了。

在朱砂洞里住了一阵之后,我们就跑到插花大队。那里有大刀会,但才开始训练,功夫还不行。他们想打鬼子,可打不过,跑到半边山,队伍就散了。鬼子一气之下,把陈庄的房子烧得光光的。

后来我们又躲到赤山。那边也有大刀会,有几百号人,挺能打的。那里是圩区,路不好走,鬼子来了道路不熟悉。几百个人呼喊齐上阵,砍死了好几个鬼子,他们很害怕。后来,新四军过来了,同鬼子打了几仗。鬼子去了不少人,被打死了不少,从此就再也不敢进去了。老百姓说:“这支中央军厉害!”我在赤山住了两年,后来才回到汤山的。

跑反时,我大伯曾金山跑到黄栗墅,后来又跑到雪浪庵,躲在山沟里。在那里躲了几天,又回到黄栗墅。黄栗墅比较大,年轻人也多,鬼子常来抓夫。有一天,鬼子抓了几个青年给他们送货,后来就集中在坟头的山洞里^①。这几个青年送完货,日本人就叫他们爬山。有个鬼子跟我表叔讲别去爬山。结果,那些去爬山的青年被鬼子当成活靶打死了。一共打死七个,都是黄栗墅的。有姓胡的兄弟俩,还有一个姓陈的。我表叔没去爬山,就逃过了一劫。这是听我表叔讲的。

① 在珠山,原来是国民党的弹药库,日本人占领后就住在里面。

我大伯曾在方冲的油老鼠洞里躲过几天。洞不大,躲了二十来个人。洞口有块大石头把洞挡住了,日本人没发现。大伯亲眼看到有一支中央军的队伍开进了方冲,说是一个师的部队。师长坐在轿子里,叫人抬着。到了方冲,下了轿子,就集合队伍训话。洞里的老百姓看到了,都觉得很奇怪,说:“你们看,中央军的队伍不是又回来了吗?”可这时候汤山被日本人占领着,山头上有日本兵。鬼子的人不多,就喊他们的飞机来炸,结果,飞机投下的炸弹炸着了他们的自己人。中央军便不顾一切地向大赤燕方向冲,被山上的鬼子用机枪压住,没冲出去,只有一小部分朝张家岗冲的人逃了出去。方冲的山上,从大赤燕到春山,到处都是中央军的死尸。我从赤山回到汤山后,去方冲山上打柴,那子弹壳一堆一堆的,可以装好几麻包。我还钻进油老鼠洞里看了看,发现洞内的灶台还在。附近山上还有石头垒起的简易工事,有手榴弹。

后来听人讲,方冲这个师是因为过长江过不去,才走仙鹤门撤退的,一直退到方冲。那一仗打得时间很短,也就个把小时,但中央军死的人很多。方冲是三面环山的小山冲,也就十几亩二十几亩地的平地,一层一层的尸体都堆着,过了很久都没有人敢去打扫战场。后来,新四军过来了,到处买枪。老百姓便到死人堆里去摸枪。听人说,有个人摸到了一支枪,死人的手指还牢牢地扣着扳机。他一拉,枪响了,这个人就被死人打死了。当时,这件事传得很广的。

3. 许振林口述

许振林,男,1928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汤岗村24号

调查时间:2004年1月25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76岁,跑反那年9岁,上小学一年级。班上有个女同学,她父亲是国民党宪兵。她早许多天就告诉我说她们要搬家,并问我什么时候搬。当时我还不明白搬家的意思。后来,鬼子要打汤山了,许多人都外出逃难,我才知道她说的搬家原来是撤离。

跑反时,我们家逃到了龙潭北圩。从汤山到龙潭的路上有许多广东兵,一批一批地撤退,人数很多。到了北圩,我就听说我家门哥哥许振明8岁的女儿在孟塘那里被日本飞机投下的炸弹砸死了。那炸弹没爆炸,是掉下来砸死的。

跑反时,我们许家的人都集中在北圩的秧田圩。有天,来了两个日本兵,叫我们站成一排。他手里拿着王八匣子(手枪),当着许多人的面,把一个女的糟蹋了,完了就走。

跑反回来,我看到一个女的被杀死后泡在塘里,就是汤山中学那个小水塘,头发散乱,快腐烂了。在附近一个山劈子下面,有一个大坑,里面堆了许多死人,后来有人去埋了。

我有个家门爷爷,头上长癞痢的,大家都喊他“癞爷”。他没有跑反,留在家了。结果,就在他家后门口的灰堆上被日本鬼子一刀砍死,头全砍下来了。

还有个家门哥哥叫许振金,当时20多岁,在日本人组织的自卫团里当兵。有天夜里,自卫团的人统统被新四军俘虏了,他也被抓去了,但后来跑回来了,住在自己家里。一天夜里,鬼子的一个团长喝醉了酒,到许振金家喊开门。许振金一开门,鬼子团长就把他一把抱住,把他当成花姑娘了。许振金挣扎开了就跑,没跑几步远,鬼子团长就用盒子枪打他。当时打伤了,没死。他又逃,但因伤势很重,没治好,就死掉了。

以上都是我们许家的几个人,我了解得较清楚。除此之外,我还听说有一个姓桑的翻译官抓住了上峰西庄的一个人,说他是新四军,在大岗子后面(今汤山医院之东、新菜场以西)用刺刀把他活活捅死了。

中央军和日本鬼子在方冲打的一仗,老人说的很多,说有一个团,大部分人被鬼子打死在方冲。当时传说这支中央军原本是要开到宝华山西边的张家岗,再往宝华山方向去的,后来领路的人把队伍领到了孟塘的张家岗,到了张家岗南面的方冲,就碰到日本兵了。

汤山这里就听说方冲打了一仗,别的地方没听说打过仗。在插花、孟墓那里,中央军的四川兵同日本军打过一仗的,而且打得很激烈。后来,孟墓那里新四军活动很活跃,人数也很多。

4. 刘幸福口述

刘幸福,男,1925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幸福邨80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0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0岁,属牛。祖籍是江宁上峰东岳庙,我是在汤山青林沿城生的,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老伴去世了,我一个人过。儿子家做的饭硬,我自己烧。我眼睛有白内障,看不清了,耳朵也有点聋。

我父亲是烧砖瓦窑的,有四张窑。我兄弟五个,我排行第三,人家喊我“刘老三”、“刘瞎子”。年轻时,我也烧过砖瓦窑,个子不高力气大,能挑七八百斤,背都压弯了。解放后在龙潭圩筑江堤,几万个人看着我挑重担,是出了名的。这力气也是烧窑时练出来的,挑砖瓦,一点一点加,到后来挑1000块也不稀奇了。挑这么重的担子,用毛竹扁担是不行的,一挑就断。我用的是硬树杠子。

跑反时,我跑到东岳庙老家那里去了。日本人在沿城杀人的事也知道,一次就杀了七八十个呢。那是跑反完了,村上人都回来了,有好几个鬼子下乡放闲,进村要鸡蛋,要花姑娘,看到一堆柴火,就把枪搁在一边,围着烤火。有人把他们的枪掳走了,还打死了几个日本人。没打死的就回去报告。后来,就来报复了,叫村上的人排成一排,统统枪毙,房子统统烧光。你去惹他们,他们能不打你吗?听说掳枪的人不是沿城的,是穿老百姓衣服的新四军。

老百姓到汤山街上来,鬼子是要盘问的,问你有没有新四军。你如果说“没有”,鬼子就要打你。如果说“新四军大大的有”,他就不打你。当时的翻译官叫赵大宝,是汤山人,他有个儿子还在。他告诉我们说,你讲“有新四军”就不会打你,就没事。

83医院是日本人造的,当时叫伤兵医院,解放后才叫83医院。日本人得了传染病,就从医院里拖出来,用大柴围成一圈,浇上汽油烧死。我在汤山林场看到过好几次,就是现在汤山新菜场附近的地方。每次烧几个,人不多,日本人让我们看的。烧的时候,有穿和尚衣服的日本人敲鼓

念经的。那小鼓圆圆的,扁扁的,直径约 30 厘米,蒙了一张皮。和尚一边走一边敲,我们小孩就跟在后面跑。和尚到了烧的地方就跪下来念经,一把小槌子不停地敲。烧完后,骨灰埋起来,再插上一块小牌子。

日本人的宪兵不在陶庐里,也不在俱乐部里,而在陶庐过去一点,现在南京市交际处管的那幢房子(今温泉路 3 号,蒋介石温泉别墅)里。

天然温泉浴室的房子是老百姓造的,后来被鬼子接过去,他们自己开了个浴室,里面有泉水。这个浴室只让日本人进去洗澡,不许中国人进去的,但里面有中国苦力给他们打工,都是十五六岁的小青年,不超过 20 岁的。(秦洪文插话:我在里面打过工,干了五六个月。)日本人男的、女的在一个澡堂里洗,打工的进去拎水,可以看,但不能笑,一笑就要揍你。

在(宁杭)公路边上还有一家日本人开的商场,商场的名字叫“天福”,是做买卖的,主要是卖木炭,给日本人烤火。中国人也可以去买。伤兵医院里有一个日本人叫山本,他不是军人,专门把医院里的剩饭剩菜拿出来卖给老百姓。干净一点的,卖给你吃,脏一点的,卖给你喂猪。“天福”的日本老板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我只知道那个老板喊他老婆“喔嘎塞”,他老婆喊他“喔得塞”。“天福”是商场名字,老百姓背后就喊那个老板天福鬼子。天福鬼子养了个女儿,二十来岁。汤山西边汤泉村上有个小五子,大名叫张有旺,是给“天福”打工的。天福鬼子叫他和自己的女儿“赛古赛古”,就是睡觉。他要自己的女儿养一个孩子,长大后既会说日本话,又会说中国话。小五子不敢,天福鬼子就说:“你的,和她‘赛古赛古’。里面话明白,西南话明白,我的金票大大的新叫。”日本人称自己是“里面人”,称中国人是“西南人”。后来,他女儿的肚子大了,有小孩了,天福鬼子想把张有旺带回日本,让他们做夫妻。到了关口,没通过,小五子又回汤山了。

我 14 岁那年由山本介绍,到俱乐部里给日本鬼子打工,擦洗澡堂子,打扫卫生。日本婆子常常一汽车一汽车地开过来洗澡。她们都是军官家属,不是妓女。在俱乐部里打工的中国苦力有八九个人,有的做饭,有的打杂。有马九毛、马九本、干八子,还有安基山的小八子,都是在里头打工的。有一天,一个做饭的对我说:“你还小,我们是大人了。下次

日本婆子来洗澡,你喊我们去看看。”我答应了。日本婆子要我给她们擦背,说:“苦力,来来来,我的金票大大的新叫。”她们还真的给了我不少角子,是银的,有两毛的,有六毛的,也有一元的。抓了一把就给我。这些角子,中间都有小圆孔。

日本婆子洗澡的时候,先把背后背的那个四四方方的小包包取下来,恭恭敬敬地供在那里,然后脱衣服,穿上高脚鞋。小包包里头有个铜像,她们叫“大商”,是他们的老祖宗,其实就是薛仁贵的像,谁也不让摸的。日本人是薛仁贵在日本丢下的一支人马,传下来就是日本人。除了讲话不同,其他同中国人都一样。朝鲜人叫“靺子”,他们的后脑勺是平的,同中国人不一样。朝鲜人帮日本人打中国,因为中国人以前杀过“靺子”,他们要来报仇,来中国烧杀。“八月十五杀靺子”,一、二、三、四、五、六,讲不出“六”来的就杀。朝鲜人不会讲“六”,中国人就把他们杀了。

后来,我喊那几个打工的人去看日本婆子洗澡了。他们看的时候没有笑,看完,出了洗澡堂子,都笑了。日本婆子洗完澡,就告诉俱乐部的门岗,说苦力良心坏了,要“三鞭新叫”(打)。门岗把八个苦力统统找来,用一米多长的毛竹片,每人猛打 13 下。门岗对我说:“你的,顶好顶好的。里面姑娘咕噜咕噜,你的,不要哇啦哇啦。你的,小孩,顶好顶好的。我的金票大大的新叫。”我吓得不敢去干活了,在家歇了三天。后来,门岗到我家来了,拿来了一包米,有 100 多斤,送给我家了。后来,我又在俱乐部里干了半年。再后来,我不肯去了。

日本人在汤山街上是开过妓女院的,他们叫慰安所,在高台坡那里,离我家门口不远,有三间大瓦房,现在改成信用社了。进慰安所,要在日本人手上买票,只有日本军人才能进去嫖,中国人是不让进的。里面的妓女都是朝鲜人,没有中国人。但是,有几个中国女人在里头给日本人洗衣服。她们在里面的活动,我们站在家门口看得清清楚楚。

在汤山溶洞那个地方有个李家庄,离华鼎公司不远,村上有个人叫老明山,老广寿,姓什么不知道,他今年 94 岁了,耳不聋,眼不花,头脑也不糊涂。他和秦洪文常到我这里来玩的。老人和老人能说得上话,老人和年轻人说不到一起的。

5. 张石洪口述

张石洪,男,1926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张肖庄39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7日、9月11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79岁,属虎,跑反时12岁。1951年抗美援朝时参军,没有出国,在苏北劳改农场当公安兵,1956年左右复员回家。因为不识字,没当上干部。

我老伴叫桑桂兰,和我同年。跑反时,她跟了她爷爷跑到方冲,躲在一个瓜棚里。那瓜棚就在后巷山脚下。后来,鬼子打方冲,把机枪架在瓜棚门口,对着瓜棚扫,瓜棚里的大人死了,她爷爷也被打死了。只有三个小孩没打死,一个是我老伴,还有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她在瓜棚里躲了五天五夜,后来被后巷一个姓秦的人收养了。

跑反时,我跟我父亲、大大、大妈一起跑到了涧南,没想到撞到鬼子枪口上了。大队的鬼子从村南的山上冲下来,架了机枪对祠堂里的难民开枪,不知打死了多少人!我们听到枪响就往另一座山上跑,从汤山南面,连夜跑到丁墅,在那里住了一天,又到万安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快安民了,又到殷家边,住在我外公家里。殷家边有个姓赵的老头,五十来岁,在一个姓杨的家门口被鬼子开枪打死了,我亲眼看到的。当时下着雪,鬼子在村上放火,是哪一天我记不得。

跑反刚开始时,我叔叔张明远、张志生的父亲张明海、朱秀兰的弟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还有李家庄的唐康金、李大洲、李世和,他们六个人在李家庄遇到了四个鬼子。鬼子要他们把四条牛腿抬走,估计是抬到“大楼”。这六个人后来都没回来。

我们村肖开银的妹妹在村南山脚下的大塘边被鬼子强奸,弄死了。当时她才十四五岁,没出嫁,我们都喊她“大丫头”。跑反完了,我们村上的大人到山上去收尸的。地点就在艾山东边一点,大道上头,鸭子山上,媒人堤下头。他另一个妹妹叫“二丫头”,和我同年,现在住在李家庄,她丈夫叫李昌仁。肖开银去世了,肖开银的父亲叫肖元荣。

安民后,我常到“寡妇营”那里去,问日本人讨饭吃。“寡妇营”就在汤山小学前面,以前叫“兵工处”。日本人来了,那里住的都是日本人的寡妇,所以老百姓就说那里是“寡妇营”。日本人蛮喜欢小孩的,给糖吃,给饭吃。有一天,我亲眼看到,在现在的印刷厂那里(今汤山小学附近),日本人一下子把12个中国人打死了。他们都是二三十岁的小伙子,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跑反时,我们村的房子都被烧掉了,只有六间瓦房没烧掉。我家的三间瓦房没有烧掉,我们现在还住在里面。

第二年冬天,我们又到“寡妇营”去讨饭。有个鬼子见我弟弟张石堂长得可爱,一把抱住他,摔进了水塘里。后来,来了个军官,上去就打了他两记耳光,又把他训了一顿。他把我弟弟捞出来,还把衣服烤干了。

(2004年9月11日补充)我们村有个人叫许友文,就是许正兵的爷爷,跑反过后在大赤燕拣到了一支机枪,扛到龙潭去卖了。

6. 桑桂兰口述

桑桂兰,女,1926年生,张石洪之妻

调查地点:汤山镇张肖庄39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7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79岁,属虎。在江西出生后不久,那里发大水,闹人疫,爷爷就带了我父母、叔叔和我逃荒,到汤山李家庄落户。刚开始住在别人家,后来盖了三间草房。我两岁时,妈妈又生了个小弟弟。因为水土不服,妈妈和小弟弟都死了。6岁那年,父亲把我送到张肖庄做童养媳,他带了个女人跑到安徽,再也没回来。我爷爷有点驼背,外号“驼子”,大名不晓得。叔叔是下霜时生的,大名叫小霜,小名叫“小五子”。

跑反那年,爷爷六十来岁,叔叔18岁,我12岁。跑反前,爷爷把我接回了李家庄。跑反时,爷爷带了我叔叔逃命,我们背了点米就走了。在海泽沟那里,叔叔被鬼子抓住了,拖到了山上。爷爷以为是拉夫,说还能回来的。谁知拖到山上就打死了。后来,爷爷带着我跑到了大赤燕的

山凹子里。那里有三个瓜棚,里面住满了人。瓜棚是看瓜的,冬天看山芋窖,没有门,地上铺着稻草,我们就钻进去了。我们在瓜棚里挤了四天,爷爷跑到孟塘烧饭,做好了带到瓜棚给我吃。一天下午太阳快下山的时候,来了五个鬼子,用快枪朝瓜棚打。鬼子离瓜棚很近,都来不及逃,一枪一枪地都被打死了。爷爷打死后趴在我身上,我就没打着。鬼子把三个瓜棚里的人打死后很快就走了。我爬起来一看,爷爷还活着,但一句话也没说,不久就死了。那两个瓜棚里有两个小娃没打死,一个丫头膀子打断了,一个男娃好好的,没打着。他们都比我小,听到我哭,都跑到我这边来了,三个讨债鬼一起哭、一起歇。那时候也不知道害怕了,哭累了就趴在爷爷身边睡一会,醒了还是哭。渴了就跑到水塘边捧凉水喝。中间有一天,我们三个人跑到瓜棚后面的山上瞧,看到三个鬼子端着刺刀,把瓜棚里的死人挑起来,一摔。挑了几个就走了。



桑桂兰

我们在死人堆里睡了五天五夜,也不知道饿。后来,有天下午,太阳快下山了,来了四个男人,到瓜棚里来掳东西,拉我的被单。我被惊醒了,就说:“你们不要拖我,我是小娃哎。”那个人问:“里面还有什么人?”我说:“还有两个小娃。”他们要我起来,我说:“我是小娃哎。你们不要打我。你们不打我,我就起来。”后来,他们把我们三个都带走了。到了孟塘,吃了一顿饭,那两个讨债鬼走散了,不知跑到了哪里。后巷有个姓秦

的,没儿没女,把我留下了,我就喊他们“爸爸”、“妈妈”,在他们家住了半年多。后来,我老公公打听到我在后巷,就把我接回张肖庄做童养媳。那时候,我老挨打,后来解放了,就不挨打了。

我叔叔和我爷爷都没收尸。那时候,我才十二三岁,只晓得哭。三个瓜棚里一共打死了多少人,也不知道,起码有二十来个。

7. 张志生口述

张志生,男,1924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张肖庄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7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1岁,属鼠的,跑反那年13岁。跑反前,我读到四年级。

鬼子是在冬月初四到汤山的,在方冲抢占喇叭山(“大楼”北面那座山)。鬼子放气球,灰灰的,比这座大山还高,上面坐两个人,负责指挥。日本人和中央军在方冲打了一仗,中央军死了许多人。日本人把抓到的俘虏带到了指挥营(陶庐)。这一仗打完后,许多人到方冲去摸枪,有个人被死人打死了。原来,那个死人的手指扣在扳机上,冻僵了。摸枪的人一拉,枪就响了,枪口正好对着摸枪的人。我们村上有个许老头,他摸到了一挺机枪,后来扛到龙潭卖了。

日本人打汤山时,中央军砍了许多大树,横放在公路上,阻挡坦克。在黄栗墅的一个防空洞里,有许多人躲着。有个老头在洞口外面抽烟,抽的是旱烟袋,被日本人看到了。结果,洞里的12个人全被鬼子杀死了。其中一个叫张礼江。他家给于右任看房子,他手里有公家发的证件,别人不敢抓他的壮丁。他没有被抓去当壮丁,却在防空洞里被鬼子抓住了。

8. 张明金口述

张明金,男,1927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张肖庄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7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78 岁，属兔，跑反时 10 岁。我们先跑到张家岗，初四夜里跑到周冲，初六跑到红岗头，28 个人，被日本人拦住了，再也跑不掉了。第一批日本人搜我们带的肉、鸡、米，搜完就走，我们就躲在一条沟里。第二批又来了，全是大胡子兵，打死了好多很多人，死人堆了一人来深，全是逃难的。后来，我们往龙潭跑，到北圩，下圩了。

初四那天在大赤燕那里，日本飞机炸死了许多老百姓，他们的姓名无人知道了。

李家庄的李新裕、李新江是兄弟俩。他们有个弟弟，跑反时老哭，就被他们的母亲用被单闷死了。这位老太太后来跟了（嫁给了）我叔叔，我就喊她大妈。她的一个女儿嫁到了陈巷。

9. 劳广寿口述

劳广寿，男，1910 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李家庄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17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94 岁，属猪。好几朝打仗，多少老百姓都打死了，我没有死。蒋介石和毛主席都是孙中山的学生，我看到的事情多了。

跑反时，我 27 岁，带着家里人（我老婆和一个侄子）跑，还有村上的人，四五十个呢。从李家庄翻山过去，到湖山、圣村、法汛，后来到龙潭北圩花园的菜子洲。四五十个人，没得吃，没得喝，要供他们吃，供他们喝，吃三个月，到第二年二月里才回来生产。回来时，一路上看到不知多少死人，小把戏（小孩）才这么高，就被打死了，他们日本人这个厉害。在龙潭，保长叫人把土埂挖了，灌满了水，鬼子就进不去了，救了多少人哪！那土埂是我带着许多人一起挖的，救了许多人的命。算命先生说我专门做好事，能长寿。我不做这么多好事哪能活到 94 岁还没痛没痒的？还

能自己烧菜做饭？大人、小把戏，我救了多少哪！看着他们可怜哪。我们村的人救过，外省来的人也救过，只要是中国人，能救的都救，能带的都带他们逃，能做好事就要做好事。冬月初四跑反，天气那么冷，那么多好朋好友落难了，哭的哭，喊的喊，可怜哪！我就救了这么多人。那时候，儿子顾不了老子，老子也顾不了儿子，伤德哪！

我们村上被打死的人多呢，有一百来人呢。我的叔叔劳振远，70多岁，不能走远路了，没有跑，留在家里了。我叫他跑，他不听，在家里等死。日本人来了，要他去抬东西，他没有劲，抬不动，日本人就叫他和另外几个人跪下来，用这么长的刀把头砍了下来，伤德哩，我亲眼看到的。

有一个湖南人，70多岁，叫商二头子，他小儿子十五六岁，躲在离“大楼”不远的一个洞里，被日本人发现了，就叫他们出来，说：“不出来就放火烧。”他们出来一个就打死一个。洞里躲了十来个人，出来后全打死了。我们村的罗长桃和他的儿子罗云山也是那次被打死的。

我们村的王大，别名“老晾”，快80岁了，在家里饿得来，没吃的，被日本人看到后打死了。还有唐康金、李大洲、李世和、王新福，那次一共打死十来个，男的女的都有。

冬月初四日本人刚来的时候，打死的人多哩。冬月初四下午，孟塘陈家边来了两个鬼子，老百姓背着东西躲在山上。有个老太太认不清这两个鬼子，以为他们是中央军，就喊山上的人都下来。鬼子对她说：“你的，大大的，顶好顶好的！”后来，鬼子把人集中到场上，用机枪把他们全打死了。打死的全是男人，小伙子，伤德哪！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还有一次，我和另外四个人被鬼子抓到“大楼”当苦力。他们不知是哪个村的，他不认得我，我不认得他。下午，那四个人把活干完了，我的活还没干完。鬼子喊那四个人：“苦力苦力，来！”要他们跪下，然后用刀杀死了。把事情做完了反而要杀，没做完的倒不杀，我就趁夜里逃走了。

日本人强奸妇女，像畜生一样，不分大小，七八十岁的也要，十来岁的也要，没有办法。跑又跑不掉，躲又没处躲。这样的事多呢，伤德哪！有一个妇女在“大楼”后头被强奸了，日本人又用木棍把她捅死了。

那时候小把戏摔在水塘里，活条条地摔在水塘里。哪个舍得啊？没得人领了。

到了第二年的正月里,英国人在东阳、栖霞办租界,救济穷人,我看到的,难人(难民)一起收去的。一天吃两顿稀饭,把命救下来了。

我不识字,知道的事多呢。要识字就好了。日本人是属牛那年打来的,第二年属虎。

我在“大楼”里看到日本人抓了三个人。问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说是在汤山头被日本人抓来的,一共抓了四个。有一个拖到西山头大高坎子那里,日本人把他的衣服脱了,往坑里摔。那坑里插上了老虎刺,摔下去戳不死,他自己爬上来了。日本人又把他摔下去,他又爬上来。这样一次次地摔,血淌得满身都红了。最后一次摔下去,他就再也没有爬上来,被老虎刺戳死了。我告诉他们三个人,在这里干活,干完了就要打死的,你们快跑吧。他们说:“家里一个人也没有了,跑哪里去呀?”后来我逃回家了,不知这三个人跑了没有。日本人要去洗澡,说要去“咕噜咕噜”,趁日本人去洗澡的时候,他们是可以跑掉的。

于右任是个大干部,他在黄栗墅盖了公房,有防空洞,准备退休后住在那里的。日本人在那里打死了许多人。张肖庄肖元荣的女儿,十五六岁,被日本人糟蹋死了。张肖庄上被日本人打死的也不少。还有朝鲜人,都是大胡子,是归日本皇帝昭和领导的,心狠手辣。被他们打死的人多哩。在“大楼”后面,挖了个大坑,埋死人的,埋了几十个,一层一层的,人踩人。那些死人摆在那里,臭了,烂掉了,就一个一个往大坑里摔。这一朝死的人多哩。不但有本地人,还有远处的,死了以后都往大坑里摔。

汤山镇上有个赵基尧,他不是好人,是个坏人。他是广东人,害了不少人,受骗的人还不知道。他说自己骑了板凳就能上天,只要靠佛就能上天。许多人跟他学,女的多。他有一间小房子,女人一去三四个,四五个,他让女的一个个地进去,进去后关上门,把女的脱得干干净净。玩了一泡,放出来,还不让你讲。他就是这样骗人,但没有伤过人命。他就是糟蹋女人。我看到他就来气。他在汤山帮日本人埋死人,埋了600多个。日本人就说:“给你金票新古。”给他的钱有一个古的,也有两个古的。死人都埋在汤山的山凹子里。

10. 陈明发口述

陈明发,男,1927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汤泉村

调查时间:2004年7月25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78岁,老家在句容黄梅冯岗头。冬月初三,日本人已经到汤山了,黄梅桥那里的中央军还不知道,他们把搭子桥炸了,那声音响得不得了。他们以为,炸了桥,日本人就过不来了。其实,日本人是在固江口、东葛壩那边走过来的。搭子桥在新塘过去一点,在孔家那里,现在还在,是水泥浇的,桥在下坡的地方,附近有一个大的加油站。

我们在冬月初三跑反。到了固江口那里,被十二三个鬼子拦住了。鬼子叫我们排成一队,挨个搜身。有个人上身穿着西装,下身穿着中央军的军裤,四十来岁,听说是南巷的。日本人认为他是中央军,叫他跪下,用刺刀在他肚皮上挑了个口子,肠子都露出来了。然后把他吊在固江口的一棵大树上,开枪打死,他儿媳妇哭得要死。日本人打死了这个人就走了,不管我们了,我们就走东谢、西谢,翻过大山,到了北圩。

跑反前,日本人的飞机炸句容的飞机场,就在句容农场那里。日本人的飞机三架一队,三架一队,几十架几十架地飞过来炸。

日本人占领汤山后,天然温泉浴室还是老百姓在经营。洋桥(陶庐)那里有慰安妇,后来搬到了高台坡那里,当时就叫慰安所,老百姓进不去的。炮校的日本兵到指挥营领了牌子就可以进去。那里有中国女人,也有朝鲜女人。每天下午三四点钟,这些女人搽了口红站在门口招呼日本兵。

赵基尧是一贯道的头子,他有一个女儿,现在不知道在哪里。后来,赵基尧的眼睛瞎了。他没有被枪毙。

中央军在方冲打了一仗,进山口的差不多全打死了,没进山口的还逃出去几百人。这些人经东葛壩到了固江口,在那里又同日本人打了一仗,一个营的兵力全打完了。那一仗是在冬月初三打的,早晨四五点钟,我们看到山上东也有亮点点,西也有亮点点。天亮后,他们就同日本人

打了一仗。有一个叫郭西木的中央军后来跟了一个老板炸油条。

11. 陈淑英口述

陈淑英,女,1934年生,陈明发之妻

调查地点:汤山镇汤泉村二牛饭店隔壁

调查时间:2004年7月25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71岁,属狗。跑反时我还小,父母亲带着我们跑到了合肥。我父亲叫陈财昆,兄弟五个,他排行老三。我爷爷那辈是从河南迁过来的。跑反前,我父亲在炮校里给营建厂看料,看大门。跑反过后,我们从合肥回到了汤山。

桑桂兰是我表姐。听大人讲,她在“大楼”后面的洞里躲过,那个洞里的大人都被鬼子打死了,她和我大妈的女儿在方冲那里睡在死人底下,睡了好几天。后来,鬼子又用刺刀一个一个地戳死人,她背上也戳了一刀。这些事她以前讲过,现在她头脑不大清楚了。

听我母亲讲,我的大大、大妈、还有大妈的女儿和他们带的一个儿子,也是在方冲那个洞里被鬼子打死的。我叔叔是在阳山碑材那里被鬼子打死的,死时才20来岁。鬼子牵了一条牛,要我叔叔杀牛、剥皮,叔叔给他们杀了牛,又剥了皮,鬼子就叫他“开路,开路”。等他一走,鬼子从背后朝他开枪,把他打死了。安民后,家里打了口大棺材,把他埋在黄栗墅了,埋的地方我知道。

我叔叔、大大、大妈的名字都不知道。我不知道,别人就更不会知道了。

12. 秦洪文口述

秦洪文,男,1925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桃源村26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25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80 岁,属牛。跑反时,我才 12 岁,父母亲带了我们跑到了北圩的营房(地名),13 岁回来。

我 15 岁去天然温泉浴室打工,打了六个月。16 岁就去 83 医院打工,在伙房里洗菜、切菜、淘米、做饭、做呆活,炒菜是日本人炒的。做饭是用装四五十斤米的大锅,用大柴烧。17 岁,我就到汤山杂货店里当学徒。

当时,83 医院是日本人的陆军医院,老百姓叫伤兵医院。医院里病房多,医生多,女护士也多。病号都是日本人。看不好的就拉出去烧,架大柴,浇了汽油烧。

天然温泉浴室里没有妓女,那里是日本人经营的,是普通的澡堂,男的、女的一起洗。我去拎水,看到了不能笑。

在马路边上的高台坡那里有妓女,用中国女人。日本男人去,中国男人也去。第二年安民后,汤山镇上的日本人就不敢在镇上找花姑娘了,他们就到乡下去找。日本的宪兵队在俱乐部里,日本的军法很严,商店里的东西,讲好多少价钱就给多少钱,不讨价还价的。在 83 医院里,伤兵对打工的中国人也蛮客气的。伙房里的日本人对我们说:“饭盒洗得不干净,你们就训他们,叫他们重洗。”那些伤兵挨了训,一个个都不作声。

13. 王本立口述

王本立,男,1927 年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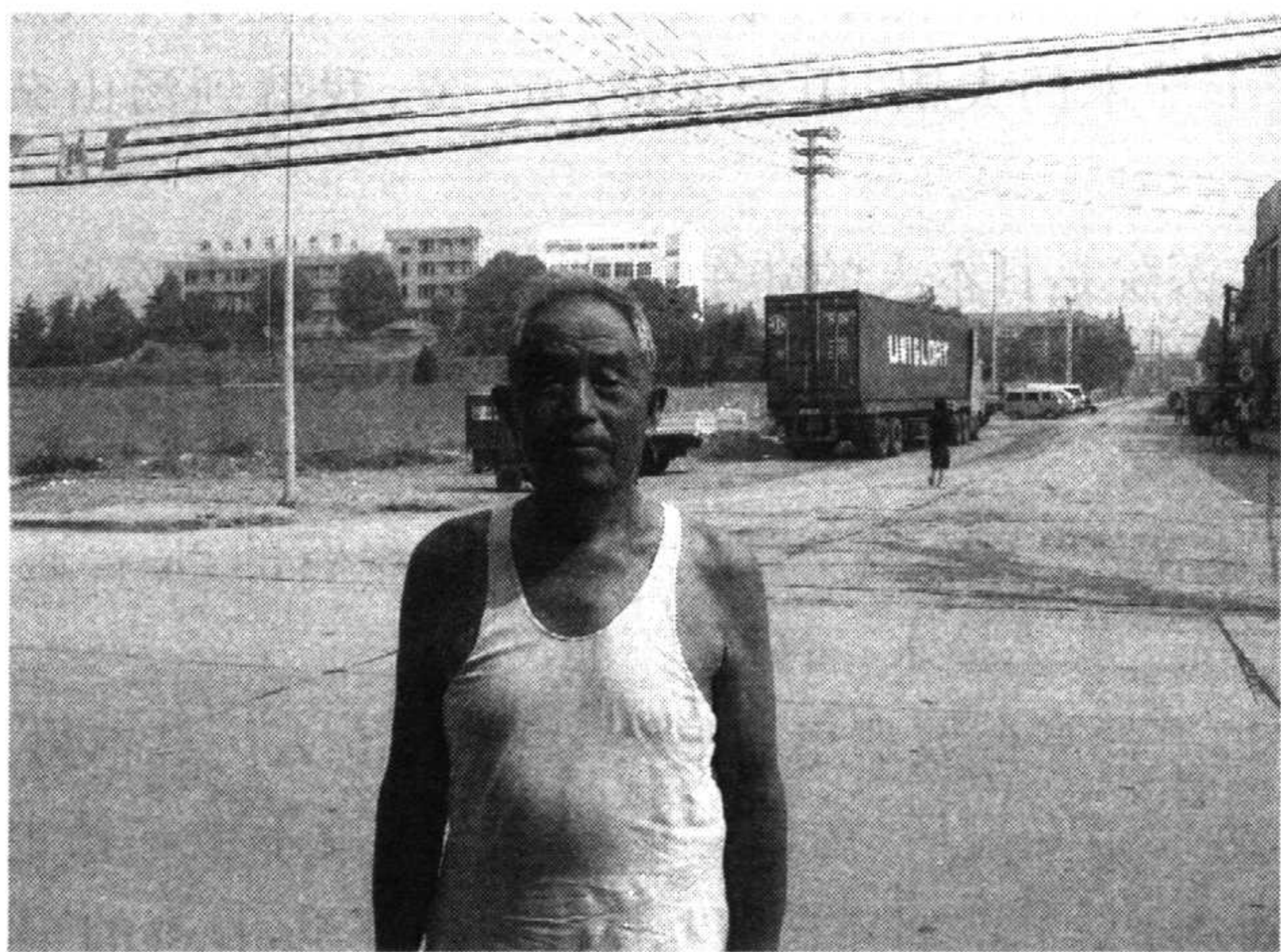
调查地点:汤山镇寺桥 74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26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78 岁,属兔,跑反时 11 岁。农历十月里跟了父母、叔叔、婶婶、祖母,一大家子十七八个人,跑到了龙潭摄山镇。先住在圩里,日本人常去找花姑娘,不安全,后来就搬到栖霞水泥厂。水泥厂是德国人和丹麦人办的,日本人不敢进去,里面住了几万难民。我们用稻草盖了个小棚子住下了。南厂、北厂,住得满满的,到处是难民。没有吃的,就问

亲戚借一点。有一次,日本人把篱笆推倒了,想进厂找花姑娘。德国人知道后就用鞭子抽他,还罚他把篱笆修好了。当时德意日联盟,日本人见了德国人是很怕的。



王本立

第二年,过了农历三月二十五,我们就回到了汤山。从龙潭到汤山,一路上看到了不少死人,都烂了、臭了,味道特别难闻。麦田里哪一片长得特别绿,黑油油的,走过去一看,准是有死人烂在那里了。汤山附近,漫山遍野的都有死尸,“大楼”后面,狼山南面,有许多中央军的死尸,都没有埋。后来成立了收尸队,一个一个地埋。秦洪文的父亲也参加收尸队掩埋过死尸的。当时交通银行印发的钞票,纸张特别好,放在水里洗也洗不烂的。从死人身上收来的钞票,你怎么洗也有一股臭味。

汤山街上年纪大的,没有跑出去的,差不多全给日本人杀死了。当时驻扎汤山的中央军是四川兵,他们叫老百姓赶快跑。有些老人不听,没有跑,就被鬼子杀了。

邮局这里有个老头叫尹兆远,七八十岁了,胡子花白,长得老长老长的。他到冷泉去挑水,被鬼子一枪打死。他老婆也被鬼子打死了,躺在水沟里,淤泥把她的身子掩盖了,一双小脚还露在外面。后来,有个小孩看到她脚上穿的绣花鞋,大人就过去拉,一拉,把死人拉出来了,才知道是尹兆远的老婆。

慎得财,也是一个老头,住在汤山老街里的。他和一个姓谢的老头被鬼子抓夫抓到“大楼”,姓谢的跑掉了,慎得财跑到碾坊那里,哇哇地叫,日本人站在老远的地方把他当靶子,一枪就把他打死了。慎得财的孙子叫慎家宝,现在还住在街上。

周发银的爷爷和朱洪远的奶奶在家门口被鬼子打死了。日本人还浇上汽油烧,烧人的地方有油,雨水都进不去。

街上的程兴友,六七十岁,腿有毛病,是个残疾人,日本人也不放过他,用一块大青石绑在他身上,把他推到寺桥下淹死了。

日本人从麒麟门抓夫,一共抓了 17 个人。后来,鬼子把他们一个个绑起来,在我家屋子前面的田里用刺刀刺死。其中有一个小鬼,16 岁,日本人找不到绑人的绳子了,叫他自己去找。他就从一个老百姓家的后门进去,从前门出来,逃了。他从汤山逃到了水泥厂,给我们讲了鬼子杀人的事。跑反后,我们回到汤山一看,那 16 个人都还在田里,没有埋。

鬼子还叫一个老百姓跪着,头上顶一碗水,不能动。日本人端起枪,把碗打碎了,碗里的水把他的衣服浇湿了。鬼子用这种方法吓唬老百姓。

在汤山邮局北面,那个地方以前叫“兵工处”,国民党造了两扇大铁门。鬼子占领汤山后,用铁丝网把冷泉附近的山地围了起来,还在我现在住的房子前插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汤山镇,大日本使用地”几个字。汤山医院原来建在今汤山中学的地盘上,旁边还有一个农民教育馆,鬼子来后都拆了。83 医院大门口进去的台坡上,原来有个大礼堂,盖得很漂亮,有戏台,有厢房,一排排的椅子是叉开的,坐在前排的人不会挡住后面的人。我上小学时,每个礼拜一都在里头开周会。后来,这座大礼堂被日本人烧掉了,非常可惜。我家的三间房屋也被日本人烧掉了。

日本人来了以后,他们把陈国钧经营的天然温泉浴室占用了,改名为“汤山阁”,专供日本人洗澡。日本老板有两个女儿,一个叫“阿义江”,一个叫“史密江”。到汤山来做生意的日本商人还有好几个。英山在如今派出所对面的天延饭店那里做豆腐,我们叫他“老英山”。83 医院里头日本人吃的豆腐全是老英山做的。还有一个叫“喜鹊”的日本人开了几家妓院,一家在如今的农行信用社那个地方,另一家在袁广智的房子里。

日本商人奥野在如今的“万家乐”商店那里开了一家商店,店名叫“天福”,专门卖劈柴和木炭。奥野到南京办事去了,“大楼”里的日本兵就到“天福”店里强奸奥野的老婆,女的不肯,就被日本兵双脚一拎,头倒过来,压在水缸里淹死了。

俱乐部里也有妓女,绝大部分是朝鲜姑娘。那时候流行好几首日本歌,一首是《满洲姑娘》,我会唱的,我来唱给你听听(用日语唱)。另外两首是《支那之夜》和《何日君再来》。

14. 肖开兰口述

肖开兰,女,1926年生,李昌仁之妻

调查地点:汤山镇李家庄31号

调查时间:2004年9月13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79岁,属虎的,娘家是肖家庄的。在我两岁时母亲就去世了。跑反那年我11岁,父亲(肖元荣)带着哥哥(肖开银)、嫂嫂(姓裘,江北人)、姐姐和我先躲在汤山的石宕里。没有吃的,我和我姐姐、嫂嫂、黄栗墅蔡步田的妈、我们村的肖汉子等几个人在下午三四点钟下山来找吃的,鬼子看到我们就开枪,土扑了我一脸,我就停了下来,鬼子也没有追我。肖汉子是个老头,我喊他“爷”的,他横着跑,没有打着。我嫂嫂的腿上中了一枪,哥哥从山上下来背她,那血一块一块地掉下来。我姐姐被鬼子抓住强奸,死在那里。后来跑反回来,用板子钉了口小棺材,把她抬出去埋了。抬的时候,她下身还插着一根小棍子。埋的地方就在现在的高速公路身下。建高速公路时迁坟,迁到什么地方,我不知道,肖家庄的肖开明知道,他是我的家门哥哥,属猪的。

我姐姐死时才16岁。她没有名字,父亲喊她“大丫头”,喊我“二丫头”,我的名字是解放后才起的。

跑反时,我家老太太,就是我父亲的奶奶,90多岁,她在家没有跑。她是山东人,大脚,白头发长长的,说:“我这么大年纪了,不怕死!”鬼子把我家前半段的瓦房(当时是槽坊)烧掉了,后半段的草房没烧掉,是我

家老太太救火扑灭的。她胆子特别大,90多岁的人了,还卖豆腐、卖草鞋。日本人把猪打死了,她把猪肉割下来烧,烧好了端到山下,在夜里喊:“开银,你下来唉,饭烧好了。”给我们躲在山上的人端饭、端水,端过好几次。

后来,我们都跑到了雪浪庵,在那里躲了几天下圩了。都是夜里偷偷走的,我哥哥背着嫂嫂走,在圩里住了下来。她腿伤没有伤着骨头,没有找医生,过了几个月慢慢好了,第二年三四月里安民了,又把嫂嫂背回家里养伤。嫂嫂还生了儿子、女儿。后来她得病死了,哥哥又娶了个老婆。她生的儿子没有上大学,当兵去了,在越南打过仗,后来在江宁县法院当一把手,现在退休了。

15. 李昌仁口述

李昌仁,男,1926年生,属虎

调查地点:汤山镇李家庄31号

调查时间:2004年9月13日、15日

调查人:费仲兴



李昌仁(左)

我今年79岁,属虎的。1951年抗美援朝时参军,但没有去朝鲜,在南京公安总队当兵,后来调到滨海当内卫。1954年入党,1957年回来。

在汤山信用社当过主任,人家喊我“财神爷”,其实只是个小官。还兼任过两年汤山大队的书记。1980年退休,退得早,现在一个月拿900来元。他们退得晚的,现在一个月拿1300元。

解放前,我们李家庄只有二十来户,五六十人,是远近有名的穷村。有句顺口溜说:“小李庄,十年九年荒,肩担头上装米缸。”这里没有水源,种不了水稻,大多数人靠砍柴谋生,卖了柴,买点米,挂在扁担上拿回家。

李家庄被鬼子杀死的人就多了,全村的房子只剩三家瓦房没烧掉。这些事我以前也想写下来,没有办成。你来调查,帮我们办了件好事,要谢谢你了。

跑反时,我们村许多人很早就跑掉了,我家跑得晚,许多事都亲眼看到了。到我跑反时,村上只剩下三十来个人了。我第一次见到鬼子是在汤山的大众浴室里。那天,我和村上的李仲树到汤山去洗澡,他当时才9岁,比我小2岁,街上的人都跑光了,浴室里空荡荡的,浴池里满满的全是水,只有我们两个,我们就打水玩,当时真是啥也不知道。洗得正高兴的时候,来了两个鬼子,一个是当官的,带东洋刀,带着两个老婆。见我们在打水,鬼子就喊:“杀!杀!”边喊边笑嘻嘻的,不是杀人的意思。我爬起来,光着身子就往外跑,一件衣服都没拿。李仲树吓得哇哇直哭,他抱着我们俩的衣服也跑出来了。那么冷的天,我们边跑边穿,光着脚跑。那时候我们穷,穿得很单薄,没有棉衣。跑到“大楼”,沿山脚一直跑回了李家庄,都是赤着脚跑的。

我在澡堂里见到鬼子后的第三天,国民党同鬼子在李家庄后面的刺山打起来了。刺山就在狼山西边,山上的刺特别多,有老虎刺、倒拉老刺、拉拉刺,其中,倒拉老刺最厉害,扎上一个就牵出一大段,脱不开身。国民党隐蔽在山上,日本人的飞机侦察出来了。鬼子的坦克从南京朝汤山开,边开边打炮,朝刺山上打。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跑,躲在屋里,炮一响,房子都晃晃的,就不敢躲在屋里了。这一仗是中午开始打的,临晚了才歇。我们只看到鬼子向山上开炮,没看到他们的步兵,也没有看到国民党兵还手。仗快打完的时候,日本飞机过来轰炸、扫射。国民党的部队被消灭了,他们的士兵到处跑。在我们村东边的小山上有三间草房,六个国民党兵躲在那里,都是全副武装的,四个躲在草房里,一个躲在旁

边沟里,还有一个躲在草垛里。后来,来了两个鬼子,一个是当官的,把这六个国民党兵全收拾了。当时,我站在墙根下看得清清楚楚。国民党兵没有反抗,兵败如山倒。鬼子先把躲在屋里的四个人活捉了,把他们的衣服剥得光光的,只穿个小裤头站着,然后点火烧草房,鬼子站在高处看。看到沟里有人动,就开枪把他打死。后来大火烧着了草垛,草垛里的国民党兵还了一枪,没打中,就从草垛里跳了出来,他也被活捉了。鬼子用刀把他的头砍了下来,又把那四个人开枪打死了。当时我们看了都不服气,国民党兵身上有枪,有手榴弹和刺刀,没怎么反抗就被鬼子消灭了。

后来,常有鬼子三三两两地进村。劳广寿的一个叔叔在我家门前不远的空地上被鬼子开枪打死了,我亲眼看到的,当时没人收尸。还有一个王老二,和我一起站在门口晒太阳,他的个头高,一只手搁在我头上。那时天冷,我没穿棉衣,他穿着一件大褂子,右开襟的。突然来了个鬼子,留着豆沙胡子,抱着一支大盖子枪,举起枪朝他开了一枪。王老二一下就倒了,动也没有动。子弹穿过他的身体,在墙上打出了一个洞,衣裳上的布料还留在洞里。还有一个是裘怀庆的父亲,是招女婿招过来的,姓韩,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他也在村上被鬼子打死了,但我没有看到。裘怀庆有个儿子叫裘玉忠,他可能知道他爷爷是怎么打死的。

还有三个人,一个是唐康金,一个是李世和,另一个是李大洲,他们被鬼子抓走了,再也没有回来。一起被抓去的还有张肖庄的三个人,都是我们从我们村过去的。

汤山街上有个铜匠,三十来岁,配钥匙修铁桶的,我们都认识他,但不知道他叫什么。当时,他躲在我们村后面沙子山的山沟里,鬼子站在一个炮台上,一枪就把他打死了。

当时,我们村上没有跑反的三十来个人都围着我父亲。他是强劳动力,大家都依靠他。鬼子来了,抓住他,要姑娘,用手枪朝地上打枪,威胁他。父亲一看,总共两个鬼子,想动手把他们打倒,摔到大茅坑里去。鬼子看看天快黑了,害怕了,拔出刀来就朝我父亲砍。父亲一闪,半个鼻子被砍下来了,流了许多血,大喊:“婶婶,快来救救我吧,我脱不了身了。”后来,鬼子就把我父亲放了。

父亲看到鬼子天天进村杀人放火,实在没办法了,就对大家说:“各

人找门路,大家逃吧!”他挑了一担箩筐,一头是弟弟,一头是妹妹,我跟着,三十来个人一起上了刺山。第一天,大家躲在刺山的洞里。这一仗,国民党兵起码有一个团,山上到处是死尸。狼山背后,国民党的武器、包袱、手榴弹、刺刀全是新的,一箱箱的子弹也是新的。我们村有个小姑娘,拿了个手榴弹当锤子,敲着玩,被我父亲骂了一顿。他说:“这是手榴弹,不能玩的!”

我们带着煮熟的山芋,背着袋子翻山。晚上下起了雪,山芋都冻硬了,又没有水喝。翻刺山时,国民党的伤兵喊道:“行行好吧,给我补一枪吧!”我们都没理。在刺山那里,国民党兵的包裹、毛毯摔得到处都是。他们好像是从狼山往西逃,先摔武器、子弹,再向西,跑到刺山,就摔包裹、毛毯。在雪浪庵,我们住了一天,雪浪庵那里全是死尸,附近的山上、树林里有国民党的伤兵,有的还是当官的。我们从雪浪庵跑到桦墅,然后走东阳下圩。一路上都是死尸,我好几次都是从死人身上爬过去的。我看一个团的兵力都不止。

后来我们跑到了北圩,安民后才回来。回来后看到汤山死了许多人。在现在的邮局南面,当时有棵大桦树,旁边有条大沟,鬼子打死了许多人,沟里都堆满了。当时汤山街上的事,汤山大队的老队长经友发知道,他住在新菜场附近,你可以去问问他。李家庄的事,劳广寿知道的多,朱丫头也知道,她比我大一岁,现在住在老砖瓦厂那里,她有个儿子叫潘传金。

汤山高台坡那里是有慰安所的,当时老百姓就叫它慰安所,是慰劳日本兵的地方。里面的姑娘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我不知道。日本人进去是不花钱的。

新四军在陶庐打过一次,在坟头的官桥也打过一次,都是在夜里打的,第二天老百姓就知道了。

鬼子在我们村附近打靶,根本不管老百姓死活,到处乱打。有一次炮弹落下来,就两丈来远,差一点就把我父亲炸死了,

16. 裘玉忠口述

裘玉忠,男,1938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李家庄

调查时间：2004年9月15日

调查人：费仲兴

听我父亲讲，跑反正在乱的时候，他剃了个光头，鬼子以为他是中央军，要杀他。村上20多个人都跪下来求，说他是良民，鬼子就放了。（李昌仁插话：鬼子当时翻到了一张国民党训练自卫队拍的照片，就一个一个地对，没有对上，又有许多村民求情，鬼子就把他放了。当时，国民党给自卫队发的制服是蓝色的，我见过。那时的情形在我头脑里，一点也没有动。）

我爷爷姓韩，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劳广寿可能知道。我爷爷当时年纪大了，有50多岁。听我父亲讲，我爷爷躲在房子隔壁的草堆里。鬼子进了村就用刺刀一个个地挑草堆，点火烧草堆。爷爷从草堆里跑出来，鬼子就开枪把他打死了。当天晚上就用门板把他抬走，他的坟墓就在我们村后的塘边上。

鬼子投降后，有一发炮弹在村后没有炸，劳广寿的一个侄子把它拿到村上，在墙上撞，要把上面的铜搞下来，结果炸了，炸死了三个，伤两个。劳广寿的侄子肠子都炸出来了，挂在树上。许老二的儿子小花子和林守福的儿子小羊子，也都炸死了。我和林正军炸伤了。林正军比我大一岁，他是轻伤，我炸得厉害，肺和心都看到了，额头上也炸了个洞，伤得厉害呢。

17. 经友发口述

经友发，男，1924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汤林村

调查时间：2004年9月20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1岁，属鼠，老家在仪征青山乡。跑反时，房子被鬼子烧光了，什么东西也没有了。16岁那年，我们逃荒到汤山，当时已经安民了。

我兄弟六个，我是老五。父亲、老四和我三个人先逃过来，他们给瓦

匠当小工,我负责砍柴做饭。后来,我们租了华武南的田,在汤山种田。

汤山这里主要是烧的房子多。人都跑光了,主要是老人,留在家被鬼子杀死了。周发银的爷爷就是被鬼子烧死的。周发银现在 76 岁,当时听他说的。听说,尹永茂的爷爷、奶奶和父亲,他们三个跑反时在葛巷被鬼子打死了。尹永茂就住在“小楼”附近,很好找。

鬼子在汤山街上的兵力总共就一个连。“大楼”里的鬼子只有一个班,是指挥营(陶庐)那里派去的,经常轮换。“大楼”里的鬼子不单独起伙,他们到指挥营拿饭吃。

鬼子在汤山时,我在指挥营里面给鬼子烧饭、洗菜、涮锅,干了一年多。和我一起干活的有谢永和,比我小一岁;甘玉良,比我大两岁。天福鬼子把剩饭、剩菜卖给老百姓吃,给我们发工资,五毛钱一天,发的是汪精卫的票子。“天福”原来是一家布店的店名,后来有个日本商人在那里开店,卖劈柴、木炭、手套、酒,也办粮行。总共三间房子,在现在的“好万家”超市那个地方。天福鬼子的真名叫奥野,是做生意的,不是军人,长得不高不低,不胖不瘦,鼻孔下留了两撮胡子。你不理他,他也不惹你。老百姓见了他就喊“太君”,背后就喊他天福鬼子。

天然温泉浴室是陈老四的父亲陈兴旺办的,日本人来了之后,把浴室占了下来,名字还叫天然温泉浴室,但不让老百姓进去了。

炮校里的房子烧得一塌糊涂,连砖头块块都没有了,老百姓都去拆墙。侯家塘 7341(国民党的步校)的房子也都拆光了。后来,鬼子投降前三四年,鬼子又把炮校的房子盖了一下,乡长保长派小工去炮校干活,我也去干过,帮人卸砖。日本人盖房子是由商人承包的,那砖头是用沙子和点水泥放在模子里敲敲,晒干了,就当砖头用。

鬼子在汤山时,83 医院和指挥营里的房子都是白铁皮盖的,陆军大学过来后才翻成瓦房。陆军大学的学员都是将官,有一个豆的,有两个豆的,最小的是大校,人数有 200 多个。顾祝符也是陆军大学的学员。这些将官的家属有的住在徐家边,有的住在汤山街上。顾祝符在汤山街上盖了幢房子,现在还在。

我们家老四、老五、老六,三个人要抽一个壮丁,我父亲就把我送到陆军大学当炊事兵,穿军装的。我从陆军大学开学一直干到 1948 年,

1948年10月,陆军大学搬到孝卫街,我也跟了去。后来,过了个把月,我们烧好了饭,没人来吃了,我和李岗头的一个人就回来了。

陆军大学管我们的是两个副官,一个姓杜,一个姓刘,都是中尉。副官主任的官大一点。陆军大学的校长是蒋介石,开学典礼时到汤山来讲过话。我们当炊事兵的,没见过他。教导主任是两颗花的,不住在汤山,住在南京。

徐家边那里被鬼子打死的人不少。有一次,鬼子一次就打死了十来个人,都是开枪打死的。

解放后我一直当干部。1950年当汤林村的农会主任、农协会的委员,1956年当高级社主任,1958年当生产大队的队长。以前搞忆苦思甜都讲过的,讲过就拉倒,没有人记下来。

日本鬼子的前头部队主要是朝鲜人多。

伪政府的区长是陈德洲,警察局就在延祥寺里。巡官陈国能是陈德洲的侄子。日本投降后,汤山的区长姓张(张溥生),住在上街头韩德银家。“交际处”原先是张静江的公馆,后来是日本人的宪兵队,日本人投降后又是蒋介石的公馆,他洗澡的地方。

汤山的慰安所一开始在老街里,是地主袁广智的房子。袁广智是汤山人,跑到四川去了,鬼子就把它占下来做生意。解放后,袁广智的房子被没收了,分掉了。慰安所是日本人起的名字,是为了安民而搞的,让当兵的在礼拜天有个玩的地方,不去搞别的女人。

慰安所在老街办了两三年,后来搬到了高台坡的巷子里,就是现在的信用社的东边,也办了两三年。慰安所是日本商人山本夫妻俩办的,只要有钱,都能进去,里边的姑娘全是中国人。

天福鬼子的头一个老婆被压在水缸里淹死了。那天,天福鬼子不在家,有几个当兵的翻墙进去,先是喝酒、玩,找鸦片,后来就强奸她,掐她,拎起两只脚,头朝下浸在水缸里,把她淹死,里面的鸦片全拿走。那个水缸其实是砖砌的,是个水池。

我老三(经万强)在“天福”帮工,挑水、打饭、扫地,既挑喝的水,又挑洗澡水。事情发生后,有人报告宪兵队,老三在宪兵队里关了三个来月。日本人的军事法庭进行审问、调查。后来,日本人要打靶,他们在晒铺草

时把鸦片抖出来了。班长马上报告宪兵队。第二天,天福鬼子到宪兵队把老三接了出来,老三就没事了。

天福鬼子在山墙边盖了间草屋给我老三住。天福鬼子的头一个老婆待人很客气的,不论大人小孩,她都很客气。我们都喊她“太太”,她也答应。我们喊天福鬼子“太君”,不喊别的。天福鬼子的女儿那时有二十来岁。他家还有个阿妈,姓言,是作厂人。她儿子在粮管所干过,现在退休了。

天然温泉浴室是比较秘密的地方,老百姓不能进去。汤泉二队的张贵宝在里面干过活,有人说他是日本人的女婿,日本人要把他带走,没有走成。现在,他死了,这些事也就搞不清了。日本人在汤山还开过照相馆、豆腐店,它们和老百姓比较接近。豆腐店老板叫英山。

日本兵吃饭,一人只能吃一碗,吃完了不能添饭的。

18. 朱世英口述

朱世英,女,1925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汤岗村11号

调查时间:2004年9月22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0岁,属牛,跑反时13岁。娘家在句容黄梅夏庄村,离东营房很近。15岁那年嫁到汤山。

跑反时,我跟了哥哥跑到了宝华山的山脚下,躲在何家祠堂附近的一个地洞里。腊月底,快过年了,回到了夏庄村。正月初三,鬼子到我们村上,我们又跑到何家祠堂,安民后才回家。

在夏庄村,我的家门爷爷朱永银(当时五十来岁)看到鬼子进村抓鸡,他就跑,鬼子追他,他就跳进塘里。鬼子把他搭了上来,然后用长刀把他杀了。这是我亲眼看到的,时间是冬月初几,鬼子刚打来的时候。

听我老婆婆讲,我的老公公许兴炎跑反跑到了汤山南边的红庙(今大凹的前身),后来他听说家里房子被鬼子烧掉了,就同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奶奶一起翻山回来,走到桃源村南面的山头上,就被鬼子的哨兵开枪

打死了。那个老奶奶耳朵上挨了一枪,流了许多血,没死,爬回了红庙。我的姐夫和我的老婆婆两个人出去找,找了好久才在山上找到了我老公公的尸体。我老公公是冬月初十被打死的,过了 102 天才找到尸体。后来就把尸体埋了。

西营房后边西储岗的刘长生,跑反时被鬼子杀死了,推到水塘里。当时找了好长时间没找到,过了很久才找到的。汤山小学的茅厕里堆了许多死人,后来一个一个地捞上来认。在孟家场,有许多人被鬼子关在屋里烧死了。第二年二月里,鬼子叫许振清带路找姑娘。许振清走路的时候,鬼子从背后用手枪向他开了一枪,一粒子弹打了进去,没有出来,当时没有死,后来身上滚烫滚烫的,第二天就死了。

慰安所就在汤山街上袁广智家的房子里。天福鬼子的老婆是被他们手下的帮工按在酒缸里淹死的。

19. 尹永茂口述

尹永茂,男,1923 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汤岗村

调查时间:2004 年 9 月 23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82 岁,属猪的。父亲叫刘典友、大大(伯父)叫刘典发。跑反时,我大大在大赤燕那里被鬼子开枪打死了。后来,我们兄弟姐妹一家十三四个人跑到了圣村,因为我姨娘在那里。有个日本人,其实是朝鲜人,他把我和我母亲抓住了,叫我母亲把衣服脱了,用刺刀刺她。我就跑,但没有跑掉。鬼子用枪托把我打昏了,我就沿着山坡滚下去。鬼子没下去,他用手电筒照我。那是天快亮的时候,早晨四五点钟的样子。我父亲没有找到,没有看到。后来,我和母亲、奶奶就逃,要饭吃。一开始跑到后巷,那里人少,没几户人家。躲了几夭,日本人的飞机来炸,我们就赶紧跑。跑出去不多远,我们躲过的那间小屋就被炸光了。后来,我们就跑到东葛墟,躲进了东葛庵,没有办法。鬼子又来烧东葛庵,我们就跑到了韩家边。后来,龙潭有个亲戚住在圩里,他们派人来找我们,就

找到我们了。

20. 周义隆口述

周义隆,男,1929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汤岗村68-1号

调查时间:2004年9月23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76岁,属蛇,跑反时9岁。我们家当时住在东阳镇,开过磨坊。母亲叫孙德佐,今年96岁,属鸡的。跑反前,她在南京城里给人家当奶妈。后来,那家人跑到了汉口,她也去了。在汉口待了一年左右,又跑到了广东、香港,鬼子投降后才回来。

跑反时,父亲带了我和弟弟(周义松,比我小三岁)躲在东槐洞里。那个洞靠山,不远就是长江。洞里躲了一百来个人,大家一个挨一个的。没有吃的,就问别人讨一点。跑反回来后,我去给人放牛,弟弟出去要饭。过了三年,父亲找不到了,不知到那里去了。

(周义松插话)日本人把我父亲抓去,拖去挖战壕。他在那时吃上了鸦片,中了毒。回家后,他把家里的东西全卖光,还偷人家的东西。龙潭自卫团王世和、于老五手下的人把他抓去打死了。解放前三个月,我来汤山开饭店,解放后,全家搬了过来。鬼子在汤山杀人的情况不清楚,只听说团子山后头被鬼子打死了许多人。鬼子在山上架了三挺机枪,中央军被打死的人非常多。葛巷有个女的胆子特别大,她打完仗就拿了把剪刀到死人堆里去挑口袋,翻值钱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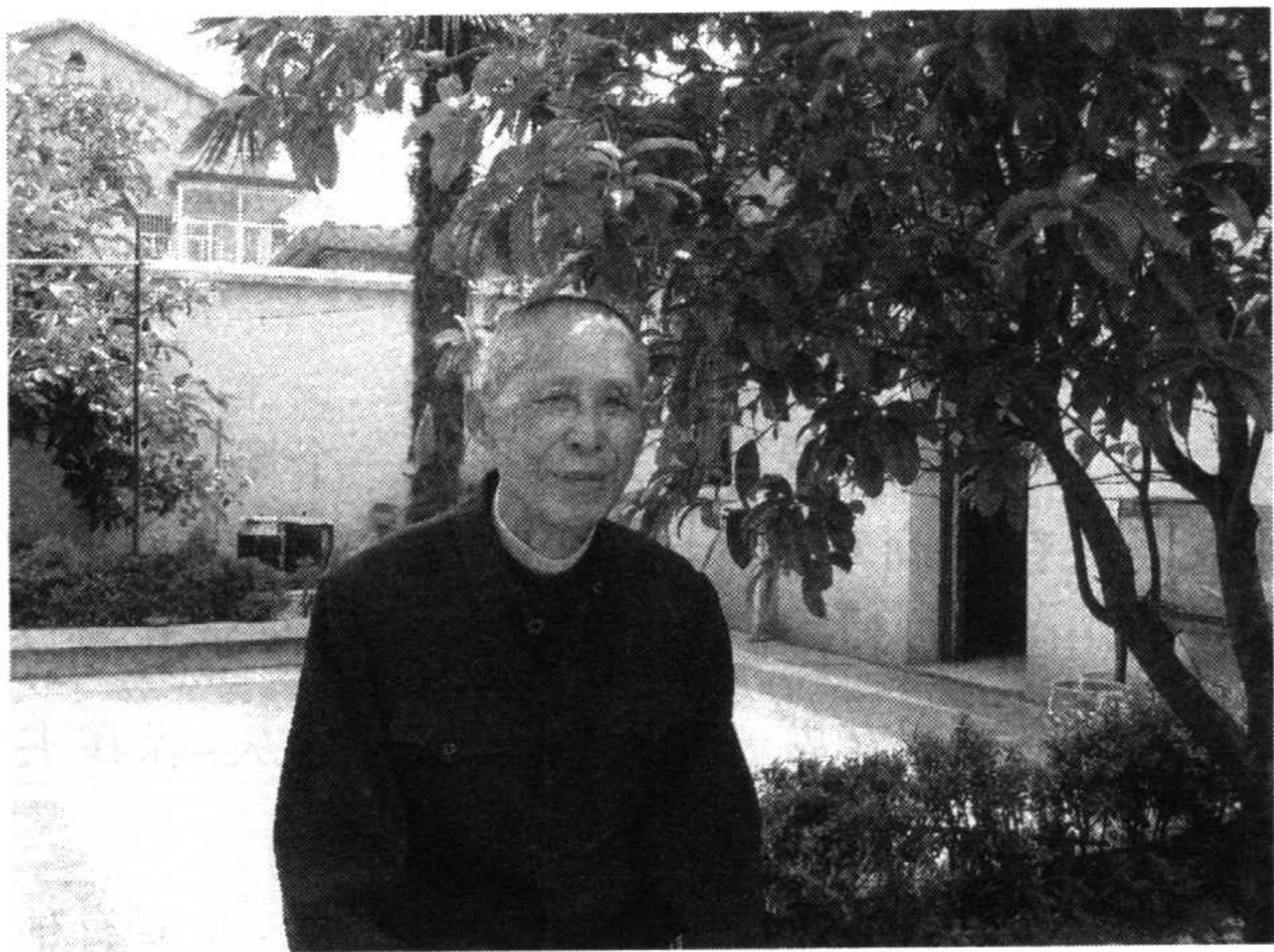
21. 刘尚余口述

刘尚余,男,1926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幸福邨120号

调查时间:2005年5月18日

调查人:费仲兴



刘尚余

我今年80岁,属虎,老家在龙潭营房乡刘家荡。7岁那年跟了父母逃荒,搬到汤山来,投靠姑母。家还没安顿好,日本鬼子就打到南京来了。我们跑得早,比别人提前两三天跑的,不是临危了才跑的。跑的时候日本飞机轰炸句容机场,半边天都黑了,我们都看见的。我父母带着大哥、大嫂、二哥、我和妹妹,七个人一起跑的,走孟塘、小赤燕、龙潭,回老家。一路上跑反的人很多,我们就带些穿的、盖的,没有带别的东西。

鬼子想到我们村(刘家荡)来,他们站在河埂上朝天开枪,桑翻译,那时叫“通司”,向我们喊:“我们不伤害你们的,你们来接,好好招待他们!”刘家荡的人就用木盆撑过去接他们。这一次就来了两三个鬼子,带了鱼网、叉子,下塘打鱼,打了千把斤。他们看到小孩还跟小孩玩。他们把鱼皮扒下,一片一片地切,蘸点酱油生吃,叫小孩也吃。那时龙潭有个大资本家叫叶梅,开了家商店叫“均益”,他把商品全运到刘家荡了。日本兵走的时候看到了这些商品,就弄了点蜜枣、桂圆、脆饼,抬走了。第二次,住在龙潭水泥厂的日本兵又来了,大家就害怕了,怕他们来搜查。有个在外面上学的,有一套童子军的衣服塞在柴堆里。鬼子要逮鸡,鸡拱在柴堆里,鬼子一掏,把那套衣服掏出来了,就说有中国兵,要找中国兵。村上人谁也不肯说,日本兵一直闹到快天黑,要归营了,说:“明天来要中国兵。”村上人连夜搬家,大家躲在蒲塘里。大人、小孩都坐在木盆里,不

敢叫,不敢哭,在蒲塘里冻了一夜。我父亲撑竹篙划木盆,半边衣服淋湿了,一冻,成了盔甲,走路都叮叮当当响,一双手冻得不像样子。后来又往东逃,找了个连门的亲戚,在他家躲到天亮。天亮后,鬼子没来,到中午了,也没有来。原来水泥厂里的鬼子连夜就开拔了,我们就躲过了这一关,村上也没有损失什么。

后来,鬼子又来了几次,要花姑娘。我和一个哥哥、妹妹,还有一个外地来的老太婆躲在一间草屋里。鬼子把子弹拿出来,在枪上敲,喊:“花姑娘的有?不出来死拉死拉的!”我们就全跪在地上,跟他说没有花姑娘,求他。后来,年轻妇女就一个个脸上抹了黑灰,躲在夹墙里,鬼子找不到。

有个董事叫徐昌东,在国民党里也有两下子的,龙潭有他的仇人,依靠日本人的力量来抓他,我们都看到的。前面一些人挑着鱼,后面的日本人把徐昌东抓住了,从上坝押往水泥厂。他双手被拷着,铁丝从肩锁骨穿透,就从我们村的前埂走过,一步一个脚印,流了不知多少血,押到水泥厂就镇压了,我没敢去看。大人们都说:“东边一棵大树倒掉了!”因为上坝在我们的东边。

桑翻译是镇江高资桥头镇人,弟兄几个都是翻译。桑水亲在汤山当翻译,还有桑水强,好几个弟兄呢。他们原来是在日本给人剃头的,回来后,有的在下蜀当翻译,有的在高资当翻译,都是他家的人。赵大宝也是在日本给人理发的,回来时还带了个日本婆子。日本婆子爱干净,常常在陶庐后头的桃花水那里用温泉水洗衣服。国民党说要抓汉奸,就把他给抓去了,他坐了几年牢。汤山本地人就去说,这个人老实,不是汉奸,把他保出来了,他就一直保护当地的老百姓。日本人来了,他在汤山当翻译。日本人打他,老百姓又骂他,他说这种事不能干,半夜三更就逃了。他逃走后日本人才找桑水亲当翻译。

鬼子的厨房里是见官大一级,再大的官也不能违犯它的规矩。鬼子找小孩给他们捧柴火、烧锅,有时还给点吃的。那种泔水饭,一个病区一桶,里面什么东西都有,剩饭剩菜、香烟头、擦鼻纸、痰,什么都有,日本人装在车上,做饭的中国人拿出来卖。老百姓没有吃的就买渥水饭吃,汤山街上吃的人多哩!老一辈的人差不多都吃过,不吃没办法呀。拿回来

用水淘淘洗洗,鱼刺骨头挑出来,洗干净了就吃。这种事情真不好讲,比吃树皮草根还难受。我们在医院里也吃剩饭、剩菜,但都是挖干净的,没污染的。有时,鬼子也会端点干净饭给我们吃。

鬼子喊我们“小孩,小孩”,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就喊他们“西杀,西杀”,就是“先生”的意思。

这样干了年把,我十五六岁了,日本人要逮人了,把我们一起留在医院里,大家都害怕了。当时外面的人传说日本人做人体实验。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过了两个来钟头,电话来了,说不要人了,才让我们走。后来我们就吓得不敢再去了。83 医院这里没有人做(人体实验)。是哪个地方做,我们不晓得,是有人传出来的。后来我到林场干活,就是现在养龙山庄那个地方,汤泉水库边上。工疗也是林场的地方。

我看到过人家拿来卖的炮弹,中间是空的,屁股后面有一个莲蓬头一样的东西,上面有许多小孔。我们以为是点火药呢。

洋桥现在已经拆掉了。有一个老头路过,没有给鬼子鞠躬,我亲眼看见洋桥那里的鬼子卫兵把老头打得鼻青脸肿。这样的事情多了,经常发生。日本人把中国人不当人的。

鬼子清乡时,新四军在孟塘、柏家庄、鲍亭一带破路,破得蛮厉害的,公路扒掉了一半。柏家庄有个老瓦匠叫陈志帮,我认识,在一块待过一段时间,他女儿当过公社妇女主任。你可以和他呱呱(谈谈)。好多事都发生在他们那里。

我在汤山农民教育馆上到小学三年级,背过《百家姓》、《千字文》,认识一些字。后来,国民党抓农民教育馆的吴大和吴二,说他们是共产党,他们就跑了,农民教育馆也停了。我又到延祥寺那里的汤山小学念书。跑反期间,在龙潭圩里,大家都闲着,有个教私塾的叔叔就叫我背书。

22. 傅春海口述

傅春海,男,1925 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幸福邨

调查时间:2005 年 10 月 12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81 岁,跑反时 12 岁。我们家是分了几处跑的,我跟了刘尚余的母亲跑到了龙潭的刘家荡。在那里住了一个来月,后来又到了山里,在窑湾、东葛墟那边,住在私人房子里。

冬月初三,我母亲带着我小弟弟跑到了狼山北面的方冲,住在两间小草棚里。狼山起先是国民党兵占领的,后来,他们的弹药都没有了,鬼子就攻上去占领了。一天晚上,我小弟弟要喝开水,我母亲在山凹子里烧开水,鬼子的子弹打过来,在我母亲的小腿上打了个洞,她都不晓得。后来,水烧开了,要上床睡觉了,衣服脱不下来了,一看,裤腿上的瘀血全结住了。那天大概是冬月初四初五的样子。

方冲第二次打仗的那天早上,我们就走了,跑到了葛巷,后来葛巷又住不下去了,有鬼子去,我们又跑到了胄王山,住在骑马岗下面,那里有七八户人家,在一个凹子里,到五月份才回来。那一仗是龙潭火车上下来的军队打的,他们要到青龙山去,路线走错了,走到了方冲。一个军的人,挨麻麻地睡(死),死的人可多了。这一仗打完后,胆子大的人去捞枪,捞子弹,拿到山里去卖。

蒋介石调军队调不动,就调两广的、热带的。天那么冷,他们还穿小裤头,还能打仗吗?广东兵打仗时都往南京城里跑,所以南京城里有几十万人嘛。

汤山有许多炮楼(碉堡),现在还有好几个。那是工兵搞的,鬼子已经打到上海了,他们还在搞炮楼。后来汤山这里打仗,这些炮楼都没有用上,日本人在这一路没有攻。

韩德诚住在汤山邮局拐弯的地方。跑反时,他家里有钱,舍不得走,留下来看门。他家里是开槽坊的,有钱。那时候,各家各户都有老头老太留下来看门的,结果留下来的人都打死了。他的儿子叫韩正清,比我大好几岁呢,去世了好几年了。韩正友比我还小,他更不清楚。韩德诚怎么死的,死在什么地方,现在没有人知道了。

头一批打过来的鬼子不一定是真正的日本人。先头部队,打前仗的,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人,一个个胡子这么长(用手比划,约 15~20 厘米)。有可能是高丽人。以后驻扎下来的鬼子才是真正的日本人。

窑湾到骑马岗、胄王村那边,过去柴火特别深,有一人多深呢。我们

白天睡在树窝里,看到鬼子在路上走。鬼子不敢上山。

汤山周家边那里原来驻有国民党兵,他们叫村上的老百姓自己烧房子,东西保存好。他们说:“你们不烧,日本人一来也要烧的。”老百姓怎么肯烧自己的房子呢?这些兵都穿着裤头,都是双枪兵,一支鸦片枪打自己,一支钢枪打敌人。

农历八月十五,日本飞机同中国飞机在汤山上空打了一天。日本飞机三架一来。有一架中国飞机被日本飞机打下来了,没有爆炸,从电线杆子上擦过去,一擦两段,飞行员落在 83 医院里头,后来被人拖走了,我亲眼看到的。听说在句容打下了几架日本飞机,叫老百姓去看,我没有去看。日本飞机过来,宪兵就叫各家各户不能烧饭,烟囱不能冒烟。飞机还没来,警报就响了,老百姓就躲在树底下去。飞机快飞来了,那警报声就响个不停了。

国民党的兵也挺可怜的,吃得不好。当兵的吃的都是糙米,炊事员卖锅巴。

23. 崔广荣口述

崔广荣,男,1920 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作厂宕子村

调查时间:2001 年 6 月 25 日、2004 年 9 月 27 日

调查人:费仲兴

解放前我在炮校洗衣房干过,1951 年又去干,后来被精简,不算退休。现在身体还好,能挑水、挑粪、种菜,力气大,饭量也大。

跑反时,我们到了南圩,那里不安全,又跑到宝华山南面的东葛庵,躲了两三个月。后来,一队鬼子兵由几个老百姓带着,边走边喊:“安民了,现在安民了,你们不要怕,赶快回家种田、做生意。”我们就回来了。

中央军和日本人在大赤燕山上打过一仗的,死的人交关(很多),还是打不过他们。汤山这里的碉堡多了,都是德国人设计的。炮校也是德国人设计的。打仗时这些碉堡一个都没用上。日本人的大部队是从土桥那边走的,没从汤山走。汤山这里没有打过什么仗。



崔广荣

作厂有好几个小队呢，高家村、言家村、陈达村、宕子村、牛牧岗，宕子村是最偏的一个，不大。跑反时，我们宕子村 20 多间房子都被日本人烧掉了，烧的那天是腊月二十七。

跑反时，年轻人隔几天就摸黑回家一次，带上点粮食，再出去躲一阵。那天，我悄悄回到村上，一看，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家里的房子烧光了，宕子村的房子都烧光了。后来听炮校里的一位民夫讲，才知道是鬼子干的。原来，炮校里有个鬼子从邻村抢来一头黄牛，拴在我家，叫民夫挑上几担水，准备第二天杀牛。那天夜里，唐道礼从宝华山回来取粮，听到黄牛叫，就悄悄解下了缆绳。那头牛可通人性了，虽然是畜生，好人坏人还是分得清的，它紧跟着唐道礼，一步不离，一直牵到东葛庵。第二天，鬼子找不着牛，就对民夫说：“支那人良心大大的坏。白日里一个没有，晚上的有！”说完就带上硫磺弹（燃烧弹），把村上的房子烧得干干净净。

日本人还烧炮校里头的房子。炮校的大楼烧了一部分，那个钟楼全烧掉了。上面有一块大钢板掉不下来，他们就用炸弹炸，炸了好几次才掉下来的。炮校北区原来有国民党的一部电台，铁塔高得很。鬼子把铁塔拆了，搬到 83 医院那个地方做旗杆，升他们的旗子。过了一段时间，他们自己要在炮校里住了，就把大楼修了修。北区的平房也是日本人盖

的,那时候住人的。日本人投降后,炮校有一部分房子被老百姓拆了,木料拉回家盖房,或者拉到土桥去卖。后来,国民党有个叫朱智辉的军官开枪制止。老百姓听到枪声,以为日本人又来了,在房顶上吓得发抖,上又上不去,下又下不来。从那以后,就再也不拆房子了。

在姚家边槽坊里被日本人烧死的全是小伙子。我舅大爷就是在那里被活活烧死的。我只知道他叫王老二,大名不晓得。他是挑箩担做小生意的,那天他挑着一担东西路过姚家边,就被两名鬼子叫住了。塘泽村上有有个叫李小骡子的也烧死在里面。作厂的言八根子不是在那里被烧死的,他是解放后得病死的。

日本人吃得可好了,那牛肉、黄鱼歹哩(多极了),一个个吃得膘肥体壮。夏天下河洗澡,一个个白白胖胖的,比中国人厉害。

炮校里有个小鬼子叫岩见,保长、甲长都这么喊他的,官不大,管种菜、买粮等杂事,专门找保甲长要人干活。这个人打人打得特别凶,我也挨他打过。日本投降后,不少人找他算账,要揍死他。他躲到 83 医院那个地方一动不动,就没有找到他。还有一个叫中山大尉,炮校的人都归他管。这个人可精了,附近什么地方有什么东西,他全知道。

炮校南操场那里当时是马号(马厩),养了许多大洋马。有许多老百姓在那里被他们打死了。日本人自己的伤兵,腿断了,不能动弹了,就用木柴浇上汽油活活烧死。烧的时候,那些伤兵哇哇叫,都还是活的嘛。等烧成了灰,就装在木盒子里,埋在花儿窖附近的小山上,还有和尚给他们念经。

日本投降后,那些大洋马舌根上都扎了一根铁丝,它们痛得不能吃东西,就活活饿死了。老百姓剥来吃,发现舌根上有铁丝,再剥一头,又有铁丝,才知道鬼子兵狡猾,搞破坏,连牲口都不放过。

(2004 年 9 月 27 日下午补充)我今年 85 岁,属猴的,跑反时 18 岁,挑了一副箩担跑到了东葛庵。我们村上有不少人,东巷、西巷、南巷也有不少人,都躲在东葛庵。有一次,我们到大庙去玩(大庙在鹿山庵东面,名字叫大庙,其实并不大)。六个人一起回来的。回来的路上碰到了一队鬼子,有骑马的军官,还有许多小兵,带了轻机枪、重机枪,在句容西巷的×和广带领下进山。×和广是个槌子,腿不好,我们村上有人认识他

的。他带了鬼子进山,边走边喊:“安民了,现在安民了。你们不要跑,回家去,种田的种田,做生意的做生意!”我们六个人一看,不能跑了。鬼子到了我们跟前,我们就向他们鞠躬,那个军官还了个礼,他走他的。后面跟的一个小兵带着银元,对我们说:“银元的新叫新叫。”要给我们发银元,我没敢拿。唐贤松拿了18个,后来我们每人分3个。唐贤松是我们宕子村人,参加过三青团,解放后打成右派,后来死了。唐良禄走在最后面,几个鬼子指着他喊:“支那兵!支那兵!”原来,他在马群体育学校里受过训练,走起路来有点像当兵的。这几个小兵就喊了几下,并没有向他开枪。

唐良荣原来是教书的,当时认(拜)了安靖帮的老头子。那时候,不认一个老头子,路也走不了。认了一个老头子,走到他地盘上就没问题了。他参加地下抗日活动,认识的人多。有一天,周家边(指上峰的周家边)金大贵的儿子抬(娶)媳妇,他去喝酒了。汤山的鬼子在陈四麻子带领下去抓他们,把唐良荣等人抓去了。一起被抓去的还有塘泽的李照远,也是个教书的。唐良荣抓去后一直没有回来,李照远放回来了。抗战胜利后,塘泽的芮朝友开槽坊,到南京高家巷去买骡子,碰到了一个人。那个人问他:“你认不认识汤山的唐良荣——唐马虎?”芮朝友说:“认识。”那个人就说,唐良荣和他曾在同一个号子(牢房)里住过,一起聊过天。鬼子准备放他出去的,都讲好了,偏偏来了个新上司,官大,说要杀一批人。于是把号子里的人一起拖到雨花台,开了车子去的,架起了机枪,一口气杀了三十几个人,唐良荣排在倒数第二个,被打死了。剩下一些没有打死的人,鬼子就叫他们抬死尸。唐良荣在号子里死活不肯招,口供紧得很。李照远的口供也很紧,没有招,鬼子把他放出来了。李照远在号子里什么刑罚都吃过了,出来后,两只手腕上被勒的痕迹还很深。可他后来在鹤龄乡打劫,断路,抢老百姓的粮食,还当过伪乡长。解放后在作厂斗他,鹤龄乡来了不知多少妇女,一个个上去打他的嘴巴子。他抢老百姓的粮食就是抢老百姓的命,老百姓恨死了。唐良荣死时三十来岁,他被鬼子抓去的时间大约是安民后一年左右。解放后,唐良荣的事就没人管了。

跑反时,宕子村有个姓唐的哑巴,30多岁,在外头被鬼子打死了。他

没有名字,我们都喊他“哑巴”。这个人没有成家,没有后代。还有一个瘫子,叫唐道年,40多岁,他不能走,在腊月二十七被鬼子烧死在自家屋里。唐凤英的父亲在李家庄那里被鬼子打了一枪,打在上臂上,子弹没有取出来。后来吃了鬼子那里讨来的饭,里面有牛肉,就发炎死了。×××跑反时躲在大庙里,被鬼子污辱了。还有一个妇女,她丈夫叫×××,我们村有人认识他们的。这个妇女在东葛庵被鬼子强奸了。鬼子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你走过来他走过去的,鬼子不管,戴上保险套就干,我们都看到的。塘泽村上有个妇女,也不知道是从哪个村来的,绑在一张大椅子上,头被砍下来了,鬼子又把她的裤子脱下来,再用山芋削成小雀雀,塞到她的阴道里。鬼子真是什么都干得出来。这是我们亲眼看到的。在塘泽,鬼子把一头猪绑了起来,不是用刀杀,而是用锯子把猪的头锯了下来,我亲眼看到的。我姐夫在塘泽,我们回来挑粮食时都看到的。

民国26年(1937年)腊月二十七,鬼子把我们宕子村的房子都烧掉了。这件事你听我慢慢讲。

炮校里的鬼子抢了一头牛,拴在我家里,叫伙夫挑了几担水,准备第二天杀牛。那天夜里,村上有几个小伙子回家挑粮食,看到了这头牛。唐道礼说:“把它牵走!”他的侄子唐贤松说:“不能牵,你一牵,鬼子肯定要来烧房子。”唐贤松家的房子同我家的房子是同梁合柱的,烧了我家的房子,他家的房子也就保不住了。唐道礼说:“这个外快不牵走,明年种田哪儿有牛呢?”说完,解下缆绳就牵走了。那头牛也很懂事,东也有牛被杀死,西也有牛被杀死,它也害怕。看到老百姓来牵它,它跟得特别紧。人跑得快,它也跑得快。当天夜里这头牛就牵到了东葛庵。第二天,鬼子见牛没有了,生气了,说:“白日里见不到支那老百姓,夜里把我的牛牵走了。”他拿了几颗小硫磺弹,东也摔一个,西也摔一个,把宕子村的房子都烧光了。那种硫磺弹一摔出去就起火了,他们放火一点也不吃力。

第二天,我们站在东葛庵的山头上看,作厂这里起了大火,看得清清楚楚。唐道礼、唐贤松叔侄两个吵开了,在山上吵得一塌糊涂。唐贤松说:“我说不能牵牛的,你偏要牵。现在房子都烧光了,看你住到哪

里去!”

叔侄俩正吵得厉害的时候,南巷的一个流氓把那头牛牵走了,一分钱也不给。这个流氓叫来宝(陈方仪),是上海的一个流氓头,会点武功。我姐夫芮汉仁,当时40多岁,力气大,也会武功的,他不服气,就去找来宝算账。说:“你不把(给)钱,就不能牵牛。”来宝就要动手。我姐夫说:“大庙里有块大石头,你有本事把这块大石头搬起来,朝我砸,能从我这里通心过(穿过胸口),你就把牛牵走!”来宝走过来,朝我姐夫劈头就是一拳。我姐夫左手一把抓住他的右手,说:“你能把我的手扳过来就算你有本事!”来宝扳了一会,拗不过来。我姐夫用脚尖踩来宝的脚尖,伸出右手,一拳把他摔出去一丈多远。庙里的人看了,都轰起来了。姐夫又上前打了一拳,说:“再不老实,我就揍死你!”后来,来宝问庙里和尚借了32元钱,把牛牵走了。

鬼子烧炮校的房子,烧得一塌糊涂。那个钟楼是被烧掉的,一根横梁,电焊焊不断,就用炸弹炸断。过了些时间,鬼子撤走了。后来,没过多久,鬼子又到炮校来了,把房子简单修了修。鬼子投降后,国民党又重新修理炮校。

国民党在的时候,作厂这里热闹得很,人们都说这里是小上海。作厂街上,光卖肉的摊位就有十来个。作厂小学那里有个合作社,盖得很漂亮,柜台全是玻璃的,什么东西都有。那时候,国民党还打算把铁路修到作厂。

作厂小学以前是作厂庙,里面没关过中央军的俘虏。没有的事不能瞎编。

24. 侯爱英口述

侯爱英,女,1929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作厂言家村

调查时间:2004年3月13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76岁,属蛇的,丈夫叫言智友,比我大5岁,属鼠的,他早就

去世了,坟墓就在作厂言家村的后边。汤山工业园区盖厂房,坟墓才迁过来的。墓前有块碑,是他的同学向云珂立的。

我娘家在寺庄,侯国权是我哥哥。他原名叫侯国椿,解放前跟了国民党去台湾,后来就死在那里,骨灰是向云珂送到汤山的。

日本鬼子打汤山之前,附近一带有许多人跟了炮校一起逃,言智友那时才14岁,他同侯国椿一起,跟了炮校逃难到贵州都匀。

日本人打汤山时,我9岁,跟了父母和兄弟姐妹一起跑反,一直跑到六合县瓜埠的一个小学里。我记得那年冬天雪下得特别大,学校的院子里有棵树,有个跑反的人吊死在那树上了。后来安民了,父母亲挑着箩担又带我们回来了。跑反的时候,没有吃的,我们就问别人讨一点,买一点。安民的时间好像是清明前后,记不起来。回到家里一看,我娘家的房子全被鬼子烧掉了,一共是十间两厢,是楼房,不是平房。回来后没地方住,就到别人家没烧掉的房子里去挤挤。后来,日本人要招老百姓做工,我父母找二鬼子,通过他们,开始做工挣钱。作厂这里的情况不大清楚。我只知道我家(指言家村婆家)的老房子有一半给日本人烧掉了。

寺庄被日本人杀死的有不少。许多人跑反时躲在大凹的老虎洞里,还有不少人躲在朱砂洞里。后来,这庙被日本人烧掉了。

25. 言德章口述

言德章,男,1926年12月3日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作厂言家村

调查时间:2004年5月4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79岁,跑反时12岁。父母亲带着我和两个姐姐、两个弟弟跑到了安基山,我伯父一家十二三口同我们一起跑的。以前,我们在安基山打柴,认识那里的人,所以才到那里去。我们言家村还有十几户人家跑到了孟家场。他们在孟家场挖地洞的时候,日本人就过来了,向他们哇啦哇啦地喊。有个小军官在纸上写“支那军在哪里”,问言智全。言智全说:“先生,我不识字。”小军官把他骂了一通,又问言礼荣。言礼荣

边比划边说：“噢，在那边，在那边，轰、轰、轰。”小军官说他不错，就把门一关，用粉笔在门上写了几个字。不一会，鬼子就在村上杀人放火，孟家场到处是哭喊声。鬼子兵看到门上写着字，就没烧那家，也没进去杀人。鬼子在孟家场闹了个把钟头就走了。言礼荣出来，在村上看了看，一数，有47个人被鬼子杀死了。他们吓坏了，把礼帽丢了，卫生衣也脱了，凡是买来的衣服全丢了。几十号人离开孟家场，往安基山跑。到了安基山，他们就讲鬼子杀人的事，说：“你们跑的路好，是山路，孟家场全是平地。”我父亲说：“还是你识字的好，救了全村人的命。”



言德章

我们在安基山躲了几天，有支中央军部队从南京突围出来。上午十一点的样子，在孟塘方冲中了日军埋伏，打得很厉害，我们在安基山都听到枪炮声了。那天，太阳快下山了，我们在山上埋锅烧饭。日本人看到有冒烟的地方，就打过来三发炮弹。我们一下就跑散了，东一个西一个地躲。后来，我家和伯父家就跑到叶庵。叶庵有二十来间房，东面一个大殿，西面一个大殿，北面还有一个套房，我们二十来人就住在里面。白天，我们男丁上宝华山，认为日本人是信佛的，不会动宝华山的大庙，晚上就回叶庵。当时我们在叶庵存了点稻谷，那是在夜里从作厂挑来的。第二天，来了个鬼子，他看到房顶上有好多鸽子，就开枪打，一枪一个，枪法准得不得了。父亲说：“这里也不安全了。有一个鬼子，就会有第二

个、第三个,还是赶快走吧。”宝华山有国民党兵,是脱了军装的。一天,我们在宝华山碰到了汤山的赵基尧,便问他:“你怎么在这里?”他说:“东洋人到宝华山了,你们赶快跑。”我们一听,就赶紧跑。为了活命,我们就搬到宝华山北面的石家岗住下了。一打听,鬼子没有来过,这里安全,我们就住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走了才三天,叶庵就来了八个鬼子,抓了几个年轻人,还抓了个小孩。这个小孩和我同年,是柏家庄人。他一看鬼子要杀人,就跑,鬼子向他放了一枪,打伤了他的膀子。另外几个年轻人全被鬼子打死了。这个小孩后来也逃到石家岗了,他母亲用草药给他洗伤口。鬼子在叶庵杀人的事是他告诉我的。后来,我当了老师,又碰到过他的。

我们在石家岗住了几个月,二三月里就搬到阜西的道白庵,住在农民家里,住了个把月才回作厂。作厂的房子,靠村边的全烧光了,我家的房子在村中间,没烧掉。但家里的东西全没了,桌椅板凳什么都没了。粮食也没了,那么多人全吃野菜。头年冬天,国民党叫男丁挖战壕,许多人家都没种麦,只有很少几家种了点麦,吃饭吃不成了。

跑反刚开始的时候,言家村的言八根子(小名)挑了一担东西到上峰李岗头去,走到姚家边就被鬼子逮住,关在槽坊里烧死了。他的一个兄弟小名叫三叶子,在炮校里当兵,参加过淞沪战役,同日本人打过仗。

跑反时,我们言家村有些老头老太留在村上没跑。有一天,他们聚在一起杀羊,在作厂豆腐店里烧羊肉吃,被日本人看到了。日本人觉得不顺眼,把几个老人都杀死了。其中一个叫沈大群,是沈桂英的祖父。还有一个叫言学明,他没有后代。另外还有两个老妇女,一个叫吉奶奶,另一个叫四奶奶。沈桂英的父亲跑反时在汤山附近被鬼子打死了,地点不清楚。沈桂英就嫁在言家村,解放后当过作厂大队的大队长,今年70多岁。

西岗头有那么多人被鬼子打死,现在说,也是他们太麻痹大意了。许多人都是回家来挑粮食的,感到鬼子最近也没来过,估计没问题了吧,就在家里住下了。没想到那天鬼子突然来了。当时,村上也有人躲起来的,我姑父的兄弟陈广海就躲在一家人的楼上,他没有被鬼子发现。我姑父陈道法在那天被鬼子打死了,姑妈一个女人家,下面有两个儿子、四

个女儿,生活就非常困难了。后来,她家的地全是我父亲和伯父包下来种的。

我伯父的三儿子叫言德文,比我大五岁,在炮校练习队当兵。练习队相当于一个营或者一个团的样子,有大炮的。日本人打过来了,他们就撤到南京。到了南京城里,83军不让他们走,他们就参加了南京保卫战。这个练习队后来全打垮了。言德文撤到了下关,上级命令他们去浦口,可又没有船,过不了江。他抱着一根木头渡江,西北风向南吹,他落脚落到了栖霞山。他把军衣脱了,跑到一个庙里。这庙里的和尚好,找了件老百姓衣服给他穿。他摸着回来,没敢回作厂,跑到安基山了,在那里碰到我们,就一起到石家岗了。我们村上还有一个叫言德富的,他家离我家就20来米,也是炮校练习队的。练习队打垮后,人都冲散了。他在城里碰到了鬼子,有个女学生模样的主动认他,拉着他对日本人说:“他是我丈夫。”把他保护下来了。日本人一走,女的就说:“你快走吧。”就这样,这个女的救了他一条命。言德富去年才死,活到90岁呢。

1937年8月15日以后,日本飞机经常过来轰炸,我们都看到过中日双方的空战。飞机在天上飞来飞去,像大老鹰一样。在西营房那里,有架国民党飞机被日本人打下来了。飞机是单人驾驶的,老百姓说,飞行员又要开飞机,又要打炮,手脚忙不过来。日本飞机没有轰炸过炮校,但炮校里有学兵站在三层楼的楼上放过高射炮的。国民党还挖了许多防空洞,在我们言家村三队的漏塘那里就有好几个,现在三队的稻场有一角塌陷着,那就是当年挖防空洞的地方。

炮校的军官都住在老百姓家里。言礼方家也有军官住着。后来,炮校向内地撤,他父母便跟那个军官说,希望能带了言礼方一起走。那个军官答应了,言礼方就跟着这个军官撤到了内地。过了几年,言礼方考上了黄埔军校,毕业后在国民党南京警备团当连长。解放军渡江时,他随部队逃到句容,在那里碰到了解放军,就偷偷地跑回了作厂。解放后,他被划为反革命。他今年81岁,比汤山的郭世才小几岁。言家村还有一个人叫言智宽,也进过黄埔军校,当过军官。

黄埔军校的招生标准一开始是蛮高的,高中毕业才能考,后来就放宽了。言礼方是小学毕业,言智宽也只读到初二,都考上了。汤山的韩

正礼是高中毕业考进黄埔的，他的文化程度就高多了。他特赦后在《江宁春秋》上发表过好多文章，我看过的。他好像只有一个女儿，女婿对他不大好。

作厂小学的“红房子”是国民党的一个飞行员盖的一幢洋房。飞行员姓刘，他女儿刘淑芝、儿子刘家强和我同学，在作厂小学同一教室里上课的。那时候学校里只有三个老师，几个年级的学生在一个教室里上课。刘淑芝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面，刘家强在解放后到炮校来参军，叫我到炮校玩，后来没去成。

中央军和日本人在孟塘打了两仗。第一仗是跑反刚开始的时候打的，日期是冬月初四，地点在孟塘大赤燕。有个叫彭合成的人告诉我说，66 军的一个师驻守在湖山，他们派了一个连守在大赤燕。日军到孟塘后，有股人马向南冲，想攻下汤山镇，在大赤燕那里被这个连挡住了。他们发动了好几次冲锋，喊叫着向前冲，都没冲过来。后来，日本人就叫飞机来轰炸，这个连的大部分人都牺牲了，只剩下三个。这三个人打一阵就换个地方，日本人也闹不清山上到底有多少人。最后，阵地被攻下来了，日本人一看，原来只有三个人。

中央军在孟塘同日本人打的第二仗是在方冲打的。我以前在乡政府写《汤山镇志》的时候到陈家边调查过。有个姓梅的老人告诉我说，日本人占领南京后，66 军的 2 000 来人从城里突围到东流，找了个干苦力的外地人，叫他带路去周冲。结果，这个人把队伍领到了方冲。有个军官在方冲站在队伍前训话。这支部队想走宁杭公路突围到安徽去。当时，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大楼”，他们在山上架起了机枪，向中央军扫射。中央军的战斗力不行了，牺牲的人很多很多，只有一小部分冲出了包围。

跑反结束后，有人出来收尸的。汤山的赵基尧当过掩埋队队长，他们埋一个算一个，凭人头账拿钱的。他说汤山镇附近一共埋了 600 来个，炮校里被打死的有 200 来个，但不是他们埋的。赵基尧是抗战前在汤山落户的外地人，广东口音。他老婆是作厂宕子村人，他“娘娘”（方言：姑妈）在言家村，所以我父母都认识他。这个人能吹，说他坐在一张板凳上就能升天，他的亲戚都不相信。

顾祝同不是汤山人。他的兄弟顾祝符是国民党的将军，当过军长。

解放后镇压反革命，顾祝符在作厂被枪毙了。枪毙的地点就在现在作厂中学下面的教导队里头，那个地方以前叫新民村，炮校的教育长就住在那里。他的尸体就埋在果园北面。有人误传，以为他是作厂人。后来，因为他是国民党将领，要厚葬一下，那个坟就动了动，弄得稍为考究一点。

26. 沈桂英口述

沈桂英，女，1929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作厂言家村

调查时间：2004年5月25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76岁，日本人打来那年10岁。跑反时，我爷爷沈荣强70多岁，留在家里看房子，没跑。父母带着我和一个姐姐（18岁），一个哥哥（12岁），一个弟弟（两岁），跑到龙潭北圩，住在老百姓家。我父亲叫沈宝坠，当时30多岁。

一提起那时候的事，我就忍不住流眼泪。我们在北圩没吃的，父亲就和小姑爷（姑夫）言智瑞一起回家挑粮。当时，他们身上都带着一个大袖章，上面印有红疤疤，还有“欢迎大日本”几个字。这是北圩的一个保长给的，说可以保平安。他们两个跑到宝华山的河冲就碰到了鬼子。鬼子叫他们排成队，跪下来，接着就开始扫射，那次一共扫死了13人。另外一个跑到山里，逃出来了。

父亲和小姑爷走后，母亲和姑妈天天盼，盼了十多天也没有音讯。后来有人告诉她们说：“宝华山河冲那里打死了13个人，不知有没有你丈夫？”她们一听，就在夜里出来，冒着天寒地冻找人。到了河冲，扒开一个个死尸，终于找到了父亲和小姑爷。可怜呀，他们的手心里都还抓着大袖章。天麻麻亮的时候，她们赶回了北圩，又不敢进屋，都站在外头不停地哭。

父亲死后，一家人没吃的，只得到处讨饭。不久，我姐姐就嫁到土桥的庄里村。出嫁时，男方用手推车过来接，车过黄梅桥，姐姐从车上下

来,躲到麦子地里,过了公路再上车。

我们跟着母亲要饭,到处跑,讨了好几年。别人问我母亲:“你男人呢?”母亲便说:“出去做工了,没回来。”要是知道她是寡妇,那年头有人要抢的。在外面要饭,不但有狗来咬,还常常遭人欺侮。有一次到了一个村上,听说有一家结婚,母亲就叫我拎了篮子带着钵头去讨,说:“如果有荤汤,你用钵头带点来。”我到了那里,几条狗拼命来咬,裤腿被咬了几个洞,篮子丢了,钵头也打了。村上一帮十四五岁的小孩还喊:“快打这个要饭的!”回到母亲身边,我两手空空,大家都哭了。这些事情,我一讲就要哭,讲不下去。

我祖父和我父亲是在同一年被日本人打死的。我祖父和村上的五六个老头、老太是在言家村被日本人开枪打死的。后来,日本人又放火烧,一个个尸体都烧得认不出来了。被打死的老头、老太不知道姓名,有个老太太叫“瞎奶奶”,她眼睛不好。

我家的房子全被日本人烧掉了。跑反回来没地方住,就住在舅舅家。炮校里头的日本鬼子常常抓老百姓给他们干活,每天由伪保长带去,在校门口排队,一个个地检查,年龄太小的不要。我13岁那年排在队伍后面,鬼子把我拎过来,用力一掀,掀出老远,又用1米多长的棍子打我。后来,二鬼子跑到我家,叫我母亲去干活,母亲就去了。吃饭的时候,我去送饭,送到了炮校门口,一个鬼子用大洋镐打我母亲,身上全打青了。那年头过得真是牛马不如。

解放后,到了办人民公社的时候,我当了作厂大队的大队长,带着大家修汤泉水库,公社副书记朱厚禄(上峰朱家山人)见了我,还表扬了好几句。那时候,汤山公社包括上峰、麒麟,比现在大得多。

作厂大高村的高树明,当时是贫农组长,和我一样不识字。听说他父亲是被日本鬼子杀死的,你可以去问问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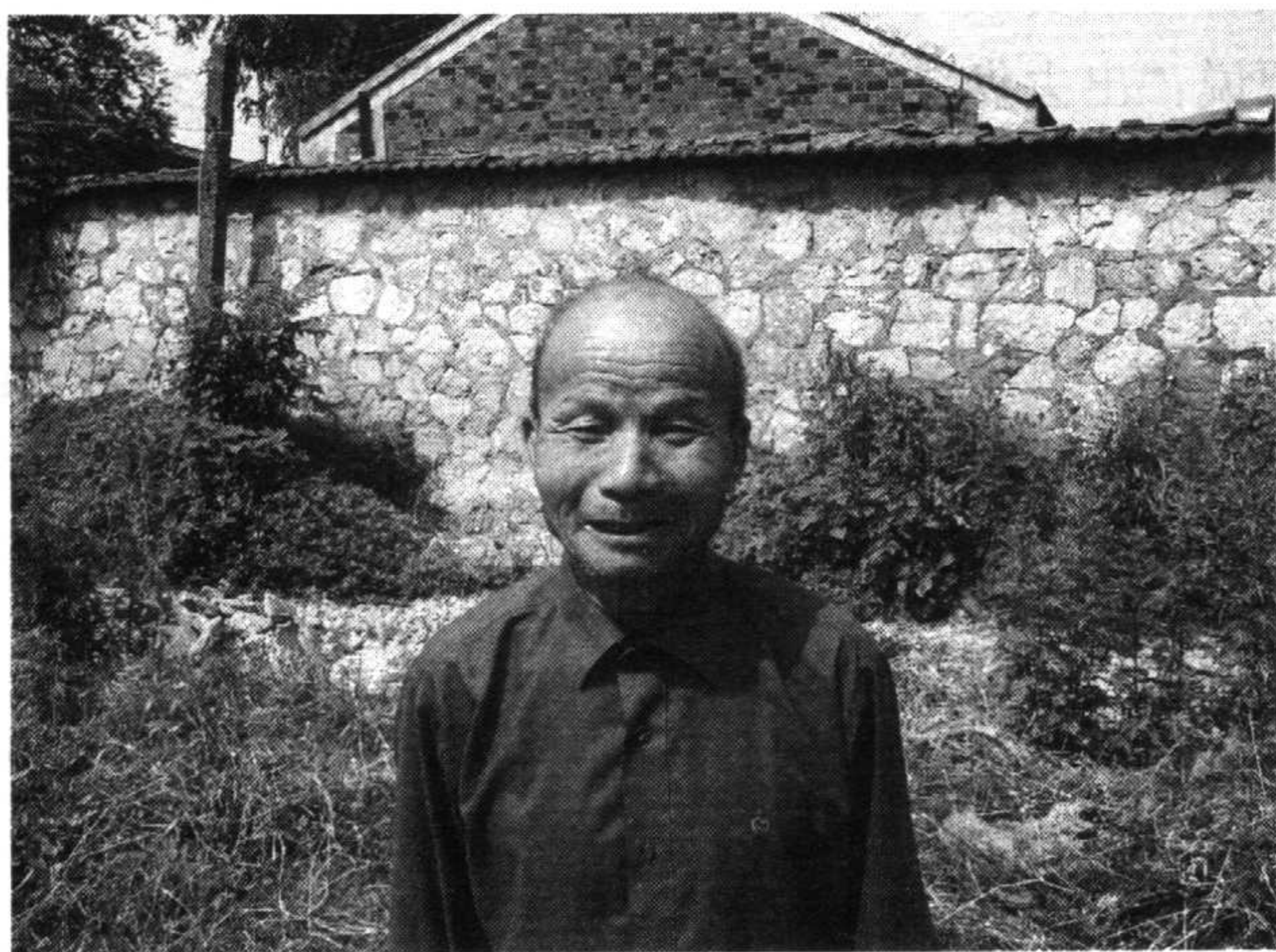
27. 高树明口述

高树明,男,1929年冬月初三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作厂大高村43号

调查时间:2004年5月24日

调查人：费仲兴



高树明

我今年76岁，跑反那年10岁。1937年冬月初三，父母亲带了我们兄弟姐妹四个跑到上峰周家边亲戚家。第二天，觉得不安全，又向北跑。我们看到中央军沿着公路往龙潭方向跑，日本飞机来炸，炸死了不少老百姓。到了孟塘，碰到了日本人，他们端着刺刀拦住我们不让走，刺刀对准我父亲，差一点点就戳破肚皮了。日本人把几百个跑反的老百姓关在孟塘的几间房子里，我们在里面关了好几个小时。后来，来了个鬼子军官，骑着马，拿了指挥刀，对日本小兵喊：“统统的开路！”那几个小兵就把我们全放了。父母带着我们跑到方冲，在山上躲了一天一夜。方冲半山腰上有个洞，叫油老鼠洞，很深，很高，比这间房子还高，里面躲着四十来个人，我们也躲进去了。那时天冷，洞顶没有滴水，地上也不潮。洞口有块大石头挡着，外面的人看不见洞口。

这时候，日本人把方冲的几个山头都占了，我们在洞里躲了两三天，有支中央军就到方冲来了。师长骑着马在队伍前训话：“弟兄们，前面就是敌人了，我们要准备战斗了！”他们在下面，我们在半山腰，他们的情况看得清清楚楚，他们的讲话也听得清清楚楚。

下午，仗就打起来了，冲锋号响了好几次，枪声很密。日本人从山顶往下打，中央军从山下往上冲。有三架日本飞机轮番地轰炸，人都炸飞

了。炸弹一响,油老鼠洞里就震得直响。这个洞蛮结实的,没震下什么。日本飞机炸了半天,不歇地炸,第二天飞机又过来炸了一会。中央军一个师的人,逃出去的只有三四百人。有的士兵进洞换便衣,父亲有两件挂子被他们要走了。这一仗打完后,日本兵又排成一排,打着旗子,端着刺刀,一步一步地往前扫荡,看到没死的中央军就用刺刀戳死。

我们是冬月初六进洞的。冬月十五,我们打算逃走,没逃成,山顶上日本人听到声响就用机枪扫,我们在洞里又躲了一天。冬月十六,月亮昏昏的,洞里的四十来个人全逃出来了。我家跑到了雪浪庵,在庵里躲了没几天,又跑到了水家边,住在一个朋友家里。

后来,父亲回作厂打听消息,觉得问题不大,就带着我们跑到殷家边,住在一个姑奶奶家。没几天,日本兵来拉夫了。母亲吓得躲进了窑里,父亲带着我到吴嘉耀家烤火。两个日本兵把父亲抓去了。那天一共抓了四个,有红庙的一个,个子山的一个,都不知道姓名,还有一个是西山头的,叫姜老五。父亲说脚痛,不能走,鬼子硬要他牵着一一条洋狗走。到了汤山,日本人把他们关在菜场附近的一个院框里,后来就把他们全打死了。那三个人是开枪打死的,父亲是刺刀捅死的,胸口、上腹、下腹,共刺了四刀。

我们听到消息时已经过了好几天了。我装着讨饭的,在汤山到处找。有人告诉我说,有4个人死在菜场边的院框里,我就装着要小便,进了院里。一看,他们全在里面,都冻僵了。别人告诉我说,他们是腊月二十一那天打死的。后来,我们就请人把父亲的尸体抬回作厂。那时没有棺材,找了块木板,当天就埋了。

父亲死后,母亲无法养活四个小孩,就在殷家边把3岁的妹妹摔在水塘里淹死了。那天正下着大雪,塘里结的冰很厚。

后来,母亲带了我们到上峰古禄庙里又躲了一阵。回到家里,房子烧掉了一半,另一半还能住。我们就出去讨饭。讨了一年,我就给人家放牛,到15岁那年就不再讨饭了。

作厂大高村言智加的父亲是从外面带来的,叫郭来喜。跑反刚开始时,他在大高村下面被日本人开枪打死了。当时他20来岁,怕抓壮丁,就弄了一件中央军的军装穿在身上,日本人见了就打。

作厂村上被日本人打死的老百姓多了,粗估估有四十来个。我那时还小,只知道自己家的事,别人家的事不大清楚。

后来稳定了,日本人经常叫民工到炮校干活,小孩也去的。干一天给两包雪格拉香烟,这是小兵抽的。当时,雪光牌香烟最好。

安民后,日本人在黄梅桥打了一仗。有 18 个伤兵,有的眼睛不行了,有的不能走了,有的还能说话。两个人抬一个,把他们抬到了宕子村前头炮校的老花房那里,铁架子一搭,把他们抬上去。有 4 个小兵用刺刀对着他们,怕他们爬起来。一个人用汽油往他们身上一浇,点火烧了。当官的给他们念经,不知念些什么。我当时在放牛,离他们不远,看了一会。鬼子不让看,对我喊:“小鬼,开路。”我就赶紧走。

日本人打汤山前,他们的飞机就过来轰炸,炮校的警报呜呜的,响个不歇,炮校没有挨过炸弹。日本人投降前,国民党也有飞机过来,投汽油桶(弹),日本人也拉警报,把马拉到战壕里,用树枝盖起来。

28. 孙桂英口述

孙桂英,女,1922 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作厂大高村

调查时间:2004 年 6 月 8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83 岁,属狗的,住在大高村,门牌号不晓得。娘家在上峰高庄。日本鬼子来的那年我 16 岁。那年阴历十月二十二结的婚,丈夫叫高德茂。到了冬月初一,我们打算把老公公、老婆婆接到我娘家去住的,他们没去,就我们夫妻俩去了。鬼子一到作厂就把我老婆婆开枪打死了,老公公腿脚不便,一看就吓坏了,在靠近宕子村的地方跳塘自杀了。我老公公叫高继财,当时 70 多岁,老婆婆姓名不晓得,当时 70 岁左右。

29. 丁庆芳口述

丁庆芳,女,1931 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作厂大高村

调查时间：2004年6月8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74岁，属羊的，娘家在仙涧桥桥西，那里就我们一家姓丁。

跑反时，我7岁。哥哥叫小桂子，16岁，我喊他“桂子哥哥”。他在外面跟了一位老板当学徒。我父亲去接他回来一起跑反，那位老板说：“我带他走，我来负责。”父亲说：“那你就带他走吧。”后来，父亲带了我、我的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和我母亲，五个人一起跑到了龙潭北圩。

我哥被老板带到了龙泉的神家庄，躲在附近。后来，他到神家庄找吃的，找到了一点粉丝，没料到被鬼子包围了，杀死了。有一个据说是西岗头的人跑到北圩，告诉我父亲说：“你儿子在神家庄被鬼子杀死了。”他就跑到神家庄去。到那里一看，有十来个人，头全砍下来了，认不出是谁了，只能认穿的衣服。认了一会，认出了我哥哥，只是找不到头。我哥理的是西装头，附近只有理平顶头的。父亲那时又害怕又着急，就随便拎了一个理平顶头的，连身子一起就地埋下了。后来，关网的（巫婆）对我父母说：“你儿子的头不是原配的了。”不知她是怎么知道这事的。

我母亲知道哥哥被鬼子杀死的事情后，一个人躲在外面哭了好长时间。当时，我们住在别人家里，她只能躲在外面哭。她怪我父亲没有把哥哥接回来一起跑，又对我说：“以后就再也没有桂子哥哥了。”我那时不懂事，对母亲说：“没有哥哥就拉倒，家里还有格西（这些）人哩。”

安民后，我们回到了家里。一看，房子全烧光了。父亲用稻草搭个小棚子，临时住住。我们村有家槽坊没烧掉，我们在里面住了些日子。槽坊里挤满了人，父亲就到山上砍了些松树，搭了间小屋，一家人住在里面。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住在句容黄梅桥我外婆家里，她家条件比较好。

30. 谭学英口述

谭学英，女，1929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作厂大高村50号

调查时间：2004年6月8日、10月20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娘家在新庄，靠近炮校的小西门。听上人讲，老家是苏北洋溪港的，是挑了一担箩筐逃难过来的。到新庄落户时，炮校正在盖房子。我5岁那年跟了大人到炮校里，见有人把吃剩的馒头丢在水缸里，捞起来洗洗就吃。我不识字，以前当过小队的妇女队长，全靠脑子记，现在记性不好了。

日本人打过来之前，他们的飞机来炸炮校，放下来的炸弹像煤气罐，有这么长（用手比划，有一米多），可奇怪得很，这些大炸弹一个都没有响。日本人过来后，也没有动它。

日本飞机、中国飞机在天上打，那声音呜呜的，炮校的警报一阵又一阵地响，我们都躲在家里不出来。有一架日本飞机掉下来，在作厂言家村前头一点烧起来了，去看的人挤得来，满满的。日本人跳伞跳下来，求中国人不要杀他，后来也不知道杀了没有。

跑反那年我9岁，村上许多人都跑到南圩去了，我父亲不肯走，我们就全留下来了。有天下午太阳快下山了，一个鬼子闯进我家喊：“马几、马几。”问我父亲要洋火（火柴）点烟抽。父亲知道洋火是不能给鬼子的，他们拿了洋火要烧房子的，就递给他一把菜刀。鬼子立刻从身上拔出一把刀，在父亲脚上砍了一刀，砍完就出门。出了门，他看到了我家的一头猪，举刀一砍，把猪头砍下来了，叫我们村的王老头等几个人抬到炮校。王老头后来给我们说，鬼子把猪架在火上熏，没有开膛破肚，也没有剥皮。

父亲脚上被鬼子砍伤后，鲜血直流。他想，在村上待不下去了，还是跑吧，就带了我、我哥和我母亲连夜动身，朝狮子沟（今句容石狮）跑。当时天寒地冻的，父亲的脚都冻得麻木了，不能走路，他就从新庄一直爬到狮子沟。路上有许多死人，他都是从死人身上爬过去的。到了万家村，我们就躲在附近的小山上。过了好多天，他脚上的伤口才慢慢好起来。可有一天，他在万家村又碰到了鬼子，那个鬼子用枪托敲他的脑壳，他被打得昏死过去了，过了好长时间才醒过来。第二年开春安民了，父亲才带着我们回到新庄。到家一看，房子全烧光了，一家四口全住在露天。

我哥在炮校放鹅，被鬼子抓住了毒打一顿，昏过去了，喷点冷水再打。父亲知道后立即去找乡长、保长，托他们找翻译求情。他们给翻译说：“他是本地人，你们得放他。”鬼子就把人放了。

有年腊月里，五个新四军便衣到炮校来摸库房，被鬼子抓住了。鬼子在小西门外的小山上挖坑把他们活埋了，土堆到胸口，他们就全胀死了。鬼子不准别人去收尸，这五个人上半段露在那里，到春天夏天烂光为止。句容茅山的新四军派人来讨这五个人的，还发了传单，日本人关了大门，不给。

鬼子快投降的时候，阴历四月左右，他们在炮校小西门外头的小山上竖了四根木桩，用木板搭架子，一层一层地搭了好几层。他们把自己的伤兵用白布裹起来，叫他们自己走上架子，一个挨一个地躺下。有的伤兵只是腿上、膀子上受了点伤，自己能走路的，也要上去。然后，鬼子从上头浇汽油，点火烧，被烧死的伤兵有一千来个呢。那一股股黑烟，中间红红的，冲到老高老高，烧了大半天才烧完。烧完了，地上全是灰，别的什么也没有，日本人也不收，也不埋。烧的时候，有许多日本女人背着祖宗牌牌，站在那里给伤兵送行。那时候我 17 岁，剃着光头，看起来像个小男孩。我在炮校挖野菜，站在旁边看，鬼子赶我，不让我看，我还是全看到了。后来，鬼子投降了，枪也缴了，中国人没有去杀他们，让他们全回去了。中国人待日本人那么好，可他们回去了还不认账，这些人真是坏透了呀。

(2004 年 10 月 20 日上午补充)我丈夫叫高德义，小名叫大宝。鬼子在作厂安营后，有一天他们从炮校出来，前头一支人马走过去了，后面一支人马还落在后头，中间有段空档。我丈夫早上出去砍柴，就从空档里穿过马路。鬼子立刻冲上来，把他抓到炮校里打，打死过去了再用冷水浇，架着走，再用木杠子压他，踩他。有人跑来告诉家里人，他父亲就去找乡长。乡长跑到炮校说：“他是我们村上土生土长的，是好人。”鬼子就把他放了，他在家养了个把月才慢慢恢复过来的。当时翻译对他说：“你从两支队伍中间穿过去，剪了人家的队伍，不吉利，人家出门就打不了胜仗。”翻译还告诉他，若不是乡长求情，他们就准备把他活活打死，乡长再去晚一点，他就要被打死了。

那时,我还没有嫁过来,我结婚后才听他说的。我13岁死了老子,17岁死了妈。16岁八字到这里(指定亲),17岁鬼子投降,9月里就把我接过来了。

我丈夫被日本人打过之后就得上喘病,一个来月发一回,喘的时候饭都不能吃。解放后到83医院检查,不是肺结核,也不是肺气肿,而是打伤得的喘病,就给他埋洋线,做试验,不收钱的。这样一治,病更厉害了,发高烧。后来取出洋线,吃中草药,也没有调好。医生说,打伤得的喘病,调不好了。后来,他又得了腰结核,69岁就去世了。他是属猪的,比我大6岁。

我们养了三个女儿、三个儿子。小儿子出车祸,19岁就死了。大儿子户口迁到泗洪,在那边成家了,抬了个下岗媳妇。二儿子叫高树录,生了一男一女。他儿子叫高雷,上到高中,前年吃毒疤疤(毒烧饼)死了。现在他有点呆了,说话不行,政府安排他在开发区上班,给工人买菜。他老婆原来在塑料厂上班,高雷一死,她急得两只膀子不能动,现在还没有上班。我大儿子的儿子苏州大学毕业,现在每月挣一千来元钱。

31. 李发英口述

李发英,女,1914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作厂牛牧岗1号

调查时间:2004年6月9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91岁了,属老虎的。娘家就在牛牧岗后头,李金宝、李双宝是我的侄子。丈夫叫计怀远,属鸡的,活到93岁,三年前才去世。

跑反时,老公公、老婆婆躲在家里没跑,我和老头子带着我大儿子,三个人一起跑,还牵着一头大牛。大儿子生下来才三个月,我抱着他跑,先躲在大赤燕,后来又跑到孟塘,看到了许多死人,把我吓死了。后来跑到黄村。在黄村那里,那条大牛被圩里的人牵走了,也不知道是谁牵走的。后来又跑到了宝华山的东葛墟,晚上躲在老百姓家里,白天上山躲一躲。鬼子骑马来,我们老远就瞟见了。孩子要是哭,我就把他放得远远地看

着。我们白天躲在山上,夜里进村找点吃的。后来没有吃的了,老头子夜里回家弄点稻,回去用小石臼舂舂。我老头子被鬼子逮住了好几次,鬼子没打他,叫他送东西,送到汤山街上。他没有开条子就往回走,到了孟塘就被鬼子拦住了。他就回到街上开了张条子,给鬼子看看,就让走了。

鬼子在东葛墟逮大姑娘,看到就逮,不给睡觉就杀,吓死了。大姑娘不能给人看到。

到了第二年三月里,鬼子不打人骂人了,我们才回来。回到家里就种田,家里没牛了,就花钱买了一条。当时牛牧岗没几户人家,村里人没有被鬼子打死过,房子也没烧。我家老奶奶没跑反,留在家里看门,小草房没烧。那时候家家都住草房,哪有瓦房、楼房,现在家家都住楼房。我养了六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在作厂中学当老师。我现在同老四一起过,六个媳妇待我都很好。你说有福气啊?是有福气。

32. 言志春口述

言志春,男,1922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作厂言家村148号

调查时间:2004年6月11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3岁,属狗的。1937年,16岁,进炮校修械所当学徒。1937年11月20日左右,随炮校撤退,最后到达贵州都匀,继续在炮校修械所修理军械和炮队镜等。当时技师分六级,我后来达到了一级技师,是级别最高的。

日本鬼子在作厂烧杀抢掠的事我没有亲眼见到。听我母亲讲,我家有两间半草房全被烧掉了,瓦房没烧。跑反开始后不久,年轻人都逃走了,有些年纪大的人没走,留在家里了。有一天,几个老人从别处弄来一只羊,大家聚在一起在我家烧羊肉吃,被鬼子发现了,打死了好几个。言智友的外婆在灶间烧火,听到枪响就摔在地上装死,没有被打死。日本人接着就点火烧房子,点着后就走了。

那天被鬼子打死的老人有好几个：一个是我父亲的奶奶，还有一个是沈桂英的祖父，外号叫沈大裙子，他的墓就在村边，此外，还有姓文的“吉奶奶”和言学明母子俩。言学明是瞎子，眼睛看不见的。我记得的就这五个人，都是听我母亲讲的。当时的情况是言智友的外婆亲眼所见，由她传出来的。

鬼子放火烧房，那场大火烧得很厉害。我家墙上的青砖都烧成红砖了，拆下来一敲，都酥了，派不上用处。离我家不远的言智杭家，炮校筹建盖房时有工程队住过很长一段时间，屋里留下一些图纸，日本人看到后就点火把房子烧掉了。

大概是1939年，言家村二队言道华的老婆（姓高）在田里割稻，炮校的鬼子从外面扫荡回来，见到她就一枪打死了。二队的王文泉知道当时的情况，他70多岁了，你可以去问问他，他就住在沈桂英隔壁。

在西营房门口，有一架日本飞机被打下来，烧掉了，我亲自跑去看。当时西营房住的是国民党的炮一旅，旅长史文桂，合肥人，这个人后来当过炮校校长的。日本飞机的飞行员是否被打死，这个不大清楚。

33. 高德明口述

高德明，男，1919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作厂言家村

调查时间：2004年6月11日、8月19日

调查人：费仲兴、白育芳

我今年86岁，属羊的，跑反时19岁。鬼子打来前个把礼拜，我和大哥就先把父母、大嫂、弟弟几个人送到了南圩的秦家边，然后回来。后来日本人打到句容了，黄梅桥也炸了，我和大哥两人趁天黑也跑了。到戴家边前面的洪巷，天刚亮，碰到了鬼子。两个军官，骑着马，沿着小巷由东往西走，我们走另一条小巷从北往南，在十字路口，鬼子的马快碰到我的头了。我们走我们的，鬼子军官他们走他们的，没有打我们。到了秦家边，我们找到了父母亲，在那里住了两个多月。没有吃的了，就花钱买点米，每天只吃两顿。听到鬼子来了就跑，出去躲一躲。安民后，回到作

厂,家里的楼房全都烧掉了。那楼房全是用的木料,不容易盖的。

那时候,炮校里没有住鬼子,就兵工厂有鬼子。兵工厂就是“大楼”。作厂有两个人被鬼子抓去做饭,一个叫高继顺,一个叫高德康,都是大高村的。他们讲“大楼”里没有柴了,叫我们送柴去,我们就挑柴去换米,换麦片。有时一担柴只换到两三斤,有时也能多换一点。这样送了一个多月,后来就不送了。当时,“大楼”里鬼子人数不多。

后来,新四军派人到作厂来,招我去茅山当兵,他们说年纪轻,这一带的路又熟悉。我胆小,没去。新四军的一个指导员和一位副连长到作厂来买枪,说一支枪五元钱。那时候,五元钱能买一担米,做三天工才给一元钱。我就跑到大赤燕找人,对他们说,有人要买枪,五元一支。方冲那里刚打过一仗,一个师的人在那里全打死了。鬼子在山头上,一共只有三个人,用机枪向下面扫。日本飞机不停地炸,中央军丢下的枪多哩。后来



高德明(左)

大赤燕那里就有人去摸枪,摸到了就拿到作厂来。有一次,新四军一下就买了七支“中正-4”,那是广东造的,枪比较短,是为纪念蒋介石50大寿而造的。一次扛七支枪扛不动,就叫我送。送到作厂村外,送一支给一元钱。据我所知,新四军在这边买的枪有四五十支。

跑反过了两三年,新四军派了两个便衣来找我,要我带路,夜里去陶庐摸情况。我们从陶庐后面上了山,站在山上往下看,陶庐里一点动静也没有。一个便衣就往陶庐里甩了一个手榴弹,“轰”地一声炸了。等了半个来小时,陶庐里还是没有动静,我们就走了。

到了农历八月十五夜里,新四军来了一个连,一百几十号人,围攻陶庐。枪响了好长时间。天亮了,鬼子追出来,可新四军的人早跑了。那次围攻陶庐,新四军的一个小兵打伤了,连长让他骑马,驮到万安,再雇人抬担架,把他送走,连长自己骑马走了。这一仗是听别人说的,新四军是否冲进了陶庐,打死了多少鬼子,我都不清楚。

陶庐里的鬼子追到句容就回来了,路过作厂。当时,言志朋(50来岁)和我的堂姐(22岁左右,乳名“小丫头”,已出嫁,丈夫叫言道华)正在田里割稻。看到鬼子来了,言志朋拿了镰刀就走,我堂姐也跟着跑。鬼子朝他们开了两枪,把他们两个都打死了。我们听到枪响,也跑了。

跑反时,作厂被鬼子打死的人多了。那年冬月,鬼子把老百姓的羊赶到陶庐里养,后来有的羊跑了,就到处找。有两个鬼子跑到言家村,看到几张羊皮挂在外边,几个老头、老太正在吃羊肉,就开枪把他们打死了。那次一共打死六个人:

高朝坤,60多岁,言家村人;

沈大裙,60多岁,从外地来言家村落户的;

言学明,60多岁,瞎子;

言学明的母亲“四奶奶”;

吉奶奶,没有后代;

三奶奶,没有后代。

当时有个老头叫胡成求,他逃掉了,没被鬼子打死。鬼子杀人的事都是他告诉我的。

跑反期间,作厂言家村的沈宝坠和舅大爷言智社两个在回村的路上被鬼子打死了。

跑反时,有一天,青林刘岗头的几个老百姓坐在屋里烤火,来了几个鬼子。老百姓喊:“太君,烤火,烤火!”鬼子就坐下来烤火,一支枪搁在墙边。刘岗头的刘之银把这支枪拿走了,鬼子回头一看,枪不见了,就赶回汤山报告。当官的问他在哪个村上丢的,他把刘岗头说成了“西岗头”,于是鬼子派兵到西岗头杀人。这件事是正月里发生的,我听别人传的。西岗头被杀死的人多哩,附近许多人都知道。

安民以后过了一段时间,炮校里住了两支日本人的部队。东大门那

里住的是“荣第 9437 部队”，门口有牌子挂的，为首的军官叫西田，日本人讲“尼拉塔”，他管牛，到句容拖煤炭。北大门那里是“荣第 9436 部队”，为首的军官是个武官，叫中山大尉，日本人叫“拉格雅马”，负责安全工作。新四军常来捣蛋的，如烧桥，在公路上投手榴弹。

(2004 年 8 月 19 日下午补充)那几个老人被杀的事是冬月里发生的，下午，哪一天不晓得。胡成求是五队的，他会吹，会说老八股，哪个朝代的事都懂，我们都喊他“老八台”。跑反回来后，他给我讲鬼子杀人的事。我就问他：“老八台，你那次怎么没有打死呀？”他说：“那天羊肉都烧好了，我回家去望望的，听到枪响，就没敢出来。”这些老人是在言志春家吃羊肉，因为他家大门朝南，能晒到太阳。言学明是言志春的大大，瞎子，当时 60 来岁，他家大门朝北，冬天冷得吃不消。烧羊肉、吃羊肉都在言志春家。言学明的母亲叫四奶奶，当时已有 80 来岁。吉奶奶的丈夫是青林大队的，后来死了，她就跟了作厂一个姓文的外姓人。这个人会买牛、买马，许多人家买牛、买马都找他。姓文的人没有后代。胡成求有个儿子，现在已去世了，有个孙子叫胡德根，50 多岁，是个农民，五队的。瞎奶奶，没听说有这个人，可能是传错了。高朝坤，言家村四队的，当时有 70 多岁了，他的六个儿子都去世了，有个孙子叫高继全，还有一个叫高继如，当过作厂的书记，现在大约 50 岁。沈荣强当时六七十岁。

作厂五大姓：高、唐、言、胡、陈。姓高的是高俅的后代。高俅带了一帮人到了句容戴村北面的石头山，以后分过来一支到了作厂。

高继财，被杀时 70 来岁。

郭来喜是言学六带过来的一个儿子。跑反初期，村上人都跑了，他没有跑。小店里有东西，没人管了，他就去拿，他穿着中央军的军装，鬼子看到后一枪就把他打死了。

高树民的伯父叫高永福。高树民的父亲没上过学，没有大名，只有小名，叫高三狗。

唐良荣，宕子村人，在常备队开会，有人报告鬼子，就把他抓起来了。邹良德可能是丁墅的。那次一共抓了四个人，有两个人放回来了，唐良荣和邹良德没有放回来，后来，常备队投降了日本人，加入了绥靖队。

土桥的魏怀良、龙潭的于老五、黄梅的鲍春来、汤山的金大贵、东葛

墟的廖仲琪,当时都是出名的。魏和廖没有跟日本人,是独立的。廖仲琪一字不识,当时有人说“一字不识当团长,大学生晒太阳”。大学生没事干,只能晒太阳。解放后廖仲琪在作厂被枪毙了。

跑反期间,在回家取粮时,我到言志春家看过,五个老人死在那里,尸体都能分清的。言学明脸朝上,沈大裙头朝下趴着。高朝坤的儿子在安民后用一扇大门把高朝坤抬出去埋了,埋的时候我也去的。言志春家的三奶奶(言智友的外婆)在灶间忙着烧火,听到枪响就吓倒在灶膛跟前了,一捆柴倒下来,盖在她身上,就活了下来。

中秋节割稻是跑反过后两三年的事。水稻田是言道华家的。第一天在村西割,我也去了,当天听说打了陶庐,第二天改在东头,割一块小田,我就没去。言智朋去帮忙了。作厂庙里没有俘虏。偷木牌子的人是开根,仙涧桥人,姓什么不知道。

34. 方兰英口述

方兰英,女,1929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作厂陈达村44号

调查时间:2004年6月13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79岁,属蛇的,娘家在青林窑湾。跑反时9岁,家中有父母,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一开始躲在窑湾的山上(南凹),后来跑到了句容西谢的亲戚家里,鬼子没有到西谢去,我们一直在那里,安民后才回家的。

日本鬼子打过来之前,我哥方载和参加了壮丁队,训练蛮辛苦的,但没有枪。当时他19岁左右的样子,已经结婚了。鬼子一来,壮丁队就解散了。他躲在我家后面的山上,只有丈把远。鬼子从山上下来,看到了他,就用刺刀刺,一刀从左颊刺进去,从右颊刺出来,没有死。鬼子又补了一枪,当场就死了。我奶奶坐在门口,鬼子没打,家里有一只黄狗汪汪地叫,鬼子也没打。

我哥哥被打死之后,嫂嫂就改嫁了。

跑反时，窑湾死的人可多了。许多小孩哭，被大人甩在塘里淹死了。有的老头、老太跳到塘里自杀了，还有的老头、老太没有吃的，饿死了。

35. 言克俭口述

言克俭，男，1921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作厂陈达村七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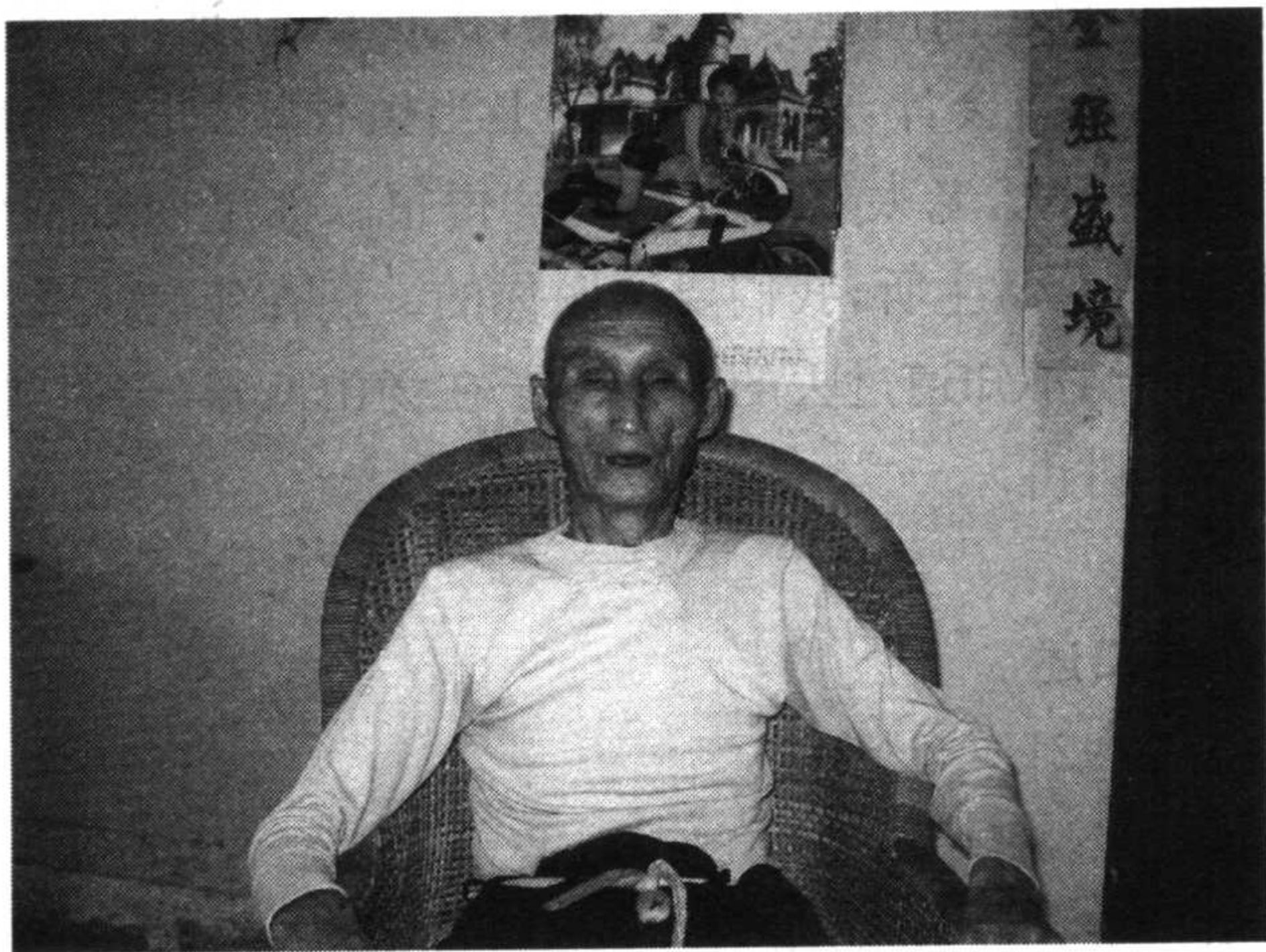
调查时间：2004年6月13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4岁，属鸡的，跑反时17岁，跟父母跑到了江北的刘家圩，安民后才回来。回来时，在孟塘那里看到了许许多多的死人，平板桥的桥上挂着死人，头歪歪的。马路上、田沟里到处是死人，不是一个两个，东一堆西一堆的，看都不敢看，心里吓得很。

鬼子在陈达村没有打死人，当时村上的人全跑了。跑反时在外头被打死的有好几个。

言克银，老婆是湖山人，他跑反到湖山，被天上的飞子子（流弹）打死了。



言克俭

言义深,我的家门叔叔,当时三四十岁。他给中央军带路,带到了尧化门,被鬼子打死了,尸体没找到。他的老婆回娘家了,他没有后代。

还有一个人,三四十岁,在淳化镇被鬼子打死了,没找到尸体。这个人的名字想不起来了。姓啥?也想不起来。陈达村就有姓言的、姓徐的和姓戴的。在塘泽,有个小孩会走路了,还是被甩在水塘里淹死了。小孩说:“我会走路的,我会走路的。”有啥用?还是甩了。那个水塘就在塘泽后头,叫“半亩塘”,就在那里,有许多树的地方(用手指了一回)。在大赤燕,一个女的被打死了,她的小孩还趴在身上吃奶。旁人看看可怜,把小孩抱走了。在孤山堰那里,鬼子一次打死了七个人。这些事,你问他们年轻人,他们哪能知道?我现在也糊涂了,讲了前头,忘了后头。20年前,脑子里记得可清楚了。

陈达村的房子,没烧的是少数。我家的房子没烧掉,跑反回来还有地方住。言仁裕、言仁泉、言仁发他们兄弟四个的楼房被日本人点火烧掉了,什么都没剩下。跑反过后,安民了,鬼子还常常进村来找花姑娘。

鬼子抓老百姓到新民村种菜,谁不去就拳打脚踢,打巴掌。干一天活,有时给点东西,有时什么也不给。我到炮校挑过粪,是人粪。马粪是用独轮车拖的。

言家村四队的唐凤英,今年84岁,是宕子村人,现在开个小店的。她吃的苦多,你可以去问问她。她身体好,比我好,讲话清清楚楚的。

我儿子在省里当会计,小儿子在镇上当镇长,二儿子在家里干活。我和老伴自己烧来吃,老太婆一天到晚忙得很。你星期天不休息,来听跑反的事,回去讲给学生听,我们要谢谢你的。现在年轻人生活好,托共产党的福呀。他们不知道过去的苦。鬼子在汤山八年,老百姓吃了多少苦!是要给学生讲讲。

36. 唐凤英口述

唐凤英,女,1921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作厂言家村101号

调查时间:2004年6月16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84 岁,15 岁时没有妈,17 岁时没有爸。我爷爷是江北逃荒过来的,靠卖烧饼油条落脚,养了四个儿子。我父亲叫唐贤福,是老三。我在 1957 年 7 月入党,1958 年当大队妇女主任,1963 年左右下来,到公社黄沙厂当排长,工厂在孟塘葛巷的扒灰庙那里,我们就住在庙里。那个庙不大,只有六七间房子。在那里干了三年,又转到作厂搞砖瓦厂,也当个小头头。现在开了一个小店,生意不多,图个热闹。我们当党员的,镇上每月给 60 元,逢年过节还发点东西。今年大队组织全体党员到杭州玩,我们刚回来,大家玩得挺高兴。党员交党费,数量没有规定,有的交 2 元,有的交 5 元。

跑反时我 16 岁,冬月初几跑出去,我和三个弟弟、一个妹妹,还有我父亲,五个人跑到了汤山李家庄。父亲想到葛巷去打听消息,翻山过去时,日本人和中央军在山上打起来了,他躲在石缝里,膀子上中了一枪,鲜血直流,后来爬回了李家庄。父亲当时 42 岁,身材魁梧,本来很有力气,受伤后没劲了,行李也扛不动。那时天上下着雪。我们躲在山上,扒开雪,挖点野菜吃吃。天上有一个像箱子一样的东西,晃啊晃的。^① 鬼子下山来,见我父亲膀子上有伤,就问是不是支那军。父亲说:“我是难民,不是当兵的。”鬼子就走了。后来,我们就翻过汤山,逃到老虎洞那里,在附近挖了个洞。当时,许多人都躲在洞里,都是临时挖的。不久,听到有人喊:“鬼子跑了,你们出来吧!”那人说话有鬼子腔,不像是中国人,我们没出来。有的人听到这么一喊,从洞里跑出来,结果,许多姑娘被鬼子抓走了。我亲眼看到四个女的被鬼子拖走了,有结过婚的,也有没结婚的,大白天被拖走了,过了一阵又放回来。这四个女的原来躲的地方离我们不远。后来,鬼子在老虎洞一带开始抄山,有个鬼子一脚跨进了我们的洞口,我都看到了他的皮鞋了,吓得直抖,他要再往前跨一步就会发现这个洞口,我们就没命了,但那个鬼子走了。大家在洞里你挤我,我挤你,吓得不得了。过了些时候,鬼子在老虎洞下面的大场上抓了七个男人,都是三四十岁,用机关枪扫,把六个人扫死了。我父亲没打死,鬼子叫他把死人装在攒稻的木筒里。后来,父亲就带了我们逃到东葛壩,那里也

① 实际上是日本人放的飞艇。

不安全,又连夜逃到北圩。有个大凹的人,姓韩,同我父亲讲,要把我卖到北圩,当时我并不知道。我舅舅和表姐都在北圩,他们划了小船接我们过去。表姐给我说:“他们把你给北圩了。”我一听,一把拉住父亲的衣服说:“我不在这边,死也要跟你们死在一起。”我表姐也说:“姑爷,你把表妹丢在这里,我娘娘在阴曹地府里也不服。”舅舅也说:“姐夫,你怎么会想起这个念头,一担二斗米就把女儿卖在这里啦?你先不要烦,拿两袋米去,吃了再说。”夜里,我们翻过宝华山,到了东葛墟东面的一个庙里,一家人住在里面。别人看我们拖儿带女的,都不敢靠近我们。

后来,二弟到炮校问鬼子讨饭,讨到了一点麦片饭,那饭硬硬的,里面还有牛肉。我父亲吃了膀子就发炎,开始肿起来。那时,我伯父留在作厂看家,我二弟就把这事告诉他。后来肿得更厉害了,就找了好几个人,在夜里将父亲抬回作厂,一夜没睡,又把我们几个孩子送到了南圩。从东葛墟到作厂,走的是山路。在刘岗头北社子庙(门前有棵大白果树)那里,看到了许多死人,我们是从死人身上爬过来的。小弟弟才4岁,父亲叫我把小弟弟摔了,我没摔。到了南圩,我伯母又要我把小弟弟送人,说:“舍不得也不行,要吃要喝的,谁养得活呢?你哭啥?兄弟姐妹好几个呢。”我就把小弟弟送给别人了。第二天,那个人又把小弟弟送回来了,说:“他见了陌生人老哭,不行。”

二弟从南圩回作厂打听父亲的病情,再到南圩告诉我们。父亲的病一天天重起来,好几次都说不行了。二弟来回地跑,脚上的鞋子全磨烂了。过了几天,父亲真的不行了,死了。家里什么也没有。六间房子全烧光了,大门也烧糊了。后来把两扇大门卸下来,把父亲抬到万安的酱油坝,同母亲葬在一起了。一路上,谁也不敢哭。后来,他们又要拿我送人家,我说什么也不同意。当时我17岁,还没有婆家,有人就来抢亲。我嫂子骗他们说:“她已经订婚了,你们都走吧!”才没有被抢走。

后来安民了,回到了家里。没住的地方,就去拆炮校的房子,搞到一点木料,搭了间小屋住了下来。没料到,小弟弟的眼睛又瞎了,不久就死掉了。

我从小就没有父母,那苦日子真是没法说。后来二弟跑到上海跟了姑妈当学徒,三弟跟人家放牛,15岁便跟人家学木匠。18岁那年我出嫁

了,几个弟弟长大后,娶亲盖房的烦心事全是我忙的。

跑反时,我们宕子村的唐道年留在家里没跑,被鬼子烧死了。他是我爷爷辈的,我喊他爷爷。听人家讲,他烧得只剩下一根桩桩了,认不出来了。

安民后,割稻子时,鬼子追着把言家村的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打死了,我听到枪声吓得逃到西梅,躲在黄豆地里。

安民后,鬼子还常常到村上来抢花姑娘。有一天,一个鬼子带着翻译跑到我家,问我老公公要东西,听不懂就骂:“八格牙路!”拔出刺刀,朝我老公公刺,他一闪,刺刀就扎在桌子上,老公公没有被刺着。那张桌子上留下了一个洞,前几年还在的。

37. 秦进兰口述

秦进兰,女,1935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作厂陈达村48号

调查时间:2004年6月29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70岁,属猪的,娘家在孟塘葛巷。跑反时,我才3岁。听上人讲,是父亲挑着箩筐带我去北圩的。我父亲叫秦汉英,当时30来岁,我姐姐10岁,一个哥哥8岁,还有一个哥哥5岁。后来,我父亲在马山口遇到了鬼子,有16个年轻人,都跪下来了,鬼子开枪,全打死了。尸体是在桦墅那里找到的。父亲被打死后,我母亲带了我们到处要饭。

38. 王文泉口述

王文泉,男,1935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作厂言家村

调查时间:2004年7月2日、15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76岁,跑反时9岁。我只上到小学五年级,解放后当过大队

会计。我哥上到大学毕业的,是汪精卫办的金陵临时大学,学农的,会讲日语和英语。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我也因此受牵连,1959年就不当会计了。现在,我在作厂大队老年活动中心当会员,下午有空就过去聊天。

我祖父是句容大卓匡家边人。他6岁时父母双亡,一个妹妹才4岁,后来由他舅父带大。他13岁开始学篾匠。因手艺好,他又带了许多徒弟。后来,他在作厂言家村落户了。我父亲叫王家寅,是在言家村生的,他后来也学篾匠。跑反时,他大约35岁。

跑反时,我们跑到了土桥张村。那里姓许的人多,言道宏的婆婆家就在张村,我们村好多人都跑到那里去了,言道宏、言道金、言至良、言至珍、言至祥、言至光、言至义、言至锡、言至立,有十多家呢。我祖父祖母一开始留在家里没跑,后来看到日本鬼子太厉害了,家里的房子也烧光了,他们就跑到了江北的瓜洲。

我们在张村住了三天,言至光的老婆就生孩子了。人家很不高兴,叫我们走。我们就经石狮、赤岗,跑到了黄梅桥的巫墅。在赤岗穿越公路(京杭国道)时,看到马路上全是鬼子的军火汽车,一辆接一辆的,都架着机枪。我们趁汽车脱档的时候赶快跑,才算过了公路。过了公路,到了亥家边,看到池塘边全是死人,像麻袋一样堆在那里。言至光的小孩生下来才三天,老是哭,就被大人丢在那水塘边上了。这个小孩没冻死,被人捡走了。有一年,他还跑到黄梅桥丁家边,找他的亲哥哥言道珍。言道珍当过三青团的小队长,解放后被划为反革命。他对自己的亲弟弟说:“你不要来认了,一认就把你牵连进去。”

我们在巫墅住在人家的祠堂里。住了没多久,言道华的老婆也生小孩了,人家就撵她们走。言道华和言至立回村取粮,看到自己家的房子烧掉了,稻谷和大米都烧糊了,岳父又在青林沿城被鬼子打死了,回到巫墅一说,他老婆一急,就死在巫墅了。当时,他们把那个小孩活生生地放进了棺材,同大人一起埋了。

巫墅不给住了,我们又找地方。腊月二十四,我们跑到了大卓的匡家边,在那里过了年,到农历二月里才回到作厂。回来一看,村上大部分房子都被鬼子烧掉了。田边的菜长得这么大,周围都是荒草,路都走不

通了。

言道华的老婆去世后,他又找了个老婆,姓高,是高老五(高继功)的女儿,有一只眼睛看不清的,我们都喊她“大丫头”。她的名字不知道。那时候,妇女都没有名字。解放后土改了,妇女才起名字。

1938年9月8日(农历八月十五),言志朋请了许多人帮他割稻。他家田亩多,炮营这边有好几亩,言家村西边也有十来亩。他们怕扎稻时遇到鬼子,一边扎,一边望着汤山方向,看有没有鬼子来。谁知鬼子从句容方向过来,言志朋和“大丫头”被打死了。原来,八月十五夜里,新四军攻打汤山陶庐,鬼子连夜追出来,一直追到句容黄梅桥,都没找到新四军。八月十六早上八点来钟,鬼子押着一大群老百姓从黄梅桥回汤山,路过作厂,在如今炮校煤气站的小门那里看到许多人在扎稻,就开枪打人。第一枪就把言志朋打死了,第二枪又把“大丫头”打死了。其他人统统跪下来,举起了手。那稻田就在如今炮营修理所的西门那里,离公路不远。言道华的父亲言至平和母亲听到枪响,就到田里看。一看,两个人都歪在那里了。

鬼子打死了这两个人之后就押着一大群老百姓进言家村,见人就抓,我父亲也被抓走了。鬼子一共掳了五百来人,全带到汤山,在如今“水上大楼”那个地方一个一个地审问。翻译官叫桑水亲,不知是什么地方人。他问我父亲:“新四军到哪里去啦?”我父亲就胡编,说:“我半夜里睡在家里,听到外面有人跑,是什么人不知道,到哪里去,也不知道。”审了一回,鬼子叫人统统向后转,脸朝着河,又架起了机枪。翻译官同日本人讲了几句,日本人拔起东洋刀,一刀把树枝砍断了。大家只听到“咔嚓”一声,以为是砍到人头了,都不敢回头看。日本人又同翻译官讲了一阵,翻译官就叫大家回家,有情况马上报告,500多个老百姓就全回家了。这段经历是我父亲回家后对我们讲的。

还有一次,我父亲差一点点就被鬼子打死了。那是跑反过后,有人说我父亲偷了人家的东西,汤山的二鬼子就把他抓进了警察局。一个鬼子喝醉了酒,端着刺刀对准我父亲。他往前一步,我父亲就退一步。幸亏我祖父及时找到了唐大先生(唐庆升,字云阶,汤山人),派汤山小学校长唐启文赶到了警察局。唐启文会讲几句日语,他同鬼子说了几句话,

鬼子就把我父亲放了。要是他晚去三分钟,我父亲就没命了。

唐大先生在江(宁)句(容)两县南圩北圩的名声很高。他不贪财,不愿做官,一心帮助乡邻解决纠纷,调解矛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帮了不少大忙。金大贵、鲍世元、廖仲祺都是二鬼子,给日本人办事的,专门敲诈老百姓。金大贵的自卫团在汤山,管汤山、上峰一片。鲍世元的团部在黄梅桥的桥头,管黄梅桥一片,老百姓牵一头毛驴过桥也得给钱。廖仲祺原来是在青林看山的,一字不识,后来搞到了几支枪,就自立一个自卫团,管青林、宝华山、胄王村,收了许多徒弟,到处敲诈勒索。汪精卫的部队叫“和平救国军”,旗子上有国民党的青天白日,上面还有一个黄颜色的三角形,三角形里面写着“和平救国军”几个字。汪精卫的队伍比二鬼子多得多了。

1943年7月中旬,秧快插完了。有天上午,我们刚吃饭,忽然听得“轰”的一声巨响,我以为是谁家的墙倒了,就出去望望。只见街上的人都往东边跑,我也跑去看。原来,一架日本飞机从句容飞过来,失事了,一头栽在言家村东边,烧得很厉害,火光冲天。紧挨着的几家人都抢着搬东西,怕大火烧着自家房子。三个乘务员出不来,“哇啦哇啦”地叫,最后都烧死了。烧了一会,飞机上的机枪子弹又炸响了。

日本飞行员烧死后就埋在附近,坟上插一块木牌,写着他们的名字。炮校里的日本人到了坟前都要下马敬礼。过了一年,那块木牌被偷走了。中山大尉找伪保长,通知村民,一定要抓住小偷。后来没抓到小偷,就贴出告示说,三天之内不交出木牌,就把全村人统统杀光,房子统统烧光。第三天早上,有个叫“三麻子”的小偷偷了言智春家的两只鸡,在如今作厂邮局那个地方被抓住了。那年我15岁,我就赶紧报告。替日本人办事的高从松跟中山大尉说了,准备把小偷送到汤山宪兵队。日本人的宪兵队就在如今蒋介石温泉别墅那里,言家村有个妇女在那里给日本人做饭。刚准备送小偷,还没出门,日本人就进村了,村子周围架起了机枪,小桥那里有一挺,东头开发区那里也有一挺。街巷里都是日本兵,老百姓只准进不准出。日本人的确准备血洗言家村了。这时候,炮校的日本人把小偷带走了,部队也就撤了。

那小偷是万安的。万安还有两个小偷,也抓起来了,都带到宪兵队

审问。但这三个人都没有偷木牌。后来,大家就怀疑是箍桶匠偷的,就把中新(大队)的箍桶匠袁春桃抓去了。袁春桃说他没偷,但有人向他借过刨子和锯子,这个人叫开根,抽鸦片烟的。日本人把开根逮住一审,他就承认了,说没钱买鸦片,就偷了木牌,借刨子把字刨掉,锯成几段,准备拿出去卖几个钱。日本人审清之后,认为开根是初犯,第一次偷东西,情有可原,把他放了,而那三个偷鸡的是惯偷,要处死。后来,就在如今 83 医院 5 病区那个地方,让这三个人挖坑,自己埋自己。埋的那天,许多人都去看,土埋到胸口,他们就喘不过气来了。

那架日本飞机,头大得很,有这么粗(直径约 1.5 米)。中山大尉专门修了一条路,叫老百姓用绳索把它拉到炮校。飞机在田里撞出一个大窟窿,碎片都是铝的、铜的,老百姓都去拣。这件事叫高麻子看到了。高麻子原先是新四军的地下工作者,后来叛变了。日本人成立了一个“爱民党”,找些人给他们办事。高麻子带了个老婆,是言家村的,天天在炮校门口转来转去。他常常带了日本人到句容北山水库那地方去搜新四军。高麻子看到老百姓拣到了铝、铜、铅等金属,就去告诉日本人,日本人就到作厂挨家挨户地收。后来,高麻子被新四军逮住了,新四军当着他老婆的面,一刀把他杀死了。

日本人经常在炮校附近农村里搞演习。演习时,头上缠一条白布,就算是国民党的中央军。日本人在炮校时,里头也是炮兵。每次打炮,都用绳索拉。大炮架在图书馆那里,朝孟墓、插花那边打,我们都去看过。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投降的场面我们也看到的。那天,在炮校大操场上,几千个日本兵站着,听收音机里讲话。那架收音机非常大,就在北操场西头台坡那里,搁在一张桌子上。收音机里哇啦哇啦地讲了半个个时,几千个人全部弯着腰、低下了头。下午四点,门口站岗的人没枪了,他们的枪全部入库了。我们站在村前高处,看得清清楚楚,当时还不知道是小日本投降了。后来,新六军的部队由美国飞机空运到南京,然后从南京步行到炮校。下午两三点钟,汤山响起了欢迎新六军的鞭炮声,作厂人也在京杭国道上夹道欢迎。新六军的士兵个头都很高,一个个穿着美式青年服,大皮鞋,背一个方包,有这么宽(约 40 厘米),这么长

(约 50 厘米),走起路来卡卡卡响,非常整齐。走在前面的队伍持卡宾枪,后面的全是冲锋枪。当时我们还不知道那种枪叫冲锋枪。进炮校大门时,三个站岗的日本人弯腰鞠躬,新六军立即派三个人站岗,门口一共有六个人站岗,日本人管日本人,手里没有武器,中国人管中国,手里有武器。

炮学校里现在车队往南一点,炮场那里,小河以西,原来是炮校的跑马厅。日本人经常在那里烧伤兵和阵亡士兵。那味道特别难闻,我们吃饭都咽不下了。每次烧伤兵,总能听到他们哇啦哇啦的叫喊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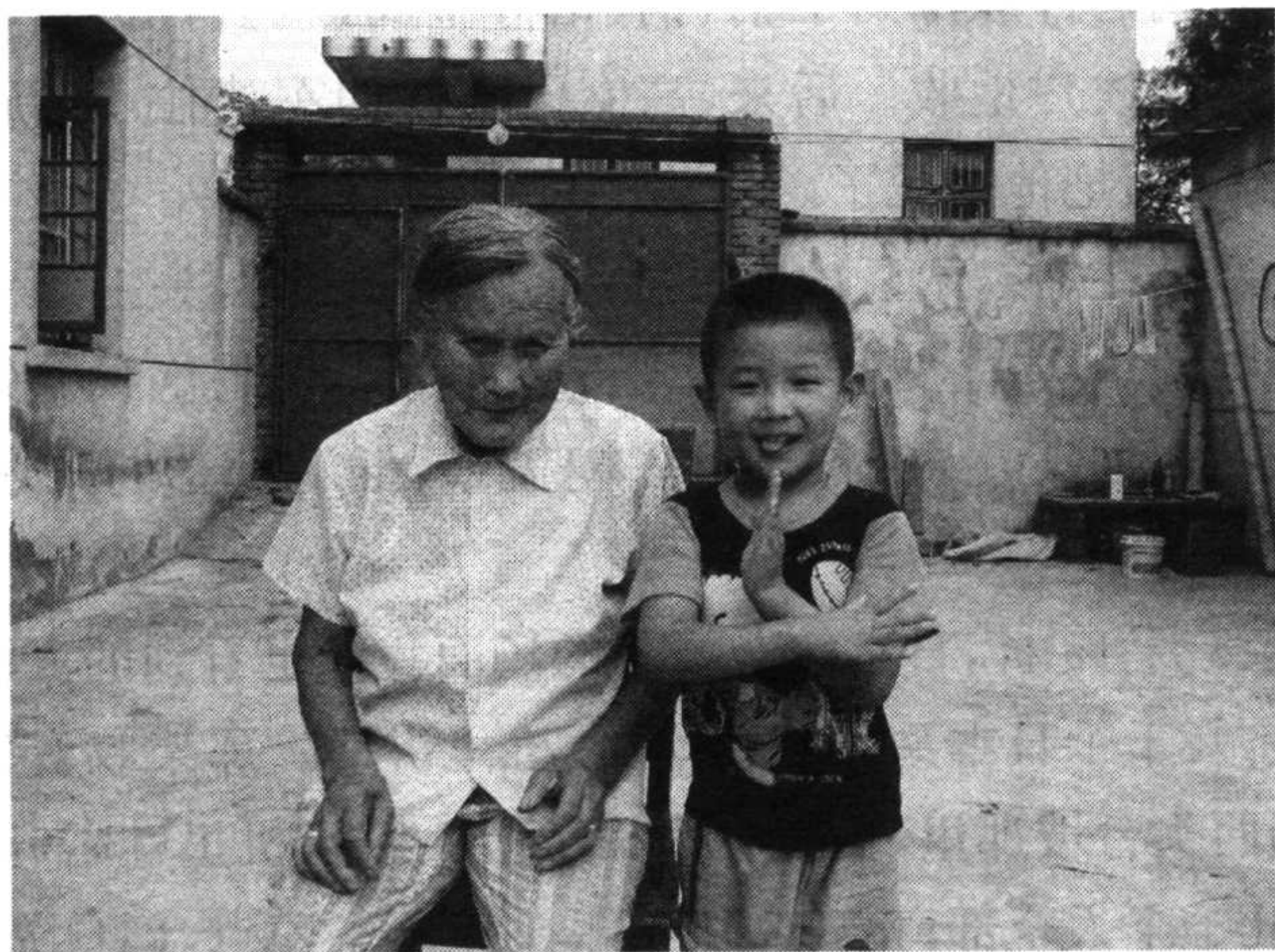
39. 邹万云口述

邹万云,女,1916 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作厂宕子村 7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8 月 19 日

调查人:费仲兴



邹万云(左)

我今年 89 岁,属龙的。娘家在江宁上峰高庄下桑干。跑反时,我们去的地方多了:高庄、南圩、下埠、蔡家墩、句容的西窑上,还到过湖熟。在西窑上,我们住在四根子家。鬼子来放火,我们躲在楼上稻仓里,上面压着几块大木板。楼下都烧着了,我们十来个人把那几块木板拱开,我

用围裙把头包起来,头发才没有烧焦。我们先把小孩从楼上摔下去,接着大人一个个地往下跳。还算好,大人、小孩都没摔死。

我老头子(丈夫)叫唐良华。他兄弟三个,老大叫唐良荣,老三叫唐良贵。唐良荣原来是作厂小学的校长,为人马虎(指不计较什么)、老实,大家都喊他“唐老好”。跑反结束后,安民了,他和几个人搞地下工作,抗日的。那年春节(1939年2月),上峰周家边的金大贵娶媳妇,喊他去喝酒。他和言仁福、塘泽的李兆远、丁墅的邹良德一起去的。后来,有人告密,鬼子就在周家边把他们几个人抓去了。唐良荣口紧,什么也没说,鬼子就没有放他回来,估计是把他杀了。我老头子到处去找,南京城里也去,句容也去,都没找到。有一次在句容的朱家山,遇到了一队鬼子,他躲在桥洞底下,才没有抓住。我家没有上人,出了大事都是我老头子去跑。出去办事要花钱,他就把耕牛、稻谷都卖了,到处访人、请人。汤山的唐大肚子(唐云阶)是个好人,他抽大烟的,老头子就买大烟送给他,请他来我家。就这样,人托人,忙得一塌糊涂,在外面忙了好几个月。良贵还小,什么事都是我老头子一个人办。我一个人在家里只会哭,又不识字,又不认得路。我第一个小孩是虎年(1938年)生的,生下来才三个月,抽筋,请不到医生,后来就死了。唐良荣有个儿子,跑反时在外面生病,找不到医生,就死了。唐良荣老婆是大高村的,后来走了,他家就没有后代了。

跑反时宕子村被鬼子打死的人多呢,好多人都记不得了。唐良根的奶奶,60多岁,跑反时躲在朱砂洞里,夜里回家看她老头子(她老头不能跑,留在家里了),被鬼子看到后开枪打死。唐和金的爷爷唐道德,60来岁,跑反时回家拿东西,碰到了鬼子,被鬼子开枪打死。唐秋生的爷爷是个哑巴,40来岁,跑反时在家里被鬼子看到,开枪打死。哑巴的弟弟叫唐贤子,哑巴自己叫什么,我不知道,大家都喊他“哑巴”。唐道年,当时也是40岁左右。他身子瘫了,不能走路。家里人给他做了一桶饭,放在他身边,一个个逃走了。他在家里,那桶饭还没吃完,鬼子来了,把他打死了。他有个儿子,去年才去世,活到84岁。

还有一个唐贤松,是老师。跑反时,鬼子看他手臂上种了牛痘,就说他是支那兵,把他拉到村前的小山上,准备开枪了。四五个老太太跪下

来求。有一个说：“他是我儿子，他是我儿子。”鬼子就把他放了。

我有一个家门太太，我父亲的奶奶那一辈的，年纪很大了，她没有包小脚，能跑。鬼子到她家，要她烧开水，还用刺刀对着她，用手电照她。她烧了一会就去搬柴，趁鬼子手电不照的时候就拼命跑，一直跑到小山凹里，趴在沟里躲着。那时候天快黑了，附近树又多，草又高，鬼子没敢追。后来，她给我们说，那天真是吓死了。

上峰我娘家有个家门婶婶，姓什么不知道，原来跟了男人在上海、苏州一带做事的。男人死后，她就回男人家里了。后来，鬼子打过来了。有个鬼子头头看她长得漂亮，每天晚上去接，白天送回村，天天同她睡觉。村上的房子就没有被鬼子烧过。

40. 高立忠口述

高立忠，男，1936年生

调查地点：江宁东山镇（原住汤山镇作厂大高村42号）

调查时间：2004年11月1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是民国25年（1936年）生的，属鼠，今年69岁。7岁开始在作厂小学读书，当时那里是个庙，有五间四厢，有院子，大门朝南，庙里供观音菩萨，一边站一个童子。这个庙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才搞掉。我在作厂小学上学时，学生有两三百人，万安、建设、西梅、中新、青林的学生都有。教室不够用，一二年级一个班，三四年级一个班，五六年级一个班，轮流上课。“红房子”在小学后面，靠马路，同作厂庙是分开的，听说是国民党的一个团长盖的，你可以去问年纪大一点的人。

日本鬼子在的时候，他们的头目叫中山大尉，他可能是个医生，我只见过他一面，个子高高的，40多岁，长相不凶。他老婆不能生育，没有孩子，一个人留在家里很孤独。她在作厂小学教日语，我们都喊她“阿腊老师”，40岁不到点。她喜欢把我们几个小孩留在她家里玩，我一个，还有言智加、高继胜（外号“老巴子”）、高德保常到她家去。有一天，我们早上去，临晚了才回家，家里人找死了，不知我们到哪里去了。我们几个小孩

在“阿腊老师”家玩,在她的榻榻米床上翻跟斗,那床上铺的是软席。“红房子”里南面有楼梯,北面也有楼梯,可以住两家人。楼上有三间房子,东面是一个平台,她住在朝南的房子里。中午没有吃什么饭,她给我们吃小面包。“阿腊老师”讲中国话讲得和中国人一样好。她给别人的小孩一块面包,给我的是两块面包,还说要收我做干儿子。她还教我们唱歌。我还记得其中一句歌词是“还有麦上美”,不知道什么意思。

中山大尉有一个勤务员,叫寒九,也会讲中国话。他中等身材,长长的脸。他用大板车拖了我们几个小孩在水泥场上转来转去地玩。

我三爷小名叫高三狗,大名不晓得。他是在汤山菜场附近的一个厕所里被鬼子刺死的,人都冻僵了,还靠在门口站着。是我爷爷高永福等人把他从汤山拖回来的。

郭来喜是黄梅桥胡岗人,招女婿招到作厂来的。他在作厂老街顺着作厂小学跑,在一条小巷里被鬼子打死了。

我家的房子,前面一间被鬼子烧掉了。这里隔壁的油坊也是我家的财产。

高树荣的母亲,作厂九队的,丈夫是招来的,她知道的事情多。上峰周家边的李志耕是我表叔,快 90 岁了,当了多年的大队会计,他知道的事情多,你也可以去找他问问。

41. 庞世昌口述

庞世昌,男,1931 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寺庄徐家边 38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1 月 18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73 岁。解放前,我在汤山小学读到高小毕业,又在徐家边的慈庵中学读到初二。这所学校征用了徐家边的十亩地,我们村的人上学就不收学费。解放后,我还在汤山读过夜校。在农村里,我的文化程度算是比较高的。但由于成分高(划为地主),好事情就轮不上我了,只好一直在农村里种田。1983 年在大队铸铁厂当会计,当了半年,又让我跑

外勤，一直干到1993年。

1937年日军从上海打到南京，那时我6岁。日军在上海打仗时，就派飞机来南京轰炸，汤山炮校也是他们轰炸的目标。炮校里面的大炮都拉到徐家边，停放在村南一条林阴道上。那时候，徐家边附近合抱粗的大树多得很，还有许多乱坟岗，便于隐蔽。农历八月十五那天，我和表嫂杜桂珍一起到地里去挖山芋，准备敬月亮的。农村有个风俗，每年中秋节都要摆一桌，放上菱角、石榴、鸡头^①、山芋、藕，敬敬月亮。我们拎着篮子扛着锄头从地里回来，日本飞机就过来扫射了。炮校的两个军人跑过来把我们按倒，说：“你们不要命啦？还不卧倒？打死当兵的不要紧，打死小孩可不行啊！”后来，日本飞机扫射了一会就走了。



庞世昌(左二)

1937年农历冬月，日军打到汤山之前，许多人都跑到山上躲起来了。我父亲叫庞维义，他认为日本人和蒋介石打是争江山，与老百姓无关，以前太平天国、孙中山争江山也打仗，到朱砂洞里躲几天就没事了。所以这一次他不愿走，留在家里了。许多人都躲在洞里，有一百来号呢，男女老少都有，我母亲、我表嫂和我哥哥也躲在那里，我父亲就赶着毛驴给他们送吃的。冬月初五，鬼子进村的第一天，没有杀人，也没有烧房子，他

^① 鸡头学名叫“芡”，一种水生植物的浆果。

就以为没事了,跑到朱砂洞里说:“没关系,没关系,大家回去好了。”众人一听,纷纷出洞,下山了。谁知鬼子见了,在山头上用机枪打。村民们都慌了,滚的滚,爬的爬,到处躲。我同母异父的哥哥刘马根,小名马根子,手臂上挨了一枪。我表嫂右腿上打了一枪,子弹从小腿后面穿进去,从前面穿出来。她今年 84 岁,就住在徐家边,我等会带你去看看,伤疤至今还在呢。

我哥被鬼子打伤后没敢回家,躲在朱砂洞底下一个姓谢的老百姓家里。当时他家里躲了七八十个人,有西山头的、寺庄的,也有徐家边的。这天下午,来了三个鬼子,要大家跪在门前,挨个地检查。我哥那年 19 岁,是个箍桶匠,脸白白的,没干过农活。他留了个洋头,手臂上有枪伤,腰里又束了条皮带,还穿了一件毛线衣,日本人就以为他不是农民,是支那兵,用刺刀刺他,一连刺了五刀。他双手抓住刺刀,说:“好先生,你们用刀刺我,吃不消哎,给我补一枪吧!”鬼子就向他打了一枪,又补刺了两刀。我哥痛得直滚,三滚两滚的,就滚到坡下去了。这时,吕长福就跪在旁边,看到这模样,以为自己也没命了,吓得直发抖。鬼子过来检查,看他像个农民,就没打他。突然,旁边有一只兔子窜了出来,日本人就去追。追到坡下边,发现我哥还在动,又上去补了一枪。我哥挨了七刀两枪,就断气了。

我表嫂右腿打伤后就回到村里。我家屋后挖了个地洞,她躲在洞里养伤。地洞旁边有三个草堆。鬼子来烧草堆,其中两个离洞远一点的都烧掉了,洞口附近的一个没烧。我母亲后来把她从洞里拉出来,一边拉一边说:“你这个讨债鬼唉,差一点点就把你烧死在洞里了。”

第二天,一个鬼子端着枪闯到我家,我父亲就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连喊“好先生,好先生”。鬼子用刺刀刺他,他一手抓住刺刀,一手抓住枪头,死死抓住了不让刺。鬼子想刺又刺不成,想拔又拔不动,两个人就在家里打转转。后来,鬼子干脆松手,把枪脱手了。我父亲抓住了枪,把它放在地上,朝鬼子望望。鬼子一看,知道父亲不是当兵的,心就软了,从急救包里取出纱布,给父亲包扎手上的伤口。

经过这一番拼命的挣扎,父亲才认识到鬼子的厉害,心里害怕起来了。但他还没有想逃跑。他不愿走,留在家里了。那时我家开槽坊做

酒,养了二十来头肥猪。父亲用酒糟把猪灌醉了,圈在猪圈里,这样,猪就不叫了。后来,记得是冬月初七,鬼子又进村挨家挨户地搜,那些猪被他们发现了。鬼子把猪统统打死,强迫我父亲杀猪、剥皮,把猪肉和内脏抬到作厂下边的新民村。那个地方以前是归汤山靶场管的。同去的还有庞方传和庞维金。他们三个把东西抬到厨房里就动身回家。见公路上到处是拖炮的马队,他们就从陈达村抄小路走。走到离公路三百来米的地方,在“长二亩”的田埂上,日本鬼子就站在公路上向他们开枪了。第一枪打中了我父亲,当时就倒在田里了,手也动,脚也动。庞维金一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忙喊:“维义哥,维义哥,你怎么啦?”刚喊完,第二枪又打来了,庞维金自己也倒在田里了。第三枪打在庞方传头上,把他的帽子打飞了,但是未伤要害。他就回到日军厨房里,把情况说给翻语(翻译)听。翻语就给他一包锅巴,要他走大路,不要走小路,还要边走边吃锅巴,但只能装个样子,不能全吃完了。他就照翻语说的,走大路,嘴里咬着一块锅巴。一路上,那些日本兵看到这个暗号,一个个向他敬礼。他回到家里就赶紧报信。我伯父庞维仁一听,急得不得了,一个人跑去看。在回来的路上,在徐家边南面的村口,他又被住在村里的鬼子一枪打死了。这一天发生的事都是庞方传讲给我们听的,要不然,我们不会知道得这么清楚。

跑反时,我们村上还有七个人被鬼子当活靶子打死了。当时,他们从外面回来舂米,准备带走的。突然来了四个鬼子,把村上的人统统赶到村西头的西峡沟。西峡沟一年到头有温泉水的,沟旁有条大田埂,长着一人来高的茅草。鬼子要他们一个一个地跑,跑一个就打一个,当靶子打。其中有周书正、周书友、周光礼和邹如山,另外三个人想不起来了。有个年纪轻一点的叫周生礼,他斜着跑,跑得又快,跑一会就趴下一会,一直跑到槽坊,躲在蒸锅里,鬼子没找到,算是捡了条命。

杜桂珍丈夫的哥哥被鬼子打死在天王寺,死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抗战八年,汤山到天王寺的公路一直不通,没法去收尸。

日本人还到处找花姑娘。我们村上有个妇女,日本兵要强奸她,追她,她就跑到村南头一个水塘里,躲在一小片芦柴滩的后面,只露出一个头在水面上。寒冬腊月的大冷天,躲在水塘里,日本兵没有找到她,总算

逃过了一劫。

日本投降那年,国民党常有飞机飞过来轰炸炮校的日本兵。日本兵就叫老百姓到炮校挖防空洞和防空掩体,还叫老百姓割草,盖在防空洞上面。我那时 14 岁,去干过这活的。防空洞里有高射机枪,我都见过。

42. 庞世根口述

庞世根,男,1927 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寺庄徐家边 10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1 月 26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77 岁,属龙,就住在庞世昌家隔壁的隔壁。他家开过槽坊,他们有钱,土改时划为地主。但他那时年纪还小,不管事。我家里穷,没几亩地。

我们徐家边在跑反时被鬼子打死的老百姓有二三十个呢。跑反开始那几天,庞世昌的父亲和叔叔守在家里没跑,他们把杀好的猪和自己做的酒抬到新民村日本人住的地方,回来时没走大路,走到一块叫“长二亩”的农田边,被日本兵开枪打死了,一个倒在田埂这边,一个倒在田埂那边。他的伯父听到消息后就跑去看,刚出村时没挨鬼子打,回来时,村上的鬼子换岗了,不认得他,一枪就把他打死了。

跑反时,村上不少人回家舂大米,准备带走的。突然来了四个鬼子,把村上的人统统喊出来,集中到村西的西峡沟。当时,西峡沟一年到头有温泉水哗哗地流,沟旁有条大田埂,长着一人来高的茅草。鬼子要他们一个一个地跑,跑一个就打一个,当靶子打。那次被打死的有七个人,有三个人的小名我还记得,他们是小三子、素油和头颅,另外四个人想不起来了。有个年纪轻一点的,叫周生礼,他斜着跑,跑得又快,跑一会就趴下一会,一直跑到了槽坊,拱在一个草堆里躲了起来,鬼子没找到,算是躲过了一劫。他一直没成家,后来搬到汤山菜场附近的幸福村,前两年才去世的。还有一个人叫顺仪,他也没打死。他从西峡沟一直往 83 医院那边跑,在 83 医院里他碰到了他的弟弟大猪。当时,大猪在“大楼”

里头给鬼子当杂工,一个人背着一二十个鳖壶(行军水壶)到 83 医院来灌温泉水,准备拎回去给鬼子当开水喝的。大猪就对跟来的鬼子说:“这是我哥哥。”这名鬼子给徐家边的鬼子一说,他们就把顺仪放了。

庞世昌有个亲哥哥叫刘马根,是个箍桶匠,他是做手艺的,不是种田的,脸也长得挺白的。跑反时,刘马根躲在朱砂洞的山上,胳膊被日本人的子弹打伤了,就搬到朱砂洞下边的平房里住。后来,来了三个鬼子,把平房里的老百姓统统叫出来跪在地上,一个个地检查肩膀和手掌,看有没有老茧,是不是农民。刘马根这小伙子亏了,他不是种田的,就被鬼子拎到一边,连戳几刀刺死了。

汤山的大礼堂不是汤山小学的,而是汤山镇的。以前汤山镇常在里头开大会,我常到那里玩。就在 83 医院里头,我认得那地方,现在就带你去看。喏,这个大台坡就是当时造的,70 多年了,还保存着。台坡上头那一排红砖平房是后起的,以前就是大礼堂。大礼堂下边是一面大操场,就是现在的办公大楼那里。大礼堂盖好了没用上几年,日本人一来就没了。是烧掉的还是拆掉的,我们都不知道。

83 医院里头汤王庙那里有戴季陶的公馆。他是为了用温泉水而特地盖的,都是楼房,很漂亮。公馆四周有卫兵站岗保卫的。跑反过后,老百姓回来了,都没有房子住,这幢楼房就被老百姓拆了,门窗木料砖瓦全拿走,什么也没留。

我 9 岁就给地主放牛,什么活都干过。陶庐那里有一条排水沟,徐家边一带的农田都靠它灌溉。水沟里淤泥很多,日本婆就叫八九岁的男孩用脸盆去掏,掏完了就用肥皂给小孩擦身子,擦得干干净净的。10 岁以上的男孩就不让干这活了。日本人对中国人凶,对小孩倒是不凶的。那年月,大牲口见了日本人也很害怕。有天,我和另外两个小孩骑了一条牛出去,突然有三个鬼子朝我们走过来,那条牛就惊了,把我们摔在地上,飞快地跑了。我们三个疼得半天都爬不起来,日本兵站在旁边看,哈哈大笑。

陶庐的大门口有一座桥,就在现在这座桥的上游 50 米左右的地方,后来拆掉了。陶庐的房子盖得特别好。我有个姨娘在里头干杂工,我进去看过的。现在,那些房子全拆光了,陶庐大门口的水塘也早就填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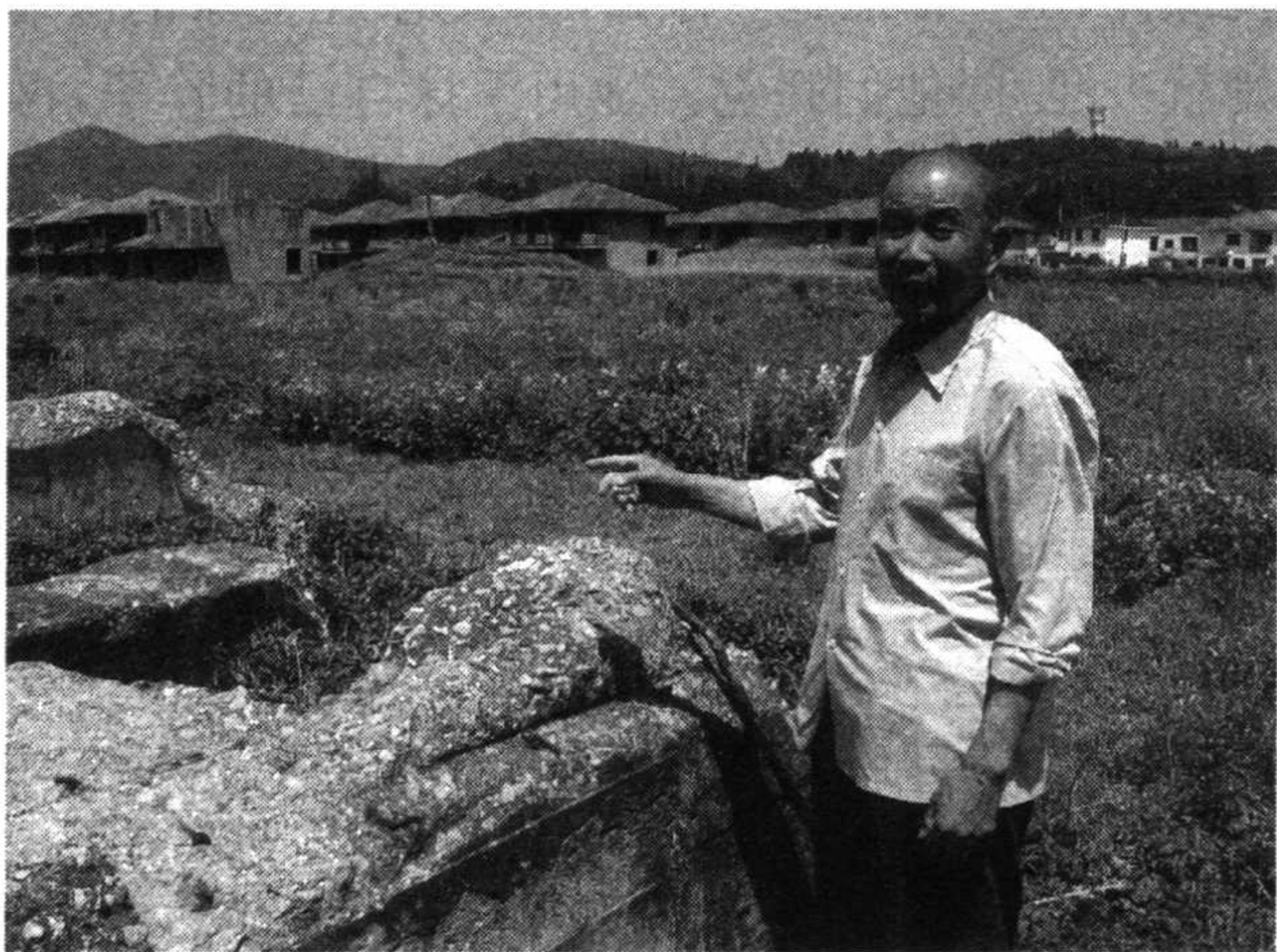
43. 朱家龙口述

朱家龙,男,1929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寺庄徐家边 229 号

调查时间:2004年2月29日

调查人:费仲兴



朱家龙

徐家边东头杨家坟那里有三个炮台(碉堡),现在只剩一个了。日本人打汤山时,中央军在炮台里把守的,管宁杭公路上的一段。当时的中央军都是广东兵,穿着单衣,打了绑腿,冻得厉害,枪都打不动了。他们在这里同日本人打,被日本人打死的、炸死的有五六十号人。安民后,有人组织收尸,我去看过的,死尸都摆在炮台那里,全是当兵的,穿单衣,没有一个穿棉衣的,都化尸了,臭了。大家在杨家坟后头挖了个大坑,用钉耙把死尸搭过来,往坑里推。那个坑挖得很深,死尸也埋得很深,有一人多深呢。当时都说这是两广来的,是李宗仁、白崇禧的兵。

东山(今汤山工人疗养院)那里原来是荒山,也挖了许多坑和沟,附近被鬼子打死的老百姓就葬在坑里沟里了,都是乱葬的,也分不清是谁的谁的。跑反开始后不久,有天夜里,父母亲带了我从东山走,到宝华山韩家边去躲躲。东山那里一走就碰到个死人,一走又碰到个死人。我那时小,由母亲搀着,踩到了死人也不怎么害怕。到了韩家边,日本人就来

搜山,我们躲在山凹里不敢动。第二天日本人又来搜山,我们躲了三天就不敢待下去了,便跑到东葛墟。那里也有日本人搜山,一天来一趟。后来,我们就躲到曹垄,在山上搭房子。白天不敢烧饭,怕冒烟,日本人看到了要搜,只在夜里烧,一天吃两顿。

徐家边有个外地来的,叫至立,姓什么不知道。他女人二十来岁,胖胖的,长得挺漂亮,也不知道她叫什么,都喊她“至立家的”。炮校里的日本人来了,她就去迎,同他们睡觉。她用手抹自己的脖子,再摇摇手,告诉他们不要杀人。日本人要强奸别的女人,她就去拦,不让强奸,说:“这是我妹妹。”她不是慰安妇,她去迎日本人不是为了赚钱,是想让村上其他人免受祸害。

日本人在汤山开慰安所的,就在指挥营后头的天然温泉浴室里,门很小,里头很大,我进去看过的。

炮校里有个日本兵,平时不让出校门的,星期天才让出来,回去时,进校门又要检查所带的东西,他就找我一起去汤山。他头一歪,一只手伸开,贴着耳朵,意思是要去和女人睡觉。我和他进去之后才知道那里是慰安所,里头有日本女人,也有朝鲜和台湾的女人。那个小兵爱吃甜食,特别是那种加白糖的赤豆沙。他在慰安所里买了,每次都装在饭盒里,再用雨衣包起来,叫我拿着,和他一起进炮校。门口站岗的人不检查小孩的东西,他就可以在炮校里慢慢吃了。

另外一个妓院是个名叫天福的日本人开的,就在汤山街上,现在的“万家乐”商店那个地方,大门牌子上写的就是“天福”两个字。天福的老婆在里头管一帮女的,很凶,可她的女儿长得很漂亮,而且和别人私通。有一天,天福的老婆被人压在一个大水缸里闷死了,大家都不知道是谁干的。许多人私下猜测,准是和她女儿私通的人干的,除掉了绊脚石,干起来更顺当。到底谁和她女儿私通,大家也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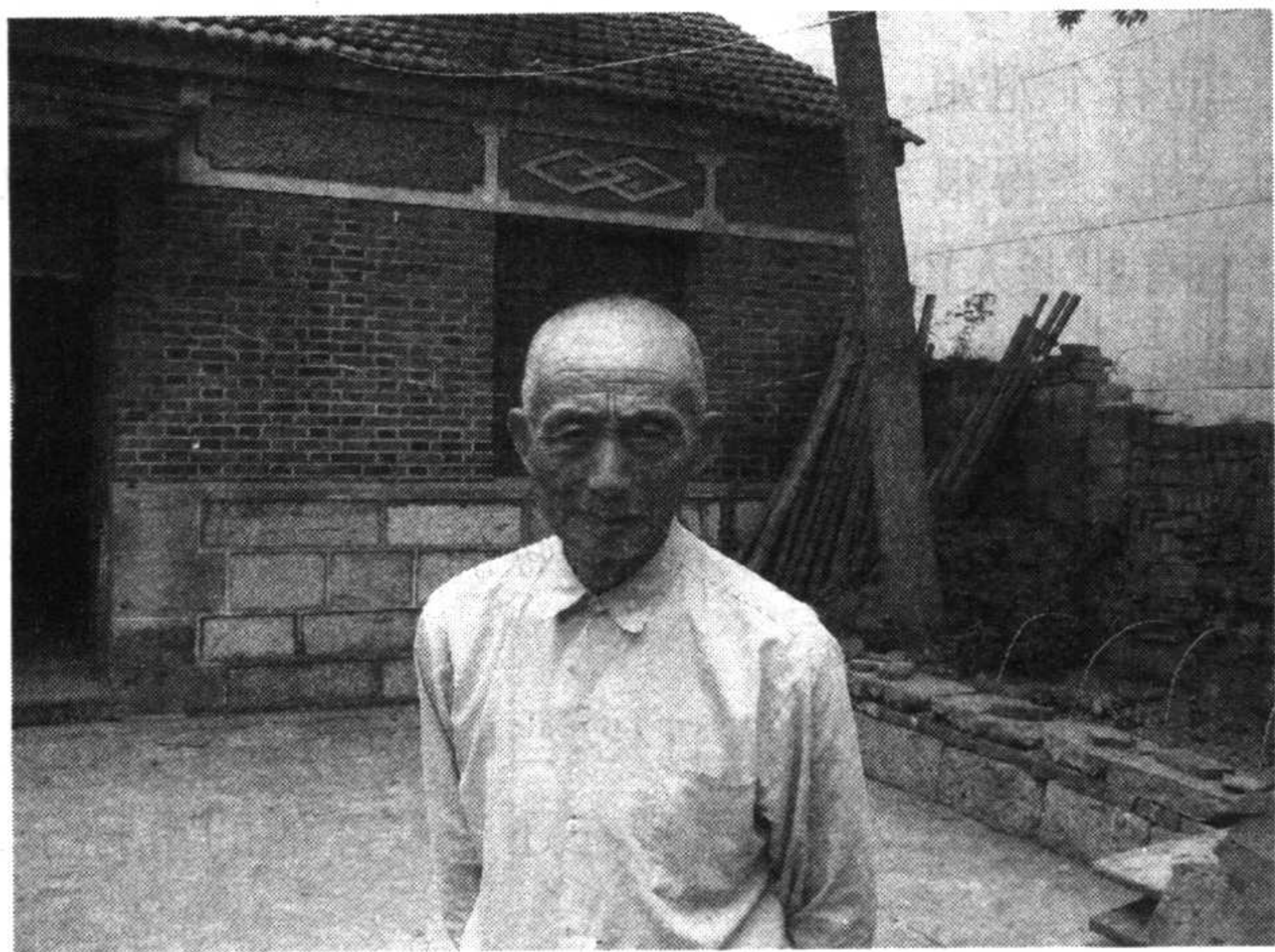
44. 侯国明口述

侯国明,男,1923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寺庄

调查时间:2004年3月13日、5月26日,2005年10月11日

调查人：费仲兴



侯国明

我今年 82 岁，跑反那年 15 岁。

阴历十月廿二那天，88 师住到我们村上，他们骂老百姓，欺负老百姓。后来广东兵 159 过来了，他们不骂老百姓。天那么冷，广东兵还穿着短裤，他们把老百姓家里的被单、烂衣服裹在身上。

鬼子是冬月初五下午三点进炮校的，他们的阵地就在炮校的小山上，几十个鬼子站在那里。日本人到炮校，有汉奸带路的。我怎么会记得这么清楚呢？那天，广东兵的一个勤务员向连长报告，说日本人到了。那个连长就赶紧叫人进战壕。广东兵都躲在战壕里，前面有铁丝网。我父亲侯于斌没躲，日本人向他开了两炮，他就躲着不动。日本人又打了五炮，都没打着他。

我们跑反，先到土桥，路不通，回头去龙潭，可到了汤山路又不通，改到坟头，路也不通，后来就去大凹，躲在凹子里。我父亲没跑，他一个人在家看门。

冬月初六，我们在大凹的山上挖了个洞，躲在里面。当时那个山凹子里躲了两千来人呢。天擦黑了，日本人来抄洞，国民党撤退。日本人在山上用机枪扫，机枪响的时候鸦雀无声，机枪一停，东也听到有人哭，西也听到有人哭，好多人都被打死了。上曹村的黄学银被打死了，他的

哥哥黄学军腿上挨了一枪,后来用剪刀把一粒子弹拣了出来,他没死。还有一个叫“小奶子”的小孩,十二三岁,是阜西西庄的,一枪打在太阳穴上,死了。他有个姐姐,一枪打在背上,没打到肉。子弹打在棉衣上,像剪刀剪的一样,齐得很。还有一个上曹烧窑的,也在那里打死的。

我们村上有些老人没跑,留在家里看门,日本人看到就打,被打死的有十来个呢。

侯于益的母亲和奶奶,婆媳两个在寺庄村上被日本人强奸后开枪打死。她们的姓名不知道。那时候,已出嫁的女人,姓名没人知道。侯于益的女儿还在寺庄,70多岁了。

侯于福,在家看门,被日本人打死,当时60岁左右。他儿子侯国瑞已去世。他孙子当时有七八岁了,现在还活着。他的重孙子、重孙女一大堆。

侯于喜,小名才喜子,在村上被日本人打死的,尸体都没找到。他的大儿子叫侯国发,已去世,二儿子叫侯国强。

侯光辉,在家门口被日本人打死的,当时六七十岁。他儿子侯于塘已去世,他的孙子叫侯国旺。

侯光熙,当时四五十岁,在家里被日本人打死的,收尸时,是不是他本人的尸体都不知道,分不清。

侯于银,跑反时跑到土桥,尸体都没找到。

李春元,日本人刚来那天,在西山头的路边被日本人打死的。

寺庄死的人还有几个。有的老人,日本人还没到就上吊了。还有的大人,看到小孩哭,怕日本人知道,就把小家伙摔在塘里淹死了。侯于益的哥哥跑反时跑到了东葛墟的吉来庵(音),他小女儿哭,怕影响别人,就用锄头挖了个坑把她活埋了。老子没办法呀,谁愿意把自己的儿女活埋呀!

我后来到了万安,被日本人抓差。万安村上打死了几十头牛,东一头、西一头的。出了万安,日本人打死一个老头,叫贾欣尚,七八十岁了。后来又到了李岗头。在李岗头,日本人杀人,那一次被打死的就有6个:黄学宝(黄学银的小兄弟);高庄的庞启财、庞启荣兄弟两个;塘泽村的小罗子;西庄的一个剃头的,不知姓名;阜西石窝里村上的一个,他和我的

一个家门姐姐十月廿六才结婚,冬月初七就被打死了。这六个人是在李岗头的一个水塘边被日本人打死的。当时有 200 多个老百姓在场,就来了 2 个鬼子,大家都跪下了。大家看着鬼子开枪杀人,没有一个敢动。要是有人组织,200 多个人打 2 个鬼子,怎么说也能打死他们吧。

有个万安人,在苏州做生意的,长得很漂亮,风光,日本人就说他是中国的大好佬,把他身上的衣服全剥光,准备砍头了,他娘求,就没砍死。后来日本人抓夫又抓到了他。他比别人特殊,穿得好,还戴一顶礼帽。日本人就打他,从万安一直打到李岗头,走一段路就打他两个老昏(巴掌)。他没有打死。我只知道他姓戴,是万安戴可明的儿子。

日本人的三八式,打一枪就“卡——空”,响两响。那声音狗听了都害怕,不敢在村里,全跑到田沟里去。在万安,日本人打鸭子,打死的鸭子就死了,没打死的鸭子也一动不动,人跑过去一抓一个。日本人的枪法可准了,天上飞的鸟,一枪一个。他们为了打中国,不知训练了多少年。

大刺堰这一仗,先是壮丁队到了那里,我们村也去了好几个。壮丁队就像现在的民兵,本来是穿老百姓衣服的,可他们却穿了灰军衣,这样可以吃得开一点。日本人的侦察兵来了,只有 3 个人,都穿着军装。这 3 个侦察兵已经站在壮丁队跟前了,壮丁队的人还不知道。他们以为日本人远着呢,在镇江、句容呢。他们以前没见过日本兵,不知道日本兵是啥模样。后来,国民党的一个营长带了马夫从那里过,被日本人打死了。这个营长原来住在刘岗头的,他想去了解情况。后来,汤山去了 2 个宪兵,骑自行车去的,同日本人面对面,一看,帽花不同,认出来了,知道他们是日本人了。一个宪兵就滚到路边沟里,另一个宪兵就上了西边山上,同日本人打。这 2 个宪兵可以的,是受过训练的,救了好多壮丁。后来,壮丁把穿的灰军衣都撕掉了,这是他们回来讲的。

日本人过来之前,中国飞机同日本飞机打过好几仗。中国飞机比日本人的还要好一点,日本飞机有点呆板。但日本人的飞机多,常常是十来架打一架。到后来日本人打汤山时,中国飞机就看不到了。

在插花那里,有一架中国飞机被日本人打下来了,飞行员跳伞跳下来,老百姓都围上去保护,还给他吃洋糖元饼。听人说,在淳化那里,有

一架中国飞机也被日本人打下来了,飞行员跳下来,落在山上,路不好走。有3个赤佬(坏人)上去要东西,飞行员把东西都给他们了。这3个赤佬走了一段路又回来,趁飞行员不备,把他敲死了。别的飞行员知道了就提抗议,要政府惩罚。后来,政府把3个赤佬抓到了,用他们活祭。这是淳化的一个人给我讲的。

(2005年10月11日上午补充)那时候,广东兵住在我们村子上,他们的膀子上有字的,是“广东159”。广东兵有大炮,汤山有好几个大炮台,工疗那里有3个,对着京杭路的。大炮台只有一个眼,小炮台有几个眼(指枪眼)。在陈坊铁塔那里,广东兵同日本人打了一仗,日本人用飞机来炸的。

冬月初六,国民党在团子尖有一挺重机枪,一天到晚打,日本人的飞机一来就不打,飞机一走他就打。到了下午,(鬼子占领了团子尖)机枪就对山下的难民打了,我们村上有头驴子打得直蹦直跳。

在万安,有6个人跑反跑到了一起,在一家人家里剃头。那时,日本人说剃西装头的人是支那兵,所以大家都剃和尚头。6个人都剃和尚头。小罗子是在旁边另外一个地方剃的。这6个人都被日本人抓住了,有个鬼子喊我跪下,一把搭住我,抓到门外,也想把我拖走。有个太君看我年纪小,就叫我开路,我就没有去李岗头。那6个剃头的人是和我们一起跑反的,他们全部被鬼子带到李岗头了。到了李岗头,在村中间的一个水塘边,他们就被日本人打死了。后来有人从李岗头回来,他们讲给我听的。

跑反时我跑到了湄塘,在小坟山上看到日本人的两个小坟,日本兵烧死后葬在那里的,每个坟上插一块小牌,上面写的是“大野部队四方队××小队×××雄战死之地”,都是中国字。安民后,又过了段时间,在炮校里住了两支部队。炮校正门那里的牌子上写的是“荣第9436部队”,东大门那里牌子上写的是“荣第9437部队”。

中山大尉见了人还是蛮客气的。我到炮校去种过菜,岩见这个人不是个东西,种菜时专门打人。抗战胜利时,他始终没有敢出来。岩见是管种菜的,见人就打。他不用棍子,也不用皮带,就用拳头打你的鼻子,打得你头破血流,人人吃不消。他个子不矮,也不胖,白白的脸,没有什

么胡子,是个笑面虎,坏东西,人人都吃过他的亏。他是个兵长,比班长小一点,30多岁年纪,有一把小指挥刀,白的,比刺刀长一点,比真正的指挥刀短一点。

有一次,他倒蛮客气的。那天,寺庄去十来个人,徐家边也去十来个人,到安基山修路,通往宝华山的路,我也去了。岩见骑了辆自行车带我们去。他怕碰上新四军,到了汤山北面,还不到养鸡场那个地方,就不肯走了,说:“我的写写!”想写个纸条让我们带走。我们说:“不行,那边的太君要讲话的。”他只得把我们带往安基山,路上还把自行车让我们骑,还叫我们“雅西米(休息)!雅西米!”。到了安基山,他就骑自行车回来了。后来,我们又到炮校给日本人种菜,见到了他,他又凶起来了,一天到晚打人。

45. 陈友德口述

陈友德,男,1937年2月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寺庄西山头

调查时间:2004年5月25日

调查人:费仲兴

听我母亲讲,跑反时我们全家躲在朱砂洞附近山上的一个小洞里,家里一口肥猪也赶上山了。后来,有个鬼子到处找人,在小洞里找到了我们。母亲吓死了,以为全家都没命了。

鬼子看到那头肥猪就一枪打死,再用刺刀割下四条腿。刺刀上沾满了鲜血,他就叫我姐姐去端水洗刺刀。我姐当时女扮男装,剃着和尚头。她去端水了,我母亲闭着眼跪在地上,看都不敢看,浑身发抖。后来,日本兵拿起洗净的刺刀,拎着四条猪腿就走,没有打人杀人。要是他把枪歪过来打,我们就全没命了。

46. 周家裕口述

周家裕,男,1923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寺庄西山头23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5 月 25—26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82 岁，和寺庄的侯国明同年，也是同学。我 12 岁到汤山上学，念到 15 岁日本人过来，以后就再也没念过，只能算初小毕业。解放后，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一直当小队会计，当了 20 多年，现在人家还叫我老会计。

日本人打来之前，广东兵到我们村找民工，帮他们挖工事。打仗时，那些工事都没用上。这批广东兵连棉衣都没穿，那么冷的天，就穿个小棉背心。冬月初五，日本人在句容回龙山架起大炮朝汤山轰，东一炮、西一炮地瞎打。我家后门口就打了一炮，墙倒了，四头肥猪也打死了。冬月初六下午，日本人到我们村。一进村，见人就打，我家有三个人被打死。父亲周庭耀（当时 58 岁）、伯父周庭树（当时 60 多岁）在村西被打死，家门伯母在建设的小营房那里被打死。西山头当时有二十来户，日本人刚来那天就放火，一条龙烧掉了七间。

日本人打来之前，村里人没走远，只是在朱砂洞附近山上挖些小洞，白天躲一躲。父亲被打死后，村上人就开始往远处跑了。我和家门哥哥、家门嫂嫂跑到了土桥下埠。我母亲、伯母和我的一个弟弟（当时 3 岁）没走，村上许多年纪大的人也没走。

下埠的老百姓对逃难的人严得很，讲明 30 元钱一个月，付现钱。你今天住下明天就走，也要 30 元。我们在下埠住了两三天，日本人就来要花姑娘。下埠的人把难民锁在屋里，他们自己倒跑了。我们连夜动身，赶到东葛墟，躲在长山龙的密林里。我们砍了些树枝搭个小棚子，在里面住了很长一段时间，第二年开春才回来。当时汤山成立了自治会，安民了，大家一个传一个的，都回来了。

我们村的姜老五跟我父亲同年，跑反时被日本人打死在汤山。他是被抓去送菜的，一起抓去的还有杭大喜、周小牛（小名）和另外几个。抓他的日本人没打他，是另一批日本人打的。那几个人送菜送到镇江，开了路单回来了，日本人还给他们一点东西。姜老五没到镇江，在汤山老菜场附近一个院框里被打死了。院框子的主人姓白，当时早逃走了。现

在,他儿子去世了,孙子还在村上。

寺庄有个姓李的在西山头后面岗子上被日本人打死了。跑反时,我夜里从东葛墟回来,好几次都看到他躺在路边。他死了好多天才有人去收尸。

青林保莲庵的一个和尚,倒在小周家边前面的路边,也是跑反时回家路过那里看到的。小周家边烧得最苦,全村房屋只剩下一个小磨坊没烧掉。

在孤山堰,我看到一个人被日本人打死在路边,听说是汤山人,姓鲁。

跑反后稳定了,日本人还是打人。我家眷当时还没嫁过来,她在黄梅桥的搭子桥干活,离公路不远。一个日本人站在汽车上向她放了一枪,打在大腿上,没伤着骨头。她用两个洋钱把前后两个伤口夹起来,不让血淌出来,再找人拿药,就没有残废。

蒋介石撤退时,炮校的大楼烧了,跑反过后,老百姓又进去拆房子。日本人住在炮校里,那些房子是他们盖的,我去做过小工。日本人带我们到孟塘拖砂,回来和点水泥,做成砖头。83 医院里有走廊的老房子也是日本人造的,我也去做过小工。有间屋子说是院长住的,在水塔下面,半山腰上,我天天用砂轮磨瓷砖。建筑材料都是日本运来的,木料的芯子是红的。有的人胆大,就发财了。他们把成箱成箱的洋钉偷出来,拿到土桥去卖。那时候,日本人住在炮校和汤山,土桥那里没有日本人。有天夜里,上峰大周家边的金葵宝(小名)偷了箱洋钉,被鬼子碰上了,当时就一枪打死。

日本人在汤山没有宪兵队,蒋介石在的时候有宪兵队。宪兵队穿的衣服可好了,全是黄呢子的。

日本人打汤山时,中央军在大赤燕打了一天一夜。打仗时我在西山头,听到了枪炮声,看到了日本飞机。日本人是跟着鳐走的,鳐到哪儿,人就跟到那里。鳐的形状像个大牯牛,上面有红太阳疤疤。飞机一来,鳐就自动下来,飞机一走,鳐就自动上去。我们站在村上看得很清楚,是个很大的东西。大赤燕这一仗刚打完,日本人的鳐就没有了。晚上,他们的坦克、汽车从我们村后沿着射击场马路轰隆隆地往南京开,那声音

响得不得了。

47. 殷侯氏口述

殷侯氏,女,1914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寺庄

调查时间:2004年6月14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91岁,娘家在寺庄,姓侯,婆家也在寺庄。丈夫叫殷培顺,老公公叫殷振福。我身份证上填的是殷侯氏,没有名字的。现在眼睛花蒙蒙的,靠近了才能看见点影子。年纪大了,眼睛、耳朵都不好使了。养了两个女儿,大女儿叫殷红英,二女儿叫殷桂英。

跑日本鬼子反的时候,我说阴历,阳历我不懂,冬月初四,跑到了大赤燕,马路边上看到一个死人,头脑子流了一大片,不得了。到了孟塘,一个老奶奶说,不能过去了,桥都炸了,我们就到安基山山上。在那里碰到了朝鲜兵,胡子那么长,是从安基山过来的。我们村上一起跑反的有七八十个人呢,挖一条沟,旁边挖洞,上面再盖些松枝,躲在里头。日本人的机关枪咔咔地响,我们一动不敢动,松枝上的松油把我的头发粘成巴巴了,也不敢动。侯于高的女儿,才养了13天,会哭。男人们讲,洞里有七八十号人呢,她一哭就不得了。侯于高就把小孩包了包,挖坑埋了。我们躲在洞里,又没有吃的,都饿昏了。我老叔叔在安基山村上煮了一锅饭,用箩筐挑来,我们一人抓一点吃吃,心里才好一点。后来大家又跑到东葛墟,那村上老百姓一个也没有了,也找不到吃的,就跑到智南庵,有个老道士住在那里。夜里,中央军翻墙过来,问男的要衣裳,说:“换了衣裳就能跑出去。”好可怜的。我们在智南庵就睡在地埂上,两个女儿,当时一个5岁,一个才1岁。

跑反时,我父亲是先走的,他从大赤燕跑到了北圩。到了北圩,还是没有吃的,就问一个大地主家借了100斤稻谷。十来个人呢,不够吃,好可怜呢。后来又问一家借了200斤米。我们同这一家本来有点亲戚关系的,他家想用200斤米换一个姑娘。我姑老太,就是我父亲的妹妹,才

16岁,为了换这点米吃吃,就同他家结婚了。那时候200斤米就是20斗。吃了19斗,安民了,就回家来了。回到寺庄,还是东躲西躲的,不敢见鬼子的面。我们住在底下,夜里就回寺庄摸点苜蓿头,寺庄这里苜蓿头歹哩(多啦)。我家里的房子烧掉了,烧得光光的,一张小板凳也没有。但是,有一个皮缸里还留了点糯稻,没烧掉,这就救了我们的命了。年轻人也不敢见鬼子,待在家里还是没得吃,就向人家借一点吃吃。后来扎(割)麦子,收了麦,就用小磨子磨点麦糊糊吃,再到山上砍点松树,搭个小房子住下来,天天吃麦糊子。后来就栽秧了。可怜呀,见了日本鬼子,我们都趴在小水沟里。

我有个娘家叔叔,叫侯才喜,被日本人拖走了,再也不见回来。

我有个大大(伯父),叫侯于福,就在本村陈昌汉家里,鬼子逼着他和一个女的干,他不肯,日本人就把他打死了。

我老头子(丈夫)跑反时冲散了,逃难到贵阳,日本人投降了才回来的。九年多,就我一个女人,带两个女儿不容易啊。幸亏有人帮忙,才没有出去讨饭。

跑反时,我们村上被鬼子打死的人歹哩。叫什么名字,想不起来了。一个叫侯才宝,还有一个是李春远(寺庄就他一家姓李)。侯于高的母亲和奶奶,婆媳俩留在家看房子,他家的房子没烧掉,他奶奶被鬼子一枪打中背上,死了。他母亲也被鬼子害死了。先被鬼子强奸,然后用挂酒桶的木质横担塞进下身,那横担又长又粗,跑反回来,她还躺在地上,横担还塞在下身。

48. 周炳礼口述

周炳礼,男,1923年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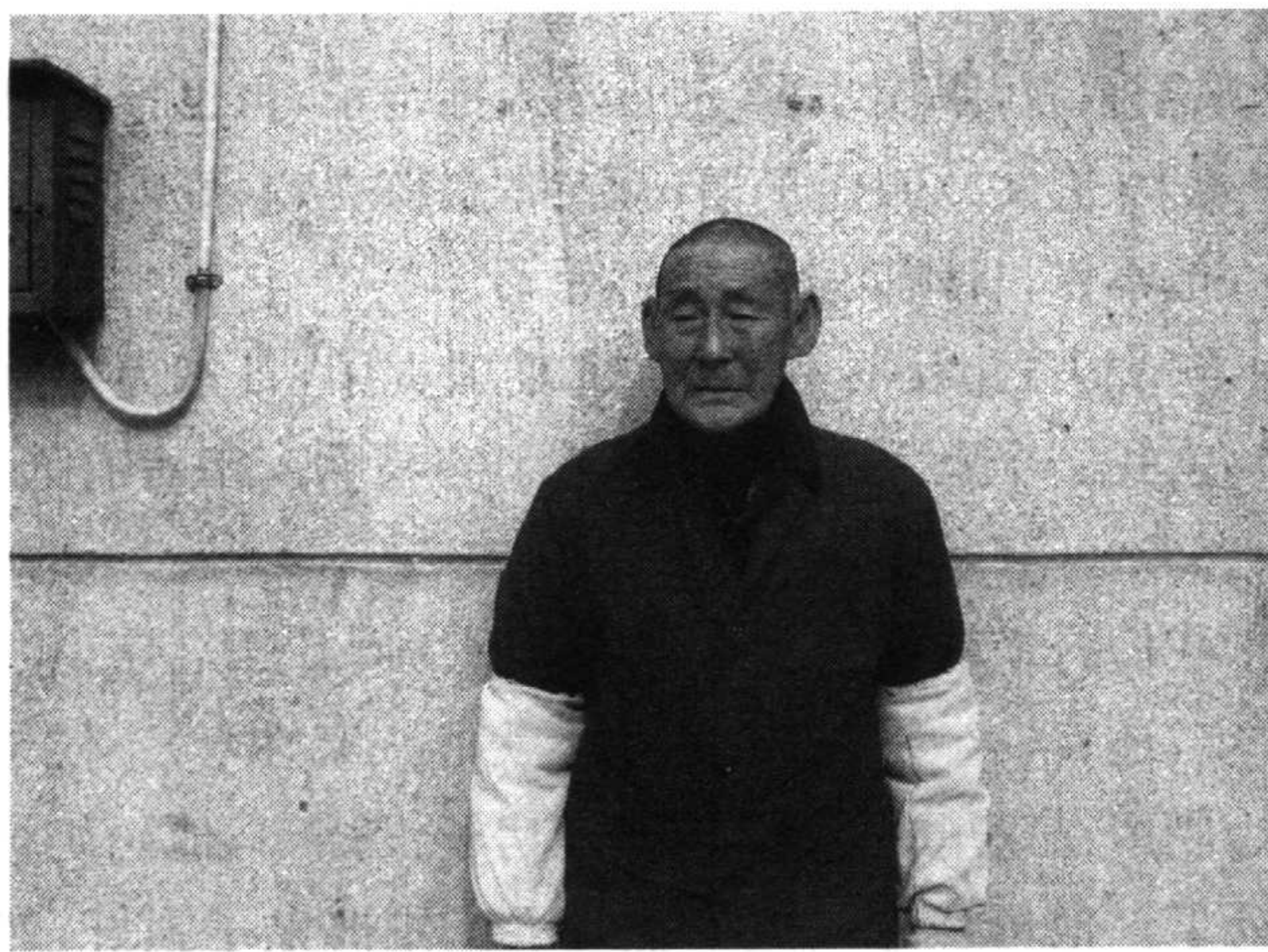
调查地点:汤山镇寺庄徐家边213号

调查时间:2004年11月24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2岁,属猪的。12岁开始给人放牛,15岁跑反。我是文盲,解放后上夜校学拼音,没学下去。

我家有三个人被鬼子打死,时间是腊月二十五日下午四点来钟,太阳快下山了。青林大队住了两个鬼子,天天要喝老酒,要花姑娘。有一天,一个鬼子喝醉了,被青林的人打死了。另一个没喝醉,就跑到指挥营来汇报,说那边支那兵大大的有,鬼子就跑到徐家边来报复。那天,他们把我家的房子烧了,把聚在屋里的老太太赶走,把老头和小伙子赶到村西的西峡沟,一个个都打死了。那天被打死了五个,其中有三个是我家的。周光礼,我家的爷,58岁;周炳里,我二哥,18岁;周书亚,我父亲,59岁;周书友,我叔叔,56岁;邹瑜山,50来岁。



周炳礼

我那天在汤山大楼里,被鬼子抓去的,没有在家。我父亲差五天就60岁了。我大哥也差一点被打死,他肚皮上擦破了一点皮,没打中。我叔叔家的堂兄跑到了83医院,鬼子瞄准了他,要开枪。我抓住了枪说:“他是我哥。”鬼子才没打,把他带到了“大楼”。

冬月初四那天,还没来得及吃午饭,我们就跑反了。东面打炮,机枪咯咯地响,再不跑就不行了。跑到孟塘,看到了日本人的飞机。日本人在孟塘不让我们走,把我们关在一个院子里,等飞机飞走后才让我们走。当天,我们到了孟塘西面的张家岗,在村后的小山上歇了一夜。那天霜下得很重,冻得受不了。第二天赶到龙潭,见到许多广东兵,不停地跑,有的有枪,有的没枪,穿的衣服也很少,冻得不能打了,兵败如山倒。后

来,我们听到紫金山上打炮了。

我们在北圩的州子圩,住在人家家里,靠着长江边,看到日本人的兵舰一只接一只地往南京开。打了三天,南京城就打开了。日本飞机在天上撒钞票,中国人拿到钞票就不打了。第三天,长江水就红了,木板、木盆漂过来,我亲眼看到的。江上喊救命的声音,一夜不歇,谁会去救啊?我、母亲、大哥和我妹妹四个在北圩,父亲留在家里,没有跑。大哥跑到远望口帮人过冬,拿钱来买点米。多少人因为没有吃的,把女儿都卖给北圩了。

后来,我被鬼子抓到“大楼”里干了一个来月,什么活也没有干,他们是抓我去玩的。“大楼”里一共有三个班,一个班八九个人,还有两个老百姓给他们做饭。也没有烧什么,他们尽是吃罐头,冰糖随便吃。每天下午三点钟,我背着大洋瓶过来洗澡,灌温泉水给鬼子喝。鬼子想炸温泉的,他们想搞试验,看看水为什么这样烫。后来怕炸出硫磺,没敢炸。

在“大楼”里,他们把我抱上大洋马,在大操场上走,看我会不会摔下来。我抓住了缰绳,一次都没有摔下来。日本人就说我脑瓜好、精。有个班长是南朝鲜人,会说中国话,他说他是抽壮丁抓来的。他看我长得神气,就待我好,想把我带到东京去,我不肯去。腊月二十五日,我家房子烧了,三个人被打死了,这个南朝鲜人专门跑到我家来看,感到很惭愧。后来,他叫我偷偷地跑,我就从“大楼”里跑出来了。我在土桥亲戚家里躲了个把月,三月里才回来种田的。

那个南朝鲜的班长姓胡。我大哥识字,叫他把名字写下来,他写了。后来,我忘了他叫什么了。朝鲜人到中国来报仇,有坏人,也有好人。

“八月十五杀鞑子”,大家都这样说,都不晓得是哪个朝代的事。薛仁贵住寒窑,投降日本人杀中国人。日本婆子背上都背着薛仁贵,那个包包是不能去摸的,你摸了就等于摸了他们的祖宗。

鬼子在“大楼”里杀了许多汤山人。那里有一条一人来深的大沟,打死了人就往沟里推。日本人有十字徽的,三个星的,他们是专门收尸的。

后来,汤山的唐大先生告诉大家:每个人手臂上背一个红疤疤,鬼子就不杀人了。他那时七八十岁,很有钱的。我老丈人在大凹给唐大先生看山,我在那里干了三四年。那里有个老虎洞,我没有下去过。唐大先

生在大凹搞了个公司,造林,叫教育林。林子很深,跑反时都没敢进去。解放后开诉苦大会,炮校、“大楼”我都去诉过苦的。

我们村上有个张老四,他女人被鬼子抓到汤山当婊子了。是给钱的,逼得没有办法,干了一年多就不干了。后来,日本婆子来了,来了不少。哪个当官的不带老婆来呀?她们同男人一起洗澡,不分男女的,还叫中国人给她们洗。寺庄的侯才宝,跑反时在澡堂后面被鬼子打死了,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回家。寺庄侯国社的老子,到汤山街上去掳吃掳喝的。鬼子看到了,要他和一个外路来的大肚子女人睡觉。他不肯,鬼子就逼着他爬上去,开了一枪,把男的、女的两个都打死了。

新塘的包根,到徐家边舅舅家来玩,在孟塘安基山那里被飞机上的机枪打死了。

周光智,在村外头被鬼子打死的,尸体没找到。

周光仁,50 来岁,跑反时在村上被鬼子打死的。

吕和顺,外号“大顺子”,在句容天王寺被鬼子打死的,尸体没找到。吕和顺就是杜桂珍丈夫的哥哥。

49. 戴明煌口述

戴明煌,男,1925 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寺庄戴家棚子 9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11 月 29—30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80 岁,属牛的,跑反时 13 岁。

戴家棚子原来不在这里,在现在的 312 农场那里,案子桥过去一点,还有蒋家棚子、梅家棚子、张家棚子。姓戴的几家在一起就叫戴家棚子。1956 年,戴家棚子搬到了这里,其他几个,有的搬到了湖山,有的搬到了鹤龄乡。

我们是冬月初六跑反的,一开始往润南,一看不对头,要打仗了,又向大赤燕跑。上午快吃饭时到了孟塘,来了十几架日本飞机,三架一批,轮番轰炸孟塘桥,想把桥炸掉,不让国民党部队走。我亲眼看到飞机投

炸弹,炸死了一个老太太。老百姓一看,全跑掉了。后来,我们往龙潭跑,下了圩。第二年二三月里翻过宝华山回来,一大早就到了山上的庙里,在宝华山躲了一天,天黑后才下山的。我们在庙里吃了一顿稀饭,不要钱的。那稀饭黄黄的,烧得不稀也不稠,锅巴有半寸来厚。庙里有200来个和尚,5口大锅都烧稀饭。那铲刀就和农民挖地的铁锹一样大,柄长长的。日本人信佛,这个庙没有烧。天黑后,我们下山,从叶庵那里经过,路上被死人绊倒过好几次。后来经过炮校边上到西庄,趁天黑慢慢摸回家。当时炮校里有鬼子,老百姓夜里去拆房子,鬼子不敢走散。我老伴那时还没有和我结婚,她从宝华山回到寺庄,一路上数了数,一共看到了78个死人,大赤燕那里死人最多,作厂下马路那里也有3个死人。



戴明煌(右)

回到了家里,房子全烧光了,什么也没有了。我的两个叔叔就到大凹山上去锯松树,我扛回来。我才13岁,扛不动也得扛。用松树顺墙搭个小棚子,勉强住住。那时候的人很讲义气,你没有吃的,他们就扒点烧糊的稻谷给你,回家炒炒,小磨子磨磨就吃了。

跑反时,我家十来个人都跑了,我父亲戴智宽(属马的,当时50来岁)留在了家里了,没跑。冬月初七那天,他在村上被鬼子开枪打死了。村上的吴老头、蒋国富等几个没有跑反的老人把他草草地掩埋了。我们村上就打死他一个,其他人没有打死。

安民后我听同学说,在孟塘陈家边的清凉庵那里,4个鬼子叫12个人排成一排,让他们一个一个地跑,跑一个打一个,全打死了。还有一个哑巴躲在床底下,鬼子用刺刀逼他出来,再活活刺死。那天一共打死13个。涧南的水塘里摔了许多死人,也是听人说的。

日本人和中央军打仗,初六那天还没有交手,中央军的人还是散的。初七就打起来了。大赤燕那里打得最厉害,死了许多人。

我家门口的这个碉堡打仗时没有用上。312农场那边有个大的,可以住一两班的人呢。听说这些碉堡是德国人设计的,造好后就把图纸交给日本人了,日本人清清楚楚。

50. 侯腊红口述

侯腊红,女,1926年生,戴明煌之妻

调查地点:汤山镇寺庄戴家棚子9号

调查时间:2004年11月29—30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79岁,属虎的,娘家在寺庄。

跑反时,跑了没几天,上峰顾家棚子有个20岁左右的女的跑到汤山街上去掳东西。那时候街上没人,店门都开着。她从街上挑了一担东西回来,走到寺庄,就碰到了鬼子。鬼子把她拖到陈昌汉家里强奸,完了又叫我大大侯于福(当时60来岁)去把她的下身舔干净同她睡觉。他是个有钱人,不肯,鬼子就在陈长汉家的长厅里把他开枪打死了,一枪就打在心口上。后来,又开枪把那个女的打死了,子弹打在脖子窝那里。那天我回家拿粮食,那场面都看到了。那个女的姓什么,我不知道。那天一共去了三个鬼子,两个鬼子跑到我大大家喊他去的。

侯于福是个地主,他家的房子盖得很好,照墙上有一个很大的“福”字。他在汤山街上开了家粮食行,卖大米,很有钱的。他家雇了许多人磨米,还养了许多牲口。他和我大妈(伯母)一天都没有跑反,留在家里看门了。出事那天,我大妈躲在大仓的顶上,爬梯子上去的,上去了再把梯子抽了。她听到陈昌汉家里的枪声,就知道要出纰漏了。鬼子走

后,她就跑过去看,我大大还没有断气,断断续续地讲给她听。我大大讲了一回就不行了,大妈边哭边讲,我们好多人都知道了。我大大死后,尸体在屋里搁了不少日子。后来回来了两个人,用席子包包,把他埋了。那个女的没人管,我第二天就跑掉了,不知是谁埋的。

83 医院那个地方有个女的,外地人,住在棚子里的,不知道姓名。那棚子就在徐家边那里,在大路边上。她跟了鬼子了,鬼子一来,她就去跟鬼子睡觉,我看到过她跟了去的。

我的堂外外(堂叔)侯于喜挑了一担瓢儿菜(一种青菜),给鬼子送菜,后来再也没有回来,尸体都没找到。

听人讲,在土桥的姚下村,鬼子一下子就杀了几十个人。有一个人被鬼子活埋了。

我的大哥和一个堂哥参加过壮丁训练队,在 83 医院那个地方训练过。跑反时,他们穿着壮丁衣走。到了大赤燕,鬼子端着刺刀把他们拦住了。他们是小孩,就上去拨鬼子的刺刀,把他们俩的壮丁衣撕烂了。结果,鬼子没杀他们。

51. 芮有道口述

芮有道,男,1913 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路西塘泽

调查时间:2001 年 8 月 10 日

调查人:费仲兴

1937 年 7 月,我从学校毕业后就回乡当小学老师,那年我 24 岁。8 月到 11 月,我教了没几个月,日本人就打过来了。日军在攻占南京之前在汤山以南的孟墓一带同中央军打过几仗。

开战前几天,我和我的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从塘泽逃到了句容土桥以南的南圩,躲在下埠村一个老百姓家里避难。那里河网密布,道路曲折,比较安全。祖母和母亲留在塘泽没逃出来,父亲芮朝顺就留在家照顾她们,那年他 52 岁。战斗开始后,日本兵便在附近村上抓夫,要他们到孟墓西南的笪箕凹将伤兵抬到汤山炮校,一天抬两趟。塘

泽村上抓走了好几个民夫,我父亲便是其中之一。当时天寒地冻,从笪箕凹到炮校路又远,空身走一趟就很累。父亲累得实在抬不动了,就在丁墅歇了一歇。日本兵不由分说,举刀便砍,有一刀砍中了前额,父亲当即身亡。日本兵又将他推入路边的池塘里。日本兵走后,丁墅的村民趁天黑将父亲的尸体从池塘里捞出来,草草埋在一个浅坑内。后来,民夫托人带口信给我们,要我们赶快回去收尸。我们得到消息时,已是腊月二十九。我和两个哥哥趁天黑从南圩赶到丁墅,从土坑中将父亲的尸体挖出,装在一个破衣柜内,连夜抬回塘泽安葬。入土前,我们仔细看了父亲一眼,见他前额上的刀口约有一指长,血肉模糊,惨不忍睹。他被残忍的日本兵杀害了,一家人无比悲痛。为了活命,我们又返回南圩避难,直到第二年开春才返回塘泽。那时候,塘泽村上的民宅大部分被日本兵烧掉了,我家的三间房屋幸免于难,还可勉强栖身。

那年月,当亡国奴的日子真是不堪回首。我们塘泽被日本兵杀害的村民还有四个。一个叫芮忠於,他从家里跑出来到村外看看,被日本兵发现了,一枪打死。他没有后代,这一门就绝了。另一个叫李朝荣,是在上峰镇南边的李岗头被日本兵枪杀的,他也没有后代。还有一个芮国美,跑反时在姚家边槽坊(即酒坊)内被日本兵杀害。他有个儿子叫芮良井,今年77岁,就住在村后头,现在身体还蛮好的。还有一个叫李朝根,也是在跑反时在姚家边槽坊内被日本兵杀害的。他有个儿子叫李六顺,解放后参加过抗美援朝,现住江宁区东山镇。

日本兵把我们塘泽那么多的房屋都烧毁了,老百姓无处安身,便砍些松树,搭个矮棚,避避风雨。粮食、衣被、锅灶、水缸等都没有了,生活陷入了绝境。开春后种地,耕牛没有了,种子没有了,水车和别的农具也都烧掉了,那种困难真的没法形容。

后来,新四军开到茅山,同日本人打,救国救民。他们派赵则三到汤山来联络,招集青年人去茅山。汤山这里一共去了七个小伙子,我是其中之一。我们到茅山时是秋天,刚割完稻子。在那里住了一个礼拜的样子,住的地方不固定,常搬来搬去的。陈毅专门接见了我们,说:“你们几个青年是从沦陷区汤山来的,不容易,你们真了不起。”到茅山去的人很多,有男有女,都是青年人,大约有三四百个,有句容的、溧水的、高淳的,

大家集中在茅山。当时打的旗子是国民党的,是中国陆军新编第四军第一支队,陈毅是司令,骑一匹白马。他是个大块头,很有学问的,大家非常尊重他。那年头很难吃到猪肉,我们一天吃一顿南瓜烧猪肉,吃得蛮好的。后来,新四军准备把我们送到皖南去集训。到了溧水的白马桥,我和另外几个人生病了,走不动了,便留了下来,回家组织抗日。在新四军的领导下,我们组织了区政府,协助新四军做抗日工作。这个区政府是地下的,没有枪,在各村流动,大约活动了两年时间。区长叫言仁福,新四军派赵则三、刘正英来联络,我们常见面的。后来出了汉奸,正月初三那天在周家边金大贵家被鬼子包围了。农会会长唐亮荣、民兵队长邹良德(作厂宕子村人)被日本人抓去了,一直没有消息,估计当时就被杀死了。言仁福逃掉了。就这样,组织垮了,毁了,再也没有活动过。

52. 李启晶口述

李启晶,男,1926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路西万安

调查时间:2003年1月11日

调查人:费仲兴、史蕾

我叫李启晶,今年78岁。日本人打来那年,我13岁,跟着大人跑反,到了江北,亲眼见到日本兵用机关枪在长江边向老百姓扫射,打死了许多人。第二年开春,我回到了万安。这时候,万安的房子差不多全被日本兵烧光了,只剩下几家没烧掉。耕牛、猪、羊、鸡、鸭都被日本兵抢走。

回到万安后,我听别人讲,村上的鄢老五因为害怕孩子的哭声会引来日本兵,把他两个幼小的儿子推入村后水塘里活活淹死了。日本兵在上峰南边的关塘堰一次就打死三十来人,我们村的贾欣尚老人,就是在那里被打死的,死时83岁,是年龄最大的一个。我们村的李世有,在村边走路,被日本兵看到了,一枪击中左肩,未打死。还有一个叫戴可久,当时四十来岁。日本兵到万安来找花姑娘,他说找不到,就被日本兵一枪打死在一个茅房边上(当时还未安民)。

我们万安还有一个戴宗美,16岁,跟了父亲跑反,到了句容黄梅桥的

涧西,就被日本兵抓住了。她父亲跪下来,求日本兵不要欺侮她,被一枪打死。抗美援朝时,她丈夫参军了,她留在农村,当过汤山乡的乡长,后来又做过公社妇女主任,现在还健在。

那时候,我们村上有一个老奶奶,70多岁,村上人都叫她“侉奶奶”。这么大年岁的人,日本兵还是不肯放过她,把她的衣服全扒光,用锅铲把子捅她,还叫一个老头睡在她身上,老头不肯,就使劲打老头。

日本人欺负中国人,中国人就起来反抗,汤山附近常有新四军活动。我15岁那年亲眼看到新四军来攻打汤山的陶庐,日本兵在汤山街上到处跑,紧张得不得了。还有一次,我看到日本兵在汤山抓住了两个女大学生,她们头昂昂的,不买账,一点也不害怕。

那时候,京杭国道上的仙涧桥是座木桥,新四军常来烧桥。日本鬼子叫老百姓看桥,我也去看守过。一天,我看到一队新四军,有几十个人,从下山村冲出来,一人带一捆柴火,直冲桥边。战斗中,有个新四军被日本兵打死了,后来就葬在下山村。

汤山维持会会长叫陈德州,汤山人。自卫团团长叫金大贵,周家边人,住在汤山。陈德州的侄子陈德能是日本人的公安巡官。他们这些人都给日本人办事。我们万安的伪保长戴可仁,还有丁墅、高庄一带的伪保长就不一样,他们是两面的,白天为日本人办事,晚上为新四军办事。新四军在我们这一带势力蛮大的。有个科长叫李贯一,胆子大,晚上常来收粮收税,招集这些保长开会。他有个警卫员叫陈四麻子,是万安人,后来叛变了,带了金大贵一帮人来抓李贯一。这帮人装扮成卖白糖的、抬担架看病的,手枪藏在白糖下面,机枪藏在担架里。他们把李贯一和一起开会的十来个保长包围了。在那次战斗中,李贯一冲出了包围,往东跑了一段路,但他不会游泳,在过河时牺牲了。要是往西跑,孟墓那里的新四军就会过来接应他,就不会牺牲了。现在,李贯一的墓就在上峰李岗头的路边,年年有人去扫墓的。

53. 戴义寿口述

戴义寿,男,1927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路西万安

调查时间：2003年1月11日

调查人：费仲兴、史蕾

我今年77岁。新四军打陶庐的事我知道。我在抗美援朝时当过兵，听一位战友讲过。他是句容黄梅桥人，新四军北撤前同陈毅他们在一起打过仗，是警卫员。他告诉我说，陈毅带领一支队伍，从胥王村、窑湾那边过来，过青林、周家边，奔万安。陈毅骑的是一匹白马，当时有一个班的人掩护。那次是为了掩护陈毅才打陶庐的，打了一阵也就走了，把汤山的日本人吓得不得了。我这位战友是三代单传，新四军北撤时家里人不让他走，他就留在家里了。后来抗美援朝了，他就再次参军。

54. 戴宗美口述

戴宗美，女，1923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路西塘泽151号

调查时间：2004年5月31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2岁，属猪，娘家是万安的。鬼子打来前念到二年级。解放后，区委培养我，在东山学了三个月，多少认识一些字。1951年3月参加工作，当过路西乡的乡长，乡政府就在作厂小学那里。当时，路西乡属江宁县第六区，区委就在作厂小学的“红房子”里，而区政府在作厂高智全家的对门，是分开办公的。1979年退了下来，现在政府每月给我1400元，够用了。

鬼子第一次进村那天，他们叫贾欣尚扛东西。贾欣尚当时五六十岁了，扛不动，扛到丁墅的五家桥那里就被鬼子打死了。那座桥是小桥，现在还在。留在村里的人说：“不得了啰，要出纰漏了。”后来去找，他已经死在那里了。贾欣尚是个好老头，他不是关塘堰打死的。他六个儿子都是种田的，都过世了。

听人说，第一批过来的不是日本人，是朝鲜人。日本人晚上都在炮学校里，不敢出来，老百姓就可以在夜里回家找点吃的。

在上峰姚家边的槽坊里,日本人烧死了不知多少老百姓。在李岗头的场上,日本人枪毙人,打死了好多好多人。听别人讲,死人倒在水塘里,水都染红了。我家的九间房子全被日本人烧掉了,六间是瓦房,三间是养猪拴牛的草房。日本人不知把什么东西往房上一甩,房子就烧着了。当时,我爸开了家小店维持生活,他雇了个伙计挑了一担东西走了,没有人在,什么东西都没有忙(抢)出来。后来跑反回来,没地方住了,就住在别人家的小牛房里。

快稳定了(指跑反快结束时),我爸跑到句容黄梅桥的涧西,被日本鬼子开枪打死了。他叫戴可钧,当时四十来岁。我们几个妇女全躲在战壕里,吓死了。第二年开春,我们问涧西的人要了点稻草,裹了裹,把他抬回了万安。父亲被打死后,我妈带着我和我的一个哥哥、一个弟弟跑到了长江边的营房(地名),在前曹、后曹一带讨饭,住了一段时间。营房是圩区,日本人进圩里,要找人撑船的。他们一坐上船,老百姓就全知道了,妇女全躲起来,那里比较安全些。

跑反时,我祖父住在我叔叔家的一间房子里,那间房子没有烧掉,里面还留了点粮食。我们从外面回到万安后没有吃的,就常常吃麸子。妈妈一个人尽吃麸子,有点好吃的就留给弟弟吃。这些苦不能再谈了,谈了可怜(老人讲到这里就不停地流泪,擦眼睛),万安年纪大一点的人都晓得的。我18岁嫁到塘泽,20多岁就把妈妈接到塘泽,全村人都喊她“老婆婆”,都知道她一个人吃苦,把好吃的留给小孩吃。

解放后,在作厂牛牧岗召开万人审判大会,一次就枪毙了12个人,有顾祝符,还有上峰的金忠军。金忠军是金大贵的儿子,公安股长蒋进堂宣布他是反革命。蒋股长叫我上台诉苦,诉日本人的苦。日本人在的时候,金大贵是汤山的头门老爷(头面人物),收的徒弟很多。一到过年,这些徒弟就去拜年,送礼,礼品全往皮缸(比普通水缸大得多的未上釉的缸)里放。顾祝符的事我不清楚,老百姓讲他是个大好佬,我不清楚。

55. 谭学英口述

谭学英,女,1921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路西塘泽

调查时间：2004 年 10 月 10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叫谭学英，名字怎么写，我不知道。我不识字。今年 84 岁，属鸡的。娘家是汤山街上的，7 岁到塘泽，当童养媳。17 岁跑反，跟了我老婆婆跑到了桦墅，我老婆婆娘家在桦墅。后来又跑到北圩，安民后才回家。

鬼子一来，我老公公就在路上被鬼子抓去了。在什么地方抓的，我不知道。他眼睛不好，抓到湖山就被打死了，尸体都没找到。他的名字也不知道。（芮友道插话：叫芮良全，当时 50 多岁。）我老婆婆活到 80 岁，是 1958 年打水库时去世的。

跑反时，我家的房子被鬼子烧掉了。安民后回到家里，就砍些树，搭个小猪圈一样的小棚子，住在里面。我 13 岁就给地主放牛。我只养了一个女儿，她今年 56 岁。

我是党员。80 岁以上的老人，大队里每月给 40 元，党员再加 20 元。三个月发一次。

56. 贾东根口述

贾东根，男，1922 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路西丁墅

调查时间：2004 年 11 月 15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83 岁，属狗的，跑反时 15 岁。冬月初四跑反，看到西庄的人挑着箩担往西跑，我们也就跟着跑，一家人跑到涧南，住在一间很大的空房子里。住了一夜，鬼子就来了。涧南的人躲在地洞里，鬼子把他们拖出来，一个个用刀杀死的，杀完了就用我们的被子擦刀上的血。我们在屋里的人没有杀，躲在外面的人都杀了。广东兵在涧南跟鬼子打仗，他们个头矮，许多人只穿着短裤头，都冻死了，没有怎么打就跑了。我亲眼看到有些广东兵把枪摔在水塘里，轻身往南京方向跑。后来，我们就跑回家了，躲在村外的

竹丝园里,看到日本人放火烧房子,我们就跑到宝华山,躲在东葛庵里,白天在山上树林里躲,晚上到庵里去。那个庙在山凹子里面,四周全是密密的竹林,老伏牛、小伏牛的人全躲在里面。这个庙没有烧掉。

安民后回到家里,房子全烧掉了,就砍些松树搭个小棚子住。我也到炮校去拆过房子,拆下的木板、木料拉到土桥卖,再买点米来吃吃。那时候,炮校里没有人住。

我们村上有两个人在鬼子刚来的时候被杀死了。一个是胡家的大奶奶(她娘家是姚家边的),当时 50 多岁,小脚,不能走。鬼子刚来那天被日本人用刺刀杀死的,就在他家门口杀的。她的儿媳是个瞎子,也没有跑反,留在家里了。结果,婆婆被杀死,她自己也上吊死了,跑反回来后,我亲眼看到她们尸体的。

另一个是上峰周家边的德贵,姓什么不知道,当时 30 来岁。鬼子刚来那天,他到丁墅来玩,在村上阿梅家小房子门口被鬼子用刀杀死了。跑反回来后,我们看到他还躺在那里,没有人去收尸。

丁墅村西头原来有座丁墅庙,有三进,很大,1958 年才拆毁。

(贾东根的妻子贾冬英插话)跑反时我 9 岁,也在东葛庵躲过。东葛庵的房子没有烧掉。我娘家在老伏牛,老伏牛的房子全烧光了,但没有人被鬼子杀死。村上的人全跑光了。

57. 朱正仁口述

朱正仁,男,1923 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路西下曹村

调查时间:2004 年 12 月 2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82 岁,属猪。跑反时 14 岁。

我大哥在冬月初二就跑了。我是冬月初四一早跑的,空身一个人,跟着村上一大群人跑。我父亲是冬月初五跑的,他看到日本人在村上又烧又杀,实在待不下去了才跑的。

跑反时,我们先到万安。反动派(指国民党军)在村外的碉堡里打机

枪,子弹“扑扑”地打过来,对路上的人打。我们就往西跑,经过神家庄、许巷、桦墅、龙潭,跑到了北圩。父亲走的也是这条路,我们是在桦墅的亲戚家碰头的。腊月底,快过年了,我们从北圩回来。汤山那边走不通,还是从许巷那边回来的。后来又上土桥,在长埠厂二姐家住下来,到三月里才回到下曹。家里房子烧掉了,什么也没有了。一家大小13口,就住在柴房里。后来到山上砍点松树,盖点草房。没有吃的,就卖柴买米,天天喝稀的。

我头一次见鬼子,是从北圩回来挑粮食的时候。来了三个鬼子,把我们叫到一起,关在屋里。鬼子拿出一个圆筒,有这么长(约20厘米)、这么粗(直径约5厘米),一擦,一摔,就直冒烟,呛得人喉咙吃不消。那东西只冒烟不起火,鬼子是来呛我们的,不是杀我们。他们把我大哥和陈友发抓到了汤山街上的农民教育馆,要他俩去送菜。夜里,我大哥问鬼子要了张白纸,说要去出恭(大便),趁机就跑回来了。剩下陈友发一个人把菜送到了镇江,活着回来了,他家里的人急得要死。

我父亲叫朱社林。冬月里有一天,他跟了许多人从北圩回来,到了孟塘就被鬼子拦住了搜身。四五十个人一个一个地搜,有嫌疑的就拎出来站在一边。搜完后,有嫌疑的三个人当众就被开枪打死了,其他人统统往北赶,不让去汤山。那天在孟塘被打死的三个人是:魏仪村,下曹村人,50多岁;朱正寿,下曹村人,30来岁;×××,徐家边人。

魏仪村身上有件小褂子,是当兵的穿的。日本飞机轰炸炮校时,炮校的人住在他家,把一件小褂子给了他。跑反时,他穿在身上,被日本人查出来了。

朱正寿给中央军送过差,中央军给了他一身衣裳,一件棉袍、一件大褂,都是老百姓的衣服。但口袋里有一张照片被日本人搜出来了。一看,不是他本人,就把他拎出来了。

徐家边的那个人也是穿了一件当兵的穿的小褂子。他曾给中央军烧过饭。

这三个人是当着大伙的面被打死的,离我父亲不远。我父亲当时不知道鬼子晚上不出来,要是知道,他们就不会在大白天走了。在晚上走,就碰不到鬼子了。后来,他们从孟塘回到了北圩。

我们村上的王发银跑反时没有跑,留在村上了。他见鬼子来了,就躲在窑笼里,结果被鬼子抓差抓到高庄。在那里,塘边有个女的死了,旁边有个洞,洞里有小孩在哭。鬼子对准洞里开枪,把那个小孩打死了。

王发银被抓到了半边山,那里有许多日本伤兵和枪支、武器,鬼子要他们抬。有个塘泽人抬到干东那里,想逃,鬼子把他一掀,推进了塘里,又开了一枪把他打死了。高堰有个老头,挑不动了,在上峰歇了歇,在更楼那里想逃,被鬼子发现了,也是一枪打死。万安的贾欣尚,他家很有钱,挑枪实在挑不动。到了丁墅过来一点的五家桥,就喊:“先生,我实在挑不动了!”鬼子就把他挑的几支枪分给别人挑,然后把他一枪打死了。那天被鬼子打死的送差人不知有多少呢,都是王发银亲眼看到的。

有一天,鬼子给王发银和朱正福一人一条牛,让他们骑上去,然后用劈柴嗨牛(敲牛),让那牛直奔,把朱正福摔下来了。鬼子又把一支假枪给朱正福,和他练刺杀。朱正福的好几个指头都被砍断了。他走到炮校小西门就再也走不动了,家里人知道后就把他扶了回来。

日本人刚来的那天,我们村的王洪远(当时60多岁)出门去看看,在村东被鬼子打死了。他的一条腿打断了,被人摔在草堆上,没人管。

跑反时,下曹村有三四个妇女被日本人强奸了。安民后,日本人不来找花姑娘了。

我们村上的房屋大部分没有烧掉。被烧掉的有四五家,都是瓦房,好房子。

我从北圩回来时在许巷那里看到了许多广东兵的尸体,多得不得了,密密麻麻的。他们穿单衣的多,有的穿件小背心。跑反前我们在西梅挖壕沟时广东兵就过来了,穿得那么单薄,冻也冻死了。

58. 陈秀华口述

陈秀华,女,1928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路西丁墅

调查时间:2004年12月17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77 岁,属龙,娘家在丁墅,婆家也在丁墅。跑反时 10 岁。

冬月初五跑反,当天下午鬼子就来了。我是跟了我母亲和七八个老太一起跑的。父亲眼睛瞎了,没有跑。当天,我们跑到了高庄的葛家边,在地沟子里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跑到石窝里(石地村),碰到了鬼子。母亲是小脚,爬水坝没爬上去。鬼子向她打了两枪,头一枪把她的手指打断了,第二枪打中了她后脖正中间,打了一个洞,流出来的血像杀猪一样多,当时就死了。这两枪也打在我身上了,第一枪打在我左手,第二枪打在我屁股上,现在还能看到伤疤。打在我左手上的一枪有一个螺丝样的皮留在手背上了,每年冬天要流许多脓,但一到春天就不流了。在我 15 岁那年,我掏口袋里的瓜子吃,这块螺丝样的皮就脱出来了,伤口慢慢就好了。这块东西在我手背上整整理了 5 年。



陈秀华(左)

我屁股上挨了一枪,当时流了许多血,也不能走路了,天天出脓。过了 40 多天,一个脓头挤出来,伤口就慢慢好了。

母亲被打死后,我就回到家里跟瞎眼父亲过。家里的房子烧掉了,床也被敲掉了,衣服被子什么也没有了,冬天里天天同瞎眼老子拱在稻草窝里睡。

跑反时,我大哥和二哥都跑散了。大哥被鬼子拖到汤山的兵工处,在那里待了一个多月,有一天夜里才放回来的。回到家里,一看母亲死

了,房子又烧掉了,大哭一场。二哥在外面帮人干活,后来也回来了。我13岁那年就嫁到这里来了。

我母亲是冬月初六被鬼子打死的,当时她48岁。她是小脚女人,5寸布就能做一双鞋。

我们村上有个地主叫胡昌华,开小店的,很有钱,有大小两个老婆。大老婆当时60来岁,小脚,跑不动路,又舍不得家里的东西,没有跑反。冬月初五鬼子刚来那天,他们抢东西,她以为是中央军,就同他们吵,喊:“你们造反啦?没有王法啦?”鬼子一刀就把她刺死。她没有生过小孩。

还有一个人是周家边的,叫老德贵,姓啥不知道,四五十岁年纪,也是鬼子刚来那天被刺死的。

还有三个人是被鬼子拖差拖到别的地方了,死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没有找到尸体。一个叫周来友,一个叫戴佳友,还有一个姓胡,外号叫“兔子”。他们三个都没成家,没有后代。老德贵的女儿给了周来友,还没结婚就被鬼子拖出去了。戴佳友有童养媳,没有结婚就出去了。

59. 陈恩国口述

陈恩国,男,1929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丁墅

调查时间:2005年7月7日、22日

调查人:费仲兴、王健、李展腾

我今年77岁,属蛇。跑反时到了神家庄,第二天又跑到涧南,过了一个礼拜就回来了。涧南那里鬼子杀的人可多了。有个人躲在一个地洞里,鬼子看到了,就用长刀砍,他半边脸砍下来了,耳朵和脸皮塌下来,没有死,回家了。鬼子顺着滴滴拉拉的血找到他家,又把他从床档里(床底下)拖出来,拖到外面用刺刀刺死了,我亲眼看到的。

后来我们就回来了,没住在村里。先到万家村,躲在人家家里,躲了十来天,又到石狮沟等地方。

丁墅庙原来有三进九间二厢。打仗的是广东兵,同日本人打,时间不长。丁墅庙的墙上全是弹孔,有轻机枪的,也有重机枪的。打仗时我

没看到,听人讲的。广东兵没有棉衣穿,从炮校里领的棉衣。他们讲:“要不是炮校有棉衣,我们早就冻死了。”打仗时,鬼子有一个气球,黑黑的,鬼子跟了气球走。

鬼子刚来时,把胡家大奶奶打死了,她是周家边人,当时 50 多岁。胡家的老管家叫金德贵,也是周家边人,他对鬼子喊:“你们造反啦?”一看他们的帽子不对,是日本人,就逃往村西的水塘边,被鬼子一枪打死了。

(7 月 22 日补充)丁墅还有一个常禄寺,就在村里,不大。跑反前,日本飞机过来炸炮校,炮校几百头马都在我们村拴着,常禄寺和丁墅庙里堆满了马草。后来鬼子打来了,常禄寺烧掉了,丁墅庙的后进也烧掉了,前进没有烧掉。

60. 周达口述

周达,男,1920 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丁墅 54 号

调查时间:2005 年 7 月 22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86 岁,属猴,跑反时 18 岁。我是在冬月初三或初四一个人跟了别人跑的,跑到了涧南,第二天鬼子就跟上来了。我躲在外面的草窝里,鬼子从草窝里抓人,抓一个杀一个,杀了三个人,第四个就轮到我了,突然吹哨子,鬼子就走了,我差一点点就没命了。

我们村的阿梅,姓周,三十来岁,在涧南被鬼子杀死了。

我们村的戴佳友,比我大 2 岁,个头也比我高,在涧南被中央军拖差拖走了。第二天鬼子到涧南,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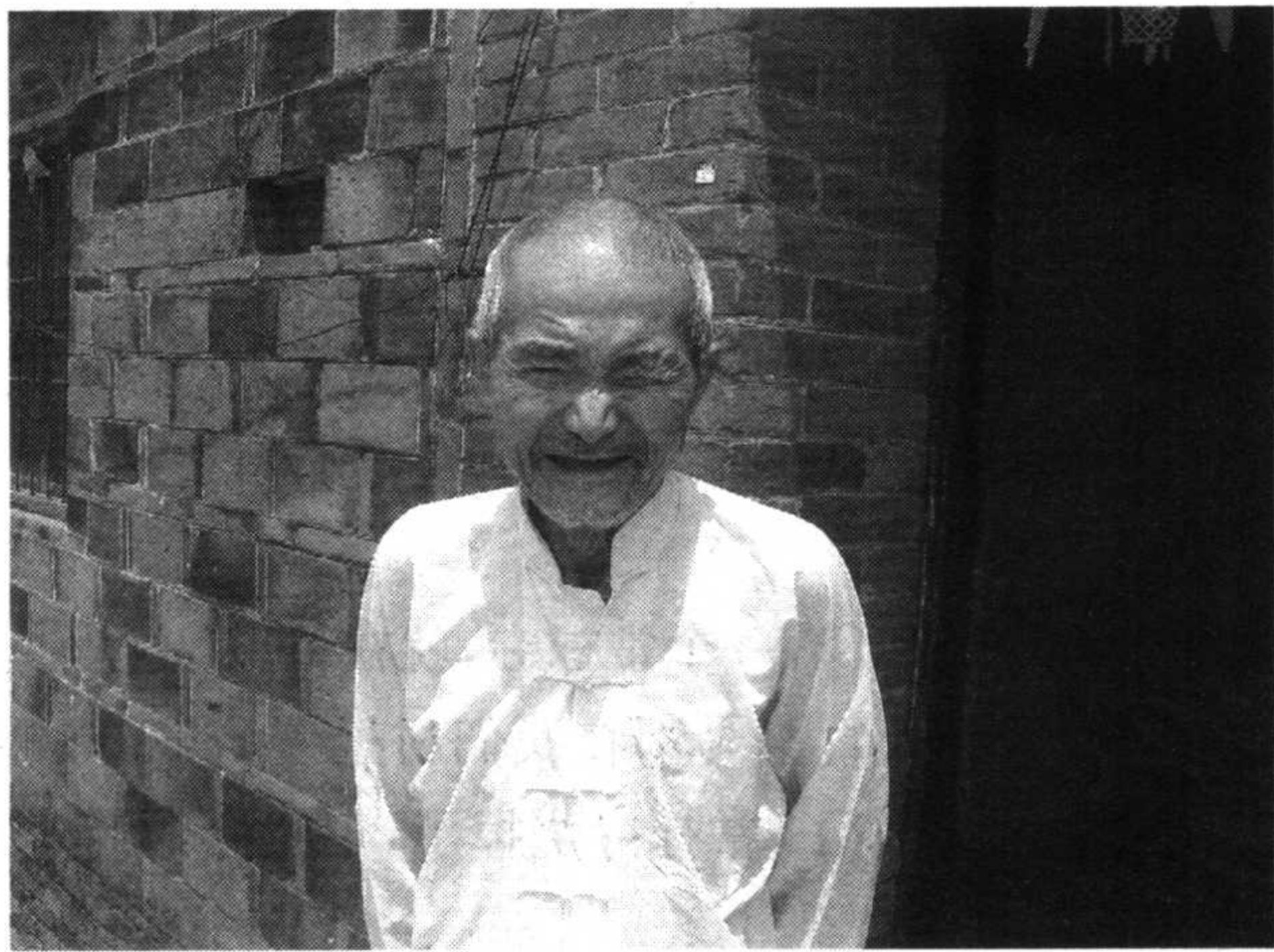
鬼子刚来的时候,在石地村开枪打死了我们村的三个人:

陈秀华的母亲,姓周,小脚;

周老三的老婆,当时三四十岁;

周保生的母亲,当时三四十岁。

鬼子打到我们村上,用刺刀把胡昌华的大老婆刺死了。她家在村东



周达

头开了个小店,她不知道来的是鬼子,以为是中央军,就在小店门口被刺死了。金德贵看到鬼子杀人了,撒腿就跑,跑到墙脚边,被鬼子追上,一刀刺死。胡昌华的大儿媳是个瞎子,人长得漂亮,当时三十来岁,被鬼子强奸了,就在家里上吊自杀了。她娘家是沧波门的,姓什么不知道。胡昌华有三个儿子,胡志金、胡志银、胡志穆。解放后,他家划成了地主。

鬼子占领了炮校,住些日子就走了。老百姓就到炮校去拆东西,先拆料后拆砖,大楼也嗨(敲)掉了,鬼子也不管。鬼子在汤山八年,后来鬼子投降了,外面一个也看不到,他们说走就走。在龙潭那里,有人把鬼子头上的帽子扭过来,朝后戴,打他们,他们也不敢还手了。

61. 张家琪口述

张家琪,男,1915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建设大凹

调查时间:2003年1月16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7岁,再过几天就88岁了。14岁那年到南京当学徒,在南京太平路花牌楼王吉昌纸店当店员,卖各种各样的纸,一年回家一次。

大凹原来叫红庙村，有一座小庙。解放前，村上人不多，就十来户，姓张的就一户，现在人多了，姓张的就有十来户。

我兄弟六个，我是老四。鬼子来时我 22 岁。母亲说：“你们分开跑吧，东西南北都可以去，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了。”我和我老伴带了我大哥的一个女儿，三个人向西跑。我们在插花（地名，在孟墓村西南）住了一夜，第二天再跑。从神家庄、坟头，一直跑到栖霞，住在一座古庙里。在那里住了三四天，鬼子没进庙动菩萨。后来听说大凹这里情况还不要紧，我们三个就趁天黑回家了。

过了一两天，鬼子进村了，要找花姑娘。他们一共来了三个，两个在屋里强奸妇女，一个在门外把守，拿着枪来回走。那天，孔祥仁（20 岁，比我小）抱着他的头生儿子同我们大伙坐在一起。后来那小孩睡着了，他就把小孩抱回家去。在家待了一会，他觉得害怕，又跑到我们人多的地方来。他这么一走动，被鬼子发现了，鬼子抓住了他，把他推出去十来步远，在一个水塘边一枪把他打死了。我们都是亲眼看着他被打死的，谁也不敢动啊。孔祥仁的儿子叫孔令文，现在就住在村后边。

那位被强奸的妇女长得蛮漂亮的。强奸她的日本人大概是个军官，以后每次来大凹，他都找她，门口有日本兵把守，不许别人进去。所以村上的房子没有被烧，别的妇女也没遭难。但是有一次，一个日本兵逼着一位妇女同一个男人干那事，男的不肯，日本兵就用刺刀刺他的屁股。男的只好干。事后，日本兵又叫女的丈夫去舔，他们站在旁边看。

孔祥仁的堂弟孔祥素死得更冤枉了。有一天，一个日本兵牵了一头牛从古泉过来，到了大凹村口，碰到孔祥素，就叫他牵着牛站在原地不能走动，鬼子自己进村找花姑娘去了。转了一圈没找着，回头就去找孔祥素。孔祥素把牛拴在路边，跑了，但没有跑出去多远。鬼子远远地发现了，便向他开枪。另外一个鬼子听到枪声，也从村里跑出来。两个人一起向孔祥素开枪，打了好多子弹，把他打死了。

孔祥仁的堂兄孔祥忠也是被日本兵打死的。鬼子到红庙村拉夫，把孔祥忠拉走了，到了黄栗墅，要他把菜送到句容去。孔祥忠躲在一间破屋里藏起来，鬼子找到了他，就开枪把他打死了。

我们大凹就这三个兄弟被日本兵打死了，别的没听说过。

我自己也被日本兵拉去送过菜。同去的还有我的一个哥哥和另外一个姓李的。我们先在汤山中学那个地方集中,然后用黄包车把菜拉到句容,再拉到东昌街,在那里歇一夜。三顿饭还是给我们吃的。晚上,日本人用铁皮饭盒放点米,放在火上烤,煮熟了就倒在一块石头上,每人给一把勺子,让我们吃。第二天,我们一直拉到镇江市的江边。那个日本兵说:“你们开路开路的,我也开路开路的。我走大路,你们走小路。”那辆拉菜的黄包车摔在镇江,不要了。

我们赶紧往回跑,到了腊月二十四才回到大凹,脚上的水泡有好几个。家里人都吓死了,不知道我们跑到哪里去了。

62. 张文孝口述

张文孝,男,1933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建设殷家边

调查时间:2004年1月22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是汤山建设大队殷家边人,今年71岁。我没什么文化,但记性特别好,以前卖豆腐,哪个村上谁欠了我多少钱,我从不记账的,都记在脑子里,清清楚楚,过了半个月,二十来天,人家想赖也赖不掉。我跑的地方多,附近一带什么地方都去过,情况熟悉。

鬼子刚来时我还小,不懂事。鬼子在汤山八年,后来我就懂事了,印象最深的就是同哥哥一起去捡日本人的炮弹。那时候我十二三岁,不像有钱人家的小孩成天躲在家里,我是天天在外面跑,一看到日本人打炮了,就赶去捡炮弹。

日本鬼子打的炮弹有好多种。有一种叫葡萄弹,是在半空中开花的,声音很响,像冰雹一样噼里啪啦掉下来,要是掉在房顶上,瓦片都砸碎。这种弹里面装360粒锡豆子,也叫锡弹子,同小孩子玩的玻璃球大小差不多,略微小一点。都是锡做的,圆溜溜的,掉到地上能钻进土里20多公分深。我们用铁丝往洞里戳,听到咯啦咯啦的声音就用锄头挖,一挖一粒,捡起来可卖钱。

还有一种炮弹是两节头的,掉下来成两节,头归头,筒归筒。筒子有9斤的,也有25斤的,一般常打9斤的。筒子里是生铁的,能卖钱,专门有挑高箩的人(收废品的人)来收,头是铁的,不值钱。那种筒子为25斤重的炮弹也是头归头筒归筒,炮弹打进地里形成一个洞,筒子再从洞里退回来,躺在地上雪亮雪亮的,老远就能看到。

日本人打的这种炮弹,国民党没打过,解放军也没打过。我捡到一个头和筒子连在一起没有炸成两节的炮弹,用手拧几下就把筒子拧下来了。筒子里面是一根紫铜管,有这么粗细(直径约3~4厘米),上面是一个莲蓬头一样的盖子,盖子上有许多小圆孔。最往上头就是一个黄铜的铜头,1斤4两重。这些零件的重量是不用秤的,卖给挑高箩的人,一看什么零件,就知道什么重量,根本不用秤。

筒和头落到地上就分成两节,总是筒归筒,头归头。头子上面还有一个小头,有2两重,里头有撞针,一碰到地上就炸了。这样的炮弹我们捡到很多,卖钱也多。另外有一种马令钢的,弹片炸得碎,又卖不上几个钱,我们是不捡的。

那时候日本人打炮,一般就把炮架在炮校里面打,但有时候也拖出来打,用马拖到上曹村殷家边来打。那炮都是铁轮子,实心的,一出炮校的门就能听到格啦格啦的声音。一路上都是二片路^①,声音大得很,老远就能听到。鬼子军官一人一把东洋刀,小兵一人一把带刺刀的枪,穿的皮鞋都打铁掌子,走在路上声音很响。他们把炮拖到殷家边,马就拴在村上。射击的目标,有时是钢筋上插个假人,有时是临时堆个土堆。也有直接瞄准炮楼打的。那个水泥浇的炮楼现在还在,窗户上打了个大窟窿。日本鬼子打炮一般就打一两公里。一塔、二塔和三塔是观测塔,三塔不常用。日本人在塔顶挂红旗子,像灯笼一样的,挂在东边就朝东打,挂在西边就朝西打。后来国民党回来打炮,就打得远了,一般是往半边山打。

只要日本人打炮,老百姓就去抢炮弹,打一发抢一发,不怕死的。每

^① “二片路”是农村乡言。大石块铺的路叫大片路,中等大小的石块铺的路叫二片路。

次打炮,总有 100 多人围着,抢着捡炮弹。我们村上有个人叫侯国林,跟我同年。他父亲叫侯良材,常去捡炮弹。有天,侯良材同另外一人为捡炮弹而打了起来,侯良材用铁锹对准那个人打,那个人就向后退了几步。这时,恰好有一发炮弹打过来,落在侯良材身边,他就被炸死了,一条大腿飞到几丈远的田里。那个向后退几步的人叫金世明,是上峰周家边人,他老婆现在可能还活着。这个姓金的没炸死,但耳朵震聋了,后来变得像傻子一样。这个人两年前才去世的,有后代。他舅大爷是我们殷家边的曾三国、曾三保,一问就问到了。

日本人的炮弹炸死了老百姓,他们是不管的。但有一次,有位老太太在自己家里切菜,切的是蒲芹和百叶,正准备上锅呢,突然一发炮弹从土墙外打了进来,炸成了两节头,老太太死了,但身上看不到一点伤痕。她老头马上跑到炮校告诉鬼子,鬼子就停下来不打了,派了一辆卡车,载了几个人来看,一查,没有看到伤口,最后就赔了一口大棺材。我亲自去看的,日本人打的就是两节头的闷弹。老太太有个儿子,叫魏酬明,今年快 80 岁了,你可以去问他。

日本人对他们自己的伤兵也是很凶狠的。我亲眼看到好几次,在岔路口那里(即今宁杭公路两个加油站的西边,大圆盘那里),架起一堆劈柴,浇上汽油,把那些断了腿不能走路的伤兵往火堆上放,活活烧死,有的伤兵就哇哇地乱叫。烧死后,骨头就埋在工人疗养院后头的小山岗上,即养龙山庄那个地方。所以,日军无伤兵,因为伤兵都烧死了嘛。

日本人经常强迫老百姓到炮校干活,老百姓就叫小孩去顶替。我们每次都是从炮校北边宕子村那里的一个小门进去,日本人站在门口检查,年纪实在太小的就不要。我去干过好多次,搭黄瓜架,种菜,干杂活。我们从炮校拖了铁板车出来,到老靶场(陈达村的新民村)种菜。那时候那里没围墙,就几间小房子,几个日本兵住在里面,带班种菜。干完一天就给每个人分一小杯发霉的米和十支雪格拉牌子的香烟,也是发霉的。有时候,有少数妇女也去干活的,一般在厨房里干杂活。她们都是家里没有男劳力,逼得没法才出来抛头露面的。那时候干活就是磨洋工,日本人来了就干点,他们一走就不干,磨洋工就是这样叫出来的。这都是情况稳定后才这样。鬼子刚来时我还小,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在我们村上看马的小兵,他闲得无聊。当时我家养了许多小鸡,他听到小鸡叫,就要我们抓给他玩,玩了一会就用手捏死。再要一只,玩一会又捏死。一只小鸡给一包雪格拉香烟。还有,我们村上有家开糟坊(酒坊)的,听到日本兵的走路声,就马上关门。鬼子也不管你关门开门的,一腿就踢开,要喝酒,又不给钱。

上面讲的都是我亲自看到的。听别人讲的事就多了,比如,上曹村董友良的母亲,跑反时躲在大凹老虎洞附近一个土洞里。鬼子在汤山山顶上架了机枪往下扫射,她被打死了。

我还听人讲,有一次一个日本鬼子骑了匹大马到大凹,抓来一个妇女和一个老太,要强奸她们。老太只好依他。鬼子没地方拴马,就把缰绳栓在自己脚上。老太手里有把伞,说要打开了伞才能干,不能躺着脸朝天的。谁知伞一打开,那马就惊了,把那个脱光了衣服的日本兵拖了好远好远。

还有一次,一个鬼子抓了一个女的和一个男的,要这两人当着众人的面干那事,男的吓得发抖,怎么也硬不起来,日本兵就用枪托打他。村上有个甲长就走过来,说:“太君,我能硬起来,让我来干!”这样,日本兵就站在旁边看,把那个没硬起来的男人放了。

63. 魏酬良口述

魏酬良,男,1926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建设殷家边

调查时间:2004年1月23日

调查人:费仲兴、邵长伟

我今年78岁,是属兔的。我15岁那年(1941年)夏天,母亲正在厨房切茄子和辣椒,准备下锅炒菜。突然,鬼子一发炮弹从山墙那边打过来,炮弹炸成了几块,其中一块挺大的(用手比划,约8公分大小,圆溜溜的)弹片从墙上弹回来,砸在我母亲下巴上,骨头打断了,流了许多血,当时就倒在地上,再也没有过门(醒过来)。我父亲魏家富急得不得了。这发炮弹击中我家的房子,日本人从反光镜(望远镜)里看到了,立即歇下

来,不再打炮了。很快,他们开了一部车子过来,作厂的高从松陪着一起来的。他们只说看看,别的啥也没有说。看完以后就回去了。过了不久,他们用车拉来一口大棺材,别的什么也不赔。

日本人打的那种炮弹叫生铁榴,9斤重的,一般是不炸的,那次打的炮弹炸开了,炸成了几块,厚的地方有这么厚(约2~3厘米)。这种生铁榴的炮弹值钱,另外一种炮弹是马令钢的,那种东西不值几个钱。还有一种装锡弹子的炮弹,弹壁薄得很。

除了这一次外,我家还有两次遭到日本人的打击。第一次是在我母亲被打死之前。那天,我家的窑正在烧瓦,日本人的一发炮弹掉在窑上,炸开来了,几千块瓦全碎了,他们什么也没有赔。

第三次是在我母亲被打死之后,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有十一二个人在炮台那边捡炮弹,干累了就一起躺在瓦棚子里睡觉,都是年轻小伙子。有个日本人跑过来,看到这么多小伙子大白天集中在一起睡觉,便怀疑他们是新四军,并怀疑有枪支藏在我家里。日本人就到处搜,搜来搜去没有搜到枪,就打电话叫来一部车子,把他们捡的铁全部拖走,把我家烧好的一窑砖瓦也全部拖走。后来,他们知道这些小伙子不是新四军,搞错了,就给我们一些大米和干面,还有十斤油,叫一个人挑过来的。这一窑砖瓦,就值这么一点点。后来,日本人用这一窑砖瓦在作厂下边(今作厂中学东南边宁杭公路下坡处)盖了个门诊所,给老百姓看病。他们给老百姓看病倒不收钱,就是不肯给我家赔钱。

我们村王锦明的两个叔叔都是被日本人打死的。有一个叔叔叫王培仁,他看到村上杨锦林家的房子着火了,便去救火。日本鬼子看到了,就把他一枪打死了。另一个叔叔叫王培礼,也是在村上被打死的。为什么被打,我不清楚,我没看到。当时,日本鬼子想打谁就打谁,把中国人不当人的。

跑反时,我跑到南京西善桥我姨娘那里。那个地方被鬼子打死的中国人海咧(多得很),路上一堆一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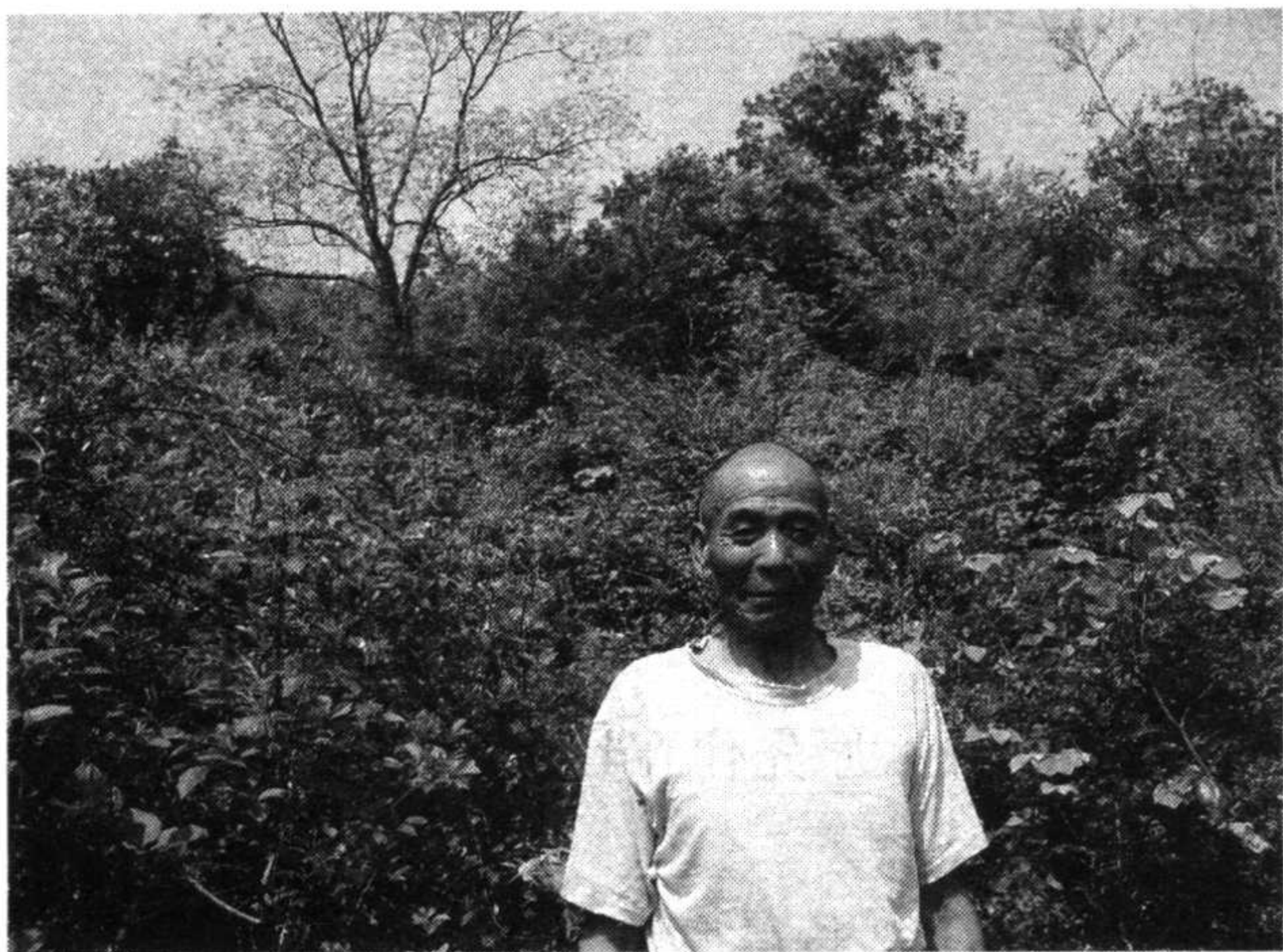
64. 李万忠口述

李万忠,男,1929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建设大凹

调查时间：2004年4月21日

调查人：费仲兴、龚秀芬



李万忠

我今年76岁，属蛇的，老伴叫王桂英，74岁。大凹是由红庙、石冈两个村合起来的，我们是石冈的。

老虎洞下面那个大洞现在堵死了，进不去。这个洞以前可能开过矿，洞前的路渣是黑的，不知是哪个朝代开的矿。

跑反时我才9岁，有些事记不清。我二姐李爱弟比我大6岁，跑反时她在山上跑，被鬼子开枪打伤了，没打着骨头，后来涂点草药就慢慢好了。当时，许多人都躲在老虎洞里，大洞里有五六十个人呢。这个洞冬暖夏凉，这么多人躲在里面不算太闷。我们下去时没有梯子，有大人下面一个一个地接的。进洞后不久，李小友（当时20来岁）和他的嫂子吵起来了。他抓住一块大石头往上爬，结果，石头掉下来，他当时就砸死了，一动也没动。其他人一看砸死了人，就全乱了，不敢再在洞里了，都往上爬。我在洞里只待了天把天，出来后就跟了我大大（伯父）跑到苏北灌南县，鬼子投降那年才回来。

我们村的李小五，三十来岁，人长得特别漂亮，还穿着大褂子（长衫），日本人看着不顺眼，说他是中央军，当着村上许多人的面把他拎出

来,拉到石冈的山凹里,开枪把他打死了,我亲眼看到的。

过去,大凹这个地方是靶场,国民党老打炮,日本人来了也打炮。日本人打的炮弹有的炸了有的没炸。炮弹里的锡弹子,有玻璃球那么大,当时随便哪儿都能捡到的。

65. 张家典口述

张家典,男,1920年11月27日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建设大凹

调查时间:2004年4月21日

调查人:费仲兴、龚秀芬

我今年85岁,属猴的,原先住在红庙,1952年搬上来的(指搬到大凹)。

鬼子打来那年我17岁,长得很瘦,看起来像小孩。鬼子的部队是走炮校—汤山—侯家塘的大路去南京的,他们不敢走岔路。我们这里偏,就丢下了。

冬月初三,鬼子进了红庙,我亲眼看到的。许多人躲在老虎洞里,我也下去看过两次。洞里有人的骨头,还有铜板、饭碗,很早以前就有人在里面躲过。洞是早就有了,听我爷爷说,以前洞里有老虎的。跑反时,这一带还有野猪和狼,现在什么也没有了。老百姓在洞里待的时间不长,因为有块大石头掉下来砸死了一个人,大家不敢躲在里面。

日本人到了我们村上也不厉害,许多人没跑反,我也没跑反。日本人在红庙没烧房子,只烧了几个柴堆。

鬼子来了两个礼拜的样子就到村上来拉夫。孔祥忠被拉去了,他害怕,就跑,结果被鬼子开枪打死了。孔祥忠死时三十来岁, he 有三个儿子,现在都过世了。他的弟弟孔祥书,二十来岁,没成家,躲在红庙后头的洞里,一钻出来就被日本人看到了。他就往山上跑,鬼子打了两枪,把他打死了。还有一个孔祥仁,23岁,阴历三月下秧的时候,他抱了个小孩在墙根边晒太阳。有个鬼子在汤山喝了点酒,跑到红庙来找妇女。他一看孔祥仁脸白白的,便说他是中央军,叫他跪在我家门前的水塘边,后来

一枪把他打死了。当时我们都亲眼看到的。

我们村有个女的,三十来岁,个子不高,胖胖的,姓袁,是外地来的。他男人跟了炮校的人撤到内地,当上了炊事员,寄了一张路单给她,说如果愿意结婚就按路单上写的地址去找他。他也给红庙村上寄了一张路单,要我们村照应她。日本人打来了,她走不掉了,就留在村上。后来日本人到红庙来,她就去招待日本人,同他们睡觉。也不是什么自愿不自愿的,她在外头跑的,对这样的事无所谓。她招待日本人前前后后有三四个月。后来稳定了,不准瞎搞了,她就跟了另一个男人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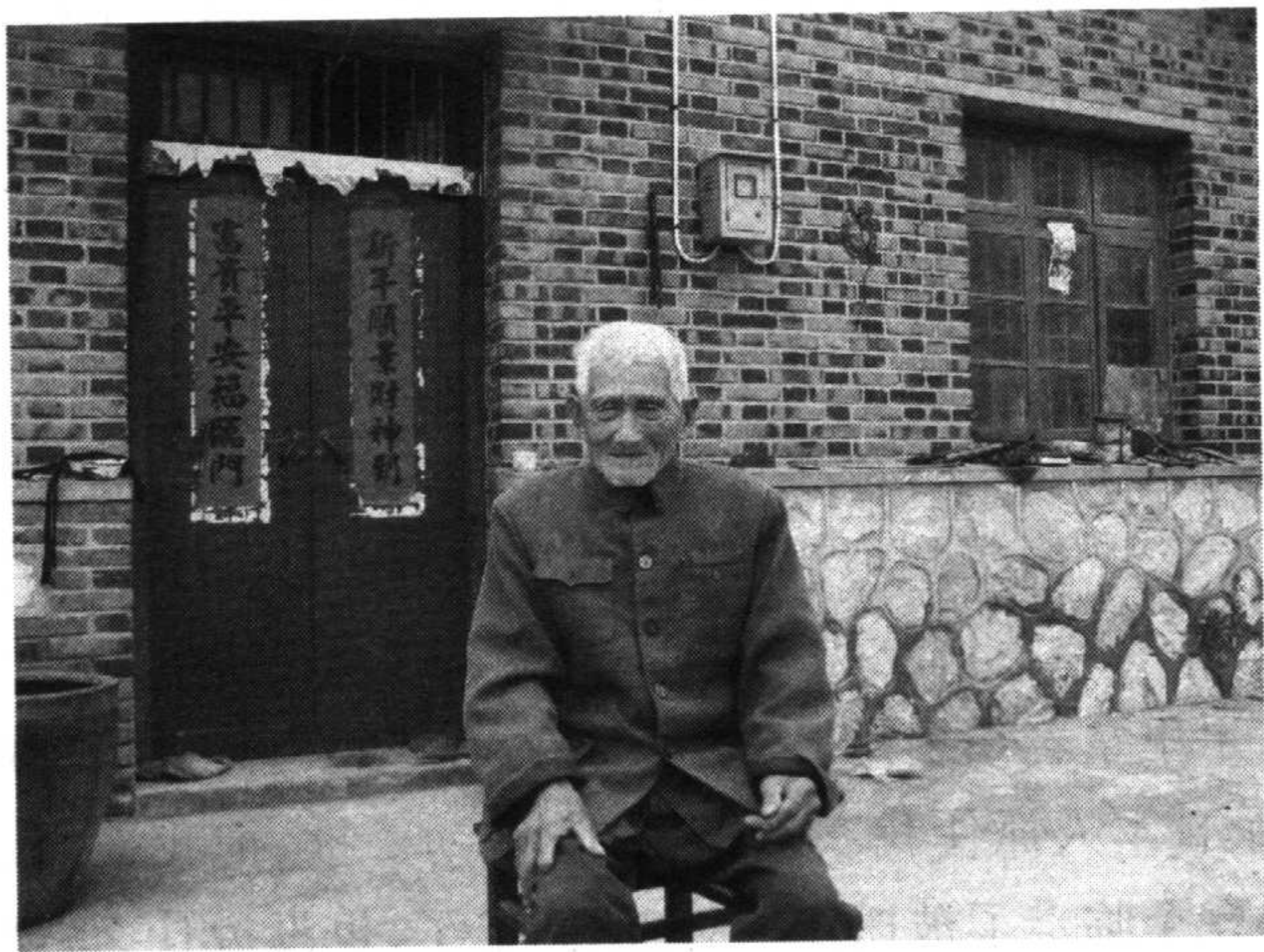
66. 戴新炳口述

戴新炳,男,1911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建设黄塘庵71号

调查时间:2004年5月16日

调查人:费仲兴、贺国庆、张莉



戴新炳

我是宣统三年(1911年)生的,今年94岁。日本人打来那年我27岁。那时候身体棒极了,可有劲了,腰也不驼。跑反时,我家三间草屋和看守桃园的五间草房都被日本人烧掉了。我把菜刀磨快了,拿在手里,衣袖卷了卷,想去杀日本人,被母亲拦住了。村上人都说不能去杀,要惹

祸的。我是杀猪的,杀两个日本人肯定没问题。他们都拦我,我就没去。在半边山那里,有两个日本兵让两个老百姓抬着上山,抬到半路,这两个人拿起棍子就打,把鬼子打死了。半边山那里树林密密的,打死就打死了,也没惹什么祸。

我老家是句容的,后来才搬到黄塘庵。家里开槽坊,两个大爷都做酒,我家也做酒。父亲腿有残废,不能走。跑反时,父母亲都没跑。我先跑到土桥,后来又跑到龙潭北圩,住在朋友家里。第二年农历三月才回家。中间,经常趁天黑回来取粮食。晚上到家,第二天白天躲在山上,天黑了再赶路。日本人晚上是不出来的,他们人少。

跑反时,我们村有六个人被日本人打死。一个叫夏小旺,20刚出头,跑反刚开始时才娶老婆,没过几天就在村上被日本人开枪打死了,他这一家就绝门了。还有一个叫赵永富,是跑反刚开始时在我们村外头的田里被日本人看到后开枪打死的。打的时候我没看到,过几天收尸时我亲眼看到的。还有一个叫戴小丁,三十来岁,是我们本家的。日本人进村后抓住了他,把他拖到水塘边,叫他跪下,然后用小手枪把他打死,脚一踢,把他踢进了塘里。这也是我亲眼看到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村王老师的二伯王兴贵,他是跑反时在姚家边槽坊里被日本人烧死的。还有三个是在炮校那里被打死的,一个叫王朝金,一个叫朱祥荣,另一个是外村的,不知姓名,都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我差一点点被打死,真是命大。这事情的经过我全知道。那年快过年的时候,腊月里,日本人抢了许多鱼、肉和大米,要我们送到炮校,都是两个人抬一箩,抬着去的。第一次抬到炮校,日本人给我们吃糖果,抽香烟。第二次去,也是四个人去的,一个日本人手里拿着一袋铜板,往我们每人手里发,发完后就叫我们走。刚出门,一个日本人抓住我衣服摇了摇,使劲一推,把我推出了门,我就走了。另外三个临走了被抓住,不让他们走了,也没说什么,就把他们开枪打死了。那时天已黑了,我从炮校西门跑出来,摸到万安,天又下着小雨,摸到家里已是深更半夜了,一家人都哭死了,以为我回不来了。后来数数身上的铜板,丢了不少,也不管它了。能活着回来,就算命大了。

日本人没打过来的时候,他们的飞机就过来炸了。我们都看到日本飞机和中国飞机在天上打。日本飞机一天要过来两次,每次一来就有几

十架,厉害得很。日本飞机一来,炮校就拉警报。在句容那里,有两架日本飞机被中国人打下来了。那年秋天,日本飞机轰炸炮校,炸弹没投准,落在炮校旁边的小山上,炸出了两个大坑,比我这房子还大。后来,那里开窑厂,挖土烧砖,那座小山也挖掉了。

日本人打过来之前,国民党就叫老百姓挖战壕。我弟弟是保长,天天喊人挖战壕。战壕还没挖好,日本人说来就来了,许多挖战壕的人都来不及逃走。日本人一打过来,沿公路放大气球,那气球不高,日本人到哪里,气球就放到哪里。在汤山这里,日本人和国民党没打什么大仗。国民党的军队是四川兵,穿的都是单衣,衣服撕烂的,撕破的,又吃不饱,一天只吃两顿。他们在村上住了几天,天天问我弟弟要粮食,给少了又不够吃。他们也有抢东西吃的。还有的人抽大烟,没大烟了,走路都走不动。后来日本打过来了,他们就沿着汤山跑,往南京那边跑。

日本人投降后,枪没有了,还站岗。他们洗的衣服、被子都被老百姓收走了,也没有办法。后来,国民党政府给他们发了几支枪,但没发子弹。他们不住在营房里了,队伍一起拉到龙潭,住在山上,后来就回国了。日本人住在龙潭山上的情形我没看到,是听别人讲的。

67. 侯国珍口述

侯国珍,女,1918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建设上曹村147号

调查时间:2004年11月29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7岁,属马,跑反时20岁。跑反时我们一家走散了,我到了大凹,躲在洞里。后来又万安,村上人杀猪宰羊给鬼子吃。有六个人被鬼子带走,要他们扛东西。

我丈夫的二哥黄学银,鬼子刚来那天在大凹山里被开枪打死了。我丈夫的四弟,小名叫小四子,二十来岁,在万安被鬼子抓了去,在上峰村的一个塘边跪下来,一起跪的有六个人,都被鬼子打死了。

上峰石窝里(石地村)的九英子,不晓得姓什么,十来岁,在大凹的山

里,躲在一个柴堆前,被山上的鬼子开枪打死了。

我娘家的楼房、长厅被鬼子烧掉了。

68. 朱存义口述

朱存义,男,1933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建设上曹村38号

调查时间:2004年11月30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72岁,属鸡。跑反时,祖父母、母亲、大哥和我跑到了土桥三岔村,父亲在家看门。他原姓樊,小名小四子,招过来后改名朱久成,跑反那年他30来岁。

我们村前有个小庙,没有庙名。鬼子刚来时,父亲和另外一个人躲在庙里。他伸出头来望望,被鬼子看到了。鬼子把他们两个拽出来,拖了一百来步,到了水塘边,要他下去划水(游泳),从这边游到那边,再游回来。他游不动了,鬼子就把他拖上岸,叫他跪下,什么也没说就把他开枪打死了。另一个人没打死。这是祖父母和母亲给我说的。

69. 杨淑珍口述

杨淑珍,女,1933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建设个子山13号

调查时间:2004年12月1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72岁,娘家在殷家边,1957年嫁到个子山。

我父亲叫杨金邦。有一天,鬼子拉铁丝网丢了两根桩子,就把我父亲拖去,把他的锄头摔在塘里,要他下去捞。当时是大冷天,没法下去。我母亲迈着小脚走过去,同父亲一起跪下来求,跪了半天,冻得非常厉害,过了好几天才恢复过来。从此以后,父亲见了鬼子就特别害怕。当时村上常常要派小工到炮校去给鬼子干活,他就不肯去,每次总是由我

去顶替。我年龄小,就在厨房里拣菜,干零活。鬼子给我糖吃,我抓在手上不敢吃。干完一天,鬼子给我们每人发一小杯米,我们也不敢吃。

70. 谢福才口述

谢福才,男,1925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建设上案子桥30号

调查时间:2004年12月1日

调查人:费仲兴



谢福才(左)

我今年80岁,属牛,跑反时13岁。那年,我在浦镇的扶轮小学读书,这是一所由铁道部办的小学。鬼子一来,我们就跑到六合。后来鬼子到了六合,我们又回到了浦镇。15岁那年,我生母去世,父亲谢义禄在我11岁时已去世,家里没人了。我就回到了上案子桥,在汤山小学上到毕业。后来,又到南京龙蟠里的国立第二职业学校上到初中毕业(那所学校是汪精卫办的)。毕业后教过两年书,后来在汤山开过裕兴粮食行。因物价波动,粮食行倒闭了,我就回案子桥买了十亩田。解放后被评为“小土地出租”。1958—1969年,在大队当会计。

上案子桥有三个人被鬼子杀死。我没亲眼看过,都是听别人说的。

陈必大,四五十岁,跑反时带了他儿子陈国平跑到了北尚庄。陈国

平当时 20 多岁,曾在上海当过藤匠,跑反时穿了一身工作服,日本人以为他是中央军,要杀他,陈必大就去救儿子。结果,日本人用刀子把他们父子俩都杀死了,他们的尸体没人收。陈国平的女儿在寺庄大队当过妇女主任,现已退休。

丁德山,当时 50 来岁,留在家里没走。他有一幅财神菩萨的布像,日本人要,他不肯给,日本人就在陈正道家把他开枪打死了。当时没有埋,后来他儿子回来埋的。

我们家的几间草房被日本人烧掉了,但两间楼房没烧掉。丁德山、陈正泰家的房子也烧掉了。村上被烧掉的房子并不很多,只是一部分。

我父亲以前是开槽坊做酒的,养了许多肥猪。

71. 梁存兴口述

梁存兴,男,1914 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建设下案子桥(原住上峰镇高庄顾家棚子)

调查时间:2004 年 12 月 2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90 岁,属龙。民国 26 年(1937 年)冬月初五,鬼子到新塘西营房,一路烧房子过来。初五那天我们跑到神家庄,初六到涧南,歇了一夜。初七一早,八点来钟,鬼子就到了神家庄。大家都不认识日本人的亮月疤疤旗,那旗子一摆,日本人就到了涧南。难民全躲在一个祠堂里,日本人有的用枪打,有的用刺刀戳。涧南的南边有个长塘,只有半塘水,那里打死了十几个难民。我娘在塘边被鬼子戳了一刀,戳在腿上(说到这里,老人不停地流泪)。鬼子走到我面前,我娘拉着我的膀子。鬼子看看我的帽子,再看看我的衣裳,要我给他背背包。五六个句容来的难民说:“他们要你背东西,就不会杀你了。”我就背了东西跟日本人走。我们在村上绕了一圈,看到了七八个死人,日本人就从死人身上踩过去。在前村街的山上,中央军开枪打过来,日本人就叫我躲下来,趴在山上。趴了三个来小时,下午枪声就小一些了,鬼子就叫我们走。鬼子在山上放火,他们的人马全部下山,从母家山过去,到谢塘天就黑了。村上一个人

也没有,鬼子就烧饭。一二十个饭盒用铁棍一穿,放在火上烧,旁边还有口大锅。烧好了饭,有个鬼子捧了一点给我们七八个送差的人吃。吃过饭,洗洗脸就休息。夜里十点多,枪声响了,鬼子又出发了。这一回是在麒麟门同守卫中山陵的中央军打,鬼子不要我背东西了。鬼子趴在谢塘过去一点的地方,他们的坦克就哈哈地过来了。鬼子前进了,我就慢慢地一点一点向后移,上了山窝就拼命跑,钻进了山里。再翻过一座山,就到了官塘,看见许多老百姓都躲在山里。天快黑了,我才回到前村街、涧南。一看,我的一副箩担被人拿走了。我就拣了人家丢下的一袋干粮,翻过渣子山,在凹子山碰到了我母亲。她受伤的腿包好了。凹子里有许多人,有姚家边的,也有丁墅的。我们就钻在柴火堆里歇了一天一夜。那晚下的霜很重,雪白的一层,我们也不晓得冷了。地里还有山芋没有收,我们就扛了一袋,用小锅烧点吃吃。那时,南京那边有枪声,炮校里有火光,日本人在烧房子,我们待的地方没有枪声。我们就走到黄塘庵,回到了顾家棚子。村上还有一些老年人。我家的房子烧掉了,墙框还在,我们就用柴火烤火。后来,我又回到了山凹子里,把我娘背了回来,把她的腿再包一包,让她睡在墙框里。到了腊月里,我们弄了点烧糊的稻谷,拿回来舂舂吃。没有盐,就吃咸菜。炮校里的鬼子天天到村里来乱打枪,打狗,打猪,砍老百姓,还拖人给他们送东西,送到了炮校就把人打死。黄塘庵去了五六个人,有一个人腿被打断了,那个人叫夏德明。

后来,我们就搬到下案子桥来了。下案子桥被鬼子打死的就是一个人,叫梁国柱,二十七八岁,是在涧南塘里被打死的。上案子桥的陈老三(陈必大)和他的儿子陈国平被打死了。顾家棚子顾言文的老婆,三十来岁,在马路上被鬼子打死了,她叫“回子”。

72. 杨金柱口述

杨金柱,男,1924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建设殷家边

调查时间:2004年12月3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1岁,属鼠。3岁时父亲就去世了。跑反时,四个姐姐都出嫁了,我跟了母亲从汤山到东阳、龙潭,在北圩住在三姐家,那地方叫龙洲圩,离长江五华里,离龙潭也是五华里。路过孟塘时没有遇到鬼子,也没有看到打仗。是哪一天跑反的,已经记不起来了。后来真正安民了,才回家。村上的房子,三分之二被烧掉了,我家的房子没有烧。当时我们村有二三十户,不穷也不富,现在有80多户。

跑反前我上过四年学,就在殷家边上的。跑反后就再也没有上过学。

跑反回来后听别人讲,在鬼子刚来的那一天,就在我家老房子门前的田里,有三个人被鬼子开枪打死了:

王培仁、王培礼兄弟俩,一个三四十岁,小的三十多岁,都没有子女。

赵××,四五十岁。他不是本村人,在村上帮人看山的,拿了一根棍子跑。他也没有子女。

我到炮校去干过活,种菜、浇水,干一天给一包雪格拉牌香烟,没有给过米。

日本人投降时一点都不凶了,比什么都老实,骂他也不敢吱声。他们的武器缴了,就一身军装。他们有几万人,住在龙潭一个叫“石人石马”的地方。有好几百顶帐篷,全住在帐篷里,我到三姐家去,亲眼看到的。

日本鬼子在炮校打炮,炮阵地就在炮校里,往上曹西边打,往个子山打。听别人说,上曹村有三个人在拣炮弹时被打死了:

侯良财,一发炮弹从腰里穿过去,把人打成了两截。那发炮弹没有炸。

小徐和王二,被炮弹炸死的。

日本人打的炮弹有硫磺弹、葡萄弹和生铁瘤好几种。硫磺弹能起火的,一打,山上的柴全烧光。拣到这种炮弹,一嗨(敲),就能烧起来。葡萄弹是在空中炸的,里面有许多锡弹子,大小同小孩玩的玻璃球差不多。

我没有去拣过炮弹,但看到过别人拣回来的炮弹。

73. 冯忠富口述

冯忠富,男,1923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建设个子山 34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12 月 3 日、2005 年 10 月 9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82 岁，属猪，跑反时 15 岁。我老伴 85 岁，属猴，跑反时 18 岁。她 9 岁就过来了（当童养媳）。冬月初六我们一起跑的，先到涧南。在前村街那里有一个连的中央军被鬼子打死了。又跑到北尚庄，中央军在母家山同鬼子打得很厉害。后来，我们就跑回了个子山，有 10 多天没见鬼子来。涧南那边打仗时，有飞机，跟着一个球（指飞艇）跑。打炮打了三天三夜，把南京城硬打开了。

我们村上被鬼子打死的有四个：

荣先生的二儿子，小名“小二子”，二十七八岁；

冯老九，比我大一转，当时 27 岁。

他们两个被鬼子拖差拖到了紫金山，被打死了，没有人去收尸。

严发友，当时 50 多岁；

伍运强，当时 30 多岁。

他们两个是在冬月初七的早上在涧南被日本人杀死的。

我们村上的房子，烧掉的不多，就东头烧了几间。

鬼子到村上来过好几次。有一次，鬼子到了村上，把我大嫂的衣裳脱了，用手捏她的嘴，叫她笑，给她照相。还有一次，来了八个鬼子，有个“大总统”，豆沙胡子，带了把长刀，在磨刀石上磨。他们八个人把我们村的××（当时才 15 岁）糟蹋了。当时，许多人从外面回来了，村上好多人都看到的。××是从小带过来的，不是亲生的，但她娘老子还是哭死了。她后来得了败血病，1962 年左右去世的。

鬼子是在屋里强奸××的，就在刚才同你讲话的那位老太太的家里干的。她姓啥，不知道。

（2005 年 10 月 9 日上午补充）冯存富是我的叔太爷，当时有 60 岁左右。他大女婿在高庄，二女婿在下曹，鬼子来之前他去帮他们看门，走下曹到姚家边。鬼子来了，他躲在槽坊里，鬼子把门一锁，放火烧，把他烧死了。第二年正二月里弄回来，葬在冯家的山上。后来要造房子，他的

坟又搬了一次。他的孙子叫冯和佩,现在 60 多岁,就在我家南面住,我带你去。

74. 徐春旺口述

徐春旺,男,1919 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敬老院(原住汤山镇建设上曹村)

调查时间:2004 年 12 月 6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86 岁,属羊,跑反时 19 岁。两个哥哥跑反了,先到南圩,待不住,夜里回来,又到北圩,安民后才回来。我们村的夏荣升当时 40 多岁,跑反期间回家拿粮食,被鬼子逮到了,把他掀到水塘里。他爬上了岸,又被掀下去。最后一次上岸时被鬼子开枪打死了。 he 有三个儿子,老大、老二都去世了,小儿子叫来银,现在 60 多岁。

朱存义的父亲叫“小四子”,是从栖霞招来的。家里人一手跑了,就他一个在家看门,当时 20 多岁。鬼子来村上,他躲在村西一条小沟里,歇歇就抬头望望,鬼子看到后把他一枪打死了。

鬼子刚来时,许多人都躲在大凹唐大先生的山上,挖地洞,躲在洞里。团子尖上有鬼子,听到下面人声沸杂,就下山用刺刀刺洞里的人。侯曲文(四十来岁,小名“侯矮子”)在洞口被打死了。还有一个住在殷家边的外地人在另一个洞口被打死了,他的姓名不知道。

上曹村一队有个年轻人姓黄,小名“小塞子”,他在李岗头被鬼子打死了。他大哥叫黄学前,二哥叫黄学田。

上曹村的侯尔顺在南京城里的难民区被鬼子打死了,他是侯曲文的儿子。

我的舅舅言顺泰,作厂陈达村人,鬼子刚来时在西岗头给侄女看门,被头一阵过来的朝鲜兵打死了。打头阵的都是朝鲜人,豆沙胡子。

我们村上的房子没有烧,其他村上的房子烧得一塌糊涂。有个当官的鬼子在我们村的墙上写了八个日本字,别的鬼子看到这些字就不敢来烧房子了。我们村上有二十来个人没有走,天天给鬼子抬东西。他们抢

到的东西都让我们抬,有时抬到“大楼”,有时抬到炮校。他们天天来拖差,我们吃好早饭就要在村上等他们。有时,鬼子捏个饭团给我们吃吃。有一次,我把东西抬到了炮校,那个鬼子送我出来,另一个鬼子把我拦住了,解开帽子,扳我的头。那时我理的是和尚头,他就以为我是中央军。送我出来的鬼子同他说了一阵,他才让我走,真把我吓死了。

鬼子在村里最爱捞牛。我们村上有条牛,活活泼泼的。鬼子不嗨(敲),叫老百姓嗨。弄死了剥皮,砍下四条腿,叫人送走,别的下水什么都不要。他们还叫老百姓把水塘里的水戽干了,下去摸鱼。

鬼子在炮校打炮,挖一个土墩当靶子,就往我们村边打。阴历三月二十六下午,把侯良财打死了,肠子都出来了。那天打的是 18 斤重的生铁瘤。那炮弹中间是空的,有铜头子、铁头子。大的生铁瘤 25 斤重,小的 9 斤重。有一天,生铁瘤、燃烧弹、马令钢、锡豆子夹花着打(用数种不同的炮弹分批射击)。

(其妻马秀英比划着插话)大的生铁瘤有这么长(50 厘米左右),这么粗(直径 20 厘米左右)。

被日本人炮弹炸死的还有小徐和他的哑巴老婆,打得棉衣都飞起来了。小徐是住在上曹村后头小棚子里的外地人,二十来岁,没有子女。

鬼子侮辱中国妇女,他们不但自己干,还叫中国人同中国人干,不干还不行。有个男的就说:“不是我要干唉,日本人要我干,没有办法唉。”日本人还趴在下面看。日本人一到村上,第一件事就是要花姑娘。

(马秀英插话)我娘家是作厂牛牧岗的,父亲叫马荣顺,跑反时,我 17 岁,他靠 60 岁了。他先跑反到江北,快过年时回到了北圩。有天夜里,他回家挑米,后来就一直没见到他人,尸体都没找到。

75. 陈正林口述

陈正林,男,1921 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敬老院(原住汤山镇建设上案子桥)

调查时间:2004 年 12 月 6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84 岁,属鸡。

跑反时,我们村的老头丁德山被鬼子打死了,当时 50 多岁。鬼子要他手里的财神菩萨像和他家的家谱,他摔到了河里,鬼子没找到,就把他拖到他家开枪打死了。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跑反,鬼子就在我们面前用盒子枪打的,我们都看到了。后来,我才跟了父母亲跑反,走许巷、东阳的小路到北圩。

还有两个人是在外面被鬼子打死的。一个叫陈必大,另一个就是他的儿子陈国平。他们躲在北尚庄的山里,鬼子看到了,要杀陈国平。陈必大和外村的一个人就一起求鬼子。结果,他们三个都被鬼子杀死了,尸体没运回来。儿媳妇带了小孩到江北讨饭。后来,她的女儿嫁到了寺庄。

黄塘庵的夏德明比我大 2 岁,他给鬼子送差送到炮校,回来时出了校门就被鬼子打了一枪,腿打断了,但没死。解放后给公家喂猪,去世了才十来年。

我也到炮校去送过一回差,抬猪和鸡。我看到炮校里的鬼子架了机枪,在靠近新庄的大操场那里,就是现在歇大炮的地方,把许多老百姓打死了,起码有几十个人。我吓得看也不敢看。

上案子桥村子小,房子不多。被鬼子烧掉的有七八间草房。

76. 王金福口述

王金福,男,1924 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中新行政村新庄 57 号

调查时间:2003 年 1 月 23 日、2004 年 10 月 10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76 岁。跑反时 11 岁,和父母、二弟、妹妹跑到赤山附近的渡桂村。一路上,父亲挑了一担箩筐,一头是锅、碗、刀铲和被子,另一头箩筐里让妹妹坐。我步行,还背了十来斤米。开始,在我姐姐家住,后来,那里也有日本兵了,我们就搬到赤山脚下更偏僻的窦家边,住在一个叫“草庵”的庙里。那庙不小,四合一的院,有大厅和小厅,都供着佛像。庙

里住了 20 多人,都是我们新庄的。大家睡地铺,地上铺一层稻草,挤在一起对付对付。

跑反时,我祖父王爱正已 80 岁,他不肯走,留在家里了。一天,路过新庄的日本兵进村来找花姑娘,祖父听不懂他们说什么,被鬼子一刀砍在脖子上,流了许多血,但喉管没断,还有一口气。村上人就on他背走,藏在附近一个地窖里。后来村上人四出逃命,谁也不知道他是哪天去世的。我父亲隔些日子从赤山回到新庄背点米,回到家里才发现祖父已僵死在地窖里了,村上二十来户人家,房子全烧光。我家的粮食被烧掉一大半,剩下的也焦了,但还能吃,就背到赤山给我们充饥。那烧焦的大米特别难吃,我们挖点野菜和着吃,赖以活命。就这样,我们在窦家边熬了两个多月,安民后才回到新庄。

除了我祖父外,我们新庄还有四个人被日本鬼子杀死、逼死,他们是新庄一队的王寡妇和她母亲钱氏,新庄二队李义贵的童养媳和他父亲李恩林。



王金福

王寡妇青年守寡,跑反时还不到 30 岁。为了照料母亲钱氏,她留在新庄没逃。一天,钱老太太在家里被日本鬼子开枪打死,王寡妇从藏身处悄悄溜回家看看,见母亲被打死了,扭头就跑。日本兵发现了她,便狂喊“花姑娘!花姑娘!”边喊边追。王寡妇从一队那边跑到我们二队这

边,再也跑不动了。为避免受辱,她跳进村边一个水塘里自杀了。王寡妇有个儿子叫王家炎,比我大一岁,抗美援朝时赴朝参战了,说要为死去的母亲和外婆报仇。他当过班长,后来在朝鲜牺牲了。因未成家,他没有后代。他有四个姐姐,一个在西庄,一个在古泉侯家塘,还有一个在苏北六合。

李义贵的父亲李恩林在跑反时不到40岁,他患有严重的小肠气,跑不动,就和李义贵的童养媳留在了家里。那时,童养媳才8岁,日本鬼子闯到她家,一刀捅进下腹,死尸就搁在她家灶台上。李恩林回到家里一看,吓坏了,赶紧跑,日本兵发现后就追,一直追到村西小山坡,一枪打死。

这四个人被杀害的情况是我跑反回来后听村上人讲的,我没有亲眼看到。

我们新庄就在汤山炮校南边,与炮校紧挨着,当时只有20来户,是个小村子。村上老一辈人都是清朝到民国初年从苏北逃荒、逃难过来的,李姓是从仪征来的,钱姓是从六合来的,我们王姓是从苏北来的。村庄原先在炮校里头,在南炮场、幼儿园一带。后来,国民党要建炮校,就把我们拆迁到现在这个位置。

我们从赤山回到新庄后,发现炮校里的房子都空着,没人住,日本人都住在汤山镇上。那时候,炮校南炮场到处是死人、死马、死牛,一堆一堆的。死人横七竖八,三五个一堆,七八个一堆,歹哩(多极了),起码有两百来号人,有国民党兵,也有老百姓,都已经腐烂了,散发着难闻的腥臭。整整一个夏天,没人去掩埋,烂光为止。老百姓没房子住,远远近近的人都到炮校来偷拆房子,下边的万安、上峰、土桥,东边的句容,胆大的人都来,日本人也不管。那时候我常常到炮校去割草,亲眼看到炮校的办公大楼,能拆的都拆了,里面的门窗、梁、天花板,还有一根根的洋松木料,都被老百姓偷偷拆下,趁天黑抬回家。办公大楼的墙没拆,别的都拆。汤山自卫团团长金大贵隔几天到各村看看,发现哪家有炮校的木料和砖瓦,就威胁敲诈,只要给他一点钱,也就没事了。安民后过了两年,日本人进炮校住了。他们在四周拉了一道铁丝网,不许老百姓随便出入,又用水泥砖把办公大楼简单修了修。后来日本人投降了,国民党的

新六军来接收炮校,又把大楼修理了一番。

日本兵在安民后仍经常出来找花姑娘,抢鸡鸭(但不抢鹅),抢羊抢猪抢牛。他们抓到了牛,就用锋利的指挥刀活生生地砍下两条后腿,别的都不要,那牛鲜血淋漓,拼命挣扎,可惨了。

日本人在炮校住下来后,这里的部队叫 39 部队。常住的是一些当官的和后勤人员,此外就是一批批来训练的士兵,十八九岁的,二等兵居多。他们打靶打炮,那炮都是马拉的大炮。训完一批又一批,训得很严格。

炮校里的鬼子兵很多,吃的菜都是在炮校里种的。他们强迫老百姓给他们种菜,句容来的、江宁来的都有,有的种菜,有的打杂,最忙时一天要去一二百号人。

1945 年农历七月,摘南瓜的时候,日本人投降了。过了一两个月,国民党的新六军来了,天上常有飞机飞的。日本人还驻扎在炮校里。他们的武器被收缴了,但还站岗,用木棍当武器站岗,人不凶了,一点威风也没有了。有一次看到天空中有国民党的飞机在飞,一个日本兵跷起大拇指对我说:“你们中国人,这个!”然后再翘起小拇指,指着他自己说:“我们,小小的。”到了南瓜收梢的时候,炮校里的日本兵就全走了,走的时候我不知道。

(2004 年 10 月 10 日上午补充)我当过阜西小乡的乡长。阜西大队有个人叫王本原,属羊的,我们帮工时在一起干过活。听他讲,在安民后第二年,东岳庙赶庙会时,他腰上系了一根丝带,穿了一件蓝色老布衣。有二十来个鬼子也去赶庙会了,他们把枪架在地上,去吃炸豆腐块。鬼子看到王本原穿的衣服有点像新四军,就问他:“你的,什么的干活?”和他一起去赶庙会的人就对他说:“日本人要来找你的麻烦了。”王本原说:“我怕他们?”鬼子听不懂,以为是骂他们了。两个鬼子上去抓他,一人抓一只膀子。王本原力气大,他左一拳、右一拳,把两个鬼子都打倒了。这两个鬼子嗷嗷地叫,别的鬼子就跑去拿枪,追他。王本原看看东边有鬼子,西边有鬼子,后面也有鬼子,就朝南面的水塘里跳,一个猛子下去,潜水游到了水塘的南岸。那个水塘很大,他游到了南岸就从下塘口的一个豁口往石狮(地名)方向跑。鬼子只看他跳水的地方,朝那个地方打枪。

等到发现王本原从南岸逃走,就晚了。鬼子找来一挺机枪,朝石狮方向打了一阵,就走了。

王本原逃了一条命。回来后,别人就说他是“二世人”。他说:“鬼子追不上我的。我是看好了下塘口的豁口游的。”王本原的力气真大。别人到塘里去挑水都要用扁担挑,他却不用扁担,两只手,一手拎一桶就跑上来了。

我55岁时退下来的。退下来前是中新大队的书记。“文化大革命”中虽然挨过斗,但村上人都知道我这个人是在前享受在后的,少数人斗了几次就斗不下去了。我是全公社第一个解放的大队干部。

77. 史德松口述

史德松,男,1936年10月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中新行政村仙涧桥桥西一队

调查时间:2003年2月13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是汤山中新行政村仙涧桥桥西一队的,1936年10月出生。1982年以前当过生产队的会计、队长,现在在家,基本上不干活了。

仙涧桥是一座石拱桥,听老人讲是光绪年间修建的。民国时修建京杭国道(今宁杭公路),公路经过我们村,于是就在石拱桥以北约60米处建了一座木桥,那木料都是厚厚的洋松,桥中间有木桩,非常结实,村上的老百姓称这座桥为“洋桥”。日本鬼子占领汤山后没多久,新四军常来袭击,烧桥炸桥,破坏交通。日本鬼子就强迫老百姓给他们看守,由伪保长征调附近村民,坐在我们村皋义富家轮流守护。皋义富家就在洋桥西边20米处,以前是吊酒的槽坊,一排平房,有朝东开的大门,站在门口就能看到木桥、公路和下山村一带的房子,视野很开阔,日本鬼子也来守桥的,他们爱喝酒,三斤半一瓶的白酒,拿起来就咕嘟咕嘟地喝,还抽香烟。有时高兴,也会递给看桥的村民喝上几口,或者给几支烟抽抽。

下山村的南边是日本人种的一大片菜地,有两个日本兵,一个外号叫“王八”,另一个外号叫“和尚”,他们监督老百姓种菜,而自己常常在下

山村喝酒,同女人厮混。有一次,新四军化装成种菜的农民,在菜地里干了一会儿,便借口渴了,跑到人家家里喝水。他知道有个鬼子在屋里干那事,就从怀里掏出一颗手榴弹,拉响了往房间一甩,然后拔脚就跑。可是手榴弹并未爆炸,日本兵大吃一惊,呼喊着重出来抓新四军。这个时候,新四军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仙涧桥现在有三个队,桥西有九十来户,桥东有一百来户,比下山村稍微小一点。抗日战争期间,我们仙涧桥有两个人被日本人烧死,一个叫皋义贵,一个叫皋义才,是弟兄俩。皋义贵的老婆还在,90多岁了,还能烧饭、补衣服,头脑很清楚,说话声音也清楚,只是耳朵有点聋,听不太清了。等一会儿我带你去看看。

78. 皋义芳口述

皋义芳,女,1899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中新行政村仙涧桥桥西

调查时间:2003年2月13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娘家姓王,在后巷,跟了皋家就改名皋义芳。我男人叫皋义贵,我们是同年的,我今年93岁了。跑反时,我28岁,我们躲在龙潭北圩,我男人和他弟弟皋义才从北圩回仙涧桥家中拿米,在下山村遇见了日本人。他们兄弟俩拱在一间草屋里躲着,日本人把草屋烧了,兄弟两个就一起烧死了。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我肚里还怀了一个,我男人死后生下来的,也是个儿子。村上多少人劝我改嫁,我看在三个孩子的面上,不再嫁人了,从28岁起一直守到现在。一个女人家拖养三个小孩,真不容易。家里的农活没人干,全靠娘家人来帮忙。翻地、车水、插秧、割稻,都是娘家人从后巷赶来帮忙的。跑反时,村上大多数人家的房子都烧光了,我家的房子也烧光了,我就带了小孩住在娘家亲戚家里。

79. 曹友林口述

曹友林,男,1935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中新行政村曹家

调查时间：2004 年 4 月 14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70 岁。我的家门哥哥曹友恒在跑反时在西岗头被日本人开枪打死了，他的尸体是我父亲带了几个人抬回来的，后来埋在村东小山上。曹友恒当时快 30 岁了，有四个小孩。他老婆和我的一个堂哥（大名叫曹友富，外号叫“罗腿”，三十来岁）跑反时在安基山被日本人开枪打死了，这两个人的尸体都没找到。

曹友恒夫妻俩都死了，他们的儿子曹洪宝当时才八九岁，没人养，我父亲就把他带到我家。养到 12 岁，就让他去给人家放牛。曹洪宝有三个妹妹，一个被安基山的人抱去养了，没养大。还有一个丢在北圩，给人家养了。他大妹妹就住在上峰高庄他舅舅家。

80. 曹洪宝口述

曹洪宝，男，1930 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中新行政村曹家

调查时间：2004 年 4 月 14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父亲叫曹友恒，母亲姓庞，娘家在上峰高庄。他们都是属鸡的，跑反那年 28 岁。我是老大，跑反那年 8 岁，下面还有三个妹妹。

1937 年冬月，我们全家跑反，往北圩走。到了安基山，遇到了日本人。我母亲背着小妹妹往山上跑，被日本人开枪打死了，她的尸体没找到，小妹妹被安基山的老百姓抱走了，后来没养活。我父亲带了我们三个小孩跑到了北圩。第二年正月里，他回曹家来取粮食，看到村上房子被鬼子一手（全部）烧光了，就没走。后来他到西岗头去，在那里被日本鬼子开枪打死了，他的尸体是我的一个家门叔叔和一个家门爷爷从西岗头抬回来的。我的小姑爷是西岗头人，叫李克俭，是和我父亲一起在西岗头被日本人打死的。

我父母亲都被日本鬼子打死了,那日子真难哪。

我的大姑爷叫裔强,西岗头人,他把我从北圩带了回来。二妹妹丢在北圩给人了。大妹妹送到上峰高庄我舅舅家里,我在叔伯爷爷家里住了两年。他家人口多,生活也很困难。我12岁那年就给人放牛了,住在后巷的皇甫祥培家,在他家吃住。一直到20多岁,解放了才回到自己家里。可自己家里什么也没有,没有房子,没有床铺,没有碗筷,一想起那时的日子,我的眼泪就出来了,讲不下去了。父母都没有了,我大冷天没衣服,没鞋,手脚冻得不像样子,那种苦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们村有个女的叫曹友英,属鸡的,跑反那年18岁,成家了,是招女婿的,她的丈夫叫曹友生。跑反后的第二年夏天,茭瓜(茭白)长得老高了,日本人到村上来找大姑娘,曹友英吓得跳进了一个大水塘里。她在水塘里游来游去,日本人就在水塘边转来转去。日本人不敢下水塘。后来,她上岸躲进了茭瓜田里,日本人没找到,以为她淹死了,就走了。她从茭瓜田里钻出来,回到了家里。不久就害了一场大病。她活到81岁才去世,她丈夫现在还很健康。

81. 曹友生口述

曹友生,男,1916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中新行政村曹家

调查时间:2004年4月14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9岁,耳朵有点聋,听不大清了。

跑反那日子真是受罪。冬月初四跑反,我们原想去北圩的,跑到孟塘就碰上了鬼子。鬼子在孟塘放火,房子都烧光了。我挑了箩担、米,被鬼子拦住,关了起来。当时想,还不如撞到耙子上死了好。后来我们趁夜里逃到附近山上。待了三天,不安全,十来个人又逃到窑湾,还是不安全,就跑到东葛壩,走西谢、东谢,到西岔,在那里住了十来天。西岔的房子也被日本人烧掉了,我们又跑到附近山上躲起来。有天夜里,我回到曹家,一看,村上的房子全烧光了,老头老太全躲在地洞里。没法子,又

跑回西岔。后来安民了,才回到曹家。

跑反时,我父亲有气管炎,没跑出去。他躺在床上,盖着一件蓑衣。鬼子进村烧房,见了我父亲就刺一刀,把他身上的蓑衣点着了。我父亲赶紧跑,才没有烧死。我母亲是个小脚女人,几个日本兵端着刺刀,抢着看她的小脚。有一个日本兵看过后,抓住她的双脚一掀,把她掀倒在地上。

第二年的六七月,鬼子进村来找女人。我老伴吓得逃到村东的大水塘,跳进了塘里。日本人没敢下塘,朝她身边打了三枪,吓唬她,逼她上岸。她游了一段,抓住菱根爬上了岸,拱到塘边一块茭瓜(茭白)地里躲着。日本人以为她淹死了,就走了。过了一会,我老婆回来了,满身是水,满身是泥,披头散发。

82. 汤贤玉口述

汤贤玉,女,1929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中新行政村后巷5号

调查时间:2004年9月2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76岁,属蛇的,娘家在中新汤家,17岁嫁到后巷,丈夫叫皇甫祥银,今年正月二十八去世的,81岁。

我丈夫的姐夫叫皋义贵,是仙涧桥桥西的。跑反时,他跑到江北,后来回来拿东西,在下山村被鬼子关在屋里烧死了,一起烧死的有好几个。皋义贵死后,他家的田都是我丈夫兄弟四个替他种的。

我3岁就没有父亲,跑反时跟了我母亲、哥哥、嫂嫂跑到江北。过江时,船上有铁链子,我一看白浪浪的一片,掉到江里去了,是我的家门堂哥把我救上来的。船上不但有人,还有几只毛驴。

跑反回来,我家的房子有半间没有烧掉。后来我出麻疹,母亲把我从祠堂里拉回来,让我单独一个人住在稻仓里,不让出来。鬼子来了,踢开了门,看我躺着,鼻孔里出血,脸上也是血,知道是害病的,看看就走了。

我老头(丈夫)在炮校做工,被鬼子踢了几脚,哇啦哇啦地不知讲些什么,后来,鬼子给他吃了麦片饭。鬼子投降时,我们到炮校的围墙边用酒同鬼子换东西,有肥皂、袜子、香烟等。日本人叫香烟是“大白果的新交新交”。

我们村上的房子在跑反时都叫鬼子烧光了,村上的人都过江了,没有被鬼子杀死。我家里人多,我的一个侄子在跑反时还睡在摇篮里,没人背,就花了12元大洋雇人挑了他走。到了船上,我就抓住那摇篮,不让它滚到江里去。跑反回来没有吃的,就挖荠菜吃,那一年的荠菜特别多。

跑反时,我们村上汤水根的一个兄弟,当时还是个小娃娃,大人带着他跑到江北,就送给别人了。解放后,他姐姐在南京城里开鱼行,她那个小兄弟到南京来贩鱼,姐姐一看,他长得好像是自己的弟弟,就问他是哪里人,一问,就知道是自己的弟弟,分散了几十年,还是认出来了。汤水根的姐姐叫小冬子,她父母都过世了,她也去世了。

我哥哥在跑反前上到大学毕业,跑反过后,他就去营房(地名)那里教书。我母亲卖了20来亩田供他上学的。解放后,我家划为地主。

我娘家嫂子的嫂子,跑反时住在句容新塘南边的马墟头,脸上涂黑了。日本人把她抓去,认出来是个女的,就强奸她。她不肯,鬼子就打她,还踢了一脚,最后把她赶回来了。

83. 汤瑞罗口述

汤瑞罗,男,1924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中新行政村汤家

调查时间:2004年10月28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1岁,属鼠,跑反时14岁。跑反时跑到了神家庄、润南,正好遇上日本兵和广东兵在那里打仗。那么冷的天,广东兵穿着单衣,用被单一样薄的布毯子裹在身上,冻得厉害,吃又吃不饱,穿又穿不暖,怎么能打仗?我只看到他们逃命,没看到他们还手,没看到他们向日本鬼

子开枪。有的广东兵，鬼子的目标(飞艇)已经飞到门口来了，还不知道鬼子已经打过来了。鬼子的目标在天上蛮高的，像个装满了粮食的大口袋，那颜色是红的。

我们村上跑反时没有人被鬼子杀死，大家都跑光了。后巷、汤家、曹家、高家，村里的房子都烧光了，没剩下几间。

后巷的皇甫恺建比我小一两岁。他母亲跑反时在家坐月子，当时40来岁，留在家里，小孩流产了。日本人烧房子，他母亲就烧死在屋里了。这是日本人刚来的时候。他和他父亲皇甫祥林跑到外面去了，跑反了。

我们在涧南亲眼看到有一家的门口杀死了八个难民，不知道是哪个村上的。我们是冬月初三跑反的，在神家庄住了二三天，鬼子就来了。我们躲在一个竹丝园里，鬼子一来就烧房子。神家庄那里有个隐静寺，庙不大，三间房，有菩萨的，里面挤了不少难民。

安民后，鬼子在上峰前新村打死了一个人，在高家也打死了一个人。前新村的那个人同鬼子摔跤，鬼子摔疼了，就向他背后打了一枪。高家被打死的那个人是我的一个亲戚，是招女婿招在高老五家的，叫什么名字记不起来了。他站在自己家门口看看，鬼子在老远老远的地方向他开枪，把他打死了。高家的高大宝可能知道他的名字。

安民后，有一天，我父亲汤贤昌差一点点就被鬼子打死了。那天在前新村，鬼子问我父亲要花姑娘，他们用枪对准我父亲，说：“花姑娘大大的？”我父亲说：“没有！”鬼子就把子弹推上膛，对准了我父亲。我父亲跪在地上叩头求情。这时候来了个鬼子军官，对那个鬼子兵说了一通，鬼子兵就把枪口转过来，对准不远处的一棵树，呼的一枪打死了一只麻雀。父亲听到枪响，吓得倒在地上了。

跑反前，我们村上的房子都是好房子，在汤山一带是有名的。鬼子一来，这些房子都烧掉了。我们只好砍些树，搭个小棚子，用稻草盖盖。家里的桌子、凳子、碗筷，什么都没有了。

鬼子投降后，他们就不凶了，你打他，他也不还手。他们走的时候什么都不带，只穿身军衣走。那时候我到龙潭捉小猪，亲眼看到一队队的鬼子从东阳往龙潭走，队伍很长。他们在龙潭坐火车回日本去了。

日本鬼子原来在炮学校里升他们的国旗，投降后就不升了。他们投降

的消息老百姓很快就知道了,但农村里没有人放鞭炮。后来,新六军就过来了。

84. 高德树口述

高德树,男,1920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中新行政村高家

调查时间:2004年11月16日

调查人:费仲兴



高德树

我今年85岁,属猴,跑反时18岁。我叫高德树,外号高大宝,村上不少人只晓得我的外号,不晓得我的名字,都喊惯了。

鬼子是冬月初三从句容打过来的,我们是冬月初三晚上跑的,一家人走窑湾进大山,躲在东葛壩、韩家边附近的山上。曹家有十几个人跑得晚一点,在安基山的黄坑那里碰到了鬼子,有的被开枪打死,有的被刺刀刺死。其中有一个叫罗腿,还有几个女的,一起埋在一个坟里,坟墓就在孤山堰下头,现在还在,清明节去扫墓的。

我们村上有三个人被鬼子杀死了,都是鬼子刚来时杀的。

一个是高德才的母亲,她躲在村里没走,当时50多岁。鬼子来了两三天,被鬼子看到了。鬼子把她掀在村东头的水塘里淹死了。高德才后

来在北方参加了新四军,还立过功,但不识字,在生产队里当五保户。他连江宁县都不认识怎么去,还是我当队长时带他去找民政科的。高德才没有子女,后来就去世了。

另一个是高老六的母亲,当时 60 多岁,也没有跑反,躲在村里,被鬼子看到后掀在一个茅厕里淹死了。

还有一个是高老五的女婿,上峰周家边人,姓什么不知道,名字也不知道,当时二十来岁。他在我们村上看到鬼子来了,就想出门,刚一跨出家门,就被西庄那边的鬼子远远地放了一枪打死了。他的妻子是个哑巴,20 岁不到,后来就改嫁到寺庄了,现在还活着。

(高家 38 号的张兴兰插话)锁石村有一家 13 口被杀。有一个人被刺了几刀,一个老太太用老母鸡皮贴在他刀口上,把他救活了。

85. 陈万堂口述

陈万堂,男,1922 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西梅西岗头

调查时间:2001 年 6 月 19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在 1949 年 8 月就去炮校印模厂工作,当木工,1969 年退休,退休工资每月 1 000 多元。我被评为炮兵系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在北京和毛主席合影,有照片存放在院史陈列馆内。现在身体不行了,走路要靠拐棍。

我的父亲陈广泉、大哥陈万松、三哥陈万夏,在 1938 年农历正月初九被日本人杀死了。一起被杀死的有 23 人,21 个是西岗头的,2 个是外村的。当时我父亲 40 岁,大哥 21 岁,三哥 17 岁,我 16 岁。事情的经过嘛,我告诉你啊。南巷有个人给炮校里的日本人磨豆腐,天天去送。西岗头有许多鱼塘,养了好多鱼,也天天去送。有一天,磨豆腐的在炮校拿了件东西,日本人发现后就到仙涧桥找人,问南巷在哪里。人家往北指了指,日本人就跑到西岗头来了。两个鬼子,一人扛一挺机枪,说是要拉网捞鱼,让人去喊。躲在北面小树林里的小伙子以为没事,就出来了。

23个人,在社堂前小学里集合,排成两排。鬼子叫他们跪下,他们就跪下了。后来鬼子用机枪一枪一枪地打,把他们打死了。只有一个人死里逃生,叫陈万有。鬼子打第一枪,前排的人倒下,他也趁势倒下,人家的血流到他身上,他就昏过去了,中间动了一下。日本人上去补刺了几刀,都没刺中要害。鬼子走了,他才从死人堆里逃出来。这段经过啊,他给村上人不知讲过多少遍。要不,我们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呢。村上的房屋,有一大半被烧光了,都是有钱人家的好房子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大家哭啊、喊啊,谁会想到呢。

这件事裔文钊了解得很清楚。他是西岗头人,在新疆当过银行的行长,退休后住在南京苜蓿园,但经常回来搞调查,村上多少人被日本人杀死,姓名、年龄、地点都写在材料上,我们都按过手印盖过图章的。他家有一个人被鬼子杀死,后来就葬在村西边,现在的砖瓦厂那里,还立了一块碑。

86. 刘道义口述

刘道义,男,1928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西梅下山村

调查时间:2003年2月6日、2004年10月28日

调查人:费仲兴



刘道义

我是1928年生的,8岁开始给人放牛,到了10岁,什么农活都会干了,很早就懂事了。

1937年日本鬼子攻打南京之前,我们下山村绝大多数人都往龙潭北圩那边跑。我在农历十月底先到舅舅家,他带我进了圩区。冬月初三,村上人开始大批外逃。到了冬月初四,日本人的枪炮声都能听到了,村上除少数老头老太外,能走的人全走了。我父母、姐姐、妹妹和弟弟是冬月初四走的,在北圩找到我之后,我们就挤在一家老百姓家里,一直到第二年春天安民后才回来,前前后后在北圩住了三四个月。

那几天,跑反的人可多啦,大人挑了担子,带上被子、锅碗家什,小孩也背着米袋,一路上全是跑反的,就像一支大队伍,同电影里的场面一模一样。老百姓弃家外逃,远处是隆隆的炮声,头上有日本人的飞机,空气十分紧张。听我父亲讲,初四那天他们逃到孟塘时,日机向跑反的人群投弹,有一颗炸弹落在孟塘桥边,炸死了许多人。有个人的尸体飞了起来,挂在一棵树上,场面十分恐怖。我们村陈志浩的母亲就是在那里被炸死的,吕志华的母亲和刘茂珍的姐姐也在那里被炸伤,一个伤了膀子,一个伤了脖子。

在北圩避难的人随身携带的粮食不多,隔上几天就要派人回村取粮。我叔叔刘有富、堂兄刘道才在回村取粮途中在大赤燕那里被鬼子抓住,拉到附近山上打死了,叔叔的尸体都没找到。后来大家传开了,驻扎在汤山“大楼”里的鬼子专打老百姓,抓一个杀一个,“大楼”后头狼山脚下不知打死了多少人,打死了就往坑里摔。

有一次,我们村的梁庆友、吕志华等人和邻村的一些小伙子,一共17人,带了扁担从黄村那里走山道回村取粮,路过一个小山凹时,被远处的日本兵发现了。走在最前面的梁庆友被鬼子一枪打死,鲜血溅到了吕志华身上。两个鬼子冲了过来,要吕志华给他们找花姑娘。吕志华答应了,把鬼子引到了别处,其余15人就放回来了。要是现在,17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人人手里有家伙(扁担),吹声口哨齐动手,说什么也能把两个鬼子收拾掉。

下山村比较大,当时有40多户。村北和村东有不少水塘,大一点的都有塘名。在村东的小鬼塘那里,日本鬼子一次就打死了18个回村取

粮的老百姓,其中有3个是本村的(一个是梁传斌,另外两个是杨正保的父亲杨家金和伯父杨家贵兄弟俩),其余15人是外村的。

在小塘那里,日本兵把中新大队桥西村上姓皋的弟兄俩关在草屋里活活烧死了。鬼子兵又抓住了我们村的尹建元、杨家海和大奥(小名)三人,要他们跪在塘埂上,然后一枪一枪地打。尹建元和大奥被打死了,杨家海个头矮,像个小孩,鬼子就把他放了。

在弯塘,两个日本兵抓住了梁金喜、小狗子(小名)、刘道全和梁传才四个人,也叫他们排成一排,跪在塘埂上。鬼子不慌不忙地走到离塘埂六七米远的猪舍,在矮墙上架好枪,一枪一枪地打。第一个被打死的是小狗子,立刻倒在水塘里,第二枪打的是梁金喜,也倒在水塘里了。刘道才一看不妙,一跃而起,跑了。鬼子冲过去,把他抓回来,再次强迫他跪在塘埂上。刘道才跪下后,鬼子再走到猪舍矮墙边拿起枪。刘道才又飞快地跑了,梁传才也一跃而起,往村上拼命跑。梁传才身材魁梧,力气极大。他刚逃进一条小巷子,迎头就碰上了两个鬼子,他左面夹一个,右面夹一个,把鬼子打倒在地上。刚逃出巷口,又碰到了两个鬼子。他三下五除二,就把他们摔倒了,摁在菜园边的水沟里,接着再跑。不料,迎面又来了两个鬼子,他一拳一个,把他们都打昏了。然后,他飞快地绕到杨家烧坏的楼房下,双手抓住一根烧焦的木梁,纵身一跃,上了二楼。几个日本兵紧紧追来,哇啦哇啦乱叫。梁传才怕自己急促的呼吸声被鬼子听见,随手抓起一只马桶套在头上。鬼子没找到上楼的门洞,搜了一回就走了。梁传才赤手空拳勇斗八个鬼子,很快就远近闻名了。后来,他被伪保长请去当了几年保镖。为了这件事,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斗过,但他没做过什么坏事,斗了几次就没事了,一直活到上世纪80年代才去世。

除了以上这些外,我们下山村还有两人在外地被鬼子打死。一个叫梁庆凤,是在汤山青林的沿城被打死的,另一个叫杨光介,他在什么地方被日本人打死的,我们都不知道了。

下山村还有一个叫梁秀荣的,在我们村后一个菜园的边上被日本兵一枪打中了脖子,躺在地上,流了许多血。鬼子走过去一看,一摊血,踢了一脚,没有动,以为死了。后来,他醒过来了,没有死。他没有后代,是

队里的五保户,到三年困难时期才去世的,死时有 80 来岁。

我们下山村位于句容和南京的交界处,又紧靠着京杭国道。村南 300 来米是仙涧桥,当时是座木桥。日本鬼子为了保住国道交通,在桥西皋义富家盖了个岗楼,白天由伪保长征调民夫来看守,晚上由日本兵看守。新四军为阻断交通,曾多次来烧桥。一天,他们派陈先农来我们村联络,察看地形。到了傍晚,有一队新四军潜伏下来,天快黑时,他们从我家门口走过,向仙涧桥运动,和日本兵交上了火。日本人有一个班,又有机枪,新四军没攻下来。他们的一个排长在战斗中牺牲了,后来就葬在我们村边。第二天天亮后,我到我家菜园一看,地上一大堆弹壳,赶紧收罗起来,倒进粪缸里,免得日本人来找麻烦。

(2004 年 10 月 28 日上午调查)葛巷的秦汉英是我们下山村杨光驹的四女婿,长得白白净净的,是个白面书生。他经常骑着一匹白马到下山村来,我们小孩都认识他。跑反时,我们跑到了北圩的袁家巷,他也跑到了那个村上。

他有左右两支盒子枪,防土匪的。他家里有岗亭,一般的土匪打不进去。他家里很有钱,在葛巷一带是很有名的人物。他在桦墅的时候,想开枪把鬼子打死,但村上人不同意,怕鬼子来报复。后来,他在桦墅被鬼子抓住,打死了。

87. 巫维鑫口述

巫维鑫,男,1924 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西梅梅家边

调查时间:2003 年 3 月 18 日

调查人:费仲兴

1937 年 12 月初,从上海撤退过来的一支广东部队曾住在我们梅家边,他们对村上人说:“我们在上海同日本人打过仗,日本人快要过来了,你们快跑吧。”他们这么一说,我们梅家边的人就比别的村早跑几天。村上大部分人逃到龙潭北圩,住在老百姓家里。当时圩子里都灌水了,远看白浪浪的一片,日本人没有船,进不了圩子。

跑反期间,除少数几家外,梅家边绝大部分房屋都被日本人烧光了。老百姓家里收藏的稻谷和大米都烧焦了。大家把枯米背到北圩吃,那枯米特别难吃,可不吃又不行。

跑反期间,我们梅家边有两个人被日本兵打死了。一个叫赵贵生,他被日本人抓去了,后来无影无踪,再也没有回来,不知死在什么地方。另一个是胡长海(小名小老虎)的爷爷,是在路上走的时候被一个骑马的日本兵一刀捅死的。

安民后,日本兵还经常到梅家边来抢鸡、鸭、猪。一天,日本兵把鲍仁朋的奶奶和另外两个 50 来岁的妇女推入一个大粪坑,三个人在粪坑里拼命挣扎,呼喊救命。她们挣扎了好长时间。后来日本人走了,有位老头把这三个人救了上来,才算保住了性命。

我们村上还有一个人叫梁庭驹,小名叫三聋子。跑反回来后,他见住房被烧毁了,就同本村的周贵乾一起到汤山砍树。他们把一棵棵碗口粗的柏树砍下来,准备盖房子时做椽子用。梁庭驹力气大,几斧下去,树就倒了。周贵乾力气小,用锯子锯,半天才锯断一棵。这些柏树拉回村上,泡在水塘里。后来,两人商量怎么分。梁庭驹出力多,想多分点。周贵乾心里不乐意,就在一天夜里偷偷将柏树拉上来盖房子用了。梁庭驹很气愤,找周贵乾算账,周贵乾就是死活不承认。不久,周贵乾同日本人的爪牙拉上了关系,后台硬了,更不怕梁庭驹了。梁庭驹眼看扳不倒他,一气之下就跑到句容土桥,参加了新四军领导的常备队。周贵乾一看不妙,就串通一些人向汤山的鬼子告密。鬼子把梁庭驹抓到汤山的陶庐,用门闩打他,逼他承认是新四军,要他下跪。梁庭驹是位硬汉,死活不肯下跪。鬼子就用刺刀刺,他还是不肯跪。鬼子先后刺了 27 刀,梁庭驹就这样被活活地刺死了。解放后,我当青林乡乡长时曾专门调查过这件事,认为应该追认他为烈士。可是,因为土桥的常备队在后来叛变投降了日本人,就没有办成这件事。

88. 陈广顺口述

陈广顺,男,1924 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西梅西岗头 76 号

调查时间：2003年8月12—16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0岁，跑反那年13岁。解放后曾去镇江举办的乡级干部短训班学习，认得一些字。回来后当青林乡（管辖青林、西梅、作厂）的乡长，干了六年。后来到83医院旁边的高干疗养院当炊事员，干了十年。再后来，又调入南京综合仓库，一直干到1979年退休。现在住在女儿陈锡红家里。

1937年冬，国民党中央军的一个团从上海西撤后就住在我们西岗头。团长是广东人，住在陈万炎家。他们在墙上打了几个洞，架了枪。当时，西岗头家家户户都住满了中央军的人，十分拥挤。许多人脚上打了血泡，问我要红蜡烛烫血泡。当时，正式军人佩带方形胸章，刚拉来的壮丁也穿军装，但佩带三角形胸章。



陈广顺

日军攻打句容、汤山之前，国民党在南圩至北圩一线修筑了许多碉堡，挖了许多战沟和壕沟，还在宝华山山顶上修筑了一个大炮台。战沟和壕沟不同，是用来挡坦克的，挖得很深很宽，许多良田都被挖了。在我们这一带，挖沟的全是第六区的民夫。挖沟时不准歇，谁要是停下来直直腰，监工的军官就用皮鞭打他。后来，形势越来越紧张了，监工的军官

跑了,民夫就纷纷逃回家,准备跑反。我大哥陈广炳、二哥陈广华和两位嫂嫂就是在那个时候走的,他们躲在北圩黄家荡村一个篾匠家里。当时,我父亲右膝盖害病,不能站,更不能走,我母亲、三哥和我就留在家里照料。中央军那位团长见我们没走,就说:“东洋人要来了,他们见人就杀的,你们还不快跑啊?”后来,村上外逃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就用小毛驴驮了父亲到东巷附近的西社,让他躲在我舅舅家里。我每天天一亮就去西社照料我父亲,下午天黑了就回西岗头,跟母亲住在一起。

日军的探子打听到西岗头有中央军。后来,12个鬼子从南社经西社到东巷,埋伏在东巷的北面。这12个鬼子是从我舅舅家门口经过的,嚓嚓嚓的皮鞋走路声和哇啦哇啦的讲话声听得清清楚楚,父亲吓得钻在床底下打哆嗦。在我舅舅家门口不远处,一个给他们带路的佩带三角形胸章的中央军吓得走不动了,鬼子一枪就把他打死了。这些情况我都是亲眼看到的。

住在西岗头的中央军虽然号称有一个团,但斗志涣散,无心恋战。第二天天刚亮,他们就离开西岗头向北面山上撤。埋伏在东巷北面的鬼子用机枪打他们,他们也不还枪,反而跑得更快。许多人纷纷改穿老百姓衣服,枪也丢了,马也不要了,附近山上到处都是丢弃的枪支弹药,九华山九华庙附近尤其多,步枪、手枪、机枪随处可见,一个团的兵力就这样不战而散了。日本鬼子打了一阵机枪,不敢进山追击,怕密林中有埋伏。半年之后,新四军打听到这里有大量散失的枪支弹药,就派人过来秘密收购。我舅舅家的表哥比我大几岁,胆子很大。他拣了两支步枪藏在田埂下用土埋了,后来就卖给了新四军。新四军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壮大,与这批枪支弹药有很大关系。

日军占领炮校后,就派兵到各村点火烧房,见人就杀。那时候,我站在九华山九华庙朝南看,从东到西,远远近近,村村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半边天都烧红了,我心里害怕极了。日军完全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烧杀的。我们西岗头先后被烧了三次,绝大部分房屋都被烧光了,只剩下一些断墙残壁和烧焦的梁、柱。

后来,我们村的莫庆元在宝华山山脚下被鬼子开枪打死了。他儿子是个木匠,就找些尚未烧焦的木料打棺材。躲在北圩的人回村挑米,见

木匠在打棺材,就聚过来看。大家凑在一起有 20 来人。人一多,大家就不害怕了。我三哥天天去看木匠打棺材,木匠对他说:“你没事就出去看着点。东洋人来了,我们一个也跑不掉。”三哥叫陈广寿,那年才 17 岁,比我大 3 岁。他性格直爽,听木匠这么一说,就站在烧焦的大门口守着。那天上午十点多的样子,一队鬼子果然从梅家边过来了。三哥立即大喊:“东洋人来了!”二十来个小伙子一听,就拼命往牛牧岗的小山上跑。鬼子看到这么多的人跑出来,没打枪,估计是够不着。鬼子进村后,见到了陈广泉,就比划着手势要他把人喊回来。陈广泉不知是计,就跑到牛牧岗喊他的两个儿子回来。躲在小山岗密林里的小伙子一听是陈广泉在喊,以为没事,就一起回村了。他们一进村,30 多个鬼子就把全村包围了。

那天上午,三哥、母亲和我都在家里,没有跑。一个鬼子军官腰里挂一把指挥刀,见我小,就拿我开胃(寻开心)。他把吸了几口的香烟摔在地上,要我拣起来叼在嘴里,我照他比划的样子做了。其他几个鬼子也把香烟摔在地上让我拣,我没办法,一支一支地拣起来,叼在嘴里。最后嘴里叼了六七支香烟,鬼子们就哈哈地狂笑。然后,鬼子把我带到小学后头的球场上,要我把棉裤脱下来,他们一个一个来摸小雀雀,还不让我哭,哭一声就打脑袋。我的头都晕了,勉强装装笑脸,那位军官也朝我笑笑,我就以为没事了。

过了半小时左右,鬼子把二十来个小伙子拉到球场上,叫他们站成两排,跪下来。小伙子不敢不依,都跪下了。鬼子架起了机枪准备行凶,但没有立即开枪。那个军官把我拎到他身边,让我站在机枪后面。他一会儿拍打我的脑袋,一会儿又塞块糖给我吃,不准我哭。我不知道他们在玩什么鬼把戏,就看着他们。不一会,鬼子军官向跪在地上的人讲话了,声音很高,哇啦哇啦地讲,不知说些什么。说完,机枪突然开火,向跪着的人扫射。一两分钟的样子,两排人一个个都倒下了,球场上血流成河,惨不忍睹。我目击了这场血腥屠杀,心里扑通扑通直跳,不知道这帮家伙为什么这样残忍,为什么要屠杀手无寸铁、平白无辜的老百姓。

扫射完毕,鬼子就把我带到球场东面不远处一地主家的照墙边。他们用两根铁棍把一个个手提饭盒串起来,架在火上烤,烤热了就狼吞虎

咽地吃饭。

三哥和母亲本来一直躲在我家的断墙边，没跑出来。后来听到哒哒哒的机枪声，三哥就怕了。他从家里跑出来，穿过一个竹园，沿小路向牛牧岗跑。不料被烤火吃饭的鬼子看到，一枪击中。他在地滚了几下，就滚到路边的茅坑里了。伤口进了水，他更疼了，拼命挣扎。我二哥的丈人看到后就把他从粪坑里拉了出来。三哥痛得在地上乱滚乱抓，附近地上的草全抓烂了。挣扎了一会，他就断气了。

鬼子吃完饭，又把我拉到球场上，不准我动。他们把死尸一个个翻过来，脸朝天，然后用刺刀一个一个地刺。村民陈万有当时跪在第二排，没有中弹，鬼子在他脖子上刺了两下，他也没有动一动，估计是昏过去了。鬼子刺完了，就集合起来向西走，回炮校。后来，陈万有苏醒过来了，爬起来擦擦脖子上的血，一步一步回家了，他弟弟和弟媳又把他带到了北圩，总算拣了一条命。

西岗头大屠杀的消息传到北圩，妇女们就哭开了。哪家死了人，死了几个，一下就知道了。大哥、二哥听到消息，连夜赶回西岗头。他们找了一块门板，把三哥抬到村西荒地埋了，又急急忙忙赶回北圩。

在西岗头小学球场上被鬼子机枪打死的村民共 23 人，其中 2 人是外村的，不知姓名，其余 21 人都是西岗头的，他们是：陈广林、陈广泉、陈广聚、陈广海、陈万松、陈万夏、陈万宽、陈道法、裔建昌、裔景华、裔景富、莫庆文、莫庆武、李克俭、李永华、李小三子、周小根子、赵小三、董老大、曹友恒、吴宝财。为防野狗来吃，他们的尸体很快就草草地埋了。一家几口被杀的，就埋在一个坑里。安民后，再小心地挖出来，装进棺材另行埋葬。挖尸体时，死尸都发胖了，一抓就烂。后来用毛竹片从下面穿过去，才一个个完整地挖出来。

除了上面讲的这些以外，我们西岗头还有好多人在别处被鬼子打死。

裔建和：跑反时在宝华山南面的东葛庵被鬼子一刀砍死，死时约 50 岁。

陈小四子：我的家门侄儿。刚跑反时，他就和他妹妹逃到句容练城。他在那里被鬼子一枪打死，死时约 17 岁。

陈治富：跑反期间，一年中最冷的时候，我家门前池塘里结了厚厚的冰。日本人叫他下塘敲冰摸鱼，他没下去，被一枪打死，地点就在我家墙角处。他是个极其老实的人，死时约 60 岁。

陈广发：鬼子刚来时，他想躲到地主家牛舍的大门上头去，因没有梯子，没爬上去。鬼子发现后，在牛舍拐角处用刺刀把他戳死了。死时有四十来岁。

刘贤春：60 岁左右。他在自家大门口走路，因耳聋，未听到日本人喊，仍自管自地走，就被鬼子一枪打死。

陈广峰的老婆和女儿：跑反时，夫妻俩背着 2 岁的女儿从外地回西岗头，走到村南的田鸡塘，遇到了日本兵。鬼子一枪把他女儿的腿打断了，又放一枪，把他老婆打死，打完就走。女儿拼命地哭，他一狠心，把女儿摔在水塘里。小女孩穿着棉衣，浮在水面上哭，没有沉下去。这时，有三个日本兵听到枪声，便从梅家边跑步过来。见小女孩还浮在水面上哭，就打手势叫他捞上来。他们看了看打断的腿，又打手势叫他把女儿抱回家。他抱着女儿走了一段路，见日本人走远了，还是把她摔在水塘里淹死了。

李连才：当时将近 70 岁，高个子，瘦瘦的，走路都走不动了，鬼子拉夫，要他扛枪往土桥走。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一家人到处找，没找到。

张再银：日本人抓他去送菜，再也没有回来。全家去找，也没找到，不知他死在哪里。

此外，还有十多个外地人在西岗头附近田间和村边被日军杀死，东一个西一个的，不知是哪来的。后来安民了，我们村上有些好心人就把他们统统埋在炮校炮营后头平山的一个大坑里。这个大坟在解放后劈山造田时平掉了。那个大坑很深，估计坑底下还有一些尸骨。

跑反时，日本人的飞机常来，每次都是三架一起飞，轮流转圈子。有一次，我躲在村后马家棚小山附近的水塘边，日本飞机向马家棚山上投炸弹，有三个南巷村的人被炸死了。

有一天，日本鬼子把村上的老头老太拉到一起，逼着他们排成两排，脱光衣服，双腿叉开。冬天那么冷，为了活命，也只能依了。鬼子趴在地

上,从下往上看他们的下身,一个一个看完了,就狂笑一番,走了。鬼子兵真是下流无耻到了极点,什么事都想得出来。

日本鬼子的心眼多得很,他们放火也有专门的器材。那东西有这么长(约 20 厘米),卷成一卷,里面一片一片的。可以一片一片地拿出来点,也可以一卷一点,可以烧更长时间。一个鬼子在水塘边点给我们小孩看,还叫我们点。那火苗蓝蓝的,烧着的小片片丢在水里也不会灭。他们就是用这种东西烧我们的房子。

后来,汉奸组织了绥靖队,每个日本部队里都有绥靖队的人。日本人给他们发衣服,还给他们发饷。鬼子的衣服是帆布的,绥靖队的衣服是土布的。绥靖队帮日本人看守公路上的桥梁,随时报告情况。句容的黄梅桥被新四军浇了汽油烧过几次,碉堡里的绥靖队每次都向新四军开枪,赶紧向日本人报告。日本人到九华山搜山,绥靖队的人也跟着去。

日本人还叫民夫给他们看守公路。我们西岗头的民夫管作厂到黄梅桥这一段,集合的窝点就在作厂张四麻子家。不是每天都去,各个村轮流干。

1937 年国民党撤退时,用汽油把炮校的一部分房子烧掉了。跑反回来,安民了,各村各户的房子被鬼子烧掉了,老百姓没地方住,就去拆炮校的房子。除了两个大门外,炮校能拆的东西都拆了。后来,鬼子要住在炮校里,就到处弄砖瓦修房子,但修得质量很差。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又把炮校修了修。

89. 裔文钊口述

裔文钊,男,1932 年生

调查地点:南京苜蓿园大街(原住汤山镇西梅西岗头)

调查时间:2003 年 9 月 21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72 岁,属猴,退休前在新疆一家银行当行长。

跑反时,我 6 岁。老人、妇女和小孩先走,身强力壮的后走,他们见到了日本人再逃也来得及,而且就躲在村后小树林里,白天出去,晚上回

来。我父亲那年 31 岁,鬼子进村了,他还在家里,听到枪响,拔脚就跑。后来一想,怕跑不出去,就钻进后院柴草堆里。鬼子用刺刀戳,他被刺中一刀,仍一动不动,躲过了第一关。见外面没响声了,才从柴草堆里钻出来。抬头一看,还有日本人,赶紧翻身跳进夹墙。日本人哇里哇啦的喊声,皮鞋踩地的咯咯声,他听得清清楚楚。就这样,他躲过了第二关。

跑反时,我家十来口人是分开来跑的,我和爷爷、奶奶一起,躲在宝华山的东葛庵。鬼子来搜查,躲在大庙里的年轻人从后门跑了,钻入密林,剩下 100 多个老人孩子来不及逃。鬼子军官先叫士兵放火。他们用一片一片的黑火药引火,那东西一点就着,又能黏糊糊地沾住木头,火药片烧完了,木头也就点着了,很先进的。庙里的菩萨是泥做的,但表面一层油漆烧得着,开始时一滴滴往下掉,最后一片片掉下来,火势很旺。鬼子一边放火,一边打手势,比划着审问一位老人:“你的,说,戴帽子的,当兵的,哪里的干活?”(当兵的都戴帽子,老百姓不戴帽子。)那老人蹲在地上,双眼瞪着鬼子,似懂非懂。鬼子“嗖”的一声拔出指挥刀,架在老人脖子上。老人依然一声不吭,鬼子“啊”的一声,把头砍掉了。顿时,在场的老老少少都哭了。鬼子又抓住第二位老人,一刀砍死。接着,便抓住了我爷爷裔建和。他有气喘病,此时已喘得上气不接下气,鬼子把指挥刀搁在他肩上。我再也不敢往下看了,躲在奶奶身后。回头再看时,他已经人头落地了。

东葛庵在宝华山南面,周围是密密的竹林,连绵不断。若不是汉奸告发,日本鬼子是绝对找不到这个地方的。那年月,汉奸活动太猖狂了,无处不有。

退休后,我把抗战期间西岗头遇害村民的姓名、遇害经过、财产损失等调查清楚,写成材料,加上被害者后代的签名,送给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备案。根据我的统计,当时全村共有 42 户,有 34 人先后遇难,26 家房屋被烧,共计 91 间加 26 厢房。这就是我写的材料,给你一份吧。

这笔账一定要算。十年不行,二十年,二十年不行,三十年。我写的这些材料,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后来,我在祖父墓前立了块碑,碑文是:“先考裔建和、裔景华、裔景富。此三人于 1937 年 12 月被侵略中国日本军无辜杀害遇难。具证人裔文钊特立此碑明志纪念。”我还打算在

西岗头国民小学旧址前再树一块碑,纪念遇害的 23 位同胞,让子子孙孙永远牢记这段历史。

在日军攻打南京之前,国民党军队在西岗头一下山村—仙涧桥—新庄一线挖了许多战壕,这些都是我亲眼看到的。再往南还有,我没去看过。主战壕有 5 米来宽,2 米深。通往每个村庄的小战壕就更多了,有 1 米来宽,1 米多深。主战壕是弯弯曲曲的,充分利用了当时现有的水塘。西岗头的东边有许多水塘,主战壕就从那里经过。我家有 2 亩地,在西岗头东边,这块地全挖了,好多年之后都没填平。战壕和水塘不挖通,留一条小路隔开,水塘里的水不会流出去。梅家边在主战壕的东边,所以后来炮校里的日本人不常去。

在日军攻打南京前,国民党军队把青年人集合起来搞军训,有的训个把月,有的训三四个月。训时发枪,训完收回,所以村上许多青年人都会打枪。有的地主老财还花钱买枪。我们村就有两家姓裔的财主买了汉阳造的快枪(长枪),我都看到的。日本兵打来了,他们把枪埋在院里的乱砖堆下面。胜利后,他们把枪拿出来放。我的一个本家叔叔,拿着沾满黄油的快枪,呼的一枪,呼的一枪,那声音可响了。他也是在战前受过训练的,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民兵,没有武器的民兵。

日本兵到我们西岗头烧杀抢掠,不是一次,而是多次。哪一天打死了谁,确切日期多半记不清。后来安民了,日本兵还常来。一二十个人,三四十个人,像是小分队,从西岗头经过,往九华山,在九华殿一带搜捕新四军。我父亲给我讲,他曾给九华山的新四军送过信。他叫裔景荣,在我们村上也算是个人物,很有威信的。九华殿在九华山的半山腰,庙有两进,十来间房,庙前有水塘。每年农历七月二十九有庙会,解放后还搞过。后来,庙拆了,但庙会还有,地点搬到新塘了。汤山的庙会在农历三月二十五,但汤山的庙早就拆了。解放前,附近的庙多了,我们西岗头村后就有一个大庙,叫北社祠庙,庙里的古树老粗老粗的。现在,哪里还有这么粗的树?

我家隔壁有个邻居叫李茂,身强力壮,有 1 米 85 的个头。日本人好胜,老找他去摔跤。一个打不赢,就上第二个。第二个打不赢就上第三个、第四个,直到打赢为止。后来,每次摔跤,李茂就装输,不和他们较真

了。日本人真是处处要占便宜,不占便宜不罢休。

西岗头村西边,那时候是一片密林,后面是山岗子。安民后,日本兵常来此地演习,在附近插许多旗子,挖许多战壕和掩体。演习时,机关枪、迫击炮响个不停。那炮弹里装的是一迭迭的纸片,一炸,纸片到处飞,我们小孩就去捡来玩。他们搞演习,完全不顾老百姓的庄稼。

在日军攻打南京之前,国民党说要死守南京,从上海、苏州、无锡、常州一带逃过来的有钱人都以为南京是首都,到了南京就安全了。结果,他们上当了。不来南京,他们也许不会死,到了南京,几乎都被日本人打死了。我在1946年到南京三山街当学徒,学铜锡五金,做铜锣响器、铜脸盆、烫婆子等等。那时,城南一带到处是被日本人烧焦的房屋。

下山村杨正保的父亲是被日本人打死的,他母亲急得上吊。杨正保2岁就失去了父母,是由他叔叔带大的。后来,他到南京三山街当学徒,学铜锡五金,是我的师弟。他解放后当上了南京市公安局的副局长,前年心肌梗塞死了。

在新庄南面的一个村上,有个老汉会武功。一天,日本兵逼他带路,他就把两个鬼子带到偏僻地方,趁其不备,给他们点穴了。后来,日军找到这两个鬼子,一看,既没有枪伤或刀伤,也没有搏斗的痕迹,无缘无故地死了,十分骇怪。老百姓都知道是谁干的,可谁也不说,因为大家都恨日本鬼子。

90. 江恒贵口述

江恒贵,男,1921年8月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青林周家边

调查时间:2003年11月23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4岁,耳朵不聋,眼睛不花,天天看报的,关心国家大事。尤其关心伊拉克,美国人太不像话。

我在青林小学、孟塘小学、上峰小学当过老师,1983年退休。后来,

学校里又要我干,所以我一直到1997年才真正退下来。现在每月有1200元退休金。可老伴去世了,一个人感到孤单单的。

日本人来的那年,我和弟弟江恒玉很早就跑到大凹避难了。我妹妹嫁给大凹一位姓吴的人,我们就住在她家里。大凹有一千来亩山地,全是唐大先生的。他家在山脚下有三间两厢的瓦房,原是给看茶叶的人住的,后来都住满了人。到大凹来避难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就搬到村后山上,躲在密密的树林里。后来,日本人就过来了。夜里,我们在树林里躲着,日本人的骑兵在石片路上经过,那马蹄声听得清清楚楚。



江恒贵

日本人占领汤山后,就在汤山主峰团子尖架起机枪,一到天黑就不停地向山上山下乱扫,躲在附近密林里的老百姓,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打伤,可多了。我亲眼看到一位三十来岁的妇女,胳膊被子弹打伤了,一条毛巾缠着,全染红了。我们一看躲在山上不行,就再往上爬,躲到老虎洞里了。

老虎洞是天然形成的,不是人工挖出来的。上层的洞高,很窄,只能躲七八个人,下面的洞大,圆溜溜的像个饺子,能容五六十人。但下面的洞不高,得弯着腰才能走路。上下两个洞都有梯子,跑反前就准备好的。我们去的时候,洞里挤满了人。有个三四岁的女孩哇哇地哭,怎么哄也不行。站在旁边的人急得直跺脚,说:“不能让她哭,日本人听到了就全没命了。”女孩的母亲没办法,就用床单把她捂死了。

第二天,我和弟弟就离开了老虎洞,趁着天黑从陈达村穿过宁杭公路,经刘岗头到窑湾,找到了我们父母亲。那天晚上穿越公路时,旁边壕沟里有好几具中央军的死尸。远处,鬼子不时地朝公路上放冷枪。我们是死里逃生,好不容易才到窑湾的。

跑反期间,周家边全村除一间瓦房外,其余房屋全都烧光了。村上有八九个人被鬼子抓住,在水塘边跪成一排,鬼子开枪射击,有两个人枪一响就倒在地上装死,一个叫张先炳,衣袖上打了个洞,一个叫张道金,没有中弹。后来,鬼子过去用刺刀把他们挑到水塘里。张道金背上被戳了一刀。鬼子走后,他们两个从水塘里爬了出来,才算捡了一条命。张道金因此得了个“打不死”的外号。

周家边离汤山镇只有一里路,鬼子经常来。村上许多猪、牛、羊被鬼子打死或烧死。跑反刚开始的时候,部分村民回村找粮食,发现死猪、死羊都能吃,就拉回去吃了。后来,时间长了,肉发臭了,不能再吃了,就把猪油、羊油挖出来,熬油点灯。

周家边的南头是菜园队。现在菜园队的人都搬迁了,那里就是东湖丽岛了。原来的菜园队那里有条土路,路边有间孤零零的草屋,没有被鬼子烧掉。有个牛牧岗的妇女被四个鬼子发现了,他们把她拉进草屋,轮流站岗,把她强奸了。

91. 金兴槐口述

金兴槐,男,1930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青林刘岗头30号

调查时间:2004年1月24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以前当过青林大队的书记。跑反那年我7岁,先跑到老伏牛村,第二天又跑到北圩大周村,安民后才回来。

日本鬼子在青林大队杀人放火,强奸妇女,被他们害死的人就多了。1937年农历腊月二十三日,在我们刘岗头大队部那个地方,鬼子一次就打死了22个人,都是我们村的老百姓。当时,村上大部分人都跑了,少

数人没跑,还有一部分人回村取粮。驻扎在沿城的鬼子到刘岗头来,把村上的人统统赶到大队部那个地方,开枪打死了。被打死的有刘家凤、文永根(绰号二根子)、老东(姓王,外号)、白学勇(我的老丈人)、荣泰(住在村上的外村人)、做瓦匠的刘智若、他的母亲、他的家门侄女,还有李兴根的爷爷和奶奶。村民周光礼的胳膊被打断了,但没死。其他死者的名字记不清了。

安民之后,日本鬼子杀人的事就少了,但还有。我父亲金长禄、我的叔叔、他的同年弟弟和另外一个人在1938年农历七月十二被鬼子抓到“大楼”,四个人都被杀害了。那年,我父亲47岁。事情是这样的:跑反期间,日本人把我们村上的房子都放火烧了,只剩四家没烧。跑反回来后,村民没房子住,就想办法弄房子。我父亲他们四个人到东储岗(即东营房)去拆木料,路上遇到了日本兵,当时还没有发生什么。后来,他们四个人从东储岗抬了一块厚厚的洋松木料往回走,又遇到了那几个日本兵,日本兵就把他们抓起来,带到“大楼”关起来,隔了一天,就把他们杀死了。

我们刘岗头当时有200多人,那么多人没房子住,非常困难。我父亲被杀害后,我姐我弟和我妹都还很小,妹妹才6岁,不久就病死了,根本没钱治病。一直到解放后,家里才盖了两间小草房,有了住的地方。

我还有个家门婶婶,跑反时跑到孟塘,在那里被日本飞机炸死了。

抗日战争期间,刘岗头一带是模范林,北边山上到处是密密的树林,日本鬼子三个五个是不敢进山的。老伏牛村和王家庄那里很少有人去。槐花洞里有二百来人被鬼子用烟熏死的事,我从来没听说过。听老人讲,长毛时(太平天国时)跑反,有人躲在那里,在洞里被烟熏死了,可那不是日本人来的时候。

青林大队管老伏牛村、小伏牛村、王家庄、上窑湾、下窑湾、刘岗头、周家边、沿城、菜园队等,有几万亩山地,地盘比孟塘大队大一些。这几个村子里,沿城最大,其次是刘岗头、周家边。日本人都住在沿城。当时,房子都烧光了,日本人在村上最高的地方扎了个岗楼,住在里面。

刘岗头村南边有个庙,有3进15间房,香火蛮盛的,附近不少地方的人都来,新塘那边也来烧香的。破四旧时,这座庙被拆掉了。九华山

上的九华殿,也是在破四旧时拆掉的。九华殿下面有方府,是方维甸的祠堂,房子很大,盖得很漂亮的,有大乌龟驮碑,还有大牌坊,后来全拆掉了。

92. 李永富口述

李永富,男,1928年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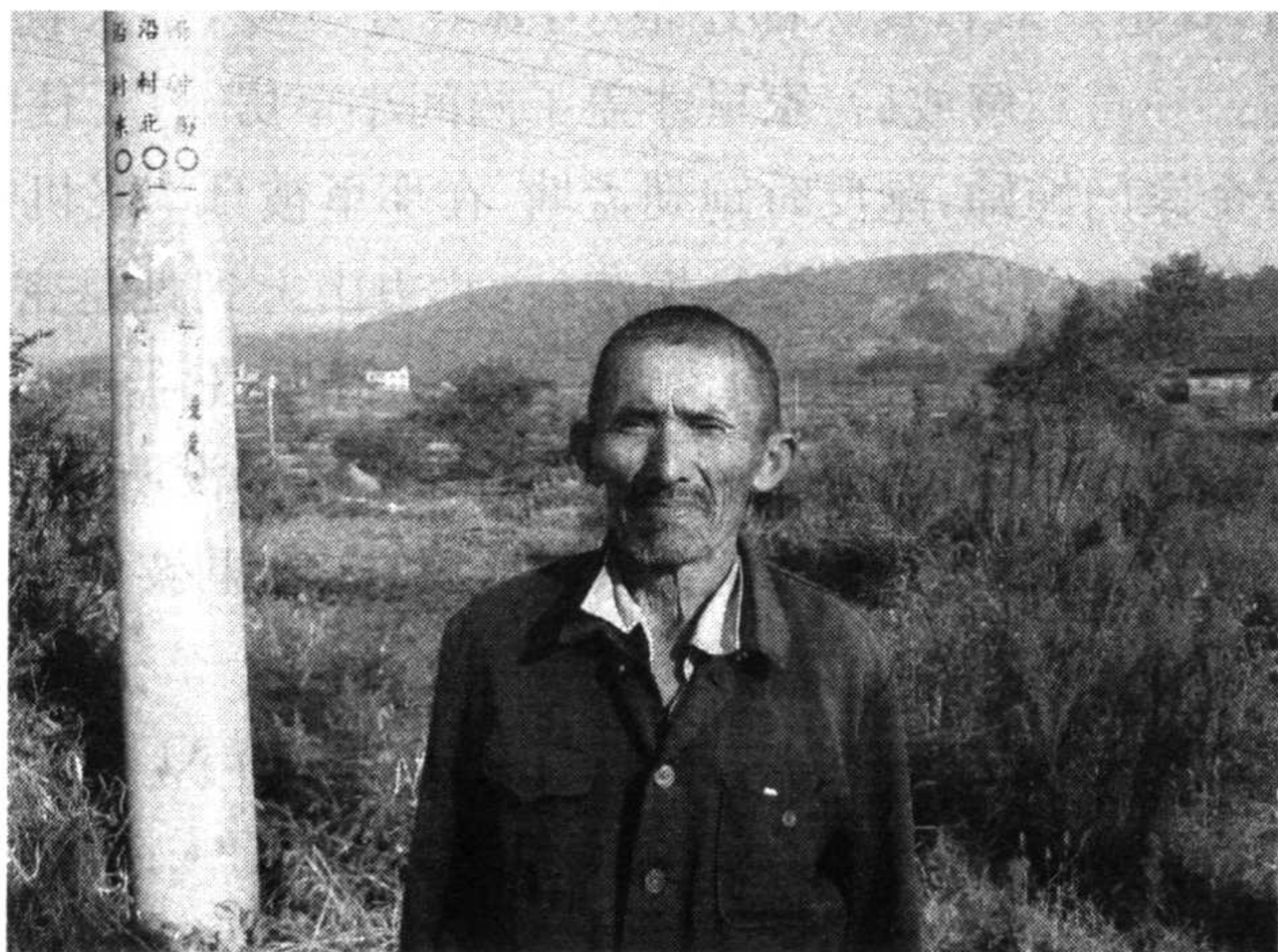
调查地点:汤山镇青林沿城20号

调查时间:2004年11月1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77岁,属龙,跑反时10岁,我不识字。

跑反前,广东兵住在我们村上,天天下雨,天天要人去挖壕沟。我父亲李国银,膀子脱臼了,腿又一瘸一瘸的,也被拉去挖壕沟。他不干,广东兵要打他50大板,他就把衣服脱了让他们看。东巷有个保长,是个老表,替他说情,他才没有挨打。后来,日本兵打过来,广东兵根本没有去占壕沟,没打几枪就跑了。



李永富

跑反时,我们跑到了孟塘张家岗。冬月初四跑,第一天就到了张家岗。我大大(伯父)的舅大爷在张家岗,我嬷嬷(伯父的妻子)就是张家岗

人。南京下来的部队,有一个军,盒子枪多,长枪少,机关枪也多,在方冲同日本人打了一仗,死的人密密麻麻。听我父亲讲,他们原来要去周冲,再到宝华山去,带路的人带错了,带到了方冲。带路的人姓安,叫什么名字不知道,是住在后巷的,他儿子叫安和林,比我小一岁,去年去世的。那天晚上十点来钟,中国兵喊:“日本人到这里了!”日本人在山顶上埋伏了,“大楼”也被日本人占了,日本人从山上往下打。中央军抢占了“大楼”,冲到新塘,句容的鬼子后来接上来了,把中央军赶到九华山,中央军都打跑了。

中央军同日本兵打仗时,我们躲在张家岗北面的过山上,就在孟塘北面一里多路,听到机枪声,听到中央军的喊声。后来我们又跑到了桦墅、东阳、龙潭,下了圩。在龙潭,火车上全是老百姓,像三月二十五日赶庙会一样,人多得不得了。老百姓只准进不准出。听说中央军一个排开到大赤燕同日本人打,村上有人看到这个排的中央军向日本人投降了。

我们在圩里躲了些日子,我二大大(二伯)李国柱到圩里来,说外面不要紧了,用不着躲在圩里了,躲在附近山上就可以了,要我们回去,我们一家就全回来了。到了安基山,二大大被鬼子打死在田里,我们又回到了圩里。鬼子到圩里去的少,只有三个两个的,找花姑娘。

我爷爷李家选,当时 61 岁,在沿城出来看看,被鬼子看到后一枪打死了。还有一个人叫李国亭,年纪同我爷爷差不多,也是在沿城被鬼子开枪打死的。

周家边宝林庵的一个女道士,鬼子和她睡完了觉,用长长的日本瓶子塞进她的下身,她滚来滚去,最后痛死了。周家边的老人个个都晓得。宝林庵有六间房子,两进,只有一个女道士。

安民后,鬼子还下乡找花姑娘,炸炮台,把沿城李国贤的腿打断了,他当时 50 来岁。

我家的房子原来蛮好的,鬼子一进村就烧房子,我家的小瓦都飞起来了。鬼子烧完房子就走了。

我们村的李国良,是我叔叔辈的,他躲在洞里,拣炮弹,一炮打过来,把肩膀打伤了。保长带了他去求鬼子医生治,说他是扎柴负的伤。日本伤兵医院的鬼子医生一看就是炮弹炸伤的,上去就给保长一记耳光,但

后来还是给李国良看病,后来也治好了。

跑反期间,村民回家背粮食,20多个人被鬼子叫到刘岗头的卧山上(今刘岗头大队部办公室所在地),开枪把他们打死了。周家边的张贤生跑了,鬼子开枪打他,他一拐一拐地往周家边跑,没有打死。还有一个人,鬼子一开枪他就趴在地上,鬼子用刺刀戳他的脖子,他也没有动,没有被鬼子打死。后来,周家边的人都喊他“杀不死”。他的名字不知道,现在他已经去世了。

跑反期间,沿城有几十个人被鬼子打死了,有的在螺丝冲,有的在小赤燕,有的在安基山。

李永树在大赤燕被鬼子打死了。

“商家”和“大石子”弟兄俩,30来岁,在螺丝冲被鬼子打死。“商家”讲起话来笨头笨脑的,家里又没有钱,大家就喊他“商家”。他儿子叫李云正,已经死了,孙子有四五个,大孙子已经50多岁了。

还有一个人姓李,外号叫冬瓜老四的,也被鬼子打死的。

“八张嘴”小龙,60多岁,爱讲话,被鬼子打死了。

跑反时在北圩,我母亲给别人当奶妈,给人家的小孩喂奶。我妹妹当时才1岁左右,反而没奶吃,饿一顿饱一顿的,后来饿死了。

村上还有好几个女孩,跑反时哭,被大人摔在“长尾巴”塘里(今安基山水库)淹死了,有几个小孩被大人用手活活捂死了。

93. 李传道口述

李传道,男,1923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青林沿城144号

调查时间:2004年11月2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2岁,属猪。跑反时,我15岁,父亲已去世了,我一个人跟着我母亲跑到北圩(我母亲就养我一个),在那里住了20来天。阳历元旦,日本人放假,一手下圩了,我们连夜跑到宝华山,躲在隆昌寺里。那个庙没有被日本人烧掉,有和尚的,山上树又多。我们在外面躲了两三

个月就回家了。

跑反期间,日本人把我们村上的房子全烧光了,只剩下两三家没有烧。那时全村 100 多户,日本人住在我们村上,就住在没烧掉的房子里。跑反回来后,日本人已经走了。

我本家的一个叔叔,李克×,16 岁,跑反时被鬼子抓去了,一直没有回来,失踪了。

李昌龙的父亲李永树,当时四五十岁,在孟塘被鬼子打死了,他是全村第一个被鬼子打死的。

李昌盛的爷爷李国旗,当时四五十岁,在宝华山北面被日本人打死了。在那里被打死的有好几个。

我们种豆子,日本人来之前是不生虫子的,日本人来了之后就生虫子了,是他们带来的细菌传染的。

94. 李永本口述

李永本,男,1920 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青林沿城

调查时间:2004 年 11 月 2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85 岁,属猴的,跑反时 18 岁。冬月初四跑反,跑到了北圩的老洲湾。后来又跑到宝华山,住在隆昌寺大庙里,住了一个来月。大庙没有烧掉,有和尚,每天挑两桶稀饭让我们喝。鬼子也去庙里的,我们见了就跑,躲在树窝里。我们帮庙里砍柴,和尚还给我们几个零用钱。

我家有八九间砖瓦房全给日本人烧掉了,那是老式楼房,很好的。猪圈里的五头大肥猪,一头老母猪和一窝小猪全烧死了。我家一条牛牵到花园(地名,在北圩),被日本人开枪打死了。他们打死了牛就走。我们把牛杀了,村上人分了吃。

我兄弟两个,我是老二。老大叫李永洪,他不在了。我们村上有 30 多个人在外面被鬼子打死。我脑筋不行,记不清了。刘岗头死的人多,周家边死的人也多。

李永树,在孟塘被鬼子打死的,尸体没找到。

李永宝的老子李××,外号叫冬瓜老四,被鬼子拖了去,一直没回来。还有一个叫小龙,外号“八张嘴”,一起被拖去的,没回来。李永宝今年78岁,是党员,他小时候吃的苦多。父亲被打死,母亲又是两眼瞎子,从小就看不见的,他就跟了他大大过日子。

李昌盛的爷爷叫李国旗,绰号叫“商家”,在宝华山北面的河冲被鬼子打死的。他的兄弟李国庆,外号“大石子”,在安基山被鬼子打死了,李国庆的儿子后来得病死了,他家里就没有人了。

李国柱也是在安基山被鬼子打死的,只剩下一个头,身子被狗啃掉了。他儿子去世了,孙子还在。

李永塘(李克宽的爷爷)在沿城前面的水塘边被鬼子打死,我们跑反回来后把他捞上来的。

李家选,在村前头被鬼子打死的。

李国寿,在村上的路口被鬼子打死的。他的媳妇被鬼子一枪打通了肠子,吃饭要漏出来,过了两年就去世了。

(李昌月^①补充)以前李国恒调查过的,沿城一共打死了36个人。他是在安民以后统计的,只知道这个数。家选的孙子李永恭今年83岁,他知道的事多。

95. 李永恭口述

李永恭,男,1922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青林沿城63号

调查时间:2004年11月5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3岁,属狗,跑反时16岁。父母、兄弟姐妹和叔叔婶婶,一大家子十几个人都跑到了龙潭北圩的三公庙。在那里住了20来天,没有吃的了,就跑回来,住在宝华山山脚下的佃户家里,安民后才回沿城。

^① 李昌月,76岁,曾任青林小学校长,现住汤山青林沿城90号。

我爷爷李家选,当时 60 岁,他没有跑,留在家里看门了。鬼子刚来的那天,同中央军打仗的时候,在村上把他开枪打死了。那时候鬼子见人就杀,不管你是老是少。我的两个叔叔也在家,他们当时就收尸埋了。

我的二叔李国柱,当时 35 岁左右,他没有下圩,躲在安基山。跑反开始后,过了 20 来天,鬼子到安基山去抄山,捞鸡,捞鸭,看到后就把他打死了。跑反期间,我父亲从北圩回来收尸的。

跑反时,我们先跑到孟塘,躲在射乌山的一个山洞里,日本人在孟塘对面的方冲山上打,死的人歹哩(多哩),脚都插不下。后来许世友在方冲开煤井,那铁帽子(中央军遗弃的钢盔)一车一车地装,堆在煤井里。多少死人骨头,都堆在煤井里。

跑反时,日本飞机炸孟塘桥,炸死了许多老百姓。炸完以后,我们就躲到射乌山,当地有个亲戚挖好的洞,蛮大的,我们就躲在洞里了。当天夜里,方冲就打起来了,人就喊起来了。我们不等天亮就往龙潭跑。先跑到周冲,国民党的军队往山上开,在小赤燕西边的山头上。我们出了周冲,仗就打起来了。小赤燕那里杀的人就多了,日本人站在山头上,见到老百姓就打死,我们村上的人就死了好几个。李昌龙的父亲李永树就是在小赤燕打死的。还有李国基的女婿,是从徐家边招到沿城的,也在小赤燕被日本人打死了。

我舅舅在周冲,外号叫槌三子。他背了个 4 岁的男孩跑到螺丝冲,走不快,就碰到了日本人。日本人叫他把衣服剥开,用刺刀对准他胸口。后来一看,是个槌子(瘸子),就把他放了。他吓坏了,用一块石头绑在小孩背上,放进塘里把小孩淹死了。

在射乌庙西南的山头上,日本人和中央军打过仗的。

跑反时,有鬼子住在我们村上,老百姓都还没有回来,冬瓜老四在家,给日本人烧饭,忙,同日本人混熟了。后来日本人换防了,不认识他了,就把他拖出去杀了,也不知道是在哪儿杀的,音讯无踪。小龙和冬瓜老四一起在村上做饭,一起被鬼子拖去,也杀得音讯无踪。他是外村人,到沿城来做工的伙计,帮李永树家种田的,当时 20 多岁。

宝林庵不大,是几个村一起造的,只有一个尼姑看庙。没有饭吃,她就出来化缘,实际上就是要饭。宝华山脚下有好多庙,叶庵、大庙、鹿山

庵。黄村和韩家边那里都是宝华山的佃户。东到下蜀,北到龙潭北圩,长江边,都是宝华山的田产,北圩的田都是宝华山的。国民党在的时候,宝华山的田产是不要交农业税的。日本人还没来的时候,宝华山就造马路,一直通到黄泥岗(在孤山堰),路基都弄好了,还准备通到沿城。后来跑反,就没有弄成。宝华山的大和尚下山到汤山去,一路上有四个人抬着走,坐的轿子是黄绸布包的。宝华山八大寮房,好比是八个科,办公都有柜台,有管山的,有管田的,有管树的。山上样样有,什么都不缺,木工、瓦工、铁匠、裁缝、箍桶匠,啥都有。和尚的衣服鞋子都是山上裁缝做的。每天有200个人吃饭,外面一个人也不去,庙里自己就有200个人吃饭。每天二十几头驴子给他们拖稻谷上山。那是日本人还没来的时候。跑反时,我们在宝华山,吃的都是庙里的米。刚开始,一天吃两顿干的,后来改吃一顿干的,再后来就喝稀粥了,不要钱。后来吃的米都是糙米,喝大锅粥。那大锅烧的粥喝起来香喷喷的。难民还帮庙里砍柴。

抗战胜利后第一年,国民党没有收我们的农业税。国民党在汤山办了个农民教育馆,就在现在的汤山中学那个地方,小孩上学不收钱,书是送的。有的小孩不肯上,还给东西吃。还买了胡琴、笛子、箫,让你吹,村上有不少人上农民教育馆。老师都是大学生,因为这里识字的人多,教浅了不行。农民教育馆还派老师到村上来教,我们沿城的人都在祠堂里上课,天天晚上去上课。农民教育馆里还研究稻、麦、农作物。

安民以后,日本人杀人少了,主要是一些二鬼子坏,要收税,要东西。龙潭的俞老五、栖霞的秦老九、东阳的王世和、汤山的金大贵、黄梅的鲍世元、宝华的廖仲琪,解放后这些人都给枪毙了。

日本人在青林打靶,每次都派人警戒的。他们用马拖一辆坦克,用炮打假坦克。那炮弹长长的。有一次,李克宽的叔叔三毛聋子和李国恒上山挖药材,三毛聋子拣到了一颗炮弹,就朝上一抛,掷给李国恒看,这一掷,炮弹就爆炸了,李国恒的腿炸伤了,三毛聋子在下面掷的,他自己被炸死了。

96. 李昌龙口述

李昌龙,男,1918年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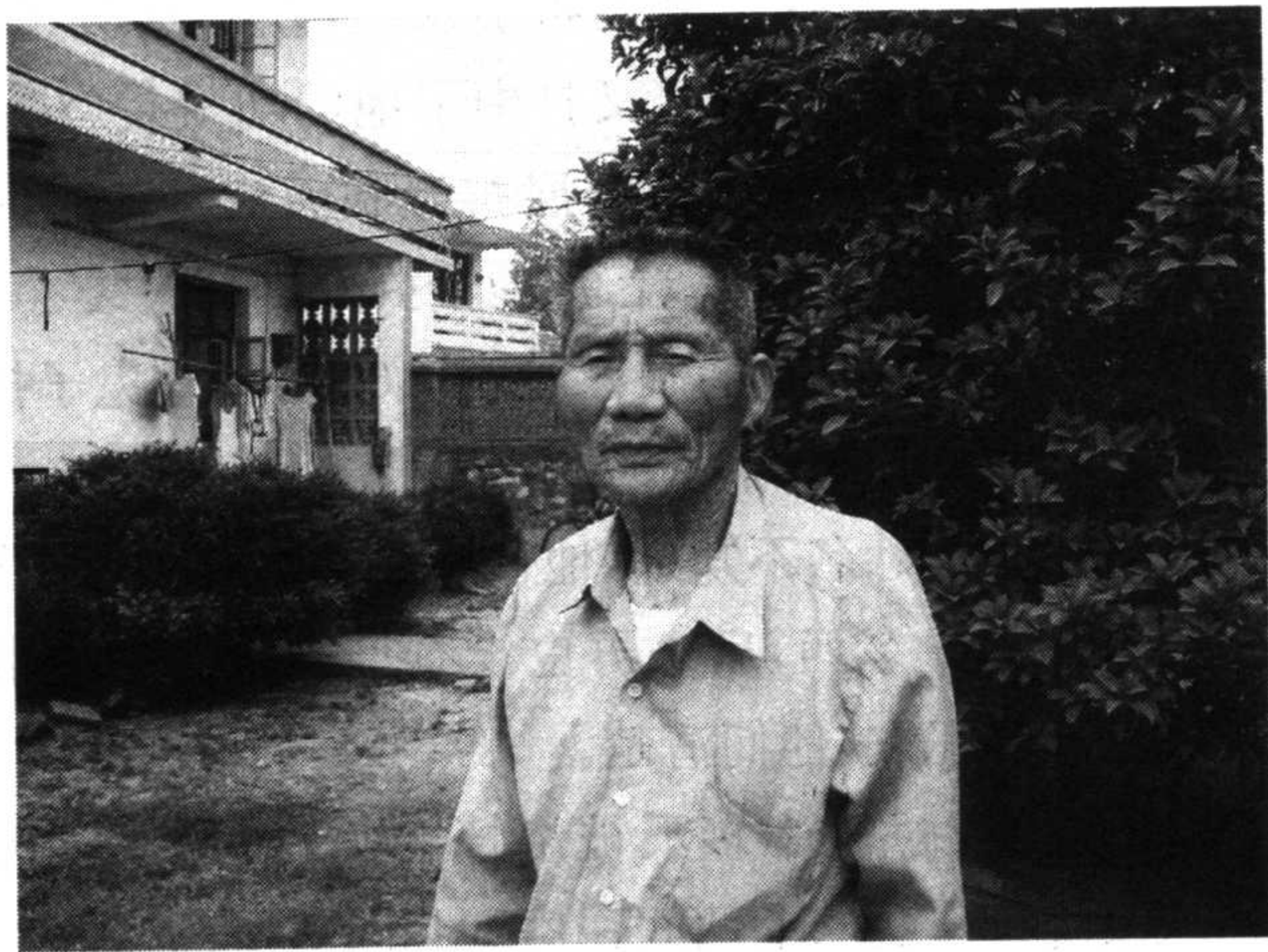
调查地点：汤山镇青林沿城

调查时间：2004年11月5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7岁，属马，跑反时20岁。我上过私塾，认识几个字，后来一直种田。

冬月初四一大早我们就跑反，当天到东阳，在那里过夜。第二天，我父亲李永树当时55岁，想回家拿点东西，才走到小赤燕，就碰到了日本人，他被日本人打死了。过了三天，我们已经在圩里了，有人告诉我们的说，我父亲在小赤燕被鬼子打死了，有几个认识他的人把他埋在那里了。我伯父李永义（当时60岁）在北圩住了几天，也想回家看看。他回到了沿城，村上住有鬼子，没有打他，他就住下来了。后来，换了一批鬼子，不认识他，就在村上把他打死了。当时村上有个瞎子，和我伯父一起讲话的，年龄小十来岁。他听到一声枪响，从此就再也没有听到我伯父的声音，因此知道我伯父是在村上被打死的。安民后我们回到村上，我伯父的尸体没有找到。我们到小赤燕去找我父亲的遗体，只找到他的一个头和两条腿骨，别的没找到。我们是根据他穿过的衣服才认出来的。



李昌龙

我们村上被日本人打死的有三十七八个,现在一下子想不全了。在孟塘村上被打死的有四个:李昌荣,40来岁;李家正,50来岁;李家正的后妈,不到70岁。还有1个人想不起来了。我们跑反跑得早,他们几个跑得晚,是跑反开始后三四天才走的,走到孟塘就被日本人打死了。李永强的奶奶听到枪响就倒在地上装死,天黑后鬼子走了,她就从地上爬起来,跑了。

张玉炳,小名小龙,小伏牛山人,在沿城帮人种田的,30来岁。李国亮,小名冬瓜老四,人长得矮矮墩墩的,像个冬瓜。他老婆是个瞎子,他就留家里没走,躲在土窑子(地洞)里了。后来,他和小龙两个被鬼子抓去了,再也没有回来。(李永富插话:我舅舅被鬼子抓到孟塘,给鬼子做饭,看到小龙和冬瓜老四被抓到了孟塘,还喊我舅舅一声。一个太君,坐在椅子上,同小兵讲了几句,那个小兵就叫他们两个“开路”,他们就走了,走到桥跟前,那个小兵就开枪把他们打死了,把尸体踢到桥下。我舅舅看到鬼子这样杀人,害怕得不得了,米都没淘完,赶忙就跑了。安民后,他亲自给我讲的。)

在宝华山河冲,几十号人回家挑粮,有十几个人被鬼子开枪打死了,其中有我们村的兄弟俩,一个是李国旗,外号“商家”,另一个是他的弟弟李国经,外号“大石子”。还有一个人叫李永继,差一点被鬼子打死了。一颗子弹打中了一个人,穿过身体,又打中了他的功夫袋(注:束在腹部的口袋,装银元铜板之类的东西,用多层布缝制而成),他当时只感到有点疼。逃回圩里,他解下功夫袋一看,那粒子弹穿进功夫袋了。

李克文、李克武是兄弟俩。克武年纪小,16岁,他被鬼子抓去后再也没有回来。还有一个李家成,当时60多岁了,跑反失踪了,一直没有找到。李永泽儿子的舅舅,姓名不知道,他住在沿城,但在外头当学徒。跑反时,他师父叫他回来拿东西,后来再也没有见到人。这件事你去问李永泽的儿子,或者问言兆友,他们清楚。

沿城的房子是跑反过后十多天被烧掉的,全村那么多房子全烧掉了,只剩三四家没烧掉。我家的两间瓦房和几间草房都烧掉了。

其他村上的情况只是听说一点,不大清楚。听说安民后,“大楼”里一个鬼子跑到黄梅南巷找花姑娘,被大刀会的人杀了,后来别的鬼子就

去报复,把南巷的许多房子都烧掉了。

在孟塘,新四军抓了一个鬼子,日本人又去烧房子。孟塘的房子烧了好几次,烧得最厉害。

在孤山堰,姓蓝的一家祖孙三代七个人被鬼子杀死了,只剩下一个小孩没有杀死。这件事蓝小龙知道,可惜他在三四年前去世了。这七个人当中有兄弟俩个,都是壮劳力。

方冲一仗,中国人出了汉奸了。国军叫人带路到周冲,结果带到了方冲,国民党的军队冲不上去,日本人在山头上架了三支机枪,向底下扫射,被打死的人歹哩(多极了)。后来,有些胆大的人就去翻枪。方冲就是大赤燕,一个地方。射乌山一仗,说的人不多。

日本投降时,在沿城还住了一个排的日本兵。

青林大队一共有两个庙。一个是北社子庙,在刘岗头前面,另一个是宝林庵,在周家边过去一点点,靠近现在的高速公路。北社子庙比宝林庵大,有三进四厢。宝林庵是周家边和沿城人的家庵,平时村里有事,就在宝林庵集中,烧东西吃。庵里只有一个尼姑,看庙的。南舍子庙在哪里呢?在土桥上面一点。

我们沿城绝大部分人都姓李。为什么叫沿城,不知道。姓李的人讲辈分,从大到小是“丁子定帮、家国永昌、克传明德”。现在永字辈的老人还有,德字辈的小把戏(小孩)也出来了。

97. 戴爱华口述

戴爱华,女,1921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青林上窑湾

调查时间:2004年11月6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4岁,属鸡,娘家在句容下鲍亭,19岁嫁到蓝家,老伴叫蓝运龙。蓝洪银是我的家门侄子。他父亲叫“小毛子”,大名不晓得,灌云有人知道。我儿子蓝洪明到灌云老家去搬家谱的,他手上有家谱。

我老公公是灌云县人,后来过来打工,招女婿招到上窑湾邱家,改姓

邱,他叫邱吉庆。邱吉庆和他的一个儿子一起被鬼子杀死了,在上窑湾我舅舅家门口杀的,听他们讲,一起杀了七个人。有姓邱的,还有他家的几个亲戚。这件事邱昌华清楚,他今年70多,80不到,你可以去问他。

我出嫁后一直住在孤山堰,种人家的田,交租子,那里就我们一家人。住的是草房,烂泥巴糊糊的,也没有一扇像样的门。

我舅舅叫邱吉强,他们姓邱的比我们富,山、田、地、房子都比我们姓蓝的强。我老婆婆姓邱,她是个瞎子。后来生了下一代,我老公公就不愿意让他们姓邱了,又改过去姓蓝。许世友开煤矿的时候,孤山堰的房子拆掉了,我们就从孤山堰搬到上窑湾。

蓝洪银家里的人在孤山堰被鬼子杀死,那时候我还没嫁过来,不大清楚。我只知道蓝树叶是他在东巷的伯父的父亲,到上窑湾来过。

98. 邱昌华口述

邱昌华,男,1929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青林上窑湾

调查时间:2004年11月16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76岁,属蛇的,跑反时9岁。日本人来的时候,我家里住了不少人,都跑出去了,上山了,山上全是树和毛竹。我们跑到了山后的胄王村,鬼子没有到那里去。有七个人没有跑反,留在家里看门了。当时我家房子比较大,有五间二厢,前面还有猪圈。

鬼子进村后,把屋里的人赶出来,点火烧房子,桌子凳子架起来烧。一共来了四个鬼子,有三支枪。鬼子叫这七个人排成一队,喊“死啦死啦的”,对准他们开枪,把他们全打死了。这七个人是:

蓝树枝(蓝洪明的爷爷);

蓝树枝的一个儿子,名字不知道;

我的外公,姓王,南巷人;

我的外婆,南巷人;

我的家门公公,姓赵,南巷人;

我的大公公,姓王,南巷人;

我的弟弟邱陆运,当时才6岁。

跑反期间,我父亲邱吉来和我的伯父回到家里把他们埋葬的。当时弄了两个坟,一个是蓝树枝父子俩的,现在有碑。另一个是邱家的人和邱家的亲戚,现在没有碑。现在,我是邱家年龄最大的,每年清明扫墓都是我去上坟,每年都要弄五只坟帽。坟墓就在西面山上。

方载和小名叫小马,他跑反跑不动,在山上烧东西吃。方载强看到鬼子来了,就喊:“你不要烧了,鬼子来了!”后来,方载和就被鬼子打死了。他当时不到30岁,是单身汉,没有后代了。

新四军到上窑湾来过。我家住过许多新四军,但我没看到他们打仗。

99. 蓝洪明口述

蓝洪明,男,1946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青林上窑湾21号

调查时间:2004年11月16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59岁,妻子叫李素珍,和我同年的。我们祖籍是苏北灌云的,去年修了一本家谱,上面有我们的名字,但没有蓝洪银一家的名字。从这本《蓝氏宗谱》上查,我祖父叫蓝树枝,我父亲叫蓝运龙。家谱上没有蓝连喜的名字,但我知道蓝连喜的父亲叫蓝树叶。我祖父兄弟四个,树根、树叶、树枝、树桩,都是树字辈的。蓝洪银的祖父究竟是蓝树根还是蓝树桩,搞不清楚。

我父亲叫蓝运龙,小名叫小龙。跑反时,小买子(蓝洪银)才5岁,他在地洞外面哭,有人跑来告诉我父亲,他就去了,抱了小买子就走。后来,我的太爷又把小买子抱到东巷。听我父亲讲,他抱着小买子跑的时候,山上的日本兵朝他开枪,都没有打着。当时,他22岁。

跑反期间,我的祖父蓝树枝和他的一个儿子在上窑湾的窑山被鬼子开枪打死了,他们两人的坟墓就在窑山上,墓前有碑,每年清明节都去扫

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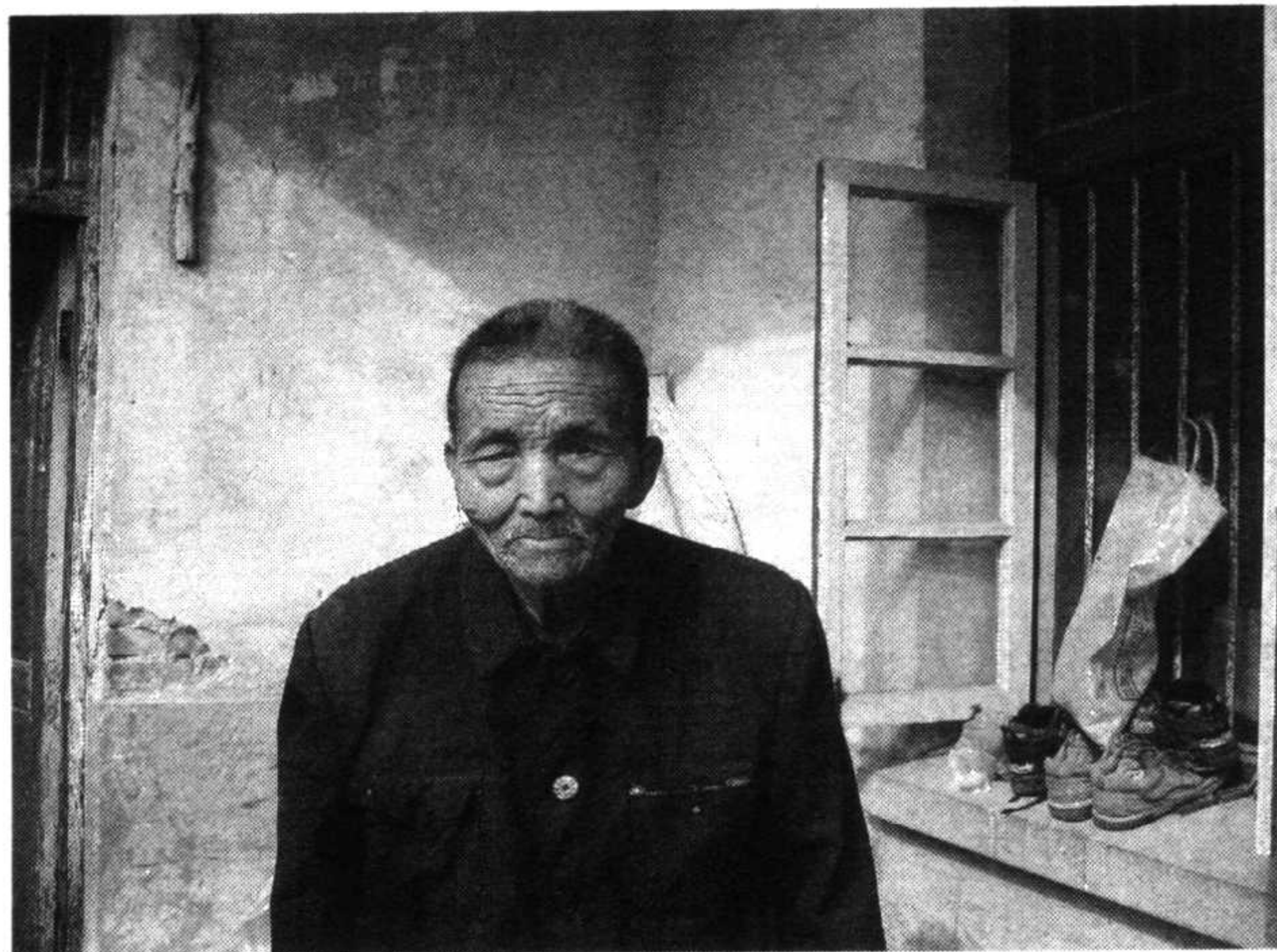
100. 刘家鑫口述

刘家鑫,男,1919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青林刘岗头35号

调查时间:2004年11月17—18日

调查人:费仲兴



刘家鑫

我今年86岁,属羊的,跑反时19岁。

那年十月二十几,我的几个兄弟姐妹就先跑了,他们下圩的下圩,到宝华山的到宝华山。冬月初四,家里就剩下我和父亲两个了。家里有不少稻谷,我父亲想留在家里看门,我一早就跑了,从安基山到黄村、小赤燕、龙潭,下圩了,一路上没遇到鬼子。

日本人有两路,一路从东葛墟、安基山过来,另一路从九华山南面过来。我父亲在上海待过,认识日本兵穿的衣服,一看日本兵进村了,他就跑。村里有的人不认识日本兵,跑得晚,就被打死了。那天被日本兵打死的有九个:

刘治佳、刘治龙。他们两人穿着国民党的兵衣站在自家门口,被鬼子抓住。他们不认识日本兵,以为是中央军,就强辩,结果被日本人用刺

刀活活刺死。

李世文(外号“老夏”)、刘治升、刘治庭、华治正(外号“老宰”,就住在我家隔壁)、华治正的嫂嫂陈桂珍、刘治富的女儿刘科芝(外号“口水呆子”,当时19岁)和一个要饭的叫花子,他们七个是被日本人开枪打死的。李世文的老婆听说丈夫被打死了,在刘岗头村后跌了一跤,也死了。

跑反开始后十多天,躲在北圩的许多村民都想回家看看,拿点粮食。他们跑到宝华山的河冲就遇到了鬼子,有13个人在那里被打死了。刘岗头的刘治炳(52岁左右)、姚贵安(46岁)和王义洪(45岁左右),还有沿城的李国旗(我的三姐夫)和李国经兄弟俩都是在那里被打死的。姚发炳负了伤,躺下装死,一动不动,才没有打死。刘治炳是个瓦匠,口袋里有50元钱被人抢走了。他老婆哭了半天,也死了。

腊月二十二,鬼子从周家边打了过来。老百姓听到枪声,以为他们是在打麻雀,没有当回事,大家都在刘家凤家救火。鬼子在周家边打死了四个人,有何拐子、何广悦(何拐子的父亲)、何小豆(小名,何拐子的叔叔)和一位姓林的篾匠。到了刘岗头,在刘家凤家那里,又打死了22个人。能想起来的有刘家凤、柏学勇、刘富连、文永根、文明才和他母亲、荣泰(外地人,有个姐姐在沿城)、刘治本、刘治远、老东(姓王)、刘治若和他母亲、李兴根的爷爷和奶奶、金兴槐的家门侄女。事后听人传说,鬼子在孟塘葛巷丢了枪,有人说是刘岗头的人偷的,鬼子就到刘岗头来杀人了。刘家凤当时没打死,他跑到了下窑湾,躲在一个棚子里。鬼子追过去,用刺刀刺他。他伸出双手去抓刺刀,后来还是被刺死了,我的兄弟在那里看到的。文明才年纪不大,属狗的,当时30来岁,很有劲。他拼命跑,差几步就下壕沟了,可腿拉不起来,就被鬼子开枪打死了。

跑反前,国民党一个营的广东兵住在刘岗头,他们的黄营长就住在我二哥家。冬月初一夜里,他们把电线收了,部队撤了。后来,这位黄营长在大赤燕被鬼子打死了(那时候还不到冬月初四)。有几个广东兵留下来了。沿城有一个姓艾,刘岗头有一个姓方,大概叫方侠光(音)。姓方的找了个老婆,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李昌红插话:生了四个女儿。)一个儿子叫唐东,一个女儿叫洪兰,嫁到西岗头了,还有一个女儿嫁到江乘了。这个广东兵将功折罪的,他在东葛墟把一个新四军的叛徒打

死了。

方冲那里打了两天两夜,好像不是冬月初四打的,快到冬月十五才打的。跑反期间,沿城和刘岗头的许多人躲在安基山,他们听到了枪声、炮声,看到了日本人的飞机。他们说,日本人在山头上摇旗子,飞机就往方冲投炸弹,中央军死的人一层一层的,多得不得了。中国人有种啊,前面的人被打死了,后面的人照样朝前冲。这一仗打完后,许多人都到方冲去捡毯子的。

我还听人讲,中央军的一个师长怕死,在孤山堰抓了一个姓安的老百姓(我只知道他儿子叫安和银)顶在自己身上。在下面的师长被打死了,在上面的老百姓倒反而没打死。

朝鲜人比日本人还凶,他们是到中国来报仇的,见人就杀,到处烧房子。朝鲜兵的肩上有红布搭子,他们戴的帽子,后头是开衩的,和日本兵不一样。你听说过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事吗?那时候,一个鞑子管三家,菜刀也不是随便用的。老百姓早上去拿,晚上去还给鞑子。老百姓家娶新娘,鞑子要先和新娘睡三天。大家都恨死他们了,就联络好了,在八月十五家家户户齐动手,一起杀鞑子。八月十五要吃饼子,饼子上面有张纸,都写好了一起动手的。到了那天,大家关起门来杀鞑子。

日本人也有好的,刘岗头吴玉炳的伤就是日本军医治好的。有天夜里,两条牛在打架,吴玉炳去解牛,下巴被牛撞断了,腿上戳了一个洞,伤势很重。大伙把他抬到汤山的伤兵医院,送上一筐鸡蛋,几只母鸡,跪下来求太君看病,他们就收下了。军医用金丝把下巴骨头缝上,在伤口上敷药。后来,大伙天天轮流用担架抬了他去换药,我就抬过七回。我父亲对大家说:“栽秧也要抬,是救人要紧,还是栽秧要紧?”后来,他们把金丝拆了,吴玉炳的伤就一天天好起来了。日本人没收钱,只收鸡蛋和老母鸡。这样重的伤,要是没有日本人医治,谁能治好了?

我家房子多,这里有十间,南边金兴槐那个地方还有三间二厢。在刘岗头,我们家是第一户。车水的农具家伙都是我家的,六人轴、长车、短车、板子、耕牛都有。人家害病接先生(请医生),使的都是我家的牲口。我父亲讲话是很管用的。跑反时,这里的十间房子都烧掉了,南边的房子没有全烧掉,多少人都住在里面。社子庙也没有烧掉,安民后,里

面住满了人。

我儿子叫刘兴顺,属鼠的,今年45岁,他当木匠,一天挣50元。他是兴字辈的,我是家字辈的。刘岗头大部分人姓刘,家谱上写了20代的辈字,还有3代没用完。100多年没修谱了,现在不修,以后的辈字怎么立法呀?现有的20代是“宜国严宗应,孔孟正道学,振治家兴广,修德运其昌”,再立20代,你看我立的“天亮东方明,晚黑分不清,接代朝下传,后来人又多”。怎么样?不能和上代同字,还要顺口,还要意思好。沿城姓李的家谱上写了16代,我只记得12个字:“丁子定邦,家国永昌,克传明德。”我儿媳妇叫李昌红,是沿城昌字辈的,属虎,今年43岁。李昌龙的年纪最大,属马的,比我大一岁。他们现在还有3个字没用完。

刘家凤的老子是个秀才,打官司是很有名气的,唐大先生就是在他手上上的学。唐大先生的脚力(关系、后台)是吓人的。他同陶保晋好,陶保晋又同戴季陶好。戴季陶是考试院院长,同蒋介石平起平坐的。戴季陶的娘葬在宝华山的小天龙,从安基山到宝华山的一条马路就是戴季陶修的。陶保晋在安基山搞了个造林公司,那里有几间小草房,雇人看守树林的。

刘岗头的社子庙叫北社子庙,三进四厢,都是瓦房。跑反那年,从二月到三月二十五唱大戏(指汤山庙会),都在庙里训练壮丁。青林一保共有103个人参加训练,我们刘岗头有22个人。这103个人的名字我都记得的。教长叫彭长贵,队长是刘治升(我堂哥),还有班长,苏发华、郑天民、叶世昌都是班长。壮丁训练队天天训练的,吃饭回家吃。主要是练立正、稍息、正步走、齐步走、向右转、向后转,没有打过枪。东流的人到社子庙来会操比赛,他们有假枪,我们没有。但我们个个都穿兵衣,胸前有符号,方方的,上面写名字,用别针一别。兵衣是蓝色的,一层布,事先量好了尺寸,做好了送来,每人缴4元钱。我们还学唱歌、练打拳、喊口令,口令是“打日本”。三月二十五汤山唱大戏,我们第四期就毕业了。还发毕业证书,上面写着要学八回,学完一回就盖一个章,我们只学了五回。等到八回都学完了,就要给壮丁发枪了,到时候中国就全民皆兵了。后来,日本人打过来了,彭长贵想立功,就把我们的符号换成了义勇队的符号,要拉出去和日本人打。可是,一支枪也没有,都不会打枪,就没有

弄成。

蓝小龙的名字叫蓝运龙,他兄弟好几个,叫运田、运才的。他们的父亲叫蓝吉庆。蓝小龙和蓝槐顺在北社子庙里和我们一起训练的。小买子的父亲叫槐子,同槐顺是兄弟。小买子的祖父叫蓝树根或蓝树桩。

跑反前,槐子穿了件兵衣,在孤山堰抓了个汉奸,槐顺就盘问他。那个汉奸讥笑说:“你穿了件壮丁衣就赚了?你看看我里面穿的衣裳!你不要神气,歇三天我再来会你。”过了三天,日本人果然打来了,小买子一家杀了六个人,小买子被东巷的叔叔连喜抱去了。

金兴槐的老子叫金常禄。他家的房子被鬼子烧掉了,金常禄就跑到东营房去拆反动派(指国民党)的房子。大料抬回来,在路上遇到了鬼子,他们四个人都被抓到“大楼”里去了,活埋了,再也没有回来。有徐立银的父亲(原来姓金)、一个家门兄弟,还有一个爷,名字想不起来了。

101. 张明才口述

张明才,男,1937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青林周家边71号

调查时间:2004年11月22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68岁,鬼子打来的时候出生才四个月,父母抱了我跑反,先到北面的山上,后来又下圩了。

那天鬼子刚来时押了18个人往东面一个小塘去,其中有我堂兄张明荣,堂叔张贤森。他们两个走在后面,商量了一下就分头跑了。张明荣向北跑,跑出去600来米,被鬼子打中一枪,伤了膀子。他不顾伤痛,又跑,又被鬼子一枪打中肚皮,擦破了一点皮。后来,他连夜跑到了圩里。张贤森向西跑,进了战壕,鬼子没打着他。现在,他们两个都去世了。

“杀不死”姓张,是在同一天被鬼子打的。他躺下装死,鬼子用刺刀戳他后脑勺下面的脖子,他没动,就躲过去了。现在,他也去世了。那天来的鬼子是住在沿城的,一共打死了15个,名字记不清了。上窑湾山凹

子里有山洞,是部队挖的。山洞底下有个泉眼,一年到头不干。我们上山扎柴去打水喝,那水真好,是真正的矿泉水。解放前,汤山的唐大先生雇了个人天天到那里去取矿泉水,用来泡茶,特别好喝。

102. 严荣英口述

严荣英,女,1917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青林周家边

调查时间:2004年11月22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8岁,属蛇的,跑反时21岁。娘家在沿城,当时已嫁到周家边,生了个儿子,生下刚40天,鬼子就来了。我们跑反跑到螺丝宕,后来又下圩了。

我婆家的老爷侯观良住在家里看门,腊月里鬼子来烧房子,他被烧死在屋里了,当时80多岁。家里人晚上偷偷回家,把他埋了。我老伴叫侯玉洪,她父亲叫侯广训。那天,我老伴在圩里接我。不在家里,要是在家,他也要被打死了。鬼子到村上来,把村上的人一手掳到村外一个小山上,用枪呼呼地打死了。那天是腊月里,一共打死了二三十个人。

我老爷的哥哥的儿子叫侯广悦。他、他老婆、两个孩子(一个叫槐子,一个叫羊子),一家四五个人都被鬼子打死了。我的一个亲戚,是老表,姓鲍,小名叫海军,当时60多岁,从汤山街上到这里来玩,也被鬼子打死了。村上有两个人,一个叫张明荣,一个叫张贤森,看到鬼子在按子子(上子弹),就一起跑,他们两个没有被打死。我们村上有个人叫张道林,他被打死了。

103. 张明华口述

张明华,男,1922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青林周家边

调查时间:2004年11月22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83 岁,跑反时 16 岁。我们是冬月初四跑反的,没有走国道,从安基山到宝华山再翻山过去到龙潭下圩,在太子洲住。春天回来,又到上峰宁东的郭干躲了些日子。鬼子到那里去烧房子,有个老头去救火,鬼子把他打死了。后来,要栽秧了,我才回到周家边。村上的房子全烧光了,只剩下“小七子”一家没烧。我家的房子也烧光了。

宝林庵有个斋公奶奶,六七十岁,被鬼子打死了。她是土桥那边人,带了老头子,夫妻俩住在宝林庵里。她不是尼姑,是斋公奶奶(带发出家的俗人)。



张明华

鬼子在腊月二十二日进村杀人,杀死的人比刘岗头多。在这之前,鬼子住在沿城,他们到村上来,还给小孩吃糖。后来,他们换防了,叫村上人赶快走,村上人没听明白。快到年底了,许多人回家来,想过年了。腊月二十二日,来了六个鬼子,四个人带枪,两个人没带枪。他们先把村上剩下的三间房子烧掉,然后把村上人赶到一块,老头、老太站在一起,中年人站在一起,小孩子又站在一起,分三个地方站。接着,就把中年人带出村外,带到村东的小山上。那里两边是水塘,中间有一条塘埂。鬼子叫人一个跟一个地站好,然后就开枪杀人。枪一响,有两个人摔倒了,其中一个没有打着。鬼子过来用刺刀戳他的脖子,没有戳死。他活下来了,这个人叫张道银,当时 18 岁左右。后来,村上人都喊他“杀不死”。

他后来招女婿招到黄塘庵去了。

腊月二十二那天被打死的人有好多,现在能想起来的有:

侯玉山,小名“槐子”,当时 23 岁左右;

侯玉龙,小名“羊子”,当时约 19 岁;

林庆松,箩匠(即篾匠),43 岁左右;

林小八子(林庆松的弟弟),属兔的,当时约 33 岁,他不是篾匠,是种田的;

张道林,二十七八岁;

张道才,二十二三岁;

鲍海军(小名),汤山街上人,当时 16 岁。

除以上这些人之外,还有几个是在腊月二十二之前被鬼子打死的:

侯广宝(侯玉山的叔叔)和他的老婆,他们俩是冬月里从北圩回家,在路上被鬼子打死的;

侯广悦,被站在沿城房顶上的一个日本人打死的;

张贤禄的奶奶,大家喊她“南巷佬”(她娘家在句容南巷)。她在碾坊里被砸死,后来扒房子才扒出来的。

104. 韩红梅口述

韩红梅,女,1933 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青林周家边

调查时间:2004 年 11 月 22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72 岁,属鸡的,和“小买子”(蓝洪银)同年,娘家在句容东巷。

跑反时,父母亲带着大哥、二哥、三个姐姐和我一起走的。后来,母亲走散了,在小赤燕那里被鬼子开枪打死了。当时我们不知道她到什么地方去了,父亲找了个把月没找到她,都灰心了。后来,东巷有个卖酒的人挑了一副担子从小赤燕经过,听到乌鸦哇哇地连叫三声。他迷信,就歇下担子到处看。一看,发现我母亲躺在地上。他就告诉我父亲,我父亲就到小赤燕去找。一看,我母亲脸上还好好的,穿的衣服、裤子都认出

来了。第二天再去,发现她脸上有一半被啃过了,就用两块板子把她抬回东巷埋了。我对门一家有个女的,年纪同我母亲差不多,也是被鬼子打死的。她没有出村,就在村上打死的。

东巷被鬼子打死的人有好几个。以上两个人的情况都是父亲告诉我的。你到东巷找年纪大的人问问,他们都知道。东巷的韩洪明,今年八九十岁了,他可能知道蓝洪银父亲的名字。

张明才跑反时才可怜呢。他母亲匆匆忙忙背了他就走,结果,他头朝下,脚朝上,是倒过来背的。他母亲想给他喂奶了,才发现是倒背的。一看,他嘴唇全发紫了。

105. 谢顺林口述

谢顺林,男,1933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孟塘

调查时间:2001年9月14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老家在安基山,后来才搬到孟塘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我们兄弟六个,我是老五,加上一个姐姐,一共七个,都是由母亲带大的。

日军打汤山之前,有五个日本兵先过来,住在我家里,侦察了三五天。说是日本兵,其实是朝鲜人。我母亲给他们做饭,他们临走时把我家里一些不值钱的东西一样一样地甩到门外,还打手势,意思是马上就要打大仗了,要我们赶快跑。我母亲弄不懂他们的意思,没反应过来。第二天,大队日军从东葛墟那边开过来了,见了中国人就开枪打死。到了孟塘,又烧房子,全部烧光。后来,稳定下来了,村上又出现了假新四军,到处杀人、抢东西。我们家就搬到汤山镇上,租了唐大肚皮的六亩地。我二哥叫谢顺明,比我大11岁,那时就给一个鬼子军官做饭。这军官大概是个团长,官不小,就住在“小楼”里,二哥给他单独做饭的。每次做饭都多烧一点,吃不完的,就用一个小木桶拎回家。主要是麦片饭,带回来给我们吃,养活了全家。他在“小楼”里干了一年多,那个军官就调走了。后来,他又到“大楼”里去做饭,那么大一片楼房里只有七个鬼子,

有六支长枪、一支冲锋枪。许多老百姓趁鬼子中午睡觉的时候进去偷东西。有栋楼房的楼底下有许多铜棒、铜管、铜块、铝棒、铁棒，有碗口粗的，也有细一点的，都被偷出来卖了。墙壁上有许多粗电缆，特别是“十八排长屋”里，电缆更多，铜线都抽出来卖钱，到最后几乎全部拆光。“十八排长屋”现在还在，是一长排的平房，我们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在“大楼”东南边的水塘里，也挖出不少铜和铁，都埋得很浅，可能是国民党撤退时埋的。

当时，汤山有慰安妇的，还有日本人的宪兵队。老百姓给日本人割马草，晒干后扎成一捆一捆的，送到日本人那里过秤，换一点食盐、肥皂、火柴等日用品。有一次，我在“大楼”那里用红皮花生同一个小兵换过香烟，是卡里齐牌的，二等品。

方冲一仗，一支中央军原本想开到周冲的，因为带错了路，开到了方冲，同日本人遭遇上了。日本兵原来是住在“小楼”和“大楼”里的，他们在山头上，用机枪向中央军扫射。中央军发动冲锋，每次冲锋都齐声高喊一阵，半个来小时就静下来了。下次再冲锋，又要喊。冲了几次，后来就听不到声音了。这一仗打完之后，方冲山上山下堆满了死尸，遍地都有。有些胆子大的人前去搜尸，搜到了大头洋钱、手表、怀表等等，有的还把死人穿的皮鞋脱下来。有些中央军比较灵活，他们见打不赢就不冲了，躲了起来。还有的找到老百姓家里，穿上便衣逃了。

我听别人说，在桦墅那边，中央军的坦克同日本人打过的。有一辆坦克宁死不投降，在日本人中间乱开乱撞，压死了不少日本人。当地的老人都说：“中国也有好汉，不怕死的。”打仗的地点在桦墅的陈岗、千亩地一带，详细情况你要去问桦墅的老人。

106. 杨官华口述

杨官华，男，1929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孟塘陈家边

调查时间：2003年10月21日

调查人：费仲兴



杨官华(右)

我家在陈家边,现在住在孟塘小学里头,给他们看大门,打扫卫生。我女儿就在这学校里当老师。

1949年4月,我在江宁县麒麟乡东流镇当学徒。4月23日夜,国民党部队从南京撤退,强迫许多年轻人参加“决心队”,跟他们跑。有名警察带了我们20多个人在路上拦了辆车,一直开到杭州。后来,我们在宁波坐船到广州,正式编入部队,穿上了军装,在那里集训了两个月。后又撤到广西柳州,在那里住了个把月。1949年11月撤到南宁,在那里解放了,12月我就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在14军直属炮兵营当兵。在解放军部队里,我作战勇敢,立过三次功,还参加扫盲班,达到了高小文化程度。1955年实行军衔制,我就复员回到汤山。我在大队里当过副业主任,还兼任民兵营长和共青团书记。1964年社教时被排挤,没给我登记党员,后来邓小平恢复了工作,公社才给我平反。“文化大革命”中,有人说我是国民党潜伏特务,斗我、打我,在大队里关了我三四个月,家也被抄了,子女、亲戚都受牵连,生活非常艰苦。后来,有位战友在采石场当书记,他招我去社办厂。我在公社砖瓦厂当过车间主任,在石灰厂当过副厂长。1984年退休后,又在建设大队烧了两年窑。

1937年日本鬼子打到汤山,那年我8岁。当时,我们家是个大家庭。父亲兄弟4个,他是老大。还有姐妹4个,只有一个出嫁。再加上我奶

奶、两个婶婶和我们小兄弟姐妹 8 个，全家一共 17 人。家里穷，只有三间草房，其余一无所有，没法分家。日本人打汤山前，村上人跑反，走得差不多了，我们穷，走得最晚。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动身时日本人占领汤山已经好几天了。我们刚走到村西 400 米左右，日本人就站在山头上朝我们开枪。我们不敢走了，就往回跑，钻进了山脚下的一个山洞。这个洞离我们家 300 多米，是在打仗前就挖好的一个土洞，洞口不大，进去是四五米的直洞，再拐个弯，又挖了四五米长的一段，没有门窗，洞里黑糊糊的，但挺暖和，一家人就躲在里面。天黑了，鬼子不出来了，我们就回家蒸点锅巴、馒头，带进洞里吃。这样在洞里躲了三天左右，国民党的中央军就和日本鬼子在方冲打起来了。

陈家边的正南是方冲，我们藏身的山洞就在方冲的口子上。中央军是怎么开进方冲的，我们没看到。只记得那天下午三四点钟的样子，方冲山上响起了密集的枪炮声，响了个把小时，中央军就向宝华山方向撤退了，鬼子也没有追。中央军撤退时，有几个士兵从我们洞口经过，想钻进洞里来歇歇，当官的不让进，他们就没进来。到傍晚时，仗打完了，中央军有部分受了伤不能跑的就躲在陈家边的老百姓家里。第二天，鬼子进村烧房子，这些伤兵有的被烧死，有的被日本人看到了开枪打死。

方冲这一仗只打了个把小时，但打死的人可多了。我家在方冲有几亩地，水田旱地都有。开春后安民了，我们要种地，我三叔杨顺宝同村上几个年轻人一起进方冲，只见到处是开始腐烂的死尸，散发着一股难闻的臭气。三叔他们就把路上和田间的死尸挖坑埋了。那死尸实在太多，他们忙了个把星期才把妨碍种地的死尸埋完，远一点的就不管了。三叔因为抬死尸中了毒，全身起疙瘩，都是蚕豆瓣大小的，治了好几年才慢慢治好。

关于方冲这一仗，有些情况是后来听别人说的。他们说，中央军是两广部队，是从桦墅那边开过来的，原本打算开到周冲集合的，因向导带错了路，带到了方冲，结果与日本人遭遇上了。日本人在山头上架起了机枪，封锁了方冲的山口，中央军牺牲了很多很多。一共死了多少，说法不一样，有的说死了千把人，有的说死了几百人，都是估计数。当时方冲山上山下到处是中央军的死尸，有东一个西一个的，也有一堆一堆的，老

百姓谁会去数数啊？

日本人攻打汤山前两天，他们的飞机同中央军的飞机在天上打，飞机飞得很低，忽上忽下的，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日本飞机在大赤燕和孟塘桥边投炸弹，炸死了许多跑反的老百姓。方冲这一仗是在日本人占领了汤山四五天之后才打的，没有飞机过来。

在日本飞机轰炸大赤燕和孟塘桥之后没多久，有一小股日本兵从孟塘过来，经陈家边，往湖山去了。这支部队可能是侦察兵，他们拿着地图，通过翻译到陈家边来问路，问去湖山怎么走。这支小部队是我亲眼看到的，但他们来问路的事是听别人说的。过了个把星期，方冲这里才打仗。

方冲这一仗打完了，我们就不敢在那个山洞里住了。当晚就跑到张家岗大石塘东边的一个山洞里，那里人多，除我们一家外，别的都是张家岗的人。方冲山上还有一个大石洞，坐南朝北，里面有许多蝙蝠，我们叫它油老鼠洞。打仗时，陈家边有两三家人躲在里面，日本人没发现。打完仗，这些人也吓得跑了。这个山洞现在被采石场炸掉了。

方冲这一仗打完后，日本人就进各村搜人、烧房。葛巷有个祠堂，里面住了几十个人，我们陈家边也有几个人住在里面。那天，这几个陈家边的人准备回村，刚走出葛巷就被日本人发现了，有三四个人被他们开枪打死，其中有一个就是我干爹。他是从外地来灵山挖煤的，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我们村有个姓鲍的资本家，人住在上海，但在陈家边同外国人合资办了个民星公司，开煤矿，挖了许多矿井，我家门口就有五六个。这个公司盖有 18 间砖瓦房，日本人烧房时没烧掉。跑反期间，我们村有十来个年轻人从桦墅回来，看到这 18 间房没烧掉，就进去看看，想捞点外快。结果，被日本人发现了。日本人把他们绑起来，推到矿井边，用机枪把他们打死了，死尸都落到井里。有一个人在鬼子刚开枪时就滚在地上，三滚两滚地滚进了井里，没被打死。

跑反期间，我们村有好多人逃到了桦墅，日本人在那里检查他们手臂上种的牛痘，把他们叫出了村。等他们走到路上，日本鬼子就把他们当活靶子打。我们村茆庆富的三哥就是那样在路上被打死的。

我有一个姑父住在龙泉大队孟家场,家里有两男两女四个小孩,两个女孩都还小。跑反时,他躲在附近一个山洞里。鬼子发现后,就用刺刀把他活活刺死了。我姑妈一看,丈夫死了,四个孩子养不活了,就把两个女孩用蒲包包了,叫老大把两个妹妹摔在水塘里淹死了。老大叫孟家锦,是我表哥,比我大四岁,是属虎的,今年 78 岁,早先参加过公安,后来当过龙泉大队的书记,这事他最清楚。

安民后,过了年把,有个鬼子到我们陈家边来找花姑娘,被新四军打死了,就埋在陈家边的田沟里。第二天,日本人开过来一支部队,到村上找人。保长领他们找到了埋尸地方,把死尸挖了出来。日本人把我家的一扇门拆了,又抢了一床被子垫在上面,把死尸抬了回去。临走了,一个鬼子还把我奶奶狠狠地踢了几脚,奶奶一直疼了好几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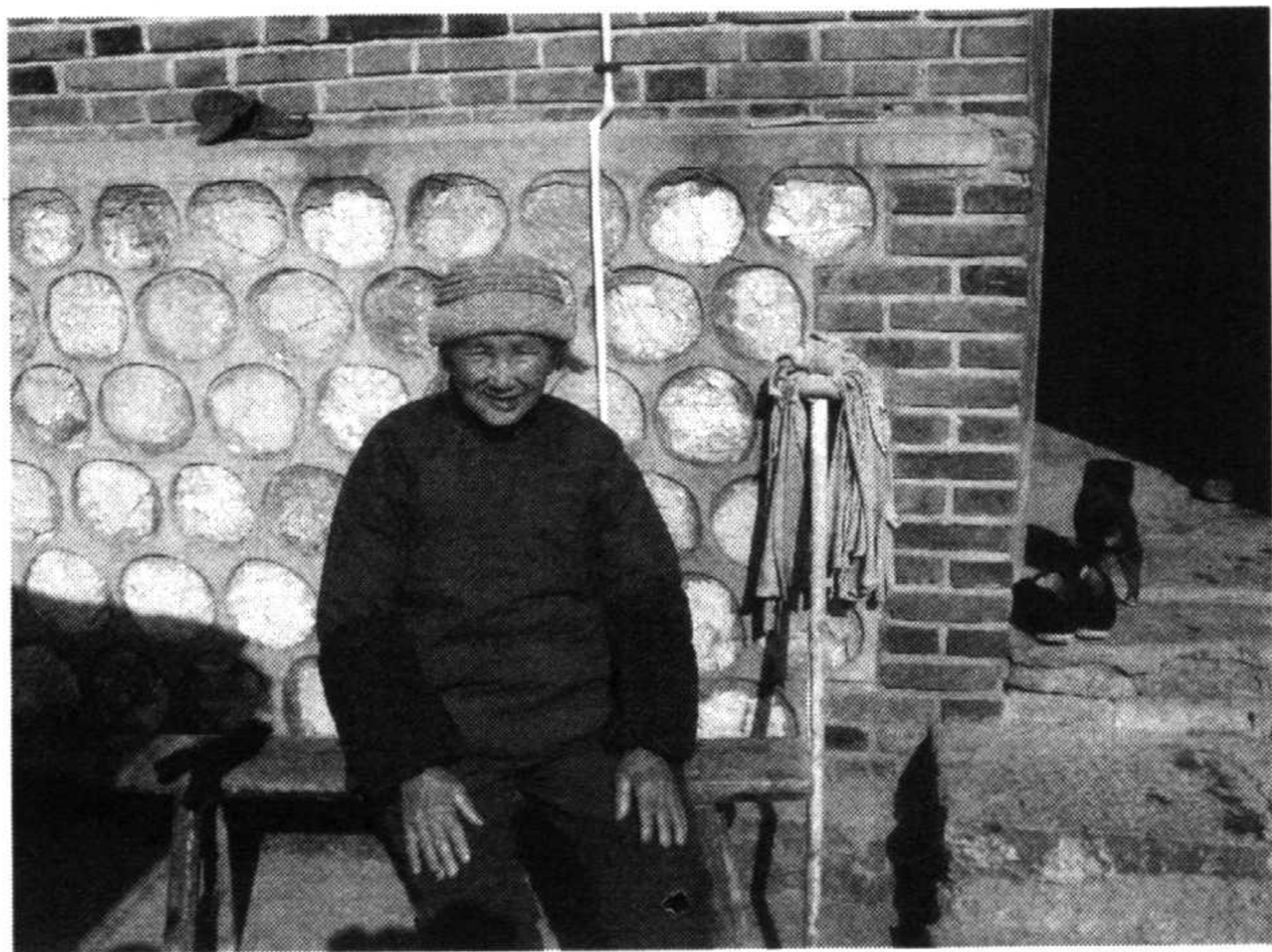
107. 王贤珍口述

王贤珍,女,1918 年 9 月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孟塘张家岗 33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2 月 3 日

调查人:费仲兴



王贤珍

我今年 86 岁,娘家在江嵎漳桥,14 岁嫁到张家岗。日本人打过来那年,我 20 岁。冬月初四,日本飞机在孟塘放炸弹,炸死了许多人。冬月初五,日本人就从大山那边打过来了,当时,我和丈夫夏传桂躲在村后一个土洞里,洞是自己挖的,有一个房间大小。日本兵把我丈夫抓去,一起抓去的有 5 个人,3 个人放回来了,两个没回来。其中一个走到鲍亭走走歇歇,不想走,鬼子回头就是一枪,把他打死了。我丈夫被鬼子抓到南京城里,给他们弄吃的。干了 18 天,后来害病,日本人就把他放回来了,还给他开了一张路单,给了 1 斤小米。在回家的路上,他又被另外几个日本人抓住,要他抬东西。他抬完东西,把路单拿出来给他们看,他们就放他走了。他回来后,我们又一起躲到螺丝冲那边的山里,十来个人住在一个老百姓家里。在螺丝冲住了一段时间,觉得山里还是不安全,我婆婆和我们夫妻俩就在腊月里跑到了江南水泥厂的难民区里。江南厂是丹国人开的,门口有面大旗子,还有人站岗,日本人只是在边上望望,不敢进去的。难民区里到处是跑反的老百姓,有上千号人,大家挤人,人挨人。我公公夏永源那年 44 岁,属马的,他留在村上了,没跑反,但到江南厂看过我们。他回家后不久,在腊月二十一那天,在陈家边一个矿井边被日本人打死了。那次一共有 11 个人被打死。听别人说,陈家边的李中民把鬼子的十来支枪偷走了,拿到江北去卖。鬼子发现枪不见了,就把陈家边的老百姓集中起来,一个个绑在井边,然后开枪打死,还到处烧房子。我家六间瓦房就是在那个时候被烧光的。留在家里看门的老头、老太,只要被日本人看到,都打死,我们张家岗一共打死十来个,现在记起名字的有 5 个:笪冬桂、谢奶奶、张裕民(60 来岁)、老祝、小龙子(小孩,六七岁)。听说在鲍亭的小张家岗,鬼子一次就打死了 18 个老百姓。

我们躲在江南厂,晚上就出来找粮食。日本人晚上是不出来的。那年春节我们是在桦墅一个亲戚家过的年。桦墅村很大,日本人的大部队未从那里经过,只有少数日本兵到村里找花姑娘。他们村上就花钱买了一个穷人家的女孩子,让她去应付鬼子。

我们在江南厂一直住到农历三月底,安民后才回家。回到张家岗后,我看到方冲有不少中央军的尸体,培山脚下那条沟里不知堆了多少死人。在现在的孟塘小学的操场那个地方。当时挖了一个大坑,埋了不

少死尸。

方冲打的是一场伏仗，是在冬月十一那天打的。中央军不是事先想好故意打的，而是认错了路，碰到了日本人的埋伏才打起来的。日本人在山头上架起机关枪向下扫射，打死的中央军不知有多少。

在桦墅那边，日本人在射乌山的山头上架起了机关枪，也打死了不少中央军。听说有个中央军的军官躲在洞里，有个人见他可怜，就天天给他送饭，他吃一顿就付一顿的钱。后来有一天，那个人送饭去得早一点，他来不及拿零钱了，就把皮夹子拿出来取钱。那个人见皮夹子里有那么多钱，就起了黑心，趁他不注意就把他敲死了。

方冲山上有个油老鼠洞，蛮大蛮深的，洞口有块大石头。跑反时，洞里躲了许多人。陈家边的李兴泉和我同年，他老婆叫华秀英，两个人就是跑反时躲在那洞里成亲的。后来，李兴泉到处对别人讲：“我们是躲在洞里结婚的，不是照样生了5个儿子、4个女儿吗？”李兴泉去年才过世，他老婆死得早一点。听别人讲，油老鼠洞里挖出来千把斤油老鼠屎呢。

108. 秦有才口述

秦有才，男，1921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孟塘葛巷

调查时间：2004年2月3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3岁，跑反时15岁。刚开始，一直躲在刺山的一个山洞里，后来又在北圩、桦墅躲过一阵。

中央军和日本人在孟塘一共打了两仗。第一仗，日本人先抢射乌山，中央军在山上边打边撤。在棒锤山那里，中央军架起了炮向日本人打，后来日本飞机过来炸，中央军的炮就不响了。日本人吹起了冲锋号，喊“杀啊”！同中国人喊的声音差不多。在桦墅那里，中央军也有一支部队同日本人打。当时我躲在山洞里，中央军在山上往西撤的情形看得清清楚楚。

第二仗，中央军又打回来了，这一仗打的是伏仗。中央军有两个师

的部队,一支是从栖霞过来的,走东阳镇、小赤燕,攻大赤燕。另一支是从灵山过来的,走东流、许巷,沿着山从西向东过来,部队开到刺山就架起炮朝大赤燕那边打。大队人马是从山上开进方冲的。两个师的部队都想打下大赤燕,往溧阳方向去。刚开始,中央军的两支部队自己人打自己人,后来打起了旗子,才知道搞错了。

给中央军带路的是一位姓吴的徐州人,当时在灵山煤矿干活,他带着中央军一个师从灵山出发,经过东流、许巷,到了雪浪庵。在那里,前边发现有日本兵,中央军的队伍就上山了。这个人后来就住在葛巷村后的山上,给一个姓鲍的人看坟,解放后才回徐州。给中央军带路的事是他讲的。他说:“他们要我带路,我就给他们带。”



秦有才

方冲从上午一直打到下午,到下午点把钟,日本人的飞机来了,放了不少炸弹。飞机飞得很低,快擦着树梢了。飞机一来,中央军就一枪不放了,趴着不动。埋伏在山头上的鬼子是从“大楼”里出来的,他们先占领了山头。等他们占领了山头,飞机就不来了。这一仗打完,方冲附近田里到处是丢下的东西,有些中央军并没有打死,他们还是跑出来了。他们叫我父亲带路,说送到宝华山就不用送了,还说要给钱。

这一仗打完后,第二天,我看到一个中国人穿着呢子衣服,戴礼帽,脚上穿着跑鞋,带着地图到葛巷来问路,要到汤山去。我说有日本人的,

他说日本人不会打他。当时我很奇怪,他大概是个汉奸。刚打完仗,他怎么一个人跑到这个地方来呢。

方冲打的是伏仗。中央军城门不得进,过江又过不去,他们往哪儿去呢?打仗时,他们是从西面沿原路打过来的。方冲一仗,有不少中央军的人还是逃出去了,没有全打死。我亲眼看到,张家岗那里有八九个,葛巷这边也有。有一个中央军躺在坟堆旁装死,身上有支20响的手枪。我告诉他,日本人走了,你快逃吧,他没有动。过一会再去看他,他不在那个地方了。

109. 茆庆富口述

茆庆富,男,1923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孟塘陈家边30号门前小院

调查时间:2004年2月4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们兄弟四个,我是老四。老三叫茆庆强,比我大2岁。跑反时,我们躲在桦墅一个茶馆里,有百来号人。茶馆有前门、后门。1938年农历正月的一天,来了五个鬼子,一个把守前门,一个把守后门,另外三个进茶馆挨个检查,看手掌,看手臂上牛痘的疤痕。年轻力壮的、疤痕大的,就拎出来站在一边,认为是当兵的。鬼子一共拎出来五个人。另外又抓了两个年纪大一点的人:一个是孟塘张家岗的雷忠仁,四五十岁样子;另一个是许巷人,不知姓名。鬼子叫这两个人抬着一头小猪和一盘豆腐,给他们送货,叫五个年轻人在前头走,他们在后头押着。这五个年轻人,一个是孟塘葛巷的秦汉英,一个是哑巴,一个是我三哥,一个是张家岗姓林的小伙子,小名叫“小兔子”。另外一个不知叫什么,也不知道是哪个村上的。我们看着他们被押走的。大约走了里把路的样子,听到有枪响,大家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到了夜里,雷忠仁回到桦墅了,才知道有五个人被鬼子打死在路上了。

雷忠仁说,他们被鬼子押着,走出桦墅,走了里把路,鬼子就朝五个年轻人喊:“回去,你们的开路!”他们就往回走了。走着走着,鬼子就向

他们开枪了。第一个被打死的是秦汉英,接着被打死的是那个哑巴。后来,走到山洞洼那个地方,又把我三哥和姓林的“小兔子”一起打死了。那个许巷人一看这情形,丢下东西就拼命跑。当时下着雪,他穿的是钉鞋,跑不快,大约跑出去80多米,在爬田埂时,三名鬼子趴在雪地上同时向他瞄准了开枪,把他打死了。后来,雷忠仁一个人把豆腐送到了坟头村鬼子住的一个防空洞里。当时天已黑了,又下着大雪,鬼子把枪架在一起,朝雷忠仁喊:“你的回去!你的,开路!”雷忠仁就原路返回桦墅了。路上,走到山洞洼那里,他还特地摸了摸我家老三和姓林的两个,一摸,都没有气了。

雷忠仁这么一讲,大家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又不敢放声大哭,都憋在心里。我母亲听到消息后也没敢哭,后来很快就病倒,没几个月就去世了。

在桦墅避难期间,我曾听说漳桥东面的红岗头有几十个难民被鬼子集中起来架了机枪打死了。我还听说张家岗的邓志强和张金凤因为岁数大没有跑反留在村上了,有一天他俩给鬼子送豆腐,在孟塘被鬼子打死在一条水沟里。

在孟塘,中央军和日本兵打过两仗。第一仗是冬月初五早上在射乌山打的,中央军有一个师守在山上,鬼子朝山上冲,哒哒哒的机枪声响了很长时间,中间没有停过。后来,中央军一枪没放就向西撤退了。据一位离开队伍留在村上没走成的中央军士兵讲,他们的几个长官阵亡了,没人指挥,就向西撤。第二仗是在方冲那里打的,是“大楼”里的鬼子在山顶上打的伏仗,打得时间不长。

我们陈家边离方冲很近,村南头到方冲山口之间当时都是旱地,那片地叫“十亩地”。中央军从下关撤退,过不了长江,就往宝华山方向撤。有一个师跑到了陈家边,在“十亩地”那个地方集中,准备走方冲,上马子顶,过大赤燕到二营,再走小路去宝华山。有两个军官,一个穿着披风,一个带了根文明棍。先有七八个侦察员到马子顶侦察,他们没有发现鬼子,就回来招手,队伍就开进方冲了。中央军的人很多,队伍拉得很长。前面的人已经走到马子顶了,后面的人还在“十亩地”。后来又飞过来三架日本飞机,在方冲山口放炸弹,扫射。这一仗,中央军只有一小部分从

山口往北冲的跑出来了,跑出来的人又有许多被鬼子打死了。张家岗、陈家边后头的小山坡上有不少中央军的人被打死,梅花墩上也死了不少人。日本兵的机枪火力很猛,方冲山上竹林里的竹子都打秃了。这一仗,被打死的中央军有好几百人。安民后,我们回陈家边种田,那时候,方冲一带到处是中央军的死尸,一股股难闻的血腥味飘过来,熏得难受。孟塘的张义德出头,组织一些人掩埋尸体。他们挖了许多大坑,一个坑里埋二三十个,搞了好长时间才埋完。

下面再说说陈家边旱井边二三十个老百姓被鬼子开枪打死的事。

民国7年(1918年),上海的鲍中礼到陈家边来开煤矿,挖了许多矿井。后来煤矿关闭了,矿井填了,成了旱井,有一丈多深,井口很大的。跑反的时候,大部分村民还躲在外头。有少数人回村弄粮食,找吃的。还有些年纪大的留在家里看牛。一天,村上有个人把日本人收集到的中央军的枪偷走了,日本人就认为村上还有中央军,把村上的人统统赶到旱井那里,叫他们跪在井边。鬼子架起了机枪,准备射击。头一枪一响有个桦墅人就地一滚,滚进了旱井里。其实,这个人没有中弹,掉到井里也没有摔死。其余20多个人被鬼子一枪一枪打死后落在井里了。后来,那个桦墅人等鬼子走了就从旱井里爬了出来。他回到桦墅一讲,说陈家边旱井里打死了多少人,我们就全知道了。那一天在旱井边被打死的人,有陈家边的,也有张家岗的,还有别的村上的。知道姓名的有夏永源(夏传桂的父亲)、笪冬桂、雷忠旺这几个。

(邓信华插话)我父亲邓志强跑反时留在家里没走,他年纪大了,不想走。他给鬼子弄吃的,一次到孟塘给鬼子送豆腐,被鬼子打死在孟塘。

油老鼠洞上面还有个仙家洞,有一个房间大小,里面有石头锅灶。李兴泉就是在那个洞里结婚的。油老鼠洞比仙家洞大,能躲五六十个人。沿着斜坡进洞,有两丈多深,洞底是平的,洞顶上还滴水,地上全是油老鼠屎。跑反时我没有躲在洞里,但后来进去看过。我们村上进洞看过的人还不少呢。

(李龙华插话)我叔叔李兴柱跑反时留在村上没走,被鬼子看到后打死了。

110. 邓信和口述

邓信和,男,1926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孟塘张家岗

调查时间:2004年9月12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79岁。

我的舅舅(四舅舅)秦老四没有子女。跑反时,他在后巷附近北塘瓜棚里看到一个女孩子没有被鬼子打死,就把她领回家了。北塘在大赤燕东边,从化工厂那里往二营方向跑,有个矿泉水公司,那里就是北塘。

我们村上被鬼子打死的人有十来个:

张庆丰,二十八九岁,在孟塘打死的;

小龙(小四的哥哥),8岁,在村后的大竹园里被打死的,是跑反开始后二三天打死的;

邓志强,54岁,跑反开始后两三天在孟塘被鬼子打死的,他是我父亲;

谢老太,70岁左右,也是竹园里打死的;

夏永源,在陈家边的旱井边打死的;

雷忠旺,也是在陈家边的旱井边被打死的;

笪忠桂,70岁,在村后竹园里被打死的;

秦汉英,30岁左右,在坟头被打死的。他家是葛巷有名的大财主,有几百亩地,家里有枪的;

林小兔子,23岁,属兔的,在坟头送菜被打死的;

笪保和,跑反时跑到了鸿岗头,在湖堤那里被日本鬼子打死的。

111. 彭明文口述

彭明文,男,1929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孟塘72号

调查时间:2004年9月29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76 岁,属蛇,跑反时 9 岁。一家人跑到了北圩舅舅家。祖母、父亲、两个叔叔和我的干父亲没有去。当时日本人还没有到汤山。过了几天,我祖母也下圩了。

跑反回来后,听目击者讲,汤山西梅下山村刘茂珍家的一个人在孟塘被日本飞机投的炸弹炸死了,尸体挂在一棵大柳树上,很长时间没人去拿下来。死人的尸体最后是怎么弄下来的,我不清楚。听说刘茂珍这个人后来因为这件事同孟塘村上的一个人结成了亲戚。

国民党部队同日本鬼子在孟塘打仗的事,我没有亲眼看到。跑反回来听大人讲,有支国民党部队要开到周冲,他们不是本地人,是广东人,说话不清楚,人家就把他们带到了方冲。日本人居高临下,在山头上用机枪扫,被打死的人一堆一堆的。第二年春天我们从北圩回来,这些国民党兵的尸体都腐烂了。我们到方冲山上去拔笋,看到有的笋从尸体中间穿出来。这一仗是否有人活着逃出来,我不清楚。听说,陈家边的李仲明胆子特别大,到死人身上去翻过东西。这个人现在已经去世了。

我在 1950 年当孟塘自然村的村长,1953 年当孟塘小乡的乡长,1955 年调到江宁县绿化工作队,1957 年又回到孟塘当大队书记。日本鬼子屠杀了多少老百姓,上级没有组织调查过,都说不清准确数字。我们村有个彭明新,今年 81 岁,他知道的事多一点,你可以问问他。

汤山到龙潭的公路修好后没多久,中日两国的战争就打起来了。后来,新四军又在这里活动,同日本鬼子打。他们都是属于茅山的,管文蔚、惠浴宇、朱万红等领导常过来。还有周伯恒、徐微,这两个人后来叛变了。

我十二三岁那年夏天,新四军过来破坏公路。这条公路上常有日本人的汽车。鬼子要到水泥厂去拖水泥,新四军就炸桥。那天晚上八点来钟,来了一些新四军,放哨一直放到制药厂^①那里,电话线全部剪掉。然后就挖壕沟,有一米多宽,装上炸药炸桥。可那座桥质量很好,只炸出一个大窟窿,没有炸掉。到夜里一点来钟,新四军吹吹哨子就走了。第二

① 制药厂指中国药科大学在汤山孟塘大赤燕办的药厂,大约是十年前办的,厂址在汤龙公路西侧。

天日本人来孟塘,问老百姓:“支那军到哪里去了?”老百姓谁知道呢?这一次,孟塘的老百姓没有受什么损失,鬼子没有杀人。第二次,我16岁那年,插秧的时候,天旱,水塘里没有多少水,我们赤了脚到塘里去捞鱼。中午十二点多钟的样子,孟塘打起来了。年轻人听到枪声就跑,我赤了脚一口气跑到了龙潭下面。老年人和妇女没有跑,留在村上了。

原来,汤山有个日本人叫天福鬼子,他办了个供销社,销售配给的食盐、布匹、水泥等东西,经常开车到龙潭拉水泥。他的侄子20来岁,刚从日本过来,押车到龙潭拉水泥。驾驶员和小工都是汤山人,车子开到竹丝园那里,被新四军拦住了,小鬼子下了车,跑到竹丝园里,被新四军抓住了。听说,新四军来了个排长,还带了几个民兵,非正式的新四军,东葛墟的桂长春也在其中。这个小鬼子被押到东葛墟后,他不肯走了,桂长春就把他打死了。若小鬼子肯走,新四军不会杀他,他也不会死的。

这件事情发生后,有人就到汤山报告,来了好多鬼子。那时候,公路上晒了不少马草,老百姓割马草,给鬼子,换点米。马路上马草多,鬼子的汽车就开不快。除了鬼子兵以外,汤山的唐大先生也来了。翻译官桑水亲没来,来了个姓陈的。鬼子就问:“新四军哪里去了?”老百姓就说:“新四军从哪里来的,我们不清楚。到哪里去了,也不晓得。我们只顾自己逃命,谁知道新四军的事呢?”鬼子就放火烧房子。唐大先生讲:“你们不要伤害老百姓,老百姓又没有犯法,事情是新四军干的。你们把老百姓的房子烧掉了,叫他们住到哪里去呢?”日本人不听,把孟塘的房子统统烧光,猪、狗、猫都烧死了,全村只剩下三间房子没有烧掉。

后来,听人家讲,新四军这次到孟塘来的主要目标是要搞一个姓张的,张敬德,他同鬼子混,对新四军不利。可是张敬德跑掉了,离开了孟塘,跑到了制药厂那里。新四军临时改变主意,拦了小鬼子的汽车。张敬德后来又当上了国民党的特务,解放以后在长江镇(地名)被枪毙了。桂长春在解放后被政府管制过,这个人现在还活着。

孟塘的房子被鬼子烧掉后,唐大先生给每户送几棵松树搭房子,汤山所有的木匠全集中到孟塘,帮助盖房。陈家边、张家岗、葛巷的老百姓给孟塘人送饭送水,村村都来送,送了三天。

日本鬼子在孟塘放火烧房后,有人跟他们说新四军跑到宝华山去

了。于是,鬼子就通知龙潭的部队去抄(搜)宝华山,汤山的二鬼子(绥靖队)也开到宝华山抄山。鬼子和二鬼子的部队到宝华山时,天已经晚了,两路人马在宝华山打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天一亮,才发现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新四军一个也没有捞到。

除了张敬德外,孟塘还有一个彭传科,也是替鬼子办事的。新四军搞的几次活动,都是他去报告鬼子的。我14岁那年夏天,天下着大雨,新四军的一个人到孟塘来收猪头税,他去报告鬼子了。日本人来到孟塘,收税的新四军跑掉了,他又去报告。后来,新四军恨死了他,把他镇压了。那天,彭传科的大儿子跑到学校去了,否则他们父子俩都要被杀死的。

这些事都是历史了。再过些年,我们这三五个老人去世了,村上的事就没人知道了。我只念过两年半私塾,文化低啊。这些事情要写成书就能传下去。要写书,还要搞调查,我们就没有办法了。

112. 秦正礼口述

秦正礼,男,1927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孟塘

调查时间:2004年9月30日

调查人:费仲兴



秦正礼

我今年 78 岁,属兔。

我们秦家的老祖宗是仪征的,后来火烧秦家营,房子全烧光了,我爷爷(秦洪和)就搬到汤山孟塘来了。他生了五个儿子:志财、志银、志和、志昌、志林,我是老三志和的儿子。我老伴在 2000 年去世了,她娘家是陈家边的,比我大一岁。我们养了四个女儿、三个儿子。二儿子叫秦聚明,高中毕业,其他人都是初中毕业。二儿子修理自行车,家里有楼房,离车铺不远。我现在和他一起过。解放前,我念过几年私塾,多少识点字,相当于小学毕业吧。

日本鬼子是冬月初四从安基山那边过来的。三个鬼子,一人骑一匹马,先过来侦察,到了孟塘的马路上。当时,我们正在吃午饭。国民党部队开过来一辆马车,上面有一个军官、两个士兵。到了制药厂那里,他们被鬼子打死了,马车摔在那里。下午三点来钟,鬼子的大部队从安基山开过来了,我们就跑到后巷躲了起来。

那天,汤山老百姓从大赤燕往龙潭跑,一路上全是逃难的人。鬼子的飞机过来投炸弹,有两颗炸弹落在我家门口,把下山村刘茂珍的大姐炸伤了。晚上,我家的上人(上一辈的人)回家搬粮食,这个姑娘就喊:“大伯,救救我吧,我的膀子炸断了。”于是,他们就把她带到后巷一起跑反。当时她家里人不知道她在哪里,安民后来找,才见到她。她父亲叫刘世才,是教书的,生了三个女儿,没有儿子。小女儿叫刘茂珍,现在已去世。二女儿是招女婿的,后来改嫁到土桥,现在还活着。大女儿嫁到刘岗头,夫妻俩都去世了。

刘世才找到我们家之后,他大女儿就认我父母为干爹、干妈,我们就成了亲戚,经常来往,所以他们家的情况我们都知道。

冬月初四鬼子来孟塘,冬月十三又在孟塘打鬼仗,是鬼子打国民党。那时候鬼子已经打到南京了,有一个师的人马,都是两广人,是白崇禧、李宗仁的部队,有万把人呢,原本打算走周冲到宝华山去的,结果带错了路,跑到了方冲。冬月十三那天,我们都在后巷。临晚了,太阳下山了,枪炮声密密的,子弹炮弹打得直飞,我们都躲在洞里不敢出来。山头上的鬼子用机枪打他们,飞机投炸弹,从大赤燕方向还开过来三辆坦克。坦克没有出手,就是朝山上打炮。国民党的部队已经冲过马路到后巷

了,他们被鬼子打死一半,冲出来一半,一路上还喊:“我们都是中国人。东洋人来杀人了,你们快跑!”这一仗一直打到半夜才停下来。日本鬼子朝国民党打,国民党的机枪有时也还手,朝鬼子打一阵。

这一仗打过之后,逃到宝华山的国民党兵又碰到了土匪。土匪虽然不杀他们,但缴他们的枪。国民党的兵,一二十人一伙,二三十人一伙,他们的枪都被土匪抢走了。

第二天,鬼子的烧杀队就过来了。他们把孟塘的房子全烧光。有三个鬼子,骑了三匹马,站在后巷的山头上,看到老百姓就开枪。有家姓毛的,八个人躲在一个地洞里。有个小孩刚从洞里钻出来,就被走到洞口的鬼子看到了。这个鬼子就向洞里开枪,把躲在里面的七个人打死了。其中有个女的,肚子里还怀着小孩,她是被鬼子用刺刀戳死的。鬼子把她的肚子挑破了,那胎儿都成形了,快要生了,我们都看到的。七个人全是在洞里打死的。只有一个叫“小毛子”的小孩活下来了,解放后,他跑到江南水泥厂,现在 70 岁左右。你到水泥厂去,能找到的。

姓毛的这家是从苏北搬过来的,当时已在后巷住了几年。后巷那里原来就没有几户人家,多半是外地迁来的。被鬼子打死的这七个人后来就葬在“大礼堂”的后面。坟的位置我不清楚,你可以去问后巷的人。每年清明节扫墓,那个坟上总有七个坟帽。(这里说的是蓝洪银家的事,“姓毛的”系误传。)

在后巷的北塘,许多难民搭了个长棚,有 20 多个人躲在里面。有汤山的,有李家庄的。鬼子的烧杀队一来,把他们都打死了,只剩三个小家伙没打死。这一仗打过之后,老二和老四(指秦志银和秦志昌)几个人就跑过去望望,看到三个小家伙躲在死人窝里。怎么办呢?老二和老四各领一个,把他们带到了家里。后来看看后巷实在躲不下去了,就带着小孩一起跑反。第二年安民后,一个男孩被汤山的家里人领回去了,女孩被李家庄的人领回去了。在长棚里被打死的 20 多个难民是什么时候被搬走的,是谁搬走的,我们都不清楚。安民后,我们回到了孟塘,到方冲去玩过。那里到处是死尸,臭得不得了。死尸的脸、皮肤全黑了,但还没有化。山上有七八条狗,见人就咬。后来,有民工来埋尸,就利用现成的山沟埋人。制药厂对面挖了个大坑,埋了四五十个人。制药厂后头有个

大坑,埋了五六十个人。

汤山到龙潭的公路,才修好一年,鬼子就打过来了。

113. 孟家喜口述

孟家喜,男,1928年生,属龙

调查地点:汤山镇龙尚孟家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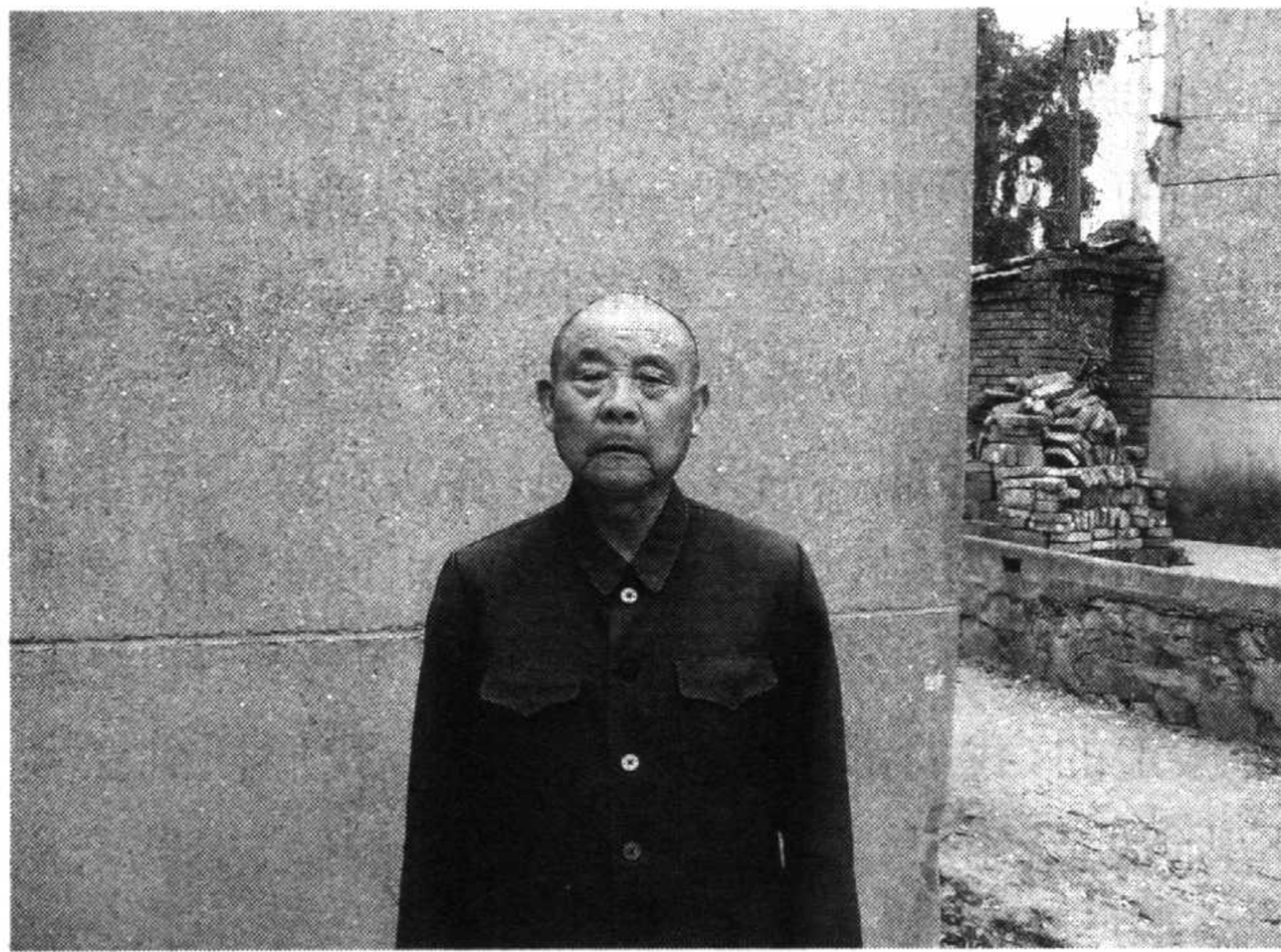
调查时间:2004年6月2日

调查人:费仲兴

日本人是冬月初七早上八点多从侯家塘的步兵学校开过来的。那个步兵学校是国民党办的,现在是解放军的营房。以前叫737部队,现在叫73917部队。

国民党的部队是广东部队,穿着小棉背心,从汤山山上逃过来,经过孟家场往西跑。日本人在飞艇上用望远镜看到了,所以我们村杀的人特别多。

(孟仁寿插话:解放初期,抗美援朝的时候,我在村上当团支部书记。为了动员青年参军,搞过几次诉苦。那时候我专门调查过,我们村上被日本人打死的一共有73个,都是有名有姓的,其中33个是本村的。)



孟家喜

我讲一个，你记一个。这些人只有四个是开枪打死的，其他全是用刺刀刺死的。

刘正六的儿子刘友全，19岁，在村后被鬼子杀死的。

刘正六的三哥，从河南信阳来的，不知道名字。他被鬼子刺了一刀，刺刀从背后进，从胸口出，出了胸口还露出一段。鬼子一拔，再用脚一踢，他就趴在地上不动了。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雷树生，属龙，当时46岁，在村上被日本人用刺刀刺死。

孟正营，被日本人刺死。他的两个小姑娘甩在水塘里淹死了。

孟正龙，52岁，在村上被日本人刺死了。

孟家良，60岁左右，眼瞎了。他的儿子叫孟生海。父子俩被日本人用刺刀刺死。

孟家仁，40岁左右。他的儿子小名“小杏子”。父子俩被日本人用刺刀刺死。两个女儿丢了，女人改嫁了，家庭破产了。

陈之宁，40来岁。他的儿子小名“三锤子”，二十来岁。“三锤子”是被日本人开枪打死的，一枪打在左胸口，靠肺的地方。

陈疤痕（外号），17岁，在村西山上被日本人用刺刀刺死。

孙广和，在村西山上被日本人用刺刀刺死。

孙广明、孙广才兄弟俩，一个被鬼子用刺刀刺死，一个在家门口被鬼子用石头砸死，脑袋被砸得粉碎。

孟文庆的弟弟3岁，鬼子用刺刀戳进他屁股眼里，挑起来一甩，摔下来就死了，鬼子还哈哈大笑。他母亲被刺中了气管和食管，咕噜咕噜地冒血水，过了三四天才死的。

刘大，五十来岁，在家门口被鬼子用刺刀刺死。

李矮子，外地人，被鬼子用扁担敲死的。

梅老头，跑反过后在芜湖被日本人打死。

冬月初七，国民党的一个连在金丝岗同日本人打，几乎都牺牲了。

孟家场西面的山上到处有碉堡。

日本人在步校架了炮向西山头轰，三炮就把工事打烂了。

日本人打南京前，天天有飞机过来轰炸。一开始，国民党军队用高射炮打，德国人指挥，总是打不下。后来换苏联人的炮，由苏联人指挥，

一炮就打一架。苏联人是真正帮中国人打日本的。德国和日本是盟国，他们是一伙的。

114. 孟家锦口述

孟家锦，男，1926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龙尚孟家场

调查时间：2004年6月2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父亲孟正营帮地主做酒，回来就被日本人杀了，地点在村西文兴家的“二亩七”田边，当时39岁。

我叔叔孟正范原来在上海当学徒的，回乡后就被日本人杀死了。他和我父亲是在同一天、同一地点被杀死的，死时二十来岁。

我的干爹王兆富是外地来的，在孟家场落户了好几年了。跑反时，他在地洞里被日本人抓出去，后来被杀死了。一起被抓的有三个人。

我母亲在山上看到他们三个被杀后，感到一个妇女带四个小孩，养不活的，就叫我和我的大弟弟一人抱一个，把妹妹（3岁）和小弟弟（1岁）甩在塘里淹死了。那水塘就在村西头山脚下，叫“沙塘”。淹死后，两个人的尸体就埋在那里。后来，尸体被狗叼走了，母亲哭喊着，在地上打滚，悲伤万分。

115. 陈德梁口述

陈德梁，男，1924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龙尚孟家场

调查时间：2004年6月13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2岁，跑反那年15岁，原来是神家庄人，后来招女婿招到孟家场。跑反时，父亲在苏州做生意，我跟了家门伯伯跑到江北，过了年，安民之后，父亲把我带到了苏州，所以我对孟家场的情况不清楚。但是，

在我跑到江北去之前,我在神家庄亲眼看到从上峰过来的一队队难民挑着箩筐往山上跑,有一队鬼子排着队冲到涧南村,在一个水塘边把许多难民开枪打死了。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就赶紧逃,在附近山上躲了起来。鬼子在神家庄也杀死了许多老百姓,你们可以到村上去问问。以前,那里有个地藏庵,躲了不少人。一个鬼子背着一支枪,跑到地藏庵,把枪交给一个老头,自己抓妇女强奸。当时有一百来人看着,都不敢动手。要是现在,肯定把这个鬼子敲死了,活埋了。跑反时,龙王庙、北尚庄那里打死的人不多,但安民后鬼子经常去抓花姑娘,糟蹋了许多人,有的妇女被强奸以后就自杀了。

116. 孟家英口述

孟家英,女,1928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龙尚孟家场

调查时间:2004年6月13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77岁,属龙的,跑反时10岁,跟了伯父家的堂哥跑到了江北。在江北什么地方,不晓得。那时候年纪小,不懂。第二年安民后就回来了。我父亲孟正祺没有去江北,他就躲在孟家场附近的山上。当时有许多难民躲在孟家场,我父亲亲眼看到日本鬼子把许多难民打死了,赶紧逃,鬼子就追过来。父亲逃到一间阁楼的楼下,站在一张桌子上,一跳,上了阁楼。他身材高大,跳上去了,一般人是跳不上去的。到了阁楼上,他抓过两条芦席,把楼梯口堵起来了。日本鬼子追到这里,没料到我会跳上阁楼,从后门追出去了,父亲就算躲过了这一劫。

我伯父孟正龙,当时50多岁,腿上有毛病。隔壁的雷树生,一条腿断了。他们两人都不能走远路,就没有跑反,留在家里看门了。鬼子一来就把他们两人刺死在家门口了。

以上情况都是我跑反回来后听我父亲讲的。还有,我四叔孟正坤,在村上被鬼子刺了两刀,他摔在地上装死,就活下来了。跑反过后,他的伤口就慢慢地好了。

117. 陈贤春口述

陈贤春,男,1928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龙尚涧南

调查时间:2004年7月3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77岁,属龙,跑反时10岁。解放后当过青龙乡乡长,现在帮村委会看门。

冬月初七早上,天上飞着一个气球,鬼子从钱山冲下来,涧南大场上的难民听到枪响就跑,多数走“上池塘”那条路往山凹里跑,被鬼子的机枪扫死许多。

我们村的陈敦魁被鬼子刺了一刀。鬼子怕他没死,又用枪把子敲他,把他打死了。陈贤林的父亲陈圣银、大伯陈圣玉也被鬼子杀死了。陈圣泉的爷被刺死,他的父亲被打死。陈敦树的父亲大招子也被鬼子杀死了。

那年腊月里,前村街的赵老三把步校里拣来的中央军用过的绑腿布放在外面晾晒,鬼子看到后以为他们是中央军逃兵,叫他一家人跪在地上,跪成一排,然后用三八大盖放了一枪,这一枪就把他家五个人打死了。

冬月初七那天,我父亲听到枪响就带我们往山上跑。后来,他又带我们跑到了江北。母亲背着我妹妹,父亲背着被子,被子里还有几吊钱。我背着一个篾子,脚肿了,鞋都脱不下了,他们就搀着我走。到了江北,那里没有鬼子。那里的人家家都有枪。第二年三月头上,快下秧了,我们才回来种田。

要把农村里的人算起来,被鬼子杀死的人就多了。孟家场打死了70多,涧南打死八十几。还有好多小孩被摔死了。听说在腊月里,有个女的带了个小孩,老哭,女的怕被鬼子发现,就把小孩摔在塘里了。可是,那小孩爬上来了。再摔,又爬上来了。小孩穿着蓝花布做的小褂子,最后还是被摔在水塘里冻死了。

我们回到涧南,看到许多死人都没有埋。有的人一家子都死了,谁

去埋呀？有三个小伙子死在那里，我父亲挖个坑把他们埋了。

我们村的陈金荣，当时四十来岁，我喊他“爷”，他被鬼子连刺五刀，没死。他趴在沟里，刺刀从脖子后面戳进去，脖子后面只有一个孔，脖子前面有五个孔，都没刺中要害。他说，刺的时候不晓得痛，后来鬼子用枪把子砸他脑袋就感到很痛。由于沟里全是烂泥巴，他没有被砸死。如果是硬泥巴，那就要砸死了。当时，他趴在沟里，家里人去找他，一看还活着，就用老母鸡的皮把伤口裹起来。结果，他活下来了。解放后，他还当上了村文书，1956年才去世。

步校里的鬼子后来搬到“大楼”里去住了。难民一看，就把步校的房子全拆了。

抗战期间，鬼子拼命掠夺中国的资源。汤山青林的铜矿和伏牛山的铁矿都是鬼子开采的。到了后期，他们的汽油用完了，就到处砍树，砍刺槐，烧木炭发动汽车。上坡上不去，就叫老百姓推。南京大光路上的机床厂是小日本搞的，我在那里抬过石子。

抗战期间，保长不好当。日本人不能得罪，新四军也不能得罪，两头忙。保长是纸糊的灯笼，一捅就破，要糊得双方都满意，不容易。

118. 唐学光口述

唐学光，男，1920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龙尚涧南

调查时间：2004年7月3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5岁，属猴。

中央军在冬月初六到我们村。他们饿得不得了，抢着吃。有的人鸦片瘾上来了，像死了娘老子似的难受。那天夜里十点来钟，鬼子到了钱山，半夜里只听得山上呜啦呜啦的讲话。第二天早上八九点钟，鬼子来了，有一个气球在天空中。中央军来不及吃完早饭就打上了，后来在山口的四组、五组和小茅山等地同鬼子打。在千儿山的山口那里有一个炮台，有个连长把子弹挑上炮台，在那里打死了不少鬼子。后来，子弹打光

了,鬼子冲上去,用一颗葡萄弹炸炮台。鬼子又打死了许多中央军。中国人当年失败就失败在炮台上。汪精卫把计划改了改,机枪孔开得很大,炮又拉不进去。

万灵的老奶奶在沧波门那里有公墓的地方被鬼子烧死了。鬼子自己的伤兵也要烧死。他们的伤兵,人还没死,就浇上汽油活活烧死。日本人不要一个伤兵。

冬月初七头一批过来的鬼子最凶,一脸胡子,见人就杀。那天,我躲在山上的地洞里,和小孩玩。看到鬼子的气球晃呀晃地过来了。鬼子见人就杀,我们村被杀的人最多。陈圣玉在戴家塘被鬼子开枪打死。陈敦宝的哥哥,小名陆陆,他在村边尖三亩田里被鬼子开枪打伤,流了许多血。回到家里,他渴得不得了,要喝水。结果,一喝水,血就冻了,第二天就死了。

陈金苏,小名苏老爷,在涧南村东北边的吃水塘被鬼子开枪打死。他的一个兄弟,小名叫四老爷,在涧南砦坊里被鬼子用刺刀戳死。

唐学英和她母亲待在家里没出去。有个鬼子进屋一看,她姐手上戴了只金戒指,就上去拉下来,拿走了,嘴里还呜哩呜哩地讲着什么。那天,鬼子只杀青壮年男人,没有杀妇女。

在上池塘死的人最多,水都染红了。下池塘那里一个都没有死。大场上的难民听到枪响就全跑了。

119. 成德荣口述

成德荣,男,1923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龙尚神家庄121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6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2岁,属猪,跑反时15岁,小学六年级刚毕业。鬼子进村前,我就跟人跑到龙潭北圩,在那里歇了两个多月才回来。回来的路上,走到坟头,见鬼子端着枪,装着刺刀,可吓人哩。有个老哥叫成德金,他把担子一摔就往山上跑。鬼子向他开枪,没打着。鬼子一个一个地检

查,检查完了才让走。回到神家庄一看,房子全烧光了,回不了家了,就到地藏庵住。地藏庵住不下,又到了龙泉庵。鬼子经常到龙泉庵去找麻烦,又住不下去了,就到南边去。可南边也有鬼子。

听人说,鬼子是冬月初七进村的,一部分从孟家场杀过来,另一部分从涧南山上冲下来,两面夹攻。中央军没走掉,撞到了,打了一仗。鬼子在涧南和孟家场杀人,孟家场杀得最多。有个做生意的外乡人老李,名字不知道,他被鬼子杀死了。还有一个成德裕,在小塘前被杀死了。他有后代的。成美村的儿子大羊,当时18岁,到汤山头去洗澡,见鬼子来了,就往山上跑,被鬼子开枪打死了。郝帮业和郝帮洲两个人怕中央军拉夫,穿着壮丁训练队的衣服去南京,他们在路上被鬼子杀死了,再也没有回来。地藏庵里躲着许多难民,鬼子一来就杀了几个男的。在涧南的上池塘那里,也杀死了许多难民。在我们村西北面的小塘那里,有三四个难民被鬼子杀死了。

神家庄的房子大部分都烧掉了,我家有三间房子也烧着了。我父亲正好回来,就把火浇灭了。成美凯、杨厚智家的房子没烧,郝家祠堂也没烧掉,其余房子都烧掉了。

我父亲叫成美贤,在南边带了一帮人组织抗日自卫队,是抗日的。徐矮子跟我父亲很要好,常到我家来的。后来,新四军要来接收自卫队,当地人不肯去,父亲就把一支手枪交给了新四军,在土桥开店做生意。我讲的都是真话,一句假话也没有。

有个叫成美登的人讲我父亲的坏话,说我父亲收了多少徒弟,还打死一个新四军。其实,那个人虽然参加了抗日自卫队,但经常偷偷摸摸地回来做坏事,吃人家的,喝人家的。后来,他被北尚庄的王明芝抓住打死了。这件事我父亲并不知道。人家讲我父亲的坏话,我父亲就被抓去坐牢了。镇压反革命时,我父亲不承认,反抗,就被打死了。后来,徐矮子当上了上海市副市长,他来信说我父亲是抗日的。但这封信来迟了。要是来得早,他就没事了。

成庆彪是跟我父亲一起抗日的,后来在我们村上被二鬼子抓去打死了。

120. 陈翠英口述

陈翠英,女,1917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龙尚神家庄 65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6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88 岁。冬月初五跑反,我跟了老伴到光华门,他有难民条子的,我们就进去了。到哪里了呢?到新街口的弹子房,就待在那里了。乖乖,反动派(国民党)的兵,可怜噢,血淋淋的。我的小孩才 3 岁,睡着了,我醒着,吓死了。反动派的兵睡在那边阁上,我们就待在这里,娃娃就哭。第二天一早,我老伴和我老公公跑出去找房子,在上海路找到了房子,我们就落下脚,住下来了。老公公开了个小店,卖点东西。冬月初五到南京,冬月十一,鬼子就打开城门了,乖乖,杀人。人一起掳了去,说是反动派,要枪毙。有人认,就让走,没人认,就枪毙。房东太太好,说:“孟方洪是我儿子。”鬼子就把他放了。

鬼子到了我们家(指上海路的住处)。我老伴弟兄两个,他哥哥在电话台报名,待了两个月,头上有帽箍,人家就说他是反动派。我老公公说:“他不是当兵的,他是我儿子,是做生意的。”鬼子的刺刀对着他了。后来把手伸出来看,他手上没有老茧,就没事了。

后来回到了神家庄。村上搞得一塌糊涂,一条龙的房子都烧掉了。××的爷,还有××的侄子叫春年,被鬼子杀掉了。我们做媳妇的不出去,听不到,不晓得哎。不像现在哎,人要到哪块就到那块。情况不晓得不能瞎讲。

(孟俊炳插话)我爷爷原来是做铜匠的,叫孟方正,60 多岁,留在家里看门。天冷,他穿了一件皮衣躲在草堆里,被鬼子拖了出来,在村边“一亩七”田里用刺刀戳死了,再把肠子挑出来玩。在坟头,阳山碑材那个地方,杀的人可多了。鬼子强奸过妇女,再用刺刀戳死,多呢。

121. 欧阳国堂口述

欧阳国堂,男,1931 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龙尚北尚庄

调查时间：2004年7月6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74岁，属羊的。跑反时7岁，对有些事情有点印象了。我父亲扛着我上千儿山，我们都躲在洞里。鬼子来之前，天上放了一个黑颜色的目标（指飞艇）。我二爷（祖父的二哥）是秀才，当时七八十岁了，花白的胡子长得老长老长的，他一看到这东西就说鬼子要打过来了。后来，鬼子真的来了，抓了不少夫子。有位老夫子叫我们赶快跑，我们才跑的。第一批过来的都是医生，他们不杀人。后面来的鬼子也没有在我们村杀人。

听别人讲，中央军和日本鬼子在团子山上打过一仗，打死了不少鬼子。团子山上有个炮台，四个中央军在里面守着，有一箩筐的子弹。鬼子朝山上冲，他们就在炮台里扫。后来，子弹快打完了，一个人说：“我出去看看。”出去了再也没有回来。过了一会，又有一个人说：“我出去看看。”他出去了也没有回来。最后，炮台里只剩下一个中央军了，子弹也打完了，日本人就把他包围了，打死了。这个炮台后来被老百姓敲掉了，钢筋拿去卖钱。

我们村的王明芝，既给鬼子办事，又给新四军办事。他家的房子被鬼子烧掉了。龙泉寺的修蟬和尚，大家都叫他“大个子和尚”，他是为新四军办事的。庙里有地道，新四军在庙里开会，遇到情况就钻地道。后来，绥靖队把这个和尚抓去枪毙了。另外一个人叫老汤的，他被王明芝抓去杀了。龙泉寺蛮大的，四棵白果树长得很高的。1958年大跃进时，龙泉寺被拆掉了。

我们北尚庄是汤山最偏远的地方，人家都说是“汤山的西伯利亚”。可是，鬼子还是经常来找花姑娘。他们是骑着大洋马来的，比你们坐的汽车跑得还快。有一次，一个鬼子问我们村的杨生龙要花姑娘，他说没有，鬼子就打了他两记耳光，打得他哭起来了。鬼子又问我二爷，他也说没有，鬼子就对他当胸一拳。我二爷是有功夫的，挨了一拳，一点事也没有。那个鬼子就跷起大拇指，指着他说：“你的，大大的。”又翘起小拇指，

指着杨生龙说：“你的，小小的。”

我二爷考秀才考了两次，第三次没去考。他的名字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爷爷叫欧阳于生，比我二爷小。（有位妇女提供线索说，她的小爷欧阳纯烨 90 岁了，耳不聋眼不花，说话有点结巴，了解的情况多。现在住在汤山邮局附近。）

122. 孙世法口述

孙世法，男，1928 年 12 月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龙尚孙家边 65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6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 1951 年入伍，参加过抗美援朝，立过三等功，1956 年回国。

我 9 岁那年，母亲去世了。父亲甩下我和两个妹妹跑出去了，找了个小寡妇。后来，我的大妹妹被北方人抱走了，二妹做童养媳。后来，二妹跟了一位当工兵的，随军去了西安，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比我们好。



孙世法(左)

跑反时,我12岁。别人都跑到栖霞去了,我没跑,跟了几个老头老太留在家里,讨饭过日子。冬月里,下大雾,也跟现在一样灰蒙蒙的天,鬼子来了。有的人吃过午饭就跑到大山里躲起来了。

刚跑反时,在我们村东边的路上,有三四个南京来的难民,都是小伙子,被鬼子抓住了,跪在地上,都被杀死了,这是我亲眼看到的。鬼子用那么长的指挥刀砍的。有一个难民穿的是背带裤。那时候我才知道这些当兵的不是中央军,而是日本人。看到他们杀人了,我就跑了。

靶场那里(涧南村西南的小靶场)以前有个村子叫前村街,解放后建靶场,这个村子搬到孟北,改名前新村。有一家姓赵的,十几个人躲在地窖里,被鬼子看到后拖了出来,全部杀死。那时我去看过的。他家有后代,一个叫赵聚山,一个叫赵聚才。赵聚山后来同我一起当兵的,鬼子杀人的事是他告诉我的,现在他已去世了。赵聚才还在孟北的前新村,你可以去问问他。

日本鬼子有好也有坏。我岳父叫朱德荣,鬼子来时害病,有个骑马的鬼子给他看病吃药,还在他家门上贴了张纸条。后来,别的鬼子看到这张纸条就再也没有去骚扰过。我们村上被鬼子打死的人有三个。跑反刚开始,鬼子一进村,看到村民孙有福往村子北面跑,一枪就把他打死了。有一次,来了两个鬼子,要找花姑娘。一个鬼子是大胡子,是朝鲜兵,他没带枪。还有一个鬼子很年轻,他背着一支三八式步枪。杨来喜和他的叔叔杨勇财,同三个国民党的散兵游勇躲在山上的亭子里。其中有个国民党兵叫老朱,他说鬼子只有两个人、一条枪,想去打死他们,另外四个人不同意,说不能那么干。后来,他们五个人被鬼子看到了,就一起跪了下来。大胡子从年轻鬼子手里接过枪,朝杨来喜打了两枪。第一枪打在肩上,来喜喊:“叔叔,我没命了。”第二枪一响,他就死了。后来,鬼子叫剩下的四个人去挖菜,大胡子把枪还给了年轻鬼子,到处逛去了。年轻鬼子后来也去逛了。四个人一看,就全逃进山里去了。

后来安民了,我伯父参加了新四军,北尚庄的王明芝也参加了新四军。住在步兵学校里的鬼子来抓王明芝,他们看到我堂哥孙树生在路上跑,就用歪把子机枪把他打死了。

我们村上还有两个人被鬼子打伤过。一个是我父亲孙富春,外号孙

老三。跑反时他从栖霞回来弄米，在路上被鬼子一枪打中了大腿。后来，我们村的一位老中医用秘方把他挑（治）好了。我们村的孙希圣，外号叫大辣子，在村外被鬼子一枪打中，裤裆里的卵子（睾丸）都打出来了。后来，也是那位老中医给他看好的。这位老中医有个女儿叫孙秀英，年龄和我差不多，现在还在村上。她是招女婿的。

以后，我们这里有了新四军，日本人就不敢来了。安民后，有人介绍我到龙泉寺当小和尚。这个庙里只有两个和尚，一个叫智松，一个叫修蝉。智松后来跑到南京观音寺去了，不在龙泉寺。

龙泉寺前后两进，前面六间是两层大殿，供弥勒佛和另外三个大佛，其他小菩萨就多了。后面有八间平房，都是住人的。庙里有田产，上峰岗窑那里有几十亩，附近荷花塘边上有十来亩。这些田都租给江北人种，庙里收租子。种田的有小老二夫妻俩和小老三他们。除了水田，还有山林。里一千外八百的山地都是龙泉寺的。庙里还有一个看庵的，叫李金发，是北方人。我在龙泉寺里管烧香，朝烧香、午烧香、晚烧香，还管打扫佛堂。也念点经，后来新四军常去，就不搞这些了。

新四军在龙泉寺里一住就是四五十人，有时有二三百人，鬼子不敢去。老百姓上山扎柴，被新四军逮住了，只让进不让出，中午也给一顿饭吃。到了晚上，等新四军走了才放你回来。这样，新四军就不会走漏消息。

我们村的孙希强，原来是新四军的营长，有警卫员的，后来当了叛徒，跑到汤山鬼子那里去了，同鬼子一起，住在“小楼”里。大老婆也不要了，找了个小老婆，是孟家场人，姓孟，长得很漂亮。夫妻俩一出门就骑大洋马，神气得不得了。小老婆生了一个儿子、两个女儿。这个小老婆今年也80多了，她们现在都住在我们村上，你要去问她孙希强的事，她是绝对不会讲的。

孙希强投靠日本人之后就当上了“出发大队长”，专门带了鬼子打新四军，新四军吃了不少苦头。解放后镇压反革命，在侯家塘召开审判大会，第一个枪毙的就是孙希强。公安人员念布告，说：“孙希强打死我地下党员修蝉。”我这才知道我师父是地下党员。枪毙前，他知道不好了，就在地上滚来滚去，公安人员上去就是一枪，打中了他的脑袋，脑浆都流

出来了。我和我老伴都去看的。同他一起枪毙的另外两个人跪在那里一动不动，一个是汤山的华国堂，一个是润南的恶霸地主陈登奎。

新四军的队长叫徐步云，大家都叫他“徐矮子”，这个人很厉害。有一天，他带了几个侦察兵到金丝岗，穿着蓑衣，戴着斗笠，在马路上市。看到鬼子的汽车来了，就用手榴弹打，逮住了三个鬼子和好几个二鬼子。他们把汽车上的轮子卸下来，叫鬼子扛着，带到了龙泉寺。有个二鬼子还是个大头头，徐矮子亲自审的。他说：“你们今天要逮我，明天要逮我，老子今天就在你们面前了，你们看看，老子究竟长得怎么样！”说完，他自己也笑了。他把警卫员叫过来，说：“拉到山后头砍了，不要浪费子弹了。”那三个鬼子没有杀。新四军把枪架在一起，围成一圈，把鬼子的黄皮鞋脱了，让他们围着大家一圈一圈地走，还叫鬼子讲话。有个鬼子哇啦哇啦地讲了一阵，大家也听不懂。后来，徐矮子让他们把皮鞋穿上，还给他们饭吃。吃过晚饭，新四军就带着这三个鬼子走了。

龙泉寺那里有大龙头和小龙头。在小龙头上站岗放哨，四面八方都能看到。皖南事变后，有一天，80多个新四军在寺里开会，有徐矮子，还有一个部长。那个部长下巴往上翘的。徐矮子对我说：“小鬼，你跟我们跑吧。”我倒是愿意的，可我的师父（修蝉）不同意，我伯父也不同意，我就不走了。后来，在小龙头站岗的哨兵发现龙泉寺被包围了，进屋来报告。那个部长说：“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开枪！”那时候，他们带的全是短枪，盒子枪，没有长枪。部长问师父：“哪儿有突破口？”师父说：“庙后有片竹园，那里有条沟，一直通到半边山。到了半边山，你们就可以跑掉了。”后来，这80多个新四军一枪没放，全跑掉了。新四军走了一会，鬼子开枪了，步枪、机枪都对准了庙里打。打了一会，没有人还枪，他们就咚咚咚地敲门。师父叫我去开门，我一开门，几支电灯（手电）都照着我，他们一上来就打我的嘴巴，我就跑了，跑到小老二、小老三他们睡的铺跟前。二鬼子问：“这小和尚是谁？”小老二说：“他是我儿子。”我也喊小老二的老婆，喊了一声“妈”。

鬼子进了寺庙就把师父和李金发吊了起来，用敲钟的木槌子海（敲）他们。后来海得不行了，李金发就招了，说：“刚才新四军是来过的，他们跑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这时候，新四军要是不开枪，也就没事了。可

新四军的人到了半边山就开枪了。鬼子把师父放下来,要他带路,找新四军。师父已经打得不行了,不能走路了,鬼子一枪就把他打死了。李金发没有打死,解放后,他搬到了我们村,有很多后代。那三间楼房(用手指给我们看)全是他的后代盖的。

和尚死了,我就不在龙泉寺了,回到孙家边,给人家放牛。那时候,我15岁。后来,新四军在白天回到了龙泉寺,把和尚埋了。他们用竹片编了一条席子,把和尚裹起来,在寺庙附近的小山坡上埋了。埋的时候,他们一人撒一把土,埋完了没有立碑。解放后,政府也没去立碑,现在那个坟还不知道在不在呢。

中央军里也有好样的。跑反刚开始时,我们村上住了许多中央军,有穿灰衣服的,也有穿黄衣服的,有的讲四川话,有的讲广东话,有的守纪律,有的不怎么守纪律。他们叫我们赶快跑。临走了,他们就拉夫,给他们挑担,说挑到南京就放回来。我们这里的山上到处是碉堡,要是组织得好,部队留在山上打游击,鬼子肯定吃不消。有个中央军的排长,他知道自己走不掉了,就问老百姓借了一副挑土的箩担。他知道鬼子从这里进南京城肯定要经过千儿山,就把山上一个碉堡的门用土堵死了,他一个人带着一挺机枪躲在里面。后来,鬼子果然从千儿山脚下过来了。他用机枪突然袭击,打死了上百个鬼子。鬼子哇哇乱叫。后来,子弹打完了,鬼子绕到碉堡后头,用手榴弹把他炸死了。

在茅屋(旧村名)那里,也打了一仗。鬼子过来时,天上放了一个球,黑不黑白不白的,蛮高的。茅屋那一仗死的人真不少,中央军和鬼子都死了不少。鬼子的尸体火化了,大骨头一块一块的,现在还有。中央军的尸体没人埋。那时候我跑去看过的,到处是死人。村上有人去摸枪,有的去卖,有的拿了枪当土匪。我们村的伪保长孙有绍摸到了几十支,收了不少徒弟,专门给鬼子办事。解放后把他抓住了,判了15年徒刑,后来,他一直没回来。他老婆带了一个淮安过来的儿子,前些日子才死的。

茅屋那里有一个很完整的碉堡,新修的水库没有把它淹掉。我们村北面,在医疗站后头的小山坡上有一个,被人敲掉了,卖铁筋,你们可以去找那个姓孙的带路,到那里去看看,他就住在医疗站那里。

有四五个鬼子在村上强奸一个妇女。

我老伴的姐夫的妹妹叫小云,也被鬼子强奸了。那是在龙泉寺里,有1000多个难民住着。那天只来了一个鬼子,没有带枪,要找花姑娘。小云她脸上涂了锅灰,还是给认出来了。鬼子抱了她就睡觉,不从就打。千把个人,没有一个起来反抗,满山地逃。

我们村王天贵的师娘,是理发的,她丈夫叫小五子,一起从南京来逃难的。十来个鬼子抓住了她,差一点把她搞死了。这些鬼子把枪丢在院子里,没人管。要是有人捡起一支,肯定能把鬼子打死了。后来,我们村上的几个妇女用热水把她抹干净了,她才慢慢醒过来。后来,夫妻俩都回南京去了。王天贵也死了,他没有子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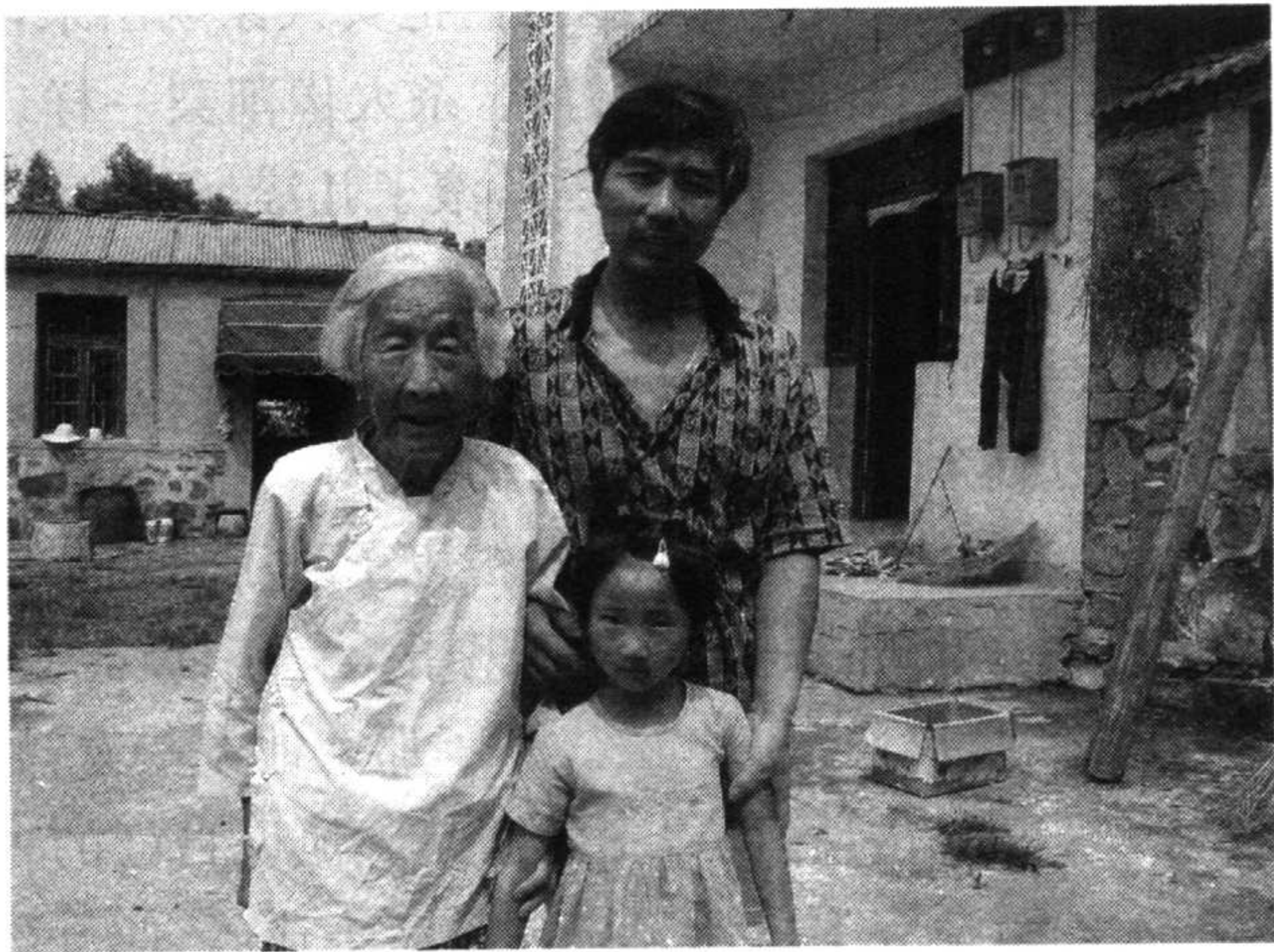
123. 刘素珍口述

刘素珍,女,1920年3月7日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龙尚庞家边24号

调查时间:2004年7月8日

调查人:费仲兴



刘素珍(左)

我今年85岁,属猴的,鬼子打来那年18岁。丈夫在公家粮食行里做事,我们都住在城里,在秦淮河边上的钓鱼巷,后门出去就是秦淮河。

日本飞机轰炸南京，一拉警报就没处躲了。飞机放炸弹，秦淮河的水溅得老高，吓人哩。他们炸过好多次，八月十五那天就炸过一次。我丈夫在公家做事，没有跑，我要躲飞机，就回到乡下来了。我娘家就在庞家边，丈夫是招过来的。

鬼子打过来之前，中央军在我们庞家边住过，都穿黄衣服，也有人穿老百姓的衣服。我们在村后的山坡上挖地洞，家家都挖。中央军在母家山同日本人打了一仗，中央军死了不少人，日本人也死了不少。我们躲在地洞里听到大炮轰啊轰的，没出来。

跑反时，句容黄梅桥的人跑到庞家边来了，我们家就住了好多人，搭个地铺就睡下了。冬月初七早上，村里有人喊：“目标来了！目标来了！”我跑出去一看，是升在天上的，像亮月疤疤（日军的飞艇），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后来，鬼子就过来了，像蚂蚁一样，多得不得了，都是大胡子兵。他们一来就点火烧房子，村上的房子一条龙地全烧掉了。本村人和外地来的人全跑了。外地来的人不熟悉路，跑得慢一点，有的就被鬼子抓到了。妇女跑得慢，也被抓了一些。

那天来了好几批鬼子，第一批鬼子一进村就放火，抓人杀人。他们只杀男人家，不杀女人家。我亲眼看到他们把女人家剔出来，站在一边，男人家剔出来站在另一边，然后就用刀砍，杀人像削梨一样。有的人头掉下来滚得老远。有一个人，头砍下来了，滚了几滚，眼睛还在一眨一眨的，看了特别害怕。

这次一起被杀死的有13个，都是黄梅桥来的年轻力壮的男人，就在村西头一点点，旁边有个长塘的地方。有个女的，她男人是在上海做皮箱的，夫妻俩一起跑到庞家边来的。男的被鬼子杀了，气管没断，一时没死。女的躲在地洞里，不知丈夫死活。等鬼子杀完了，就想去看看，可一个人又不敢去，就求我，拉着我一起去。到了那个地方一看，她男人头连着一半，还能嗯啊嗯啊地讲话，说得不大清楚。他说自己的一只鞋被鬼子踩下来了，叫女的帮他穿上。他又说自己活不成了，叫女的快走。那时候我们都吓呆了，反而什么都不害怕了。还有一个人，看到鬼子杀人就跳到长塘里，鬼子一枪把他打死了，那塘里的水都染红了。后来，我们村的人把这13个人埋在村东头的一个小塘里。安民后，黄梅桥来人把

他们都收回去了。

有个黄梅桥的女的，丈夫被鬼子杀死了，她小男孩才3岁，她就把他甩在村西头的尼姑塘里淹死了。她甩了两次，甩的时候，小男孩还喊：“妈妈，你不要甩我，我会走的。”她说：“你爸爸死了，你跟着我也养不活。”村上人都听到了。她一甩，小男孩自己爬上了岸。第二次又一甩，小男孩就淹死了。这个不能怪日本人，要怪这个女的。

第一批鬼子杀完人就走了。第二批来了三个骑马的鬼子，拿着地图，问谁能带路。我父亲是识字的，看得懂地图，就过去了。鬼子问了三个地方，问哪儿是乌龟山，哪儿是团子山，我父亲把他们带到山脚下就回来了。后来又来了一批鬼子。我们村有个女的，是南京城里人，穿着一件十斤重的皮袍。一个鬼子把她的皮袍脱下来，穿在自己身上，在院子里扭来扭去地走，叫别人站在边上看，还要你笑，不笑就用刺刀对着你，一戳一戳的，但不戳到你身上。那个时候，谁还能笑得起来呢？扭了一会，他又要去割她的两只奶。我那时不知怎么的胆子大起来了，把她的衣服拿着，给她穿，护着她。这个鬼子闹了一会也就走了。

鬼子一批批地过，东也杀人，西也杀人。下边的（指地势较低的地方）前街村，赵老三一家杀死了六个，儿子、女婿一起杀了。我们看看在村上躲不住了，过了两天就跑到了栖霞的难民区。当时，我父亲打听到栖霞有个难民区，就带着村上几十号人全去了。他还问德国人要了一面旗子，有这么长（用手比划，1米多长），上面有一个德国图章。有人说，有了这面旗子，日本人就不会来杀人了。父亲扛了旗子，连夜赶回庞家边，把附近村上的老百姓一手带了过去。这个难民区同栖霞寺紧靠着，庙里住得满满的。难民区外面又搭了许多小棚子，都睡满了人。在栖霞那里，下了一场大雪，我们吃庙里和尚放的难民粥，一直住到安民后才回来。

跑反时，我们庞家边的人没有被鬼子杀死。后来听说孟北许巷那里有许多人被鬼子杀死了。孟家场、涧南、神家庄也有许多人被杀了。

124. 欧阳纯烨口述

欧阳纯烨，男，1915年3月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龙尚北尚庄

调查时间：2004 年 7 月 8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90 岁，家在北尚庄，一进村就是我们欧阳家。我有三个儿子，现在都在汤山。现在，我住在小儿子家，隔几天就要去老大家。他们一家养一个月。

鬼子在北尚庄没杀人。头一批到北尚庄的鬼子是十字徽，医生，没杀人。那帮杀人的鬼子是打仗的。鬼子在孙家边杀了不少人，有 20 多个。在庞家边杀的人不多。鬼子可坏了，晚上也来找花姑娘，找不到就到处烧房子。北尚庄被烧掉的房子有十来间，我家房子没烧。

我们山上有国民党造的炮台，一个在千儿山，一个在五条岭。中央军和日本人打了三四天，中央军在炮台里开枪，打死了不少鬼子。鬼子打死后就烧掉了。后来，中央军不行了，子弹打完了，又没吃的，被鬼子包围了，死了不少。打仗时我们躲在山上树林里，只听到枪响。我们村靠山近，一出门就是山，山上柴多、树密，躲进去就看不到了。我们村出去跑反的人不多。

我姐夫叫祁茂生，当时四十来岁，家在淳化松岗庙。跑反时，他们跑到了北尚庄，后来带着两个儿子跑到栖霞，一个叫祁富贵，一个叫祁国良，才两三岁。我姐和两个小孩留在了栖霞，姐夫回到了北尚庄。后来，姐夫想到栖霞去接她们回来。我的家门侄子欧阳国俊谈了个对象，也在栖霞，他们两个一起去接的。走到金丝岗，他们被鬼子抓住了，带到汤山“大楼”，在那里被鬼子杀死了。我妈去找过好几次，都没找到。

茅屋那里打完了仗，有人去摸枪的。我们村没人去，胆小。王明芝是新四军，他没干到底，要是干到底，现在就是大官了。他是被二鬼子抓去害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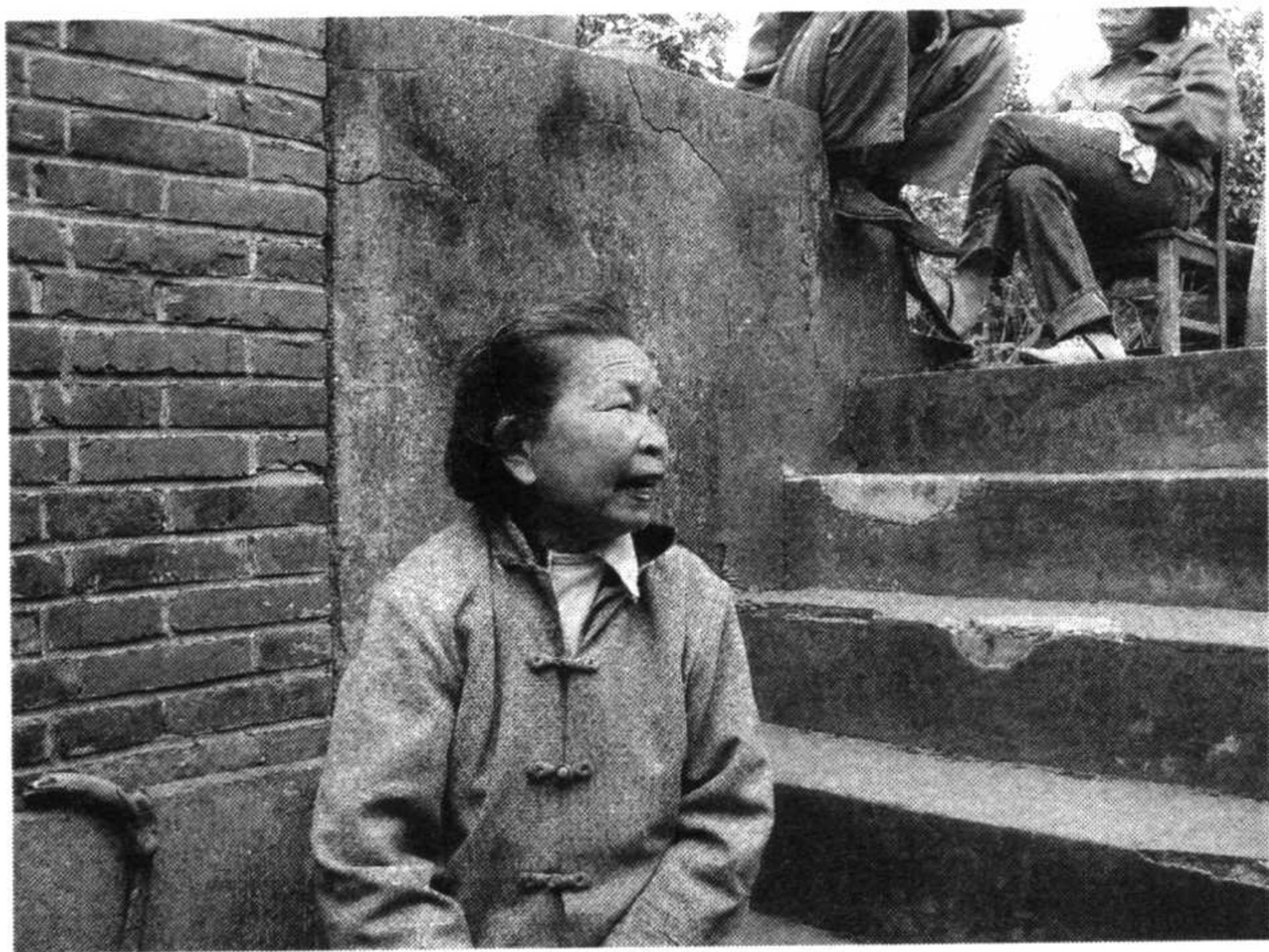
125. 陈玉金口述

陈玉金，女，1926 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龙尚涧南

调查时间：2004年9月28日

调查人：费仲兴



陈玉金

我今年79岁，属虎，跑反时12岁。娘家在龙泉前村街，婆家姓陈，在茅屋（村名）。因茅屋集体拆迁，现在住在涧南，以后要搬到汤山海泽沟去的。

我父亲叫赵德富，爷爷叫赵老三。爷爷从江北挑了一副箩担迁过来，在前村街落户，住在龙王庙山背后的一个小棚子里。那一条边有七八个小棚子，父亲当时是甲长。鬼子来的时候，父亲吓破了胆，害病，很厉害。我叔叔就给我奶奶说：“妈，你不要哭。哥哥死了，还有我呢。”奶奶就不哭了。我父亲在冬月里就死了，他不是被鬼子杀死的。

跑反前，我们一大家十八九个人吃饭呢。过年时，两张桌子拼起来才坐得下。我父母、两个叔叔、婶婶，还有一大群小孩，那时没分家。人家都说，赵老三家的人一出来就是一大群。

冬月里有一天，下着雪，我们家里架了一盆火，四五十号人围着烤火，男男女女的。我奶奶对我三叔说：“你们几个出去，不要老待在家里。”三叔说：“出去不就淋湿了吗？”他不肯走。吃过午饭，来了四个鬼子。有个鬼子擦根洋火，想烧房子，大家不让他烧，把火扑灭了。鬼子进

屋找姑娘,没找到。两个叔叔都是白面书生(指脸长得白),年纪又轻,手里都抱着小把戏(小孩)。鬼子叫他们把小把戏丢下来,喊他们六个人出去,他们就拍拍身上的灰,跟着出去了。一条狗汪汪地叫,我爷爷就去打狗。他们六个人出去半里路的样子,走到了田埂头,我们躲在墙根下看。鬼子不走了,他们六个也不走了。鬼子先开枪打死一个,一脚把他踢进田里。另外五个人就跪下来叩头。鬼子叫他们站起来,他们就站起来。鬼子一枪一个,把他们打死了。我叔叔是刺刀戳死的,还有一个家门爷爷,也被刺了一刀,没有伤到心,当时没有死,到夜里才死的。我叔叔脸上全是血,耳孔、鼻孔都流血。

这一次被鬼子杀死的有六个人:

二叔叔,赵德(荣),30多岁;

三叔叔,30来岁,在南京城里做面食,是烂面行(做面食、卖面食这一行)的;

一个舅爷,是我奶奶的兄弟,汤山东边大周家边人,他常来玩;

一个大爷,是我奶奶的大侄子,我喊他“舅舅”;

一个姑爷,是我奶奶的大女婿,叫陈友才;

平定才,是我奶奶年兄(同年兄弟)的儿子,前村街人,也是亲家。

我奶奶的娘家在汤山东面的大周家边,娘家人姓张。

六个男人被打死了,家里没有男的了。喊人家男的来抬,人家不愿意。后来到了晚上,找了扇门板,全是女人抬的,把他们抬到了山上,六个人一平排地睡(躺)在一个小坑里,盖上一点土,防止狗来拖。奶奶舍不得,还去一个个地摸摸,望望他们,看看有没有被狗拖走。

后来,庞家边的刘文才(亲戚)过来,对我奶奶说:“到栖霞水泥厂去吧。你们走得动的,就跟我走,走不动的,我也没有办法了。”我们在栖霞住了几天,住不下去了,又跑到江北老家。没吃的,就向老家的人借,可他们不肯借。奶奶就跑过去吵,对他们说:“我家里不是没得吃的,稻谷多呢,搬不过来。”在那里待了几几天,要饭吃,那里土匪又多,睡不下。平定下来后(安民后),我们就回来了。那时候,有病没人瞧,有田没人种,奶奶急得哭,就雇了人种田。解放后开大会诉苦,大家都说:“赵老三家的老妈妈一来,那就不是开会了,大家伙跟着她一起哭吧。”

126. 潘巧英口述

潘巧英,女,1931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龙尚神家庄150号

调查时间:2004年9月28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74岁,属羊的,跑反时7岁。娘家在神家庄,婆家也在神家庄。跑反时,家里有我爷爷(潘兆生,60来岁)、父亲(潘荣富)、母亲、我和一个妹妹(才3岁)。

我父亲在苏州做铜匠。跑反时,他回来很迟了。别的人家都走光了,我们还留在家里,到冬月初七才跑。我母亲在黄栗墅租人家的田种,我们从黄栗墅出来,经过侯家塘,再往南跑。

冬月初七那天,我们全家人,还有我娘娘(姑妈)、姑爷、老表(15岁),张长贵夫妻和一个儿子,张长灵一个等一共十五六个人,跑到了孟家场老洪四家里,老洪四家的人跑光了,屋里空荡荡的,我们就住在他家里。下午三点来钟,五个鬼子从7317(国民党的步校)那边马路上下来,我爷爷正在上厕所,鬼子给他一刀,刺死了。我看到了,马上跑回屋里喊,十七八个人抢着上楼。母亲抱着妹妹,搀着我上楼。因为人多,我被挤下来了,一个人在楼下。楼梯被抽掉了,我没办法,就躲在灶膛边。还有一个孟家场的老奶奶(孟文锦的母亲),身上挨了一刀,也和我一起躲在灶膛边。

我父亲当时吓昏了,从楼上跳下来,想跑,没跑掉。鬼子过来就朝他刺了一刀,从腋下刺进去,把他刺死了。我姑妈的儿子吉冬联,刚从外面玩了一会,回到屋里,在屋门口就被鬼子一刀刺死了,当时才15岁。

我和孟家场的那个老奶奶躲在灶膛边,有一捆柴挡着,鬼子没看到。但那个老奶奶血淌得多了,到晚上就死掉了。

晚上,我们从孟家场出来,八九点钟的样子跑到了汤山头。小妹妹会哭,大家都怕鬼子听到,就把她摔在水塘里呛死了。这一天,我爷爷、我父亲和我妹妹,三个人都死了。没有人挑被窝,也没有人挑米了,我们就跟了姑爷、姑妈跑,路上跟人家要点东西吃。第二天跑到雪浪庵。在

里面躲了几夭,又往回跑,跑到黄栗墅,躲在汤山半山腰的盐鸭子洞里。那个洞有两三间房子那么大,一人多高,地上高高低低的,洞里盐鸭子(蝙蝠)飞来飞去。我们在地上铺点稻草,四五十个人,白天挤在洞里,天黑了回黄栗墅烧点东西吃吃。白天不敢烧,有烟,怕被鬼子看到。

我们在盐鸭子洞里躲了不少日子。安民后就回到黄栗墅种田。我妈找了个神家庄姓孟的人,改嫁了。盐鸭子洞的洞口有个小窝,像个小院子,站在那里能看到公路。听人说,以前盐鸭子洞里有狼。这几年开山采石,牛牛洞炸掉了。盐鸭子洞没炸掉,但洞里的石头松动了,人不敢进去。

鬼子在我们家里留了个手榴弹。我那时不懂事,拿着它玩,但没有敲它。后来,大人看到了,就把它摔到水塘里了。要是拿它敲东西,我这条命就没有了。

127. 郝明亮口述

郝明亮,男,1921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敬老院(原住汤山镇龙尚神家庄)

调查时间:2004年12月19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4岁,属鸡,跑反时17岁。我走得早,伯父带我从龙潭三江口坐船过江,到仪征。后来过了个把月就封江了,日本人到了,不让过江了。记得我们过江时,东流那边也去了许多人,有四五十个呢。仪征那里当时没有鬼子,但是土匪很多,也不安全。国民党军队逃跑时丢下的破枪很多,有人拣到了枪就当土匪。1938年安民后,我们从仪征回到了神家庄,后来我又到南京跟师傅学手艺,做红白案,也做过包子。后来在四条巷那里给日本人做饭,烧了四五年。

跑反时,我父母亲、姐姐、妹妹跑到了栖霞寺难民区,寺里有和尚。难民区是丹麦人、德国人搞的,日本人不敢进去,老百姓比较保险。

神家庄有许多房子被日本人烧掉了。我家隔壁起了火,我家的房子也烧着了,只剩下一间瓦房没烧掉,别的都烧光了。

听我母亲讲,神家庄的郝尚春(我的一个家门伯父),在鬼子刚来的时候拿了一支打猎的土枪去打鬼子,结果,鬼子没打着,他自己却被鬼子开枪打死了。这个人在村上是很出名的,他很有劲,胆子也大,但头脑笨。用土枪对付日本人,那怎么行呢?

我回到神家庄两个来月后,大约是七八月里,身上脏了,大家没事就想去洗澡。村上几个人一喊,就都想去汤山头洗澡了。那里有家槽坊,有热水,洗澡不要钱的。我们好几个人一起走的。有几个人走得晚,在后面看到涧南那里过来一排日本兵,他们就往汤山头的山上跑,想躲到山上去。我们走得早一点的已经在澡堂里洗上了,听见叭叭叭的枪声,知道不好了,肯定要打死人了。后来,鬼子也到汤山头了,还走进澡堂看了看,对我们说:“你们洗澡的,大大的!”说完就走了。

那天在汤山头被鬼子打死的有三个人:

成德全,小名“羊子”,属羊的,比我大2岁,是独生子。他家就住在我屋后头,个头比我高一点,一米六七左右,力气很大,不识字。他母亲在跑反前就去世了。当时,他没有成家,但已经谈好了,只是还没有结婚。他的家境还蛮好的。这一死,就灭门了。他父亲哭死了,伤心到了极点。我同羊子是很熟的,经常在一起玩。

孙明昌,神家庄人,30来岁。

还有一个人姓周,汤山头村上的,30来岁。

羊子他们被打死后,我们就回家告诉他们家里的人,他们的尸体当时就抬回去埋了。后来,我觉得村上不太平,又到栖霞,在我姐夫家住了个把月。

神家庄有一条街,村上做买卖的多,开店的多,历来比涧南富裕一点。前村街村子很大,但没有神家庄富裕。这个村在长毛跑反时被烧过一次,许多房子都烧掉了。

安民后,我在家时还看到许多水塘里浮着好几个死人,有大人,也有小孩,都腐烂了。塘里的水再也没有人敢喝了,那么怪异的,看了都恶心。

神家庄过去一点的茶场那里有一个隐静寺,三间两进,还有下房。涧南的地藏庵是一间五进,比隐静寺小多了。地藏庵是南京水林庵分来

的,尼姑住的,平时就一个看庙的人住着。龙泉寺的范围就大得多了,寺产也多,“里一千,外八百”,南面一直到插花、孟墓一带,都有它的田地,每年收租能收许多。庙里和尚不多,却非常有钱。我在神家庄时,只知道寺里有一个和尚叫“思光”。

我上到小学毕业,解放时没分到田。家里有七八亩田,五张山,每年扎柴能扎一二百担呢,家庭经济是比较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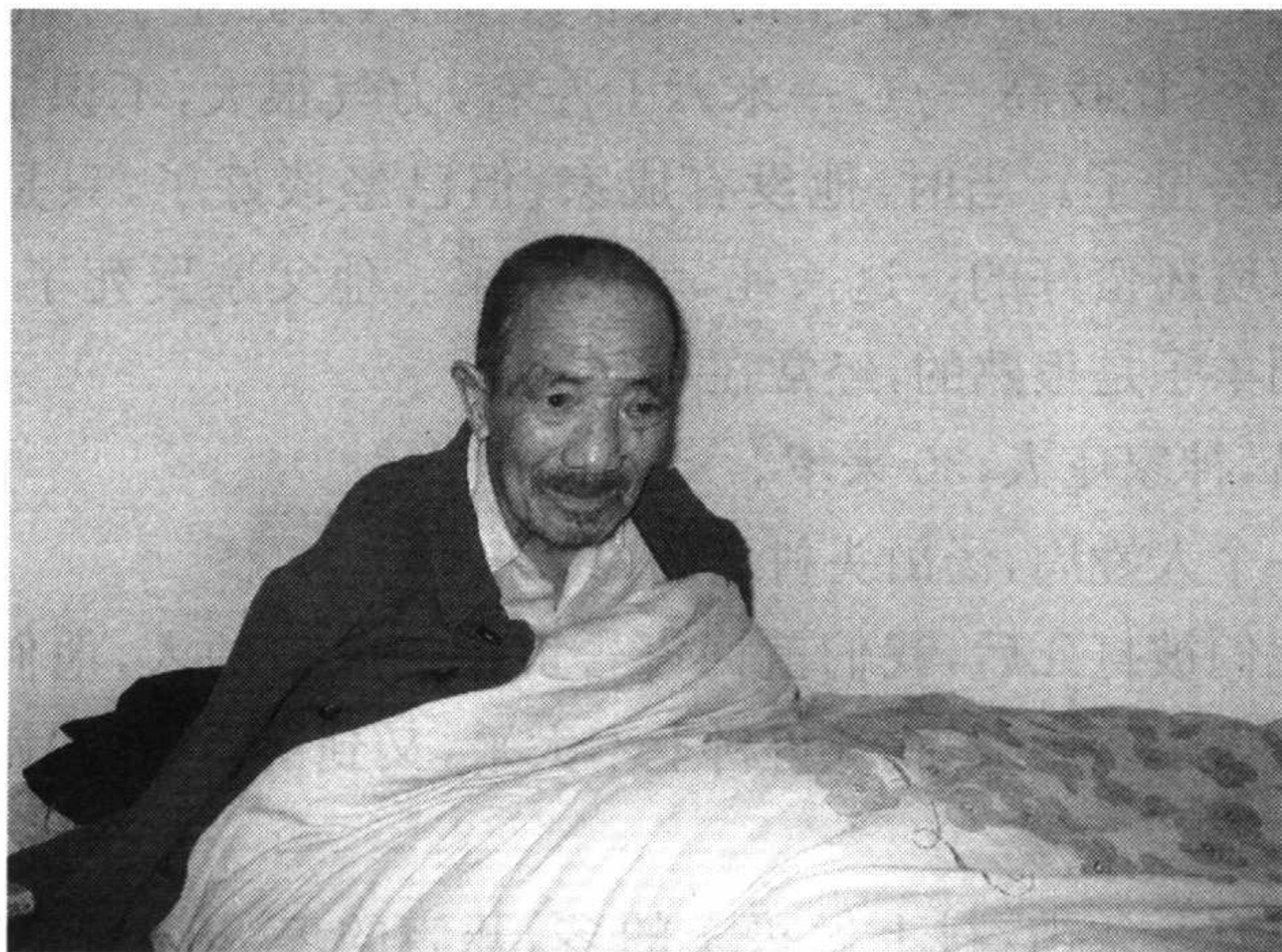
128. 陈远银口述

陈远银,男,1923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海泽路安置小区(原住汤山镇龙尚茅屋)

调查时间:2005年6月6—7日

调查人:费仲兴



陈远银

我今年83岁,属猪,鬼子打来那年15岁。那时候,我们茅屋没多少人,就七八户,姓耳东陈的三家,姓跷脚成的三家,还有姓庞的和姓黄的。姓黄的是山东过来的,我爷也是从安庆丁林镇招过来的,年轻人都不知道了。村上人主要靠种田和扎柴过日子,扎下来的柴挑到窑上,卖给他们烧石灰,生活马马虎虎。买东西跑到神家庄街上。村上有学校,旧社会上头发下来的老师。先上私学,当地先生教。鬼子一来,大家都不敢

种田了。后来平定了，有田的人家还是种田。

鬼子打过来之前，国民党反动派在山上修工事，搞炮，打靶，许多东西都是他们自己用马拉上去的，没有叫村上人去干，也不吃你的，不喝你的。后来，广东兵开过来了，有的穿黄衣服，有的不穿，有的人连鞋子都没有。年纪大的人都说：“这支军队作孽哪！”

鬼子打来的时候，我们跑到了后面的山上，躲在团山头上，有些侂子就躲在山凹子里。那天一早，太阳上了山头，有爬杆那么高，鬼子的目标（指飞艇）就从龙潭那边过来了，在天上飞，乌黑的，仗打到哪里就飞到哪里。鬼子有白旗子，上面有红亮月疤疤，摇摇旗，朝广东兵打，广东兵一个也没有跑掉，在千儿山炮台打，广东兵死了一片，作孽哪！

广东兵是晚上开过来的，一点动静都没有。到村上买东西都是付钱的，对老百姓蛮客气的。他们的话听不懂，只知道一句：“敌人一来就要刺啦刺啦的！”他们到我们村上来买鸡，鸡还没吃完，第二天鬼子就来了。

在五条岭山上一打，广东兵就跑了。千儿山炮台那边，两下（指交战双方）打得厉害，机关枪嗒嗒嗒，中央军退了，千儿山的人没走掉，把守在口子上，炮台的门开了。死的中央军多了。千儿山炮台在北尚庄的西头，从山凹子上去，五组那里，东边一点。千儿山炮台已经炸掉了，还有点痕迹。（村民奚传保插话：“我上小学的时候还在山上看到不少骷髅头，都是当年的死人。大人说不能跑，你跑，骷髅头就跟着你。”）中央军的死尸，狼拖去了，咬了，啃了吃。

茅屋古塘堰山头上的“茶杯”、“酒杯”（指两块有凹坑的大石头）就在路边上，中央军死的人啊，不止20个，80个也不止。有个中央军，一枪从屁股进去，又从后脑壳出来。一条凹的山洞窑，九堰上头有个大塘塘，中央军也死了不少。“茶杯”、“酒杯”那里死的全是广东兵。鸡还没吃完，他们就打死了。鬼子也死了不少，他们都拖去烧了。

我们躲在团山头上，鬼子上团山头，机关枪打得嘟嘟嘟，我们就跑。鬼子的飞机在头顶上撒传单，上面有字的，叫人带路到机关单位去，有人认得的。我们拈了传单也不敢装在身上，丢了。鬼子晚上不出来，放火烧村上的房子，火光连天。后来我们就跑到山里躲起来，过了几天又跑到北窑，在贾家村（属上峰），住在山上，躲在小棚子里。北窑躲了许多

人,有北尚庄的。后来又往回跑。庞家边的刘文才被鬼子拖了去,同鬼子混熟了。他是回子(回族),识字的。鬼子给他讲什么,都用笔写给他看。后来,他到了栖霞难民区,回来说那里安全,我听人讲的。我们就跑到栖霞区的大庙里,那老和尚有70多岁了,庙里还有不少学生。

难民区也挤得很,人多得不得了,鬼子一天到晚到庙里去,也不太平。美国人的小包车一来就是三四个人,眉毛黄黄的,站着望一望,小鬼子就站在旁边不动了。美国人望一下就走了,也不太灵。后来我们跑回家了。

鬼子刚进村那天在我们村上打死了三个人。一个是“苏州佬”,从苏州嫁过来的,四五十岁,是成庆生的奶奶,小脚,跑不动路的。鬼子一来就在“弯田”那里开枪,把她打死了。另一个是孙振银的父亲,叫“小老二”,是庞光坤的姐夫,60来岁,从兴隆村来给庞胖子看门的。鬼子来了,把他一枪打死在靠山的“一亩七”田里。再有一个是黄老二,60多岁,在一面场上草堆旁边被刺死的。草堆被他们烧掉了,鬼子又在他嘴里塞了一支香烟。过了天把天,这几个人的尸体拉到了山上,各家葬各家的山上。

在西冲堰附近的小山脚下,鬼子打死了两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都是外地来跑反的,不晓得是哪个村的。还有个女的,40来岁,在西冲堰的山头上被鬼子打死了。

在野山沟,就是我们村后头,西冲堰翻过去一个小岗岗,鬼子一下子就打死了十三四个老百姓,全是20来岁的小伙子。他们是麒麟镇西林耀村上的。跑反刚开始时,他们把拖石灰的骡子全拉出来了。过了十天八天,他们还在外面躲着,那些骡子拴在山上树林里,他们就躲在那里看骡子。有个鬼子喝醉了酒,摸到山凹子里,同一个佬奶奶睡觉。后来,这个鬼子看到有格些(这么多)老百姓在一起,又有格些骡子,以为他们是中央军,就叫他们排成一排,一枪一枪地打。有个人滑头一点,一头栽倒在水沟里,顺沟跑了两丈远,躲在水塘里,头歪在草边,只露出一点点,鬼子没找到他,就没有打死。这个人跑回去一讲,女人们就全哭了。我没有跑去看,是听这个人讲的。他叫什么名字也不晓得。后来挖了个大塘塘,把他们一起拖去埋了。平定下来之后,又挖出来,拉回去,也分不清

哪家哪家的了。那一次杀这么多人,只去了一个鬼子。那个侉奶奶没有打死。

跑反开始后两三天,听到狗叫,有鬼子来了。我们村上有个女的,叫陈睦金,五十来岁,拖了三个老头顺山跑。跑到大山里(指龙泉寺后面的大山),钻到柴堆里。鬼子冲上山,把她的衣服脱得光光的,还给她喝烧心酒,浇了她一身,但没有强奸她,就是捉弄她玩。这个女的后来活到九十来岁才去世的。

千儿山炮台后来被炸掉了,好几个炮台都炸掉了。在水库边上有一个碉堡叫指挥所,现在还在,没有炸掉。

鬼子身强力壮,有精神,跑得又快,来劲得很,老百姓见了都害怕。日本人一来,就打你两个老混(指出手很重的巴掌),打得你害怕了。

我两只眼睛一点亮光都看不见了,只能摸。年轻时近视,没有去瞧医生,种田也不碍事。六十来岁,还能看得见东西。后来越来越不行了,白内障,没动手术。要是能看得见一点点,我也可以到外面去走走的。

129. 张礼海口述

张礼海,男,1925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黄栗墅32号

调查时间:2003年8月14日、2005年7月13日

调查人:费仲兴

黄栗墅东面有条分水岗。它南边的一段叫艾山,艾山往南便是卧牛山。1931年,于右任看中了这里的风景,在艾山建了栋别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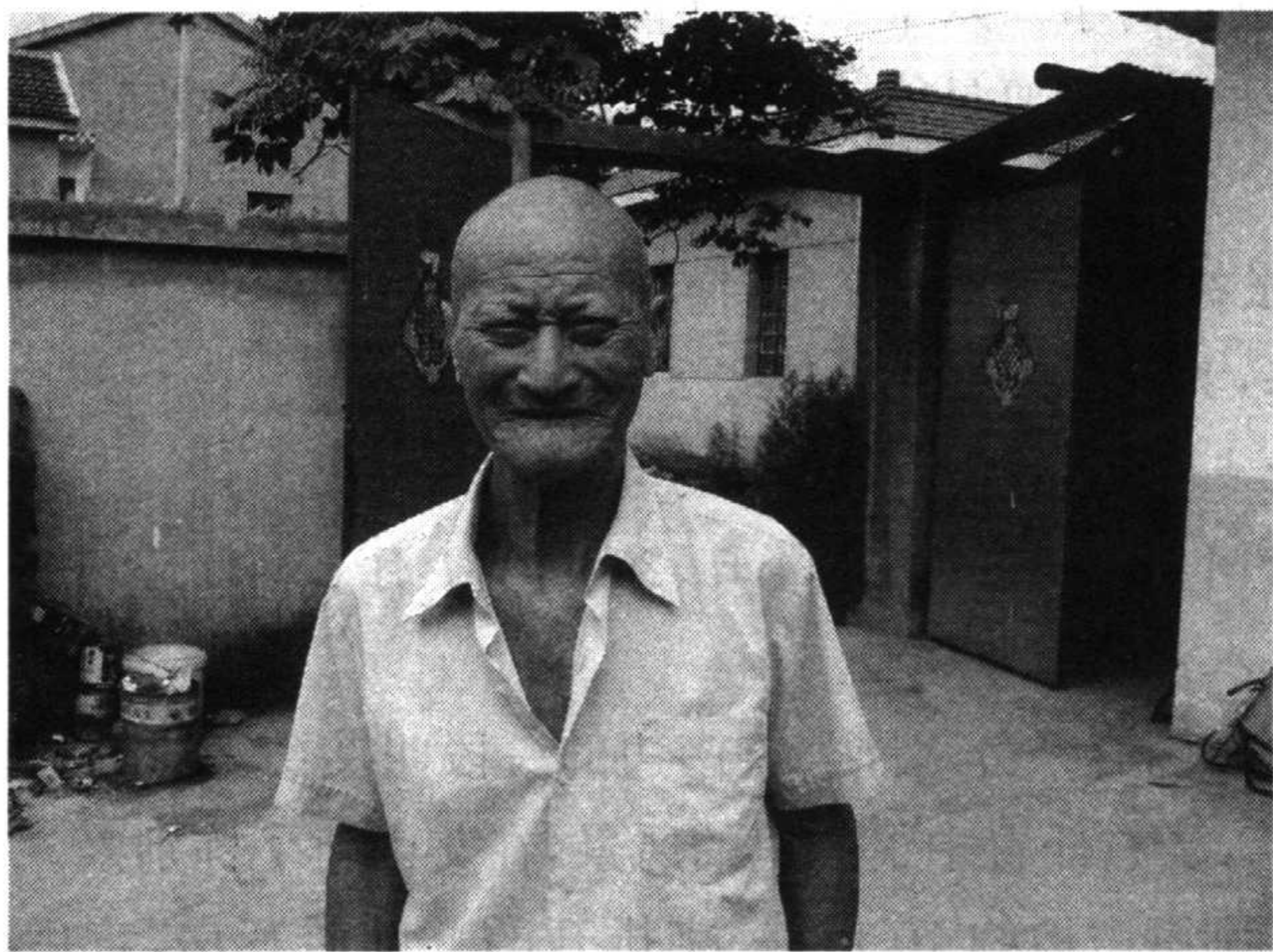
于右任别墅占地约10亩,一字排开的5间砖瓦房,背后有茅亭,东西两侧有厢房,四周有竹篱笆。正门朝北,上方有匾,上面写“于右任”三个字。后门外有防空洞,洞口不大,长方形。沿着21级台阶进洞,左右拐弯,有新洞、老洞各一个,高约4米。老洞是砖砌的,抹了水泥。每个洞都有两个房间大小,洞内夏天阴凉潮湿,冬天干燥。老洞内有麻将桌,他们点了煤油灯打麻将的。

我今年79岁。父亲叫张义兴,替于右任看管别墅18年。我从小就跟了父母住在别墅东头的草房里,经常出入别墅。

于右任每次到别墅，一下车就往山上跑。有松枝挡路，他总是弯着腰从树下钻过去，舍不得用手拨动树枝。见小孩打松果、折树枝，他就说：“树也是有生命的，别伤害它们。”他买下了艾山附近 100 来亩山地，又在别墅正门外东北方为自己选定了墓址，准备百年后安息的。

于右任每次到别墅，一般每天只写两个字，不肯多写。他送给我家两个字，还送了一副对联，每边七个字，都是一笔写下的，我们不认识。后来，我们把这些字藏在我家屋顶瓦片下的旺柴里，“文化大革命”时拿出来烧掉了。

1937 年冬月初六（即 12 月 8 日），鬼子占领了汤山。老百姓有的藏在树林里，有的伏在山脚下草丛里，有的跑到孟家场一带，有 18 个人躲在于右任别墅的防空洞里，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年纪最大的 60 来岁，最小的出生才 3 个月。



张礼海

初六那天下午 3 点来钟，太阳西斜了，七个日本兵从汤山山顶的炮台下山，在卧牛山轮奸了一名 16 岁的少女，然后用松枝插进下身折磨致死。这名少女是张肖庄人，大家都喊她“大丫头”。

这时候，我们蹲在地洞里。我大哥的丈人秦红宝烟瘾来了，跑到洞外抽烟。没抽上几口，就被鬼子发现了。他赶紧钻进洞里，盖上木盖。七个鬼子冲了过来，揭开木盖。他们擦了几根火柴，往洞里照了照，说了

一会,不敢进洞。一个鬼子喊:“你们都出来吧,我带你们逃难去!”好几个人低声骂秦红宝,说:“都是你抽鸦片(抽烟)惹的祸,你先出去!”侯国义说:“你们还吵什么呢?日本人已经看到了,我们一个也跑不掉的。”说着,他第一个爬出了洞口。我当时才 13 岁,跟在侯国义后面,第二个爬出了洞口。

鬼子守在洞口,上来一个就搜一个。他们搜我大哥,没发现什么,就喊:“你的开路!”可他没有走,靠在一棵松树上看着。鬼子接着再搜,搜了几个人,都没有发现什么,后来就搜侯国义。侯国义当时 30 岁左右,参加过壮丁训练队。他口袋里有一张三角形的符号被鬼子搜出来了,知道坏事了,连忙跪下磕头作揖。两个鬼子在他左右站着,几乎同时向他举枪射击,他一下就断气了。他老婆一看,吓得大哭。她胸前抱一个小孩,背上还背一个。鬼子掉转枪口,对准她又是一枪,把抱的和背的小孩都打死了。这颗子弹从她腋下穿过,她晃了一下就倒在地上了。另外几个鬼子端着刺刀,吆喝着,不让人跑。我们哪见过这种场面,一个个都吓坏了,谁也不敢跑。鬼子开始用刺刀一个一个地刺。刺到第七个人的时候,我撒腿就跑,往别墅院里冲。鬼子没追,也没向我开枪。我跑出别墅大门,就转身往卧牛山上跑,去找我妈。天黑后,我们赶到防空洞一看,十来个人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洞口附近的血东一摊西一摊。别墅内的家具统统搬到外面烧掉了,但别墅没有烧。

那天,日本鬼子总共只打了三枪,其余都是用刺刀刺。被杀害的村民有以下 15 位:

我的童养媳孙氏,13 岁,和我同年,娘家在法汛村。

张礼江(我大哥),26 岁,结婚才两个月。

秦红宝,汤山街上人,死时约 60 岁。

侯国义和他的两个幼女。

蔡富耀夫妻俩和他们出生才三个月的女儿,一家灭门。蔡富耀当时约 28 岁,妻子是童养媳,姓名不知道。

蔡富荣(蔡富耀的哥哥),约 40 岁。

李恩寿夫妻俩,被杀绝门。李恩寿当时约 26 岁。

张义林和他 16 岁的女儿。女儿当场被刺死,张义林被刺一刀,当时

未死。他爬回村里,躲在草堆中。后来,日军进村放火,他被烧死。死时约 50 岁。

汪小喜,13 岁,在洞口被刺了一刀,没死,跑回村里找他妈。不料在村里又遇见了鬼子,被打。他又跑回防空洞,后因流血过多,死在洞里了。

除以上 15 人外,还有 2 人的情况是这样的:

侯国义的妻子,汤山青林沿城人,村上人都喊她“沿城佬”。她被子弹击中,流了许多血,但没有伤到要害,后来被小叔子背回村里。伤口治愈后,她改嫁到涧南村,在那里又生了个儿子,绰号“花子”。

李国俭(李恩寿的父亲),右肋被刺一刀,没死。回村后治伤,活了三四年才去世的,去世时约 50 岁。

跑反期间,我们黄栗墅还有以下 11 位村民在别处被鬼子杀害:有个外号叫“大龙”的小伙子和他的父亲(从外地来黄栗墅落户不久,姓赵)、侯玉友的母亲、“侯山秃”的儿子(12 岁)、“李大愣”的妻子,这五人在孟家场被杀害。“李大愣”的儿子(10 岁)在汤山西边的山头上被拉电线的鬼子一枪打死。张元鑫(40 来岁)跑反期间回家取粮,在黄栗墅被鬼子发现后一枪打死。家住黄栗墅后山凹的姓胡的双胞胎(20 岁左右,未成家)和姓陈的“陈糊套”(刚成家),这三人在坟头被鬼子开枪打死。李国俭的母亲在黄栗墅村西的场上被鬼子开枪打死。

跑反期间,黄栗墅还有四个小孩被他们的父母弄死了:“大龙”的女儿(2 岁)在孟家场回黄栗墅的路上哭,她妈怕被鬼子发现,就把她扔在水塘里淹死了。侯二福的女儿(两三岁)躲在刺山的一个小山洞里哭,她妈怕被鬼子发现,就把她捂死了。老胡家的小男孩(一两岁)躲在汤山的仙人洞里哭,洞里有许多人,都叫她们出去,她妈就把她捂死了,尸体埋在山上,后来被狼拖去吃掉了。侯福根的一个小丫头也是因为哭而被大人摔在水塘里淹死了。

跑反过后,鬼子还是常来黄栗墅,他们抢鸡、抢鸭、抢兔子,能吃的都要抢。鬼子兵还抢花姑娘,抢到了就拎到山上强奸。

日本投降后,于右任回到汤山。他看到自己的别墅虽没烧掉,但里面东西却全毁坏了,气愤地说:“不修了!”解放后,于右任别墅还在。过

了几年,汤山供销社要木料,就把别墅拆了。

(2005年7月13日补充) 于右任并没有留下字条说我们兄弟可以免抽壮丁。我二哥张礼和就是当兵的嘛。他在昆山同日本人打仗,打败了就逃回来,后来一直在家种田。

我兄弟三个,我是老三。我大哥长得非常漂亮,他穿过一件新衣裳,两排纽扣,有13个,十分精神。26岁就被日本人杀了。我有一个姐姐,没成年就死了。我还有两个妹妹,现在老妹妹(小妹妹)还在,就住在汤山街上。

我们村上有的人姓侯,有的人姓候,多一竖,念法也不同。老人讲“侯候不分,枉做先生”。

卧牛山上原来有个炮台,孔山山顶上也有一个,都炸掉了。跑反时我看到过广东兵的,他们穿的是灰衣服,有的还穿个小棉袄。广东兵抽大烟的,我亲眼看到有的兵缩在田窝里吸白面,用一张锡纸,火柴点着了吸。

130. 成德珍口述

成德珍,女,1911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古泉侯家塘69号

调查时间:2004年8月30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94岁,娘家在神家庄。17岁嫁到侯家塘,生了三个儿子、四个女儿。大儿子叫侯维锦,今年74岁,属猴的。

鬼子到我们村上,一来就烧了二少爷家的三间瓦房,那是盖得很好的房子。在骨胶厂那里,也烧了四五间房子。我家的房子没有烧掉,我姑老太带了翻语从汤山过来救的。她要是不来,侯家塘的房子就一手烧掉了。

跑反那天,我老伴(侯明发,比她大1岁,属狗)在作厂挖战壕,没回来。我一个人挑了四个小把戏(一个儿子,三个女儿)逃到了润南地藏庵,还跟了一个老公公,一个大嫂。那时候我大儿子才6岁,他牵着一

牛,晚上走路还要关照关照他爷爷,喊:“这里一条沟,你慢慢走。”后来,我们又逃到了龙泉庵,我老伴从涧南翻山,到了龙泉庵,找到了我们。我们有四个小把戏的,他不放心。

我们在龙泉庵里躲了个把月。白天带了小把戏躲在山凹子里,打些柴,搭个棚子,用茅草盖上,晚上就回龙泉庵,一天吃两顿。没有大米就挖点青菜、山芋吃吃。我老公公、我大嫂,我们全家人都没有散。有一次,一个没有胡子的鬼子兵到山上来,见到我们,就问我:“他们是什么人?”我回答说:“太君,这是我老公公,这是我大嫂,这是我丈夫,这是我小把戏。”还有一次,我老伴在棚子门口抱着我们2岁的女儿,鬼子问他:“你媳妇呢?”他回答说:“她死掉了!”鬼子就走了。

打仗的时候,鬼子有目标(指飞艇)的。那是黑黑的、长长的,在天上飘。一看到目标,我们就不出来,全躲在草棚里。我们在山上躲了一个多月,身上的蚤子歹哩(多极了),我们在棚子里没事,就逮蚤子,那时候又没有水洗澡。

腊月二十八,我们全家回到了侯家塘。后来过年,就再也没有跑到别的地方去了。白天在附近山上躲躲,晚上就回家里住。

我们村在外头被打死的人多呢,年数多了,记不得。栖霞山有个难民区,村上去的人不少,我们有四个小把戏,去不了。

我们村侯民福的父亲在湖山被鬼子杀死了,民福的两个兄弟也被鬼子杀死了,一个叫申华,一个叫申富。张家银的父亲在我们村后被鬼子开枪打死了,洪爱月的奶奶和她家的一个呆子女人在自己家里被鬼子烧死了。

我胆子大,曾经给鬼子送过菜。菜送到大石碑后头的一个山洞里,那个洞蛮大的。还牵过一条牛,送到那里。还送过椅子,送到那里就回来了。

解放后,我家有9亩半田,还开小店做生意,有11个人要吃饭的。后来划为富农。

131. 苏世德口述

苏世德,男,1925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古泉侯家塘

调查时间：2004年8月29—30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0岁，属牛。解放前住在孟北上法汛，后来在侯家塘开店做生意，就在这里落户了。解放前读过四年私塾，认识不少字，现在眼睛不行了，不能看书看报了。

在桦墅和上法汛之间有一所独立的小学和一个庙（南宫庙），庙的东北有座山叫庙山。当时，中央军在庙山上，日本人在湖山上，连来带去的打了三天，中央军打不过，就撤了。

湖山的山顶上有一块月牙形的大石头，有两个大尖子的，日本人在两个大尖子上放了两个大气球，圆圆的，通红通红的，像火一样，晚上老远就能看到，像两个大灯笼。

打仗的头一天，鬼子进村（指上法汛）的人不多，三个两个的，没有动什么。后来进村的人也不多，但他们要抓花姑娘。我婆婆（指外婆）家的房子多，又很进深，是三进头的好房子，屋后还有大竹园。跑反之前，日本飞机轰炸南京，有个姓吴的人带了老婆孩子和媳妇到乡下来避难，就住在我婆婆家。跑反前，汤山刘岗头的三四十个难民也住在我婆婆家，搭地铺，住了好多天。我义父姓梅，是招到苏家门上来的，他长得很神气，又活泼，又聪明，我们在一起住，一起吃，都住在我婆婆家。打仗的第二天，来了四个鬼子，看到姓吴家的婆媳两人涂着胭脂搽了粉，就守在门口不走了。我义父一看，说：“不好了，快躲起来！”有的躲在草堆里，有的躲在竹园里，我们躲在一个洞里，洞的上头有盖板，铺了草皮，还插了几支松枝。这个洞离家不远，又靠山又靠水，有半个房间那么大。到了夜里九十点钟，那几个鬼子还守着大门没走，我义父就跑到竹园的围墙外，架了一张梯子，站在梯子上用大石块呼呼地砸后门，门都砸坏了。鬼子在明处，我老子在暗处，砸的声音很响，鬼子以为是炮弹，就走掉了。鬼子一走，姓吴的一家，刘岗头的难民，还有我们家的人连夜就跑了，到栖霞、江乘、漳桥，后来下圩，在万家埂住了三天。

鬼子是冬月初四到湖山的，我们是冬月初七八的样子跑的。在万家

埂,一段一段的埂都挖断了,灌上了水,一浪浪的白,防止鬼子进村。后来,因为两个婆婆(大婆和小婆)等老人还在上法汛,不放心,我们又回来看,然后再往江北跑,我虽然才12岁,但挑了不少东西,锅、碗都要带走。到了江北,先后到过陶家营、王家营、马家营,住了个把礼拜。那里没有鬼子,但是有土匪,晚上出来抢钱抢东西,也不安宁。

我来侯家塘的时间比较晚,抗战胜利后才搬过来。这里靠近交通要道,容易做生意。我在侯家塘开店,在上法汛又有田,只得起早贪黑两边跑。国民党抓壮丁,三丁抽一,五丁抽二,我兄弟被抓去了,就用十担米买了一个人代替。

我婆婆姓王,上法汛姓王的都是我亲戚。我舅舅王正华在湖山开了个小店,他的前妻姓王,病故了,又找了一个小张家岗(指孟塘的张家岗)的。她养了两个小孩,就回法汛了。鬼子在湖山山上打,我舅舅一个人在湖山,40多岁,50岁不到,个头又高,躲在高庄过来一点的坟圈里,在一棵石楠树旁边,被鬼子发现后开枪打中。他一面爬一面哭,我们躲在洞里听得清清楚楚。后来,他死在田里了。我们从圩里回来后,用婆婆的寿材把他埋了。

还有一个人叫王义太,是我舅舅的父亲那一辈的,我喊他“公公”,当时60多岁,胡子也白了。他在学校里做杂事,口袋里装着几个钱。后来,他在村上被鬼子看到了,鬼子要他的钱,他舍不得给,就被鬼子开枪打死了。

上法汛我婆婆家的房子很大、很深。鬼子快投降的时候,我看到陈毅骑了一匹枣红马进村,在我婆婆家住了个把礼拜。他的警卫员站得远远的,给他放哨。那时候我眼睛好,看他胖胖的、圆圆的脸,警卫员都穿着灰制服,一看就知道他们是新四军。那时候我眼睛好,不会看错的。

抗战期间,新四军的人在高庄把一个鬼子杀了,尸体投在井里。别的鬼子跑来找,找到了尸体,又把夏延居家好好的楼房都烧掉了,他们是来报复。

跑反刚开始时,许巷村西的几十号人打着一面白布做的旗子,有二三尺长,二三尺宽,中间有一个红太阳疤疤,用竹竿一撑,上面还写着“欢迎大日本”几个字,几十个人排着队出来欢迎日本人。鬼子哇啦哇啦地

讲了一通，大家又听不懂。鬼子就用机枪把这些人全部扫死了。

青龙山附近有四大名村：前村、后村、窰村、余村，它们是青龙的四个龙爪子。坟头的珠山就在龙须边，滚圆的。青龙和黄龙，二龙抢珠，结果青龙得水，黄龙得珠。黄龙为抢珠子把腰折断了，是在大赤燕那里断的，所以说“青龙抢得水，黄龙断了腰。”坟头那里是关口，坟头以西是关外，坟头以东是关里。

132. 郭秀华口述

郭秀华，女，1934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古泉侯家塘

调查时间：2004年8月30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71岁，属狗。现在住在骨胶厂那里。娘家是麒麟镇后村的。我哥叫侯民福，是解放前招女婿招到侯家塘来的，现已去世。嫂子的父亲叫侯申华，跑反时在孟家塘一个庵里被鬼子打死了。听人讲，那个庵里躲了几十号人，只有一个人逃出来，其余全部被鬼子打死了，血有多深。那个逃出来的人胆子大，他头上顶了一口铁锅，冲出去，把一个鬼子冲倒在地上，出了门就拐来拐去地跑，地形熟悉，鬼子开枪打他，没打着。

133. 侯明香口述

侯明香，女，1934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古泉侯家塘15号

调查时间：2004年8月30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71岁，跑反时才4岁。

我的父亲叫侯申华，跑反时在孟家场大山那里被鬼子开枪打死了。和他一起被打死的还有我的姑父孟家仁（孟家场人）和他的一个儿子。我的叔叔叫侯申福，跑反时牵了条牛跑到湖山，被鬼子打死了。还有个

叔叔叫侯申贵,跑反时在坟头被鬼子损伤,回来后就害病,不久就死了。

父亲死后,我妈和婶婶带了我们跑到了难民区的一个厂里。

134. 陆荣文口述

陆荣文,女,1925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古泉侯家塘 122 号

调查时间:2004年8月31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0岁,是六合来的。我九点半要烧饭,要剥毛豆,要干活,没工夫。60多年了,人死得冤枉哪。现在再翻过来,翻翻身,哪个人来给他们申冤啊?哪个人来给他们叫苦啊?都没有用了。

洪爱月是洪武龙的母亲。洪爱月的奶奶在侯家塘前面的公路边,在面坊那里。她家的房子被日本人烧了,她用簸箕一点点地往外扒,把烧糊的稻谷往外扒。日本人来了,她就骂。日本人就用刺刀戳,把她戳死了。

洪爱月的娘娘也是在家门口被鬼子杀死的。她的母亲被日本人戳死了,她就哭,日本人就用刺刀把她刺死了。洪爱月的娘娘当时三十来岁,手指和脚趾都伸不开的,是个残废,一副怪异样子,讲话又讲不好。她才三十来岁,要是没病,鬼子早就强奸她了。

她们两个都是鬼子刚来的那天被刺死的。她们家门口有座桥,有竹园,竹园里有树。国民党军队把树锯下来,横放在马路上,想挡坦克呢。那能挡个屁,挡挡小狗还差不多。不用武器打鬼子,就锯两棵树,有啥用呢?

鬼子来的时候那座桥是木桥、官桥,平时有人看守的。新四军来烧桥,那木桥上有大钉子,撬也撬不动。

135. 张家蓉口述

张家蓉,女,1917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古泉侯家塘

调查时间：2004 年 8 月 31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88 岁，属蛇。我爸没养儿子，就养了我们姐妹三个，我是老二，丈夫叫张家银，是招过来的。我爸叫张国义，小名二虎子。他没有跑反，留在了家里了，在村后头的山上被鬼子开枪打死的，那一天是腊月二十。收尸时用被单盖了盖，再盖点土，第二年跑反回来了，才弄了几块板子钉钉，把他埋了。

跑反那年我 21 岁，已成家了。我们跑到了龙潭圩里，后来又到了栖霞的难民区，过了年，开春了，才回家种田。我家的三间草房全烧掉了，两间瓦房没有烧掉。跑反回来后，我们白天到山上躲躲，晚上回家。

我们村上一个姓吴的，跑反时跑到了北尚庄，被鬼子杀死了。他有个儿子，已经去世了。他有孙子的，现在在采石场上班，你找不到他。

我们村的侯申富、侯申华兄弟俩在村后面的山上被鬼子杀死了。洪宝林，小名叫洪老大，在后面山上被鬼子杀死了，当时五十来岁。

我们村的房子差不多全烧光了。安民后，有个鬼子进村，朝我喊：“呼！呼！”我听不懂。后来才明白他要烘火，就在场上捧给他一捆稻草，他给了我一个角子。

136. 胡远堂口述

胡远堂，男，1932 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古泉四维村 32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8 月 31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73 岁，属猴的。原来住在上峰潭子头水库北面的胡家棚子。我爷爷带了我父亲从河南搬过来的，村上只有两三户，都是外地来的。1956 年，因为要建靶场，我们从胡家棚子搬到四维村。四维村的老百姓都是从外头迁来的，1956 年以前还没有这个村子。1956 年搬过来时，村

上只有 70 多人,现在村上有 100 多人。

跑反时,我跟了父母跑到了土桥南边的葛村庙,安民后才回来。听我父亲讲,那年腊月三十,鬼子到了胡家棚子,堵住了李家的门,李二、李三兄弟俩当场就被刺死了。李三是个剃头匠,未成家。李二有个儿子,小名毛娃子,被鬼子刺了七刀,肠子都露出来了,没死,逃了出去。第二天一早,我父亲从模范林那边回到村上,一看毛娃子躺在地上,李二、李三死在家里,就找来一只老母鸡,用鸡皮贴在毛娃子刀口上。然后,又把李二、李三抬出去,准备把他俩埋在义冢地(有钱人做善事买下的地皮,供穷人葬身的)。刚抬到旱塘沟那里,遇见一队鬼子往孟墓方向跑,他就躲了起来。鬼子走后,他就把李二、李三摔在旱塘沟里,草草地埋葬了。后来,又在坟地周围挖了一条疏水沟,防止死尸被雨水冲走。现在,不知怎么回事,这个坟地成了一个大坟,是自然长大的,不是别人垒起来的。每年冬至和清明,我们都要去上坟,李二、李三的坟上也去化点纸。那个大坟现在还在那里。



胡远堂

那年,李二四十来岁,李三三十多岁,小毛娃十四五岁。小毛娃的伤口贴上鸡皮后一直没有好,始终淌脓,刀口腐烂。后来,他给伪乡长宋良智家放牛,过了不到一年,刀口烂得厉害,他就死了。

137. 侯维义口述

侯维义,男,1925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古泉侯家塘

调查时间:2004年8月31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0岁,属牛的,跑反时13岁。

跑反时,我同母亲等人一起跑到了润南的地藏庵,白天躲在山上,晚上回到地藏庵,安民后才回到侯家塘。那时候,穿没得穿,吃没得吃。晚上回到家里找粮食,家里又被烧掉了,没有粮食吃。我家的三间草房全烧掉了,一扇大门也烧了,门框还在。鬼子要烘火,把我家的木床拿去烧,烧了一点点,能看得出的。

我母亲烧好了稀饭还没来得及吃,就拉了一条牛走了。就在村子里,被鬼子看到了,把牛打死了。侯申富、侯申华把家里的牛、驴都拉到湖山去,谁知道鬼子就是从湖山过来的,他们两个就被鬼子打死了。

洪武龙的爷爷洪老二,在村后边的山上被鬼子的机枪扫死了。那是刚刚跑反的时候,当时他40来岁。

××的一个女儿,还是个姑娘,在龙潭圩里被鬼子强奸死了,他们××的人不晓得。

张家银的父亲,小名二虎子,跑反刚开始时在后面山上叫杨家山的地方被鬼子开枪打死了。他老太太还在,在三队,你问马路边上卖报纸的,一问就问到了。

新四军来侯家塘,用手榴弹炸桥。当时鬼子不住在这里,住在汤山。后来,鬼子跑来了,问我:“你晓得中央军在哪里?”我没说什么,鬼子就扇了我一记耳光,打得我耳朵很痛很痛。13岁那年我被打了一次,18岁那年被打了一次,鬼子投降前又被打了一次。我们在神家庄扎刺槐,送到炮校里。有个鬼子叫岩见,用棍子打我,打了两下,这个狼心狗肺的家伙真狠。

夏天,日本鬼子在休息时是不穿衣服的,只穿一个小肚裆,连汗衫都不穿。不休息了,他们就穿军装。

138. 庞桂英口述

庞桂英,女,1938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古泉侯家塘 194 号

调查时间:2004年9月1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67 岁,属虎,娘家是上峰高庄的。我丈夫叫吴邦发,属羊,活到 73 岁,去年才去世的。

听我丈夫讲,他父亲叫吴振友,他妈是个瞎子。跑反时,我丈夫才 7 岁。晚上,他父亲从北尚庄回家,想弄点粮,刚从山洞里出来,就被鬼子发现了,鬼子在他身上连砍几刀,膀子上也砍了一刀。当时并没有死,要是有人去救,还能活下来,但那时谁会去救呢?后来就死掉了。我丈夫 7 岁没有爸,10 岁没有娘,很苦很苦的。

139. 孔令英口述

孔令英,女,1920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古泉侯家塘 12 号

调查时间:2004年9月1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85 岁,属猴的。娘家是大凹的,原来叫红庙村。跑反那年我 18 岁,三月里嫁过来,十月里就跑反。我老婆婆留在家里看门,没有跑。我跟着丈夫和老公公,一起跑到了江北的圩子里,第二年三月里才回来。

我老公公叫洪宝林,小名叫洪老二。跑反回来后还是不太平,我们一看到鬼子的汽车来了,就马上跑,躲在村后的尖山上。我老公公就是在那山上被鬼子开枪打死的。

我丈夫的大大叫洪宝寅,他没跑反,躲在后面的尖山上晒太阳。鬼子刚来的时候,他就在尖山上被鬼子的机枪扫死了。

140. 周德银口述

周德银,男,1938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古泉汤山头

调查时间：2004年9月1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0岁，属牛的，跑反时12岁。一开始没有跑远，就在村后山上躲躲。一个鬼子抓住了我，问我要花姑娘。我用手向北面瞎指指，说：“那边有。”鬼子就把我放了。后来，我家的两间草房被鬼子烧掉了，没地方住，我们就在夜里跑到了土桥街上一个亲戚家里。在那里住了两天，还是有鬼子，就在夜里往北边跑，跑到栖霞江南水泥厂的难民区里，丹国和德国人搞的，保险。厂里挂着德国的旗子，日本人不敢进去。难民区的人很多，我们用芦席搭个小棚子，人能拱进去就行了，带的米吃完了，就向做生意的人买豆渣吃，安定下来后才回来。

鬼子刚来的时候，看到过他们放的目标（指飞艇），头上是红的，尾巴是蓝的，目标到哪里，鬼子就到哪里。

我们村上陈德海的父亲是被日本人打死的，还有三个老太太，都六七十岁了。在姓王的沟里头被鬼子烧死，然后拖到我家屋后的地洞里。跑反回来后，我亲眼看到别人从那个洞里把死人骨头扒出来。这三个人，有王文彬的奶奶和王玉银的奶奶，她们两个是汤山头人，还有一个是陈长远的妈，从南京跑到乡下来避难的。此外，还有一个老头叫老宝荣，他是在地洞里被鬼子烧死的。

陈长远是我们汤四村村长周茂银的姑父的父亲，南京人。他在山上被鬼子开枪打死了，后来拖下来，在夜里埋的。

141. 周德海口述

周德海，男，1926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古泉汤山头79号

调查时间：2004年9月1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78岁，属虎的，跑反时11岁。我们兄弟六个，我是老六。还

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我父亲叫周志信,当时 50 多岁。

开始跑反时,我们就躲在外干朱砂堰附近的山凹子里。我父亲身上装了几个钱,想给几个儿子分分,买点吃的。正月初七下午四五点钟,太阳快下山了,我们快要回家的时候,父亲在后面墩子山那里被鬼子开枪打死了。当时,他们一起跑的还有两个,那两个人横着跑,没打死,我父亲直着跑,就被打死了。

鬼子住在步兵学校里,晚上是不出来的。妈妈拖着我和我大哥的一个儿子一起逃难,躲在大凹附近的山里。鬼子从黄栗墅翻山过来拉电线,我们待不住了,就往西跑。跑了好几个村庄,后来跑到了栖霞的水泥厂,住在难民区里,鬼子不敢进去了。

我家有十多间瓦房被鬼子烧掉了,都是盖的小瓦。我父亲亲眼看到神家庄有几十间房子被鬼子烧掉了。

神家庄有个人跑到我们汤山头,见到鬼子就往山上跑,被鬼子开枪打死了。这个人的小名叫“三强子”。

跑反时,汤山头全村有四五十户。那时村上没有这么多楼房,站在村上就能看见神家庄。

142. 钱本德口述

钱本德,男,1919 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古泉外干村

调查时间:2004 年 9 月 3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86 岁,属羊。

冬月初七跑反,我们一家六口在涧南豹山上躲了三天三夜。我们用一口小铜锅烧点米汤,都是晚上烧,白天不敢烧。后来跑到了圩里。听说和平了,我们几十号人就从圩里回来了。走到坟头的官桥那里,鬼子打枪了。神家庄的成德起听到枪响就跑,七八个鬼子对着他开枪,没打着。他年轻,参加过壮丁训练队,沿着沟里跑,所以没打着。别的人就一起跪下了,鬼子一个一个地查,看到有银耳环的就拉下来,也不管你死

活。有两个人,我们不认识的,大概是中央军,也跪在旁边。鬼子解开他们的衣服检查,问他们是干什么的。后来,鬼子又来问我,我解开手里的剃头包给他们看,他们就知道了。我18岁起就在神家庄理发。

当时,有小娃娃哭,鬼子就掏出锅巴和糖果给他们吃。后来,来了个骑马的鬼子,挂着长刀,叫队伍走,他们就把那两个不认识的人打死了。鬼子就是这样,一会给你糖吃,一会又杀人。

走到坟头,许多房子还在烧着,大梁劈劈啪啪地掉下来。我们就跑到神家庄的隐静寺,在那里烧水喝。烧水要柴火,我们就到附近去扒,一扒,就看到一个死人。一看,是我们村的吴新秀(小名),后来就不烧水了。还有一个白汉庆,也是我们村的,五六十岁,胡子都这么长了,倒在一个茅坑旁边,样子很难看。在涧南东边的一个水塘里,有七个死人躺着,这些都是我亲眼看到的。

后来,我们想去龙泉庵,可人家说那里住满了人,就没去。我父亲是打猎的,他用松枝搭了个小棚,住下了。可又下雨又下雪的,没法子,还是到龙泉庵里去住了。里面全是人,住得满满的。天亮后鬼子来了,我们翻山就跑到了孟墓,在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鬼子又来了,我们就跑到插花庙。下房里也住满了人。有一个人在被单里塞了不少大洋,鬼子来搜查,一大把大洋全掉出来了,鬼子拿了就走。我们没法,连夜下北圩。走到坟头,我实在跑不动了,就哭。但后来还是跑到了北圩。后来真正和平了,解放(指安民)了,才敢回来。一看,房子烧掉了,一样都没了。

[汪庭道(男,83岁,属狗)补充]我和他的情况差不多。跑反到了北圩,腊月里又到了栖霞水泥厂。这个厂是丹麦的,有保险的。我是跟了一个有钱的人连夜跑去的。厂里的帐篷都搭满了,我们就在厂外头靠围墙的地方住下来。过阳历年的时候,我们有三个人想回家,那时下着大雪,冰冻得很厚。回到家里,父母亲都在,可房子被烧掉了,稻谷烧糊了,一头大肥猪也烧死了,没有吃的。那房子是冬月初七烧的。我舂了斤把米,烧来吃吃。过阳历年了,鬼子喝了酒就要杀人。红庙有几个女的去接鬼子,一共三个鬼子,一人一匹马,挂着东洋刀。他们叫我拉着马不要动,还砍了根树枝给我,让我打马,要不就管不住。我在大凹的马路边弄

马草,鬼子又叫我给他们背枪。背了一会,一个鬼子又把枪夺过去打麻雀。这几个鬼子是步校的。他们叫我上马车,坐了一会,又叫我下车。

143. 吴助星口述

吴助星,女,1916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古泉外干村

调查时间:2004年9月3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9岁,属龙。

吴新秀的真名叫吴家慧,是我侄儿。跑反时,他在神家庄隐静寺被鬼子打死了。收尸时,他的尸体都化了,是用马草裹起来埋的。他死时有40多岁。

吴家园和他的儿子吴永山,跑反时都在家里看房子。那时,炮校的好多东西都丢在他们家,炮校的人把钥匙给他们了,托他们看管。冬月十三那天,在烧我家房子的时候,鬼子把他们父子俩打死在家门口了。

我家当时有六间两厢房子,前后两进,都是瓦房,造得很好的。炮校几个当官的住在我家,拉了电话线,装了电话。这些房子都被鬼子烧掉了,家里什么东西都烧光了。

我丈夫学名叫吴家斌,当兵后改为吴斌屈。他16岁进炮校,21岁就跟了炮校跑。他是七月十六跑的,到了武昌,后来就没音信了,抗战胜利后才回来。他是头一批派回来的,管京沪路一线,当时是副营长。后来,许多人去了台湾,我的两个弟弟也去了,但我丈夫没去。他跟了陈诚的部队到了湖南,在那里被逮捕了,坐了27年牢。我们被定为反革命。

鬼子是冬月初七过来的。我丈夫不在家,我在冬月初六带了3岁的大丫头跑到娘家大凹,躲在朱砂堰的一个大洞里。洞里有三四十个人,都是石岗的。后来,我们又跑到南圩,再后来又在宝华山躲了七天,然后去北圩二道坝,正月十七才回来。

144. 吴朝银口述

吴朝银,男,1927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古泉坟头

调查时间：2004年9月24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78岁，属兔，跑反时11岁。

跑反时，我们躲在青龙山上。日本人的枪法准得不得了，老远老远地开枪打人，一枪一个。开枪的声音也和中央军的不一样，开一枪响两响：“嘎——贡。”

我们村的人大多跑到栖霞水泥厂去了，有的还跑到了江北。村上的人没有被鬼子杀死，但百分之几十的房子被鬼子烧掉了。鬼子还常来强奸妇女，不论年纪大小，鬼子都要。听说山洞凹那边的稻场上有许多中央军被鬼子的机枪扫死了，坟头村上被鬼子打死的难民多得很，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145. 马永元口述

马永元，男，1930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古泉坟头排山

调查时间：2004年9月24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75岁，属马，跑反时9岁。

排山又叫葛家边、山洞凹。村前有个山洞，是天然形成的。听人说，长毛时（指太平天国时）有人跑反就躲在这个洞里。现在，这个石洞被采石场炸掉了。

解放前，我们村没有几户人家，现在也只有二十来户。跑反时，老头、老太在家看门，年轻人和妇女都跑了。我们家一开始跑到东流的平家岗，因为我舅舅在那个村上。鬼子在平家岗杀了不少人，我们在那里住了两天就跑。路过许巷时，在“六门口”看到许许多多中央军被鬼子打死了。后来就跑到栖霞水泥厂的难民区，在那里躲了三个来月。从难民区回来后，我们白天躲在村前的石洞里，晚上天黑了就回家。全村三四

十个人都躲在里面。

鬼子在坟头驻过部队的，他们住在珠山洞里。这个洞以前是国民党挖的，放东西的，鬼子一来，他们就住在里面了。珠山是一座小山。青龙、黄龙，二龙抢珠。青龙抢得水，黄龙抢断腰。这两条龙抢的“珠”就是珠山。修高速公路时，这座山就没有了。

我们村上没有人被鬼子杀死，但鬼子三天两头地到村上来抓猪、羊、鸡，见到妇女就强奸，安民以后还是这样。在孙塘那里，鬼子打死了四五个中央军的伤兵。在湖山，新四军抓住了一个小鬼子，关在山洞里。后来，这个小鬼子跑了，带了人来报复，在湖山杀了许多人。我只记得那天是农历七月初二，是哪一年，我记不得。

146. 陈华英口述

陈华英，女，1927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古泉坟头河西5号

调查时间：2005年3月24日

调查人：费仲兴

你要我讲跑反的事，现在讲这些还有什么用呢？你想讲给学生听听，也好，让他们也知道跑反的苦。

我今年79岁，属兔子的，娘家在中山陵梅花山那边。我11岁当童养媳，12岁跑反。看到鬼子杀人了才跑的。头一天我们躲在黄沟，用松枝搭几个小棚子。鬼子来了，又听不懂他们的话，以为他们要拉牛，就把牛拉过去。他们不要，要花姑娘，有三四个女的就被他们糟蹋了。这事不好说了，还用石头塞到她们的下身呢，不过人没有弄死。鬼子是住在7317（指国民党步校）里头的。他们还检查我大哥的手，说他拿过枪，要“死拉死拉”的，但后来就走了，在黄沟没杀人。他们在孟家场老坟山那里杀了好多人，是把人从地洞里拉出来杀的。后来，我们连夜就跑，一个村上二三十人都跑到龙泉庵了。我12岁，扛了一斗米，跟着大家一起，顺着山跑，许多人怕小孩哭，被鬼子听见，把小孩都摔到水沟里了，那些小孩都喊的，也没有办法。我们在龙泉庵住了一个多月，那里房子不大，

也没有看到和尚,许多人挤在庙里,哭呀,喊呀,日本人没有去。后来回到村里,房子都烧掉了,稻谷也烧了。上面的一层烧焦了,不能吃了,中间的一层烧糊了,底下一层还能吃。栖霞那边有个难民区,说是美国人办的,日本人不敢进去的。安民后,鬼子还常到我们村上来,逮牛逮猪,逮到什么吃什么。他们说洋火是“马几”,洋烟是“白果”,女的叫花姑娘。珠山洞里的鬼子逮了许多小姑娘,在里面关了几个月,她们可受罪了,但没有杀死。是哪个村上的?不晓得。珠山洞里的鬼子还常常到我们村里来,叫老百姓打架,用钉耙你打我,我打你,他们站着看。农民谁愿意打呢?在烧掉草房的地方,地上有许多稻草灰,大家你拽我我拽你的,搞得身上、脸上全是灰,就是不肯用钉耙打,鬼子就用枪托打他们。那时,鬼子差不多天天要来看农民打架。

解放前,我们河西只有十几户人家。跑反前,村里只有姓黄的、姓许的和姓戴的,现在有三四十户了,又有姓张的、姓韩的。我们这里是四个队,坟头那里还有几个队。我们村没有人被鬼子杀死,人都跑掉了。我们躲在黄沟,要是迟走一天就要被杀死了。鬼子在孟家场杀死了许多人,有几十个呢。

147. 唐秀英口述

唐秀英,女,1930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孟北前新村90号

调查时间:2004年8月21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75岁,属马,娘家在涧南。17岁嫁到前村街赵家,丈夫叫赵聚金,同年的,也属马,他过世11年了。

跑反时,我才7岁。头两天,我们躲在涧南附近的山上,挖个洞,躲在洞里。鬼子在涧南打死了许多人,“上池塘”里被打死的人可多了,水都染红了,我都看到的。后来,我就和我姐姐、弟弟跟了父母跑到了江北,安民后才回来。

我的老公公、我丈夫的两个叔叔、一个姑爷和一个舅爷,一共七个人

被鬼子打死了。另外两个人是谁,我不晓得。听人讲,那天有人带着鬼子到前村街找大姑娘,许多人从小棚子里钻出去,往山上跑。鬼子叫他们跪下,用枪一个一个地打死。

我丈夫的祖母,31岁守寡,带了孙男孙女、儿子媳妇,把他们带大。家里的田没人种,就叫她娘家人来种。二媳妇给人家抢走了,大媳妇得病死了。她活到90岁才去世的。

他们家的人当时被杀的情况我说不大清。我二儿子在汤山小学当老师,他清楚。村上的老歪嘴、老耀炳,都80多岁了,他们也清楚。我带你去找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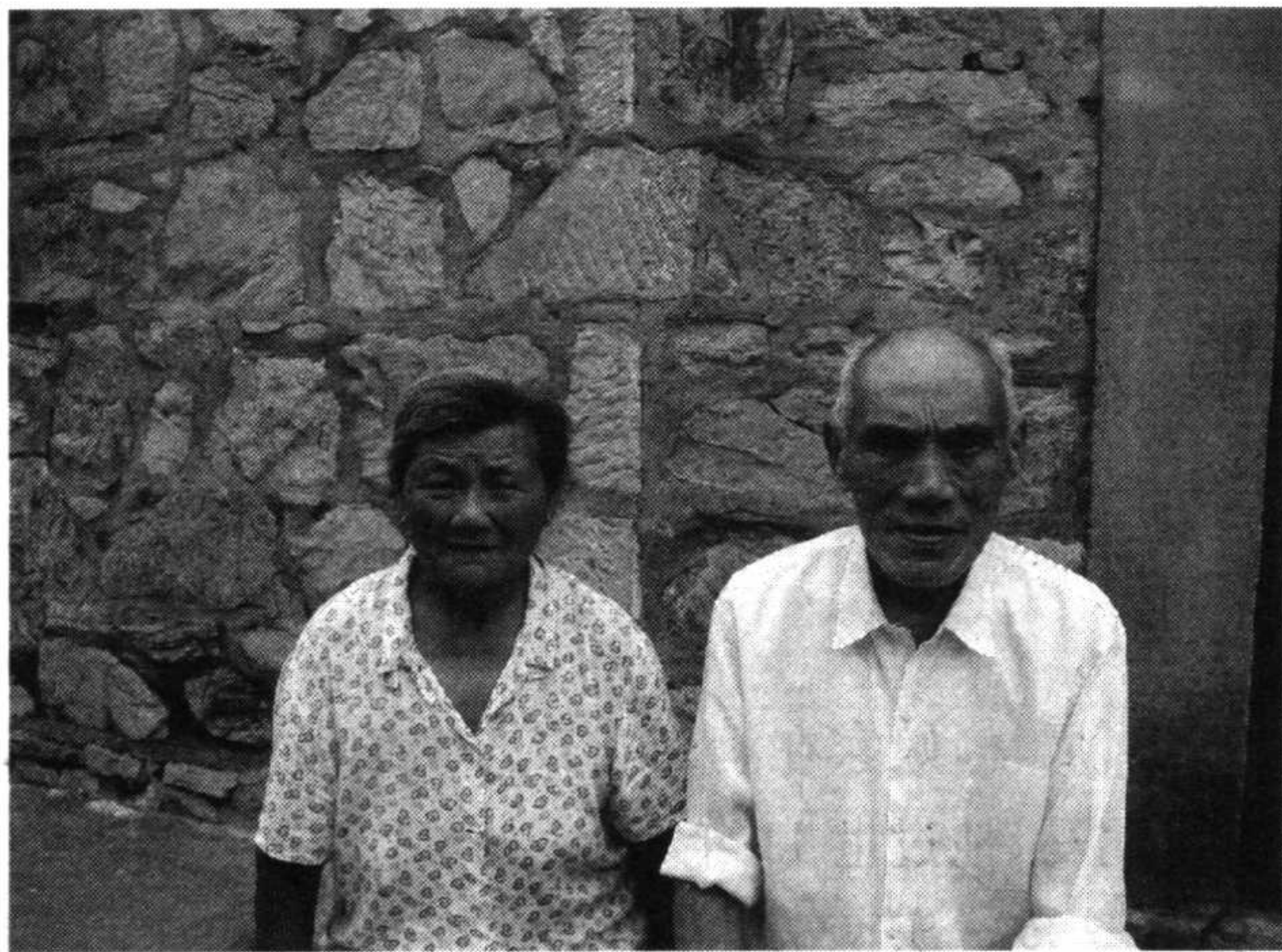
148. 平耀炳口述

平耀炳,男,1924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孟北前新村70号

调查时间:2004年8月21日

调查人:费仲兴



平耀炳(右)

我今年81岁。原来住在龙泉前村街,1956年要造靶场,前村街集体搬迁到孟北,改名前新村。搬过来之前,村里有80来户,现在村上有100来户。

跑反时,我才 14 岁。父母亲年龄都很大了,所以我们家没有跑到远处去,就躲在卯家山(音)上,过了几天又跑到大山里,快到龙山了。

冬月初七,跑反开始的当天,大批鬼子从我们村上过,大家都往山上跑。我们村东头的孟世忠(当时 40 多岁)在那天下午从山上下来,想回家看看,结果在路上遇到了三个鬼子,被他们开枪打死了。

腊月里,记得是快到阳历年的时候,有三个鬼子到我们村上,一下子就打死我们村七个人。赵聚金家靠着山,那天特别冷,许多人围着烤火,鬼子来了,把他们赶到村外。第一个被打死的是平定才,脑袋打得开花了。鬼子是在他走路时从背后向他开枪的,地点就在“神灵塘”过去一点。别的人一看,都跪在田里,向鬼子求命。可跪下来求也没有用,鬼子开枪把他们一个一个都打死了。当时,我就在张王庙(音),离他们比较远,但听得出那枪声是打人的枪声,没有啸叫声的。后来有人来报信了,我们就跑过去看,那场面都看到了。那一次被打死的有七个人,能想的起来的有六个:

平定才,40 多岁;

陈友才,40 来岁,是赵家的女婿;

“糊三子”,姓张,20 多岁,是赵家的内侄(姑娘的侄子);

赵德富的两个弟弟,都不到 30 岁,名字不知道;

赵德富的舅舅,姓张,50 多岁。

被打死的人是赵老三的后代,而赵聚山、赵聚才是赵老四的后代。赵聚才今年才去世的,死了才一个月。他活到了 71 岁。

鬼子在我们村上烧了许多房子,有三分之一的房子被烧掉了。不是一次烧的,烧了好几次。我家有十间两厢的楼房,是上代传下来的好房子,很高,木柱子很粗,有网砖网板的。鬼子一来就浇上汽油烧掉了。安民后没有地方住,我们就东家住几个月,西家住几个月,给他们付点钱。后来就一直没钱盖房子,更没钱上学了。

鬼子除了烧杀就是强奸妇女。有个女的三十来岁,是上峰南高庄的,跑反时跑到了我们村上。鬼子要强奸她,她就跑。可跑到这边有鬼子,跑到那边也有鬼子,跑不掉了,她就跳进“西庙塘”(张王庙西边的水塘)淹死了。

中国人同日本人打仗,武器不行,人的勇气也不行,见了鬼子就害怕。老百姓又没有后台,不敢抵抗。就算鬼子在强奸自己的老婆,也不敢起来抵抗。在涧南的东南角,中央军同日本人打过一仗的,打不过就走了。日本人放了两个气球(指飞艇),黑弄弄的,长长的,飞得很高,在天上飘啊飘的。气球下面就是鬼子的队伍。日本人的探子骑了探马到处侦察,中央军逃到哪里,他们都很清楚。在水库北面的吴家坟那里,不到庞家边的地方,有一个碉堡,现在炸掉了。碉堡都是德国人设计的,他们把图纸交给日本人,日本人就清清楚楚了。在千儿山那里还有一个隐蔽部。

以前我们进城都是走山路,翻山过去。走千儿山,路平一点,但路远。走母家山,路陡,但是近一点。翻过了山,就走沧波门、光华门进城。

我没有上过学,没有文化,看不了报纸。儿子孙子都上过学的,也只上到初中,没有上高中的。我们村有个孟升俊,在汤山中学当老师的,60多岁了,退休了。他上到大学的,现在住在汤山镇上。

149. 李开铜口述

李开铜,男,1930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孟北许巷一队

调查时间:2004年11月23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76岁,属马,跑反时9岁。父母亲带着姐姐、哥哥和我,在冬月初七下圩,住在龙洲圩。

有九个鬼子在冬月初五晚上就到了兴隆庵,手臂上有“大日本”几个字,还有红亮月疤疤,脚上穿着皮鞋。他们在墙上开洞,里面大,外面小,隔段时间就向中央军放几枪。中央军在山上架了大炮打,洋号吹得响响的,还喊“上啊!上啊!”可中央军都是刚抽来的壮丁,还不会打枪,有的掉在河里就淹死了。这时候,日本的大队人马还在下蜀,就这九个鬼子在打。冬月初七下午四点来钟,这九个鬼子就进村了。刘振涛正在家里喝酒,鬼子一脚踢开门,一刺刀上去就通心过,村上人一看鬼子杀人了,

才赶紧跑,一个个下圩了。当时村上有二百来户,只有少数有钱人跑得早一点,大部分人都是冬月初七鬼子进了村才跑的。我们在圩里躲着,正月初三就回来了,回来后就没有再跑了。我家的房子没有烧掉,隔壁刘立兴家的木楼房被鬼子烧掉了,我亲眼看到的。大概是正月十几,鬼子用葡萄弹烧的,那东西有这么长(约 15 厘米),这么粗(直径约 4 厘米),头上有个小扣扣。把小扣扣一拉,往房子上一摔,就起火了,瓦房也能烧着。他家的房子烧着了,我就搀了奶奶到屋子外头站着。



李开铜

鬼子就住在阳山中学附近的珠山洞里。这个山洞原来是国民党的子弹库,国民党在汤山头外干村那里造子弹,造好后放在珠山洞里。造洞的时候,我去卖瓜,进洞看过,后来造好了就不让人去看了。鬼子在珠山洞里住了三个多月,天天到村里来捞鸡、鸭和牛。他们打死了牛,只要两条后腿,别的啥也不要。捞到了鸡、鸭,就叫年轻人送到珠山洞里。

在十月里,就有鬼子拿了地图、指南针过来了,问哪里是乡政府,哪里有炮台。四队的陈智锡,60 多岁了,敲着锣鼓,喊老百姓出来欢迎,还打着旗子,旗子写着“欢迎大日本”。鬼子是从东流、西岗过来的。欢迎的人群碰到了鬼子,鬼子就不让他们走了。老百姓一齐跪下,鬼子就用刺刀刺他们。有一个人,他前头的一个人被刺了一刀,他就昏过去。后来鬼子走了,他醒过来,爬起来就跑。他姓崔,我们都喊他老崔。叫什么

名字不知道。他儿子叫崔志高,今年 79 岁,在许巷四队,你可以去问问他。还有一个人叫时松龄,刺刀从左腰进,右腰出,没碰到五脏,也没死。后来,左边、右边都长了个瘤,不小哪。他是教书的,活到 80 多岁才去世。另外还有一个人叫艾义荣,脖子上被刺了几刀,没有刺死。他到你们炮校作过报告的。

那天去欢迎日本人的一共有 13 个,有 10 个人被刺死了,全是年轻人。现在能想起来的有:艾仁林、艾仁银(兄弟俩),陈广东(陈智锡的儿子)和陈广才。

许巷人是先欢迎日本人,过了几天鬼子才进村的。是哪一天,记不清。后来一打仗,村上人全跑光了,哪里还会有这么多人去欢迎呢?

我们村上有些人相信大刀会,以为能够刀枪不入。他们一大帮人在龙潭去抄鬼子,每个人带一支枪头(长矛)和一把大刀。同鬼子一打,全都打死了。什么刀枪不入呀!我们村的王四和许克方的儿子就是在那一次被鬼子打死的。

我们村上三分之一的房子被鬼子烧掉了。跑反前,许巷不算穷也不算富。这里出过两个能人的,一个是高井(东流过去一点)的张志喜,当过国民党华东军区司令员的(此处显然有误),另一个是王庆宜,是张志喜的参谋长。鬼子来了,他们见势头不对,就走了。

鬼子刚打来的时候,摔出来的袜子都短统的,发给小孩吃的果果糖都是牛皮纸(塑料纸)包的,同现在一样。他们当时就用圆珠笔。他们的子弹壳全是铜的,没有铁的。

湖山那里的房子全被鬼子烧掉了。那是鬼子来了之后的第三个腊月。三个鬼子,一个是开车的,另外两个是父子俩,从龙潭拉了水泥回来,被土匪开枪打穿了前胎。三个鬼子被抓到湖山,小鬼子跳到竹园里逃了,另外两个鬼子被敲死了,放在煤炭窑里。老百姓一看,都跑光了。第五天,鬼子的马队跑到湖山,把村上的房子烧得光光的。我们在村上看到那里的大火的。日本人把那位老鬼子和司机火化了,然后带走。当地人全怪土匪闯祸,害得家里房子全烧光。

150. 艾义芳口述

艾义芳,女,1934 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孟北许巷四队

调查时间：2004 年 12 月 17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71 岁，属狗，娘家在龙王庙，娘家姓吴，8 岁嫁过来以后就改姓艾。

跑反时我才 4 岁。听大人讲，当时他们曾把我藏在撮盒（撮稻用的敞口木箱）里。鬼子把我父亲抓去了，要他带路去龙泉庵。路上，父亲说要去大便，鬼子让他去，他就趁机逃走了。我们姓吴的一家人躲在一个地洞里，我那时不懂事，哭，父亲怕被鬼子听见，就拎了我的双脚不停地抖，不让我哭。

据我所知，龙王庙村上没有人被鬼子杀死。

许巷这里被鬼子杀死的人就多了，有四十来个呢。我公公（丈夫的父亲）艾义林在平家岗被四个鬼子抬起来往下摔，再抬起来，再往下摔，被活活地撮死了，当时 33 岁。

有一队鬼子从东流过来，陈老头带了一帮人去欢迎大日本。鬼子把大家赶到一块田里，让大家跪下。鬼子一刀一个，砍头，用刺刀戳，杀死了许多人。有几个人活下来了。崔志高的大大（伯父）被刺了几刀，没死，歪着没敢动。鬼子走后，他跑到前头场上，躲在一个缸里，活下来了。

151. 时有升口述

时有升，男，1924 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孟北许巷四队

调查时间：2004 年 12 月 17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81 岁，属鼠。解放前当过私学老师，解放后在生产队劳动。

我们是冬月初五跑反的，就在附近转，后来就回家了。冬月十四那天，从东流那边来了许多鬼子，像蚂蚁一样的。有人叫我哥（时有恒）弄了一面旗子，上面写着“欢迎大日本”五个字，还有红亮月疤疤，有一尺多

长,扛了去迎鬼子。鬼子把老头、老太挑出来站在一边,把小孩挑出来站在另一边,把年轻人赶下田,叫他们把衣服脱了,跪下来。然后就用刺刀戳,一戳一蹬,有14个人全被刺死了。现在能想起来的有:时松筠、时有恒、陈光才、陈光东、沈九芳、沈九海、葛老四、王大林、俞启宝、俞启财。



时有升(中)

我哥当时19岁,结婚才3个月。他胸口刺了一刀,背心刺了一刀,动也没动就死了。我当时14岁,个子小,鬼子没动我。我母亲也站在旁边看着鬼子杀人的,不敢去救。我父亲时松龄被鬼子戳了三刀,一刀在心口上,刺斜了,另一刀在左腰,刺穿了,还有一刀在右腰,也刺穿了。这三刀都没有刺中心脏,但肺和肠子都露出来了。后来,有人把他拖回家,让他躺在床底下。几个老太太给他洗伤口,给他吃点东西。过了几天,就把他抬到了北圩,住在亲戚家里。他的肠子流出来了,就用手往肚子里塞。后来,腰的两边都烂了,也没有医生治,是自己慢慢地好的,一边长了一个大瘤子(伤疤),活到81岁才去世。

崔志高的父亲和另外一个村民刘应志没有被刺死,他们从地上爬起来就跑,用缸套住自己的身子,躲过去了。

我哥死后没有马上埋,第二年开春后才用稻草裹裹埋起来。那墓还在,没有立碑。

我们村上还有好多人被鬼子杀死了。冬月初六在平家岗那里,艾仁

林等人躲在牛房里,被鬼子看到了。艾仁林被四个鬼子抬起来往下摔,活活摔死了。艾仁银和艾义生被刺刀刺死。艾义荣的脖子被砍了一半,没有断,额上也刺了一刀,流了许多血。他没有死,活下来了。忆苦思甜时,炮校专门开了小车来接他去作报告的。

时均财,冬月初五那天在地窖子里被鬼子拖出来一枪打死。

朱宝金,在自家后头爬墙逃命,被土地庙那里的鬼子远远地一枪打死了。

毛毛的丈夫是紫金山那里 357 的,结婚还没结成,鬼子就来了。他躲在草堆里,鬼子就放火烧。他爬到水塘里就死了。那天夜里我们回家淘米煮饭,一闻,有股异样的味道。第二天天亮后到水塘边一看,一个死人浮在塘里,水面上浮了一层油。

艾仁炳是招女婿招来的,来的时间不长,他是在“一亩六”田里被鬼子开枪打死的。

时有能的父亲,衣服脱光了,被鬼子用刺刀刺死。

还有许多难民在许巷后头被鬼子打死了,后来挖沟埋了,都不知道姓名。在许巷一队东边的田里,日本人用机枪扫死了许多难民,死人像稻秆桩一样,田里睡满了。

152. 崔志高口述

崔志高,男,1926 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孟北许巷四队

调查时间:2004 年 12 月 20 日、2005 年 8 月 14 日

调查人:费仲兴、史长谷

我今年 79 岁,属虎,跑反时 12 岁。

我父亲崔士才是从句容天王寺挑了一副箩担搬迁过来的,在许巷安了家。跑反时,家里有我父母、妹妹和我四个人。他们三个没有跑,就我一个人跟了田老板(出租土地供人耕种的人)时景年跑到了龙潭北圩的大圩荡,住在老百姓家里。那个村的人全姓张,有几十户。我们在那里吃的米是自己带去的。冬月初八去,正月里回来,后来就再也没有跑出

去了。

听我父亲讲,冬月十四,鬼子从西边过来大回杀,就是南京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他们特地回来杀人的。那天来了两批,第一批才十来个鬼子。国民党兵见了鬼子腿都发抖了。我家门口有个老人叫陈智锡,50多岁了,他说:“你们不要跑。用红布做一面太阳旗,去欢迎他们,他们就不会杀人了。”结果,他一家就被杀了三个,一个是他儿子陈光才,一个是他侄子陈光东,还有一个是他家的伙计李宝华。



崔志高

那天一共杀了十五六个人。鬼子叫他们把衣服全脱了,跪在田里。那地方就是许巷西边“一亩六”上面一点的“八分田”,离马路不远,就在厕所过去一点,现在是菜地。

鬼子用刺刀一个一个地戳,我父亲死里逃生,活下来了。当时跪了三排,前面一排跪了六个人,中间一排跪了五个,我父亲在中间一排第三个。鬼子戳前面一排的陈光东,他身子一仰,倒在我父亲身上了,鲜血直喷。鬼子绕了个圈,到后面一排去戳时有恒。他倒下来后又压在我父亲身上。他们两个人把我父亲盖起来了。鬼子杀完了,用枪托捣我父亲的脑壳。他的头被敲破了,流了许多血。这一批鬼子走后,时有升的奶奶跑到杀人的地方喊:“有没有活的啦?能跑的就快跑,后面又有鬼子过来了!”我父亲就跑到村前头,用一只装过死人的缸套住自己,拱在里面。

不久,来了六个鬼子,一人骑一匹大马。他们看到附近有十来只装死人的缸,就走了。

我父亲是属龙的,当时不到40岁。他后来找到了我母亲和我妹妹,有一个多月一句话也不说,被吓痴了。饭端到他手上,他就吃,端得远一点就不晓得吃了。他们在村上东躲西藏的,没有跑到远处去。过了一个多月,他就慢慢地恢复过来了,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不影响干活。他头上的伤疤有这么长(约一指长),常常叫我们看的。他说:“我要是被鬼子刺死了,你们还不知在哪里讨饭呢。”他是湖山煤矿的退休工人,活到71岁,“文化大革命”时去世的。要是活着的话,今年有102岁了。

鬼子到我们村上来,主要是两次。第一次是攻打南京城之前,鬼子从华山、下蜀过来的,往西边打。第二次是他们占领南京之后,从西边杀过来的。仗打完了,他们也就走了。平时零星到村上来的鬼子不多,主要是抢牛、猪、鸡。他们把牛屁股砍下来就拿走,不杀牛。还有鬼子进村糟蹋妇女,有六七个呢,这个就不说它了。

我们村上被鬼子杀死的人全是二三十岁的青壮年。现在想得起来的有时有恒、陈光才、陈光东、沈九海和沈九芳兄弟俩、俞启财和“柱子”兄弟俩、李宝华、葛老四、王大林。他们是在冬月十四被杀死的。那天,时松龄和刘应志身上戳了好几刀,没戳死,他们是一块跑出来的。艾义生和艾仁银、艾仁林兄弟俩是在平家岗被鬼子杀死的。

那时候,汉奸多啊,日本人的地图上详细得不得了,龙门坝、东庵、三孔桥,都有。

(2005年8月14日史长谷调查时说)艾义生、艾义荣、艾仁银、艾仁林等四人是在平家岗被鬼子抓住的。艾义生、艾仁银两人被鬼子当场刺死了,艾仁林一下没死掉,被鬼子抬起来往下掼(摔),掼了好几次才掼死的。艾义荣的额上、颈上被刺数刀,但颈子没有断,故而没有死。抬回家后,为防止鬼子再来,挖了个地洞,在洞里养伤。因为无处医疗,伤口化脓生蛆。他母亲每天用盐水给他洗,慢慢就好了。一直到临终,颈部还留着一个很大的刀疤。他是五代单传。

冬月十四鬼子的大队人马是从东流过来的。沈九海被鬼子杀了,他妻子又被鬼子强奸,她悲愤之下跳塘自尽。他一家,连同伙计在内,一共

死了四个。

那时候人太老实,胆子太小,软弱无能,任人摆布。安定以后,鬼子不再轻易杀人了。一天,有个鬼子从坟头官塘的据点里来,在我们村到处抓鸡、捞鸭、抢东西,找花姑娘,折腾了好半天。他抢的东西太多了,拿不走,就找了两个人用粪箕抬他走,又喊另一人给他背枪。从许巷抬到坟头,那时候全是山间小路,空身都不好走,这两个人就这么老老实实地抬着鬼子走。要是摆在今天,几个人对付一个小鬼子还不是小菜一碟吗?掐也把他掐死了。可那时候就是没人敢动。

153. 陈广奇口述

陈广奇,女,1926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孟北许巷三组

调查时间:2005年8月14日

调查人:史长谷

我是四队的姑娘,鬼子来的那年我12岁。鬼子在外面杀人时,我和姐姐躲在床底下,没有让鬼子找着。我哥哥当年16岁,个子长得高一点,被鬼子杀掉了。时有恒、时有升兄弟二人,鬼子叫他们并排跪在地上。有恒16岁,有升才12岁,鬼子感到他实在太小了,就一脚把他踢到旁边。结果,有恒被刺死了,有升活下来了。那一年,我们村西的年轻人差不多全给杀光了。

许巷三队增松的爷爷叫刘长焕,他被鬼子抓到后被他们用刀砍死了。

刘应志被鬼子戳了几刀,没伤到内脏,没有死,又活了不少年。

154. 时松涛口述

时松涛,男,1928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孟北许巷四组

调查时间:2005年8月14日

调查人:史长谷

鬼子来的那年我 10 岁。陈立生的爷爷叫人不要跑,他带了人到村西去迎鬼子,后来年轻人全给鬼子用刺刀戳死了。

我叔叔时金才躲在地洞里,被鬼子发现后,拖出来一枪打死。他儿子叫时松山。

朱宝金听说鬼子进院子了,连忙翻墙逃跑,刚上墙,鬼子一枪就把他打死了。时有升的父亲时松龄,鬼子戳了他三刀,前后都戳穿了,肺和肠子都露出来了,但没有伤到心脏,没死。他腰的两边都烂了,也没治,后来慢慢地好了。三刀留下六个洞,腰两边一边长一个大瘤子(伤疤)。他一直活到 81 岁才去世。

155. 汤仁玉口述

汤仁玉,男,1928 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孟北许巷二组

调查时间:2005 年 8 月 14 日

调查人:史长谷

鬼子来的那年,听说村西的人去欢迎大日本,结果被鬼子杀掉了不少。我们这头杀的不多。

我家爷爷汤兴发,他跑不动,躲在地洞里。鬼子发现了,把他从洞里拖出来打死了。

方宝贵的爹方广明,鬼子来了逃跑,被鬼子追到村东河边,他不会游泳,不敢过河,被鬼子抓住,一刀砍死了。

一队的李世荣,鬼子把他掀到塘底下。两个鬼子抬起一只猪食槽向他砸去,想把他砸扁了,可他命大,一头跌下去正好跌在腰沟里,所以没有被砸死。鬼子砸完就走,他活了下来,活到 70 多岁。

李老三帮新四军修枪,汉奸汇报给鬼子,鬼子把他捉到中山门,给洋狗吃了。他外号叫“三猴子”,那时 30 多岁。他儿子媳妇都死了,孙子叫李家强。^①

^① 据李老三的侄子阳山中学教师李国祥说,李老三叫李友富,确实是给鬼子的狼狗吃掉了,地点是南京卫岗的日军宪兵队监狱。

156. 刘应田口述

刘应田,男,1924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孟北许巷四组

调查时间:2005年8月14日

调查人:史长谷

鬼子来的那年,我们村西有个甲长陈智锡,外号“老尖杠”,鬼子来了,人家要跑,他叫人不要跑,说你一跑鬼子就会开枪打。他叫人做了一面旗子,上面写了“欢迎大日本”几个字,带着村西的人去迎鬼子。由于他出了这么个馊主意,本来人们是可以跑掉的,结果却没有跑。一些年轻人全给鬼子杀掉了,陈智锡一家就给杀掉了三个,其中有招来的女婿陈光才,侄儿陈光东和雇来的伙计李宝华。

这次被杀的人,俞启宝、俞珠子与沈九海、沈九芳是两对亲兄弟,除了九海以外,都没有留下后代。

朱克文的妹夫卢某某,20多岁,躲在草堆里,被鬼子发现了。鬼子把他抓出来,先用刺刀戳,没戳死,就把他的棉衣点着了烧。他烧得疼痛难忍,滚到了附近的塘里。第二天早晨,塘里的水面上到处是油和血,一股难闻的臭味。

从法汛招来的艾仁炳,当年40多岁,在自家门口被鬼子发现后打死。

我当时因为个子小,鬼子大屠杀时被推到了另一边,没有杀掉,回想起来真害怕。

157. 杜永林口述

杜永林,男,1920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孟北北岗

调查时间:2005年9月6日

调查人:史长谷

跑反那年,我们这里被鬼子杀死的人不少,许巷村西最多,我们北岗也有好几个:

王福银,21岁,鬼子抓住他,叫他送东西到许巷。到了许巷村上,鬼子开枪打他,没打死,又用刺刀把他戳死。他没有后代。

汪小网,20岁,外地人,帮财主看山,住在北岗。

小道士,20多岁,外地人,在我们村帮工。他和王福银、汪小网是在同一地方同时被鬼子抓住后枪杀的,均无后代。

王如成,30多岁,见鬼子来了,他跑,被开枪打倒,大腿受伤,没死,活到60多岁。他儿子王其山现在在台湾。

杜德钊,60多岁。一天,他被鬼子抓住,鬼子逼他带着他们上山去找花姑娘。什么地方有洞,人藏在哪里,他全知道。他故意把鬼子领到没有地洞的地方转了一大圈,什么也没有找到。鬼子知道上当了,向他开了一枪,把他打伤了。他倒在地上装死,鬼子走后,家里人把他救回去,他没有死。他的子女都去世了,孙子杜国良、杜国培都健在。

158. 王官祥口述

王官祥,男,1930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孟北许巷二组

调查时间:2005年9月6日

调查人:史长谷

鬼子来的时候,我还很小,记不清。不过,鬼子杀了许多人,这是事实。除了我们村里的人被杀外,还有许多外地难民在村后被鬼子打死了。村东的田里也打死了不少人,有的是国民党军队的,究竟有多少,没有人统计,如今更无法查考了。

最令人发指的是,鬼子抓住了一名中国伤兵,在我们村的东庵把他开膛破肚,挖出心来烧了吃。我没有亲眼看到,但老年人告诉我们真有这回事。

159. 言翠兰口述

言翠兰,女,1922年生,李世荣之妻

调查地点:汤山镇孟北许巷一组

调查时间：2005 年 9 月 6 日

调查人：史长谷

我今年 84 岁，听我老头子讲，鬼子在这里的时候，有一次他没有跑掉，被抓住了。鬼子叽里哇啦地跟他讲，他也听不懂。两个鬼子把他推到村边的塘底下，然后抓起一只猪食槽，石头的，对他砸下来。也是他福大命大，他正好跌在一条腰沟里，猪食槽被沟边子挡住了，只在头上砸了个大口子，鲜血直冒。鬼子以为他死了，就走了。他当年 18 岁，一直活到 78 岁，头上还留着一个大疤。

(二) 上峰镇调查

1. 雷忠鸿口述

雷忠鸿，男，1937 年生

调查地点：上峰镇关塘堰四队

调查时间：2003 年 1 月 14 日

调查人：费仲兴、王红

我叫雷忠鸿，今年 66 岁，是 1937 年农历三月十六出生的。那年农历冬月初三，日本兵就跑到我们关塘堰来杀人放火，村上大部分房屋被烧掉了。冬月初七那天，我爷爷在稻场上换衣服，因视力不好，没看到村外有日本兵走动，被日本兵发现后一枪打死，当时 58 岁。这是我奶奶多次讲给我们听的。我奶奶还说，当时在关塘堰村外田埂上有六七个人被日本兵打死了，谁也不知道他们是哪个村的。我大叔雷震东（原名雷秉礼）为了给我爷爷报仇，18 岁就跑到赤山参加游击队，同日本鬼子打仗。解放后，他在福建省任检察院院长，现住福州群众路干休所。我还有一个叔叔叫雷秉智，他为了保佑全家人平安，跑到宝华山隆昌寺出家当和尚去了。

我父亲叫雷秉义,被日本鬼子打了两枪,差一点点就打死了。具体是哪一年,我说不准,大概是日本人占领汤山五六年后的事。一天,汤山自卫团团长金大贵带了几个鬼子到我们村来清查新四军,老百姓看到鬼子来了,纷纷逃跑。我父亲跑到村边不远,就被鬼子一枪打中,子弹从右肩胛骨下边打入,从右胸穿出,当时觉得好像被人狠击了一下。一摸,胸口潮了,全是血,便跌跌撞撞地往回走,走到晒稻场就倒下来了。鬼子问伪保长:“村上的新四军哪里去了。枪在什么地方?”伪保长用手一指,说:“刚才被你打倒的那个人知道,你去问他。”鬼子跑过去,把父亲拎进屋里审问。父亲一开始还能跪,后来跪不住了,倒在地上。鬼子用木棍劈头盖脸地打他,还浇凉水,父亲就昏迷过去了。这时,鬼子把村上没逃走的人全部集中起来,架了两挺机枪,对准了他们,厉声问道:“新四军哪里去了?枪在哪里?”接着从人群中抓了一个十来岁的小孩,指着父亲问:“你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小孩哭着说:“他是好人,不是坏人。”鬼子说:“好,你去吧!”放过了小孩,他们又打父亲,逼他承认是新四军,说承认了就放他回家,不承认就不准走。父亲睁开眼睛,吃力地说:“我是种田的,我是好人!”日本人扒开父亲的上衣,看肩膀,又看他手上有没有老茧。大门外,我奶奶和我母亲哭着哀求伪保长,说:“不能再打了呀,再打就要打死了呀。”边说边往屋里挤。日本鬼子拦着不让进,还狠劲打我父亲。众人都在门外求情,一片叫喊声。日本兵见天色不早了,怕有新四军来包围,说:“送你回老家吧!”拿起枪就打。父亲把两只手举起来,子弹打在他手上,又流了许多血,昏过去了。日本人以为他没有用了,死了,就走了。后来,我们村上人托人,求汤山的言仁福,又拜金大贵手下的人为师,让他写个条子,晚上把父亲抬到汤山“小楼”,找日本医生看。日本医生给父亲上了一点药,说:“走吧!”后来,父亲被抬回家里养伤,养了一年半,才能下地干活。一家人失去了劳动力,那两年的生活真苦哪。

上面这些经历,我奶奶和父母亲给我们讲过不知多少次。“文化大革命”以前搞忆苦思甜,我常在大队和公社里讲,听的人可多了,他们都知道。

2. 陈恩贵口述

陈恩贵,男,1916年生

调查地点:上峰镇姚家边

调查时间:2003年1月11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5岁了,耳朵有点聋,但还能看清报纸上的字,地图上的字也能看清。以前在炮校印模厂做过木工,能写几个字,我的耳朵就是在那时聋的。

日本人打到汤山来的那年,我21岁。跑反跑到汤山侯家塘南边的涧南,当时叫龙泉涧南。我们村上的人都跑光了,外村有人跑反却跑到我们村来了。那时候,谁也不知道什么地方更安全。

农历冬月初五(1937年12月7日),我们姚家边来了两个鬼子,手里没有枪,只有刀。他们在陈起瑞家的槽坊(酒坊)里关了门强奸两个妇女,其中有一个当时就死在床上了,另一个从槽坊里逃出来,在外面寻死了。这两个鬼子强奸完了,把躲在村里的三十来个外村人统统叫到槽坊,一个个绑起来,用刀挑死,然后放一把火,把房子烧了。村上的房屋只剩下两间没有烧光。

后来,野狗把死人骨头啃的啃,拱的拱,一具具死尸都散架了,那骨头东一块西一块的,认不出来,分不清是谁谁谁了。安民后,大家回到村里,把这些骨头罗在一起,在村西头挖了个大坑埋了,还垒了个大坟包。再后来,有七个人的姓名搞清了,他们的亲人后代每年清明节都到姚家边来上坟的。再后来,年头长了,来上坟的人稀了,那个大坟包被村上人一年一年的筑平了。我只知道黄塘沟(今黄塘庵)有一个姓陶的,好像叫陶富林,作厂宕子村有一个,塘泽有两个,李岗头也有两个。

日本人刚来时,西边山上有白崇禧的部队同日本人打,他们都是广东兵,说话听不懂。日本人在丁墅架起了小钢炮,专打白崇禧的机关枪。中央军撤退了,鬼子也没有追,他们跑到李岗头那边包抄过去。在孟墓那里,有国民党郭林祥一个连的广东兵同日本人打了一仗,打死了几十个鬼子。日本人又派兵增援,逮到了中国人就拉到炮校里火化了。

那时候,我们姚家边是受害最深的。有个老人被日本人连刺了几刀,当时没死,躺在椅子上,过了四五天才断气的。日本人在姚家边杀了人,死尸就往村东头的水塘里推,那个水塘里不知有多少死人。冬天还没烂,到春天就臭了。后来用鱼网拖,一拖一个死人,一拖一个死人。

有的日本兵会说几句中国话,一开口就是要花姑娘。村上人说:“先生,这里没有花姑娘。”他们就拉枪栓,开枪打人。有一次,一个日本兵对我这里(用手指指腋下)开了一枪,没打中,就使劲踢我、打我,我身上有好几处被他打伤了。

姚家边的槽坊是陈起瑞他们兄弟四个开的。后来,陈起瑞被日本人的流弹打死了。那年,他老婆才24岁,从此以后就一直守寡。

3. 陈德武口述^①

陈德武,男,1929年2月27日生,属蛇

调查地点:江宁东山镇(原住上峰镇姚家边)

调查时间:2004年8月6日、2005年7月20日

调查人:费仲兴

1937年,我9岁。这年的冬月初三(12月5日),父母带着我们从江宁上峰姚家边逃到了汤山龙泉的涧南。我父亲叫陈起秉,兄弟四个,他排行老二。伯父叫陈起标,大叔叫陈起瑞,二叔叫陈起发。跑反时,伯父一人留家看守,其余都到了涧南。父亲和二叔回家取粮时,大叔就在涧南照料四房家小(有14人)。

听我父亲讲,冬月初五(12月7日),鬼子先到丁墅杀人。我的老姑奶奶在家看门,鬼子一进村就朝她太阳穴刺了一刀,她当时就死了。接着,鬼子到姚家边杀人。陈德太老人在家门口晒太阳,鬼子对准他嘴巴就是一刺刀,老人立即昏倒在地。这时,鬼子看到前面竹园里躲着不少人(他们是上峰李岗头来的难民),就冲过去把一家老小五口全杀死了。

^① 2004年7月20日,陈德武先生给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张连红教授写了一封关于其亲身经历南京大屠杀的信。根据这封信,8月6日我前往访问了陈德武先生。



陈德武

陈德太醒后就跑到了陈起秉家。陈起秉是开槽坊的,家里有米酒,留在姚家边看门的老人都在他家喝酒,父亲和二叔当时也在那里。大家看到他鲜血淋漓的样子,都吓呆了,纷纷向村外跑,父亲、伯父和二叔等十几个人向村西山坡上跑,趴在村东北坟地上的鬼子向他们开枪,子弹从他们耳边擦过,泥土飞起一丈多高,但都没打中。他们越过了小山坡,向南一直跑到了周家边,躲进了高庄坝的一条坝沟,与藏在那里的100多个老百姓蹲在一起。天黑前鬼子走了,他们才算躲过了一劫。

可是,李岗头来的难民却遭殃了。一个中年妇女在我大婶婶的床上被鬼子轮奸,后来又被鬼子用刺刀插入阴道,绞死在床上,我们跑反回来时,死人还在床上躺着。其余难民和姚家边的陈起兴、陈起旺两位老人,总共30多个,统统被鬼子绑起来塞进了我家大门前的五间草房(当时是做米酒的槽坊)。接着,鬼子点火烧房,30多人全被烧死。我家一条驮米酒的黑毛骡子被鬼子打死在屋后的晒场上,我父亲老兄弟一大家子的10间2厢瓦房被鬼子烧了几次,没烧掉。有的门烧焦了,但未烧到屋里。

冬月初七(12月9日)早晨,第一批鬼子闯进了润南。当时,我正站在门口,鬼子端起枪来就放,枪声响得不得了。我被突如其来的枪声吓坏了,掉头就跑到屋里,躲在母亲和姐姐身边。这时,外面的枪声像放鞭炮似的响个不停。鬼子一边打枪,一边向南京方向开进。天空中有两个

红颜色的大气球,升得老高老高的,飞机来回地低飞,机身上的红疤疤看得清清楚楚。不久,第二批鬼子又进村了,挨家挨户地搜查。我们被鬼子赶了出来,一看,村里到处是鬼子。我们被鬼子赶到一个干涸的塘边,塘底下两个蹊子有水,塘坎下和塘埂上全是被鬼子打死的男人,有 30 多个。塘坎下有个中年人没打死,鬼子下去用脚踩,最后把他一脚踢进水中。

鬼子又把我们赶到一间草房旁边,只见一位中年妇女有气无力地靠在土墙边不停地呻吟,她上衣敞开着,右乳房被子弹打了个大洞,鲜血直流。后来,我们又被赶到草房北面的菜地里,有的妇女被鬼子拖进草房轮奸。这时,有几个鬼子把躲在草房后小山坡上的两个中年男子抓住了。其中一个被拉到村南头东边的晒场上,被当成练刺杀的活靶,你一刀我一刀地活活刺死。另一个则被拉到我们站立的菜地上,仰躺着。一个鬼子拔出东洋刀,从他脖子上戳下去,顿时,鲜血直喷,他哼了一声就死了。

我亲眼目睹了鬼子的杀人场面,心想马上就要轮到我們了,我们一家人肯定没命了,吓得浑身发抖。可是,鬼子把东洋刀在那个死人身上擦了擦,装进刀鞘就走了。就在这空隙,二姐背着我跟了一群难民,随润南一位妇女顺着草房后面的小沟,朝村南的地藏庵逃去。正在逃命的时候,有颗子弹打中了一个小女孩,子弹从她右眼进去,从鼻子中间出来,把她的一只眼球打掉了。她是姚家边陈德其的女儿,才 3 岁。她母亲抓了把烂泥,把血堵住,背着她继续跑,跟我们一起逃到了地藏庵。

躲在地藏庵的老百姓有一二百个,大家挤人。这时,小女孩的父亲气嘘嘘地跑来了,说:“我这条命是拣来的!”原来,他和另外两个男人在一条小巷里走,走在前头的是润南的老光海。不料迎面来了个鬼子,端起刺刀对准胸口就是一刀,老光海哼了一声,晃一下就倒了。他们两扭头就逃,绕过巷口,沿着村边一条小沟,跑进了地藏庵。鬼子向他们开枪,没打中,就这样拣了一条命。等他说完,有人拉拉他的衣襟,指了指说:“你女儿的眼珠子打出来了。”他一听,赶紧挤过去,抱着小女孩失声痛哭。就在他们哭泣的时候,又有人来报信了,说我大叔抱着 5 岁的儿子(陈德双)被鬼子一枪打中小肚子,栽倒在田埂边,肠子都出来了,痛死

在田边,小男孩独自从一里多外的田里跑到涧南,找到了大婶。此外,还有两个难民在涧南被鬼子杀死了。一个是高庄高埝村王明福的儿子,名字不知道,另一个是丁墅的阿梅(小名)。这是后来听我父亲讲的。他还说,在涧南的邻村孟家场,老百姓在村边的山脚下挖了个地洞,躲在里边,结果被鬼子发现了。鬼子就像在鸡窝里掏鸡似的,掏出一个杀一个。

凶讯一个接一个地传来,大家都处在极度恐怖之中,惶惶不安。后来,我们又跟着一群难民走出了地藏庵,躲入附近山上的树林里。天黑前,鬼子的飞机不飞了,我们才从树林里出来。晚上,我们连夜逃到了上峰潭子头,在刺骨的寒风中,在一条石缝里躲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父亲从姚家边赶到潭子头,到了我们身边。看到大家都活着,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接着便把鬼子在姚家边行凶的事讲给我们听。

下一步往哪里逃呢?父亲说:“还是到外婆家躲躲吧,听说鬼子没到那里去。”我们一家七口就到了我外婆家(在上峰孟墓姚岗。解放后,该村因靶场征地而迁移)。可是,第二天鬼子就去了,有的骑马,有的步行。后来,鬼子去的次数就多了,每次都是杀气腾腾的。有一次,一个鬼子骑在马上叫村上一个姓郝的男青年跪在地上(当时我们也在跟前)。他拔出手枪对准了男青年的头。这时,有位叫李柯的老人在纸上写了几个字递给鬼子看,鬼子才没有开枪。后来,这个小青年牵着马把鬼子带到了孟墓,趁鬼子进村找人的空当把马拴好,逃了。天黑后到家,拣了一条命。

我们在外婆家要吃饭的,父亲就回家弄粮食。他每次都用稍袋(小麻袋)装半袋稻谷,搭在肩上背过来,然后用石臼舂成米,煮稀饭吃。有一次他在背粮回来的路上见到一个骑马的鬼子在田间追赶一群老百姓,老百姓拼命地东奔西跑。他舍不得甩下麻袋,跑又跑不快,就躲着看。一个坞塘的男青年被鬼子一枪打中,鬼子又向前追。就这样,父亲才脱离了危险。

汤山的鬼子天天下乡找姑娘,杀人放火,被抓到的老百姓死的多活的少。我的大姐夫芮有道,家住汤山路西塘泽村。他父亲芮朝顺被鬼子抓到了。鬼子要他牵马,可他年老体弱,走不动。走到丁墅西头巷口附

近的水塘边,鬼子在马上举起东洋刀朝他头上劈,劈死后又把他踢进水塘里。我堂弟陈德双的舅舅叫金大和,金大和的父亲在高庄周家边自家门口被鬼子抓住了,鬼子把他推进水塘,再用大粪勺套着他的头往深处推。鬼子走了,他没有淹死,活下来了。在上峰干东的社堂(即祠堂)里,鬼子把三名中央军绑起来活活烧死。

后来安民了,炮校里的鬼子全撤走了,炮校的房子就被老百姓拆个精光。我也跟着父亲到炮校拆过木料,亲眼看到炮校南边广场上躺着七八具男尸。这些人都是给鬼子抬东西的。东西抬到了炮校,鬼子说送他们回家,却把他们当成活靶子打死了。

过了一段时间,鬼子又回炮校了,要重建拆毁的房子。伪保长向各村派工,替鬼子干活。记得我第一次去炮校做工,是大伯陈起标带着我、陈德双和陈恩照一起去的。刚走到炮校门口,作厂的高从松就对我大伯说:“你一个大人带了三个小孩,你是带他们来上学的吗?”他和鬼子哇啦哇啦地说了几句,有个鬼子就恶狠狠地把我们的草帽摘了,把上身的衣服剥光,逼我们回家。我们回到家里,就由当妈的进校干活。干了一天,才把我们的衣帽带了回来。还有一次,我和高庄王家山的王玉池到炮校干活。我们俩在厨房旁边的猪圈门口站了一会,鬼子抓着一把镰刀柄走到我们跟前,不分青红皂白就朝我们打。我头上打出了一个拳头大的包。这时,不管猪圈里有多脏,只好进去了。那天我们没吃上午饭,饿着肚子干了一天,晚上才回家的。

67年过去了,可一想起那段日子的恐怖经历,我的心情就无法平静。日本鬼子到中国来杀人放火,残害中国人,真是禽兽不如。

(2005年7月20日电话补充)丁墅胡家的一个儿媳妇,是瞎子,被鬼子强奸后上吊自杀。丁墅庙前有一段段壕沟,架枪打仗的。庙北部的房子烧掉了,我们跑反回来看到的。

4. 陈恩林口述

陈恩林,男,1926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寺桥(原住上峰镇姚家边)

调查时间:2005年5月10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80 岁，属虎，上峰姚家边的。解放后在汤山供销社和国营商店干，退休后就住在寺桥的公房里，就我和老伴住。

我上到小学三年级，后来就给人放牛、做工，当学徒，做茶食（糕点），也帮人种田。我喜欢看小人书，认识的字就没有丢。

跑反那年我 12 岁，农历十月就跟了我叔叔跑到了江北。我们是从坟头、东流、栖霞走的，在石埠桥过江，住在六合的划子口。我们走了个把月，鬼子就过来了。我父母亲没有跑，就在村子附近躲躲。我在安民后才回来，是坐小划子过江的。过江给多少钱？不知道，大人付的。过了江，白天不敢走，都是晚上走。仍旧走栖霞、东流、坟头那条路，没有从孟塘过。石埠桥在江边，现在可能早就塌到江里去了。

我们姚家边被鬼子打死的人就多了。我爷爷陈起森、我爷爷的弟弟陈起旺是在姚家边槽坊里被鬼子烧死的。有一个妇女被鬼子奸污了，死在床上，我们回到了姚家边，她还在床上。不晓得她是哪个村的。还有李岗头过来的许多难民也被烧死在槽坊里了，后来能认出来的就抬回去了，分辨不出来的就一起埋在一个大坟里了。

陈恩贵的父亲陈德太在家门口坐着，鬼子一刺刀刺过去，把他的半边牙全刺下来了。但没有刺死，活下来了，一直活到解放前一两年。

我们村的陈德顺是个很老实的人，住在村边一间草棚里。有一天，鬼子一把火把草棚烧了，他被烧死在里面。当时他 30 多岁。他和槽坊里的人不是同一天烧死的。

安民后，鬼子还常常下乡捞东西。他们快投降了，还骑了马到我们村上来。他们把马赶到水塘里，鱼跳出来，他们就捞鱼。

炮校的房子都被老百姓拆了。还有东营房、西营房的。当时鬼子都住在“大楼”里，不住在炮校。老百姓先拆门窗，后拆天花板、木料、砖瓦，拆的人可多了。我们小孩也去，拎扇门窗，抬块木料什么的。白天拆，晚上也拆，晚上炮校里叮叮当当的可响了，你也拆，我也拆，有人还把拆下的东西拿出去卖。过了好几年，日本人回到了炮校，又把房子修了修。我 17 岁那年到炮校做小工，到大赤燕给日本人装沙子，做杂活。吃饭是

自己带的,晚上收工时日本人给一点钱。我 13 岁那年在汤山街上拉黄包车,不是拉人,是给日本人拖东西。我们村去好几个呢,干一天,日本人给斤把米。

5. 金忠美口述

金忠美,女,1930 年生

调查地点:上峰镇姚家边

调查时间:2005 年 9 月 6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76 岁,属马,跑反时 7 岁,娘家在上峰周家边。金大贵是我家门大大,他儿子叫金忠军,解放后枪毙了。

我们跑反跑到了仪征,从龙潭过江的。我哥当时生病,打摆子,妈妈背着他,拉着我,到大赤燕就走不动了。我爸爸走一段接一段,挑着我们两个走。在仪征住了十来天,又回营房(地名)住了十来天。

鬼子刚来时,周家边的金立安被鬼子看到了,一枪打死。我爷爷金世盛,当时 70 多岁。鬼子刚来时,用枪拐子打他,牙齿都打下来了,又把他推进水塘。他爬上岸,躲在我娘娘家里,没有死。

李岗头的一个小姑娘,鬼子要强奸她,一个小脚老奶奶去求,结果被鬼子关在姚家边槽坊里烧死了。李岗头的难民,有几十个,在陈起瑞家里被打死了。还有一个小女孩,不知道是哪个村上的,鬼子在姚家边强奸她。她年龄太小了,鬼子弄不进去,用刀把她捅死了。她躺在床上,一条腿从床沿上挂下来,到了踏板上。后来,张星才的父亲把她背到外面,摔掉了。

有个女的,年龄大了。鬼子自己不干,叫一个男的同她干,鬼子站在旁边看。×××的母亲,30 来岁,小脚,胆子特别大。鬼子用大红马把他接到炮校,住几天,送回来,再接去住几天,再送回来。听人讲,鬼子给她不少金器的,但没有人见过。

(村民陈道春补充)听老人讲,村上人都跑光了,奔栖霞。我叔叔叫陈恩普,在栖霞当区长,我们全家都躲在栖霞寺,那里有保护区的,没有

受多大的罪。有的人瞎奔,到处跑。陈起瑞跑到了润南,被鬼子一枪打死,他儿子摔下来了。陈恩贵的老子陈德太,年纪大了,没有走,留在村里了。鬼子看到了,一刀刺过去,弄得满脸是血。他躺下装死,鬼子走了,他活下来了。

在姚家边被鬼子杀死的人有几十个,许多是李岗头人。后来认不出是谁了,就把他们堆在一起,埋在一个大坟里。早些年,李岗头每年都有人来祭祖,后来大坟扒平了。“文化大革命”后,就没有人来祭祖了。

安民后,村上来了个鬼子,抓了个年纪大的女的,又抓了个男的,不是我们村上的,要他同女的干。男的吓死了,硬不起来。鬼子在旁边用枪敲他的头。女的说:“干吧,要不就没命了。”可男的还是不行。

(村民陈淑兰补充)我的外公是在姚家边被鬼子烧死的。他姓冯,是个子山的。他有个孙子叫孙和佩,你到个子山一问就问到了。他的尸体认不出来了,他家的人就跑到姚家边来烧纸钱,再空着抬回去,说要把灵魂抬回家,后来又在个子山弄了个空坟。这件事我知道。

6. 顾言凯口述

顾言凯,男,1923年生

调查地点:上峰镇高庄顾家棚子

调查时间:2004年11月30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2岁,属猪的。跑反时没跑远,就在半边山上转,在龙泉寺里躲躲。1000多号人躲在寺里,就一口井,井水怎么打也打不干。晚上跑回家看看,房子全烧光了。案子桥叉马路那里死了许多人,都是老百姓。

我的一个家门嫂嫂,是教门里的,回族,不吃猪肉的。她丈夫顾言文躲在半边山,被广东兵抓差,跟着走到了麒麟门,被鬼子打死了,尸体都没找到。正月里,她在家没有吃的了,就跟着一些老太太和一帮小孩跑到汤山街上找吃的。那天我也去了,看到汤山街上烧得一塌糊涂。日本人在一锅米饭里挖了个洞,在洞里拉了一泡屎。那饭早就冻得硬梆梆的

了。大家从旁边挖点硬饭吃吃。后来，她挑了一担东西从汤山回家。走到寺庄，在侯于福家附近被鬼子抓住了，拖进屋里强奸。当时我们就站在屋外，没有走。后来听到枪响，知道她被打死了。她的尸体没有抬回村上，我们回去告诉了家门哥哥，他们在夜里去了两个人，把她从寺庄拖了出来。没拖多远，就埋在西山头路口的一个炮台跟前。

上峰高庄庞启明的兄弟，一家子躲在洞里，四五个人被鬼子杀得光光的，尸体摔在塘里。庞启明现在还活着。

7. 韩一华口述

韩一华，男，1923年生

调查地点：上峰镇高庄顾家棚子 31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11 月 30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82 岁，属猪，和顾言凯同年。跑反时，我跑到了苏北的东海县，第二年四月才回来。

我们村就“回子”一家损失得最多，一家四口都被鬼子杀死了。“回子”当时已成家了，姓什么不知道。她家没有后代。

顾言文，“回子”的丈夫，老大。他和老二顾言智在半边山被广东兵抓差，拖去后两个人无影无踪。老四叫什么，想不起来了，是在苏州被日本飞机炸死的。他兄弟六个，只有老五、老六没有被日本人杀死。

（康翠凤插话）我家就在半边山，山上有个八仙洞，那山就是我家的。八仙洞深得不得了，日本鬼子抓住了人就往洞里摔。我母亲今年 83 岁了，她住在高庄，知道的事情多，下次我带你去找她。

8. 卢会英口述

卢会英，女，1945 年生

调查地点：上峰镇李岗头老年活动室

调查时间：2005 年 8 月 10 日

调查人：费仲兴

听我老婆婆讲,我的老公公李世富是在姚家边被鬼子杀死的。第二年跑反回来,她到姚家边去找,认出了他穿的一双棉鞋,就叫人用一块门板抬回来安葬了,那个坟现在还在。我老公公去世时 30 来岁,留下一个女儿 2 岁,一个儿子(就是我老伴)1 岁。现在,我老伴和他的姐姐都去世了,家里就我年纪最大了。

9. 雷兴海口述

雷兴海,男,1940 年生

调查地点:上峰镇李岗头

调查时间:2005 年 8 月 10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66 岁,属龙。我父亲叫雷继财,前年腊月初四去世的,活到 89 岁。跑反那年,他在半边山被中央军拉夫,拉到了南京城里。后来到金陵大学,日本人体检,看手上有没有老茧。他被抓到陆军大学,后来又 到挹江门,许多人跪在地上,日本人一个一个地点名,一共点了 580 个,就在城头上用机枪扫。头一批就扫到我父亲,他的礼帽被打下来了,他就捡起来戴上。突然,肩膀上好像被人狠狠地打了一拳。原来是中了一枪,骨头打伤了,他就躺在地上装死。日本人从城墙上掀土下来,没死的人都乱叫,鬼子用刺刀戳,他没吱声。上峰插花大队三合庄的一个人,叫连保,他身上没中弹,和我父亲倒在一起的。父亲说:“拉我一把!”他没拉,自己一个人跑回了家里,几个月后就吓死了。我父亲躲在一个地方,被鬼子发现了,鬼子端起刺刀向他心窝上戳。就在这个时候,鬼子的长官来叫了,就没有刺下去,躲过了一劫。后来他逃到一个地方,没有吃的,就吃野菜,后来什么吃的也没有了,就吃棉花,拉屎都拉不出来了。后来经过玄武门,一位摆渡的人递给他一只木盆,让他自己逃命,他就逃到了青马、黄马、上五旗那些地方,躲在一个庙里。庙里有不少火柴,他带了好几包。见到一位老奶奶,给她一盒火柴,她就给他一点吃的。后来又跑到西村,那里有他的一个表叔,叫杨富根,他陪着我父亲跑到了坟头附近的官桥,我父亲又被拉电线的鬼子逮住了。鬼子要他拉电线,他

没力气,拉不动,鬼子踢了一脚,让他走了。就这样,他逃回了家里。一路上走了几个月,家里人以为他早就死了。

我父亲肩膀上的伤一直没找医生看过,自己慢慢好的,后来结了个大疤。去世前几年,他看到电视里《南京零距离》节目播放一些老人在跑反时的经历,就说:“我经历的事比他们多得多,电视台怎么不来采访我呢?”后来打电话给电视台,有位小姐接的电话,说过几天来采访,等啊等啊,结果一直没来。

我父亲去世后,我们好长一段时间舍不得去火化。他肩膀上有大伤疤,骨头被打碎过,可以检查出来的。后来一直没有人来采访,时间长了,还是把他火化了。

10. 李昌胜口述

李昌胜,男,1927年生

调查地点:上峰镇李岗头老年活动室

调查时间:2005年8月10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79岁,属兔,跑反那年11岁。冬月初三,我跟了父母亲,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小弟弟(才1岁),和我小爷爷(祖父的弟弟)一家一起跑的。当天跑到了汤山的万安,在那里歇了一夜。初四那天,鬼子到了万安,同国民党的部队打,鬼子向西边打炮,国民党的部队没有还炮,打机关枪,子弹落在水塘里,卜卜卜地响,我们一夜没睡好。打仗时,在万安西边一点,天上有一个气球,碧绿碧绿的,像个大牯牛,有两张桌子那么大,100多米高,慢慢地朝前走。我伸出头看了一会,突然一枪朝我打来,子弹啞啞地响,从我身边擦过,没打着。后来,我们就经姚家边回李岗头。在姚家边的一个水塘里睡了(躺着)十几个人,都是被刺刀刺死的,其中有一个李德坤,是我们李岗头人,20多岁,被刺刀刺死的。还有一个女的,不知是哪个村上的,鬼子要强奸她,她怎么也不肯,就被鬼子刺死了。李盛金的老婆和儿子在姚家边被鬼子抓去了,我亲眼看到的。他儿子才十七八岁,李盛金不敢去救他们,吓得一个人跑出来了。他的

弟弟李盛有，喉咙那里被鬼子刺了一刀，他就躺在地上装死，鬼子踢他，他也没有动。回到家里，喝的水都从喉咙那里淌出来。后来伤口慢慢好了，活到解放后才去世的。

我们回到了李岗头，看到村南“大路塘”里飘着七个人，都穿着棉衣，浮在水面上，风一吹，刮到塘边了。不知道他们是谁，也没有人去把他们钩上来。第二天，我们就跑到句容石狮的沈岗头，在那里住了两夜。后来，鬼子到沈岗头了。有十来个妇女躲在一个地洞里，我小弟弟哭，她们说不能让他哭，我母亲就把他摔在一个水塘里了。他脸朝上，在水面上漂，风吹吹就吹到岸边了。鬼子一走，有人去把他捞上来，放在怀里焐，抱到我母亲手上了。第二天，我们又跑到了土桥南面的张村，在新兴村的水塘里又看到了好几个死人。

那年中秋节，鬼子的飞机3架一组，飞来了9架，后来又飞来6架，战斗机掩护着轰炸机，前前后后飞过来40多架。中国飞机飞上去打，飞得没有日本飞机那么高，我们都看到的，就在附近天空中打。有架中国飞机被打下来了，飞行员跳伞，慢慢地飘下来，我们就跑去看。那架飞机落在上峰郢坊，飞行员落在白合村。老百姓以为他是日本人，拿了锄头扁担去打。他说：“我是中国人，你们不要打。”他穿着皮衣服，身上的皮肤都烧烂了。后来去了七八个警察，把他保护起来，不让大家看。他自己掏出200元钱，有4个人用软杠（两根木棍，中间绑些带子）把他抬到83医院那个地方。那里以前是陶庐，有医院的。那架飞机掉下来，烧得很厉害。这是一架战斗机，飞行员又要开飞机，又要开机关枪。

有一天我们在上课，老师叫我们出来做操。我们看到一架飞机被日本人追上了，冒着浓烟，飞不高了。飞机往半边山飞，飞不过去，又转回来往土桥飞，落在新兴村，没有爆炸，也没有烧。后来这架飞机被拉到湖熟，摆在一面荒场上。16岁那年我到湖熟去当学徒，那架飞机还在那里。飞机很小，座位很窄，就一张桌子那么宽。

当时，学生捡到不少飞机上的机关枪子弹壳，有这么长（约15厘米），大拇指这么粗，拿给老师看的。

鬼子在冬月初三到李岗头，把村上的房子烧了一大半。第二年正月里，住在石狮姚下村的六七个鬼子跑到李岗头来找姑娘，找吃的，捞了

(抢了)许多青菜、赤豆、咸菜,叫村上人送。李盛万的父亲李达扬,30来岁,他吓坏了,摸摸这个箩,又摸摸那个箩。有一个箩里装了一坛咸菜,很重。鬼子用指挥刀砍下一根旗杆,竹子的,叫他们抬。那竹竿吃不消,断了。李达扬就回家去拿扁担,鬼子以为他想跑,就叫他跪下来,解下裤腰带,双手反绑了,又在脚上绕了一圈,然后走到一棵树那里,瞄准他一枪,把他打死了。李达扬死后,一双眼睛一直睁开着,没合眼。

我以前在大队里当过会计,也在乡镇企业里当过会计。公社干部是国家干部,有正式退休金拿的。我退下来以后,有段时间没有给钱,现在每个月给200多元钱。

11. 李荣金口述

李荣金,男,1924年生

调查地点:上峰镇李岗头村西

调查时间:2005年8月10—11日

调查人:费仲兴



李荣金(中)

我今年82岁,属鼠的,跑反时13岁,没有跑出去,全家都留在村上了。当时家里有我父母、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穷啊,没有钱,就没有跑。鬼子是冬月初三夜里十点左右进村的,没有枪声。村上人走光了,

都是往北边跑的,只有六七家没走,还有些年纪大的人也没有走。晚上六七点钟,天全黑了,留在村里的人感到很惊慌,就聚在村上坟山岗那个地方,其中有保长李发桃,还有当过乡长的祁昌富。忽然看到关塘堰村上起火了,又没有一点儿声音,狗也不叫,觉得很奇怪,就叫李四有兄弟几个跑去看看。他们年纪轻,跑过两座桥,离关塘堰不远了,一听,讲话声叽里哇啦的,不对头,知道是日本人在放火,就没敢进村。为了不让日本人进李岗头,回来时就用铁锹把桥板撬掉了。我们在坟山岗等消息,他们回到村里也不给我们讲一声,自己整理整理东西就钻进防空洞(防飞机轰炸的地洞)里躲起来了。保长一个,乡长一个,还有我父亲,他们几个人就开始喝酒。乡长对我父亲讲:“你把几个小孩带到詹家边地洞里躲一躲吧。”父亲就带我们到詹家边,然后他一个人回李岗头。

日本人在关塘堰有向导带着,要到李岗头来,一看桥板没有了,就绕别处过来。到了村上,看到有灯亮着,就端了刺刀闯进来了,对着正在喝酒的几个人。鬼子把地图拿出来,要他们带路。乡长祁昌富一看地图,上面有一条红线,从关塘堰、新桥、李岗头,到大山墩、寺后庙、桑干,一直到陈坊的铁塔。乡长被迫带路,一直带到前村街。当晚,有一部分鬼子就住在李岗头,吃晚饭,点火烧房子。我父亲回到李岗头一看,村上有兵,就躲在草垛后面看,大约有200来个。家里当时还有两斗米,父亲摸到家里,发现门开着,鬼子正在点火烧房子。当时是初三,夜里黑漆漆的,鬼子没有发现他。我家祖上留下来的房子是很好的,有两间楼房,三间草房,父亲一看,吓死了,回头就跑到詹家边,说:“村上全是兵!”没过一会,鬼子跑到詹家边来了,靴子皮鞋的走路声、刀枪碰击声,响得很。他们一家一家地踢门,抓鸡,响声很大。那时候,狗都吓得不敢叫一声。夜里一两点钟,下了层白霜,我们看见日本兵在烤火。他们在亮处,我们在暗处,看得很清楚的。于是,我们就赶忙跑到“平头塘”那里,躲在自己挖的地洞里,离鬼子稍微远一点。第二天天一亮,我们看到李岗头村上的大火像火海一样,几百间房子全烧着了。这场大火烧死了两个人:

我的奶奶,娘家是王家村的,姓王,她有个兄弟叫王家贵。她当时40多岁,躲在夹墙里。那时,家里堆了许多豆萁,火烧得很旺,她的骨头都烧光了,一副金耳环也烧化了。

李岗头现任村长李荣顺的太爷(曾祖父)李发章,当时 60 多岁,是个老木匠。

冬月初三晚上,日本鬼子还杀死了一个人,他叫李荣庭,在壮丁训练队里训练过的。那天下午,村上来了七个广东兵,其中两个带着盒子枪,还有一个带了把号子,其他人都没带什么。吃晚饭时,他们买了两只公鸡,杀得血啦啦的,炒一炒就吃。这几个广东兵饿坏了,用小瓷碗盛饭,一会儿就吃完了。天那么冷,还穿着短裤头,小背心,裤腿就到膝盖那儿。我就去告诉荣庭,说广东兵有两支盒子枪。他对枪特别有兴趣,就跑去看枪了。夜里十点来钟,鬼子进村了,广东兵跑不掉,就在后面楼上躲了起来,那只号筒挂在楼下墙上。日本人一看有号筒,就说荣庭是中央军,把号筒上拴的细麻绳解下来,把荣庭勒死了。七个广东兵从楼上气窗里跳出来,两支枪丢在楼上。鬼子放火烧楼房,火烧得很旺。后来,到了正月里,有人来打听广东兵丢下的那两支枪,问丢在什么地方,他们到灰烬里去找,两支枪都烧成铁块块了。那七个广东兵跑到了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

冬月初四那天,我们还没有走。房子都烧光了,什么都没有了,还到哪里去呢?村上有十来家的人当天就往姚家边走。走得早的过了姚家边,到了万安,走得晚的有两家,就走到姚家边,结果这两家被鬼子杀掉了。

李盛洪一家:他姑娘 18 岁,鬼子要强奸她。李盛洪去护她,日本人就用刺刀刺,当时没有刺死,他女儿趁机逃掉了。他家剩下的五个人被鬼子推到磨坊里,关上门,放火烧死了。

李德基一家:他四婶带了个女儿,还有他五婶,两位婶婶都是四十来岁。这三个女的被鬼子轮奸后推入水塘里淹死了。

轮奸时,鬼子叫李德基的堂叔李世富、堂弟李德良、李德坤以及李达善、李盛有等一起跪下,用东洋刀砍头。第一个先砍李达善,一刀,头滚出去好远。第二个砍李世富,一刀,头也滚出去好远。第三个砍的是李德良,一刀砍下来就死了。德坤和盛有一看,吓得倒在地上了,鬼子就用刺刀戳他们。两个人的食管被刺穿了,但没死。后来,吃饭漏饭,喝水漏水,德坤歇了三四年死的,盛有活到解放后才死。

还有一个望宁岗的女人,十七八岁,叫任冬英,在我们村当童养媳,未婚夫在武汉做生意。她死得最惨。多少日本兵去轮奸她,最后又用一个酒瓶塞进她的阴道,把她弄死了。

冬月初四那天在姚家边一共杀了我们村十二三个人,另有两人重伤。

我们家的房子被烧掉之后,我们就跑到舅舅家去住。他家就在王家村,是我们一个大队的。他们家跑到前村街去了,外婆没有跑。我们就躲在他家的防空洞里,婆婆天天给我们送饭,不让我们小孩出洞。这样躲了七八天,我们小孩就溜出来,到山上玩。山上人很多,都是村民和难民。一天,来了七八个鬼子,见人就开枪。桑干村的周××,背着侄儿,鬼子一枪打死了他侄儿,他还不晓得。第二枪打中他肩膀,他丢下侄儿就跑。第三枪打中大腿,他就躺下了,我们在山上看得清清楚楚。打了几枪,鬼子就到村上烧房子。有间糖坊是草屋,鬼子用一样东西朝上面一摔,房子就烧起来了。接着,鬼子又上山找人,山上的人都跑光了。这时候,有七八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进村救火,不料鬼子又跑回来了。肖家有两个人,姓名不知道,站在中坝埂上朝村里望,鬼子走到他们身边了,都不晓得。鬼子啪啪两枪,把他们两个都打死了。他们是王家村棚子里的,住在山洼子里。他们有后代,名字叫肖明宗。这时,救火的人还不知道鬼子又来了。鬼子跑到村上,把救火的人打死了五个,都是王家村的,那天晚上我亲眼看到的。有个人外号叫“老练”,一枪打在后脑勺上,脑汁淌出来一大堆,七八天都没有死,趴在那里哼。他没有知觉了,最后还是死了。还有一个人打中了手臂,打的时候不疼,到了后半夜,疼得妈妈叫,叫了两三个小时,边叫边在地上滚,把一块砖场都擦干净了。第二天,一只手臂断下来了,被狗叼走,他也痛死了。

冬月初七,鬼子在陈坊铁塔那里打了败仗,退回了李岗头。鬼子看到有个民夫额上有帽箍,就开枪把他打死。另外六个民夫吓得都跑了,鬼子一枪一个,把他们全打死。这七个民夫不是李岗头的,有西庄的五个。

冬天初七那天,鬼子在村上找花姑娘,找吃的,找到了李华冲。他当时60多岁,在村上蛮有点名气的。他的儿子有点神经病,同鬼子讲话声

音高了点,鬼子一刀砍上去,没杀死。李华冲跑过去讲理,鬼子把父子俩推到磨坊里,门一关,放火就烧,他们两个都被烧死了。

冬月初七初八的样子,扣扣的奶奶在村上带了个 11 岁的孙女,鬼子要强奸小女孩。扣扣的奶奶和李盛功的奶奶、李盛×的母亲去求情。鬼子一枪打在扣扣奶奶的屁股上,又开了两枪,把三个老奶奶都打死了,那小女孩跑掉了。

还有四个人,是在别的村上被打死的。

冬月初一,中央军在土桥。后来,土桥那里过来了一批穿黄呢子衣服的兵,穿皮鞋,好得不得了。住在上峰的广东兵听说后很不服气,有一个班的兵跑到土桥去看,问他们是什么部队,那边打枪过来,打伤了两个。伤兵抬回来了,还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兵。

李盛义,以前当过区长的,带了老婆和兄弟跑到邻坊,被打死了。

壮丁训练队的教官李达全,穿得很气派,到他岳母家去,在那里被打死了。

李达财,初三那天被抓夫,抓到桑干,想跑,被鬼子打死了。

第二年二月里,跑反跑到苏北仪征东沟的李发桂、李盛清坐划子船过江回家。李盛清手里拎着一只亚西亚油箱。刚下船,鬼子上去检查,问油箱是谁的,二话没说,对准李盛清连刺两刀,掀在江里,死尸都没有找到。李发桂回家里就哭,给大家讲那只亚西亚油箱的事。

冬月初三,鬼子住在村上的时候,他们烧了一锅米饭,没吃完,就在中间挖个洞,在洞里拉了一泡屎,我回到李岗头亲眼看到的。

腊月初七那天,特别冷,水塘里的冰有寸把厚。两个鬼子把祁世才叫到“西塘”(在大队部那里),用枪托在冰上打了一个洞,叫祁世才脱下衣服往洞里塞,一件一件地脱,最后脱完裤头,赤条条的,叫他下洞,用刺刀按着他的头,叫他吃闷子,两个鬼子站在一旁哈哈大笑。世才从洞里出来,把一件件的衣服带回家,衣服很快就冻了。他人缘好,左邻右舍都拿被单来,把他盖起来,他睡了六七天才还阳,才有点热气。

同一天,另外两个鬼子,把李盛财带到“八亩塘”,也是敲开一个洞,叫他一件件地脱衣服,然后下水,吃闷子。盛财同邻居关系不大好,没有人去帮忙。他老婆用稻草把他围起来,坐在稻草上压住,他在下面一个

劲地发抖,过了十来天才还阳。

正月里,住在石狮姚下村的六七个鬼子到村上来要花姑娘,要菜,叫李达扬等几个人送货。李达扬吓昏了,一会儿摸摸这个箩,一会儿摸摸那个筐。有一箩咸菜,一筐赤豆,还有一筐青菜。那箩咸菜特别重,鬼子砍了根竹旗杆,叫他们抬。可那箩咸菜太沉了,一抬,竹旗杆就断了。李达扬回家去拿扁担,鬼子以为他不肯干了,就追上去抓住他,叫到水塘前头,背向水塘。鬼子把他双手反绑起来,又解下他的腰带,连在脚上,开枪打死了。

每年到了冬月初三,我都想把跑反时候的事情同年轻人讲讲。我们不讲,年轻人就不知道了。现在我(从大队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了,想讲也没有机会了。你帮我写下来,这就太好了。写好后还要修改几遍,改好了再印给大家看。

12. 张延兴口述

张延兴,男,1931年生

调查地点:上峰镇阜东水西村33号

调查时间:2005年9月14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75岁,属羊,跑反时才7岁,有些事有点印象。比如,鬼子把村上的人集中到一面场上,这个看看,那个看看,要打就打,要戳就戳一下,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后来,过了一年左右,鬼子到村上来抢东西,挨家挨户地搜。我家没什么值钱的,鬼子拣了几件衣服,一包,往刺刀上一挂,要走。我就去求鬼子,让他还给我们。鬼子不给,要我跟他走一段再给,他那个意思我明白。我跟着他从水西村走到马墟头、寺边村,一直跟到黄梅桥鬼子的据点那里,他才把小包包还给我。

炮校的鬼子叫老百姓去做苦工,我家就叫我去顶,我们村去了好几个。大人做苦力,我干啥呢?鬼子就叫我给他捶背捶脚。后来,鬼子叫我进厕所,他把裤子脱了,叫我摸他的鸡巴。我不肯,他就给我两个老昏(打了两个巴掌)。我只好给他慢慢地摸,他舒服一点就走了,让我跟村

上的人一起回家。那个鬼子是个当官的。时间嘛,顶多是鬼子来了年把年。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愿意到炮校去顶工了。



张延兴(左)

跑反时,我和父母亲留在家里了,没有跑。我父亲老兄弟四个,大大(伯伯)家富一点,说:“帮不了你们什么忙。你们三家,每家只能带一条根出去。”后来,他就把我哥带到了江北,我哥比我大10岁呢。我们村到江北去的人多呢。也有的往南跑,到了赤山湖。出去就等于是要饭。

鬼子在朱家山那里一次就打死了13个人,大部分是我们村的。鬼子是从新塘下来的,到了朱家山,发现有老百姓躲在田边,就吆喝,叫他们坐在一块,然后开枪打死。他们叫什么,我不知道,等会我带你去找几个年纪大的人问问。

我50岁就退下来了。当时在东岳庙联中当校长,教育局长找我谈话,说子女顶职,这是最后一批了。让我考虑考虑。我就让二儿子去顶,叫他到小学里去当老师。现在,他们夫妻俩都在东岳庙小学教书。我一个月拿1400元退休金,在家浇浇花,生活很好,知足了。

13. 张福祥口述

张福祥,男,1927年生

调查地点:上峰镇阜东水西村

调查时间：2005 年 9 月 14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79 岁，属兔，跑反时留在村里了。我叔叔跑到了江北，是什么地方，不知道。

鬼子是冬月里进村的。冬腊月里，鬼子正在大凶杀的时候，他们在我们村上弄了许多鸡鸭猪，叫四个民夫送到新塘东营房。四个人送到新塘就拿着扁担回来了。路上碰到两个鬼子，他们跪下来求，就在朱家山塔子塘那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奶牛场那里，鬼子开枪把他们全打死了。

一个是黄福亮的五爷，小名叫小牛，德字辈的，不到 20 岁，大名可能叫黄德明。还有一个是黄天成的叔叔，叫黄明荣，三四十岁。另外两个想不起来。

万福家的房子和我家的瓦房全被鬼子烧掉了。鬼子用硫磺弹往屋顶上一摔，房子就烧着了。我家的稻谷全烧糊了，我们吃了一 year 枯米。

鬼子烧房子是想叫躲在屋里的姑娘出来。有个姑娘被鬼子强奸了，但没有弄死。

14. 黄万福口述

黄万福，男，1920 年生

调查地点：上峰镇阜东水西村

调查时间：2005 年 9 月 14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86 岁，属猴，跑反时跑到了营房口的张家湾。

鬼子杀死了我们村上的四个人。一个叫黄德明，小名“矮子”，一个叫黄明荣，他们都是三四十岁年纪。还有一个是刘根宝的大大（伯伯）刘长寿，当时 40 多岁。再一个是雷炳富。就这四个人，没有别的了。

鬼子叫他们四个去送差，他们躲在拐弯角落里。有两个鬼子从郭干过来，看到塘边上有老百姓，叫他们站住，他们就站住了。鬼子叫他们坐下，他们就坐下了。后来就全被杀了。

15. 黄万和口述

黄万和,男,1925年生

调查地点:上峰镇阜东水西村

调查时间:2005年9月14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1岁,属牛,13岁跑反。十月里,听到风声就跑,跟了母亲和姑夫一家人一起跑的,跑到安徽太平青阳,在那里住了13个月才回来。鬼子在我们村杀人的事是回来后听人讲的。

我们是跟了句容开茶叶店的朱怀宣一起在南京坐小船走的,他年年到安徽收茶叶,认识那里的人。这条船被一艘大船挂断了桅杆,我们的包袱掉到江里了,证件丢了。后来到安徽,办了张假难民证。有了难民证才能领到粮食,才有人接济。

我们坐船到万几,在太平就同朱怀宣分手了。太平那里全是高山,八九点钟还看不到太阳。到了青阳,就全是平地了。太平的米便宜,一元钱买40斤,柴也不用买,这么粗(比划了一下,约40厘米)的松树都当柴烧,有的是。那里出毛竹、茶叶、木柴,村子都很小,一个村只有两三户人家,我们有钱也不敢花,怕土匪。

水西村有个姓张的绅士,秀才,他的官比大队书记还大,管16个村呢。他家原来准备跑到武汉去的,后来看看稳定了,就没有再跑。

从青阳回来的时候,那里的公路全破坏了。回来时,那边有人送,家里派人接,走旱路。迎春(一个人的名字)用小车推着四个小孩,一直推到溧水的红塘铺。

我16岁那年到炮校里给鬼子挖过地窖子(地洞),村上去了好几个人。干活不给钱,管一顿饭,有米有麦的,菜是日本的小鱼干,蛮甜的。日本人还不错,干一小时休息一下。他们当官的吸锡管烟,当兵的抽雪格拉牌子的香烟。带队的是作厂的高从松,三十来岁,这个人坏得很。他怕我们跑,中午把我们关在作厂的五神庙里,给的东西也吃不饱。后来我们到言家村亲戚家里要了点吃的,才吃饱了。他是个恶人,专门替鬼子办事,人人都恨他。他个头不高,人长得蛮标致的,留了个西装头,

洋头,穿的衣服倒很一般。

日本人还不算坏,坏就坏在汉奸身上。日本的小兵也蛮好的,我们在作厂买了油条,给他们吃,他们不吃,他们自己买。他们在炮校里头是吃不上油条的。

我们村就是日本人进村时打死了四个人,没有别的人被打死。朱家山的情况我不清楚,只知道一个人被鬼子打死了。我们在安徽的时候,朱家山有人写信过来,说朱怀春到新塘西营房去捞东西,被鬼子看到了,打死了。朱家山的人听到这个消息后高兴坏了。朱怀春这个人个性太强,他一死,人家就高兴。

16. 朱世州口述

朱世州,男,1939年生

调查地点:上峰镇阜东朱家山

调查时间:2003年3月25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65岁,家住江宁上峰阜东大队朱家山。听我父亲讲,1937年底跑反时,我们村遭到了日本兵的屠杀,农历冬月十二那天,全村有12人被杀,我奶奶朱韩氏、叔叔朱××(小名小管子)和姐姐朱带弟就是在那天被日本兵杀害的。当时,她们三人躲在村边一个水塘边上的地洞里。一个日本兵骑着一匹大马经过那里,发现了我叔叔,就开枪把他打死了。我奶奶一看,吓得直哭。鬼子又开一枪,把她打死。后来,又发现了我姐姐,又开枪把她打死。我姐姐当时才4岁,我叔叔也不到20岁,没有成家。

跑反时,我们朱家山有三十来户人家的住房被鬼子烧掉了,我们家的两间房屋也烧光了。听我父亲讲,日本人放火烧房是不用火柴的,他们用一种小片片,擦着后往屋里一摔,大火就很快烧起来了。在句容黄梅桥贾母巷,除一间房子外,其余民房统统烧光。后来,贾母巷的老百姓一直住在草棚里,多少年都没有翻过身来。

17. 朱世清口述

朱世清,男,1914年生

调查地点:上峰镇阜东朱家山

调查时间:2005年9月15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92岁,属虎。跑反时没跑远,最远就跑到句容侯家边。

鬼子是冬月初三下午进村的,叫我哥朱怀莹带路,去李岗头,他到了那里就溜回来了。冬月十二早上八九点钟,鬼子又到我们村上来了。他们一来,把怀新家的六间房子烧掉了,把碾坊也烧掉了。他们追怀新的姐姐,见到人就开枪,那天一共打死12个,我记得的有:

朱怀仁夫妻俩,在朱家山村外打死的;

朱怀东的母亲;

朱怀东的弟弟,小名小管子,十二三岁;

朱怀如,瞎子,40多岁。他是朱冬美的父亲;

朱怀亮,六七十岁,他躲在别人家里,鬼子烧房子,他被烧死了。

冬月十二那天,鬼子在我们村上一走而过,没有多停留。鬼子来了个把月的样子,我们村的陈惟钧穿了件紧身的灰衣服,有点像中央军,被鬼子看到后打死在大赤燕。他是裁缝,那套衣服是他自己做的。

跑反过后,我们村的朱怀春到新塘东营房去掳枪,他一个人背了四五支,被鬼子军官发现后开枪打死。

我16岁开始在汤山学理发,鬼子打来时快满师了。后来一直理发,前几年还给人理的。

陶庐里有澡堂子,做生意人和小军官去的多,洗一次要两三元,普通人洗不起。中央的大干部都在俱乐部里洗,蒋介石的私人公馆就在里面。张静江也有个公馆,在陶庐南面。陶庐是平房,四周一转都是走廊。蒋介石的副官胡绍昌,浙江人,是俱乐部的内当家,待人蛮客气的。

鬼子刚来时,汤山自治委员会的会长是陈兴发,号德洲,汤山街上人。蒋介石还都后,他就跑了。

18. 朱世灿口述

朱世灿,男,1928年生

调查地点:上峰镇阜东朱家山 27 号

调查时间:2005 年 9 月 15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朱世灿

我今年 78 岁,属龙,跑反时 10 岁,上小学二年级。鬼子投降后,在江宁师范读了两年,1950 年回来种田,当过小队会计。

跑反时,我和父亲没有跑,我一天也没有离开朱家山。家里有三条牛,两头骡子,父亲把牲口牵到地窖子里,那骡子一声不叫,牛也一动不动。那地窖子在上海开战时就挖了。我们先挖土,再加盖,用木头一根一根盖住,上面再铺土,后来又种上了小麦,洞门口用地瓜秧子挡住,别人看不出来是地洞。地洞有这房间大小,能住好几个人。那时候,朱家山附近都是大树,从远处看不到村上房子的,炮校的马匹都躲在这里。

上海开战后,日本人的飞机就过来轰炸南京了,三架一飞,飞得很低,上面的亮月疤疤看得很清楚。那年,也是中秋这个时候,炮校一个站岗的用步枪打中了一架飞机的油箱,飞机冒着烟向土桥飞,我们都看到了。后来,飞机掉在南圩,鬼子的飞行员被当地老百姓打死了。从那以后,鬼子的飞机就不敢低飞了。

张学良的东北军穿黄颜色衣服,刘湘的四川兵穿灰色衣服。上海打仗,刘湘的四川兵在朱家山住过的,名义上是学兵队,实际上是特务队,当兵的个头都不高。鬼子打来前,在黄梅桥看桥的有一个连。在搭子桥看桥的有十来个,听口音,他们好像是四川兵。鬼子从句容打过来,走潘家边、新塘、贾母巷、郭干、李岗头,没有经过黄梅桥和搭子桥。那时候,通讯条件不像现在,鬼子打到南京了,他们还在守桥。冬月十一晚上,搭子桥的老刘湘兵跑到朱家山,我大大给他们烧饭吃,还花了50元钱问他们买了一支快慢机。冬月十二早上,守黄梅桥的一个连撤到了水西村,他们有轻机枪、迫击炮。有两个老刘湘兵守在水库西边的土地庙里,被鬼子发现后打死了。我们村上一个姓罗的跑过去,把他们丢下的一挺机枪摔在水里,然后躲进自家的地窖子里。过了一回,来了二十来个骑兵,向朱家山村南跑,跑到对面山上,又跑回我们村,后来向横塘去了。要是他们到水西村去,他们村就惨了。

我三舅陈世荣是黄梅桥潘家边的,他和四舅陈世江都被鬼子拖差了。四舅一直跟到了城里。三舅跟的是步兵,鬼子让他背电台,收发报机,到了涓塘休息。在孟墓陈坊的铁塔那里,广东兵同鬼子打了一仗,三舅是甲长,他会爬,没打死,那些不会爬的鬼子都被打死了。第二天,日本飞机过来扫广东兵,那一仗打得很厉害。三舅给我说:“我的命是捡来的!”他后来一直跟鬼子到了光华门,一路上没有人阻挡。

冬月十二那天,来了两个鬼子,一个拿轻机枪,一个拿刺刀,到村上来找花姑娘,见人就开枪。当时,躲在附近地窖子里的人太多了,幸亏有树挡着,鬼子看不到,要不,杀的人还要多。那天杀死了12个,都是我们村的。他们讲了7个,还有5个,我记得的,你一个记:

朱世佩的岳父,70多岁,姓啥不知道;

朱世精的老婆,不到30岁;

任德喜的哥哥,当时10岁,和我同年的;

朱德阳的弟弟朱德刚,当天没有死,过了两天死的;

朱世炳的母亲,当时50多岁。

腊月里,快过年了,有人说西营房的鬼子都撤走了,我大大朱怀春就去捡枪。他只捡枪,不要别的东西。谁知道鬼子没有走光,他被鬼子打

死在东营房下垓的塘里了。后来我父亲去找,把尸体抬回来了。

水西村的四个人是在我大大打死之前在朱家山被鬼子打死的,是哪一天,不知道。他们是给鬼子送差的。那天,鬼子在我们村也抢了好多东西,把我家的一头骡子骑走了。鬼子骑着骡子,父亲叫我在前头牵。我一直牵到西营房,鬼子下来了,不要了,我就骑回来了。水西村的四个人给鬼子送完东西,扛了扁担就往回走。从下塘圩过来两个鬼子,看到这四个小伙子扛着扁担,把他们开枪打死了。

19. 韩秀珍口述

韩秀珍,女,1933年生,朱世灿之妻

调查地点:上峰镇阜东朱家山27号

调查时间:2005年9月16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73岁,属鸡,娘家是汤山街上的。

我父亲叫韩德诚,开槽坊做酒的,养了不少牲口,全套东西都有的。他原来是青林刘岗头的,姓华,招女婿过来后改姓韩。那时候,我娘家是很有钱的。

跑反时,父亲把全家送到北圩,三个哥哥后来又跑到苏北,我们几个女的住在北圩亲戚家里,那时候我才5岁。听我母亲讲,父亲带着他亲侄儿,也就是我的堂兄,一起回汤山看看,到了大赤燕,他们两个被山上下来的鬼子开枪打死了。母亲找到了他们的尸体,把他们葬在街上了。后来又迁到汤山新菜场附近,墓前有碑的。坟墓的位置,你到汤山去找韩正友,他知道,他是我们本家的。我二姐韩秀英嫁在寺庄,男人叫陈其红,她可能也知道。我父亲被杀害的地方,究竟是大赤燕还是小赤燕,可以去问问他们。

20. 时存福口述

时存福,男,1927年生

调查地点:上峰镇宁西桥东11号

调查时间：2005 年 10 月 8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94 岁，属鼠。

跑反那年，冬月初四，下午三点钟的样子，有一支人马从黄泥山（朱家山南面）过来。村上自卫队的人认为来的是中央军，就敲锣打鼓地去迎。快相逢了，发现不对头，他们打日本的旗子，有步兵也有骑兵，就想跑。时存才比我大一二岁，他胆子大，走向前去迎。鬼子一把抓住他，要他带路。鬼子还抓了另外一个人。两个人带到桥东村上，鬼子一刀就把那个人杀死了，时存才吓坏了，故意带了鬼子在村里转来转去，趁鬼子不注意就跑掉了。鬼子在村上放火烧房子，三分之一的房子被烧掉了。鬼子走后，村上人回来救火，有的房子没被烧掉。

那天有三个人被鬼子杀死了，一个是时文举，小名叫“小虎”，还有一个是时文珠，再一个是万家的万中新。鬼子在村上把一个李岗头人的老婆强奸了。雷岗头有个女的，长的蛮漂亮，鬼子经常把她带到姚下（村名）的营房里去，雷岗头的房子就没有烧。

隔壁有个人叫时鸣九，是国民党江宁县县长的秘书，我在他家打工。我没有文化，但讲话讲得过人家，他们有事就叫我过去讲，去解决。

新四军的李贯一经常到时九鸣家来，时九鸣掩护他，保护他，我就同他经常来往，听他讲国家大事，就成了朋友。后来，李贯一在张府仓吕布老四家召集保长开会，陈四麻子去告密，鬼子把机关枪架在门口扫。李贯一从后门逃了出去，过河时被打死。他一死，不少人就不敢出头了。要是李贯一活下来，肯定当上大官了。

21. 时存富口述

时存富，男，1927 年生

调查地点：上峰镇宁西桥东 46 号

调查时间：2005 年 10 月 8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79 岁,跑反时 11 岁。冬月初四上午,鬼子还没有来,我就跟了我母亲和一大家子的人跑到句容的王家边(在桥东正南约 5 公里),我父亲和四哥留在家里看门。

我们村有个人叫高德军,是国民党的一个乡长,他留在村上没走,想给路过的中央军败兵烧饭吃。突然,来了一帮人马,他一望,发现他们的帽徽是两个叉叉,就知道他们是日本人了,高喊:“东洋人到了,赶紧跑!”有一个保护他的乡丁被鬼子一枪打死了。他是万家的,名字不知道,我知道他是万长正的儿子。

晚上,鬼子在村上捞鸡杀鸡,捞猪杀猪,拿米做饭。他们用三口大锅煮饭,有一锅没有吃,中间挖了一个洞,解大便在里面。半夜里,他们就走了。后来,村上老百姓回来盛饭吃,一开锅,臭死了。这件事是看到过的人讲的,我没看到。那些见过的人都去世了。

后来,鬼子住在西营房、东营房,天天到村上来,有时一天来十几次,三个五个,七个八个地来,要姑娘。没有姑娘,就用小棍子在头上敲。我们做了小旗子,上面画一个红亮月疤疤,去迎。你不迎,鬼子就要来杀人烧房子。

冬月初四以后,我们就睡在野外塘口里,就是小水塘边上。地洞里不敢睡的,鬼子见了地洞不敢进,用火熏你,吃不消。我们在塘口里睡了个把月。

有一天,来了个鬼子,身上有枪有刀的。时存才力气大,胆子也大,他找我大哥,说:“我上去把他一把抱住,你去夺刀夺枪!”村上人都胆小,不准他们这样干,说:“不能弄啊,他们要把全村的人都杀光的。”时存才就没有弄成。

鬼子来了个把月的样子,又进村来了。我家的房子被烧掉了,门口堆了许多枯焦木,把门挡住了。鬼子叫时存元把这些枯焦木搬走,他的动作慢了点,鬼子就用刺刀戳他的肚子。鬼子一戳,他一弯腰,刺刀刺进去就不深,流了点血。鬼子想抓他的肩膀,他又一弯腰,挣脱掉了就跑。鬼子又抓住了我三哥时存顺,要杀他,叫他跪下来,用刀架在他脖子上,我父亲就跪在地上求鬼子。当时,我就站在旁边,扛了一面小旗子,对我父亲说:“爹,你过来吧!”鬼子以为我在骂人,就不杀我三哥了,用刺刀对

准我的头斩下来。我戴的一只棉帽子砍出了一条口子,有三寸来长。当时我只听得“咕咚”一声,头上马上就冒血了,淌得肩上身全上全是。我四哥随手拿了一只帽子,把伤口捂住了。鬼子走了,我们就找布把伤口包起来。第二天,跑到了句容的戎岗头,歇了两天,又回到家里来了。那时年轻,血脉旺,没有上药,说好就好了。

鬼子斩过我的头之后就到桥西。他们站在桥上招手,叫人到桥上来排队,一个个站在桥边上。排好以后,用力一掀,把人一个一个掀到桥下河里,他们自己站在桥上哈哈地笑。那天就来了两个鬼子,都是三十来岁。只有一个鬼子动手,另一个鬼子站着看,不动手。

又过了个把月的样子,句容贾母巷有夫妻俩带了个1岁的小孩躲在黄泥塘的塘口。鬼子来了,夫妻俩都向他磕头。鬼子一望,开枪把他们两个都打死了。那个1岁的小孩还爬在他母亲身上吃奶,非常可怜。当时,我们村上有个老头同他们躲在一起的,他看到了,后来就跑掉了。

那天被鬼子打死的人有三四个呢,我们村的小虎,拿着被子、被单,背上还搭着一只鸡。鬼子看到了,老远一枪,把他打死了,就在村东的岗岗那里。

还有一个人是郭干的张顺强,从我们村边上路过,上了岗,被鬼子看到了,一枪打死,我亲眼看到他睡在地上的。

我们村上的房子大半被鬼子烧掉了。跑反回来后,大伙都住在一个大财主家的柴房里,挤在一起,住了一年。后来,各家用烂草盖了点草房。

后来又有了土匪,到有钱人家去大吃大喝,抢他们的钱。那时候,有钱人也难过。郭干有个大财主,土匪上他家,吃喝完,把匣子枪一掼(摔),说:“拿120块大头来!”他说:“没有钱。”土匪就把他的衣裳剥光,在灶膛里点火,把他架在锅上烤。他受不住了,就喊:“先生,先生,有钱,有钱,就在地窝里!”把钱给了土匪。

听说在句容侯家边那里,鬼子把一个人的双眼用布蒙起来,手捆住了,推到水塘里淹死。鬼子就是拿中国人开胃(寻开心)。我们村和别的村都有好几个妇女被鬼子强奸的,我们恨鬼子恨得叠堆的(恨极了)。

22. 皇甫从愷口述

皇甫从愷,男,1919年生

调查地点:上峰镇阜庄前新村

调查时间:2004年9月2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6岁,属羊,动脉硬化,走路不便了。

跑反时,鬼子在西岗头一下子就杀死了22个人。你知道为什么要在西岗头杀人吗?原来鬼子在西巷找妇女,就两三个人,西巷的人就反抗,鬼子人少,不敢动,心里就记仇了。第二天,这两个鬼子带了许多人来报复了,报错了村名,结果就跑到了西岗头。那是正月初几杀的,我记得有一个裔景贵,还有小三子、克俭、曹友恒。曹友恒是曹洪宝的父亲。跑反回来,他从高庄亲戚家来,人家告诉他不要到上头(指地势较高的西岗头一带)去,可他要到上头去看她姐姐,结果就在那里被鬼子杀死了。

鬼子打过来之前,有两个炮校的人跑到我们村上,说新塘袁家桥(是一座拱桥,在庄里交界外)有两个中央军的伤兵没人抬,要去两个人抬到南京。我们村的张有炳和皇甫从文一听就自告奋勇地去了,还说不要钱的。在那个非常时期,胆小的人是不敢去的,他们两个胆子大,自告奋勇去,因为都是中国人,他们爱国。

我是冬月初四跑反的,鬼子马上就要进村了,我们就往西跑,跑到了湖山的将军庙,碰到了汤贤正,他早十天就跑到江北了。那天,他骑了头毛驴,想回汤家看看,弄点粮食。我后来就跟了他跑到江北,他告诉我说,江北是太平的。

我兄弟五个,我是老二,父母带着我们一起跑。那年我19岁,我们都还没有结婚。在江北,我们住在水槽里,鬼子去的少。冬月初四出去,腊月三十回来。回来后就一直沒有去江北了,在附近五六里的地方躲躲。

冬月初四,鬼子把我们村的陈桂林(70岁左右)和皇甫世善(40岁左右)打死了,是在村上开枪打死的。

正月十三,鬼子又把我们村的皇甫文华(40岁整,属猪的)打死了,我

亲眼看到的。那天，鬼子要同他摔跤，他就去了。他摔败了，鬼子叫他开路。他走出去十来步，鬼子就向他开枪了。他倒了下来，当时没有死。如果有人救，还能活下来。可没有人能救，他夜里就死掉了。

寺庄有一个人，就是我舅妈，当时 51 岁，留在家里看门，没有跑反，鬼子来了，她拱在草窝里，一个鬼子向草窝里开了一枪，扒出来一看，是个女的。另外有两个鬼子军医，想给她医的，但后来没有医，她就死了。我舅父叫侯广德，舅妈的名字不知道。

在西庄，鬼子一次就打死了 13 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大多数是大岗头的。有一个人叫时高才，他没有打死，逃了回来，这件事是他给我讲的。他说，鬼子一进他们村就拖了许多人，拖到西庄的山凹子里给鬼子干活，结果被打死了。

跑反时，我看到不少中央军的部队。冬月初四，头天夜里住在锁石，睡在老百姓家里。半夜里，狗不停地叫，一看，左一队右一队的中央军在往东跑，两三百人一队。冬月初五，我们到了湖山，中央军还在往东边开。就在那天，中央军在大赤燕同日本人打了一仗，枪声响了好长时间。中央军打败以后就退到八卦洲。这个事我怎么知道的呢？我到了江北，就天天看有没有船过江。隔了三四天，我们村上九个人坐了一条船从江北往南开。船老板想去八卦洲拣点东西，让我们上船给他们壮壮胆。船开到了八卦洲，有好几个中央军的士兵想搭乘这条船往江北去，船老板不肯。我们九个人说：“是救命要紧，还是捡东西要紧？”后来，老板让他们上船了，一人交一元钱，开到了江北。有一个排长，千恩万谢，说江心洲有八九万人呢，没有船，无法过江，急得不得了。后来我们在江北一说，那里的人家家都有船，就在夜里开船过来，把八卦洲的中央军一船一船地渡江，带到了江北。中央军八九万人就靠着老百姓的船过了江。里面有团长、旅长、师长，还有军长。

过了几天，日本人的军舰到了八卦洲了，开炮轰炸。日本人在江阴江面上遇到了沉船封江，耽误了好几天。要是早几天过来，中央军这八九万人就过不了江了。

23. 皇甫贤荣口述

皇甫贤荣，男，1924 年生

调查地点：上峰镇阜庄西庄

调查时间：2004年11月15日

调查人：费仲兴

跑反时，我们从丁墅跑到个子山、坟头、东流，再过长江，到瓜埠。后来回到家里，原来的三间楼房烧光了，前面的两间平房烧掉一间半，剩下半间还能住人，我们就铺地铺，住在里面，白天还是躲在外面。那时候，村边、田边、塘边到处是死牛死猪，村上大部分房子被烧掉了，到处是烟味苦味。许多人没房子住，就到炮校去拆房子，弄木料，有人还把木料拉到土桥去卖。我到了第二年冬天才去炮校，那时炮校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我想弄点砖回来砌个灶台，结果被自卫团的人抓到汤山陶庐，关在日本宪兵队住的地方。一起被抓去的有十来个人，一个个站着，排成一队。日本人打井水浇我们，每人浇三桶，冻得我们受不了。当时是冬天，都穿棉衣棉裤了。鬼子用棍棒打我们，每人一棍。此后送到伪警察局，日本人就不管了。我们在警察局里关了半个来月，家里人天天来送饭，一天送三次。

据我所知，我们村上被日本人杀死的就皇甫大森一个人，他的头被砍下来了。后来要安葬了，他女儿一针一针地缝了上去。皇甫大森的孙子叫皇甫贤顺，你可以去问问他，他当过大队主任，现在退休了。

24. 皇甫志圣口述

皇甫志圣，男，1922年生

调查地点：上峰镇阜庄西庄

调查时间：2004年11月23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3岁，属狗。15岁到上海学皮鞋生意，16岁时鬼子打上海，炸弹就炸在我们头上，我没回来，19岁回到西庄，后来就没有去上海。

皇甫大森是我叔叔，他儿子叫皇甫志贤，比我大1岁。志贤亲自给我讲，跑反时他们在西庄弯塘遇到了鬼子，鬼子一共抓了21个老百姓，

一个一个问：“挑得动东西吗？”许多人都说挑不动，只有两个人说能挑得动。志贤他说能挑得动的，鬼子就叫他和另外一个人挑了东西走，另外19个说“挑不动的”全被鬼子用刺刀刺死了。皇甫大森就是那天被杀死的。19个人里头，只有他一个是本村人，其余都是外村人。死尸推在弯塘里，水都染红了。收尸时，有的人头连着身子，有的头砍下来了。

跑反期间，我母亲（姓胡，娘家是丁墅的，当时50岁左右）在高庄西面给大女儿看门，她在山上看到鬼子来了，刚喊完一声“鬼子来了！”就被鬼子一枪打死了。后来，是我哥哥去收尸的。

皇甫志贤给日本人挑东西，一直挑到紫金山。有子弹打过来的时候，日本人把他按倒在地上保护他。后来，鬼子开了证明让他回来了。

皇甫贤正今年82岁，是我同一个太爷的本家。他年纪大，你可以去问问他。

25. 曹道芳口述

曹道芳，女，1924年生

调查地点：上峰镇阜庄西庄六队

调查时间：2005年4月26日

调查人：费仲兴

西庄一共有七个队，我们这里是六队。我今年82岁，属鼠的，娘家在西庄大村上。跑反时，我跟了父母跑到江北，保长写了难民条，村上大多数人一起跑的，少数人没有去。在江北什么地方不知道。只记得跑到豁子口，还有一个地方叫寡妇街，那里房子都烧光了。我们在张王庙住了两夜，鬼子去了，人吓得不得了，就跑回来了。我们村上的房子全烧了。附近一带挖了许多战壕，有的窄，有的很宽。石地村稍为好一点，我们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在侯家边也待了一段时间，在亲戚家过的年，正月里回到家里。家里一行也没有了，稻谷烧糊了，就舂点枯米出来，那枯米不好吃。猪、牛全打死了。那时我父亲40多岁，父母亲带着我们四个人。我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一个弟弟。那日子真苦啊。68年过去了，跑反时在外面生的小孩都是属牛的，今年68岁。

我们村有个男的,叫有洪,皇甫有洪,好像是在山上被鬼子打死的,地点不大清楚。他是皇甫大北的父亲。皇甫大北现在也去世了。鬼子在弯塘一次就杀了八个人,有我的老公公,就是我老头(丈夫)的父亲,他叫皇甫大森,他跑反时没有跑。(皇甫)志圣的母亲也没有跑,她也是被鬼子打死的。还有句容的一个给鬼子背东西的,被杀死了。还有大岗头的五个,不清楚他们是哪些人。他们跑反跑到了个子山,过不去了,就回头,往回跑。

我老头(丈夫)叫皇甫志贤,那时 17 岁,他兄弟三个,他是老二。老大跑反时吓得跑出去了,过了七八年才回来。我老头日子过得可苦了。他母亲去世得早,他老子又被鬼子杀死了。鬼子在弯塘叫我老头背东西,他就跟了鬼子跑。鬼子一会儿喊“快快的”!一会儿又喊“慢慢的”!还用枪拐子(枪托)打他,打得他泪汪汪的。他一直跟到南京,跟了两个月,村上人都以为他死了,其实没有死。后来鬼子写了张条子给他,碰到别的鬼子就不打他了,放他回来了。

他没有娘,又没有老子,还有一个小妹妹、一个弟弟,他们三个人慢慢苦了。我们结婚时,他 20 岁,我 17 岁,家里什么都没得。房子被鬼子烧掉了,那日子真苦啊。现在的年轻人哪能知道当时的苦?我孙子叫金鹏,上初二,我给他讲,他不爱听,老说“没意思”,学校老师给他讲,他才听。

西庄弯塘杀死了那么多人,水都染红了。西庄正好在火线上,小壕沟、大壕沟,挖了好多,是军队派人带了老百姓挖的,从阴历十月就开始挖了,麦子都没有种下去。鬼子一到村上就把房子统统烧光。丁墅庙那里打仗打得厉害啊。现在我看电视,看到鬼子杀人的事还不敢看,吓得害怕。小孩看了不怕,他们没有经历过这个痛苦。

26. 皇甫贤正口述

皇甫贤正,男,1923 年生

调查地点:上峰镇阜庄西庄

调查时间:2005 年 4 月 26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83 岁,属猪的。现在再讲跑反的事还有什么用呢?日本人要赔偿,我们有这么多人被杀死了,他们也赔不起。

我们村有四个人被日本人杀死了。一个是老有洪(皇甫有洪),当时 50 多岁。刚跑反时躲在村前一棵大树跟前,被鬼子一枪打死了。还有一个是大森(皇甫大森),当时 50 来岁,是在弯山的小塘里被鬼子杀死的。另一个是大平的老婆,就是皇甫志圣的母亲,她娘家是丁墅的,在弯山小塘被鬼子杀死了。还有一个人想不起来了。

跑反时我 14 岁。我们村上有几十个人跑到了神家庄前面的龙王庙(村名)。鬼子在涧南杀了许多人,但没有在龙王庙杀人,我们还有点福气。我们从龙王庙回来,经过涧南,看到了许多死人,大人、小孩都有,有挑担的,有抬箩的。广东兵同日本兵打,广东兵退了,日本人就追,涧南正好在火线上。

广东兵最苦了,连长营长贪污,冬天那么冷,他们还穿单衣裳,棉衣没有发下来。广东兵对我们说:“你们快点跑啊,日本人来了,不跑,要打死的。”广东兵顶不住日本人,背了枪就跑,日本人有气球(指飞艇)指挥的,气球慢慢地向前飞,他们的队伍就向前走。那气球是黑颜色的,飞得不高,用枪能打着。中国人腐败,不敢打。中国人也太落后了,不先进。汪精卫有一点还是蛮可以的,他不同意日本人抽壮丁, he 有自己的队伍。

鬼子刚打来的时候,广东兵在贾汪山打了一仗。没有大部队,只有几十个人,打了一会就跑了。在丁墅庙也打了一仗,打不过,又跑了。丁墅庙蛮大的,两进八间,解放后拆了。

在大赤燕向西一点,打过一次大仗,日本人打死了许多广东兵,广东兵的一个营一个团被打光了。后来我到那里去扎柴(砍柴),骷髅头、铁帽子扎出来好多。只看到中国人的尸体,没看到日本人的。那时候做亡国奴最苦了。安民以后,十五六岁吧,我到炮校去干过活,干一天给一斤米,一包雪格拉牌子的香烟。炮校的房子没烧掉,都是老百姓拆掉的。老百姓家里的房子被日本人烧掉了,就到炮校去拆房子,回来搭个小披屋。炮校房子拆了一大批,后来就不让拆了。

日本人的枪法很准。有个老太太在高家(村名,在西庄东边约 500 米),日本人在西庄,相隔那么远,瞄准了一枪,就把她打死了。

27. 张才兰口述

张才兰,女,1925年生

调查地点:上峰镇庄里大岗头 101 号

调查时间:2004 年 10 月 26—27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80 岁,属牛。我父亲叫张长生,属猪的,鬼子打来那年他 38 岁。

鬼子刚打来的那天,冬月初五的下午,父亲挑了箩担带着我们跑反,跑到西庄后头,靠丁墅的地方,父亲在路上被鬼子抓住了。鬼子要他带路,他不肯,鬼子就把他杀死了。那天在一起被杀的还有张庆山、李余云、李余本和时文荣,总共是 5 个人。鬼子杀人的情况我没有亲眼看到,尸体抬回家时我看到的,我父亲身上被戳了 11 刀,颈上刺了 3 刀,两腋 4 刀,背上 1 刀,尸体用门板抬回来,我看到的。张庆山的头砍了一刀,头和脖子只连着一皮,也是用门板抬回来的。

除了上面这 5 个人以外,我叔叔大台子(外号)、我爷爷张庆福以及戴春兰、朱怀林、丁义富等人也被鬼子杀死了。他们不是在冬月初五那天被杀的,是后来跑反回家时被杀死的。

我父亲埋葬时是用两扇门夹夹,抬出去埋的。父亲死后,母亲带着我们姐妹 5 个和一个才 1 周岁的弟弟跑反,经过个子山,到了神家庄。那里日本兵和中央军正在交火,我们走到火线上了。日本人的“目标”(指飞艇),黑黑的,在天空中一弯一弯的,日本人跟着“目标”跑。我们赶紧从潭子头山上往回跑。

我 14 岁就当童养媳,妹妹 12 岁就当童养媳,那日子真苦啊。我弟弟聪明,解放后靠助学金上了大学,老师保送他上大学的。

日本鬼子坏透了,我们村上好多房子都被他们烧掉了。有一家 6 间 2 厢的楼房(厅房)被烧掉了,他家的房子全是好房子。还有一家 5 间好房子,也被烧掉了。村上被强奸的妇女多了,她们全都死了。日本鬼子还在我家饭锅里拉屎。他们把一锅烧好的饭扒开,爬上灶台拉一泡屎在里头,真恶赖。鬼子投降时,他们在炮校里剖腹自杀。我那时穷,到炮校

里去拣东西,拣棉花团,烂衣裳,看到三四十个鬼子用刀对准自己的肚子戳,旁边还有他们的婆娘背着薛仁贵的包包在看着。这些鬼子自杀后一个一个倒在墙根旁边,那些婆娘看了一会就走了。那时我拣到不少东西,还拣到一个日本人的饭盒,现在早丢了。日本人还强迫我们老阜西大队的一个男人同他们的女人干,这个男人叫德怀,姓什么不知道,他长得很漂亮,日本人就把他拖去,同日本的婆娘干,他回来说,吓都吓死了!

(27日上午补充)“大台子”叫张长洪,他父亲叫张庆福。冬月十五十六的时候,鬼子要他下塘摸鱼。他衣服脱得光光的,赤了膊就跑。他父亲拿了脱下来的衣服去追,鬼子向他父亲开了一枪,脑袋就翻过来了。张长洪跑到新民队的一个棚子里,被鬼子绑在一棵树上。我们娘儿几个都在那里,排成一排,跪在地上求。鬼子向张长洪开了两枪,通心过,我们都是亲眼看到的。那时候,村上的人东奔西走,都跑光了。我们娘儿几个因为没有上人带,留在村上没有跑,所以亲眼看到了。张长洪的娘是个瘫子,她没有跑。那天张庆福他们回家来望望,没想到父子俩都被鬼子打死了。张长洪当时二十二三岁,张庆福五十来岁。

就在同一天,戴春兰也被鬼子打死了。他在村里,见到鬼子就作揖,鬼子向他开了一枪,通心过。这一天被打死的还有朱怀林,他在村里晒太阳,被鬼子拖到村外,一枪打死了。当时他60岁左右。这一天,我们村上一共打死4个人。另外还有道白庵的两个,石地村的两个,那天一共杀了8个人。

丁义富的儿子跑反跑到了安基山,丁义富想去看看他,后来在村外面被鬼子打死了。丁义富是怎么打死的,我没看到。

鬼子把德怀拖到炮校里,给他好吃的,要他给日本婆娘下种。他在炮校里住了两三天,吓死了。炮校里的日本婆娘长得可漂亮了,一个一个都很漂亮。鬼子投降后,她们走不掉了,有几个婆娘就跟了汤山的中国人。鬼子投降后,我们翻围墙进炮校捡破烂,日本人也不打人了。鬼子的旧衣服可结实呢,拆拆洗洗给小孩做衣服,穿了多少年都穿不烂。

北庄的一个人叫志刚,鬼子来了没几天,他跑到我们大岗头来看他的丈母娘,被鬼子抓住了,就在我家屋前塘边那棵高高的树那里被鬼子用刀杀死了,头和脖子只连着一皮,他的血流到了水塘里,这是我亲眼

看到的。

别人知道的多数是事后听人讲的,我都是亲眼看到的。我们留在村里,村里一个人都看不到了,走到哪里都是静悄悄地,听不到一点点动静。

28. 张长银口述

张长银,男,1933年生

调查地点:上峰镇庄里大岗头54号

调查时间:2004年10月27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72岁,属鸡,跑反时5岁。当时发生的事都是我母亲告诉我的。

跑反头一天是冬月初五。那天早上,放在罐里的十几个鸡蛋突然不见了,后来在床底下发现两排鸡蛋,这事真是奇怪极了。

冬月初五我们跑到个子山树林里,在那里过了一夜。父亲回大岗头弄粮食,在西庄后面一条路上,遇到了鬼子。鬼子要我父亲给他们挑东西,我父亲有小肠气,走路困难,求他们,鬼子就用刺刀戳他,他嘛嘛地叫,鬼子一刀砍下去,头颅差一点点掉下来,只连了一点皮。村民跪下来求饶,周怀远、朱世圣等人都在场。朱世圣今年87岁了,他知道当时的情况。

29. 陶氏口述

陶氏,女,1909年生

调查地点:上峰镇庄里大岗头

调查时间:2004年10月27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96岁,属鸡,跑反时29岁。冬月初五跑反,跑到个子山、前村街、神家庄。后来回来望望,我丈夫李余云在西庄后头被鬼子用刀捅

死了。那天一起被杀死的共五个,当时就安葬了。后来,我们又跑到赤山,住在我姐姐家里,安民后才回来。

30. 周其泰口述

周其泰,男,1922年生

调查地点:上峰镇庄里大岗头

调查时间:2004年10月27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3岁,属狗,跑反时16岁。鬼子是冬月初四到的,冬月初五开始跑反。鬼子在黄梅桥炸桥了(实际上是中央军炸桥阻敌西进),我们村的人还没有跑,保长还在碾米。村上许多人都发火了,他才带着大家跑。冬月初五跑到了个子山,在那里住了一夜,全村的人都去了。冬月初六,有个当老师的说,没有见到鬼子过来,我父亲等13个人就准备回大岗头拿点米和菜,回家看看。走到西庄一个小山岗那里,一上了岗坡就遇到了鬼子。我父亲叫周发余,当时五十来岁,属鼠的,被鬼子抓去扛枪、挑东西。他挑着东西走在前头,鬼子跟在后面,一直挑到紫金山。南京城打开以后才回来。一路上,他的衣服全撕烂了。有时为躲避枪炮,只好在地上爬,所以衣服全撕烂了。

鬼子在西庄抓人的时候,时高才在场,他年纪轻。鬼子在一个水塘里,那时塘里没有水,鬼子叫他去弄葵花秆来烤火,他就去了,后来听到有人喊救命,他就躲了起来,逃回丁墅。那天鬼子在万安同中央军打仗,老百姓都躲起来了,一看到鬼子在打仗,全都跑了。这一仗鬼子没有打上去,天黑后就退回了西庄。后来鬼子转到孟墓铁塔那里打。唐生智的部队都是广东兵,穿着裤头,棉衣都没有发。有一个中央军的连长守在铁塔上同日本兵打。广东兵叫我们跟他们走,我们就走到了神家庄,在那里歇了一夜。有个广东兵的连长被打死了,小兵跑到神家庄来弄棺材,叫老百姓赶快跑,我们就跑到了涧南的小庙里,夜里跑上了松树山。后来,山上来了十几个鬼子,他们没有打老百姓。鬼子同反动派(指中央军)用机枪对打,后来又来了一架飞机,广东兵撤了,鬼子就往前追。我

们在黄连岗烧饭,看到鬼子杀死了十几个人。马路上的鬼子坦克开过去,哈哈地响。我们回到大岗头,在村外棚子里住了两三夜,又来了一批鬼子,是西营房出来的,我们就又跑到贺家边,跑到南圩。

在西庄水塘边被鬼子杀死的有五个:

张长生,被刺了13刀,喊救命;张庆山,被刺刀杀死的,头快掉下来了,只剩下颈后一点皮连着;还有李余本、时文荣、李余云。

他们都是被鬼子用刺刀杀死的,因为前面有广东兵,鬼子怕放枪会被广东兵发现。

张长洪(外号“大台子”)和张庆福是在腊月里被鬼子开枪打死的。大冷天,鬼子要张长洪下塘摸鱼。张长洪当时二十来岁,脱光了衣服,冷得吃不消就跑了。鬼子追他,他就躲在一个棚子里,钻在草堆里直发抖,被鬼子搜出来了。他的父亲张庆福拿着他脱下的衣服跑过去,跪在地上求,鬼子一枪把他打死了。张长洪随后也被鬼子开枪打死了。

戴春兰和朱怀林是在同一天被鬼子打死的。朱怀林在村上晒太阳,被鬼子拖出来打死,戴春兰听到枪响,跑出来看看,又被鬼子一枪打死。

丁义富又是在另一天被鬼子打死的。他儿子跑反跑到了安基山,丁义富想去看他,才走到大岗头村后,就被鬼子开枪打中了,一颗子弹留在腰里,疼了几天就痛死了。

冬月初几的时候,北庄的赵志刚跑到大岗头来看他的丈母娘,被鬼子杀死了。

安民后,新四军的朱万红用手榴弹炸日本人的军车,鬼子用机枪向老百姓乱扫,还东一炮西一炮地瞎打。丁钧宝的老婆抱了一个女儿在村上走,一颗流弹把她女儿打死了。

听我父亲讲,打前站的鬼子都是朝鲜人,他们给中国人讲是来报仇的。这些朝鲜人穿的胶鞋都是黑胶鞋,力士牌,像手套一样,有一个大脚趾头是分开的。他们的年纪都比较大,有50多岁的。

我父亲从南京回来时,鬼子给了他3元大头,还告诉他说:“明天你不要回去,日本人大队人马进城。”还给他开了一张证明。后来我父亲从赤岗那边回来的。

31. 朱世圣口述

朱世圣,男,1917年生

调查地点:上峰镇庄里大岗头

调查时间:2004年11月1日

调查人:费仲兴、刘虹



朱世圣

我今年88岁,属蛇的,跑反时21岁。

我们是冬月初四跑反的,当天晚上到了个子山,在小树林里歇了一夜。初五一早我们13个人(其中有4个是女的)就回家,那时还下着霜。走到丁墅过来一点,在西庄那里有个掩蔽地方,是临时用土堆起来的,没有浇水泥。我们在那里上岗坡,遇到了鬼子。鬼子向我们招手,我们就一起到了鬼子跟前,鬼子一来就搜身,叫男的把衣服全脱了,女的不搜。东营房有个老倭,偷了军衣到我们村上来卖,许多人都买来穿了,以为穿了军衣,中央军就不来抓壮丁了。我和时高才没有穿,别的几个都穿了,鬼子就把他们都杀了。第一个杀的是张庆山。他说他是大卵泡(疝气),不能抬东西,鬼子用刀一砍,头就砍下来了,后头还连着一皮。另外5个人是用刺刀戳死的,他们是:

张长生,身上戳了11刀才死的;

李余本,一刀刺死;

时文荣,一刀刺死;

李余云,一刀刺死;

外村的一个男人,也是一刀刺死的。

外村这个人腰里束一条白布腰带,鬼子把他刺死后,把他的腰带解下来撕成两条,在上面写“大日本备用人夫”几个字,给我和时高才每人一条,扎在膀子上,叫我们扛枪,扛子弹。有一个日本人被打死了,另一个日本兵就把枪栓拿走,枪交给我背,还有一个包,沉得要命,也让我背着往前走。当时,鬼子在丁墅这边,反动派(指中央军)在丁墅过去的一个庙里架了机枪打,打得泥土飞起来直冒灰。鬼子叫我在前面走,他们在后面。打到快天黑了,仗就歇下来了。反动派也撤了。他们打的时候,我躲在一条草沟里,很深的,一动不敢动,吓死了。夜里,仗打完了,鬼子就在丁墅歇,叫我和他们睡在一间屋里,他们睡在里面,我睡在靠门的角落里。鬼子走动时,好几次踩到了我的脚。我夜里出来大便,看到有人在站岗。到了下半夜,没有人站岗了,我就出来拎水,躲在外面不远的地方。有个丁墅的人和我躲在一起。天亮后,有个老奶奶喊:“出来吧,日本人走了。”我们就出来了。老奶奶喊我到她家吃早饭,我一点也吃不下去。后来,我就跑到万安我丈人家里。他们都躲到朱砂洞那里去了。我丈人胆子大,夜里回村烧饭,偷偷送到朱砂洞,我就在朱砂洞附近的石头缝躲了十来天。我随身带着一床被单的,天冷,吃不消。

鬼子在西庄杀人的事,我和时高才两个站在高处看得最清楚,周发余和张发德躲的地方低,他们没有亲眼看到。鬼子杀死了人,死人一起掀到了塘里,塘水都染红了。过了没几天,他们的子女各人抬各人的,把死尸抬回家,趁夜里把人埋了。周发余被日本人留下来背东西,他没有背什么重东西,只背一只帆布包。鬼子都带着米的,烧了饭也给周发余吃,有时还给饼干吃,他一直跟了鬼子跑到紫金山,进了城里。

跑反跑了一段时间,我父亲就回家了,我还在外面,没有回来。我父亲叫朱怀林,鬼子把他和戴春兰抓到西营房,叫他们两个做饭,他们两个烧了几天就溜回家了。腊月初十那天,有一个鬼子到石地村去,路过道白庵,把这个村的王四开枪打死了。他在石地村抓了两个人,叫他们抬他回来。抬到了大岗头,这个鬼子不要抬了,下来走,看到我父亲和一些

人正在晒太阳,他认出来了,就走过去,把我父亲从人堆里拖出来,拖到村外,一枪打死了。戴春兰听到枪响,从屋子里出来,想看看,遇到了这个鬼子。戴春兰向这个鬼子作揖求饶,鬼子一枪,把他的手打烂了,子弹打进胸口,当场就死了。鬼子又叫那两个石地村的人抬他。一直抬到西营房,就把他们两个放了。

张长洪和他的父亲张庆福是在另一天被另外一个鬼子打死的。这个鬼子叫张长洪下塘摸鱼,张长洪把衣服脱光了,冻得吃不消,拼命跑。张庆福拿着长洪脱下的衣服去求鬼子,鬼子一枪把张庆福打死了,然后去追长洪。长洪逃到大岗头前头棚子(今新民队)冯义泰家门口,钻进了稻草堆里。鬼子追过去一看,长洪在草堆里动,就把他拖出来,开枪打死了。

北庄的赵志刚,40多岁,跑反初期在张庆福家门口被鬼子杀死了,血都流到塘里了。杀人时我不在场,等我回村时,他的尸体已经被弄走了。

我哥哥朱世强,当时24岁,属牛的,比我大2岁,鬼子刚来那天被鬼子抓走,后来再也没有回来。

朱万洪的游击队用手榴弹炸鬼子的军车,鬼子开火,一发流弹打中了丁钧宝的小女孩(抱在手里,才一两岁),打死了。

32. 庞家钧口述

庞家钧,男,1923年生

调查地点:上峰镇孟墓自然村99号

调查时间:2004年3月27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2岁,解放前当过小学老师,解放后当过大队会计。现在,大家还喊我庞老师。

孟墓行政村有8个自然村:孟墓、陈坊、陆家村、新宁(又名小前村)、湄塘、神童村、郅坊和郪家。郅坊和郪家是1956年从靶场迁来的。我们村西头陶土厂那里有个碉堡,是国民党造的。陈坊北面有座铁塔,也是国民党造的,原来是炮兵射击观测塔,四周焊了厚厚的钢板。日本人来

的时候,那里打过一仗,很出名的,国外都有人来采访的,前几年有篇文章还在美国的一家中文报纸上登过。

日本鬼子到我们村的时间是冬月初七。冬月初四初五,有一批批的中央军逃兵路过我们村,说日本人就要打过来了。老百姓听了都很恐慌,就在西面山洼子里挖了一些地洞。冬月初六的半夜里,有一支中央军部队开过来了,他们不是逃兵,是过来打仗的。他们一家家地敲门,老百姓吓得不敢开,他们就在门外喊:“外面太冷了,让我们在你家里躲躲凉吧!”老百姓开门一看,他们都穿着单衣、短裤头,只有少数人穿着薄棉背心,一个个站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他们说:“我们是唐生智的部队。唐生智在南京指挥打仗,要我们来。我们走错了路,走到汤山来了。”这支广东部队大约有两个连的样子,对老百姓不打也不骂。后来,日本兵到句容土桥了。广东兵看到我们村西边有以前挖好的现成战壕,还有老百姓挖的地洞,就把部队拉进了战壕。老百姓一听到枪响就跑了,各走各的。我们门堂里的三四户人家都往半边山跑,躲在山南面的老百姓家里。



庞家钧(左)

初七那天,枪炮声就没有停过。日本人在陈坊的巷口向王家山进攻,王家山上的广东兵就下来抄日本人的后路,在磨盘墩向日本人扫射,打死了好几个日本兵。日本人把死尸和伤兵拖到神童村火化了。有一

个班的广东兵爬到铁塔上,架起轻机枪和重机枪,向神童村扫射,又打死了许多日本人。日本人吃了大亏,就喊飞机来炸铁塔。那飞机是双翅膀的小飞机,机身上有红太阳记号,飞得很低,差不多擦着地面了,我们都看到的。飞机向战壕里和铁塔上的广东兵扫射,日本人还向铁塔打炮。可铁塔上有厚钢板护着,日本人的小钢炮不管用。被日本人打死的广东兵有好几十个,有的死在战壕里,有的死在地洞里,还有的死在铁塔下面。

初七那天打得最厉害,初八又打了一上午,后来枪声就慢慢地稀下来了。到了晚上就听不到枪声了。这支广东部队没有救兵,大部分都牺牲了。铁塔上的人最后只剩下四个,他们趁天黑撤走了。这一仗打完后,村上的老百姓把广东兵抬到火叉山埋了。被广东兵打死的日本人大约有二十来个,主要是在神童村打死的。他们火化后就埋在老百姓的屋里,上面还插着一块块小牌子,牌子上都写着字。后来,老百姓把这些东西全搬走了。

初八一大早,日本人抓了几个民夫,走长垄沟、大连山、小茅山的山路往沧波门方向去了,但孟墓村上还留有少数日本兵。我的父亲庞振瑾、家门叔叔庞振炳听到村里没枪声了,就急着要回家看看,因为家里还养着猪和牛,不吃东西要饿死的。他们两个在回家的路上同日本人碰上了,被日本人开枪打死,倒在一条水沟里。那时,我父亲 51 岁,家门叔叔 49 岁。我母亲和我婶婶不见人回来,下午就来找,一路找过来,看到两人都倒在沟里,就赶紧找人,用两扇门板把他们抬走了。村民庞振泰,当时 60 岁左右,初八那天傍晚回村看看,被村边站岗的日本兵一枪打死了。我一位家门叔叔的老母亲,当时 80 多岁,她腿脚不便,走路时要抓住一张小板凳一步一步地移。她住在家里没有跑反。日本兵看到后,一脚把她踢在水塘里淹死了,那张小板凳也落在塘里。后来,几个后生把她抬到了山上。当时又没有阴阳先生,不知埋在哪里好。他们就把手里的扁担竖起来,扁担倒在哪里就在那里挖坑。这就是老百姓所说的“烧扁担香”。

日本人占领孟墓后在村上住了几天就走了。我们从半边山回来,看到墙上有粉笔写的字“大野部队、四方部队到此。”后来,日本人很少来孟

墓,因为这里有新四军,他们不敢来。日本人在这里住的时间很短,我们村上大部分房子都没有被日本人烧掉。

(三) 麒麟镇调查

1. 金茂芝口述

金茂芝,男,1927年生

调查地点:麒麟镇锁石孟庄33号

调查时间:2004年11月23日

调查人:费仲兴



金茂芝(右)

我今年78岁,属兔,跑反时10岁,父母亲、奶奶带着我和四个妹妹躲在孟庄附近的山上。父亲原来在江阴造炮台,日本人打上海时他没有回来,后来回到家里,过了三四天日本人就打过来了。冬月初七,日本人在金丝岗东边的山上同凳子小山上的中央军对打,打了一天一夜。九乡河上有一座木桥,中央军把桥烧了,日本的车子开不过来,步兵不好攻。日本人在夜里做好了帆布桥。坦克就开过来了,凳子小山上的中央军被

打死了不知多少,我们都亲眼看到的,这一仗打完后,还去扒他们的鞋穿。中央军是广东部队,有的穿棉衣,有的没穿。他们的裤子短,裤腿到膝盖那里,下面是绑腿布。

冬月初七日本人同中央军打仗时,我们村好几家就躲在山上,在石头窝里挖石头洞。有的洞小,躲四五个人,有的洞大,躲十来个人。张开山家的洞就在我家的洞底下一点,他跑出来小便,被鬼子看到了,屁股上打一枪,打掉了一块肉,没有死。他比我小1岁,现在还活着。他家九口人,那天被打死了六个:张开山的父亲,外号叫张罗锅子;还有张开山的童养媳、张开山的小弟弟、张开山的两个妹妹、张开×(张开山的哥哥,小名小烧)。

他们六个人是从洞里出来往山上跑的时候被鬼子的机枪扫死的。

我的姑爹张开远,当时二三十岁,才生了一个小孩。冬月初七那天,他和另外两个人趴在一个小洞里,被抬伤兵的日本兵看到后开枪打死了。同他一起被日本兵打死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孙富和,另一个姓刘,记不清名字了。

还有一户姓汪,和我们洞靠洞。抬伤兵的日本人抬着木板下来,看到汪洪×(40多岁)躲在洞里,就向他开枪。他看到日本人举枪就趴下,结果子弹打在他背心上,棉袄都打破了,没打死。洞里抱着小孩的老太被打死了,吃奶的小孩打伤了。日本兵发现洞里还有人,就用火点着胡椒粉往洞里吹,几个小孩呛得直喊。汪洪×就喊:“不要喊!不要喊!”他们家七个人,有三个人当场被打死:一个叫小掌的男孩、小掌的母亲、吃奶的小孩。

汪洪×当时未死,但后来不久背上伤口发炎,也死了。

这一仗打完后,日本人在公路边用劈柴、门板架成一堆,把他们的死兵和不能动弹的伤兵架在火堆上烧,自己烧自己。

上面讲的是第一拨,还有第二拨,死的人更多。

过了个把礼拜,中央军打回来了。他们被日本人打散了,伤的伤,瘸腿的瘸腿,到处流窜。日本人从南京回过头来清山,从沧波门过来,在麒麟门的谢塘杀了不少人,把躲在庙里的100多个人全杀死了,然后从干巴山口一路杀过来,在山口过来一点的地方杀了30多个人,有中央军,

有老百姓。后来埋死尸时,我们到那里去玩,亲眼看到的。

在青龙山山沟里,过去有座小东山。那里有十几个人被鬼子逮住了。鬼子要他们去抓猪,他们跑来跑去抓猪时,鬼子向他们开枪了,东一个西一个的,打死了四五个人,摔在沟里。现在记得名字的有宋家标和他的儿子宋小坤。

那天,我们村上有 100 多号人躲在青龙山一个石灰窑的草房里,大家以为鬼子去打南京城了,这里没事了,就用白面袋布做了一面旗,上面缝一个红月亮疤疤,挂在草房上。有的村民回家,到地主家仓库里弄吃的。我奶奶感冒,我就在家没有出去。鬼子在小东山那里杀了人,就到石灰窑这边来了。一共来了三个鬼子,把 20 多个年轻小伙子掳走,在官塘水库边上叫他们解下裤腰带自己绑自己,一个一个连着,站在水库边上。大家还以为是鬼子要拉夫,谁知道鬼子回过头来就开枪,把这些人一手打死了,打死后还一个一个地用刺刀刺,把我父亲的一只膀子也砍下来了。有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叫王神眼(小名),他挣扎开了,跑出去八十来米,还是被鬼子开枪打死了。这一次打死的有二十来个人,能想起来的有以下几位:

金兆银,我的父亲,30 多岁;

王神眼(小名),20 来岁;

丁良发;

孙××,60 多岁;

衡应×,六七十岁,胡子都白了;

三呆子(外号),是衡应×的一个儿子;

衡小狗(外号),窑上的工人;

二道标(外号),姓衡的亲戚。

还有一个人,不是那天打死的。他在路上捡了一条牛,牵着牛走,日本人骑着马在路上走,看到了,就在马背上开枪把他打死了,牛没打死。这个人的名字想不起来了。

还有个老头叫刘傻子,背着个大篮子在路上走。四个日本人骑了马,在里把路以外的地方老远老远地向他开枪,把他打死了。这是第二年开春后,还没有安民的时候。

过了一两年,新四军夜里来烧官桥、割电线。鬼子在官桥那里修了个碉堡,住了一个班。这些鬼子常到村上来掳鸡,逮到了老百姓就打。丁科顺的母亲一枪打中了肺部,过了三四天就死掉了。

我在1955年入党,1960—1965年当生产大队的大队长。“文化大革命”中挨过斗的。

2. 张开宇口述

张开宇,男,1920年生

调查地点:麒麟镇锁石孟庄14号

调查时间:2004年12月7日

调查人:费仲兴



张开宇(右)

我今年85岁,属猴,跑反时18岁。

我家当时九口,有七个人被鬼子打死了。母亲张王氏在八月十四日本飞机轰炸南京时吓死了,当时才36岁。冬月初七早上八点来钟,日本人打过来,我们家的人躲在东面青龙山半山腰的石洞里,有六个人被鬼子打死:

父亲张贵友,四十出头;

哥哥张开河,23岁;

我的童养媳,姓欧,河南人,十四五岁;

大妹妹,小名“小米”,十二三岁;

小弟弟,小名“孩孩”,四五岁;

小妹妹,小名“丫头”,2岁。

第一个被打死的是我哥,是被鬼子用刺刀刺死的。父亲看到后就哭,背着妹妹往山上跑,被鬼子的机枪扫死了。我的大弟弟叫张开山,比我小9岁,他腿上被打了一枪,就趴在地上不动了,鬼子没有向他再开枪,他就活下来了。他腿上的伤疤现在还能看到。我当时躲在另一个地方,要是躲在那个洞里,也要被打死了。后来我背了开山弟弟到处跑,到处躲。到了第二年三四月里,我们去埋尸体,父亲和哥哥的尸体找到了,几个小孩的尸体没找到。那时山上有狼,他们的尸体可能给狼吃掉了。我父母的坟还在,没有立碑。



张开山大腿上的伤疤

冬月初七那天被打死的人还有好多,现在能想起来的有:

孙富和,山东来的,他老婆没生,后来跟了别人了;

耿玉其,山东来的(他姐在这里),没有后代;

刘德胜,山东来的,没后代;

张开远(我的家门兄弟),他躲在另一个洞里,见别人被打死了,他就跑,结果被鬼子的机枪打死了,他老婆后来嫁给别人了;

我的二舅母和她的一个小孩(小名“小掌”),她们死得最惨,日本人把洞里的凳子椅子架起来,放火烧,她们就被呛死在洞里了。

冬月十四,鬼子又来扫荡了。我们村上许多人都躲在官塘水库附近的石灰窑的房子里。鬼子把大家喊出来,赶到官塘水库(当时是一个水塘,不大)那里,叫大家解下裤带,你捆我,我捆你,连在一起,然后就开始开枪了。那天只有五六个鬼子,被打死的人有四十来个。只有一个人(他外号叫“神眼”)拔腿就跑,跑了没多远就被鬼子开枪打死了,其他的人都没有跑。那天,我背着我弟弟跑到山上去了,鬼子杀人的事是我们亲眼看到的。

冬月十四那天在石灰窑那里被鬼子打死的人多了,现在能想起来的有:我表舅衡义山和他的儿子“三呆子”、衡义山的老表陈冬宝、我三舅母的弟弟周三、宋亚表和他的儿子小坤、金兆银(金茂芝的父亲)、孙群友、刘××(烧煤窑的工人)、“神眼”(外号)、刘小七、王太常的老婆。

这些人被打死后就埋在官塘水库西边的山凹里,各人埋各人的,没有后代的就乱埋了。

冬月初七和冬月十四这两天在我们这里被打死的人有1 000多个呢,有本地人,也有外地人,路过的,还有中央军。两广部队在凳子山上有一个连,两挺机枪,在小山上也有一个连,都被日本人打得光光的,一个都不剩。凳子山、小山和乌龟山上到处是中央军的死尸。

后来,徐矮子带了新四军过来烧官桥,丁国顺的母亲丁陈氏在官桥那里被鬼子开枪打死了。徐矮子在解放后当过上海市的市长。他师傅是汤山神家庄人,地主,保护过新四军的,解放后在坟头被枪毙了,我们都跑去看的。徐矮子要是早来三天,他师傅就不会枪毙了。

跑反过后,第二年的三四月里,鬼子用汽车把我们拉到南京城里去做工,给他们收拾死尸。在中央门外靠火车站的地方有一所学校,鬼子杀人杀得懒了,不想动手了。翻译就给难民讲,你们躲到那间屋里去,进去了就不杀你们。等人都进去了,鬼子把大门一关,浇上汽油,里面的人全烧死了。我们去收拾房子,死尸往河里拖。我们在城里给日本人干,你不干,日本人就打你。干了几天,我们就回来了。

3. 丁科顺口述

丁科顺,男,1926年生

调查地点:麒麟镇锁石孟庄6号

调查时间:2005年8月1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75岁,跑反时6岁。我和母亲跑反跑到栖霞水泥厂难民区里,住了三个来月才回来。难民区是外国人办的,鬼子不敢进去。

躲过了这一劫,我母亲还是没有躲过去。第二年二三月里,正在下小秧做田的时候,鬼子进村了。我母亲和我二大妈(伯母)一看,就往村外跑。二大妈跑得快,没有打着,我母亲跑得慢,跑到九乡河龙桥的水坝上,被乌龟山炮台里的鬼子用机枪打死了。那机枪厉害,母亲中了两枪,一枪从头上打进去,从后脑出来,另一枪从喉咙管打进去,从后颈出来。别人把她从河里救上来,抬到家里,她在家里住了十多天。要是有医生治,她是能活下来的。她的喉管打穿了,不能吃东西。从嘴巴喂饭喂水进去,都从喉管这里流出来了,她是活活饿死的。她那时30岁,娘家在麒麟门徐家边,娘家姓陈。

我有个弟弟。母亲死后,弟弟得病死了。父亲把我带到15岁就去世了。我要了好几年饭,漳桥那一带都去过。

日本鬼子可凶啦,端了枪,一不高兴就开枪打人,谁见了都怕。现在电视里放鬼子打仗的节目,我看到鬼子戴的帽子,看到那两只大耳朵耷拉下来的样子,心里就害怕,不敢看。

4. 郝广潮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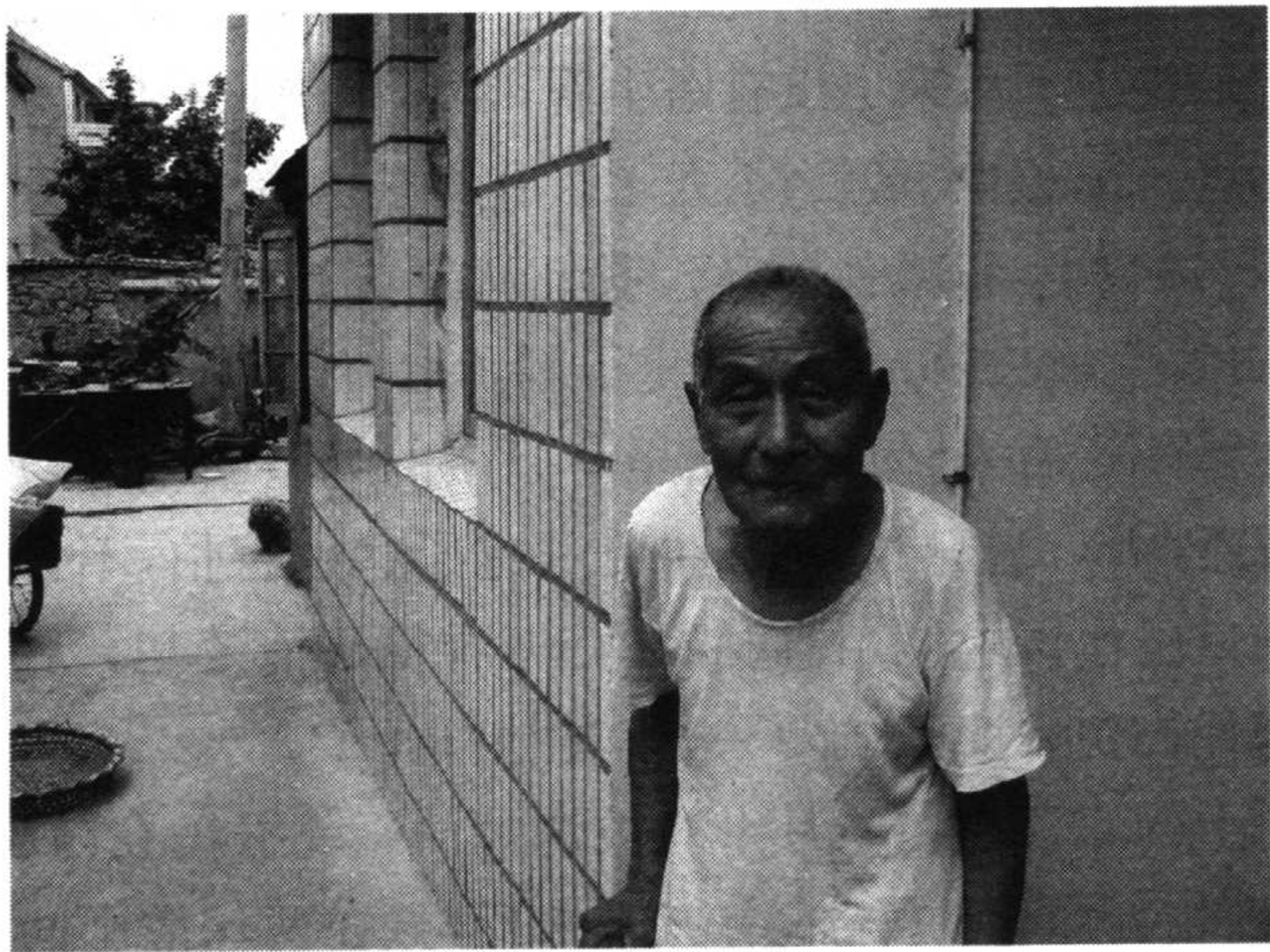
郝广潮,男,1918年生

调查地点:麒麟镇青西谢塘

调查时间:2005年6月9日、21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8岁,属马,跑反时20岁,解放后当过大队会计。



郝广潮

鬼子来的那年是民国 26 年,1937 年。刚开始时,我们一家躲在千儿山的一个山宕宕里,后来又跑到栖霞大庙里,我父亲、弟弟和妹妹,还有姨妈和姨妹,一共十来个人。我母亲没有去,留在家里了。那时我母亲 40 多岁,父亲比她大一岁。我们到栖霞是跑反开始后十来天,走小路。不敢走大路,大路上有日本人,还有日本人的电线,一踩到就响了。大庙里人很多,那和尚有六七十岁了,老百姓吃他的喝他的,一开始吃得好,后来不行了,一天就放一顿粥。日本人为什么不惹庙里的和尚呢?听说很早以前有个日本当官的到过庙里,还在庙里树了一块碑。我们刚去的时候带了点米,吃完后又买了点,那里有买米的地方。在庙里住了一个来月,听说家里的房子被烧掉了,放在地洞里的东西又被偷走了,我们一家人就全回来了。

日本人不惹小孩,他们住在村东头,小孩去要饭,他们也给点饭,还给点糖果。年纪大的人他们也不惹。

鬼子刚来的那天,大概是冬月初七。村上人一看,说:“那些兵不像中国人,头上的帽子不对嘛!”有三个人坐在家门口,被鬼子用刺刀刺死了。一个是刘老三,四十六七岁,还有一个是吴永金,33 岁,还有一个是吴小猴子,三十一二岁,他们是堂兄弟。有人看到后就喊:“日本鬼子杀人了,把小猴子杀掉了!”这么一喊,留在村上的人就全知道了。另外还

有一个人叫吴国鋈,当时49岁,被鬼子刺了一刀,肠子都流出来了,就在盲肠炎开刀的地方。后来也没有医生看,自己慢慢长好的。到了第二年开春,四五月份,鬼子也不怎么杀人了。我们村上有个人叫赵长福,四十出点头,比我父亲小,我喊他“叔”。我们从碾坊过来,我喊他走,他看到有人在烧狗肉,就过去了。结果被鬼子刺了七刀,都刺在脖子上,鬼子也没有想把他杀死。后来,附近水塘里有条牛的绳索断了,好几条牛都爬上了岸。鬼子叫赵长福拉牛。那牛见了鬼子兵也害怕,不肯走,反而跑掉了。他向鬼子作揖求饶,我们躲在官塘看得清清楚楚。后来,鬼子在官塘边上把他推到水塘里,放了一枪,把他打死了。

我们村上的房子是在冬月十八被烧掉的。郭振民在麒麟门开店做生意,带回两箱五加仑的洋油,有三十来斤,藏在两垛墙中间,后来被两个老太太拿了出来。正好鬼子兵走过来,她俩放下洋油箱就跑。鬼子用白刀(普通的切菜刀)割破了油箱,把洋油浇在扫把上,点火烧房子,村上的草房和草堆全烧光了,家里的桌子板凳也烧光。

日本鬼子刚打过来的时候,不但有飞机,还有两个大气球,黑颜色的,蛮大的。他们的武器也和中国人不同。他们的炮一口气能打五六十发,中国人的炮半天才打一发。日本人打过来,国民党兵就退,还喊:“没有家了,你们赶快跑!”他们都是广东兵,还穿着单衣,冻都冻死了,还要打仗,好可怜。有两个国民党兵跑得晚,落在最后面,在我们村后头打死了。后来,鬼子又出来扫荡,过来的人多得不得了,还打着红太阳疤疤的旗子。

那时候,中国的汉奸多呢。在铜家山的西边,离窦村不太远的地方,有个大庙叫宝善寺,里面的和尚就是汉奸。鬼子的飞机来炸,他就放炮仗的火信给鬼子发信号。后来,国民党把他查出来了,就枪毙了。在西林耀村上,有人跑反跑到山上,被鬼子打死不少。我们村南边的王后村,被鬼子杀死的人多得很。在徐家边靠山的地方有座庙,叫本业寺,鬼子一次就打死十几个人,女的多,你可以到徐家边、白下场那里去问问。本业寺在解放后被拆掉了。在东林耀,我二姨妈的儿子叫王光兴,比我大2岁,90岁了,身体比我好,你可以去问问他。

我们村是麒麟镇青田大队谢塘村,可村上没有姓谢的。我是村上年

龄最大的一个。

(6月21日上午补充)跑反时,吴永金的妻子住在城里。金陵大学有个老师要找保姆,把她找去了。解放前,她跟了这个老师到了台湾。后来,她还想回来看我的,没有回来。吴永金死的时候有三个女儿,小女儿叫“壮子”,给我舅母家当童养媳了,所以她想回来看我的。

鬼子到村上来杀人,听说只来了两个鬼子,当时谁也不敢动。日本人看到穿卫生衣的人查得特别凶。

跑反前在王后村小学当老师的是高继祖。

5. 王恒锦口述

王恒锦,男,1915年生

调查地点:麒麟镇王街

调查时间:2005年6月13日

调查人:费仲兴、王健、李宁

我今年91岁,属兔,跑反时22岁,老太(指他的妻子陈为红)当时18岁。我们成家没多久,鬼子就打过来了。我们两个挑着箩担,还背着老太的弟弟,三个人一起跑的。老太她弟弟那时才7岁。我们先跑到山里,躲在尚庄(指汤山龙尚行政村北尚庄),后来又跑了许多路,跑到了摄山一个厂(指江南水泥厂)的难民区里,鬼子看到外国人来就跑。

我们王街没有人被鬼子打死,王后村有人被刺死的,还有西村的、徐家边的。在鬼子打过来的头一天,鬼子翻山过来,天上有“目标”的,那些人都躲在祠堂里,只来了两个鬼子,用刀戳,被戳的人都喊“吃不消”。24个人被戳死,只有一个老头没有戳死。他是王后村的,躺在地上装死,一动不动,后来自己爬起来逃走了。

那天,有人从王后村跑过来报信,喊:“那边刺死了二十几个人,快跑!”我们听到后才开始跑的。跑到山上,躲在山洞里。

6. 王祖尧口述

王祖尧,男,1926年生

调查地点：麒麟镇王后村 78 号

调查时间：2005 年 6 月 14 日、29 日

调查人：费仲兴、王健、李宁、李展腾



王祖尧(右)

我今年 80 岁，属虎的，跑反时 12 岁。

那年冬月十一，日本人从村东边的官塘山打过来。他们有气球，上面黑的，像是地图，里面有人。他们的部队还没有到，气球就过来了，在上面指挥。蒋介石打不过他们。那气球有 500 米高，枪没法打。那时候飞机就飞 200 米高，蒋介石的飞机同日本人打，一打就被打下来了，要不就飞跑了，好像没有什么力量。

村上人一开始不认识日本人，以为是蒋介石的部队打败了撤回来的，老百姓还挺同情，喊他们：“先生，先生！”可日本人讲“贡隆”、“贡隆”，听不懂。端茶给他们，他们也喝，说：“沸，沸。”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日本人。

我 10 岁上学，上到四年级就不上了。学校就在村上，不是私学，而是洋学堂，有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学校原本是王家祠堂，有三间教室。从学校大门进来，走六十来米，便是教室。鬼子杀人那天，我和王祖兴（小名“小七”）、王光义（小名“鸭双”）三个人躲在祠堂外面的墙根下，当时也不知道日本人来杀人，以为日本人来捅教室，那教室里课桌

板凳都有,没想到他们会来杀人。我们和学校只有一墙之隔,听到学校里有人叫喊,也知道有鬼子在学校里头,不知道日本人是在里头杀人。日本人走后,从学校大门往外流出许多血,才知道日本人在里面杀人了,我们不敢看,调过头就往山上奔。我家有个叔叔,比我大4岁,家里找不到他了,后来才知道他在学校里头被鬼子杀死了。

在学校里被杀死的有23个,也有人讲是21个。他们不是事先躲在学校里的,而是被鬼子一个一个叫到那里,一个一个杀的。王光清的爷爷,50多岁了,躲在一个地窖(地洞)里。他要是不咳嗽,鬼子还不知道。他一咳嗽,就被鬼子发现了。日本人叫他出来,把他带到学校里,我们都听到的。二十几个人都是这样一个一个抓去,带到学校去的。王祖坤的叔叔躲在自家的稻仓里,日本人来,他的头一窜,被日本人看到了,抓到学校里杀了。杀的时候是一个一个杀的,前前后后起码有一个半小时,不是二十几个一起刺杀的。

那个时候,西村、徐家边有两百来个人躲在我们村上,因为这两个村靠着京杭国道,常常要过兵,蒋介石的部队、广东部队都要经过,他们就躲到我们村上,结果有许多人被日本人一个一个地拖到学校里杀死了。

被杀的大部分是十七八岁二十来岁的小年轻。我们村上有八个:

王祖坤的叔叔,小名“二豆子”,十七八岁,没后代;

王继源的儿子,小名“锁子”,十七八岁,没后代;

王光贵的大伯王祖春,小名“双田”,二十五六岁,有一个女儿;

我的一个老叔叔(年纪最小的叔叔),王继钊,16岁;

王光宝的叔叔,王祖武,16岁,小名叫“连四”;

王希桐的儿子,十八九岁;

王清光的爷爷王继增,50岁出头;

平文信,小名“小金财”30岁左右,有两个儿子。

平文信被戳了七刀,没戳死,他躺在地上装死,鬼子一走,他就跑出来了。八个人当中,就他一个人没死。还有一个是徐家边人,二十来岁,姓苏,小名叫“顺子”,他的肠子都戳出来了,鬼子走了以后,他还没死,呼喊救命,那时没人救,如果去救,他是能救活的。

有人说,在学校里杀人的只有两个鬼子,有人说还有别的鬼子,说不

清楚,没有人在杀人现场看到。鬼子把人抓进去,叫他把上衣脱光,下身不脱,再解下裤腰带,把双手反绑在背后,再绕过脖子,套住了,鬼子才开始刺。西村被刺的人很多,你们到西村去找薛万海(王光贵的舅舅),他了解的情况多。西村人尸体堆在那里没有人收,后来我们村上的人去抬出来,埋在王后村小山脚下,挖了坑,一个坑里摔几个,埋了。后来也没有挖出来重埋。我们村上大部分人跑到湖熟、龙都去了,西村的人跑到栖霞、摄山,在水泥厂的难民区里躲着。还有栖霞寺,据说是一个老和尚保护难民。

跑反一开始,我躲在山上的凹宕里,是露天的大坑,有100多人,这样的大凹宕有好几个呢,有大有小。那山叫狸子山,在千儿山和母家山之间,靠近千儿山,离王后村有四五里路。躲了不到一个月,又到了茅屋东边,在龙泉庵翻山过去,在龙泉庵的山南边,也躲了个把月。大约过了春节,我叔叔冒着危险从南京难民区出来,叫我们到南京的难民区,我们好几个人跟着他去了。都是夜里走,从沧波门到五百户,一路上全是死尸。我叔叔说:“不要朝脚底看,向前头看!”一边走一边喊。后来我们跑到了南京,进了难民区。中山北路西边、汉中路的北边是难民区,是美国人保下来的。我叔叔、婶婶在南京做小生意,日本人一来,他们都成了难民,躲进了难民区。有个美国人,女的,大家都喊她“黄小姐”,个子很高,讲自己是美国人,她男人是中国人。黄小姐经常到难民区来看,管理难民区。我叔叔和婶婶见过她的,我没见过她。美国人在五台山有几口大锅,直径一米五呢,每天上午烧粥施舍给难民,不限量,随便吃,那锅铲都是大洋锹,难民端了脸盆、缸盆去打粥,尽饱吃,每天只供应一个上午。后来安民了,日本人不怎么杀人了,我们在农历三月回来了,那时天气暖和了。

我们躲在山上的时候,搭个小棚子,地上铺点草就睡了,回到家里,个个打摆子(疟疾)、害疮,生病的人还真不少,只能等死。小孩出天花的,下牙疳的,五六岁以下的小孩,百分之八十都得病死掉了,各个村都这样。

本业寺在徐家边东面,宁杭公路南面,解放前还在,但已经没有寺庙了,只有破框框。

青龙山的千儿山一仗打得比较激烈,千儿山炮台打了一仗,只剩下一个排长在碉堡里,后来子弹打光了,排长牺牲了。被广东兵打死的鬼子也不少。

在我们村前,鬼子在馒头山上,广东兵在狮子山上,双方都站着打,广东兵有两挺机枪,对着打,我们当时也不晓得是哪里的兵。后来打打没有子弹了,没军火了,广东兵就撤了。山上没有打死人,有个广东兵撤退时路过我们村南头的一个水塘,在水塘边被鬼子打死了。广东兵可怜啊,穿着单衣单裤,下面打绑腿,脚上穿麻草鞋,讲的话也听不懂。

在五棵松双拜岗那里打了一仗,也很激烈的。打仗的是教导团,不是广东兵。王街有一个人叫王七两,当时二十来岁,从芜湖过来,在双拜岗参加了教导团的战斗。那个地方中日双方都打死了许多人,日本人一开始没有攻下来,往后撤了。后来又攻了一次,才攻下来。日本人的枪声“嗒——嗒”响两响,中国人的枪声,只有“叭”的一响。我们后来都知道了。

王街还有一个人叫王家灿,抗战时是炮兵连长,参加过缅甸战役。他说中国人的炮比日本人多,中国人三四十门炮也打不过日本人的十来门炮。中国人的炮一响,日本人的炮一下子就打过来了,炮就被炸掉了。后来吓得不敢再打炮了。

头一批过来的日本兵,从青龙山翻山过来的,人不多,几十个人,全是大胡子,个头高,不是日本人的小胡子,后来听说他们是朝鲜人。

(6月29日补充)本村的王希广在祠堂里被日本人杀了,当时有50岁左右。那祠堂在村南,早就拆了,现在看不到一点痕迹了。

杀人的那天晚上七八点钟,又来了一批日本兵,放火烧了一批房子。王继标、王继增、王祖炳三家共计九间瓦房、四间草房,被烧掉了。

日本人在本村强奸妇女一人,两次。

当时学校里面和学校大门的楼墙上都贴有抗日标语。内容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禁止日货等。

1943年左右,村民王光宝的父亲(小名“连三”,当时20岁左右)在东解附近的田里做秧田,日本兵打炮,把他当活靶打死了。事后,只赔了两担劈柴,就是日本兵在野外打炮时烧饭用的劈柴。

我小时候六七岁的时候,农村里的抗日气氛就很浓了。我现在还记得当时唱的一首诗歌:“只有铁,只有血,只有铁血才能救中国。还我河山,誓把倭奴灭,兴我国魂,誓把国耻雪。风凄凄,雨戚戚,切记,切记。大家团结,大家团结,努力杀贼!”我只上到小学四年级,后来全靠自学,识了许多字。人家喊我“工程师”,我不敢当,可建筑施工我全懂。泉水大队盖那么些房子,都是我设计的,你们看,图纸都是我画的。灵山部队盖房子搞结算,也请我去。他们的财务科长是大专毕业,而且是学建筑的,他搞不了。我都是自学出来的,有实践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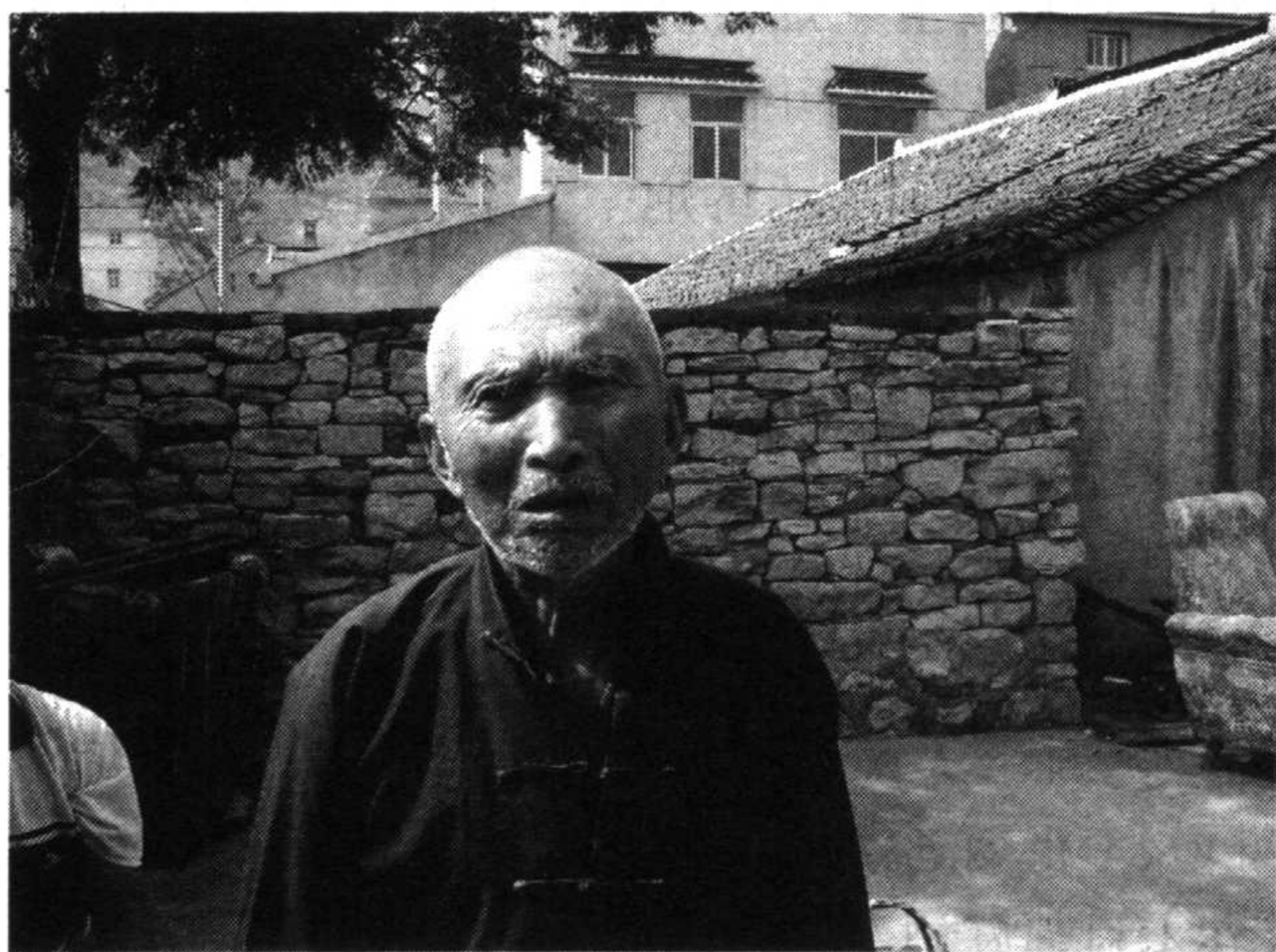
7. 王光兴口述

王光兴,男,1916年生

调查地点:麒麟镇泉水东林耀61号

调查时间:2005年6月13日

调查人:费仲兴



王光兴

我今年90岁,属龙的,跑反时22岁,跑反前在村上种田。

1937年冬月初七,鬼子第一天到村上就打死了六七个人,有我们村的徐仁寿和颜明洋两个,还有外村的一个哑巴和一个小名叫“刘琴子”的人,其他几个人的名字不知道。徐仁寿牵着一头骡子,鬼子把这头骡子

拉走了,他去要骡子,被鬼子一枪打死在村边靠青龙山的地方。

我们家是在冬月初七跑反的,我和我父母亲,我妻子,还有我妹妹一起跑的。东林耀的人都去了,西林耀的人也都去了,有两百来个人呢。我们带着米、锅和被窝跑到青龙山东边,茅屋和兴隆村交界的那个地方,就是现在那个大水库的西边,躲在山上的松林里,那松林密密的,都有碗口粗细。我们躲在松林里,别人看不到。那年天气还真好,一个月没有下雨、下雪,我们躲在山上的小棚子里,要是下点雨下点雪就更难熬了。

鬼子进村的那一天(冬月初七),在龙口架了机枪向山下扫射,打死了不少中央军,有几十个呢。老百姓全逃难了,安民以后也没人去埋,后来这些死尸全烂了,到处都是骨头。

鬼子打来那天,在麒麟乡的公路上空有一个气球,颜色黄黄的,有两人多高呢,在空中走走停停,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说它是“目标”。他们的大队人马在公路上走,那旗子是白的,中间有红疤疤,那时候老百姓才知道是鬼子过来了。

我们在山上躲了个把月,在腊月初七八的时候,来了一个鬼子,打死了几十个人。有个外村的哑巴,鬼子叫她走,她就跑到难民躲的地方来了。这个鬼子在大连山山脚下的王家山附近强奸了一个女的,是西林耀的,没有杀她。后来,这个鬼子就在难民住的地方杀人了。头一批杀了五六个人,有我们村的徐小宝、王大生,还有西林耀的两个,他们都姓谢,小名都叫小四。另外还有几个是外村的,不知道姓什么。他们都是被刺死的。后来又抓了我们四个人,叫我们跪下来,跪成一排,叫我们把衣服脱下来,然后就用刺刀刺王家宴。他和我同年的,22岁。鬼子刺了几刀没刺死,后来又开了一枪,把他打死了。我们都吓呆了,我就喊:“快跑!”一蹦,跑到一个水沟里,水沟里只有一点点水,我躲了起来。鬼子没有找到。我跑出去没多远,就一百来公尺,还是在山上。徐玉荣(属马的,当年20岁)、王家和两个跟我一起跑的,我们三个都逃出去了。那时是中午吃饭的时候,许多难民把饭都烧好了,都没有来得及吃,看到鬼子杀人,全吓死了。后来听人家说,一共有四个鬼子,都是从兴隆村过来的。另外三个鬼子没有跑过来,就这一个鬼子,叫哑巴带路跑过来了。

徐小宝是老三,他家一共有三个人被打死了。老二是在西头被坏人

(土匪)打死的,老四也是被坏人打死的。

我们村上的房子没有烧多少。泉水村其他村子,百分之八十的房子都烧掉了。耕牛被抢走的就多了,都是难民牵过来的,牵到山上,鬼子看到就开枪打死,砍下四条腿,别的不拿。

泉水大队当时是火线。麒麟门那里没打过什么仗,只有鬼子打枪打炮,国民党没有还枪的,都跑掉了。

(王立芳插话)我母亲看电视,看到鬼子打仗就不敢看下去。她今年92岁了,头脑还清挺醒的。等会我带你过去。

8. 王吴氏口述

王吴氏,女,1914年生

调查地点:麒麟镇泉水东林耀89号

调查时间:2005年6月13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92岁,属虎,娘家在仙鹤门。跑反时在东林耀,跑到山上,躲在一个小棚子里。鬼子把人拖出去,叫他(指王家宴)跪下。刺刀按在枪上的,先刺进胸口,再用力搅,他就用手去抓刺刀,手指全是血。他个子高,22岁,又高又壮,脸白花花的,长得又好看,鬼子就先刺他。他挣扎了一会,鬼子又向他开了一枪,打在头上,我亲眼看到的。还有“毛猴子”(王光兴)、王家和,他们都奔了(跑掉了)。他是第一个被杀的。那天他赶了骡子,就是平时拖石灰的骡子,被鬼子看到了。鬼子兵驻扎在上坊的。有个哑巴,穿的红鞋子(才结婚的),鬼子追她,她就跑,一跑就跑到难民住的地方,她自己躲起来了。那天死了八个人呢,有西林耀的,有一个好像是叫“小顺”。

后来平定了,石灰窑上也烧石灰了。王家和用骡子拖石灰,拖到城门口,鬼子看照片不大对头,就把他的衣服全扒光,打他。四老表就跑到家里拖了(喊了)一个姑娘。姑娘对鬼子讲:“他是老百姓,你们认错人了。”鬼子就把家和放了。四老表把家和留在家里,还在澡堂里洗了个澡。第二天,他就回家了,那牲口也由别人拉回家了。

9. 陈洪源口述

陈洪源,男,1924年生

调查地点:麒麟镇泉水西林耀64号

调查时间:2005年6月13日

调查人:费仲兴



陈洪源(左)、吴金桂(右)

我今年82岁,属鼠,跑反时14岁。我10岁开始上学,到13岁。后来,鬼子的飞机来轰炸,老师也跑了,就没有上学了。后来跑反,家里的房子全烧掉了,再也没钱上学了。我家的房子是祖上传下来的好房子,全村最好的,木板壁,格子门,五间都是好房子。

跑反时我们跑到了茅屋附近的山窝里。父亲在我出生后一个月就去世了,母亲和外婆是小脚,走不动路的。跑反时,我是跟了我外婆的娘家人一起走的,母亲和外婆留在家里了。在外面,过段时间回来挑点米。冬天天气冷,睡在小棚子里,霜下得很重,雪白的一层,白天化了,水滴下来。西林耀大部分人都跑到那里去了。

鬼子进村的第一天就放火烧房子,我家的房子全烧光,东西全烧光,后来外婆娘家(在窦村)的人送点米过来,家里用的东西就到外婆娘家去要一点。鬼子进村后,强奸妇女,捞鸡,杀猪,拉牛,拉骡子,但没有在村里杀人。

我们村上有两个人在茅屋附近被鬼子杀死了，他们都姓谢，小名都叫“小四”。一个小四是谢天海的叔叔，个子矮矮的，没有结婚，还有一个小四是谢明钊的四哥，个子高，结了婚，有一个儿子，现在住在上海。

（吴金桂插话）我今年77岁，属蛇的，跑反时9岁。我亲眼看到他们两个人被鬼子戳死的。在离茅屋不远的地方，有八九个人跑，鬼子在后面追，第一个被刺死的是谢天海的叔叔谢小四，刺刀从背后刺进去，从胸口出来一段，又把他前面的甘长树的棉衣戳了一个洞，但没有刺伤甘长树。谢明钊的四哥也叫谢小四，是第二个刺的，刺刀从脖子上刺进去，是当面戳进去的。他是个大个子，一刀戳下去，当时就倒在地上死了。大人跑，我们小孩也跟着大人跑，所以都看到了。

王光兴在鬼子杀第六个人的时候就跑掉了，躲在沟里，鬼子没有看到，他是命大。

鬼子杀完人之后，难民都散了，各跑各的。我们连夜跑到上峰的贾家村，在那里住了没有几天就回来了，没有吃的了。别的人跑到哪里，不晓得，大家都走散了。

（陈洪源继续说）在十里长山凹西面的轿子山，原来有国民党的一个军火库，鬼子在那里住下来了。他们白天晚上都出来，晚上出来找花姑娘。老百姓见到了鬼子，一看就吓呆了。

过了四五年，鬼子常常到我们这里来打靶。飞机拖着靶子，地面上的鬼子用高射炮打靶子，步兵用枪对了青龙山的龙口打。有一发炮弹落下来，孙大梅家的房子砸了个洞，没砸死人。鬼子打靶，老百姓都吓得不敢出门。

鬼子来了好几年了，孙广义的叔叔从中山陵进城，再也没有回来，连尸首也没有找到。他的小名叫“小五子”，大名不晓得，没有结婚。

鬼子刚来的时候，小茅山那里打了一仗，打得很厉害。中央军的一个连在山上，日本飞机一来，有人给日本飞机打信号弹，五个一串，七八个一串，红的绿的，飞机上的鬼子就知道那里有中央军，就炸。我们都看到的，那时不知道这红的绿的是信号弹，是汉奸放的。

有个四川人叫华海，人很老实，没有文化，当过国民党的兵，后来留在我们村上了。我和他一起干活的时候问过他，他说是在唐生智的部队

里当兵的。部队打到南京,后来又从紫金山打回来,一直向东打到小茅山、大连山。在大连山上,他们部队从地下挖出一箱箱的子弹,一看全是木头的,上上下下全哭了,他们的首长说:“弟兄们,大家各自跑吧,这仗没法打了。”弟兄们都散了。他就跑到西林耀来,帮一家人种田,成了家,但没有子女,去世有二十来年了。我当时对他说,那些子弹就算不是木头的,也打不过日本人。

小茅山的山顶上有座庙,二进三间,很大的,有道士,有菩萨,“文化大革命”时拆了,拆下的石料非常好。小茅山是进南京的必经之地,日本人打南京,就路过那里的。庙门口死的中央军好多、好多,路都不好走了。

我们上小学,小学就在本村的关帝庙里,很大,附近四个村上的小孩都来念书。那个老师可喜欢我咧,就住在我家。有什么事都叫我代理。日本飞机轰炸南京,他也要逃命。这座庙在1958年拆掉了。

日本鬼子在王后村的碾坊里杀了20多个人呢,都是用刀戳的。你到村上去找王恒锦,他知道。他90来岁了,还常常出来走走看看。你到那里一问就问到了。

10. 叶水兰口述

叶水兰,女,1913年生

调查地点:麒麟镇窦村

调查时间:2005年6月28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92岁,属牛的,跑反时24岁。

日本人打过来之前,他们派飞机来掉炸弹,掉在我们村侯智恩家的房子上,他和他的两个儿子(老二和老五)被炸死了。宝善寺里有个和尚是特务,他画亮月疤疤给日本飞机看,要他们去炸十里长山凹里国民党的子弹库,结果,日本飞机炸到窦村来了。这个特务后来被国民党抓住了。

后来,日本鬼子打过来了。他们在我家捞了一只鸡,挂在枪头上扛走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是日本鬼子,他们人不高,有一个人骑了

匹大黑马,那马可高了。天上还有一个球(指飞艇)。后来他们就走了,战线上的鬼子不惹人。后面来的日本人就不讲理了,他们住在十里长山凹里的子弹库里,晚上不出来,白天翻山过来,烧房子,找花姑娘,糟蹋妇女,见人就打,坏得厉害,这些事我行行(全都)晓得。

家炳的父亲,叫新才,被鬼子戳了七刀。后来杀了一只老母鸡,用鸡皮贴在伤口上,贴好了。

在小茅山那里睡了(打死了)多少中央军呀!还有许多老百姓,死的人歹哩!

(林桂芬插话)听我母亲讲,我的姨奶奶,就是我老婆婆的姐姐,姓杨,差一天就要结婚了,做了好多新衣裳。鬼子一来,在靶场那里把她开枪打死在水塘里了,塘里的水都红了。

(张秀英插话)有个女哑巴,沧波门那边石坝村的人,跑反跑到了余村。鬼子追她,她不懂。鬼子一连砍死 18 个人,都是余村的,我亲眼看到的。我跑反跑到了石桥口、周家边、余村,后来到了秣陵,那里有翻译,他们就不敢乱动了。

(叶水兰继续讲)茅屋那里也打死了一个人,是高桥门的人,男的,30 来岁,他是我们窰村人的外孙子,我亲眼看到鬼子开枪把他打死的。

王真兴,窰村的,就躲在家门口对面的高山上,躲在一个洞里。鬼子看到后把他打死了。当时他 40 来岁。

还有一个姓吴的小伙子,十八九岁,是住在窰村的江北人,躲在青龙山脚下的一个洞里,鬼子远远地向他开枪,把他打死了。

还有一个姓范的,小名叫“小呆子”。安民后,他去扒炮弹,被鬼子看到后一枪打死。还有一个“老烟囱”,姓鲁,是同一天被鬼子打死的。

在建南大队的中解村,许多人正在晒太阳,鬼子一下就打死了 18 个。

鬼子投降时,我在南京海福巷做生意,看到他们在兵营里把被单、包包都烧掉了,要走了。我就骂他们:“狗日的,你们也要死啰!”日本婆子坐黄包车,回回不给钱的。鬼子投降后,她们还不给钱,拉黄包车的就把车子一翻,把日本婆子掀倒在地上。她没有穿好衣裳,躺在地上“啊、啊”地直喊。路上看的人可多了,中国人都笑死了。

我们村潘航北的儿子在日本留学的,外号叫“小三子”。日本人打过来时,他三十来岁。当时他就说:“别看鬼子这么凶,他们立不长的,只能呆八年。”后来果然是这样。

[王照银(59岁,属猪)插话]我们窦村从来没有人来调查过。以前也没有搞过忆苦思甜。这里没人管。做石匠的在外面做生意,妇女呆在家里,上学的人不多。

11. 黄秀英口述

黄秀英,女,1925年生

调查地点:麒麟镇窦村沟西

调查时间:2005年6月29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1岁,属牛的,跑反时13岁。当时住在南京市文昌巷附近的红花地。我母亲带了我们姐妹三个跑到了安徽和县,哥哥留在家里看门。哥哥小名叫“西子”,没有大名,当时十六七岁,跟人学裁缝的,是学徒。鬼子进城后,他吓得爬墙逃命,被鬼子抓去后用刺刀戳死了,尸首没找到。这是我们从安徽回来后别人告诉我妈的。

我们回来时还没有安民。从水西门过来,一路上到处是死人,没人收。有的没有头,有的没有腿,有的没有胳膊的,到处都是。进城门时,鬼子不让进,用刺刀戳我们的米袋。后来有人告诉我们说,要向他们鞠躬,才能顺利进城。

回到家里,房子烧掉了。我们就住在竹子搭的席棚里。17岁那年,我嫁到这里。母亲说,城里乱,到乡下去吧。可乡下也不安全。农村里的活我又不会干,还不如在城里呢。人家讲“宁可投城里一条狗,不要投农村一条人。”城里的狗还有骨头啃啃呢,农村里就啥也没有了。

在那间房子里(用手指着村里的一间瓦房),六七个鬼子强奸村上一个女的,那女的后来走路都走不动了。这样的事多呢。

听人说,在小茅山那里,鬼子打死了好多人。从那里经过,要从死人身上跨过去。

12. 徐桂英口述

徐桂英,女,1920年生

调查地点:麒麟镇窦村沟西

调查时间:2005年6月29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6岁,属猴的,娘家在窦村徐家山。跑反时18岁,刚嫁过来,就跟了丈夫跑反,还有一个姑老太(婆婆的女儿),一起到江北。在下关过的江,那时候船就紧张了,上不去,许多人都摔到江里去了。我公公和婆婆是后来过江的,在江北找到我们了。在江北的浦口、六合,住在老百姓家里,走到哪里就要(要饭)到那里,出去了三年才回来。我们在六合卖五香鸡蛋,做小生意。回来后,一家子先住在中华门,因为以前我们在中华门住过。又过了几年,才一手回到沟西。

后巷(指麒麟青西的王后村)杀了好多人,鬼子一个一个地戳,血好深。我有个老妹子在后巷,是她讲的。

(黄秀英插话)我三嫂子的男人也是在后巷被杀死的,十几个人,一手抓到祠堂里,她都吓死了。后来她改嫁到沟西,到我大伯家来了。

(徐桂英继续讲)东林耀也打死了不少。鬼子追一个姑娘,是个哑巴,她往人堆里跑,许多人都被鬼子杀死了,全是小伙子。

我们沟西有一个姓杨的,叫“小苗”,在上坊桥上被鬼子杀死了。还有一个人在家门口被鬼子杀死了,名字不知道。村上好多房子被鬼子烧掉了。

我丈夫在北撤以前参加了新四军,北撤时没有跟新四军一起跑。在收六合县城时,他的一只眼睛被打瞎了。解放后什么照顾也没有,还被揪斗,说 he 来路不明,深更半夜地来抓人。

13. 王学沂口述

王学沂,女,1927年生,薛万海之妻

调查地点:麒麟镇西村123号

调查时间:2005年6月14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79 岁,属兔,娘家在麒麟门王后村,父亲叫王继远,我哥哥叫王祖荣,小名叫“锁子”,跑反那年他 22 岁。冬月初七那天,鬼子到王后村搜查,把他抓到了学校里(原来是村上的老祠堂),用刺刀戳死了。时间是吃过午饭以后。下午,我到学校去看的。他上身赤膊,反绑着双手跪在地上,裤腰带绑在手上,又往头上套。刺刀戳在心窝上。第二天夜里,我们家的人用被单裹一下,放在一块踏板(旧时床前放鞋子的长木板)上,把他埋在王后村后头的老坟里。后来我就跟了父母跑反,到山上,在石子窝里搭个小棚子,砍树搭的。后来还下雪,那时我才 11 岁。安民后回到家里,房子没有烧掉。

跑反时,我们在龙王庙借人家的锅烧稀饭,再用桶挑到山上。龙王庙村上,鬼子没有去烧杀。

14. 薛万海口述

薛万海,男,1926 年生

调查地点:麒麟镇西村 123 号

调查时间:2005 年 6 月 14 日

调查人:费仲兴



薛万海

我今年 80 岁,属虎,跑反时 12 岁。冬月初七,鬼子一来,在王后村祠堂里把我父亲杀死了。(王学沂插话:“那天夜里,我父亲找人去埋的,过了一年,又弄了口棺材,重新埋在西村的山上。”)我是跟了我舅舅跑的,我母亲过了两天就回家了,躲在西村后面的小山上。

我们村在王后村上被杀死的人多了,我家就有五个:

薛继福,我父亲,当时 49 岁;

薛继心,我叔叔,当时 40 多岁;

薛继山,我的老叔叔(小叔叔);

薛继林,我大伯,当时 50 多岁;

薛“和尚”,我大哥,当时 28 岁。“和尚”是外号,大名不晓得。

还有五个也是我们村的:

薛伦富,我的家门爷爷,60 多岁;

薛长生,我的家门叔叔,三十来岁,他是老大,有一小孩,后来被人抱走了;

薛常×,我的家门叔叔,他是老二,二十来岁,没后代;

薛常×,小名“小四猴”,他是老三,20 岁;

这四个人是一家子。

薛伦×,住在村西头的,老大,比我大 10 岁。

还有一个是徐家边人,是苏黄头的儿子,22 岁,结婚了。“黄头”是外号,大名不晓得。

我上过私学,念到《孟子》就没上了。跑反时跑到了狸子山、龙王庙、龙泉庵、贾家村,后来又跑到栖霞水泥厂。鬼子在门口站站,不敢进去的。我们在龙泉庵只待了两天。有三个鬼子喝醉了酒,到龙泉庵里到处冲,用刀砍佛台,把佛像砍得一塌糊涂。庵里原来挤满了人,鬼子这么一冲,大家都吓奔了(跑了)。

龙泉庵很大的。一个龙泉庵,一个小茅山,都蛮出名的。徐矮子、陈毅一到江南就在龙泉庵打歪(落脚),穿的衣服同老百姓一样,鬼子看不出来。徐矮子在北尚庄,鬼子要抓他,他趴在牛背上,背一个篾子编的披风(避雨的),从鬼子身边走过,后来骑牛跑了。

青龙山的架子山,在最高的地方打过一仗,中央军打开炮弹箱一看,

里面没有炮弹,只有石头,当兵的急得哭。紫金山上打了几炮,鬼子后退了几里路,后来打开炮箱,一看,又全是石头,仗就没法打下去了。徐家边东边山上原来有两个碉堡,有三四米高,钢筋有这么粗(3厘米),后来敲毁了。

本业寺在徐家边东面,宁杭公路南面,原来有 99 间半的房子呢,很大的,我们小时候那寺庙已经倒了,破破烂烂的,只有房框子。寺中原来有棵金边牡丹花,后来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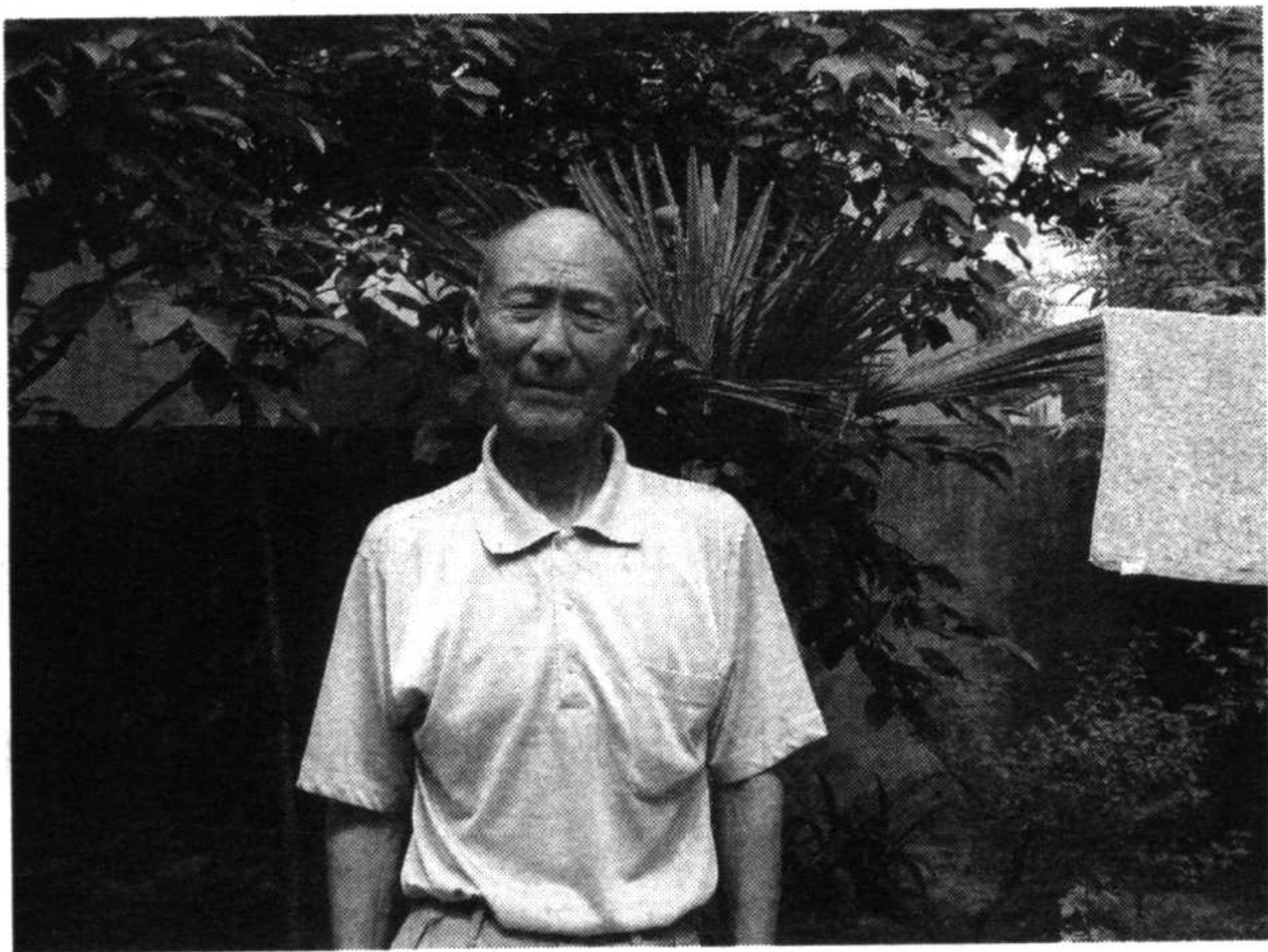
15. 薛伦炳口述

薛伦炳,男,1921 年生

调查地点:麒麟镇西村 42 号

调查时间:2005 年 6 月 20 日

调查人:费仲兴



薛伦炳

我今年 85 岁,属鸡,跑反时 17 岁。冬月初七,我和妹妹、弟弟跟了父母跑到了秦家渡,住在一位朋友家里。这位朋友是仪征人,在秦家渡帮人种田。后来,我父母和妹妹、弟弟又渡过长江到了仪征,住在那位朋友的老家,直到第二年农历二月底三月初的样子才回到秦家渡。我们村的房子大多数被鬼子烧掉了,我们没地方住,一直住在秦家渡那位朋友

家,我结婚了还住在人家家里。

日本人没有到秦家渡去,那里最安全了。村上只有一个人被鬼子打死,他叫窦礼炳,当时70多岁,他从秦家渡跑出来,在我们村附近的一座山上,被鬼子一枪打死了。秦家渡后来拆迁了,村上人都搬到麒麟门去了。

刚才给你们带路的人姓苏,叫苏连才,小徐家边人,是薛万海的女婿,招过来的,薛万海没生过孩子,他带了个女儿。他没有我大,才80岁。他家有5个人在王后村被鬼子刺死了:薛继林,薛万海的大伯;薛继福,薛万海的父亲;薛继山,薛万海的三叔;薛继心,薛万海的四叔;薛和尚,薛万海的大哥。薛和尚的名字是他奶奶起的,想让他活得长一点。他没有上过学,他的大名就没有叫出来。

还有一家,4个人在王后村被刺死,他们是:薛伦富(父亲)、薛长生(大儿子)、薛毛头(二儿子)、薛四猴(第四胎养的)。

这9个人全是用刀捅死的,在王后村的学校里,血流了很多。我们村上一共有16个人被鬼子打死,人数最多。电视里说有人在调查被日本人杀死的人,当时我就想,我们村上怎么不来调查呢?

“根子”的堂叔薛兴智,当时50岁左右,在麒麟门被鬼子开枪打死的。当时他住在乡政府那里,那儿以前是个庙,日本人有一个排住在里面。他是在跑反开始后好多天,恐怕有两三个月了,被打死的。

薛四来,兴字辈的,老四,当时40多岁,日本人刚来时把他拖差拖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薛兴禄,当时40多岁,冬月初七那天他躲在小徐家边(现在靶场旁边),被鬼子看到后用刺刀刺死的。

薛伦林,当时40多岁,冬月初七那天在自己家里被鬼子开枪打死的。

陈春山,当时60多岁,儿子媳妇都跑了,他没有跑,在家看门,被鬼子开枪打死的。

薛开同,当时50来岁,跑反刚开始头两天,在东流南边,山南头的北边,被鬼子开枪打死的。

苏连才的一个叔叔,小徐家边人,被鬼子用刺刀刺死的。日本人的

小兵只有刺刀,当官的才有长刀。这种长刀可厉害呢,热水瓶这么粗的树,一刀下去就能砍断,公路边上的电线杆子,一刀也能砍断。这事你到徐家边去问一个叫苏洪金的人,他是苏连才的家门叔叔,今年73岁,他知道。

“顺子”,姓吴,大徐家边的,当时二十来岁,也是冬月初七被杀死的,但不知道他是在什么地方被杀的。

我14岁开始学理发,17岁那年,日本人打过来,我满师了,开始给人理发。解放后分了五亩地,又要种田,又要理发,比一般人忙,祖产一点也没有,全是白手起家。生了五个儿子两个女儿,解放后盖房子就盖了五次,真不容易。大儿子今年60岁,退休了,他也是当过兵的,在大别山当过工兵,后来退伍了,在许世友开的煤矿里干活。

本业寺就在公路边上,我们小时候就没有寺庙了,我没有见过。你可以找白下场的人问问。白下场的白大洲,今年79岁了,他女儿在公路边上开小店,他的父亲白启林同鬼子夺一把刺刀,后来奔(逃)了,跑到栖霞水泥厂,他的手指全划破了。那水泥厂是德国人和丹麦人开的,后来安民了,鬼子不杀人了,我也到水泥厂看过。

尧化门那里有个大水罐,一个团的人被鬼子用机枪扫死了,在那里死的中国兵最多了。高桥门那里有个小水罐,我在外面理发时听人讲的。冬月初七打过来的时候,那些广东兵最可怜,穿的短脚裤,裤腿只到膝盖这里,下面是绑腿,那么冷的天穿那么一点点衣服。他们都是广东广西李宗仁的兵,我听他们讲是后勤供应不上,或者是有人贪污了。

16. 白大洲口述

白大洲,男,1926年生

调查地点:麒麟镇晨光白下场16号

调查时间:2005年6月20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0岁,属虎的,跑反时12岁。跑到栖霞寺,不保险,后来又跑到水泥厂,那里保险。



白大洲(左)

在王后村祠堂里被鬼子刺死的有我们白下场的父子俩。父亲叫郑金富,40多岁;儿子叫郑大呆,20多岁。

鬼子刚来的头一天,我们村上不少人躲在教育林场,就是本业寺那个地方,用红布做了面旗帜,欢迎日本人的意思,上面没有字,日本人把他们一个个拖到林场的院子里,把他们的衣服脱光了,叫他们跪下,用刺刀一个个地戳。就两个鬼子,把他们全戳死了。现在想得起来的有:许艺桂,五六十岁,徐家边人;许小四(许艺桂的儿子),20多岁;白启照,40来岁,白下场人;白启桃,40来岁,和白启照是堂兄弟;罗小六子,13岁,白下场人;赵德斌的父亲(赵立洲的爷爷)赵老头,60多岁,白下场人;程朝云(小名“前子”)的母亲,60多岁,白下场人;我的奶奶,当时62岁,在官塘司法局那里被鬼子开枪打死的,从这里翻山过去的山里。

村上的房子全被日本人烧掉了,一户也没剩下。本业寺的寺庙早就没有了,我小时候那里有房子,那不是本业寺的房子,是教育林场的房子。

我们跑反跑得早,鬼子还没进村就跑了。一开始跑到龙潭的李家圩,在那里住了六七天,住在亲戚家的。后来没粮食了,就打算回家弄粮食。回来时,先跑到栖霞寺,在寺里住了一个晚上、一个上午,我和我弟弟(白大锦)都在那里。当时听人讲,栖霞有难民区,安全,我们才去的。

上午,来了两个鬼子,一个把门,另一个挨个儿地查,看到一个年轻妇女,就把她的衣服脱了,当着许多人的面,在她睡觉的地方把她强奸了。那个女的怀孕了,吓死了。日本人走了,她还是不敢穿衣服。旁边的大人对她说:“姑娘,日本人走了,你快穿衣服吧。不丑的,不要紧,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们那时还小,不懂,吓得不敢看。当时只有一个鬼子强奸,另一个没有干。到了下午,寺庙里的人都走光了,都跑到水泥厂去了。寺庙里有和尚,他们也不敢管。我们在寺庙里吃的是自己带的米,有锅,吃的水是塘里的水,那时候水塘里的水干净,能烧饭的。大小便吗?不管的,随便。下午,我们就到了水泥厂,厂里有黄头发的美国人,日本人不进去。那些美国人好,有七个国民党的逃兵,穿便衣的,美国人给他们钱,叫他们过江,往北跑。我们大米吃光了,就在水泥厂里买,厂里有市场,附近农村里的人拿来卖的。还有人在厂里做小生意,卖油条、元宵,我们也去贩卖,挣两个钱。

我父亲叫白启林,当时30多岁,叔叔叫白启银,当时20多岁,我父亲在水泥厂住了没多久就回白下场弄粮食了。到家一看,村上房子全烧光了。这时候,父亲和叔叔碰到了两个鬼子,一个手里拿着东洋长刀(指挥刀),另一个拿着一支长枪。他们用毛巾把我父亲的手绑起来,另一个鬼子把我叔叔拖到断墙隔壁,也想找东西绑他。鬼子先用长刀戳我父亲的肚子,他一闪,腰间刺出了一长条口子。鬼子举刀砍头,他又一歪,头上砍下一块皮,没伤骨头。后来鬼子又一刀顶头劈下来,我父亲双手一顶,把鬼子顶倒在地上,他的手砍断一半,没断下来。这个鬼子叫另一个鬼子过来帮忙,我父亲和叔叔就一起跑了。跑出100多米,鬼子打了两枪,没有打着。两个人跑到秦家渡,我们的亲戚连夜把我父亲抬到水泥厂,厂里的美国人给他治好了,还没收钱。我叔叔没有受伤,他双手没有绑住。

鬼子刚来的时候,国民党在凳子山同鬼子打了一仗,死了不少人。后来平定了,我们到山上去割柴,看到许多死人骨头和骷髅头,一直没有人去收尸。究竟有多少死人,估计不出来。有一个国民党兵被鬼子烧死了,尸体摔在我们村前的水塘里,都发胖了。我父亲用席子把他包了包,埋在我们家的坟山上。现在,那个坟还在,每年清明上坟,我们顺便也给

他烧点纸,弄一个坟帽。

有一支国民党部队,过江过不去,从紫金山下冲出来,在上五旗、下五旗、青马、黄马那地方同日本人打,那里死的人多呢。这是听别人说的。那时有许多老百姓被日本人拖差拖去,替日本人背东西,他们亲眼看到了,回来后讲的。还有,许巷那里被打死的人多,他们说,半个村的人都被鬼子杀死了,你们可以去问问。

17. 苏洪金口述

苏洪金,男,1933年生

调查地点:麒麟镇徐家边35号

调查时间:2005年6月21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73岁,属鸡,跑反时才5岁。当时我们家住在小徐家边,1955年建靶场,我们迁到了大徐家边,我大哥迁到了西村。大、小徐家边没有一个姓徐的,长毛跑反时都杀光了,我们先辈是从安徽迁过来的。小徐家边就在靶场边上,主要是苏、吴两大姓,加上少量姓黄的。

跑反时,小徐家边村南有座大坟山,树又高又密。国民党部队的炮阵地就在那里,朝日本人打。鬼子看不到炮弹从哪里打出来的,只知道炮阵地在小徐家边。后来,国民党部队没有炮弹了,往紫金山撤,鬼子就冲进村里,把我们村四户人家的人都杀了,死了11个,房子全烧光了,一家不剩。大徐家边被鬼子杀死的人不多,没有小徐家边多。

我大伯叫李开炎,是招女婿找来的,当时40多岁。冬月初七鬼子刚来那天,在小徐家边村上被鬼子刺死。他儿子苏明照,当时21岁,也是那天被杀死的。

我父亲叫苏恒才,属羊的,当时40岁或41岁,在鬼子刚来的头一天,冬月初七,被刺刀戳死。

我的舅舅薛兴禄,那天在我家吃午饭,喝酒,鬼子一来就把他刺死了。

苏洪亮的大儿子苏复胜,被鬼子一枪打死,当时他家的房子被鬼子

烧掉了,他没有跑,就被鬼子打死了。二儿子叫苏来发,被鬼子刺死。苏来发的妻子被鬼子推入水塘后开枪打死。苏来发的儿子,还抱在手里呢,被推入水塘淹死。苏洪亮家的小媳妇(童养媳,18岁)被鬼子开枪打死。苏洪亮一家有五个人在那天死掉了。

苏复才,50来岁,鬼子用枪拐子捣他,把他烧死在柴堆旁,然后推入水塘。苏复才的三儿子,小名“三子”,当时23岁,也在冬月初七那天被鬼子打死了。

大徐家边被鬼子杀害的有四个:

苏洪金(和我同名,他小名叫“四宝”),在西村被鬼子杀死;

吴家洪的父亲,在大徐家边村上被鬼子杀死;

吴家金的老婆,姓钟,是个疯子,也在村上被鬼子杀死;

“顺子”,姓吴,大名不晓得,他是在王后村祠堂里被鬼子杀死的。

我父亲被鬼子打死后,我和两个姐姐(一个11岁、一个8岁),跟着别的大人跑到了青龙山劳改队那里的山上。我母亲是瘸子,留在家里没跑。我家有十来亩田,我父亲的年兄帮着种,没有雇人。到我15岁时,得力了,能挑100多斤了,就由我种田。解放那年,我17岁,就出大劲了(力气更大了)。

18. 吴为忠口述

吴为忠,男,1928年生

调查地点:麒麟镇晨光后村114号

调查时间:2005年6月21日

调查人:费仲兴、王健、李展腾、李宁

我今年79岁,属龙,跑反时9岁,解放时23岁,1954年办初级社时当会计,成立人民公社后在大队当主任。晨光初级社是江宁县第一个成立的,县委命名为“晨光”,这件事许多年轻人都不知道了。

我们后村就一个“小磨子”在鬼子刚来的时候躲在屋里被一把大火烧死了。别的人没有被鬼子打死。还有一个“小四”,他是在村前被飞子(流弹)打死的。

平文信是后村的姑爷,常到后村来。他在王后村被鬼子刺了好几刀,死里逃生的。他颈上一条伤疤,我们都知道的。王后村杀了那么多人,就他一个活下来了。

我们是冬月初六跑反的,走锁石、小湖、下法汛到窄堤,听到枪响,看到有人烧草堆。夜里到龙潭,第二天太阳出来时到江边。船很紧,我们等到下午三四点才坐上小木船过江,过了江都天黑了。我家和我大伯家共十口人,奔小铜山。身上就带了五元五毛钱,这是广东兵买了我家一口大猪和一头小猪给的钱,大猪给五元,小猪给五毛。在窄堤,堂妹妹哭,要人背,就把她摔在路边了。走了好几里路,我大伯舍不得丢下她,又走回头路,把她带走了。我堂妹妹现在还在孝陵卫住,今年72岁。

在小铜山住到快过年了,没粮食了,只得要饭。江北的狗特别多,不带棍棒不行。后来听说鬼子不打小孩,不杀人了,就在腊月二十九,我父亲带了我过江,回到了后村,一起照顾留在家里的祖母,我们三个人在后村过的年。我家的房子没有被烧掉,东边的烧掉了,墙也塌了。这个年过坏了。正月初一,一前一后来了两个鬼子,由塘山头的李桂洪和“二五子”带着,到后村来点名。鬼子用刀戳我们村的高老二,一排老头老太全跪下来求情。鬼子又用枪上的刺刀对准我父亲(他叫吴长兴)和苏家树戳,一戳一个洞,衣服上戳了许多洞。我们一手哭,一手求,老头老太都求。鬼子用刀背打苏家树,打得鲜血直淌,接着又打我父亲,头上打了个大包,回过头来又打高老二。当时我在场,亲眼看到那场面。高老二没打死,可吓出病来了,下半年就死了。高老二当时30多岁,我父亲和苏家树40多岁。

大年初一那天,我们连夜跑到栖霞难民区,我跟我表叔住在水泥厂,那里有警戒线,鬼子不敢进去。难民区里天天失火,不是这里失火就是那里失火。我家属叫郭仁英,我们同年的,她那时候跟了她父亲躲在栖霞大庙里,有难民粥的,小朋友去随便打,大人去要排队。

安民以后,土匪特别多,到处都打枪。枪都是中央军丢下的。好在我们后村有个苏家兴,当过东流镇的镇长,土匪不敢到后村来,比较安全。苏家兴是三开人物,对共产党、国民党和日本人都不得罪,解放后没有被镇压。那个苏家树当过伪保长,准备枪毙了,台都搭好了,夜里有政

策来了,可以宽大,第二天就把台拆了,没有镇压,送到了栖霞水泥厂劳改队劳改,后来死了。他这个人啊,好胜,有人恨他。

19. 李有华口述

李有华,男,1922年生

调查地点:麒麟镇建南东解61号

调查时间:2005年7月6日、14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4岁,属狗的。我二哥叫李有超,小名叫小连,被鬼子打了三枪,打死了。他比我大3岁,当时才18岁。

我弟兄三个,我是老三。大哥叫李有高。我跟了叔叔,做他的儿子。跑反时就跟他一起跑到龙都大庙里,中间没回来。我父母一开始没有跑,我二哥被打死后才跑出来的,他们比我们跑得还远,过龙都,跑到三岔(音)了。我们是在鬼子进了村才走的,我跟了叔叔、婶婶,挑了米和被子,还有锅碗,晚上走的,白天不敢走,人多得很,我们跟了别人跑。先到窠村山上,躲在石头宕子里,人多呢。去了3个鬼子,一个是翻译,只听得他喊:“出去!出去!”叫男的女的分开来站着,鬼子就挑女的,当场奸污了,拖到石头宕子里去的,那里有被子。到了晚上,我们就跑,从小茅山那里走。那里打死了许多人,看不清,我们都是从死尸上跨过去的。到了余村,没住下来,又往南跑,到龙都去了。我是在龙都听别人说二哥被打死了,我没有看到,跑反回来后,又听我母亲讲的。

我有个亲戚,姑妈家的儿子,在海福巷南面的杨庄大婆口酒厂弄了一坛绍兴酒回来,放在我家里。那时候乱,酒厂没人了。酒坛子是陶瓷的,大肚子,这么高(60厘米左右),小口,口只有这么大(10厘米左右),装的是黄酒,不是啤酒,那时候没有啤酒。鬼子到东解来喝酒。第一天喝的是绍兴酒,喝醉了就打人。第二天又来了,他们就把酒藏起来,不给他喝。鬼子就找,一开始找不到,我表弟就把我二哥找来了,拖着他去找酒。后来,酒找到了,鬼子火了,拿起枪来要打。一粒子弹掉到地上了,二哥就把子弹捡起来,递给鬼子。鬼子装到枪膛里就开枪,没打死。二

哥叫了三声“妈哎”，鬼子又补了两枪，在门外把他打死了。当时我母亲是跟着我二哥出来的，她全看到了，是她跟我讲的。二哥打死后就埋在村后，二嫂改嫁了，他们没有后代。

那天一共来了几个鬼子，我不知道，是哪一天也不知道。那时还没有过年，是冬月腊月交界的时候。鬼子是从华工那里（今南京理工大学）来的，是从教导总队那里跑来的，跑到这里也就一个来小时的路。他们到这里来，主要是找花姑娘。弄点吃的、喝的是次要的。

鬼子在中解打死了 15 个人呢。他们的姓名不知道。

鬼子常打人。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进南京城没有一个不挨打的。打耳光，家常便饭。

20. 孙如意口述

孙如意，女，1918 年生

调查地点：麒麟镇建南中解

调查时间：2005 年 7 月 6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88 岁，属马，跑反时 21 岁。

我们是在鬼子进村后才跑的，带了个 3 岁的侄子和我们 2 岁的女儿，跑到小茅山、孟墓。后来回家了，一看，还不稳定，又跑到龙都，先住在大庙里，后来住在观音寺，前前后后跑了许多路。我丈夫挑东西挑不动多少，我挑得多，挑两个娃娃、两条大被子、两床小被子，一路上走走歇歇。第二年农历二月里我一个人先回来的，锄麦田里的草。

鬼子在我们村上杀人是在冬天。一天吃过午饭，有个鬼子喝醉了酒从我们村后水塘边经过，叫许多人排成一队，跪下，打死了七八个呢。有个老头姓王，四五十岁，膀子上打了一枪，就躺在地上装死，他活下来了。我二哥、二嫂被鬼子开枪打死了。二哥叫王强富，属羊的，当时 32 岁，二嫂娘家是徐家山的，属马，33 岁。二嫂跪在地上求，鬼子一枪从她后颈打进去，把她打死了。鬼子杀完了，我去看的。死人用芦席包一包，放在田里。后来安民了，再打棺材埋到山上。安装时，我婆婆用布去抹二嫂的

头,她的尸体还没有化呢。老婆婆都哭死了。

二哥二嫂一开始也是跑反的,跑到了小茅山。后来他们回来了,没有跑到龙都去,就被鬼子打死了。

还有一个小爷爷,40来岁,外地来的,住在我们村。他人老实,挨了一枪不会装死,还站着,鬼子又补了一枪。还有个姓刘的八老头,当时四五十岁,住在我家隔壁的,也被打死了。其他被打死的人就不知道了。

21. 王德富口述

王德富,男,1926年生

调查地点:麒麟镇建南中解16号

调查时间:2005年7月6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0岁,属虎的,跑反时12岁。

鬼子进了村,我们连夜就跑,先到窦村沟西,后又跑到小茅山、孟墓、龙都。

鬼子有好也有坏。满脸胡子的坏,见人就杀。白面书生的好,喜欢孩子,给糖吃,是那种一粒一粒的方糖。你不敢吃,他就先吃。

有两个鬼子在东解喝绍兴酒,一个没醉,一个喝得多,醉了。他见人说:“你是中央军!”一下子打死了七八个人。我的家门爷爷王瑞×,我喊他“五爷”,当时60多岁了,他挨了一枪没死,鬼子又补了一枪,还没死,歪着头回家了。王强富和他的老婆、余解南的小爷(注:这里指叔叔)、还有我姑爷龙昌来是在水塘边被鬼子打死的。“小和尚”、来贵、东发是在另外一个地方被打死的。

沧波门过去一点的言鲁庄,有个老太太被鬼子一枪打死在大堤旁的水塘边。

22. 熊长荣口述

熊长荣,男,1931年生

调查地点:麒麟镇建南东解

调查时间：2005 年 7 月 6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74 岁，属猴，跑反时 6 岁。

我的爷爷熊瑞林在跑反初期在沧波门被鬼子打死在王同勤的田里。

小茅山那里，国民党一个连的人，挂了白旗投降了，鬼子还是把他们全打死了。小茅山那里打死的人可多了，有当兵的，有老百姓，我们村的老人个个都知道。

有个女的，是沧波门下石坝村上的，鬼子要强奸她，她不肯，在茅屋那里被鬼子刺死了。

我们村的吴本四，40 来岁，鬼子问他要“马几”，就是洋火，他听不懂，说：“我要上茅厕！”鬼子一枪就把他打死在茅厕里。

我们村李小八的母亲正在给李小八理发，一个鬼子在河对面远远地放了一枪打在她脑门上，打死了，李小八没有打死。

我母亲叫熊树珍，当时三十来岁，在家没有跑。鬼子刚来时，她去砍柴，见鬼子来了，她放下镰刀就跑。鬼子追上来，想强奸她，用镰刀砍她的腿，她逃了，钻进了竹丝园里。那时天快黑了，鬼子没找到她。

中解打死的人可多了，他们村上年纪大的男人就不多了。在水塘边上被打死的有 15 个，都是中解的，有男有女，名字不知道。他们村的王成华知道，他参加过抗美援朝的，你可以去问问他。

鬼子在东解喝酒，第二天又来喝酒，一个鬼子喝醉了，村上一个小伙子送他回营房，他不想从中解的村里走，怕碰到村里的老百姓，怕鬼子会伤害他们，就领了鬼子从村子北边走，没想到许多老百姓就躲在村子北面的水塘里。水塘里的水快干了。鬼子把他们赶到岸上，叫他们排成一排，跪下，然后就开枪打人。

后来，这个小伙子把鬼子送到了孝陵卫的营房门口，那鬼子还没有醒，又在营房门口开枪打死了一条黄牛。后来，营房里的日本人就把这个喝醉了酒的鬼子打死了。这个鬼子是满族人，不是日本人。这个小伙子叫刘炳银，他兄弟几个呢，是东解村的，是他回来后讲的情况。那营房以前叫万德园，现在叫龙家庄、胜利村，就是现在的华工（指南京理工大

学)。以前,那里是国民党的教导总队。

从小茅山过来的鬼子,头队、二队是日本人,三队是朝鲜人。朝鲜人是专门杀人的。跑反时,我们一开始就跑到了小茅山,后来回来了,就在床底下挖个洞,鬼子来了,就躲在洞里。村上许多年轻人都跑到龙都去了,老年人没有跑。

我的一个姑奶奶,跑反时从一个庙里回来。刚走到五家大塘那里,被鬼子一枪打中,肠子都打出来了。当时没有死,是晚上死的,我亲眼看到的。那时,她60来岁。

沧波门门西的许多人跑反跑到了东解,鬼子一来,叫男的站一排,女的也站一排,脱光了衣服跪下。两三个鬼子用东洋刀一个一个地敲头,这边望望,那边望望,然后掳到大场底下,架了机枪准备打。但后来没有打,把一堆稻草烧掉了。这也是我亲眼看到的。

我们村的许昌兴在朝天宫亲眼看到鬼子把2000多个抓来的国民党兵全部开枪打死了,他回来讲的。

汤山塘泽有个人解放后卖菜,给我姐姐讲,马群那里有个坟,99个人葬在里面,就他一个人是从死人堆里逃出来的。那个坟现在还在,就在我姐姐家附近。我姐夫叫周继坤,外甥叫周二臣。

孝卫街那里死了许多老百姓。高桥门神路口,一个村的人差不多全杀光了,这是跑反回来后听人讲的。

沧波门的王国庆,开粮食行的,常常跟了牲口扛装米的捎袋(指较小的米袋),扛惯了,人非常有劲。一天,在沧波门土城墙的石坝(地名)那里,鬼子叫人站成一排,开枪打死了十几个人,他站在最后一个,他外甥被打死了,他没有打伤。 he 就把鬼子拎起来,掼倒在地上,把鬼子的枪摔到田里,飞快地跑了。鬼子醒过神来,朝他开枪,他横着跑,没打着。这是他同我一起干活时讲给我听的。

23. 王成华口述

王成华,男,1931年生

调查地点:麒麟镇建南中解

调查时间:2005年7月7日、14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75岁，属羊的。参加过抗美援朝，给首长当警卫员，1957年7月24日回到南京。

我家里很穷。父亲挑葱卖菜，夏天卖西瓜，糊生活。他很有劲，打起架来五六个人也打不过他。那年冬月初八，鬼子到我们村，把他的衣服扒开来看，说他是中央军。父亲指指手头的扁担，说：“我不是中央军，是拿扁担干活的。”鬼子就叫他挑东西。他挑了两大包山芋，送到了沧波门，鬼子就叫他回来。他刚想动身，后面的鬼子又到了，叫他挑背包，跟了跑。当时国民党兵和日本兵在紫金山对打，父亲不懂得卧倒，在沧波门的小桥下站着，鬼子就向他打了一枪，又戳了一刀，把他杀死了。过了一个多礼拜，我跟了母亲去找他。在沧波门遇到了开粮食行的王贵玖，他说：“你们不要去看了，那地方死的人可多了。”母亲求他带我们去，他点了盏灯笼，带我们跑到了桥下。父亲的脸已经看不清了，但穿的袍子上有个补丁，我们把他认出来了。当时也找不到人帮忙，他的尸体没运回来。后来，母亲把我的哥哥、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送人了，只留我一个。妹妹才1岁，还不会吃东西，后来就饿死了。

二月初七，母亲改嫁了，我就跟大妈（伯母）过。她是个瘸子，生活也很困难，我就跟二舅过了一年。后来在马群龙王庙给人放牛，只吃饭不给钱。10岁那年，干一年给一担米，到了16岁，就给四担米。后来又在鼓楼学了半年裁缝，又出去学翻砂。19岁那年南京解放，后来就参军了。

日本人很残忍的，把村上大部分房子都烧掉了。许多人都跑了，我也跑到了茅屋，睡在小松林里。小茅山那里有座庙，门口死的中央军有几百个，我们走路是从死人身上爬过去的。村上除了老头、老太都跑了。后来，一部分人又跑了回来。我家的房子被烧掉了，墙没有倒，就搭个小披屋，四个人挤在里面。

过了年以后，大约是正月二十左右吧，鬼子在我们村后的小水塘塘埂上一下子就打死了18个人。当时全村一共才14户，一下就死了18个，全是中解村的，所以我们村现在老人不多。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沧波门街上有个王贵前，是个好人。鬼子叫

他带路,找鸡。他带到了东解,鬼子打死了一只猫,烧了当下酒菜,在李有高家里喝酒。李有高家是卖绍兴酒的,有酒。王贵前带了鬼子回来,不想从中解村村里走,就从村子后头走小路,没想到中解村的20个人正好躲在村后的水塘里。这个水塘就在现在的人口学院(指南京人口学院沧波分院)里,早填平了。那时候塘很深,塘里没有多少水,塘埂又很高。他们躲在那里躲了好长时间,就叫两个小孩出去看看,看鬼子走了没有。这两个小孩跑到村里了,那18个人还在塘里躲着。其中有一个是女的,肚子很大了,再过两个月就要生了。这时候,鬼子从塘边走过来,看见有这么多人,就叫他们都上来,在塘埂上排成一排。那时候的人老实,也不反抗,也不逃跑。鬼子放了一枪,一串人就倒下去了。有个“五老头”,肩膀上挨了一枪,就躺下没动,他活下来了。我二婶没打着,她就跪下来求鬼子,鬼子用刺刀一挑,肚子里的小家伙就出来了。鬼子又补了几枪,把人都打死了。

鬼子开枪打人是在下午四点来钟。打的时候我在村里,打过以后我们村上的人一手跑去看了。塘埂全染红了,二婶的肚子挑成了两半。后来我站在塘埂上看着,看到有狼来就喊。

那天被鬼子打死的18个人,有的想不起来了,有的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了。现在能想起来的有:王强富夫妻俩、余道梅(侬子,40多岁)、刘宝金的父亲(50多岁)、王强叶的妹夫、王强修的妹夫、王长远的儿子王来贵。还有李小和尚,当时二十一二岁。他没有大名,他前头的几个孩子都没养活,他娘就给他取了这个名字。他打死后过了一年,他老婆就被东解的刘贵抢走了。那都是事先讲好的,抢寡妇。晚上,东解来了一大帮人,抱了就走,还留下许多人,准备打架。

我们村上还有两个人被鬼子打死了。一个是王来贵的老婆,在另外一个地方打死的。还有一个是后村(今王后村)的王德胜,他在稻田里拔草,鬼子在农科院那个地方(指今江苏省农科院)打迫击炮,一发炮弹从他屁股眼进去,把肠子全拉出来了,拖出来十多米长呢。我们全跑去看的。后来鬼子来了,说要赔,结果只赔了两扎白纸。

十里长山凹里有国民党的一个子弹库,就在小茅山底下的大山洞里。国民党的部队从库里搬子弹,一打,扑扑扑地飞不远;一看,原来子

弹头是木头做的,外面镀了一层铜,粗看还看不出来。打仗没有子弹了,当官的就开枪自杀,当兵的就走散了。

小茅山的山顶上原来有四个炮台,后来炸掉了两个,还剩两个。

(7月14日补充)日本军队里的韩国人走了之后,有几个女的韩国人留下来了。有一个女的在西解跟了王春焕,所以我们知道日本军队里有韩国人。韩国人也叫满洲人,他们是“鞑子”。以前,八月十五杀“鞑子”,他们同我们有仇,后来他们就过来报仇,专门杀人。

余新南是外地人,来中解讨饭,我家太爷把他收下来,住在我家的。孙如意的丈夫是红帮(土匪)的小爷,在外面混的,打她打得可厉害呢。家里的人个个恨他。他死了,在殡仪馆放了个把月,没人去管他。孙如意后来的日子就好过多了。

我们解脱村的村名是有说法的。过去有个皇帝,公主的驸马死了,那时候妇女不嫁二夫,她就到宝善寺来当尼姑。宝善寺可大了,有99间半的房子,跑长毛反的时候烧掉了。公主跑到中解和东解交界的五家井那里,宝善寺的住持和尚来迎接她,她就在那里换衣服,把皇宫里穿的衣服换成尼姑服。解第一个扣子,她向东指了指,说:“这是东解。”解第二个扣子,她向西指了指,说:“这是中解。”解第三个扣子,她又向西指了指,说:“这是西解。”到了宝善寺,她不吃不喝,合掌坐了40多天就死了,后来埋在庙底下。埋的地方没人知道,一直没有探出来。但有一个洞,大青石盖着,我进去过,里面有石桌石凳脸盆等东西,后来都被江宁县文物局拿走了。

我从朝鲜回国后在麒麟乡当过基干民兵连长、采石场书记、东流白水泥厂的教导员,后回大队当副大队长和民兵营长、治安主任,还当过食品厂厂长,兼任过中解小队的小队长。

24. 王东焕口述

王东焕,男,1921年生

调查地点:麒麟镇建南西解43号

调查时间:2005年7月14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85 岁,属鸡的,跑反时 16 岁。我们是鬼子进村后第三天才跑的,跑到龙都过去七里多路的地方,叫焦村(音)。全家一起走的,我父母,我兄弟三个,还有我老伴李带珍,她和我同年,娘家在麒麟门丁家村。跑反时,我们牵了牛、驴,夜里走,摸了一夜,天亮到龙都。没住大庙,在焦村住了 51 天,过了年,快下小秧了才回来。在那里把牛卖了,驴也卖了,吃光了,没钱了才回来,太平了回来的。

西解村上被鬼子杀死的人有好几个呢。有的是外村来的,不知道姓名。西解本村的有两个,一个是“二道毛”,女的,姓杨,十八九岁,鬼子刚来时才成亲,鬼子一来就被开枪打死了。还有一个叫楚正富二十来岁,也是鬼子刚来时被开枪打死的。

在中解村杀人的鬼子是从沧波门过来的,我们村的雷同春把鬼子带到东解,他们去找花姑娘,没找到,在姓李的一家找到酒了。酒是绍兴酒,是从大河口酒厂挑来的。喝完了酒,也是雷同春送的。雷同春比我大 2 岁,他想走中解北面,从没有人的地方走,无意中在水塘边碰到了中解的 18 个人。有一个人没有打死,在下巴这里打了一枪,就装死,在死人堆里没有动,他活了好长时间,解放前死的。雷同春是好意,不想好事做成了坏事。

鬼子在中解村杀人是过年前,不是过年后。

王强富夫妻俩有个小孩的,后来送到后巷亲戚家去了。

我读私塾只读到《大学》,只相当于小学三年级的文化程度。

(李带珍补充)“二道毛”被鬼子从背后打了一枪,肠子都出来了,拱到了草堆里。鬼子又放火烧草堆,她被烧得卷成一团,不成人样了,我跑反回来看到的。那时候,村上要是来了个鬼子,人人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动也不敢动了,尽由他们,不吱声。姑娘涂脸,涂得不像人样。被鬼子强奸的人不少。有个女的,才养了小孩,鬼子拖去就把她强奸了。不能提鬼子,他们要多坏有多坏。

我父亲叫李合义,被中央军拉差,说好过三天一换。有几个人不到三天就钻铁丝网逃走了,他没有逃。后来,在中山陵那里,他被鬼子打死了。他是属实狗的,当时 50 岁不到。我 10 岁到王家来做童养媳,跑反时 16 岁。家里父亲死了,母亲一个人带三个小孩,她又是小脚,干不动

活的,跑反时带了三个儿女趴在山上,没得吃的,有时别人给她一点吃吃。我母亲是从盐城逃荒过来的,人家喊她“侬子”,跑反时人家都不愿意靠近她,怕小孩哭,引来鬼子。她吃的苦最多。我在王家也是天天吃点剩饭剩菜,没有衣服穿,没有鞋子穿,大冷天光着脚出去挑猪草。我们跑反跑到龙都大庙,庙里许多房子被鬼子烧掉了,那么多稻谷堆在屋里,都烧糊了。

鬼子在这里住了八年,老百姓吃了多少苦啊。你把这些写下来,给学生看,要谢谢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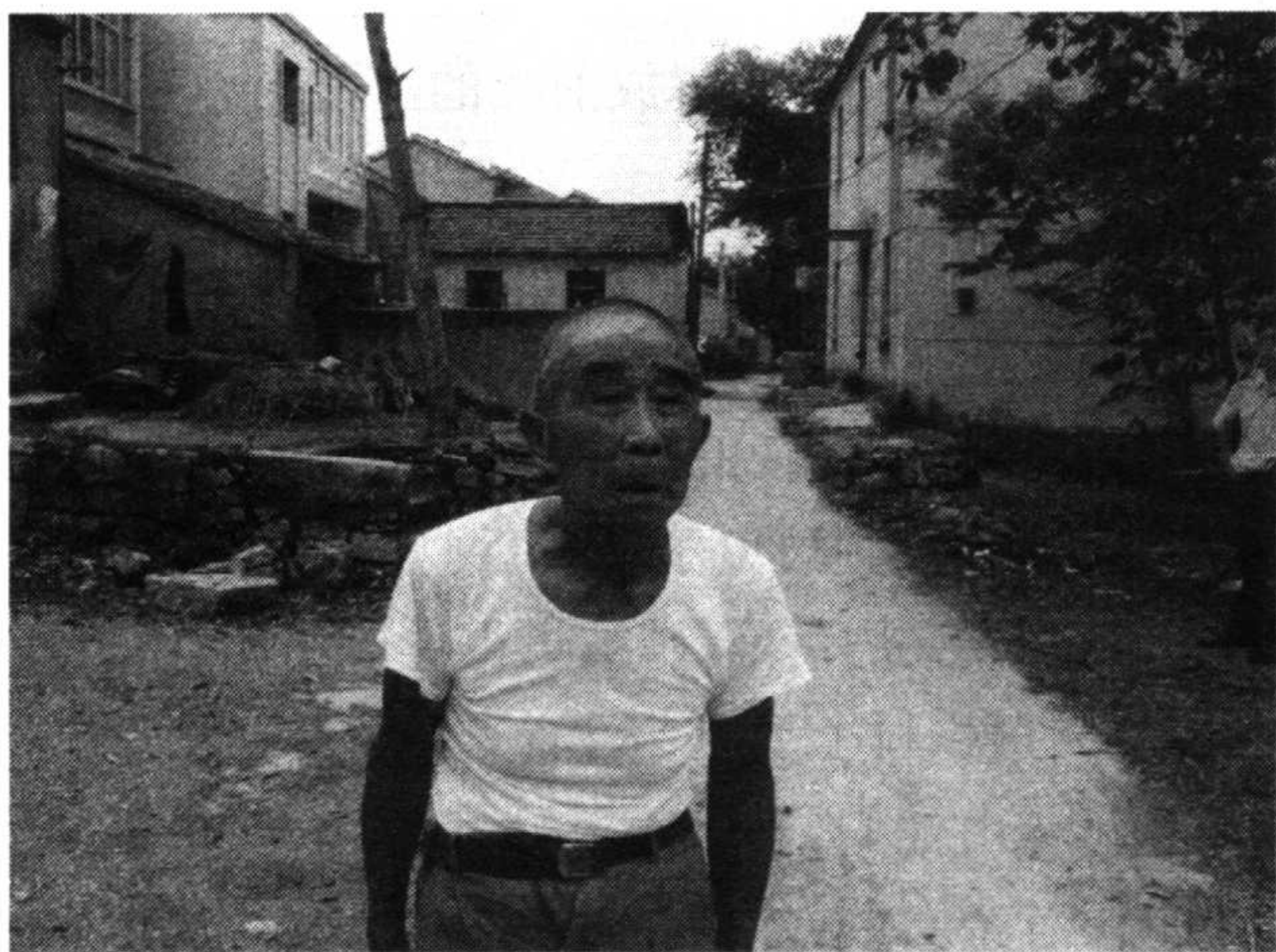
25. 吴锡友口述

吴锡友,男,1927年生

调查地点:麒麟镇后库80号附近

调查时间:2005年9月2日

调查人:费仲兴



吴锡友

我今年80岁,跑反时11岁。

我们村东面有条河(指九乡河),原来是弯弯曲曲的,现在挖直了。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那时都是荒野。西面有个贞节牌坊,不大高。有

个当官的老婆,结婚了,才来了几天,男的就去世了。后来,她没有走,当了一辈子寡妇,人家就给她立了块牌坊。“文化大革命”时,这块牌坊被砸坏了。

跑反之前,中央军在我们村上住过的,多数是广东人,穿夹衣,穿裤头,没有棉衣。他们腐败,不抗日,住了几天就走了。鬼子是从湖山、许巷一路过来的。他们把炮支在平家岗,朝后库打。头天打炮,第二天鬼子就过来了。他们不是骑兵,是步兵。那天,天上有个气筒(指飞艇),黑灰色的,好高好大,慢慢地朝前飘。

鬼子从东面跑过来,有几十个。村上有几个年纪大的人,打了太阳旗去迎他们。要是躲在家里,也就没事了。鬼子一到村上就把年轻人抓起来,看手上有没有老茧,有老茧的就说是中央军,做手艺的、脸上白白的,也说是中央军。鬼子叫小孩和老人回去,把年轻人统统抓到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排成一排,打死了,一共打死了13个,名字记不全了。

我父亲叫吴连兴,当时30多岁,种田的。一粒子弹从他的右耳下面一点进去,从右嘴角边上出来,打了一个小洞,牙齿没有打着。迷信的人讲,这是祖上有德,再偏一点就没命了。鬼子走后,我跑去看,有的打死了,有的没有死。我父亲当时已经不能讲话了,人家就把他抬回我家里,我们用布把他的头包起来,没有上药,连夜搀着他跑到栖霞寺难民区。那时候我家就四个人,父母亲、我和我妹妹,妹妹当时才四五岁。我们带了点米,搀着父亲慢慢走。姑夫帮我们挑箩担,一起走的。他是个歪子,头歪着的。到了栖霞寺,那里的人多呢,有几万人呢。那几天天气好,我们就住在外头。国民党的伤兵,军衣摔掉了,老百姓这个给他一件,那个给他一件,也住在栖霞寺里面。

鬼子到后库是哪一天,我不知道,那时还小嘛。第一天,鬼子光冲(杀)人,冲完就走,从灵山往西边打,没有烧房子。后来,另外一批鬼子在村上放火烧房子的。

鬼子在后库杀的人,我能想起来的有:

孙兴来,我的小舅舅,做木匠的;

吕叔宝,住在村后的,家里穷,没讨老婆;

吕三石,住在村后的,他打死后,他老婆就走了;

吕二虎子(哑巴的哥哥);

李二子,家里很穷,他没有后代;

谭正启;

孙勇成(孙勇平的大哥);

孙羊子(孙振林的父亲),当时 30 来岁,住在村前头的;

孙晃子,当时 20 来岁,没有后代,家里穷。

26. 孙勇平口述

孙勇平,男,1921 年生

调查地点:麒麟镇后库 50 号

调查时间:2005 年 9 月 2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老家是沧波门下石坝的,兄弟六个。

跑反前,我跟了叔叔在后库种田。鬼子打过来以前,有中央军住在后库的,他们是广东佬,说话听不大懂。他们捞了鸡,杀了就吃,不给钱,那时候乱了,谁还给钱?

鬼子冬月初六到沧波门,冬月初七到后库。鬼子在东流架了大炮朝后库打。有一发炮弹打在我家柴火堆上,石头磕(砸)下来,把我奶奶和一个外甥女磕死了。我奶奶当时 70 岁,身上还中了子弹。冬月初七,吃过午饭,他们就打过来了,一个个头上扎着一条红布。他们是跑过来的,没有骑马。当时,天上有个气球,老高老高的,很大,黑颜色,像条牛。气球往前飞,鬼子就往前跑,气球不动了,鬼子就不跑了。

鬼子进村后,看到年轻人就抓。我那年 17 岁,我大哥孙勇成 28 岁。鬼子看看他的手,看看他的头,说他是中央军,把他抓去了,我亲眼看到的。在贞节牌坊那边,鬼子把他们排成一排。我大哥是第一个被打死的。鬼子一枪从他后背打进去,他喊了一声:“哎呀,我的妈呀!”后来又打了一枪,从后脑进去,从脑门这里出来,他就死了。当时没有埋,就盖了盖,安民后用板子钉了口棺材,后来运到石坝老家。

我大哥是做手艺的,打剃头刀的,个子比我还高,人长得漂亮,头发

乌黑的。他打死在那里,我亲眼看到的。可怜哪,哭也没有用。

那天,我们连夜就逃了,先跑到徐岗头。第二天就跑到了栖霞寺,男的、女的挤在一起睡。鬼子天天晚上来找花姑娘,拖人,有的还给点钱。可是谁肯啊?有天晚上,鬼子打着手电来照,看男的还是女的。有个40来岁的男人,手电一照,一下子就爬起来了,鬼子一枪就把他打死。鬼子拖了一个女哑巴,她只是笑,不肯走,鬼子一刺刀,刺在肚子上,把她刺死了。后来,我们就到水泥厂去,那里有美国人,保险,还有老百姓站岗看大门的,鬼子不敢进去。

有个女的,二十五六岁,被鬼子抓去强奸了,又被带到百水桥鬼子营房里。她在那里有一个多月呢,后来逃出来了。

鬼子在后库打死了13个人,许多人的名字我都不知道。吕叔宝、吕三石、吕二虎子,他们都是住在村后头的,是双口吕的。有好几个家里都很穷,没讨到老婆,他们打死了就没有后代。后库讨不到老婆的人一共有八九个呢。

冬月初七下午,鬼子在后库冲人,没有烧房子。过了四五天,又有一批鬼子进村找中央军,灰堆、草堆,到处找,还烧房子,烧了几十间,我家的房子也烧掉了。烧房子的时候我不在后库,留在村里的老人告诉我的。听人说,观音洞里打死了许多人,仙鹤门那里也打死了许多人。鬼子住在百水桥营房里,天天出来找花姑娘,毛驴、牛拉去,杀来吃。

当年吃的苦,几天也说不完。这些事啊,对学生讲,他们不爱听,讲也没有用。你是当老师的,我才给你讲。其他人来,我还不讲呢。现在坏人太多了,弄不好就上当。

(四) 上坊镇调查

1. 耿泽民口述

耿泽民,男,1917年生

调查地点：上坊镇石马街 37 号

调查时间：2005 年 3 月 6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89 岁，跑反时 21 岁，同父母亲一起挑了被铺、大米、锅碗，跑到了龙都，住在老百姓家里，米吃完了就买一点。那里有个大庙，有 99 间半房子，住了很多很多难民。有个日本人叫句地，在淳化娶了个姓马的女人。他有四五十岁，据说是伍长，事务部长，经常背了一支枪在龙都街上走来走去，保护龙都人。他在街上一站，别的日本人就不敢胡来了，龙都的难民比较安全。后来，我们就回来了。回到家里一看，我家的几间瓦房都烧掉了，而且还很乱，我们就又跑，跑到了江北，在光门镇的一个小村里住下来。后来又跑到铜井镇，没碰到日本人，就回来了。

我们街上原来住在马路对面的一个人，是来投奔谢明项的。他躲在草堆里，被日本人发现了，拖出来用刺刀刺死了。这事发生在跑反期间，我们回来后听说的。那个人当时四五十岁，叫什么名字想不起来了。他有个儿子，现在住在东山镇。

（耿泽民女儿耿桂英补充）我母亲张荷英去年刚去世的，活到 76 岁。她头脑不糊涂，记忆力又好。以前讲跑反的事，我们也听到一点。我母亲曾被日本人关在一间屋里，关了三天，不准出来，又没有吃的。日本人把关在屋里的人排成两排，用刺刀来回地刷。

2. 阮全英口述

阮全英，女，1921 年生

调查地点：上坊镇高桥神路口 22 号

调查时间：2005 年 7 月 30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85 岁，属鸡。娘家在新桥，离这里不远。17 岁跑反，同婆婆、老伴一起跑到了龙都，躲在曹家祠堂里，离湖熟不远。我们在外面一年多呢，没吃的就到仓库里去弄粮。

我家的房子被烧掉了。村里没跑的都打死了,姓名不知道。

潘村有一家跑得晚,儿媳妇被鬼子强奸,儿子、婆婆被鬼子打死了,他们的姓名不知道。潘村就在我们村南边,你去问问就知道了。

3. 吴行珍口述

吴行珍,女,1928年生

调查地点:上坊镇高桥神路口 22 号

调查时间:2005 年 7 月 30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78 岁,属龙。我娘家在神路口,婆家也在神路口,是在这里根生土长的。9 岁跑反,跑到了龙都圩。那里有个中国人在日本当大官,他儿子打回来了,拿了张地图,在龙都一画,保护起来了,鬼子在龙都就没有杀人,我们躲在龙都圩里一点事都没有。

鬼子在神路口杀死的都是外地人,跑反来的。听老人讲,鬼子刚来的时候,把一个老太太按在茅坑里淹死了。她是外村的,不知道姓名。

我们村上有个姓吴的,十八九岁,在铁匠铺当学徒。鬼子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是打铁的,日本人恨打铁的人,就把他杀了。

鬼子打过来之前,在机场放炸弹。汉奸在附近打红弹(信号弹),日本飞机就知道炸什么地方了。

鬼子刚打过来时,在小茅山、窦村杀了好多人,都是难民,外地来的难民。

我讲这些事情不会倒霉吧?(连问了好几次)

4. 骆宝清口述

骆宝清,男,1919 年生

调查地点:上坊镇高桥前潘村 110 号

调查时间:2005 年 7 月 31 日、8 月 2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87 岁,属羊,跑反时 19 岁。跑反前在上海当工人,做针织品的。上海“八一三”打起来了,我逃难回来,没有再出去。我家里有十来亩田,就在家种田。

鬼子打来时是冬月里。鬼子没进村,我们就跑了。我跟了父亲、两个哥哥和两个嫂嫂一起跑到龙都圩,母亲留在家里看门。我们在圩里住了十来天,后来又在杨柳村的乾安庙(音)住了一段时间。龙都离这里 30 多里,我父亲过了些日子就回来了,我们是开春后回来的。中间也回来过几次,那都是深更半夜摸回来,弄点粮食,看看老人,再连夜回去。

我家的房子没有烧,我们这一路烧了四五家。我家东面有骆氏宗祠,西边有座五仙庙。这座庙在太平天国时就有了,有 99 间半呢。太平天国时烧了一次,剩下 6 间 2 厢,跑反时没有烧掉。

我们潘村有前潘和后潘,后潘的情况我不大清楚。前潘村被鬼子杀死的有好几个。有的在鬼子进村后才跑,跑到余村,在那里被杀了不少。

骆桂廷的儿子,小名叫“汤包子”,比我小一点,是独子,家里很苦的,鬼子来之前刚刚结婚。鬼子来了,他们躲在村南焦烟场的防空洞里,被鬼子发现了。鬼子要强奸他老婆,他就上去保护,结果,他们两个都被鬼子用刺刀刺死了。我们从龙都跑反回来没看到他们的尸体,村上的老人把他们埋了。骆桂廷在跑反前就去世了。

赵爱章的儿子,小名叫“毛头”,20 多岁,没成家。鬼子来了,他没有跑反,也躲在村南的焦烟场那里,结果被鬼子开枪打死了。

有个箩匠,姓方,板桥人,在我们村落脚,帮人编箩筐的。鬼子刚来时,夫妻俩在五仙庙后头的张家塘边上被鬼子开枪打死了。姓方的当时有三四十岁了,他们有后代的,但不住在潘村。

跑反时,高桥门那里是有门楼的,驻守在门楼那里的是日本的海军,到村上来的大多数是陆军。他们常常到村上来找花姑娘。我家当时有个阁楼,我母亲心肠软,许多年轻妇女都躲到我家来。最多的时候,阁楼上躲了 20 多个妇女呢。

鬼子来后第二年的秋天,他们搞细菌战,潘村的人家家都害疮,大人、小孩都害,只有极少数没害。生了疮全身痒,一抓就破,后来用河水洗洗,慢慢就好了。后来我到上海跟二哥说,他讲这是日本人搞的细

菌战。

跑反时跑到余村的人最倒霉,在那里被杀死的人最多了。我们村上有个姓潘的,他的外甥叫孙新招,平时住在潘村的,跑反时跑到了余村,结果在那里被鬼子打死了,当时20岁左右。这是我听人家讲的。

5. 张圣林口述

张圣林,男,1918年生

调查地点:上坊镇高桥后潘村55号

调查时间:2005年8月2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8岁,属马。

我祖父叫张明根,很看重我。我父亲叫张松年,他不行,好赌,对外讲仁义,对家里狠,把家里的田全卖光了。祖父就叫我学算盘,我一学就会,15岁就到外面去当学徒了。多亏我会打算盘,才有口饭吃吃。解放后在供销社,一直干到退休,现在一个月拿700元退休金。我现在也走不动了,不出门了,在家常常打打算盘,一来是活动活动,二来也是不忘本,不忘恩,不忘祖父的恩。

我19岁结婚,20岁跑反,跟了叔叔跑到了安徽,老伴没有跟我一起跑。后来回到龙都。龙都那里有个日本人,是个官,叫什么想不起来了。他的上人是中国人,他就帮中国人。鬼子一犯坏,他就去抓,龙都那里就太平一点。回到家里,我家的房子被烧掉了。

日本人在我们村上杀死的人多哪,我脑子记不清了。

跑反时,我们村上有个叫骆文景的,年龄同我祖父差不多,被日本人摔在他家门口附近的一个粪井里,淹死了。还有三四个老太太,被日本人推在水塘里淹死了。她们的名字不知道。

我祖父是信佛的,每年都去九华、南海烧香,教人要行善。我也信佛,行善,从来不做坏事。

6. 李茂善口述

李茂善,男,1920年6月生

调查地点：上坊镇高桥后潘村

调查时间：2005年8月2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7岁，属羊，不识字。跑反时跟了父母亲、哥哥、姐姐，一家跑到了陆郎。有一天，去了四个鬼子，有个鬼子被人打死了，另外三个就把陆郎一条街全烧掉了。我们一家就跑到龙都，住在隐庵（音），第二年的下半年才回到潘村。鬼子什么也不管，不收钱，不缴粮，出门来就找花姑娘。他们人少，中国的地盘大，他们管不了。

跑反时，鬼子把好几个人推在塘里淹死了，老文景摔在茅坑里淹死了，还有一家，夫妻两个，男的去保护女的，女的去保护男的，结果男的、女的全给鬼子杀死了。

7. 陈恩云口述

陈恩云，男，1920年6月生

调查地点：上坊镇余村55号

调查时间：2005年8月4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91岁，属猪的。跑反时多大年纪啊？想不起来。

跑反时，我跑到了龙都大庙，在杨柳村门口住过的。淳化有个女的，跟了保田（日本人），龙都街上就保险。后来听说日本人把保田抓去杀了。

日本人打过来的时候，天上有一个黑色的球，好大好大的，那是他们的标志，人到哪里，球就到那里。这个球从小茅山过去，飞到紫金山了。

日本飞机飞过来投炸弹，一颗炸弹落在余村，把村上孙国×的老婆（老奶奶）炸死了，尸体四分五裂，飞得老远老远。

日本人从（上峰）贾家村翻山过来，走山路到小茅山，再向沧波门。中国兵在小茅山、珠山造了许多碉堡，日本人架了大炮，把这些碉堡炸掉了。一部分人从正面向上攻，一部分从山上攻，两边夹攻，中国兵在小茅

山同日本人拼命,死了好多人。中国兵在山上打死了一个日本人的头头,日本人见到中国兵就戳,死人丢在小茅山的茅厕里、水塘里,塘里的水都红了。

高桥门有个人,二十来岁,到余村来躲难,日本人看他手上有老茧,说他是抓枪的,就用枪托敲他的头,又拔出刺刀砍他,把头砍下来了。

余村孙德根的老婆,比我大一点,抱了个小孩,小孩正在吃她的奶。日本人要她的骡子,就开枪把她打死了。

鬼子到村上来找女的,有三个老奶奶就躲起来了。鬼子发现后,一枪打死一个,再一枪,又打死一个,把三个老奶奶都打死了。这三个老奶奶,一个是陆世财的老婆,一个是苏招财的老婆,还有一个想不起来了。

余村的村民打死了一个日本鬼子。

(孙大启插话)孙常炳的歪歪(叔叔)在余村村上被鬼子开枪打死的,他的名字叫孙新招,他有个舅舅在潘村。

我们村南边有个碉堡没炸掉,门没有了,里面有过道。这个碉堡居高临下,现在四周都是竹丝(小竹子),等会我带你去看。

(余宗保插话)兴隆村是从堰稍搬过来的。青龙观在余村村上,现在被水库淹没了。小茅山上的道观就叫“小茅山”。

(五) 句容及其他地区调查^①

1. 吴景富口述

吴景富,男,1927年生

调查地点:句容下蜀宝华东葛壩

调查时间:2004年5月15日

调查人:费仲兴

① 本部分由费仲兴教授组织调查,区域紧靠汤山,故收录于此。

我今年 78 岁,日本人打过来那年才 9 岁。跑反时,我们躲在村南面的老凹里,白天在山上,晚上回家。村上的房子被日本人烧掉了一部分,有几十个人在官塘那里被日本人打死了。有个人叫张景发,是国民党军队里的人,穿军装的。他看见日本人的队伍从东边开过来了,以为是国民党的,就去迎,结果被日本人打死了。

2. 朱长旺口述

朱长旺,男,1921 年生

调查地点:句容下蜀宝华东葛墟

调查时间:2004 年 5 月 15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 84 岁,属鸡的。日本人打来那年 15 岁,在东阳烧窑。鬼子是冬月初五打到东阳的。此前有支中央军住在东阳,他们叫老百姓躲在家里不要出来。日本人一来,他们没打就撤了。在射乌庙的山凹里,中央军同日本人打过一仗的。打完后,有人去捡东西,但没捡到什么。射乌庙不小,有三进,头二十间房子。在孟塘的一个山凹里,中央军同日本人打过一仗,死的人一层堆一层,很多很多。这一仗打完后,许多人都去摸东西(手表、钢笔等),我也跑去看过的。

当时,住东阳的中央军穿灰布棉衣,在孟塘山凹子里打仗的中央军也穿灰布棉衣。穿单衣的是广东兵,他们不是蒋介石的部队。当时,老百姓就说:“这么冷的天还穿单衣,冻都冻死了,还能打仗吗?肯定要打败仗。”

我 21 岁那年才搬到东葛墟。那里好一点的房子,特别是楼房,都被日本人烧掉了。鹿山庵也烧掉了,但宝华山上的大庙没有烧。那时候鹿山庵里住的全是和尚,日本人一来,和尚全跑掉了。日本人白天是狼是虎。晚上就不敢出来了,他们人少。二鬼子(汪精卫的伪军)晚上是出来的。在东葛墟,老百姓主要是吃二鬼子的苦,他们常跟着日本人来扫荡,一来就向老百姓要钱要粮,还动不动地抓人、打人、杀人。那年月,替日本人办事的二鬼子和汉奸可多了。

日本人每次来扫荡,汤山都有人送信过来的,所以提前上山躲起来了。那时候,我们这一带的山上全是又高又密的大树,一进了山就谁也看不到了,鬼子是不敢进山的。

新四军在东葛墟一带打游击,正规的新四军都穿灰军装,但游击队全是老百姓,穿老百姓衣服,鬼子也分不清。

3. 陈美龙口述

陈美龙,男,1935年生

调查地点:句容黄梅冯岗头

调查时间:2004年7月17日

调查人:费仲兴、龚秀芬

我今年70岁,属猪。跑反时,父母亲背着逃到了龙潭北圩。

跑反时,我们村有个老奶奶有病,躺在床上。鬼子进门掀开被子一看,是个害病的老太太,一枪就把她打死了。这是跑反刚开始时发生的事。她孙子今年已经82岁了,叫王光宝,有一个重孙子也63岁了。

还有一个男的也姓王,跑反开始时躲在一个水塘边,抬头看看鬼子来了没有,鬼子看到后一枪就把他打死了,那枪法准得要命。后来,他哥把他埋了。

贾母巷北面的潘家边,有一户人家,两个儿子都被鬼子打死了。他们有后代的,有一个今年也70多岁了。句容东边有座关帝庙,有几十个人在那里被鬼子打死了。

黄梅桥的鲍世元原来是新四军,和巫恒通平起平坐的,都是陈毅的部下。巫恒通原来是小学教师,后来被鬼子抓住了,绝食饿死的,解放后追认为烈士,墓就在行香公社。鲍世元的儿子鲍毅也是新四军,当上了营长。后来,他们父子俩一起叛变,把一个营的武器全带走了。解放后,鲍世元被枪毙了。他儿子跑到上海,被判了20年徒刑,现在还活着,90多岁了,不知住在什么地方。鲍世元是句容大卓侯家边人。

4. 刘明富口述

刘明富,男,1925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汤林村(原住句容黄梅桥南巷)

调查时间：2004年9月21日、10月9日

调查人：费仲兴



刘明富

我今年80岁,属牛,南巷人,现在跟儿子住,买了人家的二手房。这里是汤山汤林村,暂时没有门牌号。

民国26年(1937年)冬月初四跑反,在南巷那里,这是个纪念日,年纪大的人都知道。我跟了父母、哥哥和一个弟弟、一个妹妹跑反,一起跑到了龙潭北面的黑鱼荡。这个地方现在变成长江的江面了。在黑鱼荡住了半个月,又到东阳,见到鬼子,又跑到宝华山南面的东谢、西谢,一路上见到死在路边和田间的人多极了。我们在东谢、西谢住了三个多月,白天在山上躲,晚上住在老百姓家里。我哥哥当时18岁,他和父亲常在夜里翻过九华山到南巷,去地主家挑粮食。后来安民了,汤山的唐大先生(唐庆升)派人去喊:“安民了,你们不要在外面躲了!”我们就回家了。

跑反时,村里的保长给大家开难民条,大家拿着难民条跑,有的鬼子看到难民条,就说是良民。

窑湾那里有家姓蓝的,七个人躲在安基山公路边的一个地洞里,被鬼子发现了,开枪打死了六个,只剩下一个3岁的男孩没打死。这个人现在还活着,大名不知道,小名叫“小买子”,住在东巷四队。他叔叔在东

巷,他是由他叔叔带大的。那六个人的坟墓在窑湾,每年清明扫墓时,坟头上总有六个坟帽。

南巷有个人叫王文洪,当时三十来岁,跑反一开始就被鬼子拖到村外刺死了,我亲眼看到他被拖走的。

还有一个叫王在高,跑反一开始被鬼子抓到南巷村中间的菱塘旁边开枪打死的,死时三十来岁。这件事我没有看到,是事后听人说的。

鬼子在南巷放火,天快黑了,陈梅根(40多岁)、韩朝利(40多岁)、李水和(50多岁)三个人去救火,鬼子看到后把他们三个开枪打死了。这是跑反期间回家挑稻谷的人给我们讲的。

还有一个王金高,外号“三呆子”,40岁上下,在南巷村外头的雷猪塘边上被鬼子用刀杀死了。有个20岁左右的小伙子叫韩朝堂,躲在水塘边,钻在攒稻的木桶底下,没有被鬼子发现,逃了一条命。

在窑湾的黄土岗,鬼子打死了一个中央军,这个人坐在那里吃山芋,吃了半只,被打死了,我亲眼见到的。那个人个头很大,不知是哪里来的。在胄王村出村的地方,一个50岁上下的老百姓也被鬼子打死了,也是亲眼看到的。

跑反时,南巷百分之八十的房子都被鬼子烧掉了。南巷的白水庵没有烧掉,这个庵有八间瓦房,不高。韩正礼家的房子,前进烧掉了,后进没烧掉。他家是南巷第一大户,有260多亩田,我帮他家种过三年。上峰高庄那里有八亩,安基山螺丝冲老虎洞那里还有庄田,还有一片山,有三间草房,我在那里给他家扎过柴。韩正礼家的房子,后进是稻仓,别的人家稻谷烧掉了,都在他家挑稻谷。跑反回来后,有十几个妇女躲在这个稻仓里,被鬼子发现了,就拖出来糟蹋。鬼子叫南巷的男人同这些女的干,还用刺刀对着男人,还喊,喊的声音很高,人都吓死了。当时鬼子有十来个人,他们自己把妇女拖到另外的地方强奸。这是开春以后发生的事,已经安民了,时间是上午。后来汪精卫过来,他同日本人订了条约,日本人就不敢干这样的事了。那些妇女被强奸后没有杀死,也没有听说被抓走当慰安妇的。

韩正礼兄弟三个,他是老大,人缘还好。老二叫韩正奕,老三叫韩正文。老三在村上有190多亩地,我种了他家12亩6分。鲍世元在黄梅桥

当自卫团团长,常常来南巷收税。韩正文写好条子,把田让我们种,说好由我们交税,不收租子。那年稻子长得好,鲍世元收的税也不多,韩正文反悔了,跑来问我们收租子,说:“谁不愿交租子就把田丢下来,不准你们种!”周长柱、赵大宝、伏田宝等 13 家种他的田,都不愿交租。条子上写好的,他说不干就不干了。

我家的房子烧掉了,就用稻草搭个小棚子住。下雨天,东也漏,西也漏,衣服淋潮了,被子淋潮了,没有换的,只能捂在身上。衣服破了没有换,棉花一团团地露在外面,不成样子。身上长满了虱子、疥疮。冬天喝点稀粥,晒太阳取暖。哪有钱买东西,哪有钱上学。现在的日子比那时不知要好多少了。

我想起来了,东巷五队彭长友的父亲跑反时在九华山南面的松树山上下来找水喝,被鬼子看到后开枪打死了,一脑袋的血,流了一地,我亲眼看到的。他当时三十二三岁,叫什么名字不知道。那时,九华山南面长满了大树,一棵一棵都很粗,现在山上的树都没有了。

现在,南巷那里经济条件还是不错的。有采石场,还磨石粉,就是抹墙用的石砂,那东西挣钱快,挣钱多。

(2004 年 10 月 9 日补充)冬月初四,日本人刚来的那天,我们先跑,跑到了西巷后面的山坡背后。赵长华当时 60 来岁,跑得晚一点,刚跑到西巷后面的那个山坡上,被鬼子打了一枪,子弹从左肩穿过去,流了许多血,但没有死。跑过了那个山坡,鬼子就打不着了。他的儿媳胡桂英,当时 30 来岁,娘家是黄梅胡岗的,她被鬼子开枪打死了。赵长华的孙子赵立功,当时 6 岁,左膝盖上被打了一枪,没有死,到成立生产队的时候(1958 年成立人民公社后,农村里才有生产队)才去世。还有一个陈方礼,当时 17 岁,在同一天同一地点被鬼子一枪打脚背上,负了伤,没有死。他哥哥把他背过了山坡,他就没事了。过了五年,他得病死了。跑反前国民党抓壮丁,也教大家唱歌的。有支歌叫《大路歌》,我还记得一点,“军人军人要兴起,我们中国被人欺。日本强占我土地,我们同胞做奴隶。背起重担朝前走,自有大路快转弯。快快起来干革命,快快起来干革命。”我们听了,也就会唱了。

南巷的那个人叫陈方仪,小名叫来宝,在上海做过皮坊,会点武功,

对付一两个小伙子没问题。解放后在青海坐了七年牢。他的哥哥叫来经。

小买子家六口是在孤山堰二营的一个洞里被鬼子杀死的,他有个叔叔叫蓝连喜,还有个叔叔叫蓝小龙。顺和的儿子叫朱义根。

家谱有挂谱和睡谱两种。挂谱不值钱,当不了的,睡谱值钱,能拿出去当的。睡谱写得详细,几十代的人,装一大箱子,死人、活人都写在上边。

5. 张庆龙口述

张庆龙,男,1928年生

调查地点:句容黄梅桥新塘周家边81号

调查时间:2004年10月27日

调查人:费仲兴

今年我77岁,属龙,跑反时10岁,跟着大人跑到了江北仪征,那里没有鬼子,安民后就回来了。

我姑姑嫁给前村街的赵老三,她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那时候妇女多半没有名字。姑姑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儿子叫赵德富,老二、老三分别叫赵德荣、赵德华。跑反期间,德荣、德华被鬼子杀死了。我的堂兄弟,名字不知道,大家都喊他“呆子”,是我大大(伯伯)的儿子,当时我大大带着他住在前村街,不住在周家边,所以周家边的老人也不知道他的大名。我的叔叔叫张远信,当时在神家庄一家杂货店干活。跑反时,他就住在我姑姑家。鬼子杀人那天,我的堂兄弟呆子和我叔叔张远信在一起被鬼子杀死了。安葬时,我叔叔是单埋的,其他几个同辈的合葬,并排躺在一个坑里。安民后过了几年,我父亲去世了,我叔叔的尸骨也从前村街运了回来。

鬼子杀人以后,我姑姑带着两个孙子和一个孙女慢慢地糊日子。赵聚金比我小1岁,姑姑教着他种田,他们的日子很困难。那时候我经常到前村街去玩,他们的情况都知道。

陈友才是我的大表姐的丈夫,同一天被杀的。二表姐的丈夫姓陈,

润南人。跑反时,他脖子上被鬼子刺了四刀,没刺死,活了下来。

我们周家边的杨成才在跑反时被鬼子打死了,当时 40 岁左右。鬼子要他去找花姑娘,没找到。我们村上被鬼子打死的人就他一个,被烧掉的房子也不多。

6. 蓝洪银口述

蓝洪银,男,1933 年生

调查地点:句容黄梅东巷棚场 35 号(原住汤山镇青林孤山堰)

调查时间:2004 年 11 月 2 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祖上是苏北海州(灌云,灌南)的。我爷爷兄弟三个,他排行老三,他们的名字叫蓝树根、蓝树桩、蓝树叶,我爷爷不知是树根还是树桩。

我今年 72 岁,属鸡,跑反时 5 岁。跑反前,我家住在离后巷不远的孤山堰,现在属汤山青林。跑反时,我们躲在马路下边防洪沟边上的两个洞里,我家一个洞,我伯父家一个洞。我母亲没有躲在洞里,她事先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跑反时,我很小,印象非常模糊,只记得打仗时天上有一小朵云(指日军的飞艇),灰灰的,白白的,不动,很高。后来听大人讲,那朵云到哪里,日本人的先头部队就到哪里。冬月十二那天下午,鬼子杀人,在洞口附近被杀死的有五个人:

我的爷爷蓝树×;

我的父亲,小名叫“小毛子”,大名不晓得;

我的大伯,小名叫“大白子”,大名不晓得;

我的伯母;

我的奶奶,当时她没有躲在洞里,在厨房里,听到枪响,就跑出来看,鬼子见到后把她一枪打死,她死后斜靠在墙根旁;

我同年的堂兄弟,5 岁,他是被鬼子攒(摔)死的,攒死了,又刺一刀。

鬼子杀人时我还睡在洞里,醒来后不见大人,就爬出洞口哭。我的大歪歪(大叔叔)蓝小龙冒着危险把我抱走,鬼子的子弹嗖嗖地响,打得

后面的泥土直冒烟。我大歪歪当时才 19 岁。当天晚上,我的老太爷(曾祖父)把我抱到叔叔家里躲了一个晚上。他家就在窑湾的一个土凹子里。后来,我就到了东巷,由我的家门大伯蓝连喜领大的。后巷那里有个人叫安时和,比我大几岁,他对我很好。我家人的坟墓就在后巷二营通安基山水库的路边,每年都去扫墓的。跑反时,后巷只有两三户人家,二营那里也没有几户。

现在窑湾有五六户姓蓝,上窑湾还有一家姓蓝,他们都是蓝小龙的晚辈。

母亲逃出去后改嫁到苏州。我 12 岁那年同她在青林一个庙里见过面。家门伯伯和伯母不让她带我走,因为他们没有小孩,把我养到那么大不容易。

后来,我 13 岁就开始给人放牛,牛在谁家干活,就去谁家吃饭。放牛的地方远得很,在句容亭子的螺丝宕、西谢、东谢一带都放过牛。冬天那么冷,我就穿一条单裤,而且是补了又补的。放牛的时候,新四军游击队的队长戴庆元都知道我的,叫我和另外一个小鬼放哨、送信。他们写好的信,缝在我的裤腰带里,我们光着上身,束了裤腰带出去送信,鬼子从来不搜小孩的。这段历史我以前没有给别人说过。13 岁放牛,16 岁就解放了。1956 年出去做工,在市建二公司搞基建,当小工,后来开吊车。1988 年退休,现在每月拿 700 来元退休金。

我家对面的山上有炮台。小时候,我们在门口看,看到有人在山上忙,但不知道他们是在修炮台。过了年把,日本人就过来了。鬼子从山上冲下来,把躲在洞里的人拖出来,拖到洞口附近的荒坡上开枪打死。我老太爷连夜把我奶奶拖过来,一起埋的,当时用土堆了一个坟。

跑反时挖了两个地洞,门朝西,一家一个,隔一两米远,洞里铺点稻草。孤山堰周围的山上有许多炮台。东巷这边也有炮台,南边的水库旁边就有一个。老伏牛山上还有一个。

7. 陈世江口述

陈世江,男,1919 年生

调查地点:句容黄梅前塘潘家边 61 号

调查时间：2004年11月24日、26日

调查人：费仲兴



陈世江

我今年86岁，属羊的，13岁开始上学，在东岳庙上到高小毕业。跑反时19岁。1961—1968年担任前塘大队的书记。

冬月初三晚上，鬼子在包家村放火，烧得红红的，我们老远就看到了。我三嫂刚生小孩，还不满十朝（十天），不能让她一个人留在家里，所以我们到冬月初四才跑反。那天上午，我和我三哥一人挑一副箩担，刚准备走，鬼子就从前塘过来了。他们一进村就用刺刀对着箩筐，要我找花姑娘，见筐里有花生，他拿了就走。过了一回，来了一批骑兵，向我招手，要我牵马，我就只好跟他们走了。

第一天到冯岗头、夏家庄、杨家村、新塘，在北庄歇夜，14个人住在三间房子里。第二天到了孟墓，中央军和日本人对打，枪炮声响个不停。鬼子要我去洗饭盒，我把鼻子贴着地，爬到水塘边洗好了。回来时，一块弹片削掉了左耳上一片肉，流了许多血，过了两小时才醒过来。孟墓那里的房子被日本人烧了，妇女鬼哭狼嚎地喊。那天，我们在半边山南面的小平房里歇夜。日本人叫我去拎水，我哪知道哪里有水塘呢？后来听到水公鸡（苦鸭子）叫，就知道附近有水塘了。拎了两桶水往回走，一不小心被绊倒了，水全翻了。一看，原来是一个中央军的死尸。再回去拎，

走路就格外小心了。冬月初六到了卫岗,在那里见到了我三哥,他也被鬼子抓差了。我们说好,谁先放出来谁就先回家。冬月初十,进了南京城。一路上,中央军和日本人对着打,头三天打得最厉害。日本人的一个班长叫奥国良,打枪时就向我喊:“小孩,小心!”还让我躲在马肚子下面。还好,那马没有动。他同我交谈,问这问那的。他问中国人读书要缴多少学费,还说他在东京一家有限公司当职员,以后要带我去东京等等。我们在南京城里住在五台山,日本人出去到处搜东西,店铺里查了好几遍,乱七八糟的,没有什么东西了。

在五台山住了十一二天,我又跟了鬼子的骑兵出南京城,到索墅。奥国良一直送我到中山门,给我开了一张通行证。他告诉我说:“若皇军向你招手,你就朝他走。你要是往别处跑,就会啪的一枪。回去要走大路,走小路就啪的一枪。晚上不能开小差,开小差就啪的一枪。”

我跟着鬼子的骑兵到了索墅,住在笪寿海家的三进大瓦房里。下午四点来钟,他挑了一副箩担在门口绕来绕去,我就问他:“你是什么人?”他说:“我就是住在这里的。要进去挑点稻谷给小孩吃。”我就在纸上写“他来挑稻谷给小孩吃”,日本人看了就让他进来了。他挑了稻谷要走,又对我说:“日本人要烤火,屋里有劈柴,叫他们不要烧农具。”我就在纸上写“烤火用废柴,不要烧农具”。我在索墅住了19天。后来,快过阳历年了,奥国良也到索墅来了,还带我到团部去过一次。他高高的个子,二十七八岁,说要带我去东京。我就骗他说:“父母亲只养了我一个儿子。家里房子烧掉了,回去要盖房子,养父母亲的。”没答应他。若是跟他到东京去,那就回不来了。

腊月二十四日,我终于回到了潘家边,在外面整整度过了50天。母亲以为我早就被打死了,都不敢相信我会回来。我回家后不久就过年了。一家人都团圆了,没有一个被打死。我父亲(当时66岁)被鬼子的步兵拖差,抓到南京城里,出去了20天。我三哥也被拖差,抓到城里,在外面18天。我二哥和弟弟带了大侄子,五个人一起跑到了江北仪征,他是理发的,有手艺,走得最早。我母亲带着嫂嫂她们跑反跑到了东边的陈武,腊月里回来的。我大哥跑到了他老丈人那里,在陈巷躲了些日子。一家16口人跑了六个地方,最后团圆了,过年了。村上大部分房子被烧

掉了,只有五六家没有烧掉。我家里的十间房子烧掉了,回来后我们就住在我一个同年哥哥家里,他家的十间房没烧。我家有两皮缸的米没有烧掉,还有吃的。但有的米烧糊了,我们吃了好几个月的糊米。

在外面,我亲眼看到鬼子杀人的。冬月初八那天,在一个小山村的大埂后头,有一个四十来岁的道士在晒太阳。鬼子招手让他过来,他不肯来。我就对他讲,你就过来吧,我都出来这么多天了。他还是不肯动。鬼子离他就丈把远,举起枪,放了一枪,那血就冒出来了。可惜啊,送了一条命。

和我一起被鬼子拖差到南京的两个人,一个是句容白兔的,小名叫“小鞋”,30多岁。另一个是丹阳的,也是30来岁。这两个人被鬼子放了回来,后来又被别的鬼子抓去,再也没有见到他们。

冬月初四,鬼子在潘家边打死了一家三口人。一个是俞海青(俞卫生的父亲),30来岁,腿烂了,躲在地洞里,被鬼子拖出来打死了。另一个是俞海修,他是中央军的士兵,28岁,回来接他老婆的。见了日本人,他还走上去朝他们敬了个礼,后来被日本人带到村后小塘边开枪打死了。还有一个是俞三口子(小名),才13岁,当天被拖去送差,我在新塘还见过他,他正在路上踢石子玩。我告诉他要小心。后来,我们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了。

我舅舅芮永忠(潘家边人,50岁左右),腊月二十三那天同我姐夫朱怀春(上峰朱家山人)到东营房拆木料,找外快,被鬼子看到后都被打死了。

安民后,农历三月里,尹继富和陈德高两个新庄人(指潘家边南边的新庄),都是30岁左右,他们把黄梅桥电话局的房子拆了,木料拿回家,被鬼子看到了。鬼子把他们抓到电话局,用刺刀刺死了。

我还听说,鬼子刚打来的时候,贾母巷有六个人躲在机窑里,被鬼子发现后杀死了。

8. 方智源口述

方智源,男,1928年生

调查地点:句容黄梅南巷行政村西巷二队

调查时间：2005年3月25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78岁，属龙，方礼堂是我的家门叔叔。跑反时，我跟父母亲一起跑到了下头的桥东（在上峰郭圩村以南），方礼堂跑到了北庄（在上峰郭圩村以北），他是属虎的，当时二十四五岁。跑反前，他受过训练，穿过军衣（壮丁训练队发的制服），人很聪明，知道的事也多。后来安民了，有个住在炮校里的鬼子带了把刺刀出来找大姑娘，没有带枪。他到了西巷、南巷、琅琊界、东过山、大周家边一带。大周家边那里有大刀会，有人对大刀会的人说：“你们大刀会的人没用，杀不掉鬼子。那边只来了一个鬼子，没有带枪，你们有本事就把他杀了！”大刀会的人听了，就喝一口冷水，喷一下，来功了，就去追鬼子，一直追到琅琊界。鬼子跪了下来，大刀会的人就在西社那里把鬼子一刀杀了，摔在琅琊界的大场里。下午五点左右，炮校里的鬼子出来找人，跑到西巷，没找到人，就回去了。后来又来了一大批鬼子，到处找，翻译讲是西社杀的，鬼子以为是西巷杀的，就到西巷烧房子。翻译讲烧错了，不是西巷，而是西社。村上的老百姓到处乱跑，鬼子见人就打。第二天，方礼堂从北庄回西巷看看，走到西储岗就碰到了鬼子，鬼子开了一枪，打中了他的左肩，又追上去刺了一刀，刺中了左胳膊窝，差一点刺中心脏。他就躺下，一动不动，装死。后来，有几个老太太从那里经过，发现他睡在地上，就问他是哪个村上的。他说是西巷人，义礼家的老三，那几个老太太就送信到北庄，他家的人就把他抬回了北庄。方礼堂知道自己受了伤不能喝水，他人很聪明的。后来慢慢养好了伤口。那时候也没有医生，没人来治的。西巷没有人被鬼子杀死，村上只有一家房子被鬼子烧了。安民后，老百姓拆西营房的房子，鬼子也不过问。

9. 刘勇口述

刘勇，男，1927年生

调查地点：孝陵卫双拜巷102号（原住句容天王寺）

调查时间：2005年9月4—5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78岁，属龙，老家在句容天王寺后山沟。

跑反时，父母亲和我兄弟姐妹四个，一起跑到了句容茅山南边的荒山。那山蛮高的，同茅山差不多。我是老大，他们是7岁、5岁、3岁、2岁一个。我们住在一个山洞里，洞很大，天然就有的，黑糊糊的，住了上百号人。在山上住了几天，没有动静，父亲就回家去看看。一到村上，见鬼子正在烧房子，几十间草屋全烧了。我三奶奶和几个人救火，救了三间，其余全烧光了。后来，鬼子没有上山。我们没地方住，就住在朱巷的婆婆家里。

鬼子在天王寺到处杀人放火，强奸妇女。谷城离朱巷三里路，鬼子在谷城杀人放火。天快黑了，一个日本人带了把刺刀，走到谷城至朱巷的半路上，强奸一个女的。女的是朱巷人，一边逃一边叫，鬼子就追她。我父亲看到后面没有别的鬼子，这个鬼子又没有带枪，就找了一二十个老百姓，拿着锄头钉耙，趁天黑把这个鬼子打死了。

父亲叫刘胜富，他没有住在婆婆家，在朱巷租人家的小楼住，天天从楼上窗口往天王寺方向看。第一天，没有动静。第二天，鬼子向朱巷来了。乖乖，戴着铁帽子，端着刺刀，向朱巷冲过来了。父亲从楼上下来，高喊：“鬼子来了，大家快跑！”刚跑到朱巷东边，鬼子就追上来了。日本人不管小孩和妇女，把十五六岁到四五十岁的男人全带走，一共带了七八十号人，带到天王寺南边的王家边，关在一个碾坊里，还用铁丝把双手绞住，不让动，不让跑。

王家边马路东面原来挖了一条战壕，很深的。第二天，来了一个班的鬼子，开始杀人了。他们把一张宽板凳放在战壕边，把人捞过来绑在板凳上，用锯木柴的锯子从后脖往下锯，人的叫喊声几里路外都能听到。锯完一个就往战壕里摔，再捞一个锯。七八十号人，杀了一天，战壕都塞满了。杀到后来，鬼子也疲劳了，只剩下一个姓徐的和我父亲等四五个人了。姓徐的对我父亲说：“老刘，我们跑来！”我父亲没有跑，姓徐的趁鬼子捞人时冲出去跑了。鬼子发现了就去拿枪，姓徐的一直跑，跑到朱巷，找人要了把钳子，把手上的铁丝绞开，又找到我母亲，把情况说了。第二

天,我祖父(刘有章)趁天黑去收尸,用棍子拨,找到后就回来喊人去抬。他们把我父亲的尸体绑在水车的扑盖(农村中车水时支撑双手的横木)上,抬回来了。我看到他的头还连着,喉咙那里没锯断。母亲在自家坟山上挖了个坑,把父亲草草埋了,又回到朱巷。

一个妇女,要带四个小孩,带不活的。母亲把我们四个摔下,跟别人走了。我祖父那时八十来岁了,给人家磕头,讲好话,让我去放牛。老三、老四送给人家当儿子、做童养媳,他就带了老二(刘学发)到处要饭。老二才死,没几年。

我给人家放牛,干了三四年。第一家老板不错,后来又跑到离茅山八里的朱店,帮张文崇家放牛。张文崇是天王乡乡长,两面的,当时才二十来岁。他和毛礼至是同学。毛礼至是茅山乡乡长,是新四军的乡长,他动员张文崇给新四军办事,开会都在一起的。新四军看我苦,动员我跟他们一起干。15岁那年(1942年)春天,我就跟了茅山区(三区)区长徐信智,在区政府当通信员,给保长送信。那时,许多保长都是两面的,既为鬼子办事,又替新四军办事。区政府是秘密的,我们都穿便衣。

那时候,我还小,专门送信。纸条抓在手里,遇到敌人就吃掉。有一次在曹村一个急拐弯的地方,突然碰到了十来个鬼子,面对面的,不能吃了。有个鬼子摸摸我的头,说:“你的,小孩。”等这十来个鬼子过去后,我再把信送出去。

那时候,天王寺、王庄、二圣、蔡巷、南街镇、塘林都有鬼子的据点,方山山顶上的庙里也住着鬼子。据点里面有鬼子,也有汪派(指汪精卫的伪军),四面八方都有敌人。区政府白天根本不能行动,有时,一个晚上也要转移十来次。

从江北到江南有一条专门的送信线路,一站一站地传,送的地方都是很保密的。句容城东的二区、茅山的三区和塘林以南的四区都是共产党的。四区的一个点是个大村子,靠山边的地方有小茅棚,住了两三户人家。

1944年,句容成立警卫连,我就到了这个连。上级派来了指导员、连长和一位排长。指导员叫张树理,连长叫刘金胜,排长叫刘云海。警卫连里还有一个人叫王开华,警卫连的人有许多都是他的徒弟。

王开华是地方上有名的爱打抱不平的人。有一天,他在王庄茶馆吃茶,茶馆那里卖菜的、卖肉的都有。离茶馆店里把路的地方有个炮楼,一个鬼子扛了支三八枪来买肉。王开华胆大包天,问他买什么,鬼子说买肉。又问他要买什么肉,鬼子说要瘦肉。王开华把鬼子带到肉墩头跟前,亲手割肉,突然一刀,把鬼子的头砍下来了。茶馆里的人一下就跑开了。炮楼里的鬼子发现了,就追过来。王开华把子弹和枪拿了,跟了老百姓跑,鬼子也没有找到他。这一来,他就出名了,老百姓都信他,拜他为师,当徒弟,人越来越多。区长也相信他了,利用他扩大队伍,警卫连很快就发展到一百来人,其中王开华的徒弟就有五六十个。没有枪,怎么办呢?老百姓到处捡国民党丢下的枪,只要我们知道,就去向他们借,说是“借”,但后来一直没有还。

10. 王寿椿口述

王寿椿,男,1936年生

调查地点:南京下关清江花苑

调查时间:2004年3月10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爸是汤山炮校的军需官,当会计的,1934年结婚后就搬到汤山,租老百姓的房子住。当时,炮校里很多军官都是住在校外的。

1937年12月,日军攻打汤山前,句容方向的炮声听得清清楚楚了,我爸回家就说:“马上就走,日本人要打过来了。”外婆说:“流浪一辈子了,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个家。我这么大年纪了,留下来看家,没事的。你们走吧。”我爸说:“那好,过些天就来接你。”我妈收拾了几件衣服,用台布一包,带上钱就走。我爸是炮校最后一批撤的。他带我们到下关坐上了最后一班去汉口的船,离开了南京。原以为南京是肯定要守的,不要多久就能回来,谁知这一走就是八年,外婆和舅舅音讯全无。

国民党还都南京后,我妈带着我们回到了南京。她立刻打听外婆的下落。左问右问,找到了当年房东的邻居,才知道外婆和舅舅在日本鬼子打汤山时被炸死了,我们住过的那间房子也炸毁了。

11. 李道福口述

李道福,男,1935年生

调查地点:汤山镇孟塘(原住龙潭)

调查时间:2004年9月29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70岁,属猪,龙潭人,现在住在孟塘,帮儿子看大门,当汤山机械厂的门卫。

龙潭圩里有个大地主姓黄,有300多亩田,房子很大,有七进深。他比较开明,你交不出租子他也不逼你,只派管家的到你家里,问碰到了什么困难。第二年再交租子时,上年的租子就不提了。这个地主解放后虽然被斗过,但他没恶名,没吃什么大苦头。

跑反时,有六个鬼子跑到他家找花姑娘,枪都放在他家大门口。听到里头有女人讲话,一个鬼子就进去了。那个女的在第七进,鬼子走到第六进,他就把门关上,用杀猪的斧子把鬼子砍死。第二个鬼子进来,走到第五进,他又把门关上,把鬼子砍死。后面的鬼子都不知道前头的鬼子被杀死了。一个一个地进去,被他一个一个都砍死了,一个也没剩下。这个地主厉害,他算好了的。如果剩下一个鬼子回去报告,村上人就要遭殃了。

中国人不敢反抗鬼子,不是说中国人没有好汉,主要是村上人怕鬼子报复,不敢动手。

12. 谢秀英口述

谢秀英,女,1918年生

调查地点:孝陵卫双拜巷102号

调查时间:2005年9月4日

调查人:费仲兴

我今年88岁,属马,娘家在杨晏桥(位于沧波门西南五里),婆家在沧波门街上。爱人叫陈伯兴,四年前去世的,活到92岁。他十几岁就到

孝陵卫街上来做小生意,做烧饼,烂面行的。解放后联营了,他到供销社。老头平时身体很好的,四年前跌了一跤,去世了。我们养了三个儿子、四个女儿,个个都很孝顺。陈长贵是我小儿子。

跑反时,大儿子还不到1周岁。我们从孝陵卫跑的,跑了许多地方,脚上打了许多泡,还要走。我们到过窦村、小茅山、尚庄、余村、龙都。后来住在龙都吉来庵,住了三四个月才回来。

跑反时,我父亲早去世了。我们带着儿子,跟了我大哥、二哥、堂兄弟、堂姐妹,许多人一起跑的。我三哥叫谢金钱,我们叫他一起跑,他说要到林耀(指麒麟镇泉水行政村的东林耀、西林耀)去。那里有一家人对他好,要给他介绍朋友。他到了那里,那家人的小老板和他的儿子往地洞里走,还没进洞,鬼子就来了,咣当一枪,把小老板打死了。我三哥跟在后面,鬼子问他是什么人,向他开了八枪。老太(小老板的母亲)跑到窦村告诉我们,我母亲哭死了。后来平反(安民)了,才去把他找回来,钉了口棺材,埋在杨晏桥。埋的时候我们都在,那个坟现在不知道迁了没有。

我们住在龙都吉来庵,庙里人可多了,有百十来个呢。那里有个日本的当官的,原来是龙都人,他带了四个护兵保护,天天在外面转来转去,龙都那里就有点保险(比较安全)。那个人是个大官,给了他三个姑娘,让他随便挑,感谢他的人多得不得了。在别的地方,鬼子还是杀人。在窦村,我们躲在一家人的小楼上,看到鬼子来了,见鸡捞鸡,见狗打狗,见猪打猪,见人杀人,当天晚上我们就走了。在小茅山那里,山顶上有座庙,睡(死)了多少人啊。有当兵的,也有老百姓。山路上也有许多人睡在那里,都是老百姓。尚庄有个哑巴,女的,鬼子强奸后又用刀捅死,我听人家讲的。杨晏桥有个女的,姓蔡,和我同年,她没有跑反,留在村上了。八个鬼子强奸她,走路都不能走了。她没有死,但后来不生不养了,没有后代。这个人才死,没几年。

我们到龙都之前在艾塘(艾村)睡了一夜。有的娃儿哭,就摔在水里了。怕被鬼子听见,影响别人。我儿子乖得很,我们给他讲,鬼子来了,飞机来了,他就不哭。后来,他九岁害病死了。那时没有好医生,要是现在,他就不会死了。

沧波门街上打死的人不多,孝卫街打死的人多,街上的房子烧得干

干净净。平反后我们回到沧波门种田,我们家的房子没有烧掉。

口述词语说明

1. 汤山: ①宁镇山脉中部的一座独立低山,在南京中山门以东 28 公里。主峰团子尖,海拔 292.2 米。山间多天然溶洞,东麓 700 多米的弧形地带上有数处温泉。②汤山东麓的集镇——汤山街镇(旧名汤水镇)。③南京市江宁区汤山镇,下辖汤山、寺庄、青林、西梅、中新、作厂、路西、建设、孟塘、湖山、桦墅、古泉、龙尚等 13 个行政村和两个居民委员会。④泛指汤山镇附近的农村区域,包括现在的上峰镇和麒麟镇,无明确边界。

本书的“汤山”二字在不同场合有不同含义,请根据上下文判断。

2. 炮校: 国民党创办的一所兵种学校,全称为“陆军炮兵学校”,1935 年从南京城内迁入汤山,俗称“汤山炮校”。日军攻占汤山前,该校于 1937 年 11 月 20 日撤离汤山,经徐州、郑州、武汉等地,最后到达贵州都匀,继续办学。汤山沦陷后,汤山炮校原址被日军占用,后成为日军炮兵训练场所。日本投降后,陆军炮兵学校返回汤山,继续办学。淮海战役开始后不久,该校又撤离汤山。1949 年 12 月,其残部在云南曲靖起义。

3. 步校: 国民党创办的步兵学校,校址在汤山侯家塘。

4. “大楼”: 旧地名。在今汤山中学正北约 500 米。原为国民政府兵工署的弹道研究所,有楼房数幢和若干附属建筑,俗称“大楼”或“兵工厂”。本书中带引号的“大楼”二字,即指此地。现为解放军某部营地。

5. “小楼”: 旧地名。在今汤山中学正北约 50 米。原为弹道研究所聘请的德国顾问的住所,有小洋楼八幢。俗称“小楼”。本书中带引号的“小楼”二字,即指此地。现为解放军某部营地。

6. 指挥营: 旧地名,今汤山温泉路 1 号院内。现为解放军某部营地。

7. 新民村: 旧地名。在今作厂中学以西约 200 米处。民国时为汤山炮兵射击场的营区,旧称“老靶场”。现为解放军某部营地。

8. 骑兵营: 旧地名。又称“西营房”。现为解放军某部营地。

9. 牧马场：旧地名。原为国民政府军政部的种马场，在句容黄梅桥以北约 7 公里，离固江口水库不远。现为解放军某部营地。

10. 指挥营：旧地名，今汤山温泉路 1 号院内。现为解放军某部营地。

11. 陶庐：民国名人陶保晋在汤山东麓温泉附近修筑的一幢高档别墅，占地约 11 亩。南京沦陷后，陶保晋投靠日军，任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会长，陶庐成为日军宪兵队驻地。

12. 俱乐部：民国初期，江苏士绅仿照北京“安福俱乐部”模式而在汤山成立的一处休闲会客地，位于陶庐以北 20 来米。建筑风格与陶庐类似。1928 年蒋介石到汤山后，此地改为国民党军政部招待所，俗称“军人俱乐部”。汤山沦陷期间，俱乐部与陶庐连在一起。

13. 戴季陶公馆：戴季陶在汤山的别墅，自称“望云书屋”。其位置在今 83 医院内“军师疗养楼”以东约 80 米处。

14. 于右任别墅：在汤山黄栗墅以南，位于汤山北麓的山趾上，占地面积约 10 亩。建于 1931 年左右，解放后拆毁。

15. 红房子：一处在工作厂小学门口，红砖红瓦，故名“红房子”。又称“校长楼”，2002 年拆毁。另一处在原汤山小学内，相传为蒋介石拨款修建，20 世纪 70 年代拆毁。

16. 天然温泉浴室：一家中等规模的浴室，位于汤山陶庐以北约 100 米。日军侵占汤山期间，该浴室为日本人经营。

17. 寡妇营：旧地名。在今汤山小学以南 80 米处。抗战前为国民政府兵工处用房，故又称“兵工处”。日军占领汤山后，有阵亡军官家属在此居住，故称“寡妇营”。有平房四幢，2005 年夏天拆毁。

18. 维持会：日军侵占汤山期间扶植的汉奸政权。地点在汤山老街的寺桥，旧址房屋尚存。

19. 自卫团：日军侵占汤山期间扶植的汉奸武装力量。

20. 跑反：方言。为躲避战乱等而离家逃走。为区分不同时期或不同原因的跑反，常使用限制词，如“跑长毛的反”，指太平天国时期的跑反，“跑日本鬼子的反”，指抗日战争时期的跑反。1949 年 4 月南京解放前夕，部分村民受国民党谣言影响而离家逃走，老百姓也叫跑反。

21. 安民：侵华日军在 1938 年农历三月左右号召跑反村民回家种田而使用的“术语”。安民以后，日军大规模的烧杀抢掠行为有所收敛，但仍有之；而强暴妇女的行为丝毫没有减少。严格地讲，安民二字是应该带引号的，但本书未加引号，特此说明。

22. 支那：古代印度人称中国为“支那”，佛经中也有此称呼。日军侵华期间，称中国人为支那人，称中国军队为支那军，含明显的蔑视意义。

23. 东洋人：指日本人，有时也指朝鲜人。

24. 二鬼子：指为日军卖命的地方武装和汪精卫的“和平救国军”。

25. 翻语：翻译。

26. 南圩：句容土桥以南的广大低洼圩区。北圩：龙潭以北至长江南岸的广大低洼圩区。

27. 大赤燕：地名。指孟塘自然村以南，汤山街以北，夹在狼山与刺山之间的岗坡地段。小赤燕：地名。指鲍亭以南，柏家庄以北，夹在陡山与射乌山之间的岗坡地段。

28. 方冲：地名。指孟塘陈家边以南的狭长山冲，其东、南、西三面分别为干山、狼山、培山。其东一公里为大赤燕。

29. 东葛墟：地名。现属句容下蜀宝华行政村。墟：ai，音同“埃”，但本地方言却念作 zai，音同“栽”。

30. 半边山：山名，也叫半面山。在汤山龙尚行政村龙王庙自然村以南约两公里。此山南坡平缓，北坡陡峭，形同壁立，故名。山北有龙泉寺（又称龙泉庵），1958 年拆毁。

31. 周家边：地名。汤山附近有三处。一处位于上峰镇东北约一公里，另一处位于新塘东营房东北，均称“大周家边”。还有一处位于汤山镇东北约 1.5 公里，俗称“小周家边”，又称“周棚”。

32. 张家岗：地名。汤山附近有两处。一处位于孟塘陈家边以东，俗称“大张家岗”。另一处位于东阳镇东南约三公里，俗称“小张家岗”，属句容宝华乡。大小张家岗相距仅三公里，容易混淆。

33. 槽坊：做酒的作坊。又，“砬坊”指碾米房，“糖坊”指制糖的作坊。

34. 炮台：碉堡。

35. 二片路：中等大小的石块铺成的道路。大片路：石板路。渣子路：由碎石铺成的道路。

36. 冬月：农历十一月。腊月：农历十二月。

37. 老倭：外地人，特指外省人。

38. 家门侄儿：本家族的侄儿，与亲侄儿有别。类似的，有家门爷爷、家门婶婶等。

39. 公公：指外公(母亲的父亲)。婆婆：指外婆(母亲的母亲)。老公公：指丈夫的父亲。老婆婆：指丈夫的母亲。

40. 上人：指上一代的人，特指父母亲。小把戏：小孩。

41. 卖卖：母亲。大大：父亲的哥哥，即伯父。大妈：伯母。歪歪：父亲的弟弟，即叔叔。

42. 太太：指父亲的祖母，曾祖母。

43. 娘娘：父亲的姐妹。姑老太：父亲的姐姐，特指年岁已大而未出嫁者。

44. 一手：全部。

45. 皮缸：比普通水缸大得多的未上釉的陶缸。

46. 大柴：较粗的树段或木料。旺柴：指山上割下来的筷子粗细的小树枝，烧起来比茅草旺得多，也叫旺巴。

47. 疤疤：像树疤一样的圆形物。在老人口语中，烧饼、月亮等都可称为疤疤。

九、新闻报刊的访问报道^①

(一) 新闻 媒 体

孙有发、崔省福、全德发等：下关电厂惨案

《新华日报》1950年11月29日

孙有发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日，国民党反动派不坚决抗日，军队突然撤退，让日本鬼子进城了。鬼子一进城，就杀，我们电厂工人就被集体屠杀了四十五名，当时被抓去，带到煤炭港时，那里已经有二千多人，被脱光了衣服。最后拖到长江边，一批批用机枪扫，尸首就丢在江里。后来大概那些刽子手们怕麻烦，把人关在煤炭港的房子里，点上火连房子一齐烧光，火烧起来时，房子里的人的惨叫声，就像针一样刺我们的心，但是鬼子们都围在周围哈哈大笑，简直没把国人当做人，就是对待鸡狗，也不能这么狠心呀！仇恨，我们还没有报，料想不到麦克阿瑟把我们的仇人——鼎鼎大名的刽子手重光葵释放，想利用他来给美帝带路，到中国来再进行更大的屠杀，这简直是想杀光我们中国人。

^① 本部分收录的新闻报道，其题目均为编者重拟，以符合全书统一格式。

崔省福

日本鬼把我们人押到江边,用机枪扫射。一次十二个,屠杀完了接着再拖出十二个。我中了一弹,就装死倒在死尸堆里,机枪声继续哒哒响着,死尸也一个个地压在我的身上,尸堆流出来的血流到我的脸上,闷得我喘不过气来,喝了好几口血,完了以后,刽子手们怕死不干净,又用机枪向尸体射,于是我又中了一弹……兄弟们,我是死里逃生!这种痛苦,我永远忘不掉,这一辈子,我报不了仇死也闭不拢眼睛。

全德发

我的父亲是电厂工人,我也是电厂工人,日本鬼子到南京我才五岁,在日本进城那天我父亲出去挑水做晚饭,我们足足等到天黑还没回来,后来听见外面机枪声和喊叫声,全家人都不敢出去找。第二天母亲想到井上去看看时,一出门,唉呀!马路上,巷子里,田地里,横七竖八都躺满了尸体,到哪里去找?从那天起,我就成了失掉了父亲的孩子。在日本到下关的头几天,简直就没有人影,要是被日本人看见了,就一枪打死。或者为了省子弹,就用刺刀穿,头二十天,中山桥上的尸堆像山一样。唉!说不下去了,越想越恨。现在麦克阿瑟竟把我们的仇人重光葵放出来,又想屠杀我们,听到这消息后,我的肺都好像气炸了,做起活来,心里也忘不下,我要替我父亲报仇,仇报不了,死也不甘心,狼心狗肺的美帝就是我的死对头。

金福顺

我父亲被日本鬼子杀死了,尸首也没找到,到底是枪毙的呢?还是用刺刀穿死的呢?也不知道。父亲被抓走后,母亲就带我和我的弟弟逃到一个小草房里,一会,听到呱呱的皮鞋声,我们知道鬼子来了,遇到了中国人,装上子弹就是一枪,子弹完了再装,杀人就好像打野鸡一样。小草房不保险,于是晚上我们又往野地里逃,一路上的死尸,不知使我们跌了多少跤,后来就躲在一条地沟里,那里已挤了廿多个人。因为里边闷气,小弟弟受不了,要哭,沟里的人就对我母亲说:“把小孩扼死吧!要不日本鬼子听到了声音,我们大家都保不住命!”在这样情况下,我母亲呜咽着就把我小弟

按在自己的大腿上,活活地把小弟就弄死了,其他的几个小孩子也先后弄死了,我年龄大些,知道好歹,所以没有哭,就没有被弄死。当时的情形,想起来就心冷。今天美帝竟想利用我的仇人再来屠杀我们,这种手段比什么都毒辣,我立誓要报仇,我们再不能让下一代失去父母。

顾阿金

日本鬼子的凶狠,说是说不完的。日本鬼子来了后,见人就杀,我就绕弯转路的往宝塔桥逃,想逃过江去,但是日本人见船就用炮轰,机枪扫射。没法,只得逃躲到一座荒凉的空房子里,那里已有廿多人,一会日本鬼子来了,竟检出两个人,绑在树上练习刺刀,一直把尸体都穿得稀烂,然后廿多人排在一起,用机枪扫射。

汤汝棠

我本来也是被抓起来与孙有发关在一起,因为我有和记工厂(和记工厂是英商办的)的工作证,就被放出来了,但是并没有减少危险,我们住在工厂里,到了晚上日本鬼子来要花姑娘,我说没有,他就对准我的脑袋,就是一刺刀,幸亏我躲得快没有死,仅刺了一个洞,这个疤就是我的血账,我这个疤永远去不掉,我的仇也永远忘不掉。今天美帝把重光葵释放了,这个血账,就要美帝来还。

李士海

日本进南京时,我与张长根等三个朋友,躲在难民区,但是日本鬼子要想杀人,躲到那里也躲不住。到第三天日本鬼子来了,把张长根一刺刀就穿死了,我们侥幸没被杀,后来被带到新街口附近一座房子里,替他们做苦工。他们每天晚上每人总是抓个女人来奸淫,有几个唱戏的姑娘,竟被他们关起不让走,连续好几晚上的轮奸,受不了污辱,想逃又逃不掉,每天晚上总是叫成一片。再有一次我经过城门口,在黑暗的灯光下,看不清楚,走过了他的岗位,没有鞠躬,他赶上来,就是一刺刀,要不躲得快,哪能活到今天。为了没行礼,就要你的命,想想那种亡国奴的痛苦,多难受呀!今天我们要想不做亡国奴,我们就要和美帝拼。我们坚

决支援朝鲜人民军和我们的志愿部队,把美帝消灭在我们的大门口,告诉他,再想来屠杀我们,那是白天做梦。

周兆年

我的父亲也是被日本鬼子杀死的。在过去反动派时,我觉得仇是不能够报了,我也不多讲,解放了,我就盼望着报仇的机会,谁知还没等到报旧仇,而美帝又想利用日本了。我们知道,美帝是比日本帝国主义更毒辣更凶狠的,不打它个头破血流,我们是没好日子过,不消灭日本法西斯,我们的仇也报不了,今天我坚决地搞好生产来支援朝鲜人民军和我志愿部队,共同来打死美帝这只疯狗。

殷长青:万恶日寇罪行滔天 南京屠杀三十万人

《新华日报》1951年2月23日

我是在下关作小买卖的,是“红卍字会”的会员。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日本人进城,到处杀人放火,外边死尸很多。我带着人到下关去埋,简直看不见活人,我埋了一个多月的人。在江边有一千多个中国人被扫射死了,燕子矶一带有膀子挂在电线上的,腿丢在大路边的。我们挖了好多房子大的坑,分别男的女的埋下去,他们的手都被背绑着。埋了一个多月还埋不完,你看杀了多少人?

下关有三个岗是阎王关,老百姓过去就是死,有时要过路的人用头顶住石头跪在石头上,各种刑罚真用尽了。日本宪兵队抓了人,铁棒打、灌自来水,真是惨无人道,我埋了一个多月,共计埋了四万三千零七十一人,我们有详细统计的。

张正安:永远忘不了的仇恨

《新华日报》1951年2月24日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我八岁的那一年,我们全家九口除祖父因年老留在纸店中看门外,其余都跟父亲逃到难民区,八个人窝在一间四分之

一的小房间里,还有四分之三是另外三家住的。女人躲在天花板上。大家饱一顿饥一顿地过着非人的生活。日本鬼子在难民区也照样杀人,几十个几百个地杀,被害的同胞有的无头无脚,有的少手缺臂。女人赤裸裸地死在马路上。

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午,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天,天很冷。我五岁的弟弟顺安带着两岁的妹妹小霞在门口晒太阳。忽然响起了“当、当、当”的钟声,这是告诉每一个难民鬼子进难民区来了,院子的大门立即关上了。父亲因为顺安和小霞在外面没有回来而坐立不安,但为了全院子三十多家人的生命安全,不能开门出去寻找他们回来,一会门外“叭、叭”两声枪响,接着一阵大哭,院子里的人都恐怖地不知死神又降临到谁的身上。

一会儿,日本兵走了,管门的老吴拉开沙喉咙奔进来大喊:“张老板,张老板,不得了啦!你家顺安跟小霞在对门学堂让日本兵打死了!”

天花板上咚的一声,母亲一听昏倒了。父亲也疯了似的直奔出去,我吓得只是哭。一边哭,一边跟着父亲跑。到了学堂门口一看,已经有人脱下衣服盖在弟妹身上了。父亲当时发怔了多时,最后只说了一句话:“这个仇什么时候报啊!”

不久,我们全家六个人回到家,一看,店已变成一片瓦砾了。对门牛肉店看门的刘伯伯对我们说:“你们走后半个月,有一天来了四个日本兵,那天天冷,看到你们纸店容易着火,就要放火取暖。你们老先生(我的祖父)向他们求情,有一个鬼子一脚把老先生踢倒,拔出刺刀当胸一刀,可怜他老人家就这样死了,你们的店就这样烧起来了……”

我的祖父和弟弟妹妹就这样地死了,父亲辛苦开的纸店就这样被日本兵付之一炬!

冯金德:不能再让鬼子来砍杀

《新华日报》1951年2月24日

我叫冯金德,南京沦陷的第二天,我在老家中华门外兴隆乡同我的弟弟、儿子、邻居和几千个乡亲一齐被日本鬼子绑到下关三汊河一带做苦力,想起那时所受的苦来,日本鬼子真令人可恨哪!他不给吃、不给

喝,哪怕是你替他抬的马料你都吃不到,逼得我们只好到那些断墙倒壁的大火堆里去找些烧剩的米面来活命,做起活来,从早到晚不准休息,慢一点就挨打,稍一不如他意,他就狠命一耳光把你打倒,跟着一脚把你踢下堤去,顺手就是一枪。就这样,我们的难友一天一天少下去,那个惨状叫人不忍看,滚到河边的、躺在路埂上的死尸,一眼望不到边,鬼子的汽车就在死尸上开来开去。使我永世难忘的,就是除掉枪杀、刀戳之外,还把活生生的青年人放在火上烧。一天,我看见一个人挂在电线杆上,烧得只有一个龇着牙的头骨和半截身子,腿和膀子都烧没了,底下还烧着一堆柴火。这样过了十几天,我再也忍不下去了,就打算找我的兄弟和孩子逃跑,可是怎么也找不着他们,后来知道他们也遭了毒手。这时我愤怒极了,总想拼命干掉几个鬼子,发泄心头之恨,可是手无寸铁,身体也被前几天拳打脚踢得不成样子,一点力气也没有,我酸着鼻子把眼泪往肚里咽,我咬着牙、捏着拳头,我想:我不死,我要记住这个仇,等着有一天把这些凶手的罪恶告诉天下人!这天晚上我就拼死从虎口里跑了出来。

伍长德:大屠杀历历在目 幸免者伤疤仍在^①

《人民日报》1982年8月5日

1946年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的“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伍长德老人,用亲身经历的事实揭露侵华日军暴行,谴责日本文部省在教科书中篡改侵华史实的行径。

伍长德今年74岁,现住南京糖坊桥96号。8月1日,他向记者诉说了他在日军大屠杀中的一次亲身经历。那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入南京城的第三天,伍长德当时已弃家进了“国际委员会”办的难民区。1937年12月15日下午,一帮日军竟闯进难民区,把两千多我国同胞绑起来带到汉西门外。伍长德看到四挺重机枪分架在两边。等一队同胞被驱赶到中间时,日军立即开枪扫射,同胞们纷纷倒下。当伍长德和同胞们一起被赶进射击圈时,没等枪响,伍长德先倒在尸堆上,躲过了枪击。日本剑

^① 题目为编者所加,下同。

子手们枪击以后,又挨个捅刺刀,伍长德的后腰挨了一刀,血流如注。但侵略者还不罢手,他们又往被杀害者身上浇煤油,点火焚烧,然后才离开。伍长德身上也着了火,他痛得翻身滚下护城河,才幸免于死。讲到这里,伍长德老人站起来,把衣服撩起,摸着五寸长的伤疤,怒不可遏地泣诉说:“我就是当年日本鬼子在南京进行大屠杀的铁证!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时,我曾去东京出庭作证。日本侵略军奸淫掳掠残杀南京人民的罪行在法庭判决书上都有记载,这是有案可查的。这样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日本文部省能掩盖得了吗?”

由中、美、英、苏、澳、加、法、荷、新西兰、印度和菲律宾等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从1946年5月开始对日本战犯东条等进行了约两年半的审讯,共开庭818次,伍长德是419名出庭作证者之一。关于南京大屠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判决书中指出,就连当时纳粹德国政府从它的代表得到的报告都曾形容日本侵略军是“兽类集团”。

路洪才:手无寸铁难幸免 老弱妇孺遭杀戮

《南京日报》1982年8月6日

“我家有七口人惨死在日本侵略军的屠刀之下。”市广播事业局事业科路洪才同志昨天含着眼泪对记者叙述了他一家惨遭日军杀害的经过,用铁的事实驳斥了日本文部省篡改历史的做法。

路家当时住在城南小心桥东街的转龙巷二号。一九三七年冬的一天,一队日本侵略军到该地区抓人,路洪才跟着父亲、大舅舅逃到沙洲圩避难,家里留下了外公、外婆和两个舅舅、一个小姨娘,以及即将临产的母亲。他们躲在屋外一个自挖的地洞里。这时来了六七个日寇,有的提着机枪,有的端着带刺刀的步枪,挨家挨户搜查。当他们搜查路家时,发现了屋外的地洞,便哇哇地吼叫起来。躲在洞里的小姨娘被日寇的怪叫声吓哭,一听有人在洞里哭着不出来,日寇便端起机枪往洞里扫射,接着又向洞里扔了手榴弹。随着“轰”的一声巨响,血肉随着弹片飞出了洞口。在场的日寇一个个拍手狂笑。接着,日寇又把路家的家具劈了烘火,最后放火把房子也烧了。后来,路洪才父亲

回来,扒开地洞收尸时,发现妻子的肚子已被炸开,未出世的小儿子也惨死在娘肚里。

路洪才愤怒地对记者说:“日本侵略我国,烧杀抢掠,奸污妇女,无恶不作,这是有目共睹的。但现在日本文部省在审改教科书时,却把无数血腥罪行说成是:日本军队进入南京后,‘由于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以致‘杀害了许多中国军民’。这真是一派胡言!当时国民党军队已经撤离,而我家七名妇孺和南京几十万手无寸铁的同胞仍无辜被杀,这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历史事实。”

魏廷坤:一九三七年冬某日目击记

《南京日报》1982年8月6日

我是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和见证人之一。

一九三七年冬的一天,在隆隆炮声中,日本侵略军闯进了南京城。我和父母亲从住地头条巷十八号急急忙忙躲到成贤街一座尚未竣工的楼房的地下室里。这里已躲了三四十人,大家都不敢喘大气。有一个炸豆腐干的中年人冒冒失失地到洞口张望了一下,不巧被日寇发觉,一枪打死。不一会,就来了几个日寇,用刺刀把地下室里的人一个个逼出去。正在危急关头,我忽然发现墙边壁烟囱有一个尚未收口的小洞,便钻了进去。接着,便听到外面响起了一阵枪声,我父母和其他三四十人就这样被惨无人道的日本兵枪杀了。

夜间,我肚子饿得慌,便不顾一切从壁烟囱里钻出来,转到一个大地下管道内,仍时时听到杀人的枪声。三天后,趁天还未大亮,我就钻出来,哪知还是被正在百米外烤火的日寇发现了。他们用枪把我逼到一处,那里已集中了几百名同胞。日寇从中拉出一批人,用绳子拴起来,赶往汉中门(后来才知是集体屠杀了)。我和其余的人则被送到鼓楼“难民区”。听“难民区”里的人说,鬼子仍不时来这儿抓人杀人,“难民区”并不安全。于是我和几个人设法逃出了“难民区”。沿街几乎无一行人,到处阴风惨惨,白日无光,断墙残壁,尸体横陈,不啻人间地狱。日本侵略军欠下的血腥罪行,是那些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的。

左润德、曹广荣、马明福：日本侵略者的罪行

《新华日报》1982年8月6日

记者：周正荣

日本文部省审定的历史教科书把当年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改为“进入”中国，甚至对当年血腥的“南京大屠杀”提出种种荒谬的辩解。这一事件激起了南京市人民的强烈愤慨。墨黑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罪恶。连日来，当年“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纷纷用血泪控诉日寇残杀中国人民的罪行。

血洗王府巷

现在的建邺区石榴新村，当年是个三百来户人家的棚户区，叫王府巷。在“南京大屠杀”中，这个地区遇难人数虽不算最多，但从这里被血洗的事实，已足见日寇残暴之一斑。

现在的建邺区医院，当年是个卫生所。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的一天，日寇进城后在卫生所放了火，火光冲天。附近的居民纷纷赶去救火，不料救火的人刚涌到跟前，早已埋伏在隔壁日本军营（现在的省委党校内）的日本兵大批翻墙而出，端起刺刀就捅，捅死就扔进火堆。有的被日本兵活活推进烈火烧死。在这场灾难中，单是王府巷的居民，就被日寇烧死二十余人。

卫生所惨案之后，日寇反复几次血洗王府巷。死里逃生的当地居民左润德老人向我们叙述了当时的情景。日本兵看到行人，便尾随到家里，用刺刀戮死。有个叫王二顺的年轻人，被日寇抓住，剥了衣服，让狼狗咬。鬼子朝哪里指，狗朝哪里咬。王二顺肚子被咬破，肠子拖出来，惨不忍睹，最后致死。左润德当时十八岁。有一天，他和另外七八个人被日本兵抓住了，押进一间空房子。日本兵让他们面朝西，跪成一排。左润德和他一个邻居跪在这一头，日本兵从另一头开始用刺刀捅人。左润德用胳膊碰碰他的邻居，两人突然站起，夺门奔逃。日本兵端着刺刀劈面向左润德刺来。左润德一侧身子，刺刀划破了他的胸部。左润德抓住刺刀，把日本兵推倒在地，日本兵连开两枪，打偏了，左润德才得以逃生。

其余几人全被刺死。当年小小的王府巷,在几天里,被日寇杀死的本巷居民和过路人竟达五百多人!

说到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人数,左润德说,当时满街尸体,血流遍地,死亡的人要远远超过当时国际红十字会公布的数字。他说,当时红十字会派出卡车沿街收尸,每车配三人,一个驾驶员,两个抬尸体的工人,驾驶员负责记录死亡人数。红十字会的数字,主要就从那个记录统计起来的。然而,这是极不完全的。他们收尸,只是收显眼的地方,藏在角落和许多埋掉的尸体未算在内。左润德当时拾破烂,在垃圾堆、阴沟洞、墙角里,随处可见尸体。收尸从冬天继续到夏天,许多尸体早就烂掉了。而且大量尸体被日本人抛进了长江,在连续一年的时间里长江总是不断地发现有漂流的尸体!

“难民营”的苦难

南京大屠杀开始后,红十字会把各国使馆集居的鼓楼地区划为“难民营”。居民们以为“难民营”是安全的,老人孩子妇女都往那里涌,挤成了人堆。谁知,那里同样被日本兵变成了杀人的屠场。

下面是当年难民被大屠杀的目击者,现在石榴新村居委会主任曹广荣的叙述:

“我当时十六岁,在兵荒马乱中已经结婚。全家逃到现在宁海路附近的难民营。开头两天,没一点动静,我们觉得这里蛮好的。第三天,腊月初三,开来了大队的日本兵,见人就杀。我们躲在屋角里,抖抖地缩着。第二天早上,我到一个大水塘边淘米煮粥,一看,一个大水塘周围,尽是死人,叠成了堆,塘水染得血红。我吓死了,米也丢了。我们一百多个逃难的人,挤在一间大公房里。第二天,日本兵进了这个大房子,手指到谁,谁就要出门,被绑上。一共点了五十多个人,全被带到一百公尺远的一个大塘边,被机枪扫死了。”

“一亩地”的冤魂

在当年大屠杀开始后,许多在郊区有亲戚朋友的居民,都纷纷逃往乡下。但是他们并未能逃出日本法西斯的魔掌,而是同郊区无辜的农民

一起承受了这场劫难。南京市糖烟酒公司业务科长马明福同志就是这场劫难的幸存者。

马明福当时七岁，祖居南京，做小生意，外祖父住在现在郊区的沙洲公社。城里大屠杀开始后，马明福的父母带着四个孩子逃往乡下。马明福最大的姐姐九岁，一个妹妹四岁，最小的弟弟刚满一周岁。他们到乡下的第二天，日本鬼子就来了。鬼子们争着用棉花球蘸了汽油往房子上点火，然后端着刺刀站在房前狂笑。村子里的人都躲在离村子四五百公尺远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有一亩地大小，中间低洼，三面是高土坡，一面是水塘。村上五六十口人连夜在洼地中间草草挖了个洞，用树枝遮上。马明福一家六口，连同外祖父母，三个舅舅，一个姨表姐，都藏在那里。日本兵发现了“一亩地”藏着人。他们把洼地包围起来，从两边的高坡上开枪向洼地里的人射击。不到半小时，六十多人被打死了一半多。马明福的外祖父和二舅、三舅都被打死，马明福的母亲，正抱着一周岁的小儿子喂奶，日本鬼子的子弹打中了她的胸部，这位三十岁的母亲当即死亡。她的着弹点，离怀里的小儿子只有一寸远。妈妈身上的血，溅到了偎在身旁的四岁小女儿身上，小女儿看到自己身上有血，吓得对爸爸喊道：“爸，我也被打着了……”一句话刚说完，日本鬼子的子弹打进了这个四岁女孩的肚子，女孩当即身亡。在这同时，马明福的姨表姐双腿被打烂，流血不止而死。马明福一家和他外祖父家，当场死了六人！这时，天黑了，日本鬼子说笑着离开，幸存者落荒逃走。奔逃中，七岁的马明福和他的父亲失散，被一个陌生人带着跑了二十多天，才被家人找着。

马明福同志愤慨地说，日本文部省昧着良心篡改侵华历史，不但在中国人民面前通不过，在日本人民面前也通不过。一切企图让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蠢举，都将被历史潮流所粉碎！

陈颐鼎、金长益、麻子和等：历史见证人的控诉

《新华日报》1982年8月8日

一些在南京的目击日本侵华的历史见证人，八月六日下午，谴责日本文部省最近在审定日本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时，把日本侵略中国篡改为

“进入”中国。他们愤怒控诉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暴行,真是字字血、声声泪,一桩桩骇人听闻的惨案,一件件令人发指的罪行,使到会者说着说着,时而泣不成声,时而愤慨无比。大家表示,日本文部省必须改变错误立场。

劫后余生者的批驳

原国民党军队第八十七师二六一旅旅长陈颐鼎,一九三七年日军侵略南京时,他也是劫后余生。他哽咽着说:日本侵略中国并在南京实行大屠杀已经四十五年了,这本来是举世皆知的事。但日本文部省公然篡改侵华历史,这是不能容忍的。我是历史见证人,我要用血和泪驳倒日本军国主义的谬论。当时在明孝陵的石象路南侧竹林里。有二百多个中国重伤官兵在那里,按照国际公法,对于失去战斗力的重伤员是不允许杀害的,但是日本侵略者把他们全部杀掉。我部下的营长陈国儒负了重伤,也夹杂其间,因为躲入他人尸体下面才幸免于难。仅此一点,就可看出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就在那几天,我的军队失散了,我由战士陪着从燕子矶下江,十几个人伏在一块破船底上,几乎丧命。后来还是国民党的桂永清部队下面的一个士兵用四捆芦柴扎起来,我才得浮过江,到了八卦洲,在那里两三天,见到日本军舰用机枪扫射手无寸铁的落水居民,人数无法统计,只见江面上成群的尸体随风吹来。这难道叫“进入”吗?日本文部省这样篡改侵华历史,正是日本一些人妄图复活军国主义的表现!

和平居民何罪之有

南京旭光仪器厂的金长益,他的父亲金宏祥是南京西方庵清真寺的二掌教,日本军侵略南京的第三天,金宏祥正在午睡,日军闯进家来把他及其妻弟捉去,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被杀害了。金长益搀着他病危住院后刚出院的八十四岁的母亲来到会场,流着泪控诉说:“我父亲,论职业,是宗教职业者,论居住地点,当时是难民区,纯属善良的和平居民。可是日本侵略者都不放过,这不是侵略暴行是什么?”他一面说,他的母亲金麻氏在旁拭泪。八十七岁的麻子和当时是伊斯兰教协会埋葬队的,当年

他在草桥清真寺一次就抬出十几具尸体,在汉西门清真寺抬出两具,其他清真寺都有被日军杀害的老百姓,他告诉大家:止马村常福年兄弟俩因在日军用机枪扫射时早伏下来,幸免于难,至今还有一个活着。彭如清尽管在日军侵略南京时还小,但日军暴行历历在目。她说:南京沦陷第三天,日军闯进院子来,将年方十七岁的舅舅抓走,外祖母哭得死去活来,被法西斯强盗用枪托打倒在地。走出大门,就是鼓楼大街,街心里已站了一大批被抓的和平居民,外祖母想扑上去喊舅舅,舅舅回头喊了一声“姆妈”,就永远没有回来。彭如清泣不成声地说:时间虽然已隔开四十五年,但日本侵华我们是历史见证人,要想抵赖血腥罪行是办不到的。

侵华罪行罄竹难书

今年已七十五高龄仍在南京执教的李修业,在日本投降后与蒋经国先生同时到华北,李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外事处处长兼日侨处处长,负责遣送日本战俘和日侨回国,他知道很多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罪行。当他听说开座谈会,主动要求参加。他说:我当时搜集了大量的日本侵华罪行,有文字有图片。我知道的日本侵略者的罪证可说是堆积如山,罄竹难书。当时,经过我手遣送的日本人有一百多万,有战俘,也有平民百姓。但是一些军国主义分子当时就骄横,不感恩,反而在上船不久,拳头伸伸地表示要“复仇”。所以日本文部省改“侵略”为“进入”不是偶然的。李修业说: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事实国际上早有定论,并已载入国际文件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推翻。我作为一个当时直接负责遣送日本人的中国官员,作为一个中国人,决不容许他们篡改侵华历史,要想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我七十五岁的老头也坚决与他们斗争到底。

侯鸣皋在回忆一九四六年审讯日本在南京的“二号屠夫”谷寿夫时说,当时检察机关作了调查,南京有近三十万人受到了日本侵略者的屠杀。其实,这还是不完全的统计。例如在座的陈颐鼎,我们共事二三十年,今天才知道他也有一段遭到日军迫害的辛酸史,其他很多熟人,都有一本血泪账。过去都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健忘了?不!因为我们对中日友好是采取向前看的态度,是宽大为怀。但是,今天日本文部省篡改侵华史的行为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血泪之仇。当然,这仇要记在日本

军国主义者身上,我们和日本人民则要世代友好下去。而且,我们相信,日本人民也决不容许文部省篡改侵华历史,也决不容许军国主义复活!

李伯潜:血海深仇永不忘

《南京日报》1982年8月8日

我家世居船板巷十八号。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军侵占了南京城。十三日上午十时,一个日本兵踢开我家大门,不分青红皂白,强行把我六十岁的父亲拖到新桥十字路口,一挺挺机关枪架在父亲和邻里们面前,日本兵的血红眼睛射出凶光,扫来扫去,直到认定这群人中没有当兵的,才放他们回家。

父亲被抓走后,母亲闻讯后赶到门口,刚伸出头想看看动静,就被一个日本兵发现,用刺刀逼着她带路去搜寻中国兵。母亲虽是小脚老太,但深明爱国大义,当即严词拒绝。丧尽天良的日寇就向我母亲肚子上开了枪,然后扬长而去。

父亲和邻居张老伯从新桥口被放回家,两人路上还说:“这条命是捡来的。”谁料两天后,张老伯还是被日本兵拖到笪桥市杀害了。我父亲一走进家门,只见母亲躺在地上,肠子露在外面,血流满地,神智尚清楚。父亲还没来得及把她抱上床,又被一个日本兵抓走了,等父亲再次回来时,母亲已断了气。悲愤交集的父亲含着泪把母亲的尸体裹好放在床上,由于日寇天天在城内烧杀奸掠,邻居中有的逃难在外,有的被害,无人帮忙,四十多天后才将母亲的遗体草草入殓。而我的父亲经过这番折磨和刺激,终于精神失常,中风卧床不起。

日本文部省却将小学教科书上如山的侵华历史篡改,是令人气愤!

陈颐鼎: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一手制造的

《人民日报》1982年8月8日

记者:马鹤青、段存章、颜世贵

1937年曾亲身参加指挥守卫南京的战斗,并亲眼看到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的江苏省政协委员陈颐鼎,今天愤怒地揭露日本侵略军在南京犯下的血腥罪行,痛斥日本文部省在修改中学教科书中歪曲历史的谬论。陈颐鼎说:“日本文部省把日军在南京屠杀几十万中国人的原因说成‘由于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这是侵略者的逻辑!”

今年77岁的陈颐鼎,是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生,长期在国民党军队工作,获中将军衔。1949年,他参加人民解放军,任南京军事学院教员。1937年,他任国民党军旅长。这年12月10日日军进攻南京时,他率部在南京光华门到灵谷寺一线布防。当天夜晚,有200多名日军冲进光华门。当时,中国士兵和民众爱国御敌的情绪十分高涨,陈颐鼎指挥他的部队同259旅配合,血战一天一夜,将入城的日本军队全部歼灭。12月12日,日军大举进攻,国民党军队都退下来,陈颐鼎也被迫率部退到石像路南边的竹林中。第二天,他不得不留下200多名重伤的官兵,撤退到下关。日军占领石像路以后,竟残酷地用砍头、刺刀挑等手段,将这些伤员全部杀死。说到这件事,陈颐鼎激愤地说:“当时就有‘国际公法’嘛,两国交战,对被俘的人员和失去战斗力的人员不准杀害。日本军队这种行为,是一种灭绝人性的暴行!”

陈颐鼎痛斥日本文部省的谬论,他说:“日本文部省说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是由于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这是侵略者、杀人犯的逻辑!他们侵略我们,难道不允许我们抵抗?我们几十万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不是也遭到日军的杀害吗?现在的日本文部省为侵略者和杀人犯辩解,正好说明那里有人至今还站在军国主义的立场上!”

陈颐鼎在他的家里同记者谈话时还说:“这几天我看到报上说,住在台湾省的许多爱国人士也在批判日本文部省的谬论。这是对的,我们中国人爱国一家嘛!日本文部省不改正他们的错误,全体中国人都是不能容忍的。”

姜根福:血腥罪行抵赖不了

《南京日报》1982年8月9日

“我是南京大屠杀的见证人，历史事实不容抵赖。”最近南京港老工人姜根福含着眼泪向笔者叙述了他一家惨遭日本军国主义杀害及成千上万同胞惨死的情景，用铁的事实驳斥了日本文部省篡改历史的做法。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黄昏，日本侵略军两万多人，从雨花台进入中华门后，便惨无人道地用机关枪、手榴弹、手枪、步枪屠杀受阻在中山北路和中央路上数以万计手无寸铁的难民。顿时尸体遍布，血流成河，一些未被打死的婴儿还趴在母亲尸体上吃奶，惨状不堪入目。在城内屠杀后，日寇又杀到城外。那时姜根福才满七周岁，一家八口人，大姐已出嫁，住在一艘破划子上。为了逃难，他们从浦口把划子摇到三汊河，不幸船破将沉，只好弃船上岸，分头躲进芦柴堆里。当夜，日寇经过，听到他才三个多月的七弟哭声，便追了过来，发现他母亲后，企图侮辱，他母亲反抗，灭绝人性的日寇竟将他七弟活活摔死，当他母亲扑上前想救护时，日寇又开枪打死他母亲。第二天，日寇又把他父亲抓去当苦力，至今下落不明。过了两天，一名日寇发现他十一岁的二姐，又要侮辱她。二姐连骂带踢，鬼子恼羞成怒，抽出军刀把他二姐从头到身劈成两半。就这样，鬼子四天杀死他家三人，抓走他父亲，害得他家破人亡。从此，他和幸免的九岁三姐及两个弟弟，过着孤儿的流浪生活。

姜根福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侵略我国，屠杀我无辜同胞的血腥罪行是抵赖不了的，现在日本文部省在审改教科书时，却把法西斯罪行说成是‘由于中国军队的激烈抵抗’以致‘杀害了许多中国军民’，这是弥天大谎。”

朱友木：在尸骸上建立的“中岛桥”

《南京日报》1982年8月11日

本报讯 雨花台区江东公社江东大队六十岁老人朱友才八日下午愤怒地控诉了当年日寇在南京江东门大屠杀的滔天罪行。

一九三七年时，他家住在江东桥边。十二月十六日下午，日军中岛部队把关在原国民党陆军监狱里的上万名“俘虏”（其中半数左右是平民百姓），驱赶到了江东门集上。人群塞满了道路，一直延伸到江东河边，

足有三四百米长。傍晚,日酋一声令下,道路两旁的草房全被浇上汽油点燃起来,在火光照明下,轻重机枪一齐开火,交叉扫射,顿时一片哀号,连躲在几里路外的朱友才也听到了。屠杀之后,江东门尸堆如山,血流成河。

第二天,日本侵略军为了让辎重过河,竟拿中国人来填河截流,无论死人活人,见到了就扔下河去。在固定桥板打桩时,还能听见未咽气人的呻吟,日本侵略军竟命名为“中岛桥”,大批坦克、军车、骑兵就是从这座“人桥”上开过江东河的。

天暖解冻后,尸体腐烂发臭,红十字会派人前来收尸,把尸体拖到两个大坑里掩埋。据红十字会粗略估计,约有一万五千多具尸骸。以后,当地人称这两个坑为“万人坑”。

朱友才还讲了一件事:一天,他和一个姓芦的小学徒被日寇抓去挑马草,一个日本军官为了试刀,竟信手把那名小学徒一劈两半。还有一次,一伙日寇闯进了法先家,先枪杀了丁法先,还要强奸她的女儿;女孩子不肯受辱,跳河了。日本兵又逼着丁的儿子下河去捞,丁的儿子拒绝后,姐弟两人都被射杀……

讲到这儿,朱友才红着眼圈说:“现在日本竟有人企图篡改历史,重弹军国主义老调,这是我们决不能容许的!”

田家凤:日寇轰炸的罪行

《南京日报》1982年8月14日

本报讯 八月六日,在六合县竹镇公社,六十二岁老人田家凤,指着腿上的伤疤,向记者愤怒地控诉了四十四年前日本侵略者狂轰滥炸竹镇的滔天罪行。

一九三七年底,南京沦陷以后,日寇在疯狂屠杀南京人民的同时,把血腥的魔爪伸向南京周围的一些重镇。竹镇地处苏皖交界处。当时,交通方便,经济繁荣,在附近有“小上海”之称。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六日上午八时,突然从南面飞来三架日机,在竹镇上空盘旋一圈后,投下几颗炸弹,紧接着又飞来六架飞机,顿时炸声震天,热闹的竹镇顷刻变成一片

火海。目睹者高松峰等老人说,日寇飞机从早晨八时一直轮番轰炸到下午五时,在三四平方公里的小镇上,投下上千枚炸弹。全镇绝大多数房屋被夷为平地,被炸死五六百人,尸骸遍地,血肉横飞,惨不忍睹。后来,敌机还陆续前来轰炸十多次。

至今大腿上还留着日本侵略者弹片的田家凤老人回忆了当时死里逃生的情景:当时,她和四个邻居正趴在冯家大塘边,一个炸弹在她的右边爆炸。田家凤两眼发黑,觉得腿上被一个什么东西叮了一下,用手一摸,血已染透了裤子。她再看右边四位邻居,早已被炸死躺在血泊中。田家凤爬了三里多路,才脱离险境。

在竹镇,许多人家都有一本受日寇残害的血泪账。他们一听说日本文部省篡改侵华历史事实,个个义愤填膺。当年一家被炸死三个亲人的经继富老人,含着泪水控诉了日寇的罪行。那一天,他们一家刚跑到小营盘(今竹镇小学附近),敌机一枚炸弹投下来,把他父亲的头削掉半边,他母亲一只膀子被炸断,胸部也中了弹片,怀抱的妹妹当场被炸死。母亲在地上哼了几声,就含恨死去。经继富老人十分悲愤地说:“日本帝国主义欠我们的血债太多了,国难家仇三天三夜也说不尽,诉不完,现在有人妄想赖账,我们坚决不答应。”

李学发、李书海:活人当靶子 鲜血流成渠

《南京日报》1982年8月14日

听到日本文部省篡改日寇侵华史后,栖霞区摄山公社李家岗村的李学发、李书海两位老人很气愤。他们讲述了当年日寇对村里无辜百姓进行集体屠杀的罪行。

一九三七年冬的一个深夜,一百多名全副武装的日寇包围了李家岗村,把全村年轻的男人逼到村前的小秧田里当活靶子练刺杀,边杀边发出“呀呀”的怪叫及狂笑。他们刺杀时对人体乱戳,被刺者痛得在地上直翻滚,不一会工夫,就有十六人在鬼子的刺刀下死去,血流成渠,肚子拖得满地。狠毒的日寇还把肠子用刺刀挑起来,挂到死者的脖子上。这时,被日寇捆住的李学发目睹暴行,拼命挣扎叫骂,日寇又把他当第二批

活靶子捅了九刀。他滚进秧田旁的小沟里,才幸免于死。

现已七十五岁的李书海回忆了他与日寇搏斗的经过。当时有十多个日寇包围了他家。一个挎刀的小头目踢开屋门,叫骂着冲进屋来。李书海练过武术,随手操起一杆红缨枪一挡。鬼子见他反抗,挥刀向他头部横劈过来。李书海使个“缩头蹲身”势让开,夺门而跑。谁知跑出门口后,又被四五个鬼子拦住。李书海左闪右躲,借天黑之际,夺路沿小巷向村口狂奔。跑到巷子尽头,也被埋伏在那里的两个日寇抓住。李书海用“封心掌”将他们打倒,终于死里逃生。

两位老人指着身上的伤疤说:我们是当年南京大屠杀的目击者和受害者。今天谁要想复活日本军国主义,谁就没有好下场。

李福成:我这个死里逃生者的控诉

《新华日报》1982年8月15日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有一天,九个日本鬼子窜进我当时住的中华门外的韩复村,其时村上男人都逃到韩复山躲藏起来。日寇到村上找不到人,便上山去搜索,结果藏在山坳中的两百多个男人被发现,他们从青壮年中拖出十三个人,我那时二十四岁,也被拖了出来。

九个鬼子用刺刀逼着我们挖了一个大坑,接着向我们十三人开枪射击。子弹从我面前掠过,鼻尖被打穿了,我一吓,栽进了坑里。接着其他被枪杀的同胞尸体都往我身上压。我脸朝下,还能用嘴巴呼吸。只是觉得左腿痛得不能动弹。其时被害者中有一个患哮喘病的,他腹部被击中一枪,倒入坑里并没有死,只是不断地哮喘。谁知声音从坑中传出,鬼子听到后,又用刺刀在尸体上捅了许多刀,我的背部被刺伤好几处。日本鬼子以为我们全部被杀死了,便回城内。直到深夜,我和那个哮喘病人才敢从死尸堆里爬出来,我连走带爬地躲进了山里,那个哮喘病人用手捂着流出来的肠子跑回家中。在断气前,他告诉乡亲们说,我还活在上。我的家属和乡亲趁黑夜把我从山上找到抬回家里。由于受伤流血,两天未吃东西,已奄奄一息。家属把我鼻子里的泥土挖洗干净,身上的伤口又敷了些草药。总算死里逃生。

我今年已六十九岁,有儿子、儿女共六口人。解放后生活安定,在南京钢铁厂食堂做炊事员,全家过得很幸福。人们常说我是“第二世为人”。各方面对我都很照顾,退休后生活安定,还有医生定期上门给我看病。今昔对比,我怎么不仇恨日本军国主义,怎能不热爱社会主义和共产党呢?日本文部省在事隔四十五年后来掩盖侵华罪行,把侵略篡改改为“进入”。我坚决不答应。我要用自己的血泪史戳穿日本文部省的弥天大谎!

沈锡恩、姜根福、骆中洋:幸存者控诉日军在宁暴行

《南京日报》1987年12月8日

记者:李晓辉

本报讯 昨天早晨,20位幸存者在江东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把一个凝聚哀思的花圈献给50年前惨死的30万亲人。

年已八旬、须发银白的沈锡恩想到当年3岁女儿被日军摔死的惨景,泣不成声。长江航运管理局职工姜根福那一年只有7岁,他们全家八口藏在石梁柱附近的芦苇丛里,小弟弟哭着要吃奶。10多个日兵顺着哭声找来,摔死了小弟弟,开枪打死了他母亲。第三天日军又抓走了他的父亲,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又过了两天,日本兵竟要强奸他11岁的二姐。二姐连骂带踢与日本兵拼打,被一个日本兵从头劈为两半。当年在江东门从两万多被杀者中逃生的骆中洋激动地说:“我怕谈过去,可是我要告诉后人,永远记住血的教训。每一个中国人都要有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要把国家建设强盛,不能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谢仁石之母:血与火的磨难

《南京日报》1995年1月3日

记者:谢仁石

母亲八旬离我们而去。她大半生坎坷艰辛,这十多年生活安定,衣食不愁,儿女孝顺,算得上幸福和乐了。人到晚年爱唠叨,叙起旧事来没

完,许多事都已淡忘,只是那段“跑鬼子反”声泪俱下的陈述,听了叫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日军破城后,南京市内烽烟四起,父母带着大哥、大姐跟着逃难的人群出定淮门,沿三汊河边径直向南跑,但不久拖着哥哥姐姐的母亲和背着细软被褥的父亲就给冲散了。追杀的枪声四起,母亲一时没了魂,糊涂到一队日本骑兵冲过来还没察觉,等听到叽里哇啦的叫喊声,急忙拉着两个子女往河滩的芦苇丛中钻,耳边子弹嗖嗖直飞,母亲只觉肩胛一阵热痛,血就流下来了。钻到芦丛深处,大人疼痛不敢哼,小孩惊恐不敢泣,只有听天由命了。天渐渐地黑了下來,只见城里的大火染得天空一片通红,密集的枪声在绞杀着无辜的百姓,母亲和大哥蜷缩在潮湿的苇地里,忍受着枪伤的痛苦及饥饿寒冷的煎熬,默默地等待命运的安排。

时至半夜,母亲三人还在睡眼朦胧之中,不想苇丛也被鬼子放火烧着了,干枯的苇叶趁着阵阵寒风,烧得叭叭直响,难民又骚动起来,枪声、惊叫声四起,河面上不时浮起亡者的尸体,慌乱之中母亲只是紧紧地按着大哥、大姐,躺在洼地里,听任火焰的烤灼、闭目等待死神的降临。

火渐渐地熄了,搜索的鬼子队伍也走了,母亲他们三人居然没死掉,趁着夜色拼命往野地里走。肚子饿,只好挖田里的山芋吃。母亲肩胛上的伤口阵阵疼痛事小,可怕的是大姐发起了高烧——大概是受了惊吓或喝生水着凉的原因。天亮时,总算寻得一户人家,农人对难民还相当热情,只是没有药,没有医生,也无人敢上集镇去买药找医生。大姐越烧越厉害,还浑身抽搐或抖动,可怜的母亲眼睁睁地望着亲生女儿无治而亡,心痛得像刀绞一样。

埋葬了大姐,母亲赶到江宁乡下的亲戚家,总算在那儿找到了失散的父亲,一家人见面,又高兴又悲哀。我家虽然一伤一亡,但比起许多灭门亡族的好多了。

一年之后,听说城里的日本鬼子不杀人了,父母才想到回家,可进中华门的时候,父亲莫名其妙地挨了两巴掌一枪托,缘由是未给站岗的鬼子兵脱帽鞠躬,直到父亲从地上爬起来重新来一次脱帽弯腰才算了事。

几十年弹指一挥间,事过境迁,浸印着国耻家仇的画面将永远不会再现,只是在这特殊的日子,使我追忆起母亲“跑反”惨痛的往事,更加思

念受了半辈子磨难的母亲和从未见过面的大姐。

潘开明：我就是“屠城血证”

《南京日报》1995年7月16日

记者：刘健

在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78岁的南汽退休职工潘开明，7月7日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日本侵略者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真是几天几夜也说不完；想想当年遭的那份罪，我的心就疼得厉害。”老人满怀激愤之情拉开了记忆的闸门。

他16岁的时候，双亲在10天内相继去世。日军攻进南京之前，他和一个弟弟跟着姑母住在鼓楼二条巷24号的难民营。当时，他姑母62岁，弟弟才9岁，他20岁不到，全靠剃头和拉人力车糊口。

1937年12月13日，日军破了南京城，见了男人就杀，见了妇女就强奸，抢东西、烧房子，真是无恶不作。14日上午9点多钟，日本军人把他抓走，在华侨路一个地方关了3天，不给饭吃，不给水喝。到第三天下午快3点钟的时候，用绳子把他捆着，和300多人一起赶往下关煤炭场。日军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在路两边押着，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这时，日军已在煤堆上架好了机关枪，大家一到就疯狂扫射。又累又饿又怕的他，一下子昏厥栽倒了，死尸随即压在他身上。直到晚上9点多钟，他才醒来，从死人堆里爬出后发现左臂上有个大口子，浑身上下都是血。原来，日军扫射过后，唯恐留下活口，又用刺刀到处乱戳，他臂上的伤口就是刺刀穿过一个尸体再戳上去的。后来，他在一个老人的帮助下，第二天夜里才避开巡逻的日军，回到姑母身边。

对于日本现在还有人企图否认对中国的侵略，否认南京大屠杀，潘开明非常气愤。他指着左臂上醒目的刀疤说，除了他亲身经历的那场屠杀，还亲眼看到过几次日军集体屠杀后的现场。有一次，被杀老百姓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的血把两个水塘的水都染得红红的。他说：“好在

我还活着,日军大屠杀的证据是明明白白、否定不了的。”

谈到今天的生活,老人顿时振奋起来。他从南汽退休后,每月有400元的生活费。3个儿子、1个女儿都有工作,正过着儿孙满堂、乐享天年的好光景。面对南京日新月异的变化,他激动地说:“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得好,才有我们今天稳定、幸福的生活。”话锋一转,他痛切地说:“落后就要挨打。这是我们从亲身经历中悟出的血的教训。一定要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懂得这个道理,牢记过去屈辱的历史,保卫和平,把南京、把中国建设得越来越好。”

崔征:五十八载恨难消

《南京日报》1995年8月27日

记者:孙崇平

1937年12月,日本侵略者攻陷南京,屠杀了30万中国人。然而,现在刚上任的日本文部大臣却公然抵赖侵略历史,实在令人愤慨。日前,在58年前江东门大屠杀现场目击者崔征家中,这位70岁的老人抑制不住愤怒,向记者讲述了那一段悲惨的历史。

崔老说:“我1926年出生于江东门大街。日军攻陷南京时,我才12岁,不仅目睹了江东门大屠杀现场,还亲手救过一个死里逃生的贵州籍伤兵。”1937年12月14日下午3时左右,他突然听到江东门中央军人监狱方向传来密集的枪声,同时听到撕心裂肺的喊声。10多分钟之后,喊声、呻吟声逐渐消失,变成了一片沉寂。夜里,崔征和家人去监狱寻找食物,只见监狱大门前约200米长的大路上,尸横遍地,无处插脚。犹豫许久,为了寻食,只得摸进监狱。监狱内广场上也全是尸体,突然从尸体中传出呻吟声,崔征和他父亲循声过去,果然有一未死的人。见他们走近,那人连呼救命,说日军机枪一响,他立即扑倒。日军扫射之后,便在死尸中寻未死者。他被发现,鬼子便又用战刀在他颈后砍了一刀。等他苏醒过来,才知那一刀未曾砍断喉管。同情之余,崔征父亲背起那人朝监狱东头菜农杨开荣家走去,将那人背进豆芽房,铺些稻草,盛了些豆渣给他充饥,又送去些刀伤药疗伤。交谈中得知那人是贵州人,被抓壮丁入伍,

后调来南京守城,在雨花台参加战斗。12月12日夜得知守城部队纷纷撤退,他随着向三汊河下关方向奔走,到沙洲圩时,日军从上新河方向赶到,截断去路,他只好躲进芦苇滩深处。13日上午,被日军搜出集中起来,日军命令他们解下绑腿互捆双手,后带至江东门中央军人监狱门前大路上(即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北大门的大路)。这时,从各处陆续带来的中国士兵和老百姓挤满了一条200米长的大路,后来的则被带进监狱内广场上,日军将他们团团围住,子弹上膛,刺刀出鞘,十多挺机枪对准人群。下午3时许,日军一声令下,机枪齐发,手无寸铁的人群猛醒时已纷纷中弹倒下。全部射倒之后,日军又遍寻未死者补枪、捅刺刀。

崔征说:大屠杀的那一年那一月,天寒地冻,数千死难者的尸体被冻得僵硬。江东门原有一座古代名桥江东桥,日军侵占南京前被守城士兵炸毁。日军无桥可渡,就把这些尸体拖下河道层层堆起,最上面铺上木板,铺成一条惨不忍睹的“桥”——尸桥,让日军步兵、骑兵、汽车、装甲车从上面通过。第二年4月,春汛到来,南京慈善机关派出掩埋队打捞尸体,有的尸体早已破碎分离,只得用箩筐装起,就近在监狱门前挖一大坑掩埋(即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址),后又把散落在管子桥、凤凰街、积余村等处死难者尸体移聚过来,在离崔征家仅几米远的今江东门大街江东剧场对面挖一大坑悉数掩埋。崔征说,其中不少人是他的街坊邻居,如江东门街上的李之江,日军抓去背草料过河时被杀;江东桥头卖大饼的老崔头和两个儿子,在三汊河放生池难民区返家途中被杀;积余村一妇女刚刚分娩,在家人抬其逃难途中,被日军拖下竹榻先奸后杀,婴儿同时被害;茶亭的徐志广被日军抓去烧饭后,被刺刀捅破肚皮,肠子流出体外而死;邻村一村民被日军带到江东桥东南桃园地堡,投入稻草,浇上汽油,点燃后将其推入火中活活烧死。至于在水塘、粪坑、沟渠、水井、水缸、路边、菜地等处,更是随处可见惨不忍睹的尸体。

讲到此,崔征老人悲愤不已:“两处大坑,共埋葬尸体一万余具。江东门这场大屠杀,仅贵州籍士兵一人幸免于难。他在杨开荣家养息伤愈之后,落下残疾,头颈僵直歪斜,后来返回贵州原籍。”

“可是日本至今还有人竟掩盖侵略真相,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然而血

写的侵略史是他的几句谎言所能掩盖得了的吗？”崔征说，他只恨自己当时太小，不能手刃日寇。后来他多次参加抗日募捐活动，参加了南京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投身到埋葬腐朽的国民党政权斗争中。解放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的老人深深感到，一定要用这段历史教育学生，教育后代，要把如尸桥这样的史实编入教科书，让后代永远不要忘记。

沈轮：他们也是南京大屠杀的见证人

《新华日报》1995年8月30日

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犯下的滔天罪行，是世人皆知的铁案，谁也休想翻案。前几年，我在调查侵华日军在苏州的罪行时，曾参加过苏州抗日救护队的沈轮老师告诉我说，他们救护队离开苏州后，在南京经历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灾难，他们也是南京大屠杀的见证人。

一天，我去苏州石路街道办事处调查，年已73岁的沈轮老师回忆了往事。

抗战爆发时，我刚高中毕业。“八一三”后，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高潮中，我参加了阊门青年抗日救护队。当时，上海前线的伤员不断运到苏州来，急需救护。我们一面接受培训，学习医务知识和急救法，一面去火车站抢救伤员。我们全队有二三十人，领队是一位医生，我是护士长。

日本飞机不断来苏州轰炸。没多久，我们救护队离开苏州，先到光福，再到宜兴，最后到南京。在宜兴时，有部分队员和我们分手，他们有的人后来到了延安。我们到南京后，日本兵也进了南京城。我们无路可走，当天夜里，住在鼓楼医院附近一户人家。

第二天上午，我们10多人正商量怎样出去，几个日本兵走进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兵，拉走了我们的两个女队员，第二天才放回来。她们被日本兵强奸了，眼睛都哭肿了。

我和其他几个女队员，把带来的药片全倒在手里，准备吃掉，誓死不受辱。一个男队员悲愤地说：“我们不能死，要和日本人斗！”一个男队员跑到鼓楼医院找到医院里的人，说明情况，要求医院收留我们。医院里

的人答应了,我们就在鼓楼医院住下来。

鼓楼医院是教会医院,里面住了许多中国伤兵。日本兵进城后,鼓楼医院改为难民医院,叫中国伤兵脱去军衣,说是难民。他们把我们救护队的人编成一个小队,我是小组长。我们在鼓楼医院一面护理伤员,一面做宣传工作,传播抗日消息。

日本兵进入南京后,就在南京大屠杀。他们把许多人赶到鼓楼医院后面集中。第二天,我们在鼓楼医院楼上,躲在窗格后面朝外看,看见医院后面场地上集中的1000多人,全被日本兵用机枪扫死了。后来,住在医院里的一个美国人(她是国际红十字协会的)拿来日本兵枪杀中国人的照片给我们看,叫我们保护好伤员,不要让他们出去。

住在医院里也不保险,几天后的夜里,日本兵闯进来,我们的一个女队员被日本兵强奸了。这天夜里,我们还有4个女队员被日本兵拉去。

南京伪自治会成立后,我们被押送上车,遣返苏州。火车到了苏州车站,我们看到车站上站满日本兵,没有下车,随车到了上海。我们到上海后,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给了我们帮助,把我们分配到上海各个难民所去工作了。

徐廷梁:劫后余生记

《南京日报》1997年12月12日

今年12月13日,是悼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60周年祭日。在历时两个多月的血雨腥风中,日本侵略者在南京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无论岁月怎样流逝,侵略者的滔天罪行,令每一个中国人永难忘却。

今年74岁的徐廷梁老人,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现住在南京秦淮区仓顶19号。1937年,14岁的他在难民区内两条街上亲身经历、亲眼目睹、亲耳所闻大屠杀的悲惨事实。最近,他将往事回忆并整理成文,投书本刊。我们将徐老先生的文章编发于此,藉以声讨日本侵略者的兽行,纪念无辜死难的30万同胞。

沦陷前夕,山雨欲来

1937年12月初,南京城内隐隐听见远方炮声隆隆,警察和士兵正挨户动员所有居民一律迁往“安全区”。所谓“安全区”,老百姓统称难民区。地址在鼓楼区境内,四面以马路为界:东为中山路,南为汉中路,西为西康路,北为山西路及以北一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鼓楼医院、美日等国大使馆都在区内。

我家落脚在鼓楼二条巷尾左转弯处的两间平房内,共有八九户,四五十口人,无法睡觉。熬到天亮,我们和胡汉臣、李公银、徐娘娘四家搬到二条巷靠近十字路口一幢西式两层楼房的楼上,同样的楼房共三幢,呈“品”字型,我们是当中一幢。

下午枪炮声不绝于耳,入夜四处火光冲天,爆炸声声。远看紫金山上的树木一排排在燃烧,犹如火焰山。南眺整个中华路,像一条火龙在翻腾!

烧杀淫掠,无恶不作

1937年12月13日上午,远方时有零星的炮声,机枪声爆炸声则是断断续续,人们误以为日军已被击退。九时左右,大批逃难的人群从各个巷口涌入难民区。不少放下武器的国民党士兵、警察夹在人群当中。这一天,晚上依然机枪哒哒,火光闪闪,四处燃烧,南京处于火海之中。第二天上午,两名日军身背三八步枪,骑着高头大马,从十字路口经过,老百姓从未见过日本兵,出于好奇,纷纷出门观望。日军向着围观的人群点头狞笑。有的人以为可以安居乐业了,岂料随之而来的却是重重灾难!

第三天下午,十字路口站满了日军,来往行人都被拦下捆绑着带走。事后才知道,日军灭绝人性,对手无寸铁的居民集体屠杀。傍晚,机枪声哒哒哒,有远有近此起彼伏,大屠杀开始。正巧这天一大早,父亲去探望我的姑父母,天黑了仍不见回来,母亲以为父亲也被抓去,独自伤心饮泣不止,我也忧心如焚。深夜一点多钟,父亲匆匆赶回来。他说:午饭后就往回走了,中途远远看见几处十字路口都有日本兵在抓人,只好躲进树林等到深夜。从此,路上行人绝迹。

一天上午,忽听楼下9岁的女孩声嘶力竭的哭喊声,不知何故。我连忙下楼,只见两名日军淫笑着从堂屋出来扬长而去,女孩已被两个禽兽蹂躏得不能站立!又一天下午,两名日军在楼下将一名20多岁的少妇轮奸,她羞愤万分无脸见人,其夫在旁百般劝慰。从此,妇女们都在脸上涂满锅烟灰躲藏起来,女孩剪去长发改为男孩装束。

又一天将近中午,我和小舅舅在大门外右边打井水,过来两名日军,都是20多岁。一个是三角脸,上宽下窄,面色黄白,手持步枪;一个是长脸,面色红黑,下颌一撮胡须,手里提着大小两只皮箱。长脸喊我:“小孩!”立即将小皮箱塞到我右手。“你的跑跑的,死啦死啦!”随手拔出刺刀朝我试试。舅舅要替我去,我说:“你不能去,快回家。”我被迫提着皮箱跟在日军后面,在巷内挨户翻找财物。出门后走到十字路口,两人叽咕几句朝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方向走去。路上我看到路边两侧相距十多米就有一具尸体,仰着趴着侧着形状各不相同,都是单衣单裤,无一穿棉衣的,年纪都是20多岁。走到大方巷中山北路,两人朝我看看,互相叽咕几句,长脸向右边平房门前晒太阳的两位老人招手,老人立即过来,长脸从我手中拿过小皮箱交给老人,说:“小孩,你开路开路。”我掉头转身就走。路上来来往往都是日军,无一行人。不时听到哒哒机枪声和一两响步枪声,一声枪响就是一条性命!

死里逃生,幸免于难

胡汉臣伯伯和我们同住二楼。一天傍晚,两名日军在楼上看见胡伯伯身材高大结实,额头较白,就问:“你的,中国兵?”胡伯伯摇摇头。一日军拔出刺刀朝他头上砍下,听见咣当一声巨响,灯泡灯罩被砍得粉碎,挡住了刺刀的落下。另一日军随手将刺刀拿过来插在枪上。我站旁边以为要用步枪刺杀。不料,两日军相互叽咕几句转身下楼。胡伯伯是死里逃生。

当年,我父亲开有一片小型的织锦缎机房,李学成师傅是“机房”的“曳花工”,他来二条巷见到我父亲就说:“我是死里逃生。”我看他不过30岁左右,嘴上却留着八字须,像个老头。日军进城不几天,他在水西门被抓去,一共有二三十人,都是年纪轻的。日军命令他们每人挖一个深坑,叫他们跳下自己挖的坑中,然后推土活埋。他在坑内猛然想起了在日本

理发的朋友曾经教过他一句日本话,就大声喊:“阿列阿多。”日军闻听,嗯了一声,看看他:“你的,阿列阿多?”他点点头又重复了一句。日军招手叫他爬出坑,给他一张路条:“你的,开路的。”一句日本话使他活下来,其余青年都被活埋。

严鸿亮艺名玉魁,唱南京白局和扬剧,是我舅父。南京沦陷时他在下关和记洋行,日军将这一带居民统统赶到江边,黑压压一片,数不清多少人,然后挨个查看额头、虎口和腿部,年纪大的、身有残疾的站一边,年纪轻的可疑的站另一边去。舅父头上拔顶,看上去年纪较大,日军把他推到年纪大的一边,另一日军走过又看看他,把他拉出来推到年轻人一边去。舅父喊叫前面日军,指着后面日军拉他到年轻人一边去。两日军叽咕交谈后,仍将他送回年纪大的一边去。天色已近傍晚,江边,日军机枪早已架好,站在另一边的几百个青年人,一排排地惨死在机枪之下!严鸿亮是死里逃生。

劫后南京,满目荒凉

2月下旬,父亲叫我回门西老家看看。那天上午我从上海路走,只见路两边排满地摊,买卖东西的人熙熙攘攘,跨过汉中路出了难民区进入莫愁路则是冷冷清清行人稀少。路上无人也无声,犹如空谷旷野。一声咳嗽,远方立即回音。老虎桥、仙鹤街小学和许多民房已成废墟,只有美国人办的益智小学安然无恙,也住满了难民。我走进家门,只见织锦缎的木机仅剩空架,旧桌椅尚在,别无他物。又到金粟庵姑父家去看,四间平房只有空壳,衣物家具荡然无存,看门的“三一子”师傅30多岁,被日军刺刀捅死,邻居徐奶奶60多岁,竟遭日军奸污!我转身绕道三山街回鼓楼,只见昔日繁荣的中华路已被烧成断壁残垣一片荒凉!瑞丰和绸布店、大中华百货店、同仁堂药店、宝庆银楼等有名的商店和福利大戏院已化为灰烬!

张玉英:深情回忆魏特琳

《南京日报》1999年12月14日

记者:赵锐

一张布满皱纹的脸从门缝里慢慢露了出来。得知我是记者,张玉英老人的眼睛就迅速湿润了:“我不能回忆啊,我一回忆就要哭……”都说历尽沧桑的人是不怕舔舐过去的伤口的,莫非侵华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留在她心灵上的伤口到现在还没有长痂吗?62年过去了,她的父母、弟妹、丈夫甚至儿子都已经陆续离她而去了,只有她还顽强执著地活着,并一次次为采访的调查人员提供宝贵的证言。

“听说您叫魏特琳女士‘姑姑’?您还记得她吗?”我小心地问。

“怎么能不记得呢?她是我这生遇到的贵人啊!”她用袖口一个劲地擦着眼睛。“我们叫她‘华小姐’,还有人叫她‘活菩萨’、‘活观音’……”

张玉英一家6口是1937年6月底从北京来到南京的,当时张玉英11岁,刚念完小学四年级。张玉英的父亲曾任北京电话南局业务科科长,眼看北京局势日益紧张,他以为南京会更安全些,遂拖家带口南迁。谁知战争很快全面爆发,他竟在异乡惨死于敌人的屠刀下。好心人把幸存的张玉英从父亲的尸首下拖出,张玉英身带父亲的血迹,扶着小脚的母亲、领着年幼的弟妹来到金女大避难。

整天忙于四处巡视的魏特琳女士注意到了这个新来的小姑娘,并拿出一块红布条,让张玉英缝在袖子上,叮嘱她按时到临近的金陵大学去领粥。有了粥,张玉英一家活了下来。魏特琳还为难民们办起了成人教育,教妇女们学技术、学知识,张玉英也在她的建议下学起了织毛巾、踩缝纫机。每星期六下午不上课,张玉英都去魏特琳家,帮她做蛋糕、摇冰淇淋、熨烫衣服,而魏特琳总要给张玉英一点钱,鼓励她自食其力。有一次,魏特琳带着张玉英打扫学校的琴房,按着钢琴的琴键,张玉英兴奋地问:“我能学弹琴吗?会弹琴,以后我就可以当音乐老师了。”魏特琳听了很高兴。学完一年的职业技术,张玉英很想到正规学校继续战前的学业。魏特琳马上帮她联系了汇文附小,上附小要考试,张玉英毫不含糊,一下子考了个第一。魏特琳乐坏了,搂着张玉英直说:“你的学费我出了。”魏特琳唯恐张妈妈不让玉英上学,她特意准备了两大口袋大米让玉英送回家,她说:“他们也有了吃的,就不会不让你上学了。”1940年秋,张玉英小学毕业。就在这一年的5月,魏特琳被友人护送着回了国。等张玉英得知消息时,她在心里真有点怪华小姐为什么临走时没跟自己告

别？她哪里知道华小姐在殚精竭虑帮助她这样的中国女孩时，在忍受着怎样可怕的病痛！

从那以后，张玉英几次试图与魏特琳取得联系，她还托在美国的亲友登过寻人启事，可始终没有任何消息。今年11月底，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一位女士找到张玉英，说准备请她参加12月6日举办的魏特琳女士纪念活动，张玉英这才明白华小姐已经不在了。12月6日，她步履蹒跚地来到现在的南师大，买来一只很大的花篮郑重地敬献到了魏特琳女士的遗像前。

孙仲芳：我想回家看看

《扬子晚报》2000年7月12日

记者：莫寿昌、肖世艳等

60多年前，日军在南京那场惨无人道的血腥大屠杀所留下的阴影，至今在八旬老太孙仲芳心头挥之不去。那一年，日本鬼子杀进了南京城，也杀进了她的家；南京城大部分房屋被毁，尸骨遍地，瓦砾成堆，成了人间地狱。她的公婆、嫂子和两个侄儿也不幸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之下，妈妈及南京的丈夫、哥哥和儿子失散，她随着溃逃的国民党兵走安徽、下汉口，最后落户在广西桂北一偏僻的小山村，生活了60多年，如今她已风烛残年，每每想起失散的亲人，她说：“我想回家看看。”孙仲芳一生多舛。妈妈在怀她时，一场大火烧了她家的房子，后举家迁到南京市平西街（音）竹竿巷18号，租了两间平房。15岁那年爸爸去世了，生活所迫，17岁时孙仲芳嫁了大她9岁的、在国民党警察局当警察的丈夫陈桂同（音）。第一个孩子在那年出生了，不料6个月大时，孩子拉肚子，因无钱看病夭折了，之后，她又有了第二个孩子，为了让孩子像狗一样好喂养，夫妻俩给孩子取名小狗子。

1937年11月12日，日军攻占了上海，不久又开始轰炸南京城，12月13日，孙仲芳清楚地记得：那天守城的国民党军关闭了四道城门，以为可以过个平安年的老百姓开始走出防空洞，上街购买年货。24岁的孙仲芳也约了几个女伴上街聊天。

突然听到有人在喊：“鬼子来了！”大家回头见四面城楼上站满了日本鬼子，并不断有鬼子从城墙翻入城内。“叭，叭，叭”鬼子开始举枪朝人群扫射，轰炸机不断向城内投下炸弹，枪声哭声喊声交织成一片。此时孙仲芳的嫂子快要生孩子了，又惊又怕的妈妈与哥哥正围着她团团转，公婆在旁边急得手足无措直抹眼泪，自己的儿子小小子吓得大哭，丈夫不知去向。看见孙仲芳回来，妈妈拉住她和哥哥的手惊恐万状地喊道：“你们年轻，快躲出去。”孙仲芳跳进了家后门的小河内，妈妈赶紧用石头盖住她，仅鼻子跟嘴露出水面呼吸。不一会，屋内传来嫂子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和鬼子的淫笑声，隐约还有公婆的怒骂声和孩子的哭喊声，在一阵枪声过后，屋内开始死一般的沉寂。

街上仍不断传来枪声和哭喊声，殷红的血水染红了孙仲芳藏身的小河水，她一动不动地浮在水里，刺骨的河水让她身体开始麻木，可她仍不敢出来，直到两天后，城内不再有枪声，她才胆战心惊地从后门溜入家中，屋内那可怕的一幕令孙仲芳老人直至今天回忆起来仍禁不住老泪纵横：屋内倒卧着亲人的尸体，满屋子的血和吸血苍蝇。嫂子一丝不挂仰面倒倒在满是血渍的床上，腹中流出的肠子和血肉模糊的身体上聚满了苍蝇，一个尚未出生的婴儿还躺在嫂子被日本鬼子剖开的腹中，公婆睁着双眼趴在地上，双手伸向倒在床上的嫂子，两个侄儿一个倒在嫂子的床边，一个倒在公婆的身旁，母亲奄奄一息地坐在地上低声啜泣。见到女儿，母亲颤抖着声音说：“你嫂子被这些畜生强奸了仍未能保住性命，你年轻，快逃吧。”孙仲芳不忍离开伤重的母亲，踌躇之际，泪眼中见到哥哥抱着小小子惊恐万分地跑回家中，见到家中惨状，这个硬朗朗的汉子不禁抱头痛哭。之后兄妹俩忍痛含悲，悄悄将屋内亲人的尸体拉到屋外掩埋。这时，街头又响起了鬼子的枪炮声，在母亲的催促下，孙仲芳与哥哥抱着小小子一起混入了逃难的人群，街上目光所及之处均是死人和断胳膊断腿。就在这时惊恐万分的孙仲芳在混乱中与哥哥和小小子走散了，她只得与一些伤员和逃难的群众躲进了临时设在国民党外交部的红十字医院。

不久，国民党军队从南京一带溃退，孙仲芳也随着溃逃的部队辗转到了安徽。

在安徽,她凭着手工制作衣服的技艺艰难地求生,并嫁给了一个在逃亡途中悉心照顾她的国民党士兵黄世清(音)。虽然又有了一个家,但她仍极度思念自己失散的儿子和妈妈、哥哥,她托人写了封信寄到了南京平西街(音)竹竿巷18号,几个星期后,哥哥回信了。哥哥在信中说南京方面局势仍然混乱,不能久居,他带着小狗子和母亲不久将赶到安徽,叫孙仲芳在原地等他们。

不料未及等到哥哥他们到来,安徽战事又起,孙仲芳只好卖掉手中的布料,随着黄世清及其所在的部队辗转到了汉口。这一走,孙仲芳从此与母亲、哥哥及小狗子失去了联系。

抗日战争胜利后,孙仲芳随回乡的黄世清定居在广西桂林兴安县界首镇小山村一马路桥屯。不久黄世清去世,她又改嫁给同一镇上的合家村何家拉屯村民何成才为妻,与第二、第三任丈夫生活期间,一直未曾生育。

在何家拉屯,孙仲芳凭自己的手艺给村民做衣裳,教村民剪花、剪纸,高兴时还哼几曲京戏,村民们渐渐地喜欢和关心起这位乐观豁达的外地“巧媳妇”。

70年代,公社的电影队来村里放电影,她从银幕上看到家乡南京城熟悉的模样,思乡之情愈加强烈,她没有钱乘车,突生了最笨最实在的念头:沿着当年逃亡到广西的原路返回去,一定能成。有一天,她真的把家门一锁,到解放前就有的离村六七公里的百里村火车站,沿着铁路往回走,但走到天黑时,她突然想起,自己这样一狠心离去,丢下已60多岁、无儿无女的丈夫,谁来照顾?于是,她又转回头,回到了村里。

日月如梭,一晃几十年过去了,何成才也已经去世,只剩下她孤孤单单地生活在异乡的小山村,并成了村里的“五保”老人。白天她走家串户与村民拉家常,尚可排解心头的寂寞,乡村的夜格外宁静,她总会在这时想起在南京的家,想起失散了60多年的哥哥、妈妈和小狗子,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活着。每每想起这些,她的心就像被无数只虫子噬咬般难受,常常老泪沾襟。

7月4日,记者沿着坎坷不平的乡间小路,在一片绿阴掩盖的小山村,一座已塌了瓦梁的旧木屋内找到这位在南京大屠杀中的幸存者。谈起过去,她说:“我恨死了日本鬼子,是日本鬼子害得我家破人亡。”在整

个采访过程中,她说一阵哭一阵回忆起那令她仍然胆寒的往事。她告诉记者说:“我好想回家,我在南京的家(平西街竹竿巷)绕过一条中山街便到了南京总统府,大约只有两公里的路程。哥哥名叫孙仲府(音),父亲孙廷国(音),母亲名叫曾高叙(音),南京大屠杀时,还有一个不在城里住的妹妹孙仲兰。如果有生之年能找到自己的亲人,就是爬着,也要爬回去看看。”在广西到底有多少与孙仲芳老人同样命运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有多少因日军的蹂躏而至今仍然亲人失散的家庭?带着与读者同样关切的心情,记者到有关部门了解,但得到的答复都是:没有这方面的统计。通过《南国早报》的热线,记者找到了两位:在南宁火炬路金达花园,76岁的老奶奶宋淑华尽管已是子孙满堂,但回忆起当年自己逃出南京时的惨景,仍旧心情愤懑。她说,12岁便碰上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是一个拉黄包车的穷苦人见她年幼可怜,将她抛出城墙外,借着墙外密密的竹林藏身才得以活命。在那场大屠杀中,她与爸妈、哥、姐及两个妹妹失散,从此亲人再也没有见过面,也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活着。

在钦州市大直镇顿檬村,一位被当地村民称作“土婆”的80多岁的老太太,在那场大屠杀后与当时任国民党军官的丈夫及家中亲人失散,她沿着山路没命地逃,往没有枪声的地方躲,最后辗转来到广西。如今已是耄耋老人,膝下无儿无女,时常对着她当年逃来的方向思念亲人,思念在南京的家。

由于历经战乱或逃亡时的年幼加上长时间的尘封,这些失散亲人的不幸者中,有的回忆自己当年在南京的家庭住址甚至家人姓名、生日时,已有些模糊,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给他们带来的痛苦是如此的深重。

孙老太欲回南京寻亲的消息在当地《南国早报》披露后,引起了读者的热烈反响。7月9日晚10时许,南京普天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驻南宁办事处的蒋先生打电话给报社说:“我的家庭有过和孙仲芳老人家庭一样的不幸。作为家乡人我一定要帮帮这位老人。”一位姓关的民警主动捐出1000元钱,他说:“真想认她老人家作亲奶奶,照顾她。请帮我捎点钱过去,让老人家日子好过些吧。”一位读者在寄来的捐款附言中说:“祝孙仲芳老人健康!长寿!并早日踏上回家之路!”收到这篇报道后,本报与《南国早报》商定,两地媒体合作,共同帮助孙仲芳老太太圆“回家梦”。

欢迎了解情况的读者,向本报提供有关线索。

附

孙仲芳:南京大屠杀见证者的悲欢离合

南方网 2003 年 1 月 17 日

作者:王勉

没有亲生子女的陪伴,孙仲芳带着历史遗恨,走完了她 92 年的沧桑岁月。1 月 15 日,在乡亲们悲伤的唢呐声中,她被安葬在广西兴安县界首镇何家拉屯后的山冈上。

老人是不幸的,自幼就经历了南京大屠杀的劫难,夫离子散,颠沛流离;老人是幸运的,在有生之年终于见到朝思暮想、分离 63 年的亲人。

往事不堪回首

孙仲芳 15 岁时父亲去世了,为生活所迫,她嫁给了一位大她 9 岁的警察。第一个孩子夭折,夫妻俩便给第二个孩子取名“小狗子”,意思是让他像狗一样好喂养。

1937 年 12 月 13 日,家住南京平西街竹竿巷 18 号的孙仲芳与几个女伴上街,突然听到有人在喊:“鬼子来了!”大家回头看见四面城楼上站满了日本鬼子。紧接着“叭!叭!……”鬼子开枪朝人群扫射,随之而来的轰炸机也不断向城内投掷炸弹。

枪声、哭声、喊声交织一片,孙仲芳没命地逃回家。母亲拦着她和哥哥惊恐万状地喊道:“你们还小,快躲出去!”两天后,孙仲芳才胆战心惊地跑回家。见到女儿,母亲有气无力地说:“快逃吧……”在母亲的催促下,孙仲芳与哥哥强忍着心中的剧痛,抱着“小狗子”一起汇入了逃难的人群。

不料,混乱中孙仲芳与哥哥和“小狗子”走散了。后来,孙仲芳随着溃逃的部队辗转到了安徽,并嫁给了一位在逃亡途中照顾她的国民党士兵黄世清。

在安徽,孙仲芳托人写信寄到南京的家。几个星期后,哥哥回信了,

说南京方面局势仍然混乱,不能久居,他带着“小狗子”和母亲不久将赶到安徽,叫孙仲芳在原地等他们。不料未及哥哥他们到来,安徽战事又起,孙仲芳随着黄世清又逃亡到汉口。从此,她与母亲、哥哥及“小狗子”失去了联系。

抗战胜利后,孙仲芳定居在黄世清的家乡广西桂林兴安县马路桥屯,一住就是50多年。黄世清病逝后,她又嫁给邻近的何家拉屯村民何成才,直到1990年何成才去世。但她与这两任丈夫均未生育。

南京大屠杀所留下的阴影,使老人每每想起失散的亲人便心如刀绞。她常常念叨:“60多年了,‘小狗子’还在不在?如果有生之年能找到亲人,就是爬也要爬回去看看!”老人还说,“小狗子”名叫孙家才。

离散母子终团圆

孙老太欲回南京寻亲的消息在广西地方媒体披露后,引起读者强烈反响。许多人打电话询问老人的健康状况,有的还捐钱以表心意。

2000年夏天,上海市公安局在查阅户籍材料时,发现一位“孙家才”,他就是让孙仲芳老人梦里想起、醒来泪湿的儿子“小狗子”。

孙家才当时66岁,已从上海一家事业单位退休。2000年7月19日,孙仲芳终于从南宁坐上了返回故乡南京的火车,7月21日上午,在古城南京一家报社的会议室里,一名两鬓斑白的花甲男子神情激动地等待着,眼睛不住地盯着门口。8时整,孙仲芳在人们的搀扶下出现了,那男子急切地迎上前去,两双泪眼凝固了,双手颤抖着伸向对方,紧紧地握在一起。

男子掏出两张泛黄的照片,捧给孙仲芳辨认。“这个,这个是我妈妈!”短短的几秒中,老人紧紧地注视着照片,泪如泉涌。好久,她干瘪的双手抚着男子的脸颊,浑身颤抖着呜咽起来:“小狗仔,我的小狗仔!”花甲男子禁不住双臂拥向老人,“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妈妈……您让我找得好苦啊!”在场的人潸然泪下。

返回桂北山村

作为经历南京大屠杀这场历史劫难的见证人,孙仲芳显然成了“活

教材”。一时间,许多媒体、机关单位和学校邀请她去作报告,她成了大上海的名人。有时,一天会接到好几张请柬。

可是,每一次重温过去,对于孙仲芳老人来说,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回忆起当初那可怕的一幕幕,老人总是浊泪纵横、不寒而栗,除了心碎,没有丝毫的快乐和安慰,尽管她有责任让后人知道这段历史的真相,但她真的不想再一遍遍地揭开那块伤疤。

老人为此煎熬了两年,加上她割舍不下在广西桂北山村结下的亲情。2002年思忖再三,她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吃惊的决定:要回广西兴安去!再次回到桂北山村的孙仲芳老人在乡亲们热情中又过上了简朴而自主的日子。

临终前,孙仲芳老人一直轻唤着“小狗子”的名字。遗憾的是,年近古稀的孙家才此时也卧病在床,需人照顾。电话里,孙家才哭得撕心裂肺:“妈妈呀,这次儿子赶不上给您尽孝了,病愈后我一家来您坟头给您烧香、磕头、添土,好吗?”

七旬老人不忘幼时逃难经历

《新华日报》2001年4月5日

4月4日,75岁高龄的郑瑞林老人再次来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这是身居长沙的他时常在心中祭奠的地方。这一次,他把一份名为《逃难归来》的手稿郑重地交给了纪念馆。

“船过江心,不久就接近下关,朝江里一看,水中漂着无数的尸体,略远一点有无数尸体随着江浪上下起伏……”由于日军侵入中国,在1937年秋天,11岁的郑瑞林跟随母亲逃难到安徽芜湖,次年3月,他又随同母亲回南京,就在快到家时,他看到了这样的情景。“颤颤的难民一个个踩着尸体下船”,他回到了从小生活着的地方。但是,一切都变了,留在南京城给布店看门的父亲,已经给日本人杀害了。12岁的他再也见不到自己的亲生父亲了。

这些惨痛的经历从此深深地烙在郑瑞林的心上。他参加工作后来到长沙,居住在长沙县南托岭水利电力部第八工程局南托基地宿舍。

这10多年来,他每四年来一次南京,每次都要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来祭奠一番。为了让子孙后代了解历史、记住历史,他把逃难归来的所见所闻写下来,300字一页的稿纸,足足写了11张。

当他得知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严重歪曲史实,甚至把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描写成“尚有争议的南京事件”,老人十分激动。他说,幼时的逃难经历永远都忘不了,日本想抹杀南京大屠杀的暴行是不可能的。

季培生:回忆痛苦 祈盼和平

《江南时报》2002年12月11日

记者:倪方六

12月9日,一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向本报讲述了他尘封65年的惨痛记忆。

12月13日,每到这一天,已离休的季培生老人总会独自一个人来到地处南京西郊的河北大街23号门前,默默地站一站——这里曾是他的家,在65年前被日本人毁掉的家!

12月9日,老人领着记者,提前4天来到这里,他要把那份久藏的记忆告诉媒体。他说,不能再沉默了。再沉默,那种痛苦、那段历史就要被带到地下了。

河北大街23号:刺刀逼向全家人

这次采访是老人主动与记者联系的。记者赶到7路公交解放南路站时,老人已等在寒风中,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见记者来了,他从塑料袋里拿出一叠材料,告诉记者已把童年时亲眼看到的侵华日军暴行整理出来了。

老人今年72岁了,是位离休干部,现住瑞金路附近,那时住在河北大街23号。日本人攻陷南京那年,他7岁。1937年12月13日上午,两个日本兵闯进他的家。当时,他与外婆家及邻居吴家等十几个人,躲到了自家挖的防空洞里,不想却让这两个日本士兵发现了。季培生对“日

本鬼子”的概念就是从防空洞爬出来的时候形成的。

“两个日本士兵用刺刀把我们全逼了上来,我的舅舅和邻居吴家的儿子年龄一样大,都是15岁。日本士兵用刺刀顶着他们的肚子,开始搜身。外婆见舅舅危险,上前阻挡,被其中一个日本士兵一脚踢倒在地,后又用脚在她的头上乱踩。另外还有两位老太太也未能幸免,三位老人的脸全被打肿了。我外婆的脸肿得最厉害,大如脸盆,闭着眼直喘气,奄奄一息。过了一会儿,日本一支部队冲进了我家,还在我家驻扎了一个星期。万幸的是,我们逃过了死劫。”

老人说这些时,已领着记者到了他童年的家前。老房子原来四进,现在还剩下临街的一进,其他部分已改建成了一家钢套厂的职工宿舍。在宿舍的后墙角边,有一棵大树。老人说,当时外婆等三位老太太挨打,就是这位置,这棵树当时仅是指头粗的小树苗。

河后街3号:浇油活烧叫花子

从老宅出来,走到河北大街河后街3号一处老房子前时,季培生停了下来,眼睛盯着墙角,似乎在寻找着什么。好长一会儿,老人抬起头,指着老房子的墙角对记者说,这里曾发生过日本兵干的极其残忍的一件事:活烧叫花子。

“当时,在我家所在的上新河镇上,有一位长期讨饭的老叫花子。这位叫花子全身上下都患了皮肤病,平时就露宿在街头,当地居民都叫他老癞子。日本兵来后,他没有逃走,而是仍旧在街上讨饭。一天,三个日本士兵看到他这副样子,便用绳子将他捆绑起来。他们从我家里拖出一张桌子放到街上,将老叫花子抬到上面,然后再浇上汽油,将其活活烧死。当时我舅舅带着我,躲在不远处。老叫花子的惨叫声、日本士兵的狂笑声,至今仍在我耳边回荡,真是不堪回忆啊!”

在河北村16号的一栋楼前,老人告诉记者,这里原先是一个大院子,是一个难民营,当时挤进了一百多人。说是难民营,其实就是人家聚集到一处,壮胆子。驻在上新河的日本士兵随时都会来抓人,晚上根本不能睡,大家只是挤坐在一起。有几次晚上日本士兵进来找“花姑娘”,吓死人了。每当这时,难民营里便是一片哭声、喊叫声、求饶声。

河北大街 26 号：防空洞前险送命

在与记者的交谈中,老人的情绪一直很激动,当他带着记者来到现在的南京钢套厂厂区时,却沉默了下来。他说他想找一处防空洞。可老人怎么也找不到,原来防空洞所在位置已盖上了高大的厂房,里面机器轰鸣。老人告诉记者,就在这处防空洞,他继 12 月 13 日那天遇险后,又一次险些命丧虎口。“在形势稍稍稳定后,一天中午,舅舅带我从这个防空洞出来,准备找午饭吃,那天听说日本兵又要来抓人了,一大早大家就躲了进去。走到防空洞的门口时,我们以为日本兵不在,便拉开门闩。门刚打开,只见两个扛着枪的日本兵背对着防空洞站在不远处。我一声惊叫,惊动了他们。他们立即转身追了过来,舅舅带我迅速返回防空洞。两名日本士兵在上面乱嚷乱叫,但却不敢下来。最后,我与舅舅一直挨饿到晚上,天黑后才敢出来。由于这里也不安全,之后舅舅便带我逃到别处。”

新河口江堤：集体杀人推江中

日军进攻南京,其中有一条线路是从西郊的双闸、棉花堤过来的。季培生目睹了日本士兵血腥屠杀手无寸铁士兵和无辜难民的过程。

记者与他走到新河口大街附近的长江大堤边时,老人脱下了帽子,默哀起来。他说要为那些死去的人默哀,就是在这一片地方,日本兵将他们集中到一块,用机枪集体射杀,然后将尸体推入江中。

季培生还告诉记者,一天晚上,邻家失踪三天的吴大爷突然回来了,浑身是血,当时大家都以为他被日本人杀害了。经他叙说才知,这几天他被日本士兵抓去埋死尸了。在埋尸过程中,没有力气的会被射杀掉,他因为是做木匠的,力气大,最后活了过来。吴大爷后来还给有关人员指证过埋尸的地方。

新河口大街 84 号：宪兵放狗咬行人

在新河口大街 84 号的一座二层老式木楼前,老人显得十分愤怒。他说,这里原来是日本人的宪兵队驻地。以前,这座房子是开木行的曾云泰家的,日本士兵将他全家赶了出来。有一天下午,他舅舅带他到江

边看船(那时形势稍稍稳定了)。站在门口的两个日本宪兵看到有一男子从门前走过,立即放出一只大狼狗撕咬他,一直把他身上的肉撕开了花。这个人胆太大,被咬过后,捂着膀子与日本宪兵论理,结果被两个日本宪兵痛打一顿,最后瘸着腿逃走了。

“我当时还想看热闹,舅舅立即拉着我的手,将我牵走了,为此,我回家后挨了大人一顿打,以后不论做什么再也不敢跑到宪兵队的门口了。”季培生说。

听说老木楼里住过日本宪兵,这里好几家住户纷纷走了出来,向季培生问这问那。老人一遍又一遍耐心地给他们解释,听明白后,住户们十分惊讶,脸上同时也充满了悲愤!

老人告诉记者,他的记忆力很好,虽然七十多岁了,但生人的电话号码他看一遍就记住了。他还说,之前也曾试图向有关部门反映此事,可因忙于工作,家庭负担又重,一直没有顾及。现在退休了,年纪也大了,今年适逢南京大屠杀 30 万同胞遇难 65 周年,为了让年轻人记住那段历史,为了和平,有义务把这段深藏在心底的记忆、把历史真相说出来。老人最后特别强调,说出这些并不是想向日本人索取什么,而是希望日本以史为鉴!

桂英:我险遭日本鬼子的蹂躏

《江南时报》2003 年 11 月 27 日

记者:少白

(编者按:随着 12 月 13 日——南京大屠杀三十万同胞遇难六十六周年纪念日越来越近,编辑部也陆续接到了一些由老百姓口述、作者采访的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幸存者新的证词。本刊在上期登出了《我目睹了鬼子的罪行》后,激起了读者的强烈反响,今日又刊登出一篇,在悼念逝者的同时,也再次表达南京人民祈求和平的心愿。)

1937 年,日本鬼子侵犯南京之前,我随奶奶、母亲等人逃往难民区避难。

当时的难民区在金陵女子大学(今南京师范大学)对面的图书馆楼

上,听说是一位美国人名叫黄小姐办的。初去时,难民区对难民十分关心,每天熬一大铁锅稀粥,用大木桶装着提来施舍给众难民吃,并带着碗、筷、小菜,让难民们很受感动。时间长了,难民越来越多,人们开始自烧自吃,在平地上放三块砖头,架一个小铁锅,用木柴烧饭烧菜。难民区里供应包菜,当时称为甜菜,勉强度日。

日本鬼子攻进了南京城,到处烧杀抢掠奸淫妇女,吓得我们这些小女孩不知如何藏身,真想找个地洞钻进去,再也不出来,躲过这一劫。听难民们说,难民区是国际共管区,受国际法的保护,日本人不能进来。再看看大门口站着几个戴袖章的男人进行守卫,但愿他们能拦住日本人,不让鬼子进来糟蹋老百姓。

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一天,从后面进来了几个日本鬼子,扬言要找花姑娘,鬼子知道从前面进来要受到阻拦,就从后面溜进来了。原来,图书馆的后面是何应钦(原国民政府要员)公馆,人去楼空,鬼子砸开门窗闯进去,越过围墙来到难民区里。大家听说鬼子要找年轻女子,一下炸开了锅。哭的哭,喊的喊,女孩们不知往哪里逃,奶奶、母亲连忙往我脸上涂锅烟灰(锅底上熏出的黑灰),往我身上套老太婆衣服,还找来一把剪刀剪我的头发,想将我装成疯女孩……

日本鬼子终于来到我们的面前,我当年14岁,因个子长得较高,鬼子非说我是大姑娘,要强行把我带走。急得奶奶、母亲连声辩解,说我是小疯子,才十二三岁!鬼子哪容分说,推推搡搡带着一群女子就走。正在此时,美国人黄小姐带着一批人赶来了,立即阻止了日本鬼子的兽行。鬼子理屈词穷无言以对,显得狼狈不堪。怔了一会儿,鬼子恼羞成怒,嗷嗷叫着啪啪打了黄小姐几个耳光,转身悻悻而去。我们一群女孩子流着眼泪感谢黄小姐的搭救之恩,众家属们也围着黄小姐进行拜谢。

那一幕情景让我一生一世不能遗忘。

明金:我目睹了鬼子的罪行

《江南时报》2003年12月12日

记者:少白

1937年日本鬼子侵占南京前,我家住城南门东。当年下半年时局趋紧,国民党第88师进驻门东、门西。这支部队是四川兵,每人带两支枪,一支步枪、一支大烟枪。部队官兵动员老百姓:日本人就要打来了,你们还不快跑,走迟了就没命了!穷苦百姓说:兵荒马乱,又没钱,跑到哪里去?官兵说:快去金陵女子大学(今南京师范大学),那里有美国人办的难民区,日本人进不去,比较安全。

起初我们还没有动。后来形势越来越紧张,日本飞机嗡嗡嗡嗡不停地在天上飞,狂轰滥炸。接着日军排炮打进城,落地开花,炸死许多无辜百姓。这时一家人才慌张起来,连夜逃命,先住进一家小旅馆,十块大洋一个晚上。第二天赶到金陵女子大学,门前插着美英法俄等五国国旗。我们住到大学对面的图书馆楼上。因我们去得较早,当时楼上还没有多少人。可一天夜间,突然来了许多人,原来是国民党的溃败军队无处逃命,一起涌到难民区来躲藏了。那时图书馆的围墙内长满了柞刺,扎人厉害,无法进去。士兵们就用棉被裹紧身子往里滚,一夜之间楼上挤满了人,楼梯的每一级台阶上都坐着两个人。过了几天,大批日本鬼子来了,架上了机枪,命令男人站一边,女人站一边,要给难民区里的人登记“居安证”,借机搜查隐藏的国民党士兵。搜查士兵要验看三条:一看额头是否有帽箍印。当兵的都要戴军帽,时间长了头上会勒出一道帽箍印。二看右肩。士兵开步枪要用右肩顶着枪托,时间长了肩上有疤痕。三看右手指,是否有扳枪机的老茧。若发现任何一条,立即拖出去枪毙!

当年我才十五六岁,看着周围架着的机枪,担心鬼子兽性大发,随意开枪把我们打死,一直胆战心惊。在登记前,有一个穿长衫的男人站在大桌上向大家讲话,自我介绍名叫陶锡三。他说皇军优待国民政府士兵,凡是还想回部队去打仗的,就送还原部队去继续打仗;凡想回老家去的,就发给路费还乡。人群中的国民党士兵心想日本人还是很人道的,不虐待战俘,与其被搜查出来拖出去枪毙,不如自己站出来要求回老家去。路边停了十几辆大卡车,于是他们都上了大卡车,个个都说要回老家去,谁知鬼子将卡车全部开到鼓楼下面的一个水塘边,把他们赶下车押跪到地上,预先安排好的机枪扫射过来,十几卡车的国民党士兵没有一个能逃脱掉!

原来是日本鬼子和汉奸相互勾结设下的圈套,杀害了无数的愚昧无知的国民党士兵。日本鬼子残忍、可恶,汉奸出卖国人更可恨,令我终身不忘国耻。

张绪英:鲜血将长江染成红色

人民网 2004 年 7 月 21 日

记者:邹德浩

为纪念七七卢沟桥事变 67 周年,由美国新泽西州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发起,近日在新州中部皮斯卡特维市肯尼迪公共图书馆举行了纪念“七七”活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张绪英及家族成员曾参与抗日的爱新觉罗恒懿均与会忆往,乡音合唱团并演唱抗日歌曲,与会者在二胡幽怨音乐的陪衬下,为当年遇难者默哀,更随着主讲人的描述而心情澎湃激动。

这次纪念活动是由新泽西州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副会长梁伯华主持,该会正与新州犹太人浩劫教育委员会合作编撰中国抗日史实,并计划将这部史实作为新州中小学校的教材。第一部教材可望于明年完成,希望通过这些教材让下一代了解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华的历史真相。

如今已 78 岁高龄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张绪英,远自宾州驱车两小时前来参加会议,当年仅 9 岁的张绪英回忆说,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对中国发动卢沟桥事变,日本侵略军从上海一路打进南京,9 月开始轰炸南京,近百岁的曾祖母听到剧烈的炮轰声,心脏病突发去世,成为家中第一个日本侵华战争的受害者。

尽管事隔 67 年,回忆往事仍难抑悲痛的张绪英说,由于战事吃紧,父母决定逃难,留下年事已高的祖父母及叔父守着家业。不料日军进入南京比赛“谁杀人最多”,裹着小脚的祖母来不及逃跑,遭日军连开三枪打死;祖父逃进后院芦苇丛里躲过一劫;企图逃出门外的叔父,也被日军一枪打死,死时连身上的衣物都给日军扒走。

张绪英说,直到隔年开春她和父母才返回南京,只见全城尸首处处,

把长江及整个南京市的水沟都染红。日本占领军强迫市民敬礼,不敬就打,为了躲避日军凌虐,当时正值发育期的她只好剃光头、捆绑胸部,打扮成男孩模样,母亲也在脸上贴膏药,以防日军污辱。

爱新觉罗恒懿则说,她的八姑妈是抗战期间台儿庄战役指挥官孙连仲将军之妻,随夫上战场照顾伤兵;她的四姑父冯安邦在台儿庄战役中遭日军轰炸而亡,姑母服毒自杀。她叹道,日本侵华不仅中国人受害,日本战败后无法返回日本的遗族,如今仍面临“何处是祖国”的困扰。她及张绪英异口同声地说,中国人民可以宽恕日本法西斯政府当年的暴行,可是日本人不可以自己篡改或否认这段侵略历史,日本政府更应向受难的中国人民真诚道歉。

桑桂兰:爷爷帮我挡住鬼子的子弹

《现代快报》2004年12月13日

记者:宫靖

新闻索引:时光回到67年前,年仅12岁的桑桂兰奋力推开压在自己身上的爷爷,发现瓜棚里横七竖八地躺着几十具尸体。她拼命地想推醒爷爷,但像几天前死去的叔叔一样,爷爷也一动不动,他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挡住了侵华日军疯狂的子弹,让小孙女得以幸存。桑桂兰失去了最后一个亲人,她在亲人和乡亲们的尸体堆上哭哭啼啼五天五夜,最终被邻村的一对好心夫妇收养,半年之后却又离散了。67年来,桑桂兰在心里一直管这对好心夫妇叫爸爸、妈妈,一直想找到他们,但未能如愿。最近,一位南京大屠杀民间调查者为她找到了“好心夫妇”的后人。现在,双方都表示愿意回到当年的屠杀现场,指认侵华日军的罪行。

在爷爷身下躲过了屠杀

在一位叫费仲兴的南京大屠杀民间调查者的指引下,记者来到了南京近郊汤山镇张家庄桑桂兰老人家。这是一间已有几十年历史的旧砖房,79岁的桑桂兰端着一小篮菜,诧异地看着刚进门的记者。她是一个从未被社会注意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67年前侵华日军屠杀了她的亲

人。她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日本右翼无法否认的侵略罪行的一个缩影,也是在那段历史中南京人的苦难缩影。

桑桂兰记得,她的祖籍是江西,出生后不久家乡发大水,她的爷爷就带了她、她的父母和叔叔逃荒至南京汤山李家庄。她两岁时,因为水土不服,妈妈和刚出生不久的小弟弟死了。6岁时,她成为张家庄一户人家的童养媳,父亲去了安徽,再也没有回来。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入侵南京,被人们称为“驼子”的爷爷把她接回李家庄,与叔叔、爷爷一起“跑反”(躲避侵华日军)。那年爷爷60来岁,叔叔“小霜”18岁,她12岁,他们只带了少量的米和御寒的衣被。

“那天,太阳快落山了,我们走在‘孩子沟’(初步推断此处为如今的汤山小学教学楼后的水塘)那里,碰见了好几个日本兵,他们都拿着盒子枪,问也不问,朝着叔叔就是一枪,叔叔就倒下了。”桑桂兰一遍遍地重复着叔叔的死,说后来其他人认为叔叔的死是因为腿上绑了裹腿布,被侵华日军误认为是反日士兵了。据桑桂兰说,叔叔死后,日军还把她爷爷当场抓了差,而把年仅12岁的桑桂兰一个人丢在当地。在荒凉的山谷里,桑桂兰“不晓得吃,只晓得哭”,就在叔叔身边哭哭睡睡。

几天几夜后,爷爷回来找到她,带她到一个叫“大赤堰”的山沟里,那里有“3个瓜棚”,瓜棚里满是逃难的人。很快,惨绝人寰的一幕发生了。据说,那天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来了好几个日本兵,用“快枪”(据描述是一种很长的枪)堵住了瓜棚门口,有3个日本兵朝他们开了枪。“爷爷很快把我压在地上,用身子帮我挡住了鬼子的枪口。枪响了一阵后,我听到鬼子走了,就想推开爷爷,但推不动,我是‘拱’出来的。我推爷爷,喊爷爷,沾了一手的血……”很快,她发现,3个瓜棚里的几十个人,除了她和另两个小孩外都死了。

好心的“爸妈”收养了她

据学者考证,桑桂兰所描述的这场“瓜棚屠杀”,发生在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入侵南京城区之前。此场屠杀和已被证实的其他多起发生在汤山镇的集体屠杀,有力地证实了南京大屠杀早在日军入侵南京城区前就开始了。

桑桂兰说,爷爷被打死后,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哭,哭累了就睡,醒了就害怕,还是哭。据她说,另两个瓜棚里也有两个和她年龄差不多的小孩像她一样被大人保护下来了,是一男一女,他们三个小孩就一起在死人堆里睡,饿了就到附近水塘里捧凉水喝。“5天后一个下午,有4个操本地口音的男人来到瓜棚,其中一个拽着我喊我‘小鬼’(南京人称小孩的口语),要我跟他走,我就说‘不走,怕你打我’,他说‘不打你’,我就跟他走了。”桑桂兰后来知道,收养她的好心人姓秦,是另外一个村子的。

67年后,桑桂兰已是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但她仍然记得被秦姓人家收养半年中的不少事情。她说:“他们是我的救命恩人,人不能忘恩。”带她走的秦师傅就是“大赤堰”附近的人,当时住在为“跑反”临时建的一处房子里。夫妻俩无儿无女,家境虽然一般,但也没让桑桂兰饿着。桑桂兰给这家人放过鹅、放过牛。这家人很喜欢她,她后来也真的认了秦氏夫妇做爸爸、妈妈。

让桑桂兰无比遗憾的是,张家庄的公公(她是童养媳)半年后打听到了她的下落,赶来把她带回张家庄,由于怕挨公公的打,她一直没敢回去找秦氏夫妇。后来,她自己也忘了去秦家的路,而秦家也搬离了临时住处,她再也找不到了。但几十年中,找到秦氏夫妇或他们的后人一直是桑桂兰一桩心愿。

桑桂兰 67 年来苦寻恩人

今年上半年,南京大屠杀民间调查者费仲兴在汤山调查时,被桑桂兰老人的故事打动,决心帮她了却心愿。经过调查,桑桂兰讲的“大赤堰”实有其名,并且至今沿用,就在汤山镇后巷村附近。费仲兴后来惊喜地发现,附近另一个叫孟塘村的地方有一位叫秦正礼的80岁的老人,回忆自己叔叔的事时,所述情节与桑桂兰讲的大致相同。后经确认,秦正礼的四叔、四婶秦志昌夫妇就是桑桂兰老人的救命恩人。

记者找到了秦正礼,据他说,他的四叔秦志昌(如果活着,今年应该是99岁)和四婶都死于上世纪50年代。他们一生无儿无女,在“跑反”时,听说“大赤堰”的瓜棚打死人了。几天后,四叔和几个人去看,发现有“3个小鬼”还活着,他们就把“3个小鬼”领回来了,四叔收养了其中一个

女的。“那丫头长得蛮好看的。”他证实,另两个小孩,当时也被村里人收养了,但那两家人现在去向不明。随后,秦正礼带记者到了“大赤堰”现场,这是一个山洼,当年的瓜棚现在是一片稻田,而当年的水塘现在已是一片沼泽。

愿到现场指证日军罪行

“我很想跟他见上一面。”得知自己救命恩人的后人找到了,桑桂兰非常高兴。桑桂兰和秦正礼两位老人,正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正式见面,他们还同意共同到现场指认当年的屠杀现场。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认为,幸存者桑桂兰经历的那场屠杀,是侵华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的一部分。她和证人共同指认屠杀地,具有相当的意义,她的真实经历将构成侵华日军罪证的一部分。

桑桂兰和秦正礼如今又有了一颗新的心愿,希望通过媒体发动读者,共同寻找那场屠杀中另两名幸存的“小孩”。如果这两名“小孩”还活着,如今年龄应为 80 岁左右。

附

又一大屠杀幸存者去世 专家呼吁社会关爱幸存者

《现代快报》2005 年 9 月 27 日

记者:解璐

9 月 25 日,南京汤山黄梅镇八十岁老妇桑桂兰中风离开人世。1937 年,桑桂兰的爷爷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她挡住了侵华日军疯狂的子弹。现在老人走了,在她闭上双眼的瞬间,当年大屠杀的一幕幕,是否还在她的心头萦绕?

【血泪记忆】 爷爷帮她挡了十几枪

“她经常讲她‘跑反’(躲避侵华日军)时候的事情。先是她叔叔被日本鬼子打死了。她和爷爷躲在一个瓜棚里,当时村里好多人都在里面。”桑桂兰的老伴张石洪说。

一天,不少日本兵发现了躲在瓜棚里的村里人,他们端起机枪便向瓜棚里的村民们开枪扫射。村民们一个一个地倒下了,桑桂兰的爷爷也中了枪,受伤的老人把孙女推倒在地上,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她,而他自己的背部却接连中了十几枪。桑桂兰哭着使劲摇着爷爷的身体,但是爷爷的眼睛始终闭着,一动也不动。瓜棚里,12岁的桑桂兰呆了五天五夜,哭累了睡,醒了又哭……直到五天后,被一户姓秦的人家发现后救回了家。

“因为她从六岁起就在我家做了童养媳,我的父亲四下寻找,把她从秦家带了回来,那时才发现她的一只耳朵被日本人的枪声给震聋了。”张石洪望着桑桂兰的遗像说。

【可敬品格】 贫困而低调的幸存者

据桑桂兰的孙女介绍,桑桂兰是9月15日被发现有中风症状的,但由于家贫,所以一直没有接受正规治疗,最终病情恶化并于9月25日黯然去世。虽然桑桂兰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但她的经历却鲜为人知,她只是把那段往事当作刻骨铭心的经历深深地埋藏在心里。

虽然快报记者对她进行了专访,并做了详细报道,可是老人依然低调。“婆婆是个很老实、很本分的人。即使你们报社的记者来采访之后,婆婆也不愿意到政府部门去,说她是大屠杀幸存者。虽然日子过得贫寒,但她说,她不要那个好处。”盛存娣抹着眼睛说。早上十点,桑桂兰的遗体进了火化室,伴随着亲人们的痛哭声,转眼间青烟袅袅,老人的微笑永远凝固在那张遗像上。

【现状反思】 该如何抢救幸存者

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张连红听到桑桂兰去世的消息,沉默良久:“幸存者又少了一个。”

“很多人有个误解,等到需要幸存者的时候,就把他们请出来说几句话,平时就很少关心他们。其实对于自己的往事,幸存者有权利说,也有权利不说,他们是人,而不是工具。”日本右翼分子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时候,社会才会关注到这些老人,可是当舆论风平浪静的时候,又有几个人去关心过他们的生活,关心过他们的冷暖呢?“这些幸存者本质上是战争的受害者,理应受到国家的照顾。”张连红激动地说。

“我呼吁全社会多给这些幸存者一些关爱,否则的话,等到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时候,剩下的还会有几个呢?”

【新闻链接】 幸存者亟待救助

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去年12月介绍:1985年,纪念馆成立之际曾在南京10个区寻访到1756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到1991年夏季对他们进行回访时,发现已有300多人去世;1997年,中日学生寻访到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目睹者、见证者2460多人,其中幸存者有1213人。据目前估计,这些幸存者中还有400多人在世,这些幸存者大多为八旬高龄的老人,体弱多病。

去年12月12日,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给179位幸存者颁发了大屠杀幸存者证书,其中大部分是目前居住在城区的老人。据介绍,由于农村人口的分散,那里的幸存者根本无法全部纳入统计。研究大屠杀幸存者的学者们也只是对个别有典型性的幸存者进行调查访问,无法触及全部。于是像桑桂兰这样的农村妇女就成了一个被社会遗忘的“大屠杀的见证者”。而这些幸存者中的很大一部分的生活往往比较拮据,生病之后也无法得到精心的治疗。

曹学森: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诉说悲惨经历

《南京日报》2004年12月27日

记者:肖姗

昨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研究部收到一封来自我市鼓楼区五条巷的信,是一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83岁的曹学森老人寄来的。她在信中诉说了亲眼目睹日军杀害中国人的事实,并控诉当年日本人对她的伤害。曹学森老人的来信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又添铁证。

曹学森说,日军侵占南京后她全家躲到安全区里,在安全区,她把自己的头发剃光,脸上抹上锅底灰,穿上男人的衣服才躲过日军的奸杀。有一天在安全区门口,她发现有一个刚被鬼子杀害的男人的尸体,她想把这具尸体拖到安全区里,一个日本人冲上来就在她肚子上刺了一刀,

肠子都能看到,她捂着肚子拼命跑进安全区里才幸免于难。至今肚子上还留有一道长长的伤疤。此外,她还亲眼目睹了两次日本人杀害中国人的暴行。一次是在北阴阳营水塘边,日军屠杀了 100 多个中国青壮年,没有死的或受伤的就被鬼子扔进水塘里淹死;还有一次在当时最高法院对面的水塘,日本鬼子用枪逼着几个人把另外一家五口塞进麻袋,并逼着这几个人扛着麻袋走向水塘中央,然后就向水塘中央扔手榴弹,麻袋里的人和扛麻袋的人全被炸死了。

据查,曹学森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历次幸存者普查中,一直未被发现的一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李海林:南京大屠杀“陆郎惨案”幸存者回忆悲惨遭遇

《现代快报》2005 年 1 月 8 日

记者:宫靖、陈英

67 年前,丧心病狂的日本兵在南京城郊陆郎镇强奸民女,当地居民怒杀 3 名日本兵,随后,侵华日军对陆郎附近居民进行了疯狂报复,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陆郎惨案”。3 天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陆郎惨案”调查取得较大进展,一位重要当事人进入学者视野。这位 81 岁的老人当时 13 岁,据其讲述,侵华日军在当时的腊月寒冬要求他和 200 多名我同胞脱光衣服,站进冰冷的水塘里,2 个小时后,他的父亲和其他约六七十七名同胞被活活冻死。学者认为,这名幸存者的发现,对还原“陆郎惨案”历史真相非常重要。同时学者也表达了一个忧虑,目前的南京大屠杀研究过于偏向宏观研究,对许多重要的微观事件还没有完全搞清楚,这是让人担心的,因为活着的幸存者会越来越少。

骇人听闻的“陆郎惨案”

陆束屏编译的《南京大屠杀——英美人士的目击报道》(红旗出版社 1999 年出版)中的《威尔逊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六名日本兵走进离这儿西南几英里的一座小镇,从事他们惯常的强奸、劫掠的勾当。镇上的男子组织起来杀了三个日本兵。另外三个逃了回去,不久又带了几百

名日本兵回来将镇子包围。三百名居民全部被六个或八个地捆在一起,扔进冰冷的河里。接着日军将小镇夷为平地,不留一寸墙壁。”这是威尔逊先生对“陆郎惨案”的记载。另外,李克痕的《沦京五月记》也对此惨案略有记述。然而,对于历史研究来说,这两人均未亲历此惨案,其间接记述也较为简单。

学者认为,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侵华日军为了让中国平民彻底失去抵抗意志,对平民伤害日军事件往往进行疯狂而残忍的报复,“陆郎惨案”就是这样一个事件,将此事件彻底搞清,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是较为重要的。上世纪80年代初,陆郎镇当地对“陆郎惨案”进行了调查,几名惨案幸存者回忆了当时情况,比如侵华日军为报复烧了镇上所有的房子,打死许多无辜百姓等。但今天看来,这个调查并未回忆得很完整,如“许多人被冻死”一事就没有提及。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近日接到一封特殊的信,信是江宁区谷里镇一位60多岁的李海山老人写来的,信中说,他健在的哥哥亲身经历了“陆郎惨案”,他的父亲在惨案中被活活冻死。1月6日,该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与记者一起,持信寻找这位“陆郎惨案”幸存者,期待更多地了解“陆郎惨案”。

幸存者痛斥日军暴行

家住南京江宁区谷里镇西山口村的李海林老人今年81岁,67年前南京大屠杀期间他年仅13岁。他回忆说,1937年阴历腊月十五夜里,他们全家7口人(父母和兄弟姐妹5人)已经睡下,突然听见村里的狗不停地狂叫。过了一会儿,有人用力地踹门和砸门,他的父亲(李大文,时四十余岁)只穿了单衣开门。日军进来后把家中多数的人(家中还住有许多逃难者)赶到门外站着,只有李海林的母亲和8个月大的弟弟,还有得了严重的肺病的哥哥没被赶出。日军把13岁的李海林和一大群难民赶往陆郎乡方向。他们在寒夜中大概走了15华里,到达陆郎乡时,天已经亮了,这时大家看到当地的房子都被烧光了,只剩下当时的陆郎小学。日军把这些难民都赶到陆郎小学里,当时小学里已经站了很多日军从别的地方赶过来的难民。日军命令男人们都站在学校的空地上,而把妇女

们单独关在学校的几间空房里。

大概九十点钟的时候,一个翻译官过来开始问话:“你们知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把你们带过来?有三个日本军人在陆郎被打死了,尸体现在找不到,你们如果说出尸体藏在哪儿就放你们回去,如果不说,你们就别想回去了。”难民们都说不知道,翻译官去向日军汇报,后来又问了四五遍,人群仍然回答不知道。过了一会儿,翻译官过来说:“我们太君说了,不说出来就枪毙你们。”这时,人群中出现哭喊声,说:“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不是陆郎人”。

接着,日本军官命令难民们把衣服脱了跪在地上。李海林和别人一样,被命令脱到只穿一条单裤。十几分钟后,还是没有人回答,日军当场开枪打死四五个人,但还是没有人说。太君又命令把难民都赶到学校后面的水塘中,当时天气寒冷,水塘都结了冰,水只有齐腰深,但塘底的淤泥很深。不到一会儿,1亩左右大小的水塘里站满了赤裸着身体的普通百姓。

六七十人被活活冻死

据李海林回忆,没过多长时间,就开始不断地有人因为忍受不了严寒,口吐白沫,栽倒进水塘里。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翻译官又过来威胁说:你们再不说,太君就命令用机枪来扫射。这时,一个自称姓王的人出来说:“我是陆郎人,我知道尸体在哪儿。”日军验证了王姓陆郎人说得不假时,才允许人们上岸。

他们在冰冻的水塘中呆了两个小时左右,当时大概有两百人被赶进水塘,结果上岸来的只剩下一百多人,有六七十人被冻死在水塘里,水面浮尸一片,惨不忍睹,而且尸体脸上沾满淤泥,很难辨认。李海林上岸后就开始找自己的父亲,他的堂哥也帮忙找,在下午四点多时终于在水面的浮尸中找到。44岁的父亲李大文身体本来也不好,加上他被赶出来时穿得就很少,最终敌不过腊月的严寒在水塘里被活活冻死。

一家三兄弟全部遇难

李海林的二伯毛有德本可以逃过这场劫难,但当他听说李海林的父

亲衣服没穿好就被带走时,手足之情让他甘愿冒着危险去给弟弟送衣服。谁知走到半路,被一个日本兵抓住,先让他弯腰蹲下给日军蹬上马,日军上马后就顺手给了他一枪,可怜的毛有德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就倒在了地上。

等这件事稍微平静了一段时间后,叔叔李大本回到大焦村来看看,这一去竟也成了永别。第二年油菜花开的时节,在当时的夹岗村发现一具尸体,已死去多日,尸体已经开始腐烂,但根据尸体腰间的绿腰带和袜底上的蝴蝶可以肯定那就是他的叔叔李大本。

对重要事件要多关注

张连红认为,由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目前的年龄一般都在80岁以上了,由于健康因素,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现在可以说进入了最关键几年,但是,这些年学者由于种种原因,较偏于宏观研究,对一些具体的重要事件,则重视不够。张连红介绍说,许多国家的历史研究,是首先搞清楚其中的重要事件,然后合起来成为宏观历史,由此可见,具体事件在历史调查中是很重要的。他呼吁政府和民间调查者多关注这个领域。

周湘莲:八旬老妪勇敢控诉日军暴行

《现代快报》2005年7月8日

记者:吴聪灵

68年前,13岁少女两度遭日军蹂躏;68年后,周湘莲老人鼓起勇气讲述屈辱经历

新闻索引

南京市一院呼吸科住院部,81岁的周湘莲老人倚在床上吸氧。她77岁的妹妹周湘萍把拐杖往床边一放,一坐下就握住了姐姐干瘦的手。她叫了声姐姐,就不知再如何开口了。看见摊开在床头的纸与笔,周湘莲似乎已经明白了记者的来意。她抿了口凉水,开了腔——1937年冬

天,那年我才 13 岁……

爷爷和父亲一天内遇害

那一年,妹妹周湘萍只有 9 岁。但留在她记忆里的一些印象,却已成为她 68 年来不忍回顾的痛。“当时我们家住在秦淮区王府里 3 号,现在大概是鸣羊里 12 号左右的位置。爷爷奶奶,一个头脑不大好的叔叔,再加上我父母与兄弟姐妹 4 个,一共 9 口人。那年冬天鬼子进了南京城,我们家左右邻居基本上都早早跑到别处去了,也有的到难民区去避难。当时我们也想去躲一下的,可我奶奶的思想比较守旧,说是老房子不能离开。爸爸比较听话,就没走。到了 1937 年冬天,整条巷子就剩我们一户人家了。”

那年,周湘萍的父亲刚刚 39 岁。灾难就在那个冬天开始接二连三地袭击这个家庭。“冬月十一(公历 1937 年 12 月 13 日)那天,响了一夜的炮声。我父亲一早起来,准备去巷口的茅房,就喊了我哥哥跟叔叔一起。他们出门时,我爸还讲,会不会碰上鬼子啊,人多点应当不会有事吧!谁知出门走了几步,还没到巷口,不知从哪窜出几个日本兵,拿着刺刀就把我爸他们三人围住了!”

周湘萍与姐姐躲在门后看见这一幕,吓得双腿发软。“鬼子就押着我爸他们一直到了家门口,我爸指着我们全家人跟他们讲,说我们都是普通老百姓,他要留在家里养家糊口。可鬼子还是说,必须有一个人跟他们去当劳力。考虑到我哥哥还小,叔叔头脑又不大好,我父亲就自告奋勇跟他们走了。”

父亲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当天下午,有人到周家来报信,说看见鬼子在南门外乌龟桥上把人给打死了。“我妈当时就昏过去了。我爷爷说要去找人,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啊。家里人劝不住,他就去了。结果再也没回来。”

当天晚上,又有人带来了坏消息。“一天时间内,爷爷和爸爸就都走了。我们家一下子没了主心骨。后来妈妈就和哥哥一起去找他们的尸体。他们到中华门外、江东门那一带,到处找。死人横七竖八多得不得了,就挨个地翻,每一步都要从尸体上跨过去,可找了好几天,都没找到

爷爷跟爸爸的尸体……”

13 岁女孩两度惨遭蹂躏

68 年来,周湘莲的记忆一直在回避着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然而她越想忘掉,反而记得越分明。“爷爷跟爸爸走了没几天,巷子里的人跑得更少了,可我们家没有钱,也没地方可躲,只能住在原处。那些日本兵经常过来烤火。把柴堆一架,点上火在边上烤,人就嘎嘎地笑。隔壁有几家房子都被他们烧了。”

女人不可避免地成为日本兵寻找的目标。“我妈妈那年 36 岁,那阵子从来不敢洗脸,反而要用炭灰把脸涂得黑糊糊的,有一天晚上,我们已经睡下了,鬼子来拉我妈。我妈还抱着刚几个月的弟弟呢,她指着怀里的弟弟,又指着满脸的灰,鬼子可能是嫌弃了,就没再拉她。可是后来,我没有逃得过去,日本兵连我这个 13 岁的小女孩也不放过……”周湘莲讲到此,哽咽了起来。

妹妹周湘萍坐在一边补充:“那天晚上,她躲在柴垛子里,外面堆得高高的,可人在里面发抖。鬼子进来就把柴垛子踢散了,然后像拎小鸡一样把姐姐拎走了……”

“他们就把我拖到离我家不远的一处空房子里面,刀就架在我脖子上,三个鬼子轮流……我又是出血又是肿的,连凳子都不能坐。没过几天,又被他们架去一次,这回是四个鬼子兵……”周湘莲老人断断续续地叙述,一开始,像在讲别人的故事,但没说两句,就泣不成声。病房里一片静默。

为了避免渐渐长大的周湘萍也遭遇如此命运,家里在她 10 岁那年就把她送给人家当童养媳了,周湘莲到了 15 岁时,也随便找了人家结了婚。“说是当童养媳,其实就是让我当苦力啊,两年过后我就从那家逃出来了。回家也没有活路,就去给人家哄孩子,伺候病人。后来我哥到外面谋生了,我妈也带着小弟躲到外地去了。我们一家就这样散了……”

如今,一家人只有两姐妹还在人世。“我的身体也不好,也不知哪天就不在了。以前一直觉得,这事开不了口,跟谁说去啊?可现在我再不讲出来,就永远没人知道鬼子干下的罪恶,我遭的这些罪,也就带到坟墓

里去了……”两姐妹偎依着靠在病床上,妹妹伸出手来,给姐姐理了理零乱的头发。她们不约而同长吁了一口气,如释重负。

吕维先:七旬老人回忆当年血泪史

《现代快报》2005年7月8日

记者:吴聪灵

“日本兵打瞎了我的眼睛”

“日本兵来的时候,我才5岁。那天我正和几个小伙伴在街上玩。”73岁的吕维先老人在他江浦东门的家门口,记忆回到了1937年的秋天。

“那天日本兵刚刚进村,老远看见我们,就朝我们这边开了一枪。子弹从我的右耳旁边进去,又从我右眼出来了。”5岁的吕维先当时就栽倒在地,昏了过去。他父亲顾不上危险,冲到街上拿稻草把孩子包起来,抱回家放好。没有任何医疗措施,父亲就趴在他身边哭着盼着。“后来我终于醒了。但从此身体就不好,一到阴天就头疼,而且经常不声不响就晕倒了。一直到十几年过后,才慢慢适应。可这几年上了年纪,又经常头疼。”吕维先虽小,却很有骨气。“日本兵进村有一个多月后成立了维持会,就是想奴役我们。他们到我家给我道歉,还给我东西吃。我一点都没吃他们的,后来东西都被摔出去了。”

日军当年那一幕幕的残酷暴行,至今还烙在吕维先童年的记忆里。“日本兵为了抓八路军,经常不分青红皂白胡乱打人。日本兵让你站住,你不站,他就杀。烧杀抢掠是常事。有一次我去舅舅家玩,在路上看见日本兵又在桥上开枪打人。那个人我还认识,姓蔡。子弹从他脖子后面打进去,从嘴里蹦出来掉前面地上去了。他人当时就跌到了桥底下去。日本人还到桥下去看,踢他。看他不动了才走。”在此之前,吕维先的父亲是编草席子的,小时候吕维先也会帮父亲干活。日本兵来之前,家里还可勉强度日,但日本兵来了之后,日子就大不如前了。“能活命已经是万幸了。一直到解放以后,共产党把我们这些失学的孩子组织起来劳动学习,大家才过上了安生日子。”

王之民：我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人

中国新闻社 2005 年 7 月 10 日

记者：路梅、刘舒凌

在台北县汐止市一座傍着青山、凉风习习的宅院里，一尊佛龕供奉在客厅中央，充满安详的诵经声从录音带里传出来，不断地低声回响。但回忆起六十八年前侵华日军的南京大屠杀，八十三岁的王之民老人仍充满了悲愤，他说：“我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人。”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本侵略军不断进攻，王之民一家十四口从江苏常州逃难到南京，想从南京搭火车逃到大后方。

王之民回忆，他进南京城一个星期后，南京就被日军攻陷了。当时日军举行了进城仪式。南京城里的百姓都吓得躲了起来。于是日军让人四处喊话，大致意思是“大家都出来吧，我们不会伤害你们！”但是大家不敢出来。入夜后，日军开始纵火烧房，大家以为失火，纷纷跑出来救火，却被日军早架好的机枪扫射身亡。

当年只有十四岁的王之民和姑婶被收容在“金陵女子大学”，这所学校为美国教会所开设，成为临时的难民营，收容儿童和妇女。离难民营不远有一堵围墙，每到夜晚总有汽车马达的轰鸣，接着是机枪扫射的声音传来。好奇的王之民和姑姑壮着胆子爬到高处想看个究竟，这一看吓坏了：老百姓被日本兵带到墙下一字排开，在汽车车灯的照明下，日本兵用机枪对着他们扫射，扫射完之后，还要用刺刀把每具尸体刺一遍，确保没有活口。这短短不到一百米的墙边，堆叠的尸体竟然有大半堵墙高，十几米宽。王之民受惊过度，当晚发起高烧，几天说不出话，满眼都是横尸惨景。

日军屠城在冬季，当二三月春季来临，天气变暖，满城的尸体开始腐烂，散发出恶臭。一些中国人被日本兵捉去，浑身撒满消毒粉，戴上口罩，去帮忙收尸。王之民因为个头小，于是被分配计数。他说，日本兵只抬穿黄呢军服的日军尸体，并画“正”字计数。而中国人的尸体不计数，胡乱塞进卡车里拉走，倒入三米深、一米半宽的壕沟掩埋。从雨花台到中山门，都埋着死难同胞的尸体。长江边堆着三大堆尸体，“像三座山一

样,每一堆都有上万人”,“南京城活脱脱就是个人间地狱啊!”王之民老人说到这里,泪水涌上眼眶。

作为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王之民和其他二百二十一位历史证人的脚印留在了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的一条铜版路上。老人说,他曾想把这段恐怖的记忆封存起来。可是,看到日本人篡改教科书,否认历史事实,他不能不站出来,用一个亲历者的见证,告诉大家历史的真相。

杨明贞:回忆当年的灾难

中国新闻社 2005 年 7 月 10 日

记者:丁翔

翻开尘封了六十八年的历史,那血腥的一幕依然让杨明贞女士悲愤难忍。在抗战期间,日军侵入南京城,开始了历时六周的大屠杀,至少有三十万中国人被杀戮、活埋,给她身心留下了至今无法愈合的创伤。

今年七十五岁的杨明贞老人,思路清晰,语言流畅。一回忆起当年那段可怕的灾难史,老人泣不成声地告诉我们,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日军侵入南京城,丧失人性的日本兵,从入城第一天起,就到处追逐和搜捕妇女,进行蹂躏和杀戮。

老人说,家里是做篾匠的,听说日本人要来了,家里人在做逃难的准备。当天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有很多人在门口乘凉,突然,门被一脚踹开,五六个日本兵端着刺刀冲了进来,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她的父亲被打中了胳膊,晕了过去。接着又一枪打死了房东老太太。

十二月十四日下午,一个骑马的大胡子日本兵带着枪,手握军刀,闯进了家中。他一进门,便将我抱住,解开了我的棉袍扣子,扯掉了我的裤子。当时,我吓得又哭又叫,日本兵嚎叫着对准我的额头连砍了两刀。说到这里,老人指着自己的额头,头上刀疤清晰可见。

老人说,父亲冲上来救我,日本兵对准我父亲的脖子连砍了三刀,不久父亲便死去了。

十二月十五日下午一点钟,又有两个端着刺刀的日本兵冲进我家,

强行脱下我母亲的裤子把她糟蹋了,不久,哭瞎了双目的母亲也离开了人世。之后,又一个日本兵过来强行解开我的棉袍纽扣,把我强奸了。那年我才七岁,老人咬着牙关说。

“日本人真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老人气愤地说,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父母都很疼爱我,家里虽然是做小本生意的,但是很幸福。自从日本人来了后,他们是做尽了坏事,使我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

杨明贞由于年仅七岁就遭强奸,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小便失禁,七十多年来一直在裤裆里兜着尿布,身心受到极大伤害,苦不堪言,常常处在精神恐惧之中。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时老人听到日本人投降的消息,激动不已说:“日本人终于给打出中国了。”

对于日本高层试图否认日军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杨明贞坦言:“在你们这些小辈面前,提我以前的那些事情,真的很难为情!”

老人态度坚决地说,历史不容篡改。不管日本人怎么说,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行径,我们一定要和他们斗争到底,一定要让他们道歉。

秦杰:一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回忆

中国新闻社 2005 年 7 月 15 日

记者:陆祎玮

在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前夕,一位当年的幸存者,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就是江苏省检察院前院长、大屠杀幸存者援助会会长秦杰老人,今年八十岁了。曾在南京读书的他,经历了黑色的六个星期,他见证了那些令人发指的大屠杀。

屠杀前的恐惧

一九三七年,秦杰老人还是一个上学的小学生,那一年,他十二岁。上海“八一三”轰炸以后,学校就停课了。由于当时农村不是日本人轰炸的主要目标,所以城里的小孩大多躲到乡下的亲戚家避难,秦杰老人也不例外,他躲到了江宁的姨母家里。但是当时日本的飞机还没有经过南京的上空,所以大家的思想都有些麻痹,很多学校又都恢复上课了。可

就在开学的第二天,日本的一百架飞机就轮番轰炸了南京。老人回忆说,三九年十月份的时候,日本人越来越接近南京。当时就有不少的南京市民开始逃难。

十二月十一日,老人兄妹六个,加上父母和年迈的祖母一家八口人,离开了水西门外的家,向三岔(汉)河逃难,希望通过水路,逃离南京。老人说,这时候听说日本人已经到了,远远地能看到大火,大家都感觉不安全了,于是毫无目的地向外奔。在去三岔(汉)河的路上,老人的母亲遇到了一个在三岔(汉)河附近工作的熟人,熟人告诉他们,不要去三岔(汉)河,那里已经挤满难民。于是他们转道去了三岔(汉)河附近的放生祠难民营,每日三顿以稀饭果腹,没有床,只能睡在地上,生活条件非常的恶劣。老人回忆说,在日本兵还没有攻进南京城的时候,就有不少传言,说日本人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在乡下,把孩子落(擦)在一起,用刺刀从两边刺穿。

第一次目睹满地屠杀的尸体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日本日攻进了南京城,开始了六个星期的屠杀。这一天,也是秦杰老人第一次目睹屠杀后满地的尸体。

日本兵端着刺刀压着难民往江东一带转移。为了不让一家人一起遭毒手,老人的父母决定八口人分三组分开走,秦杰老人负责牵着年迈的祖母。祖孙俩随着被押送的人群向回走。老人回忆说:“当时非常的紧张,不敢抬头看,也没有人反抗。当时我的任务就是扶着体弱的祖母。”成千的难民被日本兵压着,日本人看到难民群里有青壮年,不容分说拖出来就枪毙。一路上什么样的死态都有,老人说,他看到一个人被活活地烧死,跪在地上,可以看到死者的骨架,整个烧成了焦炭。越是靠近江东门,惨案越多,死的人越多。老人说:“有一段时间,是跨着死尸走过来的。”这时,老人的祖母已经吓得有点瘫了。最让老人记忆犹新的是,当时日本飞机轰炸南京城,江东门过江的桥已经被炸断。由于是冬天,河床比较的干枯,日本兵让老百姓把死去同胞的尸体填进河里,在上面铺上木板,“我们就这样过去,踏着同胞的尸体过去了”,老人有些哽咽地说,“有时在木板这边看到头,有时在那边看到脚,非常的悲惨,甚至看到一个妇女,死在河边上,赤裸裸的,可能是被日本鬼子强奸了。泡在水

里,身体已经浮肿起来了。一只乌鸦停在她的脸上正在啄她的眼珠。”

臭名昭著的日本兵

逃难的人群都被押了回来,当时在老人居住的地方有四个年迈的老人,他们想向日本兵求情,希望能放大家一条生路,可是还没靠近日本人,就全被日本人打死了。

老人说:“后来我们和亲戚一起在水西门外的一所房子里避难,有一天,来了个日本人,把我们一家人关进一间小房子,把我刚新婚的婶婶拖到了另一间房子,我听到婶婶哭着喊着叫救命,当时我只有十二岁并不太清楚到底发生的什么。后来,在难民营,我常看到在难民营里日本鬼子常把一些妇女和女孩拖出去,她们哭啊,叫啊,这时,我才意识到,我的婶婶被日本鬼子强奸了。”

江东门是日本大屠杀一个重点地区,老人这一路走过来,正好是江东门,江心桥。“这一路日本鬼子杀人无数,我目睹了日本兵种种罪行,都是亲眼看到的!”

六个星期的屠杀,老人的祖母受到惊吓,一年后过世了。秦杰老人的一家在大屠杀中都幸运地活了下来。老人说经历了黑色的六个星期,十二岁的他清楚地知道:“国家穷,国家弱,没有本事,就要被人欺负!”

刘仲铭:不堪回首

香港《大公报》2005年7月16日

记者:吴斌

日本右翼妄图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但铁证如山,岂容篡改!白骨累累的万人坑,在无声控诉着日军的滔天暴行,而那些仍然健在的“活化石”——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更可揭穿日本右翼制造的谎言。

炎炎夏日,目前北京和天津地区唯一健在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已经83岁高龄的刘仲铭老人,在家中接受了大公报记者的专访。

刘仲铭老人虽年事已高,但头脑清晰,思维敏捷。“南京大屠杀,不堪回首。”刘仲铭老人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向记者诉说了当年自己亲身

经历过的那段惨痛历史。

集体枪杀推入长江

“我出生在北京,1935年13岁时,作为琉璃厂的一名学徒工,被派到静文斋南京分店当学徒,没想到在南京仅过了2年,就遇上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上海失陷后,日军沿着‘京沪线’进犯南京,妄图以南京为样板,实施罪恶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来威逼中国其他地区投降。当时南京市人口约五六十万人,我和静文斋的店员们,逃进了拉贝先生等组织的国际安全区。没有进入安全区的几十万老百姓,有的死在家里,有的逃出来,被射杀在通往难民区的路上。”

“当时的南京马路上,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有的尸首被日军汽车压扁,惨不忍睹!”刘老说到伤心之处,不觉热泪纵横。

“我们虽然进了安全区,但仍然不安全,”刘老说,“日军以搜查为借口,强行进入。有一次,强迫我们这些难民集中于一片空地上。日军叫男女分队站立,开始检查,将那些光头、受伤、手掌上有茧子的男青年喊出队,另站一排,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这些人就是拿过枪的军人和可疑分子,将他们装上军用卡车,由日本兵押送至下关江边集体枪杀,然后将尸体推入滚滚长江之中。这样的惨剧,在我滞留南京的那段日子,天天都在发生。”

6岁女童也遭强奸

刘仲铭老人不仅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目击者,而且也是受害者。

“我的右腿至今肌肉萎缩,长时间行走不便,阴雨天就隐隐作痛,就是被日军打的。”刘老无比愤恨地说。

“到了南京大屠杀后期,一天夜里,我们静文斋几个店员正在地铺上睡觉,突听门响,闯进两个日本鬼子,拖着大枪带着刺刀,我们站起来,我在排头,一个高个的鬼子先用枪猛击我的右腿外侧,将我打倒在地,然后挨个猛打其他人,嘴里大喊:‘花姑娘的给。’他看一房间全是男的,就用枪逼迫着我们店里的厨师去找花姑娘,出了大厅,在走廊上听到后院平

房有小孩哭的声音,就一脚把厨师踢翻,然后‘哇哇’大叫着直奔平房。我们的店员手无寸铁,无奈之下都躲藏到大院里的小土山后面,就听到后面平房里传出凄惨的哭喊声。”

“日本鬼子不是人啊”,刘老无比悲愤地说,“天亮后,才得知两个日本鬼子把逃难的老两口的三个女儿都给强奸了,大的15岁,小的13岁,哭的女儿只有6岁啊,都给糟蹋了,老两口跪在地上都吓傻了。”

骆中洋:从守城弃城到目睹日军屠城

新华社2005年7月18日

记者:周轶君、蔡玉高、马晓燕、邵背平

1937年12月,南京城外麒麟门下。骆中洋所属83师在邓龙光率领下,从广东奔赴淞沪战场。没想到,淞沪会战在他们到达前已经结束,疲惫之师转而驰援南京。城下,人群中闪出一个熟悉身影,竟是哥哥。骆中洋兄弟二人紧紧抱在一起,千言万语化作两行热泪。

两人分属不同部队,匆匆一晤,各奔战场。

骆中洋再次“见到”哥哥,却是铭刻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的“哭墙”上,一个黑色名字——骆奕梧。

生离死别

“要为国家战斗!”骆中洋清楚地记得哥哥在麒麟门下道别的最后一句话。

那时他19岁,哥哥21岁。两人交谈不过十几分钟。

“我在邓龙光麾下第83军156师466旅831团步炮连。刚到安徽广德,淞沪会战就已经结束,我们驰援南京,立即投入南京保卫战,”作为一名士兵,骆中洋清楚记得自己所属部队的番号。

现年85岁的他,眉毛与胡子茬全部灰白,双目炯炯有神,身体硬朗,嗓音洪亮。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淡绿色衬衣,款式像军装,右臂上方两道细布条还可以佩戴臂章。

“按说每个连应该有100多个弟兄,但那些从淞沪战场撤到南京的

部队,一些连队只剩下十几个人,我们步炮连在二线作战,情况好些。”
“本来上面命令我们在南京守6个月。到南京两三天后,也就是12月12日,上面就下令撤退。”

负责守城的最高长官唐生智12日晚召集各部队长官开会,决定弃城。南京城内军心大乱,纷纷涌向江边。紧邻江边的挹江门内挤满士兵和百姓,秩序混乱,路上尽是丢弃的车辆、驮马。

“但是,通讯落后,守城军队还没有接到撤退命令,不肯开门放行,”骆中洋说,“我们只能用救火水管做‘云梯’攀爬,有人从城墙上摔下去,跌断了腿,有人掉进河里,我当时还年轻,费劲爬了下去……”

原本前来打仗的士兵,倾巢之下,沦为难民。

虎口逃生

翻过南京城一道城墙,却无法跨越这人间地狱的千沟万壑。骆中洋爬上一条小船,但没走多远,船漏进水,最后还是在江东门被包围,落入日军手中。

12月13日早晨7时左右,日本军人押着刚抓来的四五千名俘虏走到城北三汊河边。骆中洋和不少国民党士兵也在其中。只见日本兵端着枪,站到人群前方,军人本能告诉骆中洋:“准备屠杀了。”

“你们为什么抵抗皇军?”日本兵通过汉奸翻译喊话。

“最让我气愤的是,他们竟然还问:‘你们愿意选择哪种死法?机关枪、步枪、汽油弹,还是刺刀?’”

日军最后决定用刺刀,也就是杀人比赛。日本兵冲上来,捅死站在最前面的人。人群顿时慌乱,百姓哭喊。

“从第一排算起,我在第十排,我头脑依然很清醒,和另外三个战友缓缓往人群后面挪动。”

从上午7时到下午四五时,也许是骆中洋生命中最漫长、最痛苦的时光。日本兵一直没有放下刺刀,同胞们一个个倒在血泊中。一些人偷偷爬到附近茅草屋顶,立即遭到日本兵枪击。

“傍晚,我终于挪到河边,钻进芦苇丛里。”骆中洋说。日军最后把没有杀完的人推向河边,用机枪扫射。

骆中洋与另外两个人躲在水洼子里，战战兢兢，生怕弄出一丝声响。穿着大头皮靴的日本兵在岸边走来走去，咯噔，咯噔，还用日语呼喊。

“突然，水里冒出一点动静，日本兵举起枪朝水面一通扫射，劈劈啪啪，幸好没打中我。”三人找到一间空屋藏身。半夜，却来了几个日本兵，抢走我们的棉被，自己盖上睡觉。“幸好是日本辎重兵，没有向我们开枪，”骆中洋说，三人在墙上挖了个洞逃出去。

岸边泊着一艘渔船。“船里坐着两个老人，喊他们没反应，过去一推，原来早就被打死了……我们跑了几十条船，船上渔民都死了。”

那一天、那一地，骆中洋亲历日军大屠杀，死难同胞事后计数超过2万。

命悬一证

五六个星期后，日军停止屠城。但是没有难民证，仍随时可能被日军抓走。

骆中洋与同伴两人辗转逃到被划为难民区的法云寺，红卍字会（国际红十字会在纳粹德国统治下的名称）正在那里派发难民证。

“你们是哪里人？”红卍字会的人首先要确认身份。

“广东人。”

“我们只管南京人。”那人说完便继续朝前走。

骆中洋和同伴不甘心，尾随红卍字会成员，改称自己是南京人，希望得到一张。

“那人慢慢朝前走，东看西看，忽然袖口里掉出一张难民证，落在地上，被我同伴捡到。”骆中洋赶紧追上红卍字会成员，再求一张“救命符”。

这时，一队日本兵迎面走来。红卍字会成员的袖口里又掉出一张难民证，连别针都没有，骆中洋捡起来赶紧粘在袖子上。

“中国兵？”日本兵问。

“良民。”红卍字会成员回答。

一张纸、一句话，再次把骆中洋从鬼门关拖出来。

此后，骆中洋一直住在难民区，管不相识的老头老太喊“爸爸妈妈”。因为没有亲属“认领”的青年男性很可能被日军抓走。

法云寺里 1 000 多难民住在一起。骆中洋还记得,妇女害怕遭日本兵强奸,打扮成男人的样子。就连老太太们,都往脸上抹黑灰,免得被日本人看出性别。

“到处都是死尸,日本人抓我们做苦力,我的任务就是挨家挨户收尸。”骆中洋手臂上的“难民证”换成了“苦力证”,上面写着日军部队的名字“中岛”,“几乎每个房间里都有死人。”

不学日语

1938 年,骆中洋加入日军占领期间的南京治安维持会,但不肯学习日语。

“我很痛恨日本人,日本人教我们学日语,我就是不学,”骆中洋说,语速越来越快,声音也高了起来,“他们不仅仅在南京屠杀中国人,而是在全中国作恶啊,我老家在广东,我父亲、伯父和叔伯爷爷就在惠州被日本人杀死。”

“1945 年 8 月 15 日,我们被召集到办公室听广播。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通过中文翻译,我们知道天皇说‘很多人将作为战争罪犯受到惩罚’。”

骆中洋说,自己心里乐开了花。但同时在场的还有手持武器的日军士兵,内心的喜悦无法表达。

接下去几天,骆中洋所在的警备司令部内,日本人慌忙烧文件,没烧干净的直接扔进河里,“他们怕留下证据。”

骆中洋 1997 年赴日本讲述南京大屠杀经历,还曾经与一名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兵见面。骆中洋说,当着他这名“中国兵”的面,那名日本人承认罪过,对过去所做的一切表示忏悔。

记者手记:铁证如山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处庭院,绿树成荫,阳光碎片洒在青草地。

骆中洋端坐在石凳上,双手拽拽衬衣的下衣襟,把褶皱抚平。他下颚微抬,从领口到最下端的 6 颗纽扣系得一丝不苟。整个人呈现灰白色

调,与纪念馆“哭墙”的花岗岩相当接近。

“您穿的是军装?”我问道。

“我这件衬衫有点像军装。你看,这里还可以别袖标。”说着,老人指了指右臂衣袖上方两道细布条,眼睛里飞扬出一丝神采。“我平时也喜欢穿军装。”

一句话提醒了我,眼前这位银发苍苍的老人是老兵,亲历过南京保卫战——曾经在邓龙光将军率领下气宇轩昂地迎战侵华日军;继而无奈地跟随大部队一路后退,眼见城墙被日本炮弹炸得面目全非;也在特定地点亲眼目睹2万同胞遭受日军屠戮、血洒长江……

新中国成立后,骆中洋成为南京市公安局一名干部,1984年退休,1997年与2001年分别赴日本和美国讲述南京大屠杀真相。

2001年12月11日,骆中洋参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实赴美展”前说:“我就是活生生的‘证据’,我要在有生之年向更多的人讲述这段历史真相。”

对骆中洋老人而言,硝烟早已散去,“战斗”尚未结束。

周纪穆:血色往事,68年不曾提起

《新闻晚报》2005年8月4日

记者:徐哲、胡同珍、陶捷

“鬼子来了要鞠躬,否则就得挨马刀……大屠杀时,南京城尸首堆积如山,大家都以为我死掉了。”日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开通纪念网站,近日,上海的周纪穆老人将埋藏了68年的往事用一封电子邮件向该网站发去,首次叙述不堪经历。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中心副主任经盛鸿说,几十年研究中,他从来没听说过上海还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周纪穆老人的回忆,对两座城市,对抗战历史,弥足珍贵。

那年11月,我在南京当卫生队队长

“快请进!我来帮你们拿包、拿伞。”昨天下午敲开周纪穆老人的家

门,他特地带着老伴站在门口这样招呼记者。“昨天有南京的记者采访,我给他们开门,其中一个冲我说,你是周纪穆的儿子吧?”他哈哈大笑起来,先幽默了一下。

话题说到 1937 年的南京大屠杀,周纪穆老人脸色一下阴沉下去。

“我毕业于浙江医学院,1937 年 11 月底参加抗日南京保卫战时才 22 岁,担任国民党 72 军一卫生队分队队长,当时军长叫孙元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听说是台湾著名演员秦汉的父亲。”

那时,南京城还没有被侵华日军攻破。“全民抗日保卫南京,士气高昂,我们每个人心里都充满了信心,后来,不明白国民党将领为什么要下令撤退。”这个问题,无论是当时年仅 22 岁的周纪穆,还是现在已 90 岁的周纪穆,心里都充满遗憾和困惑。采访中,他先后 4 次提及这个话题。

“尽管城里还有一丝和平,我们还是每日每夜包扎伤员,看着战友断腿断胳膊地进来,还有很多具尸体搬进搬出,令我触目惊心。”

和平没有持续多久。1937 年 12 月 13 日凌晨,南京城被攻破,日军大屠杀开始。令周纪穆老人印象特深的是这一段时间南京城里静悄悄毫无动静,城外密集的枪声,凄惨的喊叫声连成一片。

在难民医院,每天都要被鬼子搜身

谈到逃命的过程,周纪穆老人沉默了几分钟,坐着,站起,又坐下,身体变化了好几种姿势。稳定一下情绪后,周纪穆老人继续回忆。

“想起日本鬼子的帽子、军装、大刀,想起那张脸,我就无法忍受!我恨死日本人了!实在无法原谅他们!”周纪穆老人痛苦地说,当时他在难民医院当医护人员,每天有日军来搜身,被逼着摘下帽子,检查脸额、腰、手和膝关节。看额头上有无戴钢盔的印子,腰上有无系过皮带的痕迹,手上有无持过枪的老茧,膝关节有无训练的痕迹,凡有一项的,就被带走,再也没有回来过。

“沦陷后一个星期内,我每次零星听见炮声,心里就燃起希望,是不是我们的部队又打回来了?后来,希望渐渐虚无,就只能听见枪声了,我知道不对,这枪是日本人开的,而且一声枪响,我心里明白,同胞又失去一位。这时整个人都垮掉了,我心里充满绝望。”周纪穆老人哽咽着说。

“我一共在南京熬了 140 多天,所有人都以为我死掉了,我的老祖母也生病了,但她一直相信我活着。逃出来后我去看她,三天后她就去世。后来我的家人几乎全都被日本人害死了,就一个妹妹逃脱,真是恨死日本人了!”周纪穆老人说。

“后来,一位侥幸脱难者对我说,在下关煤炭港江边,成千上万官兵被日军当活靶,在日军的战车和机枪火网下一排排地倒下,中弹的中弹,投水的投水,江边尸首堆积如山,血流成河。”

公开身份,90 岁的老人花了 7 天 7 夜

听周纪穆老人说话稍微有点费力,他的口音混杂着浙江、上海及外地的口音,复杂的口音至少说明了他有一段不寻常的经历。

“后来,我通过苏北的抗日组织逃出南京,坐木筏渡过长江到达安徽和县,辗转找到国共合作部队,随部队退守到汉口、长沙、重庆,期间还在贵州的第二军医大学进修学习了两年。在重庆时,我在军区总医院工作,1949 年在成都我参加了地下组织。”周纪穆老人说。

他说:“1951 年,我提出申请要求调往上海,那时困难挺多。当时,成都特别缺医护人员,组织上也害怕开这个口子。但我老伴的母亲一个人在上海,我们毕竟是江浙人,特别想念家乡,组织对我也特别信赖关照,就批准了我的申请。”

1951 年年底时,周纪穆老人转车到宝鸡乘坐火车回到上海,在上海纺织工业局一工作就是几十年。期间,他从未向任何人说过南京这段往事。直到今年 7 月,周纪穆老人才首次公开自己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公开的方式是,自己口述经历,孙子打字,儿子把邮件发给南京大屠杀史料网站,这个过程,90 岁的周纪穆用了整整 7 天 7 夜。

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埋藏在心中长达 68 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这一代经历实在太多太多了!我一直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周纪穆老人感慨说:“抗日的痛苦历程不必说,三反、五反、反右、文革……运动不断,作为知识分子,非常担心连累到家人。”

周纪穆老人最后说了一句:“或者,你说我胆小好了。”

他说,今年是抗战胜利 60 周年,国家各方面的氛围也越来越好,打消了自己以往的顾虑。

张士荣:目睹日军轮暴残杀妇女

《燕赵都市报》2005 年 8 月 11 日

记者:乔宾娟

“我把这段经历讲述出来,就是要沉痛悼念牺牲在日军手下的 30 多万同胞,让人们永远记住这段血泪史!”近日,现居邯郸的 88 岁老人张士荣向记者讲述了其在南京大屠杀中的亲身经历,回忆了当年南京大屠杀中日军犯下的种种罪恶。

与日军恶战 3 个月

张士荣老人出生在 1917 年 2 月 13 日,是四川叙永县大石乡人,十几岁时他就因家贫而到国民党部队当了兵。“我是南京大屠杀时死里逃生的幸存者。”7 月 13 日,记者刚来到张士荣家,老人就打开了话匣子。虽然张士荣老人离开家乡多半辈子了,但其浓浓的乡音仍没有太多改变,一旁的夫人便为他当起了“翻译”。

“1937 年 8 月,日本帝国主义向上海发起进攻,当时身为国民党陆军 58 师 538 团 2 营 4 连战士的我跟战友们一起在上海南墙(音)县与日本鬼子展开了殊死搏斗。这场恶战一直持续了 3 个来月,直到当年 10 月,日本从宁波把上海包围后我们才退了下来。”张士荣老人说,后来他们来到南京下关附近,在 12 月 13 日,日军占领南京,他们一行有 32 人被日军俘虏。

目睹日军轮暴残杀妇女

1937 年 12 月 16 日,日军翻译左腾贯一让张士荣等战俘到一贫民窟中牵几头毛驴过来杀了,在那里,他们看见有十来个日本鬼子正在轮奸 5 个妇女。其中一名妇女因为反抗比较激烈,一个日本鬼子竟把刺刀从该女子的阴道处插进去,并向上一直剖到了胸口……

在南京的那些日子里,类似的惨剧数不胜数。张士荣说,在宝塔桥

东边的石榴园处、在中山桥下惠民河附近、在姜家园、在燕子矶,近百人、二三百人、上千人、数千人,或者是国民党兵,或者是平民老百姓,谁都逃脱不了被屠杀的厄运。更残忍的是,有的日军在把人杀死后,还要在尸体上浇满汽油把尸体烧了。

日本鬼子变着花样杀人

“日本鬼子真是变着花样杀人。”张士荣说,从1937年12月16日到1938年4月,在南京四号码头处,几乎每一天,日军都会用军用卡车从城里的难民营中拉来两三车人,“变着法儿”将人杀死:或是让5人一组背对背站着,从后面把5个都打死;或是让人站在江边上,用刀砍死后尸体直接掉到江里;或是把人推下水,等人浮出水面时再用枪打死……

因为要给日军做工,张士荣逃脱了被杀的厄运。1945年日军投降后,他又回到了国民党部队中。1955年,张士荣来到邯郸成家立业。

纪耀发:我们一家七口避难栖霞寺

《现代快报》2005年8月14日

记者:都怡文、郑春平

在昨天下午的首映式上,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走上主席台,一字一顿地说:“我今年89岁了,是1937年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也是栖霞寺1937的见证人。”霎时,台下响起了长久的掌声。

这位老人名叫纪耀发,1937年的时候,他只有21岁,当时日本军占领了南京,到处烧杀掳掠。纪耀发一家那时就住在栖霞街,在无路可逃的情况下,纪耀发父母和弟兄姐妹一家7口人一起跑到了栖霞寺避难。

说起为什么要到栖霞寺避难,纪耀发老先生说当时就觉得那儿是唯一“安全的地方”,而且,纪老还提到他跟寂然法师早就认识,小时候他经常到栖霞寺玩,大家的感情很深。说着说着纪老忍不住感慨:“要是能活到现在,寂然法师也该有一百多岁啦!”

纪老说,一开始去栖霞寺避难的人还不多,但后来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蜂拥上山企求庇护。“外面有追兵,日本兵时不时地来寺里搜查,难

民越来越多,寺里的生活也越来越困难!”

纪老说,面对这么多的难民,寂然法师没有一句怨言,依然一个个地收留下来,而且把寺里所有的粮食都拿出来给难民吃,他记得难民最多的时候,连千佛岩上的石窟、佛龕里也都住满了人,大家都是一人一个铺盖卷,最多时足有2万多人。

薛书琼:见证——喋血雨花台

《福建日报》2005年9月17日

记者:张强福

没到过南京,只听说那有个雨花台,一个美丽的地方。

雨花台,多么美丽的名字。然而60多年前,却是血腥的代名词,是日军屠杀场。

五年前,我无意中获悉了上杭县下都乡豪康村82岁的薛书琼老人,一个从日军刺刀与机枪底下逃生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在闽西的乡村日夜经受枪伤的折磨。

时值2000年,薛书琼老人在电视台、报纸等新闻媒体上看到日本一些右翼势力,违背历史事实,胡说南京大屠杀是“世纪谎言”后,气得火冒三丈,愤而致信日本最高法院:“南京大屠杀是侵华日军一手制造的惨案。我就是铁证!”

薛书琼原是国民党87师261旅521团一名文牍人员,1937年12月初,他随军驻守南京孝陵卫,12月13日,日军在狂轰滥炸后攻入南京城,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而薛书琼正是大屠杀的幸存者。

薛书琼在信中陈述:“当时在日军的追杀下,我随军由尧化门败退入城,并纷纷向板桥和下关逃命。到了江边,我们用木头、门板作工具泅水渡江,被日军舰发现后,一阵机枪扫射,无数中国公民的鲜血染红了江水。当时,我和20多名中国军人扮作难民,投奔到南京城内夫子庙难民收容所。那几天,日军多次前来搜捕,稍有可疑者即带出去枪杀或活埋。我是在日军第三次搜捕时被查捕的。记得在下旬的一天上午,我和1000多人被捆绑着押上几十部汽车,押至雨花台。我看到四周布满荷枪实弹

的日军,地上架着几十挺轻重机枪。下午3时许,一个日军士兵一挥太阳旗,站岗的士兵马上退走,骤雨般的子弹便向我们射来。我的腰部中了一枪,立即昏死过去,苏醒后才发现自己倒在低洼的血泊地上,难友的尸体将我掩盖才幸免于难。天黑后,我艰难地爬过堆积如山的尸体,逃出了虎口。”

(中略)

老人时而愤怒,拍桌而起,时而悲痛,泪流满脸,劫后余生的老人,怎忍一些日本右翼势力信口雌黄,颠倒黑白!他说: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滔天罪行是赖不掉的,我还健在,可以到东京出庭作证。

没有经历那场浩劫,像我,对雨花台不会有那样印象深刻;只有逃过那场浩劫,像薛书琼,才会被雨花台烙下刻骨铭心的痛。

我连夜采写了《我就是铁证》的新闻稿,急于把他的声音传递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他的不幸,让更多人记住这场历史的惨剧。

时常想起五年前的那次采访,时常想起薛书琼老人,想起那段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而日本当局毫无忏悔之意的行为,更加强烈刺激我的内心深处那根永远无法麻木的神经。

葛国华:湖北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周末》2005年9月22日

记者:倪秀萍

(新闻提示:《12·13——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实展武汉巡展》19日在武汉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展期一周。巡展首日,现场就出现了一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家住武汉江岸区鄱阳街的90岁老人葛国华女士。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研究员介绍,葛老是在湖北省发现的首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20张展览票,牵出90岁的大屠杀幸存者

9月19日上午9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工作人员,正在武汉国际会展中心为即将开始的开幕式做准备工作。这时一名

40 多岁的女士匆忙赶来,向工作人员表示自己想要 20 张展览门票。由于展览全部免费,参展市民随时过来随时会有人发门票,工作人员对这名女士的要求有点惊讶,问她是不是为哪个单位来预订门票。

但这名女士直摇头,她解释说:“我是武汉江岸区居民,我姓费,我 90 岁的老母亲叫葛国华,她以前就住在南京,经历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我母亲听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实展到武汉巡展,今天一早特地让我过来先看看情况再带她过来参观。老人还怕门票被预订完了,又一再叮嘱要我带 20 张票回去,发给家里其他人,方便他们随时过来参观。”

征集在武汉生活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为这段特殊历史的研究收集更多史实,本来就是此次巡展的重要目的之一。正在现场的朱成山立即满足了费女士的要求,并通知一名工作人员跟随费女士去她家,将她老母亲接到展览现场。

难民营里,眼看着两个孩子死在怀中

“我的两个孩子就是被日本鬼子害死的,我心里恨哪!”站在一幅幅惨绝人寰的历史照片前,葛国华老人嘴唇发抖。虽然已是 90 岁高龄,但老人身体还算硬朗,记忆力、听力都不错,回忆起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她几次老泪纵横。

“当时我 22 岁,我爱人费志忠也才 25 岁,我们住在南京新街口管家桥一个四合院里。我们有两个孩子,大的是男孩,3 岁;小的是女孩,刚满 1 岁。1937 年 12 月 13 日早上,我和丈夫正在家,突然听到外面枪声一片,街上到处都是人在跑,有人还大声喊着‘日本鬼子进城啦,快逃命啊’。我和丈夫吓得什么都没拿,赶紧一人抱着一个孩子,也随人流向鼓楼方向逃命。

“后来,我们逃到了鼓楼附近的金陵大学,人挨人地挤在一个 10 平方米左右的平房里,后来还有人专门数了一下,一共 81 个人!平房外面的屋檐下,也到处都是人,大家都和我们一样,吓得面色发白,连大气也不敢出。好多大人手里都抱着小孩。孩子们一哭,我们就赶紧用手捂住他们嘴,怕哭声引来了日本鬼子。

“那时我们又冷又饿,几天不敢出去,也没东西吃。后来有胆大的

人,晚上到北极阁附近的菜地里挖些白菜,回来后在学校的操场上支上灶台,把白菜放在水里煮了汤给大家喝。”

但是情况还是越来越糟,由于寒冷,葛国华怀里的1岁女儿经常全身发紫,加上没有东西吃,葛国华已经没了奶水,孩子饿得直哭,并且发起了高烧,还抽筋。最终,在一天早上,葛国华朦朦胧胧被饿醒后,再拍拍怀里女儿的小身体时,发现孩子已经一动不动了。半个多月后,她3岁的儿子发高烧、抽筋,同样不久也永远地离开了她。

除了孩子,还有3名亲人惨死“大屠杀”时期

除了在逃难时失去自己两个孩子外,葛国华另有3名亲人也惨死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时期。

“当时,在管家桥的四合院里,和我们一起住的还有一个50多岁的单身叔叔,他是我父亲的弟弟,因为腿不太好,逃命时,他留在了家里。在金陵大学躲了几天后,有一天晚上,我急着想看家里的叔叔怎么样了,悄悄跑回了家。谁知到家一看,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床上的被褥不见了,叔叔已经浑身是血死在床上。”老人边说边睁大了眼睛,好像又回到了那个恐怖的日子。

“我吓得双腿发抖,连哭都不敢哭,又赶紧跑到住在同一个院子的舅舅家。他也50多岁了,是我母亲的哥哥,逃难时我没看到他。我到他家一看,舅舅也已经直挺挺地死在地上,身上到处是刀伤,衣服被血浸透后又冻干了。

“我脑袋里一片空白,什么都没做,又赶紧回到金陵大学的难民所。再过了几天,又有人带来消息说,我丈夫的一个40多岁的舅舅在另一个难民所躲难时,被日军抓走枪毙了!我在难民所里呆了将近3个月,亲眼看到日军开着3辆卡车来避难所挑选年轻力壮的男人,还有一些年轻好看的女娃也被他们带走。我每天都听到有熟人被杀的消息,很多和我们一起躲难的人也伤心得活不下去了,有的甚至要撞墙自杀,那时的南京城简直就是一个人间地狱!”

当搬尸工,丈夫从此变得沉默寡言

在葛国华老人现在住的武汉市鄱阳街房子里,一进门的显眼位置,

就能看到一张神情严肃的老人照片,那就是葛国华的老伴费志忠。10年前,80多岁的费老因病去世。

据现在照顾葛国华老人的五女婿李燧华介绍,在他和老丈人接触的20多年里,费老给他的最深印象就是沉默寡言,退休后经常一个人在家发呆,也不愿意和人说话。

“他是从大屠杀发生后才变成那样的,以前他可是个能说笑话的人。”葛老回忆说,大屠杀刚发生时,她和丈夫一起在金陵大学避难。大概避难一周多后,国际红十字会的人来到避难所,让丈夫和其他一些男人出去当搬尸工,掩埋尸体。

“他每天早上出去,晚上回到难民所,每次回来身上到处都是泥巴和血迹,还带着一股怪怪的味道。刚开始几天晚上,他还跟我讲今天大概搬了多少具尸体,埋在了哪里。再后来,他就不讲了,回来什么都不说,就是发呆,眼神直直地看着前面,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一直到后来日本鬼子被打败离开了南京,生活恢复了正常,他还是这样,好像再也回不到以前了!”

“国家强大,我们才不会受外人欺辱”

1950年,葛国华随丈夫工作调动到了武汉定居。经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事件后,老人又先后生了8个孩子,包括6个女儿和2个儿子,其中7个孩子都在武汉,一个在南京。现在,葛国华已经是12个孙子、孙女的奶奶(外婆)了。由于身体好,葛老现在基本上能生活自理,但8个孩子还是轮流到她家来陪她住,照顾她。

平时向儿孙们回忆在南京的那段苦难岁月,是葛国华老人现在生活的一部分。老人神情严肃地说:“我这辈子受的苦难,我的子孙代代都要铭记在心,年轻人不能过了好日子忘了历史!所有的人都要努力,只有我们的国家更加强大,才不会再受欺辱!”

李高山:皓首作证南京大屠杀

《羊城晚报》2005年10月10日

记者:邓琼、车琳

八旬老人李高山——幸存于“南京屠城”，69年来首次回广东故乡，替中国人记住那段惨绝人寰的人间恶剧。

人物小档案：李高山

1925年出生于广东省高州市，1936年参加国民党军队，1937年12月随部退守南京。南京沦陷，他与同部士兵一起被日军俘虏，遭机枪扫射，幸存。从死人堆里爬出后被市民带进难民营，后一直生活、工作在南京。69年来，他首次回到家乡广东。

少小离家老大回——阔别故乡69年，李高山终于重新踏上了广东的土地。

当年的“娃娃兵”，怎么也没有想到，一去他乡竟是这样久！如今，乡音全改，甚至已经听不懂家乡话！

李高山是广东高州人，但他是作为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和见证人来到广州的。今天，《12·13——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实展》在广州艺博院开幕，年逾八旬的李老第一次有机会亲口向家乡人诉说历史。

梦魇：屠刀下多次险些送命

1936年，李高山在高州行医的父亲去世，家道中落。作为长子，他只好跟随父亲的一位友人到部队里讨生活，由于还不够参军的年龄，于是冒名顶替了一个名叫“张发”的逃兵，成为国民党部队一名小勤务兵。就是这个“小”字，既让他过早地承受了背井离乡、战火纷飞的军旅生涯所带来的苦难，却也让他在这灭顶之灾到来时得以传奇般地逃过大难。

南京沦陷时，李高山所在的部队刚刚从上海步行退却到南京，已两天没有吃过什么东西了。哪知未放一枪，就得到就地投降的命令，全师官兵被俘虏。

饿了一天一夜后，李高山和其余士兵被赶进一间大房。机关枪架上窗台，日本鬼子开始向中国士兵的头顶进行扫射。他年龄小个子矮，又站在人群的中间位置，很快就被死去的士兵压在下面，任鲜血浸透全身。“我太害怕了，枪声、惨叫声、践踏声响成一片，可惊恐中又好像什么声音也没听见！也不记得自己到底是怎么爬出了死人堆！”

这次逃出了六个人，他们爬上二楼，却被鬼子发现了。鬼子开始用火烧，他们只好往下跳，在一家民居屋顶的照壁里藏了五天五夜，最后还是因为一人出去寻找食物而重新被抓。两名日军把这六人押到一个水塘边纵向站成一队，开始挨个射杀。因个子小而排在最后的李高山拔腿就跑，日本兵猝不及防，居然让他逃脱了！

李高山又悄悄潜回先前藏身的民居，在床底下躲了两天。一天，一位脸上抹着锅灰、打扮像个叫花子的老太太进了屋，她是从难民区偷跑回家看情况的。李高山猛地从床底下蹿出磕头作揖，差点把老人家吓昏过去！看到他身上血色的军装，老太太明白了，赶紧从家中找出衣服帮他换上，并带他到了位于宁海路的难民区。

可是难民区并不安全，鬼子照样会恣意进入寻找“支那兵”和花姑娘。李高山亲眼看到鬼子数次拦住青壮年男子，先看双手和肩头是否有扛枪的老茧，再看头顶有无常年戴帽形成的发迹。可怜许多无辜平民，因从事体力劳动、日晒雨淋而同样具有这些特征，也被杀害！但李高山年纪尚小，鬼子没有料到有这么小的士兵，所以没有盘查过他。

在难民营里，李高山被一对周姓南京夫妇收养，此后将近 70 年，一直生活在南京。

后遗症：好记性只停留在 68 年前

李老一口南京腔，丝毫听不出任何广东口音。想当初，李高山在废墟里向那位老太太求救时，还曾因为自己满口粤语而跟对方无法沟通，谁知如今他已经听不懂广东话了！

死里逃生，李老的生活一直很坎坷。但只要脱离了遭日本人追杀的经历，他不论是说起在餐馆当学徒时的生活，还是因参加过国民党的军队而在建国后屡次运动中受到的冲击，甚至是被饥饿折磨成疾如今已经切除了四分之三的胃，脸上仍都是一副乐呵呵的表情。李老说：“个人的苦难算不了什么，民族的痛苦是每一个中国人应当谨记在心的！但我能活下来，还能回到家乡，已经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了。”

在那场 68 年前的劫难中，李高山奇迹般地几乎没有受到任何皮外伤，带给他的后遗症是：对当下的事常常过眼即忘，他的好记性只停留在

68年前。李老可以清晰地复述出救助自己的那位老太太当时的打扮、表情,详细地描绘当年日军所使用的机关枪的型号、样式,却常常记不住刚刚看过的一则新闻或人名。

对于这个让他无数次从噩梦中惊醒的后遗症,李高山一如既往地乐观和豁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既然幸存,就愿意替中国人记住这段历史。至于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这么多,偶尔有啥不顺心,忘记最好啦!”

本色：只要一息尚存就作证

今日的李老,从南京市粮油食品厂退休已经20多年了。他没有什么业余爱好,最主要的社会活动就是参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组织的各种展览、讲座、集会等。

2000年12月,李高山还应日本一个民间友好组织邀请,赴日宣讲自己亲身经历的南京大屠杀。他不辞劳苦,七天走了七个地方,作了十多场演讲。老人最高兴的是,有一位年轻人在听完之后,径直走到他面前跪下,并说这“不仅是为了当年的行为赔罪,也是为了我们长久以来的不知情而请罪”。而让他最气愤的是,在某地演讲时,居然有人在会场外示威!有人问他害不害怕,李老第一次在记者面前表现出了军人的本色:“从死人堆里都钻出来了,难道还会怕这些小鬼吗?”

提到现在有少数日本极右翼分子妄图抹去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李高山软软的江南口音也充满了愤怒和厌恶:“他们怎么能篡改历史!说没有屠杀过平民?我亲眼见到无辜平民的尸体在路边堆得一人多高,日本兵还故意把手榴弹往尸堆里扔,炸得残肢乱飞,鬼子哈哈大笑;说杀的都是‘伪装成市民的士兵’?我自己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我们当时根本没有换下军装,而且都缴了枪,根本不可能‘伺机袭击日本士兵’,还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屠杀?!”“我老了,不知道还能为历史作多久久的证人。但是只要一息尚存,我还是一名士兵!”

会亲：50年后再见高州老姐

李高山此行除了配合在广州搞展览,还有一项“私人使命”——回高

州探望已经九十高龄的大姐李月英。在此前近 50 年的时间里,他们虽然知道彼此还活在世上,却只能靠书信和电话来联络,从来没有见过面。

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李高山就开始了寻找姐姐的行动。他只记得自己的家住在高州市后街,父亲是专门治麻风、哮喘和面斑的土郎中,家里门楼上有块大匾写着“近光书室”四个大字。于是试探着以“广东省高州市后街近光书室”为地址写了十多封信去寻找姐姐,但都没有结果。灵机一动,他开始把自己自小离家、急欲寻亲的遭遇和心情写在信封上,希望能得到热心人的帮助。果然,不久之后传来好消息:姐姐的家就在距离高州市十几里地的新洞镇!

几十年来,姐弟俩一直保持联络,却没有见过面。两地相距遥远,他们先是难以承担来往的路费,后来年事已高也就更加相见无期。平日里打电话,姐弟俩虽然听不懂对方的口音,需要孙辈们现场翻译,但也总是有说不完的话。一想起马上就要见到从小最疼爱自己的姐姐,脸上泛起的红晕让老人愈加显得鹤发童颜。

(二) 政协文史期刊

麻子和、沈锡恩、张德义等:忆南京沦陷时的回教掩埋队

《史料选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专辑)》代第四辑 1983 年 8 月^①

整理:杨为仁

南京沦陷的惨景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吞噬了我国东三省后,又悍然出兵卢沟桥,进一步掀起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八一三”沪战开始,淞

^① 该专辑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沪撤防后,蒋介石闻风丧胆,急忙逃往武汉,计议迁都重庆。留守南京的十余万国民党军队几乎是不战而溃。十二月十三日,日军的铁蹄踏进了南京古城。

日军进入南京后,到处烧杀淫掠,罪恶滔天。南京城被日军纵火焚烧,浓烟蔽空,从天空飘落下的烟尘犹如“黑雪”,似在哀悼南京人民的苦难。

侵华日军在南京进行骇人听闻的大屠杀,给南京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当时南京的街头巷尾和防空洞中,死尸枕藉,惨不忍睹。在这场浩劫中,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内,也是血流满地,尸体纵横,回族人民同遭残害。当时敌人凶焰万丈,无人敢出来收尸。直到翌年二三月间,日寇暴行在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下,稍事收敛,社会秩序略为平定,有些胆大的人才走出难民区返回家园。伊斯兰教内年高的阿訇也相继回到清真寺探望。结果发现有的清真寺被日寇烧毁,如中华门外西街清真寺;有的清真寺被抢劫一空;有的清真寺“寺存人亡”,庭院中杂草丛生,满目凄凉。更多的清真寺内如草桥清真寺、太平路清真寺、汉西门清真寺、长乐路清真寺等处,都倒着被日军残杀的回民尸体,其中草桥清真寺最多,有十余具。目睹这一切,不禁凄然泪下,发出“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感慨,阿訇们在回忆这一段往事的时候,都深深感到有一个强大的祖国是多么重要!继清真寺内发现有被杀戮的教胞,在市郊其他地方,也陆续发现被害的回民尸体。根据伊斯兰教教律规定,给死亡的穆斯林(即伊斯兰教徒)站“折那子”(即给以殡礼)是穆斯林的“瓦只布”(当然的责任),何况是被敌人残杀的教胞!

回教掩埋队的筹组

住在难民区豆菜桥二十八号王寿仁阿訇家避难的老阿訇们,对日军的暴行都义愤填膺,同仇敌忾。他们见被害教胞露尸在外,急需处理,即由王寿仁、张子惠两阿訇倡议,组织“回教掩埋队”,得沈德成,马春田、马焕庭、余玉书等阿訇的赞同。老阿訇们对青年阿訇说:“日本鬼子看到青壮年要抓伏。你们出去有危险,由我们年纪大的出来掩埋,即使遭到危险也死得着了。”这些年高德劭的老人顾惜青年,舍身忘我的精神,令人

敬仰。

回教掩埋队正式组成,由王寿仁、马焕庭担任殡礼主任。王是鸡鹅巷清真寺的以(伊)玛目(南京解放后曾任市伊斯兰教协会主任),从回教掩埋队成立起,他一直认真负责,坚持始终。马焕庭又名孝福,后更名锦章,是草桥寺的以(伊)玛目。

文书财务由余玉书担任。余玉书又名瑞麟,擅长文墨,负责掩埋队的文书、财会事宜。掩埋队结束后,有关文件、白事账、黄纸簿(捐款簿)等均由余玉书保管。(一九六六年曾找其孙余世衡阿訇查询上述文件,据答,都已经烧了。)

打坑、抬亡人由马明仁负责(马是回民坟山主)。洗亡人由张子惠(老阿訇)和沈德成(鸡鹅巷寺二阿訇)两人担任。杂务由马春田(原中华门外息心亭殡舍阿訇)、余寿春(余玉书侄)、麻寿芝[登隆巷寺以(伊)玛目]和杨振祥(原汉西门寺阿訇)管理。杨振祥是掩埋队唯一的青年阿訇。因其两姊惨死于沙洲圩,感到责无旁贷,遂追随老阿訇参加掩埋。杨办事精明能干,在掩埋队出谋划策,颇受欢迎。如掩埋队有时需用公章,但乱时无人刻字,杨即建议购豆付干一块,自己动手刻成。

掩埋工作情况

阿訇们为了履行宗教职责,掩埋伊斯兰教的亡人,这本是与政治毫不相关的回族殡礼和善行,而且也有益城市卫生。但当时如果不取得伪“维持会”的批准,不仅办不成事,且有性命危险。为此,备文由张子惠出面,通过伪“维持会”负责人之一回民孙叔荣的帮助,办好了备案手续,定名为“南京回教掩埋队”。队址设在豆菜桥二十八号王寿仁家,“维持会”发了十个袖章。掩埋队为保险起见,借用了“南京回教公会”和“南京红卍字会”的名义,制了两面布旗,一面是“南京回教公会掩埋队”,一面是“南京市红卍字会掩埋队”。当时善堂会馆也以红卍字会名义组织了掩埋队,掩埋汉民尸体。回民掩埋队虽动用了“南京市回教公会”、“南京市红卍字会”的名义,但是和该两组织却没有any实际上的联系。打着这两面旗子,套上袖章,出去掩埋,的确减少了不少麻烦。

掩埋队当时的掩埋坟地先后有五处,一处为难民区内的左所巷山

上,其他几处在广州路东马明仁的山上及桂花坞、峨嵋岭、冬瓜市等距难民区较近的回民坟山上。

难民区内没有清真寺,阿訇们沐浴、小净、礼拜(这是伊斯兰教每日的功课),都在豆菜桥二十八号勉强进行。而冲洗亡人的条件则更加困难。由于亡人都已露尸一二月之久,不少已腐烂发臭,这就更需要冲洗干净。根据当时的条件,阿訇们只能将亡人置于“讨破”(盛亡人的木制盒子)盒盖上露天冲洗。用水从坟地附近的池塘中提取。亡人用的穿布(裹穿于亡人身上的白布),是从难民区集市上购买的白布被里子。老阿訇们和坟山工人在北风呼啸的荒山中,提心吊胆地掩埋着被敌人杀害的同胞尸体,心情十分悲恻!有时打坑发现坑内已有尸骨,当时出于无奈,只得将尸骨靠边推移,匀出穴位安葬新亡人。虽然亡人受挤了,但总算达到了回族人民深埋土葬的目的,消除了暴尸露骨、犬噬虫叮的惨状。阿訇们每次出门掩埋时,心情是很不平静的,当一天的掩埋工作结束,分手回家时,他们都是虔诚地谢主保佑,互祝平安。沈锡恩阿訇在回忆上述这段往事时,无限感伤地说:“在日寇刺刀下,谁能保证自己不遭横祸亦被掩埋呢?”

回教掩埋队前后紧张工作一个多月,共掩埋一百余亡人(知晓的回民死者)。参加掩埋的阿訇都是尽义务的。其后掩埋队又延续约半个月,处理了一些零星白事(丧事),即无形结束。

掩埋队后期陆续有麻子和(麻寿芝之子)、马慎录等中、青年阿訇参与掩埋工作。其时被日军杀害的回民尸体(知晓的)多已埋葬,而居住难民区回民中病故的亡人,按习惯亦烦请阿訇殡葬,这实质上已不是掩埋队的任务。但那时南京城无一清真寺可去,亡人又不便出城殡葬,只得仍请掩埋队阿訇办理。这些白事一般是交付经仪(阿訇站“折那子”、祈祷的费用)的。这些阿訇都有妻子儿女。原来阿訇生活就很艰苦,在难民区一住数月,已无以维生,所以不得不冒死出来办点白事,收点经仪,以维持生活。

回族人民中可歌可泣的一二事例

在日军的残暴统治下,中国人民的生命是毫无保障的。南京沦陷之

初,西方庵清真寺的马慎禄,吉兆营清真寺的沙延培两位阿訇都是在敌人刺刀下幸存的。法荣祥阿訇的父亲惨死于太平路寺中。法荣祥为了给父亲收尸殡葬,以尽人子和宗教之义,却不幸被日军拉去背包,后冒万死才逃脱出来。王府巷清真寺的杨希贵阿訇,西方庵寺的金宏祥阿訇,则被日军拉夫一去不复返了。中华门外西街清真寺四师傅张巴巴,因家贫无力逃难,一家三代七口人都住在寺里,他以为自己是宗教信徒,日本人来了与他何妨。当日军闯入他家,要污辱他的媳妇,张巴巴怒不可遏,大骂日本鬼子是畜生,鬼子立即扣动机枪,把他打死。接着竟将其全家其余六口人,赶到院中,用机枪扫射,一家人全被日军枪杀于血泊之中。日军恨犹未消,又放火将清真寺烧光。鬼子走后,邻人发现张的七岁孙女未中要害,将她救护收养成人。可怜张巴巴一家仅此一人幸存。原中华门外坟山阿訇张庆华回忆张巴巴一家惨遭日军杀害的情况时,极为沉痛地说:“血的教训告诉我们,宗教不可无祖国,宗教徒更不可无祖国。”

现已七十五岁高龄的张德义阿訇提供了史实的另一方面。他说:“我们阿訇和教胞中也不乏可歌可泣之人和事。长乐路清真寺的白庆元老阿訇,日军进城时,他胆大留在寺中未走,当他看到日军闯入寺中竟然要向住在寺里的蔡老太进行强奸,禁不住怒火填膺,奋不顾身前往阻止,被鬼子兵连刺两刀,重伤身亡。下浮桥寺杨桂芳老阿訇(即杨振祥之父)的两个女儿抗拒日寇玷污,跳到沙洲圩紫洲里自杀,多么坚贞不屈的妇女啊!住在木屐巷的一位叫张长生的回民,人高体壮,有武功,在水西门外菜市场掌秤,一只手能提百把斤菜,人称之为‘张大力’。某夜,日军闯进他的宅院,他为日寇奸污邻家妇女的兽行所激怒,轮起大木棍打倒一个从房里钻出来的鬼子,正准备打第二个鬼子时,一粒子弹夺去了壮士的生命。这样的事很多,我们回族人民和所有中华儿女一样,是不可侮的!”

路洪才:追述往事 悲愤难已

《史料选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专辑)》代第四辑 1983年8月

整理:彭如清

我家住在雨花门红土山下,是那条街的第一家。一九三七年冬天,从句容逃难路经门前的难民都纷纷传说:日军在句容烧杀淫掳,无所不为。我们全家都惊慌起来,商量如何逃难。外公外婆因为孩子多不肯走,两个小舅舅,一个小姨娘都比我年龄小(我那时才六岁),母亲已快临产也不便于行走,只好与外祖一家同留住地。父亲只带着我和大舅跑到中华门外渔圩滩(即沙洲圩)荒岛去避难。我们和其他难友一起挖一个地洞,住在里面。一天,见日军追赶一个农民往我们这个方向跑,只见日军把那个人捉住后,用石块缚住沉入江中。才感到这个荒岛也不安全。这时有从雨花门来的难友告诉我父亲说:你家不得了,赶快回去看看。我们偷偷回到家中,只见房屋已成一片瓦砾,院前防空洞血肉满地,尸体枕藉,全家人无一生存。父亲悲痛欲绝,在收埋尸体时,看到母亲的肚子被炸开,尚未出世的小弟弟也惨死于腹中。住在隔壁的伯母,见我们归来,哭诉那天遭难的经过。在父亲带我们走后的一天,六七个日军来到红土山,他们有的提着机枪,有的端着带刺刀的步枪,挨家挨户地搜查。我家首当其冲。他们先是翻箱倒柜,寻找值钱的东西,继而劈毁桌椅,引火取暖,后来竟放火烧屋。出屋时发现防空洞口,日军便大声吼叫,我母亲和外公一家都躲在洞里,日军看见了母亲,叫她出来,母亲不肯出来,万恶的日军端起机枪便向洞内扫射,接着又向洞里扔进手榴弹,随着“轰”的一声巨响,血肉随着弹片飞出洞口,这些灭绝人性的侵略军竟拍手狂笑。我家老小七口就这样惨死在日军之手。

陈德贵:老人的控诉

《史料选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专辑)》代第四辑 1983年8月

整理:彭如清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我随着大批难民跑到下关“和记洋行”(即今肉联厂)避难。那时我才十五岁。日军侵入南京城,到了下关,发现了这一批难民,遂把我们集中起来。集中后,他们放两个脸盆,要大家把手表、戒指等贵重物品都放入盆内。第二天,在难民中抓出二千八百多个年轻人,从和记洋行押到煤炭港一间仓库关起来,日军端着刺刀枪站在

门口看守。第三天清晨,日寇从仓库里叫十个人出来,把他们带到煤炭港河汊口头,叫他们站在水里,忽听一阵枪响,日寇又来叫十个人,又一阵枪声。我心里明白,这是日寇在枪杀我中国同胞,当日寇又进来要十个人出去时,我就出去了。这时约在上午八点多钟。我刚站进水里,见日寇正准备举枪射击,我一个猛子栽到河里,在水底潜游到对面已被炸倒在河里的火车肚里,这时我可以看见对岸的鬼子,鬼子看不见我,我躲在火车肚里亲眼看见十人一批、十人一批被日本鬼子枪杀,从早晨直到傍晚,还有六七百人,鬼子把他们一起赶至河口,用机枪向他们狂射。天黑,鬼子走后,我从火车肚出来摸到桥底,因在水里躲了一天,冷得直打哆嗦,把难民丢下的毯子裹着身子盖着头,睡在尸体中间。第二天几个日本兵从桥头经过,发现我在抖动,一枪打来,子弹从我大腿穿过,左手第四指也受了伤,至今在我两腿和左手指上还留着枪疤。到第三天掩埋尸体的伙子见我活着,把我救上来,才幸免一死。

姜根福:南京港老工人的控诉

《史料选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专辑)》代第四辑 1983年8月

整理:彭如清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傍晚,日本侵略军自中华门入城后,沿途烧杀抢掠,逃难的市民,拥挤在中山北路和中央路上,日军追来,用手榴弹、机枪向他们投掷、扫射,几万名手无寸铁的难民都惨死在马路上。中央路、中山北路顿时变成了两条血路。日本侵略军从城里又杀到城外。

那时我刚满七岁,一家八口,住在一条破划子上,为了躲避日寇,父亲将破船向三汊河方向划去。到了石梁柱,不幸划子漏了,无法划行,全家人只好弃船上岸,沿着圩堤向前行走。那里的老百姓都逃走了,沿街全是空房子,但我们不敢住,父亲和母亲带着我们姐弟分开躲进芦苇丛。因为母亲没有奶水,三个月的小弟弟啼声不止,被路过的日寇听到,顺着哭声找来,他们发现了我的母亲,企图奸污,我母亲竭力反抗,灭绝人性的日寇,竟从母亲怀中夺下小弟弟活活摔死。母亲哭着扑向小弟,日寇又开枪将母亲打死。日寇走后,父亲含泪将母亲和小弟埋在芦苇岸边。

第三天日寇又将我的父亲活活抓走,一直杳无音信,又两天后,日寇又来到芦苇丛,看见我十一岁的二姐,竟要奸污她,二姐逃跑,日寇紧追,跑到现在的河运学校附近,终被抓到,二姐怀着满腔仇恨,连骂带踢与鬼子拼打,鬼子恼羞成怒,抽出军刀将二姐从头劈为两半!剩下的我们姐弟四人,都吓得哭作一团。就这样几天之内,日寇杀死我家三口,又抓走了我的父亲,使我家破人亡,姐弟四人失去依靠,度过几年不得温饱的流浪生活。

后来幸亏遇着好心的工人,分别收养了我们弟兄,才免于冻饿。但同胞手足不得不活活拆散。直到解放后人民政府帮我找到了两个弟弟和日寇进城时就被冲散的大姐,我们姐弟才得以见面。但最伤心的是三姐,后来被人卖去当童养媳,早已夭亡。

这都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给我家带来的不幸和苦难。

李秀英：一场殊死的搏斗

《史料选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专辑)》代第四辑 1983年8月

整理：彭如清

我叫李秀英,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日寇的飞机天天在南京轰炸,房屋倒塌,百姓伤亡,人心惶惶!十二月十三日下午,日本兵从光华门和中华门打进城来了,鬼子一进城,见人就杀,烧房子,抢东西,街上的人几乎都被杀光了。我的丈夫和弟弟已经逃到江北乡下避难,我因有七个月的身孕,行动不便,就和父亲留在城内未曾逃走。日本鬼子进城后,我们和一些难友躲在五台山一所美国人办的小学校的地下室里。这个地下室又小又潮湿,挤了二十多个人,白天不敢探头,蹲在里面,又闷又挤。

十二月十九日一场灾难降临了。那天下着细雨,西北风吹得很紧,我们躲在地下室里冷得发抖。约在上午九点钟,六个日本兵,手里托着枪,跑到地下室,拉走了十多个年轻妇女,我也是其中之一。当时我想,宁死也不能受辱,决定以死相抗。我一头撞在墙上,撞得头破血流,昏倒在地。当我渐渐醒来时,知道在日本鬼子走后,是父亲和难友把我抬进地下室放在帆布床上。我感到自己撞得头破血流,不值得,我自幼跟父

亲(我父亲是搞武术的)学过一点武术,练过几天功,为什么不同日本鬼子拼一拼呢!拼死他一个,我也不算白死。想到这里,感到有了勇气。我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父亲,我说:“万一我被日本鬼子杀了,你告诉我的丈夫和弟弟,我没有受辱,要他们为我报仇!”决心下了,什么也不怕了,准备与鬼子拼命。就在这天中午十一点钟,又来了三个日本兵,他们要把地下室剩下的七八个人全部赶出去,其他六七个妇女被两个日本鬼子赶到另外两间屋子里,准备奸污。我躺在帆布床上就是不走,看鬼子怎么办?一个鬼子拿着枪跑来,说什么“中国姑娘不要怕”,这时我一团怒火涌上心头,当时我穿着旗袍,这个鬼子来解我纽扣,我看到鬼子腰上挂着一把刺刀,这种刺刀我以前见我叔叔挂过的,刺刀装在壳子里,一般不易拔出来,我稍懂一点,所以很快打开刀壳上的锁扣,握住刀柄,从床上一跃而起,准备拔出刺刀同鬼子拼搏!鬼子见状大惊!要扒开我紧握刀柄的手,同时按住不让我拔出刺刀,同我争夺刀柄。于是一场殊死搏斗就展开了。这时,我早把生死置之度外,我用脚踢、头撞、牙咬,鬼子被咬痛了,哇哇直叫,隔壁屋里两个鬼子听到喊声,就赶过来,被抓去的六七个妇女乘机逃走了。我一个人面对着三个鬼子,死活紧握着刺刀柄,这个鬼子也拼命夺这把刺刀,我们在地上滚来滚去拼命搏斗,其他两个鬼子就用刀向我身上乱砍乱刺,我的腿上被刺了好几刀,鲜血直流,我一点也没有感到痛,脸上也被刺了好几刀,鲜血直冒,衣服被染红了,我还是拼命地搏斗,最后,一个鬼子用刺刀向我肚子上刺来,我肚子向后退,只感到烁的一声,眼前花了,立刻昏倒了,以后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了。

鬼子见我已经死去,也就走了。鬼子走后,父亲回来见我已“死”,伤心备至,白天不敢抬出去掩埋,等到傍晚,鬼子收兵了,父亲和难友在五台山旁挖了一个泥坑,准备把我埋葬,他们将我放在门板上抬出来行走的时候,由于门板的晃动和外面冷风的刺激,使我渐渐苏醒过来,父亲听见我有微弱的呻吟,就赶快喊我“秀英,秀英!”我耳里好像听到亲人的呼叫,便微微睁开眼睛,用非常细弱的声音对父亲说:“我没有死,我要活下去。”

父亲设法将我送进鼓楼医院抢救,第二天,我怀胎七个月的孩子终于流产了,我浑身是伤,又肿又痛,满身血斑,头发根都结成了血饼,医生

将我头发剪光,那时脸肿得像个血盆,经医生检查,我身上一共被刺了三十七刀,嘴唇刺破了,鼻子刺破了,眼皮也刺破了,吃饭从嘴里进去,又从鼻子出来。后来医生帮助我一块一块用线缝起来。经过了七个多月的医治,才使我恢复了健康。但是日本鬼子想杀害我的罪证,至今在我身上还找到不少。

张学濂:刀光血影下的幸存者

——南京沦陷前后的回忆

《白下文史》第五辑 1988年12月

1937年12月13日是南京历史上最悲痛的日子——南京被日寇攻占沦陷。笔者是在日寇南京大屠杀中的幸存者。近观《屠城血证》后引起我的回忆,当时日本侵略军的种种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烧、杀、淫、掠滔天罪行,比影片所揭露的更加惨重多倍。笔者仅以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略述于下。

南京沦陷前

南京是1937年12月13日沦陷的。日军分三路向南京进攻,形势告紧,政府机关及工作人员开始大批疏散撤退。12月1日南京市内已呈现战时气氛。12月5日,下关江边已有伤兵撤下待运。次日,传出日军逼近汤山,城中已隐约听到炮声。8日晚,新街口福昌饭店门前落一炮弹,炸死炸伤多人,遥望城南上空烟雾迷漫,不时有红光冲起。9日,敌军攻到麒麟门,枪炮声更密,八府塘也遭到炮击,敌机在市区上空盘旋侦查,南京已危在旦夕。10日新街口地区遭敌炮击,市民死伤甚众,人心惶惶,大批市民向北方奔逃,南京已完全进入战时状态。走不掉的市民纷纷弃家躲入难民区。12日下午,中山路、山西路街头堆积沙包,交通阻断,但无一兵一卒驻守,至13日夜敌军蜂拥入城,南京遂告沦陷。

在南京沦陷前由在宁国际友人组建“难民区”,划定范围为中山路以西,广州路以北,山西路以南,西侧靠近城根。人们到了难民区满以为是进入了安全地带,而事实并非如此。难民区内设有十几个收容所,所有

房屋都住满难民,男女老幼挤在一室,一间十余平方米的房内要睡 20 多人。笔者一家三口(夫妻俩及一弟)即进入难民区,在当时金陵大学(即今南京大学),因房内已满,连每层楼梯上晚间都要挤睡两三人。笔者就在楼梯上度过一个夜晚,其状之惨实难尽述。

南京沦陷之后

12 月 13 日,日军从中山门和光华门攻入城内,以机枪开路,见人即杀。在难民区外有不少舍不得抛弃家室留守的老人及小孩,日寇看到不分老幼一律刺杀或枪杀。掠夺财物后纵火烧房,在难民区内看到区外到处是火,映红了天,日夜任其蔓延无人扑救。每条街巷路旁及屋内,都能见到被残杀的尸体,直到一个多月后还陈尸路旁无人收殓。

在难民区内也毫无保障可言,日寇借口搜捕中国军警闯入难民区内,见到男人或就地枪杀,或被强行拉去集体屠杀,尤以 14 日至 16 日最为疯狂。笔者当时挤住在鼓楼渊声巷维庆里二号一幢二层楼内,15 日早晨日寇闯入搜捕将所有男子驱至楼下,迫令 200 多名男子 4 人一排列队由 4 名日寇押至云南路五条巷口与从其他地方搜来的难民聚集一起,总数不下千余人。鬼子逐个观察头、手、面容以及全身各处,绝大多数人都被叫到靠中山北路一边,分别押到几个地点用机枪集体杀害。我的弟弟张学庆,姑父戴幼三和其他被押走的男人都一去未回。笔者当时害了几个月的疟疾病尚未好清,骨瘦如柴,站立不稳才被放回,幸免于难。我们被释回后和那些躲过搜捕的男人们仍日夜川流不息地遭到鬼子毫无人性的侮辱与蹂躏,被强迫拉走做苦役。不从者或遭毒打或被枪杀,笔者即曾被毒打数次。

日寇进城后,除疯狂屠杀我国同胞,焚烧抢掠外,更惨无人道的是如饿狼一般到处寻找妇女进行轮奸、强奸,鬼子三五成群,见到妇女不分老幼拉到室内进行轮奸,前走后来,妇女被蹂躏得死去活来。稍有反抗即遭刺死,连孕妇、老嫗均不得免。以后更公开强迫少年妇女为妓,设立“慰安所”(妓院)供鬼子玩乐,据说,如不同意设置慰安所,就不能制止官兵奸淫。这是多么无耻的禽兽逻辑!

以上是笔者在南京沦陷前后所见所闻的一部分,是日本侵略者对中

国人民犯下的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我们要教育我们的子孙,永远牢记住这历史上的惨痛一页,决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更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

倪宝富:难以忘却的历史一幕

《栖霞文史》第二辑 1994 年 2 月

访问:夏爱景、贡强、李发祥、惠新英

今年暑假,我们几个同学有幸走访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倪宝富老人。虽然我们不想牵动老人那颗滴血的心,但为了让现代青少年能从中得到启示或思索,我们还是请老人翻开那不堪回首的一页……

(一)

倪老人今年七十五岁。很健谈,气色也很好,我们向他说明来意,他沉思一会儿就很动感情地讲开了:

“一九三七年,我才二十一岁。这年的年底,日本小鬼子侵略南京时,我们岔路口一带房子全部都给烧光了,东西都给抢光了。日本鬼子见人就杀,对老年人就用枪打,年轻人则绑起来,用刺刀挑开肚子,有的甚至被用竹片从喉咙直捣到胃,那样子,真惨啊!当时在乱草堆中,在池塘边,到处都可以看见被杀害的同胞,我们岔路口村的王呆子、老韩、王东海等等不就是给小鬼子用枪打死后扔到茅坑里的吗?最惨的还是吴光德的老婆,这群禽兽不如的东西用毛竹片插入她的下身……”

听着倪老人的话,我们的眼睛都湿润了,我们仿佛看到了那一具具目不忍视的尸体,那一幕幕惨不忍睹的场面……

老人抹了抹眼睛,苦笑着说:“我的亲人、我的邻居都被鬼子杀死了,但我还活着!”我们紧接着问:“您是怎样脱险的呢?”老人想了想接着说:

“那是一九三八年初,我同村里的几名青年人逃往燕子矶,准备从那里过江到江北,中途正好碰上一小队巡逻的日本鬼子,只见日本鬼子叽里呱啦地示意我们停下来,我掉头一看情况不好。日本鬼子已经从后面端起枪来对准我们,这时想逃只能白白送死,只好硬着头皮停下来,一群

鬼子赶了上来，一个军官模样的鬼子走过来就给我们几个耳光，还用刺刀挑落我们的帽子。我们看到鬼子凶神恶煞的样子，敢怒不敢言，只能咬紧牙在心里骂道：‘我操你祖宗八代，你们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鬼子仔细地看了我们的额头和手掌，并用枪托打我们，才放我们走，但没走多远，后面突然响起了枪声，我想肯定是鬼子又追上来了，大家头也不敢回，拼命往前跑，子弹就在头顶上飞。这时同村的彭叔标倒下了，但情势太急，没法救他，只是向前跑，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才到了江边，江面上全是烟，水上漂浮着尸体和被击碎的木船，看着这一切我们都禁不住哭了。”

老人还沉浸在回顾往日所引起的深深的悲痛之中。我们几个中学生，以前只是从一些报刊中得知一些日军大屠杀的事情，现在则有了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好像是自己也在受骂、挨打、被侮辱。那惨不忍睹的场面历历在目。是呀！多少善良的中国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丧生，我们中华民族的后代难道能忘记这一历史耻辱吗？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让我们记住那血腥的一九三七！

(二)

我们又从倪老那里了解到，解放后，政府安排他进了南京铁路分局，倪老人虽然文化不高，可是有一身的好本领。以前在旧社会抬不起头来，新社会人民当家作主，他工作干得欢了，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并热心地手把手地把本领传给青年一代。党和人民同样给了他很高的荣誉。他曾光荣地出席了五八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劳模代表大会，受到了各级领导的嘉奖和鼓励。

一谈到这些事情，倪老显得很自豪：“小同志，不瞒你说，我老头活了一辈子，还是共产党好，日本鬼子怎样？凶！国民党怎样？狠！到最后还是共产党领导咱们得了解放。”老人越谈兴致越浓，从抗战一直谈到解放战争，谈到现在，他对共产党直竖大拇指。我们禁不住问：“你是党员吗？”“是。咋不是？”老人把眉毛一扬，异常自豪地回答：“我现在可是享受天伦之乐的人哪！你们看我儿孙满堂，这房子砌得多漂亮，真的，没有共产党，哪有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呀！”老人突然问：“你们不信？”我们笑

着说：“信信，哪能不信，我们也是共产党的接班人呀！”老人马上眉开眼笑了，自信地说：“有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一定能胜利。”

(三)

这一次采访给了我们一次极为深刻的教育。我们的先辈为什么受到外国战争狂人那样的惨无人道的欺侮呢？是落后，是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才使人民民不聊生，才使人民受苦、受难，才使人民遭受这血腥的屠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终于得到了自由，得到了土地，得到当家作主的权利。是的，我们应该坚信，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应该相信没有革命先辈们出生入死，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但是，我们不能放松警惕，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从没有放弃过对社会主义的颠覆。作为现代的青少年，我们的头脑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警惕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和平演变战略。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跟党走，做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为人类最崇高的事业献出一生！

历史虽然翻过了那不堪回首的一页，今天的中华民族不再被人称为“东亚病夫”。我们伟大的祖国，好似东方巨龙！在纵情地腾飞！

为了人民，为了国家，为了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我们绝不能让历史重演！

尚德寿：日军残害了我的父兄

《江苏文史资料》第80辑 1995年8月^①

整理：李永勳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我的一家，直接被日本人害死三人，弄得我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是受难者的亲属，每忆及此，辄捶胸泣血，悲愤不已！

我家世居南京城南，经商为生。在南京沦陷前夕，全家老小随街坊群众避居城西宁海路一带的难民区，原以为在难民区有国际人士出面维

^① 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该辑为《腥风血雨：侵华日军江苏暴行录》专刊。

护,要比较安全些。岂料日本侵略军无视国际公法,竟侵入难民区捕杀居民,强奸妇女,抢掠财物,无恶不作。

有一天,忽有几个汉奸和一些带枪的日本兵闯入难民区,见到年轻人就捆绑带走。我的胞兄尚德仁(当时 25 岁)、堂兄尚德金(当时 28 岁)都被日军捆绑带走。尚德仁之子尚照富(乳名长江)当时才五岁,见其父被捆绑,他抱膝牵衣,又哭又喊,不让其父被带走,被日军踢倒在地。当时在场老少人等,被吓得惊恐不安,但还以为这是日军抓劳工,不久会放回来的,岂知这时日军已开始了大屠杀。

我家被捉去两人从此再没有回来,显然已被杀害了。以后日本兵不断地到难民区来捉人,时常枪声四起,各处火光冲天,南京全城陷于恐怖之中。难民区也不安全,难民们的性命朝不保夕,人心惶惶!

我们弟兄四人,尚德仁是长兄,原指望他撑门顶户,养老抚幼,不料他被日军杀害。遭此不幸后,家中景况衰落,长嫂带着刚满两岁的小女儿改嫁了,留下五岁的儿子随祖父生活,经济拮据,生活艰难。亲友们也因在那恐怖时代,自顾不暇,也无力相助。我父不得已去帮人做些杂务活,挣钱勉强维持生活。我父因丧子之痛,身体日益衰弱,经常生病。

不幸的事又发生了。1939 年,我父帮人送货,在途中经过三山街时,被一日军蛮横地推倒在地上,一跌不起,终于丧命。这是我家死于日寇之手的第三条人命。我父亲死后,经亲属草草殓葬。日寇残害中国人手段毒辣,当时我们受难同胞的亲属只有含恨于心,永远铭记着这个国恨家仇。

我父丧命后,我侄尚照富从此住所不定,生活无依,饥寒交困,情状十分凄惨。后来他流落异乡,随人漂流到台湾,吃尽千辛万苦才苟活下来。

1989 年,我侄照富由台回宁探亲,母子兄妹相见,抱头痛哭。亲友们目睹此情,无不怆然泪下。母子分离 40 余载,重逢团聚时间短暂。岂料照富侄探亲后返台,不到一年其母突然去世。照富来宁奔丧,与其妹跪在母亲灵前痛不欲生。我侄返台后也忧郁成疾,经多方交涉,其妹才得办理签证赴台侍候。

堂兄尚德金是我伯父的长子,被日本人残害后,从此家中无得力之

人,其妻未生子女,后改嫁而去,弄得家破人亡。

我们尚姓亲属,每年清明前后都要到江东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凭吊亡魂、祭悼亲人。馆里的遇难者名碑上,尚德仁、尚德金也名列其中。

1946年,我的二哥尚德义以南京大屠杀事件见证人身份,被选送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审问大屠杀祸首松井石根等日本战争罪犯时作证。他返回南京后,愤慨地对亲友说,在军事法庭上,日本战犯开始百般抵赖,继而在屠杀人数上进行狡辩,并聘请律师为他们辩护。后来经过当年留在南京的国际人士及南京目击证人当庭作证,在大量的人证、物证面前日本战犯才不得不承认犯罪事实。

杨吴氏、张春林、陈继明、王寿春、杨雨彩、王志林等:燕子矶日军大屠杀见证

《江苏文史资料》第80辑 1995年8月

整理:胡汉林

1937年12月中旬,侵华日军攻陷南京城后,在南京燕子矶地区,疯狂地进行了一场大屠杀,共杀戮了中国军民5万余人。

笔者走访了当年经历过这场灾难的幸存者,听取了他们的讲述。提到这场灾难的情景时,他们无不满腔愤怒地说:“日本法西斯军队,实在太野蛮,太凶狠,太没人性啦,实在是太可恨啦!日本帝国主义欠下的这笔血债咱们世代绝会忘记的!”

现住燕子矶镇临江街62号之二的杨吴氏老太太,就是这场大灾难的见证人。她生于1913年,属牛的,今年82岁。当年,她家住燕子矶大王庙附近窑场的三间瓦屋里。那时因为家穷,没有钱往外出逃。听到日本人来了,就找地方躲藏起来。她说:日本兵住在仁和里的汪炳生家(现在是和燕街27号),抓到十几个中国士兵,逼着他们互相用绑腿带捆起来,一起赶到小清河边,用机枪给打死了。接着,日本兵又从肖坤家里抓到十几个中国士兵,就在肖家的院子里用机枪给打死。汪炳生也被鬼子抓住,用布给蒙上眼睛带走了。这个汪炳生,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杨吴氏还讲到：当时长江里有日本军舰，拦截往江北出逃的中国士兵和老百姓，江岸上也有日本兵，追杀中国人。日本兵在此地杀了一天一夜，燕子矶山上、小清河西岸、荒草地里和江边芦柴滩上，到处躺着死人，江边堤埂上死尸堆成堆，燕子矶东头大洼荡里都给死尸填平了。

杨吴氏还气愤地说：那年周景治的母亲，年纪30多岁，正在小清河边涮马桶，被日本兵看到了。日本兵不问青红皂白，跑过去就用刺刀挑死了，还将尸体拖到周景治家门外，人的肠子露在外面，血淌了一地，死得真惨！日本兵来到此地，还到处向中国人要“花姑娘”。这地方有好几个妇女被日本兵给奸污了，有位妇女被七个日本兵给轮奸了。更可恨的是，有的日本兵奸污了妇女就把她们杀死。

张春林，现住燕子矶新燕街33号，生于1911年，今年84岁。他也是日本部队在此地大屠杀时的见证人。那年，他因为母亲患重病，日本人到来之前未出逃。日本兵来了之后，他白天躲在山林里晚上等日本兵走了，再回来伺候母亲。

张春林讲：当年，他在燕子矶开饭店。那时候，燕子矶街上，住有200户左右人家。人们听说日本兵要来了，好多人家都逃难出去。没出逃的妇女，都用土灰抹在脸上，躲避日本兵的污辱。日本兵来了后，到各家各户搜查中国士兵；日本兵向户主问话时，动不动就开枪打人，有时用洋刀砍，有的用刺刀刺。那天，一姓吴的妇女，被日本兵抓到了，七个人轮奸了她。这位妇女受了污辱，又受惊吓，事后生了重病，没活多久就病故了。这都是日本侵略军在中国造的孽呀！

张春林还讲：那天，日本鬼子发现芦柴丛里隐藏着中国士兵，就让翻译、便衣队喊话说，中国士兵赶快出来，缴枪不杀！那些藏在芦苇丛里的中国士兵真的出来了，都把枪放了下来。结果呢，这些中国士兵，都给日本鬼子逼着相互用绑带拴在一起，被赶到江边，用机枪给打死了。那天，日本部队就用这种办法，将抓到的中国士兵，抓到一批杀一批，燕子矶街上、燕子矶周围、小清河两岸，到处是被打死的人。

陈继明，现住燕子矶和燕街13号之一，1912年生，今年83岁，也是日军大屠杀的见证人。他说：那年，日军在此地大屠杀时，父亲被日本兵抓走了，之后就下落不明。当时，还有个叫胡大个子的，也被抓走，下落

不明了。新燕街一户姓周的,户主的儿子叫周敬豪,在小清河也被日本兵打死。日本兵像杀人魔王一样,杀死的人,到处都有;在住户家里,在江边上,都有死人。有的地方死人成了堆;燕子矶西边三台洞、大窝子那地方,被日本兵杀死的中国人就更多了。

王寿春,现住燕子矶东边,笆斗山东里,门牌 65 号。他生于 1911 年,今年 84 岁。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任过笆斗山乡的乡长。当年,他亲身经历了日军大屠杀时的不幸时日。

王寿春回忆当年景况时讲:那年,日本兵在燕子矶一带烧、杀、淫、掠,无恶不作。这笆斗山附近,中国人被杀害的也不少,还有五名妇女被日本兵奸污了,有一家的房子也给烧了。1937 年 12 月 16 日那天,有一个日本军官骑着大洋马,还挎着洋刀,后面跟来一些日本兵。他们在此地,把搜查出的 36 名中国士兵赶进一座小房子里,用机枪打死。日本兵还把住在此地四名居民,也给打死了,一个叫唐梅海,一个叫胡裕厚,一个是和尚,还有一个住在江边草房里的名叫石头的驼背老人。日本人临走时,又搜查出 100 多中国士兵,都押解到燕子矶以西杀害了。

杨雨彩,现住燕子矶西边渡师石村 41 号,生于 1928 年。他说:日本人在此地屠杀中国人我亲眼看到过。当时,这地方被日军杀死的中国人有成千上万。其中大部分是从龙潭、栖霞山撤退来的中国士兵,也有一些逃难的老百姓。日本兵跟在后边,一边追一边用枪炮轰打;此地通往城内的大路两边和通往栖霞山的大路上,都有很多被打死的中国人。此地西边,有个叫大窝子的地方,被打死的中国人足有一万多,那片洼荡里的水,都成了红血水。那情景,真是惨极啦!

王志林,现任燕子矶镇文化站站长,他家住本地奋斗村,原名叫仇家庄。他是 1937 年 10 月生的。他一家,在日本兵大屠杀时,有三口人被杀害了。一个是他的祖父,一个是他的大伯,一个是他的叔叔。

王志林说:日本帝国主义是法西斯,是杀人魔王。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的罪,造的孽,中国人讲也讲不完,诉也诉不尽。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欠下的血债,我们是仇难解!恨难消!气难平!日军在南京杀了中国同胞 30 万,仅燕子矶地区就杀了 5 万多;我们燕子矶街,包括各村各居民段被杀害的有 2 000 多人,被奸污的妇女有 200 多人,还有几百

户人家的房屋被烧毁。这,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犯下的滔天大罪!

刘永兴:对日军在中山码头大屠杀的回忆

《江苏文史资料》第80辑 1995年8月

整理:曹敦沐、邢胜华

我叫刘永兴,1914年生,今年81岁。1937年12月12日,日军攻陷南京城的前一天,我家从中华门东搬到了大方巷后面的难民区。我家有父亲、母亲、弟弟和我的妻子共五口人。

1937年12月16日下午3时左右,一个日本兵闯进门来,把我和弟弟叫出门,一个翻译说:“皇军在江边来了一批货,叫你们去搬货。”我们先到国民党华侨招待所的大操场,天将黑时,操场上坐满了人,都是20多岁的青年人。当时我23岁,我弟弟20岁。日军叫我们六至八个排成一排,向中山码头走去。

我和弟弟走在平民队伍的前头,看到一小队拿着枪的日军走在最前面,接着是30多个被俘的国民党军警,后面是被抓来的平民百姓。队伍的两旁有日军押着,还用马驮着30多挺机枪,队伍的最后是骑马的日军军官。一路上,我们看到路两旁有不少男女尸体,大部分是平民,也有一部分是中央军。

到了下关中山码头江边,我们以为去扛货,再也没有想到是把我们拖去枪杀,因为我们不是当兵的。当时我们看情形不对,周围都架起了机关枪,日军军官拿着指挥刀,我的心慌了。我们是被逼的,膀子上带着膀箍,白布上有个红巴巴。日军把我们的膀箍一齐拿掉,把被俘警察的帽子扔掉。这时还有人陆陆续续被捆着押到江边来,二三十人一串,连同我们先来的共有好几千人。日军命令我们坐下,然后用机关枪扫射。我和弟弟与坐在一起未被捆的人商量,与其被日军打死,还不如跳江吧,死也死在江里。于是我们就一起往江里跳。这时,天已黑了,日军也急了,除继续用机关枪扫射外,又往江里投手榴弹,死的人多得不得了,江里、江边都是死人。一阵混乱之后,我和弟弟失散了,以后再也没有找到他。算我命大,我随水漂流到一艘搁浅的军舰边,后来又被波浪

冲回到岸边。我伏在尸体旁,吓得不敢动弹,只听到喊爹叫妈声和猛烈的机关枪声、手榴弹爆炸声。我的耳朵就是在那时被震聋的,至今还留下残疾。机关枪扫射以后,日军又向尸体上浇汽油,纵火焚烧,毁尸灭迹。夜里,日军还守在江边,看见江边漂浮的尸体就用刺刀乱戳。我离岸较远,刺刀够不着,才幸免一死。

天快亮时,我从江里爬上岸来,浑身全是泥水和血水,当时就找了件死人的衣服换上,看见一个农民挖的防空洞,就一头钻了进去,躲了一天又冷又饿,等到12月17日天快黑时才敢爬出来,跑到下关三所村,那儿有个尼姑庵,庵附近住了一些农民,我跟他们说好话,才住了下来。后来我又被日军抓去做苦力,那个罪不是人受的,日本兵还叫我带他们去找花姑娘,我想我没死掉也不能害人,就说不知道哪里有,日军就打我。后来不知道日军从哪里抓来一个女人,说是让她洗衣服,当晚一小队日本兵就把她折磨死了。

12月28日,日军要去小丹阳,才把我放出来。回家后,我母亲听说弟弟被害了,痛不欲生,她悲伤过度加上病痛,不久便去世了。

仇良矩:日军在南京民间的掠夺罪行

《江苏文史资料》第80辑 1995年8月

作者:仇良矩

1937年8月15日,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对南京开始了狂轰滥炸。此后,对南京空袭几乎从未间断。我们全家为了躲避空袭,9月初就举家溯江西上,匆匆搭船去汉口避难。临行时仅带了极简单行李,以为国民党不会连首都也丢了。不料想12月份南京竟然沦陷了。敌人入城后残酷地杀害无辜平民,烧毁大批房屋,还掠夺了大量民间财物,其中包括藏书、字画、文物等文化遗产,其价值无法统计。日本侵略军罪行累累,罄竹难书。据沦陷时留在城内的人说,敌军入城后闯人民宅搜寻女人、财物等等,稍有不逞即纵火离去,那时全城火光接天,加上被残害的同胞呼叫声,其景象惨不忍睹。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普及教育,一般人都有小学以上的文化程

度,日军士兵都是征来的,也都有一定的文化,有的或多或少还认识一些汉字,知道中国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文化遗产极为丰富。所以日军除抢夺财物外,还把搜寻文物书籍、字画也作为掠夺目标。日军把掠夺来的文物、书籍等物品集中在珠江路某处,经过整理运回日本,也有少量的被日军官兵个人据为己有。

我家原住在中华路金沙井7号,祖祖辈辈都是读书人,算是书香门第。祖先们收藏了一些书籍、字画、碑帖、古董,我父亲仇垞(字亮卿,号述庵),尤其爱好藏书和字画,经他收集的数量也不算少。原先,我父亲有间书房50多平方米,四周都是书橱。另外,还有一间专门藏书的大房间,不仅四周摆满了书橱,而且中间还摆了二排,橱中放满了藏书。因为我家不是大富之家,不可能专门考究收藏版本之最,主要是为了读书才藏书的,其中也有一些善本、孤本和抄本。躲避空袭时,我家人慌忙出走,什么都没动。

日军占领南京后,日寇在我家住了一年多。从1937年下半年到1938年下半年,我家四处逃难,以后全家才落户上海。南京的住处临时由亲友看管。我曾于1941年回到南京,走进家门满目凄凉,书房里的书橱全没有了,书籍遍地都是。经过初步整理,发现善本、抄本被一扫而光,不剩一本;字画、碑帖全被掳走,一张不留;古玩同样一件也没有了。据邻居告诉我,鬼子要搬走的那几天,周围居民都很紧张,当时连看都不敢看,只知道装了几卡车东西运走了。所幸鬼子没有放火烧房子。日军在杀人放火的同时,还专门搜集那些善本书籍、字画、碑帖、古玩等有价值的珍贵物品运往日本。侵华日军疯狂掠夺,给中国文化事业带来的损失,造成的破坏是无法估量的。

我父亲的好友石凌汉(字云轩),是南京有名的中医、词人,原住在大石坝街,家中藏书极多。他住的房子最后一进是三大间“河厅”,全是书房,其中一间放有写字台,四周全是书箱、书橱。他的藏书中有多种医书孤本和孤本词集。南京沦陷后,日本人派专人把石家洗劫一空,临走时还放火把房子烧掉了。石家的损失比我家更大,尤其是他的那些医学书籍非常珍贵,求之不易。这里仅举我们两家的损失惨况,其他类似的读书人家损失惨况南京还有不少,如果调查统计一下,数字肯定惊人。这

也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欠下南京民间的一笔债。

严兆江、赵本洁、张仁炳等：北家边有冤魂六千

《江苏文史资料》第80辑 1995年8月

整理：梁其强

北家边是一个不大的村庄，在南京太平门外，位于栖霞区尧化镇乌龙村，距宁栖公路甘家巷车站向西5公里处。1994年12月13日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悼念日，当地群众首次揭露侵华日军曾在这里屠杀6000余名国民党士兵和老百姓。笔者闻讯后先后6次来到北家边，寻访侵华日军在此杀害我无辜同胞的“万人坑”，向社会公布了这一历史惨案。

严兆江，76岁，男，当年参加掩埋尸骨于“万人坑”的唯一幸存者。他指着村头土路两边各有一口方圆上千平方米的水塘说：“这就是57年前的‘万人坑’。当初，我和20多位乡亲在塘里捞死尸埋，捞了半个多月，足足有6000多具尸体在这两口塘里。那时，我们是等日军走后，村民们自发组织起来的，带上木棍、布条做的简易用具，去塘里收尸。先收有头有身子的整尸，后收光有身子的无头尸，最后用网捞头、胳膊、腿的分尸。有一次，我用网捞，一下子就捞上来7个人头。这些尸体全埋在附近的乌龙山、黄毛山和‘万人坑’附近了。”说到这里，严兆江老人面目便阵阵抽搐，痛苦不堪。“我不能想，一想起1937年的大屠杀我就合不上眼，能有几夜睡不着觉。那塘里是人垛人、人叠人呀，水都被染红了。惨得很哩！在塘边的一个水井里，还捞出一个被日本鬼子‘倒栽葱’扔进去的国民党兵，硬是被水呛死的。捞出来时还有一把盒子枪，可能是当官的。”严兆江老人被日军抓去当民工，日日夜夜给鬼子烧水，一天吃两个剩下的饭团充饥，幸免于难的他亲眼目睹了日军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把国民党士兵和老百姓集中起来后，用刺刀逼着往水塘里赶，先用机关枪扫，后来人多了嫌费事，就把成箱的手榴弹往人群扔，炸得血肉横飞，日军手舞足蹈，哈哈大笑。一些日军仍嫌不过瘾，不够刺激，就在塘边用东洋刀砍头，用刺刀挑肚子来残杀中国人。

赵本洁,80岁,男,自23岁起一直都是戴着假牙生活的。他指着自己的嘴控诉道:“我这一嘴牙齿,就是被日军一枪托砸光的,这一辈子我都戴假牙。在‘万人坑’遭屠杀的大都是国民党兵,附近的老百姓只要碰到日本兵,也是死路一条。1937年底,一群日军冲到我家抢粮食,母亲不让抢,被刺刀捅了几刀,我上前去护母亲,被日军一枪托砸在嘴上,并用白布勒着我颈子,沿路往‘万人坑’拖,拖到半路上绳子断了,我拼命地跑到乌龙山的山洞里藏起来,半夜偷跑回家,母亲已被日军捅死了。”

张仁炳,73岁,男,北家边乡办工厂退休工人。他说道:“距北家边二里路有个炮台,驻着许多日军,疯狂地杀、烧、淫、掠,老百姓提起北家边一带都毛骨悚然。王家湾有个才20多岁的青年,路过北家边时,被日军拦住,用东洋刀砍了头,头滚到水沟边,牙齿还在动哩!”

夏奶奶,83岁,提及日军恨得直咬牙:“那时候,这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中年妇女都用锅灰往脸上涂抹,有的在家里挖地窖,把女孩藏起来,女人们脸不洗、头不梳,任衣服发臭,任虱子乱爬,让头发发馊、结饼,忍耐臭脏,才免遭毒手。”

赵乃富,51岁,尧化镇政府会计。他回忆道:“1953年,有人在万人坑附近盖房子,地基才挖下去一尺多一点,就看到了成堆的尸骨,吓得掉头就跑,房子也不敢盖了。”

赵乃泉,66岁,南京炼油厂退休工人。他告诉我们:“我的两个叔叔就是在‘万人坑’被日本鬼子杀死的,大叔叔是被枪打死的,小叔叔是被刀砍死的。”

向北家边村民访问得知:“万人坑”原是修筑土路时,在道路两侧取土垫路基形成的洼地。当时,守卫炮台的国民党官兵未来得及撤退,被日军围住后,用铁丝网封住,成连成排押往北家边杀害。

乌龙山炮台位于尧化门北面。据乌龙村71岁的村民夏安荣介绍道:“1937年12月14日,四艘日本军舰经吴淞口直逼南京,这时江阴炮台已沦陷,敌舰到了镇江十二圩一带水域向南京进发,炮台上的大炮集中火力向敌舰开火,吓得敌舰不敢动弹。这时炮台下面的成千上万老百姓赶快渡江逃命,长江水面上黑压压一片,农民们扛来铺板、大门、竹床等,扎成小木排漂过江去。后来大炮不响了,下午时分,日军从陆地上向

炮台包围过来,围住了约有两个多师的国民党官兵。这近5 000人被日军抓住后饿了三四天,一个个没有一点反抗能力了,全被带往北家边‘万人坑’枪杀了。”

陈坤林:日军枪杀村民目击记

《江苏文史资料》第80辑 1995年8月

整理:张修淮

我叫陈坤林,今年79岁,是南京市浦口区路西村村民。1937年,我已有21岁了。记得阴历十月二十六日国民党军队从南京慌忙撤退,士兵过江逃跑无船坐,用树棍绑扎着盆、锅渡江,许多人被淹死漂在江面上。日本兵到浦口后,将逮住的中国士兵和老百姓,用长绳子捆绑在一起,或关在广福油坊大院内用机枪扫射;或赶着下长江,凡是往岸上爬的,就用刺刀戳;或将他们用船运到江心,一起推入水中。死者难以计数,我们邻村孙家凹的徐加清父亲就是其中的遇害者。

阴历十月二十八日,鬼子就到乡下骚扰了,我有两次与日军遭遇,亲眼看见日军枪杀了几个乡亲。一天,我们到浦镇东门去卖柴,过了三河乡桃园村,眼见杨家村边地上躺着几个老百姓,还望见三个鬼子叫一百姓站直,在他头上放一只碗,然后用枪打。碗打碎后,鬼子手舞足蹈狂笑,那个百姓瘫倒了,我丢下柴吓得跑回来了。

我住的陈庄也接连遭到鬼子的横祸,开始,鬼子进村迟,张正田的父亲天天拄着拐杖,站在山头上望风,见到鬼子就喊:“鬼子来了,鬼子来了!……”村民们听见就往山里钻。鬼子进庄抢些吃的,我家的一头大猪,蔡长珍家的两头小猪都给鬼子戳死剥皮后烤着吃了。一次鬼子天微亮就进了村,被我老婆下塘沿淘米时发现,喊了起来,村民多从后门溜进了竹园。我来不及穿上棉衣,上身只套一件白大褂,怕招鬼子眼,就急忙脱下挂在树上,赤膊钻进了竹丛,浑身都给荆棘划破了。邻居张淑兰望见递了一条麻袋让我披上。大伙翻过山梁,奔向金亭庄去躲避,发觉那里也有鬼子,还在路边沟里看到在金亭庄林立鼎家耕田的大师傅被打死头朝下栽着。我们又急切地往村后梨柿洼跑,看见了我们庄的二蛮子、

朱四炳和二瘪子被鬼子杀死在石棠树下。鬼子走后,我们回村,又看见有两人被鬼子打死了,一个是在褚家放牛的刘小六子,被鬼子一枪打在腿上,一枪从耳朵打进去,死在陈家塘边;另一个是张必旺的姑娘金女子,早晨放牛到塘埂上,人、牛都挨着了枪弹,一路血迹,人、牛都死在她家门前。这一次,林马庄的一个妇女未跑及让鬼子奸污了。我父亲陈德玉也未走脱,鬼子抓住他,逼他把抢到的鸡挑送到东门去。他回来说:沿途见被鬼子打死很多人,在汤庄鸡头山下一堆就有七八人,他认出有当地村民林立松。过两天,我姐夫王松扬来躲难,说三河乡吴庄接连遭洗劫两天。第一天,鬼子追一个姑娘没有追上,撞着村民王松贵就用他泄气,先打耳光,后用枪打在他肚子上,他挣扎在麦地里,滚撒一片血,到晚才死。第二天早上,他兄弟王松奎刚准备抬他出门去埋,又碰上鬼子进庄。鬼子将尸体及他家房子浇上油一起烧了。

刘志华、丁笃等:死里逃生的刘王氏

《下关文史》第四辑 1995 年 8 月^①

我母亲刘王氏,乳名王羨,1906 年生于安徽省宿县(今宿州市)夹沟,1930 年随当铁路大修工的丈夫刘凯之来到南京,住在下关宝塔桥。

1937 年农历冬月十一日(公历 12 月 13 日),日寇侵占南京时,我父亲刘凯之正在江西修铁路。母亲准备与一批市民逃离南京途中,被日军抓住,押往下关江边集体屠杀。母亲目睹了自己的同伴倒在日寇刺刀下之后,也被日本鬼子捅了一刺刀,从背后腰间到胸前腹部“攘了个穿心透”,当即昏死倒地。她两日后苏醒,口渴难耐,爬到江边找水喝,被红卍字会的人发现而得救。

对当年的遭遇,母亲不时断断续续地对人讲或自言自语地重复这样的话:

“鬼子冬月十一进南京……我在煤炭港让鬼子兵逮住。男男女女,都让刺刀攘死了……三个男的,攘死了;两个女的,挨几刀也死了……鬼

^① 南京市下关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子刺刀从我背后攘了个穿心透,我啥也不知道了。两天过去了,我口渴,爬到江边找水喝,人家把我抬进宝塔桥1号红卍字会……”

在侵华日军在南京制造的那场空前浩劫中,母亲虽然得救了,但是给她留下的却是无尽的痛苦。在生理上,每逢阴雨天,伤疤剧烈疼痛;两耳也早已变聋,炸雷听不见,家人没法与她通话。在精神上,被“鬼子的刺刀、流血的煤炭港……”等一连串可怕的记忆折磨着。

我母亲的恐惧症与日俱增,10多年以前,已经到了神志不清的程度,常说胡话:日本鬼子要杀她。她不停地喊:“鬼子来了”,“又要杀人了”,“我痛,我痛……”。她白天紧闭门窗,并把门死死抵住,往床底下钻,每次都吓得浑身发抖,直到筋疲力尽倒在地上,脸色苍白,眼神发直。

我们对她看护偶有疏忽,母亲便会到处乱跑,说要找地方躲起来。1978年的某天,母亲出走到车水马龙的大街上。这对一个耳聋、神经不正常的老人来说,每时每刻都存在着危险,简直把我们吓坏了。找了一整天,最后我们才从新街口石鼓路派出所将母亲领回家。

50多年来,我们千方百计为母亲治病,采取了各种办法。长期以来给母亲服用大剂量的镇静药,即使高出常人数倍也无效,日本鬼子端着刺刀屠杀中国人的影子始终无法从她脑海中消失。药物对母亲来说已不起作用,多少个日日夜夜,主要是靠我们精心护理和照料。我们的孩子从小就学会了打手势,用自编的哑语同她说话。长她一岁的丈夫与她相濡以沫,终日陪伴着她,以慰其伤残之心。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侵华日军的暴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莫大的灾难。然而,谁能料想到,当年的国仇家恨之痛,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延续了半个多世纪。为了世界和平,为了人类幸福,请牢牢记住这段历史的教训吧!

黄仲萍:江面浮尸 惨不忍睹

《下关文史》第四辑 1995年8月

1938年春,在南京沦陷约4个月后,我与友人从家乡仪征乘小木船去南京,船出泗源沟口沿长江西行,至大河口时,突然发现江滩芦苇间有

一具被江水泡得硕大的尸体,复前行,相继发现类似这样两三具一摊的尸体多处,何止数百具。每具尸体都被江水浸泡得肿胀庞大,惨不忍睹,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据船家相告,这些尸体都是从南京方面漂淌下来的,多数为日寇兵舰攻击南京时对附近江面逃难木船滥肆扫射的遇难者,也有部分是在幕府山江边遭日寇集体屠杀后被推入江中的尸体。

崔省福、孙有发、全德发、金福顺:幸存者及遇难者亲属的控诉

《下关文史》第四辑 1995 年 8 月

整理:萧宏书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崔省福,讲述当时被日军屠杀时死里逃生的经过:1937 年 12 月 15 日夜里,下关发电所 47 名工人和数千名难民被凶恶的日军拘禁在煤炭港江边,已经两天一夜没吃没喝,又冷又饿,站立在潮湿泥泞的江滩上,冻得失去了知觉。妇女抱着孩子坐在地上,棉裤湿到了腰,冻得浑身发抖。在黑鸦鸦的人群中,大家紧紧靠在一起,用身上仅有的一点热气相互取暖。就在这时,突然听到也不知道有多少挺机关枪,啪啪地对着我们难民开火,顿时人群惊叫起来,喊声、哭声、机枪声连成一片。一颗子弹从我胳肢窝打进去,由后背穿出来,只觉得耳朵里嗡的一声,倒下去什么都不知道。待我醒过来的时候,天已麻麻亮,棉衣已被血水浸透,难受极了。当我慢慢抬头向岸边看时,满地都是被日本侵略军枪杀的难民。他们死得多惨啊!这时,已见不到一个日本兵了,于是我忍着疼痛,爬过无数个死人,终于逃了出来,成为大难不死的幸存者。

老工人孙有发以耳闻目睹的事实控诉日军屠杀南京人民的罪行说:12 月 14 日,日军进入英商“和记洋行蛋厂”,将逃至蛋厂内外的数千名难民(包括电厂几十名工人)全部赶到煤炭港江边拘禁。我和电厂几个同事被日本兵叫去替他们烧饭,仍回到蛋厂,成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之一。15 日夜间,日本侵略军架起几十挺机枪,对准拘禁在江边的数千难民,以密集的子弹进行集体枪杀。血流成河,尸积如山,惨不忍睹。第 2 天,受了伤还没有死的,以及又从别处抓来的难民,约有 400 余人,被凶恶的日

本兵拖的拖、赶的赶，一起关在煤炭港的机房仓库内。日兵浇上几大桶汽油，把机房门关死，连房子一起烧。顿时大火熊熊，机房内惨叫声、哭骂声像针一样刺痛我们的心。我和几个同事在厨房的窗口看着，个个咬牙切齿，含着眼泪，又不敢哭出声来。而那些日本兵围着大火哈哈大笑，从中取乐。

1950年11月，遇难亲属、青年工人全德发在下关发电厂召开的“反对美帝重新武装日本控诉大会”上抢先跑上讲台，以满腔怒火控诉了当年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制造惨绝人寰大屠杀的罪行：“首都电厂下关发电所45名工人因奉命留守，坚持送电，也被那些毫无人性的日本兵集体枪杀。我父亲全小宝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死得好惨呀！连尸体都没有找到。当时我只有5岁，与母亲相依为命，我那可怜的母亲整天痛哭流涕，因悲伤过度，没有多久也含恨去世。从此，我就成了一个孤儿，过着难以想像的苦难生活……”讲到这里，他已泣不成声。接着，遇难亲属、青年工人金福顺走上讲台，他声泪俱下地控诉说：我父亲金义宝也是那一天在煤炭港被日本侵略军集体枪杀的。临死前，他高声呼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从这以后，母亲带着我和一个吃奶的弟弟，流离失所，到处躲藏。有一天，听到有人喊：“鬼子兵又来了！”母亲抱着弟弟拉着我和其他难民一起，跑到一座桥下面躲起来。弟弟哭着要吃奶。这时已听到鬼子兵的脚步声，母亲怕弟弟的哭声被日本兵听见引起杀身之祸，于是解开棉袄，将弟弟的脸使劲地往怀里裹着，不让他哭出声来。等鬼子兵的脚步声走远后再看看我弟弟时，弟弟脸孔已发紫，停止了呼吸，活活地被闷死了。从此，我们母子二人渡过了苦难的8年岁月。金福顺接着说，这血海深仇，我没有一天忘记过，也永远不会忘记，忘记就是背叛。人们的血泪控诉，激起全厂职工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无比愤恨。“反对美帝重新武装日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成为大家的共同心声。

李锡奎：我在难民区困了九个月

《四川统一战线》1995年第12期

作者：朱小鑫

眉目慈祥的李锡銮老人现是四川邮政运输局汽车大修厂退休职工。虽已 77 岁高龄,身板却相当硬朗,思路清晰,记忆力非常好。半个多世纪前近 280 个日日夜夜中发生的事,他记得一清二楚。下面是他对那段屈辱历史的回忆。

1937 年 12 月 13 日,日军攻占民国首都南京,日军的坦克、卡车、马队及步行的士兵狂吼着往南京城涌。当时,我已逃到美国人设立的难民区。当天难民区四周就布满了荷枪实弹的日本兵。管事的美国人四处安慰我们:日本人不敢破坏国际公约,难民区是安全的。但第二天一早,日军就闯进难民区,专抓中国士兵,我们这个点有五六百号青壮男子,被赶着人挨人地从一个挎指挥刀的日军军官面前走过,日军主要通过观察头发(小平头),额头上带帽子的痕迹,再看手上的茧子来判断是否当过兵,发现一个士兵就抓一个。那时,我还不到 20 岁,又比较矮瘦,像个小鬼,轮到我时,就被放了,老实说当时我害怕极了,低着头,慢慢地走。横穿过街道,对面是德国人办的难民区,我一进去,马上躲进厕所跟着蹲在那里,一直呆到天麻麻黑,听人说日本人走了,才敢出来。五六百号人只有一二十人被放了,其余全部抓走枪毙了。

1938 年 1 月的一天,日本人二闯难民区,把男人全部赶到金陵大学。操场上黑压压一片,估计有 2 万人以上。汉奸翻译站在石板上训话。意思说,要大家当皇军的良民,安居乐业不要反抗。当兵的,可以站出来,皇军优待,还要安排工作等等,重复讲了几遍。

人群中的老人暗暗告诫,千万不要站出去,便硬是有三四十个人懵懵懂懂被骗出来。放人的时候,日本鬼子在大门排列两队,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枪,让我们从中间走,又有一二百人被拉出来和被骗的三四十人当场枪毙了。

过了不几天,日本强盗开着卡车三闯难民区,这次专门挑选二三十岁的妇女,装满一卡车,估计三四十人,这些妇女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又过了几天,日本鬼子四闯难民区,这时难民区里男子汉已不多,老的老,小的小,他们就抓了七八个我这般年龄的人,正在此时,一个大胡子看到情况危急,赶紧跑去找来了一个高个子的美国牧师,那牧师赶到,用身子挡住我们,用中国话对日本鬼子说,他们(指我们)是我的教徒,一

边用手比划着,一边指着他胸前的十字架,反复说基督徒、基督教。几个日本鬼子叽里呱啦说了一通,终于不情愿地挥挥手,转身走了。我算是三过鬼门关,留下了命一条。

那时,我人年轻,一天24小时在难民区待不住,就大着胆子往街上跑,还有几次返回老宅——程阁老巷瞧了瞧。整个南京满目疮痍,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房子被烧了;街上见不到人,唯有红十字会的人在拉尸体;路面、墙边一摊摊一块块已干裂的黑红色的血迹非常刺眼;巷头、门角还不时有尸体。那年冬季很冷,空气中飘散着臊腥的人血气味和焦糊味。国破山河碎,七朝古都,千年石头城,竟成了屠宰场、骸骨冢、墓地、废墟。

1938年初,我因为谋了个邮递员的差事,有了一辆自行车。记得是开春了的4月份的一天,我骑车路过当时的美国使馆附近。路口有一个日本宪兵在站岗,我不情愿给日本鬼子行礼,就绕到他背后,悄悄地骑走了。差不多骑了一百米远了,忽然听到一阵哗啦哗啦枪杆的声音,不好,我一侧身,连车带人滚到田畦里,那日本鬼子一边招手让我回去,一边用日本话咒骂着。我刚到他面前,他一个耳光向我扇来,打得我眼冒金星,耳鸣鸣响。从此以后,几十年我一直耳鸣、耳背。接着他用中国话问:“良民证的有?”看了“良民证”后,他警告我,再发生这种情况,枪毙。末了还命令我给他行礼。这次躲,不仅没躲过,还挨了一耳光,当时我眼眶里一圈屈辱的泪水,心里默默地呻吟,亡国奴,亡国奴,我是亡国奴啊!

难民区并不安全,鬼子随时随地可能进来抓人,难道我就如此苟且偷生地当亡国奴?我左思右想,心中开始滋长起一个越来越坚定的信念,我要逃,决不当亡国奴。不绝的耳鸣也变成了“亡国奴、亡国奴”的吟声,像鞭子一样抽打着我。

1938年9月,我很幸运地从南京逃到上海。一到租界,我就把“良民证”撕了,抛进了黄浦江,结束了我个人历史上最耻辱的9个月的亡国奴生涯。我买了张船票乘英国船“苏州”号到香港九龙,后又到广州,再从广州到衡阳、长沙,最后辗转到柳州、贵阳,漂泊到重庆,因我大哥在成都的邮局工作,最后我又来到成都。

回首往事,感触良多。我在难民区困了9个月,亡国奴一般的生活使我的良心一直不能平衡。我想,如果当时我遇上抗日游击队,或许我

也会扛枪打鬼子去,但毕竟这没成为事实。但我是20岁的热血青年,有反抗的能力,在当时条件下,赤手空拳与日本鬼子拼斗是愚蠢的,但逃跑的体力总有吧,所以我逃跑了,我的心愿就是不当亡国奴!恨只恨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国力衰败,抗日不力,还同室操戈,导致中华民族遭此空前大劫难,这是一场历史的大悲剧,我是一名受害者。

去年,我携妻子回到了久别的故乡南京,专门去祭扫了几处南京大惨案冤魂的亡灵。触景生情,老泪纵横。

“访旧半为鬼。”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活在世上的已不多,更“应共冤魂语,投诗赠‘天下’”——祝愿我们的后代在阳光普照、鸟语花香、万紫千红的环境中健康成长。

王鹤标:从首都沦陷到逃出虎穴^①

《鼓楼文史》第七辑 1996年1月^②

八、大撤退

廿六年十一月七日敌军杭州湾金山卫登陆,北路敌军切断南翔,南路北进作钳形包围,迫使国军后撤。五十万大军于十一月八日夜沿青浦公路西撤,敌机数十架尾随轮翻扫射,伤亡无数,使我官兵星散,失去战力。因我家在河北省白洋淀湖区,从小就会游泳,当敌机来袭时,我就跳下公路边的水渠里,侥幸未被扫中,这是我六十年来第二次劫难。

十一月十八日退至南京,八十八师师部设内政部,时政府机关大部迁武汉,市面异常萧条,残军惊魂甫定,又奉命防守中华门光华门一带城防。十二月初江阴失守,十二月八日敌军占领芜湖,南京退路全失,顿变孤城。

九、首都沦陷

廿六年十二月日寇长驱直入,未受阻拦。从上海到南京沿途预筑的

① 1994年,王鹤标先生写了一篇名为《浮生六十年》的记事录,从1934年投考军校开始,写到1994年止。内中记录了1937年随军赴上海抗战及南京沦陷后被困经过。这里,刊出了《浮生六十年》的第八至第十四节。

② 南京市鼓楼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国防工事,没有发生丝毫作用,俗话所说的兵败如山倒,诚非虚言。十二月上旬日军前哨已到光华门外,随即展开炮轰,十二月十三日凌晨攻破,首都沦陷。

十、沦为鬼蜮

廿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夜,战况告急,随军向挹江门撤退。城防军卅六师奉令守城,在挹江门前摆下重机枪交叉火线,不得出城。坐在挹江门边城墙下耗到十三日天明,只好放弃出城希望,脱下军服,随难民进入华侨招待所难民收容所(日军攻陷南京前,南京教会方面派人到城外与日本军部联络,请求鼓楼以西地区划为难民区,但未得日军认可)。十二月十四日零星日兵进入收容所,带走年轻妇女,并搜索每个难民身上的财物及香烟。一时中年妇女脸上都涂满烧饭的锅黑,但也不能幸免。

人的求生欲望是最强的,在十三日早晨进入收容所时,看到一位老先生手举救世军旗帜,带着十几个难民到收容所,我认定这位老先生是位热心救人的基督徒,他名李炳森,夫妇二人作小成衣生意,他原籍徐州,南京落户,太太是南京人,有一个眼睛失明,夫妇年龄都约五十多岁,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儿子。我找到李老先生很坦白地对他说,我是当兵的,在八十八师政训处担任中尉政训员,我是北京人,家乡在河北省保定东安新县,家有老母和新婚妻子,现在只有靠老先生救我了。他毫未考虑,慨然应允。

十二月十五日上午大批日本宪兵进入收容所,把年轻的男人全部驱到前面广场,日宪兵队长经翻译告诉大家,凡承认是当兵的可以免死!随即将这群人带到新街口交通银行仓库后院,供了一顿菜汤黄萝卜干米饭吃,押回收容所。十二月十七日上午日本军又进入收容所,再次把年轻男人驱到前面广场列队,有一个害怕不前的,宪兵队长立刻予以枪杀!这时门外排列若干辆大卡车,把全部年轻人顺序押上车。我因恩人李炳森老先生相救,他把和我事先想好的说辞向年长的大胖汉奸请求,说我在书店当学徒,不是当兵的,请他转达日宪兵队长。大胖汉奸嫌他多事,责问他为什么袒护北洋人?经李老先生苦苦请求,胖汉奸才答应转达。日宪兵队长准我出列,我举步出队,背着队长脸的日本兵没看见队长的

指示,打我嘴巴,我闪过去没有打着,就这样未登上死亡列车。

据说日军把这两千人运到长江边,先用机枪扫射,再将死尸全部投到长江里!这是我六十年来遭遇的第三次劫难!也是最长一次劫难。这时全城处处枪声,烟火弥漫,满街死尸,而最显眼的是穿着整齐的黄呢子军服和黄皮鞋的年轻身高的教导总队官兵死尸。日军奸杀掳掠,无所不用其极!日军比赛杀人的数目,有一日兵在一天内杀死一百多个中国人而获得冠军(这是教会方面传来的消息)。据我官方估计,日寇进城后,共屠杀我军民卅万人。

十一、领发安居证

廿六年十二月廿五日,日军布告在金陵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颁发安居证,声明廿七年一月发现无证者,以军法论罪!当日凌晨挽李炳森老先生往候,全城二十万人依次排队候领,有鹄候终夜者,地点是女子文理学院旁银匠营广场,每次约放入棚内二百人,廿七日午我被放进,二百人立在木台下,日军少佐于野站在木台上,以流利的北京话先向南京父老兄弟道辛苦,并宣称皇军宽大保护良民,好的百姓不要掩护当兵的。继说为潜伏的中国兵留一条生路,凡当场自认的,绝对保障生命安全。再加以威吓说,领过安居证再办五家联环保,如发现居民有保中国兵情形的都枪毙!最后加重地说这是最后的一条生路,万勿错过!

于野讲完,汉奸詹荣光上台又重述一遍。并大声疾呼:“我是中国人,绝对不骗中国人。”经此哄骗后,一次放进棚内的二百人中,站出来自认的廿余人,约十分之一强。鹤标当时抱定至死不当俘虏的决心,虽然恩人李炳森当时也劝我出来自认,我终不为所劝,宁遭枪杀,也不苟且偷生。日军顺序检查,先量我身高一百七十四公分,注明高大(那时日本人大多是矮子)。再检查我手掌有无老茧,因为持枪日久,手掌心必磨出老茧,幸而我担任政训工作,除有特殊任务外,并未经常持枪,因而又闯过这一关,领到安居证,这是我六十年来第四次劫难。

十二、难民医院分院挂号员

八十八师政训处处长曹君植最关心我的安危,他常担心地说:“你的

身体高壮,又是北方人,一看就是当兵的。”曹处长和鼓楼医院院长是旧知,鼓楼医院院长兼难民医院院长,他指派曹君植担任分院主任,院址在金陵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对面图书馆内。曹主任派我当分院挂号员,月薪六块大洋,手臂套上红十字会臂章,生命暂时获得保障,但我觉得长此下去,将何报国?

十三、大恩未报

南京城沦陷两个月后,因城内物资匮乏,尤其是粮食蔬菜及日常食品,城内外小贩已有进出交易。又听说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化装逃出去,遂与同事五人共商如何出城。出城的前两天,我到收容所向李炳森老先生夫妇报告,李恩人说,你好不容易这条命捡回来,现在又有了安全的工作,还为什么要去冒这个险?我答说,长此下去我就落伍了,这样活着有什么价值?还谈到什么尽忠报国?居然把李恩人说服,他夫妇嘱咐我临走的前一天到他那里去,他夫妇为我做油饼当干粮在路上吃,并向神祷告保佑我一路平安。对我有救命之恩的这对老夫妇,令我永生难忘!总想找机会有所回报,谁料抗战胜利不过三年,而山河板荡,至今大恩未报。李恩人夫妇那时已五十余岁,现在已有一百一十多岁,不可能尚在人间。不过我知道他儿子的名字,但望将来有机会能追报一二,稍了心愿。

十四、逃出虎穴

廿七年二月七日黎明,与同事五人化装小贩(我背着麻袋,里面装着十五包小大英香烟),守门兵也未多问,遂逃出水西门。步行廿里过上新河到大胜关渡口,正赶上午前守渡口的岗兵换岗离去,下午岗兵还未到,遂胜利登舟。因大江流急,要到对岸,必须由纤夫把船向上游拉上去一段放下才成。纤夫拉了十几分钟,就听到换岗新兵来到渡口鸣枪示威,但是江岸很高,日本兵再也看不到我们了。纤夫拉了半个多小时,才放舟驶向对岸。这时江风爽爽,突然来了一个浪花,打了我一头一身,好舒服!好快乐!方体会生命与自由之可贵,这是我六十年来第五次劫难。

融通：一个小和尚眼中的南京屠城

《鼓楼文史》第七辑 1996 年 1 月

多年来，从报刊杂志上读到不少有关控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滔天罪行的文章，可是都没有我亲眼所见的那样具体。今年，我已 74 岁，回想当年，日军的暴行仍历历在目。我昔日的日记尚存，今摘录数则，以警示后人。

第一次看见刺刀捅死人

民国二十六年(1937 年)十二月十三日(农历丁丑年十一月十一日)星期一，天气晴朗，温度 2 度。今天比前几天平静多了，日本双翅的战斗机飞得很低，连上面的人都能看到，似乎是在侦察什么，从头顶上飞过去的声音特大。城里高射炮停火，城外也不向城里开炮，机枪、步枪声很少。天气干冷，妈叫我和她一同去张府园家中拿棉衣，吃过早饭就一同去了。这时我临时住在石鼓路口的罗汉寺里。我们刚走到催八巷东口(今秣陵路)，见丰富路由南向北排列五路纵队前进的日本兵，路边有六七个居民好奇地跑出来看。只见这个方阵有百余人，一律穿黄呢子军装，扛着步枪，一面日本国旗，另外还有一面长形黑色在边上面有字的旗子。队伍后面是一门不太大的大炮，由骡子拖着向新街口方向前进(此处即今市公安局两边大路)。队伍过去后，我和妈从曹都巷经大香炉到张府园家中，匆匆拿了点棉衣、大米等，仍按原路回石鼓路罗汉寺。街上没有人走路，我心里有些怕，不料刚走到催八巷，一眼就看到一个老太婆手提着一个淘米箩，被刺刀戳死在小巷口；在巷口对面洋房门口还有被刀捅死的一个中年男人。另外还有一个中年男子挑了两篓木炭回难民区，也在这里被日军刺刀捅死了。挑炭人的妻子跪在尸体旁边，大哭大叫。我和妈见了魂都吓飞了。妈急忙叫我不要走大路，穿过三茅宫，从宫后山绕回罗汉寺。今日想来，早一步也将会遭到同样杀害，这是第一天第一次见到日军大屠杀。

第一个汉奸在高喊

今天太阳很好。我和同院的小朋友在院中晒太阳，四周寂静得很。

突然听见大门外路上——石鼓路由西向东有人边走边喊：“日本皇军进城啦！不烧杀掠抢，大家不要怕，快出来欢迎呀！”我把门拉开一条缝，向已走过的人一看，见是一个高瘦男人，戴一顶旧呢帽，穿一件旧蓝布大褂，肩上扛着有四尺长的细竹竿，上面挂一面日本国旗。我心想，这一定是早就培养好的汉奸，我们的国旗再也不见了，从此便开始尝到“亡国奴”的滋味了。

舅舅被杀我当了和尚

今天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2月15日(农历十一月十三日)星期三，晴朗。一生难忘的12月15日。大难终于落到我的头上了。就在日军进城的第三天，日军把靠做小生意养活我和外婆的舅舅和两个邻居抓了差，向新街口方向去了。隔了一个多小时，只见日军押着三人路过汉中路向汉中门方向走去，三人各扛着一缸酒。从此舅舅再也没有回来。后有人发现三人都死在汉西门四眼井附近，因为汉西门老城门是日军驻防地。舅舅几天不回来，急坏了外婆，可谁也不敢向她讲真话，谎说抓了多少人到日本去做工了，迟早会回来的。于是外婆初一、十五烧香求菩萨保佑、拜佛、求签、问卜、算命，我心里难过，但嘴里却说舅舅没死。她老人家到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夏天终于去世了。而我也就从十六岁起当了和尚。

王太太被强奸了

今天是农历冬月十六日，天气晴朗。我和外婆住在罗汉寺，庙里和尚早已逃走了。外婆的干女儿也住在这里，他男人是瓦匠包工头，生了个儿子才三个月，都住在寺中厨房里。我到前边院子里晒太阳，突然大门被人敲得咚咚直响，我连忙答应“来啦！”跑去开门。哦！原来是两个日本兵，前面一个手提红缨枪，穿了双白色尖头皮鞋，枪上溅满了鲜血，不知从何处杀了人又闯到这里来了。后边一个日本兵挟着步枪。前面的进门手一伸，抓着我的衣领(和尚领)一拉，四件衣服的扣子全被拉坏了，见此他才把手一松向后去了。当时如果用红缨枪捅一下，今天也就少了一个揭露其罪行的人了。他先进厨房小门，一眼望见抱着小孩吃奶

的王太太。走过去不容分说,一手把孩子抓过来摔到案板上,小孩便哇的一声哭叫起来了,外婆赶忙抱起孩子来哄。两个日本兵拖了王太太出了后门,向隔壁酱园店老板家去了。隔了不久,王太太回来了,抱起孩子就哭道:“要不是为了孩子,至少我要弄死一个鬼子兵。”外婆只有劝劝她,不要再提此事,也叫我不许再讲了。

一枪杀害两代人

沦陷已经十天了,人们也摸出日军的活动规律:他们早上不出来,要下操跑步、吃饭,所以住在难民区的城南居民,一早结伴从大路走,回家去看看。走到府西街六谊楼茶馆门口(今市一中学大门东边),被步枪一枪打死两个人。一位长了白胡子的老者,肩上骑着一个小男孩,一枪从老头面部射入,从小孩肚子穿出,老者手抓着小孩的小腿,倒在路边。这里住的是中岛部队。后来听人讲,老头扛着孩子回来,按理说这一老一小,日本鬼子总不会杀害吧,可是畜生不如的哨兵居然一枪打死他们祖孙二人。

屠杀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

南京大屠杀除街头巷尾遇上老百姓就杀之外,所有从外地调来的中国新兵,皆二十岁上下,也遭到杀害。一个老兵带一个班新兵,新兵从四川、广西等地来的,南京都下霜了,他们还穿着裤头,打着绑腿,住在市一中学校内。这些兵因人生地不熟,上面命令撤退过江集合,下关无船,被日军包围在大路上。日本兵喊:“缴枪不杀,全部在大路上列队站好。”可当中国兵放下枪按要求站好队后,日本鬼却把几挺机枪架好了,一声令下,中国士兵全部倒下。一个老兵是保安队的,在几百人的后边,听到机枪响他先倒下被压在死尸下边,直到日军走后,到夜里才逃走。(保安队直属首都警察厅,该队曾驻防城隍庙,次年夏天幸存者曾来庙中谈及此事。)像这样大批杀害俘虏的事件,当时,在下关江边,中山门外卫岗、龙膊子、灵谷寺的松风阁和燕子矶岩山十二洞等处都曾发生过。

罕见的诱骗大屠杀

南京是当时中国的首都,估计有一半人在大屠杀前已随政府内迁,

做大生意的人也走了。余下的四分之一,下乡投奔亲友,还有四分之一的是穷人,想走也无处去。加上外来的新兵,城里的人还是很多。当时的难民区(新街口→汉中门→龙蟠里→虎踞关→西康路→赤壁路→江苏路→山西路→鼓楼→新街口)一大片地区除房子里住满了人,连大路边也搭起芦席地棚,地上铺稻草,有的买不到芦席就挂起布帐子挡风。听说这个区域是在沦陷前由美、英、法等国与日本军部划定的,保证不轰炸、不炮击、不扫射。可是沦陷后,由汉奸组成的维持会成立了。街上贴出布告,叫居民限期十天去指定地点领取“良民证”,随身携带,便于查核,没有此证即视为支那暗藏军人,就地枪决。男女从十六岁到六十岁都要去登记。指定地点共有六处,我就知道宁海路金陵女子大学一处,我是在那里登记领证的。

已登记三天了,师傅有病不能去,请公园路西方寺妙机老和尚(约五十岁)带我去的。进了大门,除了一条水泥直路外,全是草坪,有几棵大松树,在草坪上用桌子搭了一个临时讲台,去的人很多,先到台前听讲话。一位身材不高穿长袍马褂的中国人登上讲台,明确地讲:“……你们当中要有当过兵现在还想当兵的请出来,站在那边;你们当中有不想当兵想回老家的,皇军给路费,你们自己回家;本市居民,失业没事做的,现在要打扫战场,可以去做工,四毛钱一天,妇女老太太不要。大家考虑好,分队站好。”草坪上停了五辆土黄色军用卡车,专门送人。不一会,分类上车,装满后车就开走了。每辆车大约装有五十人,大都站在车厢里,等车开出去,不久后就又回来再装,五辆卡车从上午到下午五点,开个不停,去何处?不清楚。不去的人就到只容一个人宽的竹栏杆内,从东向西排队走,栏杆外有两个日本兵,一个挟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来回巡视,另一个手拿一根毛竹棒子,看到哪个不顺眼就在头上敲一下。他专门挑人的帽子,看额头上有无当兵戴帽子压的圈,再看手掌上有无当兵磨的老茧,有怀疑的就叫去做工。妙机老和尚,身材不高,一脸短胡子,黑皮肤,虽是和尚头,却用一条染成灰色的大浴巾在头上挡风寒,当时和尚白天都这样子,他没主动除去头巾,拿竹棒的日本兵就在他头上敲了一下,他差点被打昏过去,额头上立刻就肿了一个大包。我跟在他身后,因为没有带帽子,光着头也就没有挨打。走出竹栏口,有三张桌子,两张桌子

上有两个年轻人,他们一边问一边写。“良民证”是用一张和现在工作证芯子大小的道林纸印制的,折起来正面印有“南京市”(上边小字)“良民证”(大字),旁边印有“维持会”,里面不贴相片,只填姓名、性别、年龄、籍贯、住址、职业等。另半页是注意事项,不许借给人,不许转让他人,要随身带着,以备检查。如果没有,就按支那军处死,期限十天登记结束。

就这样到了第七天,居民产生了怀疑,怎么被车拉去的这些人没有一个回来呢?吃住怎么解决?天又冷,没有行李不就冻死了吗?难道维持会长陶锡三是说假话吗?其实从这里拖走的人,全部拖到广州路向西过了火葬场,那里人家很少(我外公的坟就在此处),有菜地、竹园,在两山之间有一条路,那里早已架好机枪,等车上的人一下车,车再开走后,机枪一响,下车的人,全部遇害,然后再拖到水塘里去。看来这事很保密,山上有岗哨,山下居民早被扫荡死光,谁会知道这个秘密呢?原来,离杀人场不远,有一座庙,名善庆寺(今清凉山扫叶楼)。有一位知诗词、善画的老和尚名叫寄龕,当时五十多岁。日本人大屠杀前在这一带扫荡时,他发现大批日军进寺后乱喊乱叫,自己也听不懂,就藏在用砖砌的空芯神台肚子里。他每天听到汽车向山里开,一会儿机枪响一阵,汽车又向东去。到了第七天,他的干粮也吃完了,天刚有些亮,就偷偷从后门出来,从山上向下看,见到无数尸体吓得目瞪口呆,他立即趁日军没有出来之际沿山间小路到了一个熟人家里,将所见的惨景讲了一遍。大家一传十,十传百。从此,除了老太婆去登记,青年人一个也不敢去了。善庆寺今已改名,寄龕老和尚死于“文化大革命”初期。过去孩子问我,几十万人被杀为什么不反抗?要知道这是在诱骗之下被杀害的,等枪声一响已迟了。

四处放火,人成肉干

南京保卫战初期,有不少伤兵被送进城,许多地方被辟为临时伤兵医院。我就知道一个在王府巷口,专收重伤员,住得满满的。南京沦陷后,没几天,来了十几名日军,带了汽油闯进医院放火,将全部伤兵烧死。据住在王府巷的刘怀义讲,王府巷的棚户区当时还有人住,听到惨叫,又看到失火,人们出来救火,带了水桶等物,可是一到医院门口日本兵示意叫人进去

救火,大家奋不顾身进去抢救伤员,背了伤员朝外冲,日军却开枪射击不许出来,大部分救火的人都困在院子的角落里成了人干。当时南京三山街有两家大布店,一名天福布店,另一家名叫瑞丰和绸缎庄,都被烧掉了。

死人也不得安宁

失去国家保护的百姓要遭到入侵者的屠杀和侮辱,就连死人也不例外,同样遭殃。我的伯母住在上新河,在沦陷前几天病故了。于是停柩在家,供在堂屋中。沦陷前两天家里人都逃到江北去避难了,屋里空无一人,这天中午来了两个日本兵,破门而入,一见是灵堂,布幕后边停了一口棺材,也许他怕是伪装的,里面有什么危险品,于是两人用刺刀将棺材盖撬开。盖子揭去,见是一具死了十多天的老太太的尸体,他们把我伯母从棺材里拖出来,把外边寿衣扒下,日本兵自己穿上,把头上的花冠也戴起来,拿起灵前的“哭丧棒”上了大街,一路上又唱又跳,吓得行人不敢看,这是后来堂兄告诉我的。因为尸体被抛在地上,几天后让猫、老鼠啃得不成人形了。

惨无人道的轮奸

当时我住在府西街城隍庙后边的小房子(房子还在),北边有个三尺宽的死巷子,再北边是砂朱巷小学的教室。沦陷后,南京无水无电,冬天黑得早,吃过晚饭后就睡觉,就在这一天将黑暗时,只听一阵皮鞋声,有两三个日本兵不知从何处拖来一个妇女,拖到小学生的课桌上轮奸起来,只听皮鞋进进出出,日本兵讲话也不懂,女人先是又哭又骂,后也不哭不骂了,我也糊里糊涂睡着了。第二天吃过早饭,我到前边大院子里去扫地,就在这时,一件我终身难忘的事进入我的眼中,烙在我的心上。只见一位披头散发的中年女人,约四五十岁,盘着腿一丝不挂,坐在对大门的青石板地面上,身旁什么都没有,手中拿了一个钥匙圈,上面有几把钥匙,嘴里清楚地在喊:“儿呀!你到哪里去啦?妈在这里等你,快点来呀!家里没有人呀!”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喊,天气在零度上下,光屁股坐在石头上不冷吗?怎么地上会有血?我看了害怕,就去喊韩伯伯,他是庙里管香火的,有七十岁了,他随我来一看,知道是被日本兵奸污疯

了,于是老伯伯把她扶起来,送到房中,送水给她洗,找衣服给她穿,又去厨房弄来热粥小菜给她吃,问她住在哪里。她说,她住内桥湾,儿子两天没回家,她出来找儿子,让住在一中的中岛部队的日本兵一个排轮奸了一整夜。吃过早饭,我们绕道马巷把她送回家,并叫她在家等着,免得儿子回来进不去屋又要去找她,她答应了。其实,我们知道她儿子两天不回来,一定是遇害了。隔了两三个月,她平静多了。有一天韩伯伯去看她,听邻居讲,早半个月她就跳到内桥河里淹死了。因为她男人在日军进城后第二天抓差走了没回来,儿子不知去向,自己又受了日本鬼子的奸污,终于走上了绝路,一家三口全遇害了。

也有强奸不从的,后果是惨遭杀害。在沙洲圩,一个日军追母女三人,母亲先跳塘,两个女儿也先后跳塘自尽。中华路一香烛店门口,日军要强奸一个老太太,老太太反抗,让日军推倒扒下裤子用竹笛从阴户捅进肚里一大半,死在那里,路过的人都见到了。还有的是奸污后用刺刀从阴户向上一刀杀死。

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种种罪行,我只见到一小部分。我要将这些真实情况告诉中日两国人民的下一代,战争使双方人民痛苦,只有和平共处,才能子孙平安。

张学明:南京大屠杀亲历记

《贵州文史天地》1997 年第一期

作者:陈世玉

1994 年 11 月 18 日,《遵义晚报》第二版影视栏目登载一则题为“《南京大屠杀》赴日本挑演员——应征者甚众,剧组难定夺”的短消息。

报纸发出后约一个礼拜,报社总编办公室收到一位读者名叫张学明的来信。我拆信一看,原来他是谈对这部影片导演及剧组去日本挑选演员一事的一些看法。

《南京大屠杀》影片于 1993 年 11 月在南京开拍,1995 年春关机,将在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期间公映。为挑选饰侵华日军南京战区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等人的演员,导演别出匠心地到日本挑选演员,他对此持

异议。他说：“中国人口众多，又有好几家电影制片厂，难道在中国挑不出饰松井石根这样的演员吗？”接着，他在信中又这样说道：“让日本演员饰侵华日军指挥官松井石根，再现屠杀中国人那惨绝人寰的一幕幕场景，我实在是受不了……”

原来，今年75岁的张学明是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人。这则消息勾起他回忆50多年前的血泪往事。

1937年春的一天，只有17岁的张学明担柴进遵义城卖，被抓丁，安排在贵州何知重军队103师的后方医院当一名看护兵。不久，部队开赴上海参加“八一三”大会战，后退守河南。日军攻占南京前，蒋介石为死守南京，调兵百万在南京布防，抗击日军的入侵。他所在部队又从郑州开赴南京，任务是守中山门防区。为死守南京，守城最高司令部下令，将长江两岸所有的大小船只全部拖走，切断守军的退路，使百万大军背水一战。谁知，日军在攻占南京前，并没有直接正面进攻，而是采取侧面进攻：先攻占南京外围的一些县城及村庄，对南京城实行包围和封锁，然后再大举进攻。

由于日军进攻孤城南京凭的是飞机、大炮、坦克，我守军在无援的情况下，本来就难以抵御，而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些高级将领贪生怕死，他们在日军攻占南京前，丢下部队临阵脱逃，能跑的都跑了，守军群龙无首，军心涣散；加之城内汉奸猖獗，利用守军矛盾乘机挑拨离间，使其相互残杀，战时不配合。据老人回忆说：“战斗打响后，他们守的城墙被日军炮火炸开，将士们用粮袋垒起顽强抗击。经与日军激战了几天，但终因无外援而停止抗击，孤城很快被攻破。”

撤退大约是凌晨2点。城内几十万大军失去指挥，混乱得如潮水般向外涌。老翁是这样陈述的：在可怕的拥挤中，即使你腿不着地，也会被人潮挤抬着走。人一旦挤倒在地，即被踩死。当他们撤退时，城门已被汉奸用机枪封锁，不许出城。士兵们只好用背包带和绑腿带从城墙上吊下来。出城后，他们三五成群奔到江边，用木筏子渡江，因黑夜辨不清方向，逃到江中心的一个沙洲上，自以为过江得救了，倒地睡了个安稳觉，等醒来才知还未过江。

这个沙洲挺大，约有2000多散兵集于此无人统领。为逃生，许多士

兵将老百姓的房屋拆掉,抱着木板或扛着木棒横渡长江。12月的冬天,渡江者不是冻饿死,就是被日寇的舰船撞沉和开枪打死,几乎没人过江。未渡江的人,每天在此啃老百姓的生包谷,夜宿草窝。7天后,洲上的包谷杂粮殆尽,房屋拆光,在难以生存的时候,有的百姓返回江南板桥。没过多久,日军用船将洲上留下的1000余人押运到板桥。

上岸后,他们被押在马路边坐着,一坐就是6个多小时。日寇不给饭吃及水喝,人人饥肠辘辘。一路上,到处是死人。小河桥下,尸体成堆,血流成河,惨不忍睹。接着,他们又被押到一个荒凉地带,这里前面有公路和铁路,后面是环山,有经验的老兵见地形不妙,于是喊道:“我们投降!我们愿意当兵!”他周围的一些伪军(蒙古人)大喊:“蹲下!蹲下!”还用土疙瘩打人提醒。就在这时,只见早就埋伏在山上的日军突然出现,明白的人一看便知,敌人要对他们这些手无寸铁的俘虏实行残酷野蛮的集体大屠杀。老翁那时个子小,站在中间,当日寇10多挺轻重机枪齐向他们猛烈扫射时,他随着一排排人中弹倒下了……但万幸的是子弹击中他后面的人,穿过这个死者的身体,又射进他的后背。约过半小时,日军下山在死人堆里检查,发现没死的,就用刺刀捅死,接着用汽油往死人堆上浇,用火焚烧尸体,残忍到何等地步!张学明被压在死人堆里,伤痛难忍想挪动身子,却被压在他下面的人制止。狠心的日本强盗端着上刺刀的枪,又开始查找活着的人。就在这时,他亲眼目睹一位未被打死的人,因周身着火,跳入就近一个牛滚凼里,横着身子在泥水中打滚。火是熄灭了,但人却再也爬不起来了。因12月的寒冷天气,加之他们多天又未进食,饥寒交迫,怎能抵御。当鬼子来到他面前,见其头露外面没死,用刺刀向他的头部连刺两刀:一刀刺进下颈椎上,另一刀刺入脖子正中,刀尖从口出,他血流满面,当即昏死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他才苏醒过来,爬出臭气熏天、烟雾弥漫的死人堆,并目睹了经火烧仍未死的人在痛苦的呻吟声中挣扎着。一些手脚被打断、双眼被打瞎的人经火烧痛不欲生地大骂:“狗杂种,再给老子一枪吧!”好不凄惨,那恐怖的场面简直难以用文字来形容。此时的他,真想快点死去。想跳岩没山,投河又离江远,上吊无树。他抱着一线希望,挣扎着爬过小山,见有几户百姓家,但均挂着“太阳旗”。他爬到麦草堆上

停了下来,是百姓给吃给喝,并叫他藏进山上的防空洞里。第二天天刚亮,老百姓又送饭送水来,并对他说:“赶快到江边去,那里有船送你过江,只要过了江,就好办了。”打霜天,太阳刚一露头,他便赶到了江边。约在此等了三个多小时,才见江北有一条小木船慢慢地划了过来。船一靠岸,两个身着普通便衣的人上了岸,木船立马调头往回划。就在这时,他急忙上了船,船快速往江北划去。船划到江心,撞上日军汽艇船。船夫拼命地划船,并抢过急流,不然就会被汽艇船掀起的波浪打翻。刚划过急流,两船由远到近,日寇大声向他们喊话,并用机枪向他们扫射,他们的小木船共中 18 个枪眼。好在没人受伤。顺着波浪,他们很快过了江,刚一靠岸,船舱进满了水,很快就沉了。

经 1 个月的讨饭和露宿房檐下,徒步经全椒、合肥、舒城、桐城等地,行程 1 000 多里到后方医院治疗,方才活了下来。南京的沦陷,首先遭殃的是他们这些当兵的,接着就是老百姓。在这场震惊中外的大屠杀中,老人至今留下的 3 处伤疤,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所犯下滔天罪行的铁的证据。

虽说 50 多年时间过去了,但只要提起当年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行径,老人怎么也忘不了那一幕幕屠杀的悲惨场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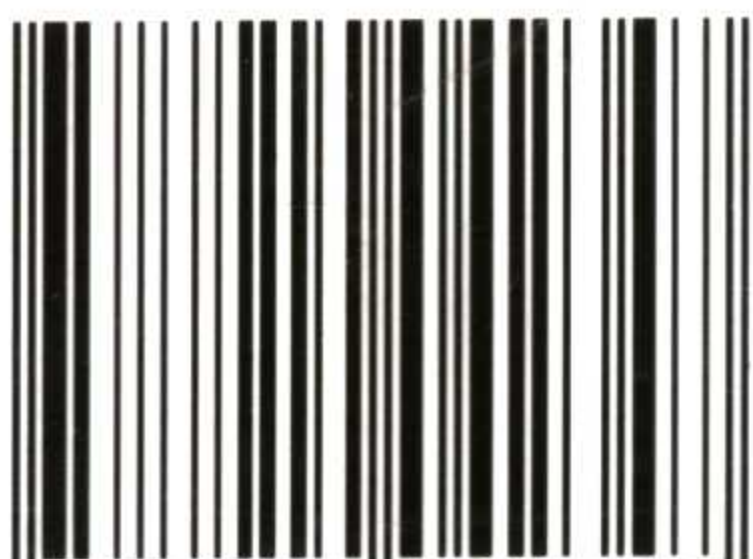


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

②7 幸存者调查口述 (下)



ISBN 7-214-04234-7



9 787214 042347 >